

上下五千年

上古篇
春秋戰國篇
秦漢王朝篇
魏晉南北朝篇
隋唐五代篇
宋遼夏金元篇
明朝篇
前清篇
後清篇
民國篇
中華人民共和國篇

第六卷

科普教育与艺术修养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上下五千年

夏于全 常 桦 主编

第六卷

宋辽夏金元篇目录

第一章 北 宋

第一节 北宋的政治.....	(1)
一、陈桥兵变和北宋的统一.....	(1)
陈桥兵变.....	(1)
李筠李重进反宋战争的失败.....	(4)
吴越入朝.....	(6)
漳泉归附.....	(8)
平定北汉和局部统一的完成	(10)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5)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15)
宋太宗巩固统治的斗争	(18)
三、王小波、李顺起义	(19)
第二节 北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23)
一、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	(23)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23)
租佃关系	(25)

赋 税	(26)
徭役和差役	(27)
二、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	(28)
农业的发展	(28)
手工业的发展	(30)
商业的发展	(34)
第三节 北宋的政治改革	(41)
一、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41)
宋真宗的“天书”骗局	(41)
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恶化	(45)
二、庆历新政	(47)
三、王安石变法	(51)
第四节 北宋后期的统治与农民起义	(56)
一、从元祐更化到哲宗绍圣	(56)
二、宋徽宗、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57)
三、方腊、宋江起义	(59)

第二章 辽和西夏

第一节 辽的社会政治	(64)
一、辽世宗之立	(64)
二、察割政变	(67)
三、辽穆宗暴虐	(68)
四、韩德让辅政	(71)
五、辽圣宗改革	(73)

六、辽钦哀后听政	(76)
七、耶律重元之乱	(78)
八、耶律乙辛专权	(81)
九、辽天祚朝内乱及辽的灭亡	(84)
十、西辽的建立	(87)
第二节 辽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89)
一、畜牧业	(89)
二、农业	(90)
三、手工业	(90)
四、城市和商业	(91)
第三节 北宋与辽的关系	(92)
第四节 西夏的建立和政治经济	(102)
一、我国西北的一个古老民族	(102)
二、大夏地方政权的建立	(106)
三、西夏毅宗改革	(109)
四、西夏梁氏专权	(111)
五、西夏崇宗亲政	(116)
第五节 西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118)
第六节 北宋与西夏关系	(120)
一、延州之战	(120)
二、好水川之役	(122)

第三章 金的建立及北宋灭亡

第一节 女真的兴起和金的建国	(127)
----------------------	-------

一、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	(127)
二、阿骨打称帝与联宋灭辽	(130)
第二节 北宋的灭亡	(132)
一、汴京保卫战	(132)
二、靖康之变	(138)
第三节 金国的汉化改革	(141)
一、金熙宗改制	(141)
二、海陵王改革	(145)

第四章 宋金对峙时期

第一节 宋室南迁时的抗金斗争	(150)
第二节 战争与妥协交替的宋金对峙时期	(153)
一、仙人关之战	(153)
二、藕塘之战	(155)
三、顺昌之战	(158)
四、郾城、颍昌之战与宋王室自毁长城	(160)
五、采石之战	(169)
六、“隆兴和议”和与开禧北伐	(175)
第三节 南宋的社会经济	(176)
第四节 钟相、杨么起义	(182)
第五节 南宋内部的政治斗争	(186)
一、苗刘之变	(186)
二、秦桧专权	(186)
三、孝宗图治	(187)

四、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擅权蠹国	(188)
五、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	(190)
第六节 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191)
第七节 金朝的衰亡	(193)

第五章 宋、辽、夏、金时期的文化

第一节 哲学与宗教	(199)
一、两宋理学和著名的理学家	(199)
二、北宋关学和新学	(205)
三、异军突起的南宋浙东两学派	(209)
四、宋金时期的道教	(215)
第二节 文学	(217)
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217)
二、璀璨夺目的文学奇葩——宋词	(221)
三、启迪后代的文学大家	(228)
苏轼	(228)
辛弃疾	(232)
李清照	(237)
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	(239)
元好问	(245)
四、话本与宋金杂剧及其他民间文学	(249)
第三节 史学	(252)
一、《资治通鉴》	(252)
二、《通志》等其他史学成就	(258)

第四节 绘 画	(260)
一、两宋画苑的绘画	(260)
二、文人学士画在北宋中的兴起	(264)
三、城乡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	(268)
四、靖康之变后的人物画	(271)
第五节 科学技术	(277)
一、誉满世界的三大发明	(277)
二、天文学和数学	(285)
三、地理、地质和气象科学	(291)
四、医学和药物学的优秀遗产	(300)
五、建筑工程技术的光辉成就	(305)
第六节 友好的中外文化交流	(313)

第六章 元 朝

第一节 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统一	(322)
一、蒙古的兴起	(322)
蒙古族的起源	(322)
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	(324)
星空旋转，诸部争战	(328)
二、成吉思汗与蒙古统一	(331)
蒙古国的成立	(331)
臣服“林木中百姓”	(335)
三、蒙古的征服	(336)
统一畏兀儿和西辽	(336)

征夏与伐金	(338)
东侵高丽	(346)
窝阔台侵宋	(347)
拔都西征	(351)
四、忽必烈攻宋	(357)
进攻南宋与统一吐蕃和大理	(357)
忽必烈夺取汗位	(360)
襄、樊保卫战	(363)
南宋首都临安的陷落	(365)
南宋的灭亡	(370)
第二节 元代的社会政治制度	(373)
一、迂回曲折的汉化道路	(373)
大蒙古国时期汉化的初步尝试	(373)
忽必烈推行汉法	(374)
元代中后期汉化的曲折进程	(376)
二、元代的中央官制	(380)
三、行省制度的建立	(390)
行省制度及其特点	(390)
路府州县和基层行政组织	(394)
元朝对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396)
四、军事、法律制度	(398)
五、重吏轻土的官员铨选制度	(400)
六、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	(409)
第三节 元朝的统治者的内部斗争	(411)
一、平定李璫之叛	(411)

二、海都、乃颜之乱	(413)
三、阿合马、桑哥事件	(415)
四、真金继行汉法及其失败	(418)
五、南坡之变	(422)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424)
一、农业与畜牧业	(424)
户口的变化与分布	(424)
土地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兴修	(427)
作物品种、分布与产量	(429)
畜牧业生产	(433)
二、手工业	(437)
手工业发展概况	(437)
官营手工业	(441)
民间手工业	(445)
三、交通运输	(447)
四、商业贸易	(451)
第五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454)
一、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454)
土地高度集中	(454)
繁重的赋税差役及民族压迫	(455)
“开河”和“变钞”	(455)
二、反元教会组织的活跃	(457)
三、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	(460)
“挑动黄河天下反”	(460)
“小明王”亳州称帝	(462)

宋政权三路北伐	(464)
北方红巾军失败及宋政权的灭亡	(470)
四、张士诚集团的蜕变	(471)
五、朱元璋集团的崛起和元的灭亡	(476)
朱元璋集团的崛起	(476)
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	(482)
朱元璋北伐与元朝的灭亡	(483)
第六节 元代的文化	(487)
一、哲学和宗教	(487)
程朱理学的提倡	(487)
邓牧的“异端”思想	(488)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	(490)
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和利用	(493)
二、史 学	(496)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496)
其他史学名著	(499)
三、语言、文学和书法艺术	(500)
《中原音韵》的成就	(500)
八思巴字的创制和推行	(503)
大书画家赵孟頫	(505)
王 冕	(510)
四、元代文学	(518)
散曲的辉煌成就	(518)
元杂剧的繁荣	(521)
南戏的创作成就	(525)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529)
《拜月亭》及其他	(533)
五、科学技术	(536)
郭守敬的科学成就	(536)
元代的地理学	(541)
王祯和《农书》及司农的《农桑辑要》	(542)
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545)
黄道婆与棉织技术的推广	(547)
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	(550)

宋辽夏金元篇

第一章 北宋

第一节 北宋的政治

一、陈桥兵变和北宋的统一

陈桥兵变

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转化为北宋的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赵匡胤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赵匡胤（927——976 年）是涿州（河北涿县）人，生于洛阳马夹营，原是五代周世宗柴荣手下的一名高级军事将领。他跟随周世宗立了战功，得到周世宗的信任，成为禁军的重要将领。周世宗对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十分重视。禁军是后周政权的支柱，是一支劲旅。这支禁军由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分别率领。侍卫亲军司掌握的兵额较多，最高统帅是“侍卫

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殿前司的兵员较少，但部队比较精壮、战斗力很强，胜过侍卫亲军司。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是“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就是后周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掌握了禁军的实权。

五代时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一些军事将领，利用手中控制的武力，从事权力斗争。五代十国各个朝代的兴亡，大多取决于禁军及其统帅的向背。那些掌握禁军实权的大小将领，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往往勾结起来，拥戴自己的最高统帅夺取皇位。后周太祖郭威（951——954年），邢州尧山（河北隆尧）人，是后汉的大将，先后做过节度使、枢密使。他在部将们的拥戴下，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后周政权。那些拥戴他做皇帝的人，都是禁军的将领，如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王殷，以及一部分中级将领如郭崇、曹英等。

公元959年（显德六年），周世宗柴荣去世，由他的7岁幼子柴宗训继位，这就是周恭帝。

赵匡胤由于在军事上威望较高，他和他的一班亲信赵普、石守信等，利用这个时机，共同策划了以夺权为目的的“陈桥兵变”。

公元960年正月，从镇州（河北正定）和定州（今河北定县）传来急报说：北汉联合契丹南犯。后周的宰相范质和王溥等，立即主张派赵匡胤率领禁军予以抵抗。赵匡胤名正言顺，当即带领部队北上。当行抵汴京以北20里的陈桥驿时，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归德军掌书记赵普和军中一班将领，在深夜五鼓，一齐聚集在陈桥驿门，宣言要请殿前都点检赵匡

胤为天子。到了天刚亮时，军士们拥到赵匡胤的寝所，由赵光义入内传达军士们的请求。诸将露刃于庭，赵匡胤的爱将罗彦环叫嚷说：“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于是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皇帝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大家高呼万岁，并把赵匡胤扶上马，准备返回京城、登上皇位。

于是赵匡胤下令：“后周太后和主上（柴宗训），不能惊犯；后周大臣不得侵袭；朝廷府库和士庶之家，也不许侵掠。”诸将都表示遵命。赵匡胤当即回到了汴京，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在汴京城内暗作内应，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皇权。因为赵匡胤当时兼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于是就用“宋”为国号，改元“建隆”。习惯上称赵匡胤建立的宋朝为“北宋”，都城在开封。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用和平的手段，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战斗，夺得了皇位，使北方正在好转的社会生产力没有遭到破坏。赵匡胤把周恭帝降为郑王，对拥立有功的将帅，都一一加以奖赏和提拔，如石守信就做了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顺利地解决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陈桥兵变”的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赵匡胤在后周统帅禁军期间素得军心，得到军士们的拥护；另一方面，是由于赵匡胤手下的高级将领沿袭五代以来将帅拥戴之风，以赵匡胤为自己的靠山。

宋太祖赵匡胤懂得将帅们的心理。他在即位的第二天，就晋升一批禁军的高级将领。除了为石守信加官晋爵以外，还以张令铎为马步军都虞侯，张光翰为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为步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殿前都点检，王审琦为殿前都指

挥使，皇弟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这些人都是赵匡胤的亲信。石守信和王审琦还是赵匡胤“义社”十兄弟的成员。

李筠李重进反宋战争的失败

建隆元年（960年）正月，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试图起兵反宋。建隆初，赵匡胤派使者去见李筠，以授他中书令一职来拉拢他，李筠拒绝接受。在幕僚们的谏诤下，李筠虽然接见了使者，但他故意把周太祖的画像悬挂在室壁，并涕泣不已。幕僚们都很惊惧，告诉宋使说：令公喝多了，有失常性，望切勿怪罪。

北汉主闻知李筠想反宋，遣使送蜡书，邀他共同起兵。宋太祖继续慰抚李筠，用他的儿子李守节为皇城使。李筠一方面派遣李守节入朝，探听京师动静，另一方面，派遣刘继冲向北汉，奉表称臣、纳款求援。李守节到朝廷后，宋太祖即责问他来京城的意图，李守节惶恐，以头击地，说是有人在算计他父亲。宋太祖遣李守节归，让他告诉他父亲说：“我不是天子时，听任你的作为。现在我已是天子，难道你就不能归属于我吗？”李筠不顾宋太祖的一再慰抚，决心反宋。

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李筠命令幕府草拟檄文，历数宋太祖的罪恶，随即遣兵袭杀泽州刺史张福，占领其城，将监军周光逊等人抓起来送于北汉。李筠的从事閻丘仲卿认为李筠孤军举事，北汉的援助不可靠，宋兵精锐，难与争锋，建议他西下太行，直抵怀、孟，塞虎牢，攻占洛阳，然后东向争天下。李筠错误估计形势，以为他是周室宿将，与周世宗情同兄弟，禁卫军都是他的旧人，必将倒戈来归，况且有僭

珪等强将，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他不听闾丘仲卿的建议。北汉主刘钧率兵与契丹军数千人增援，李筠率部下至太平驿以臣礼迎谒，北汉主封李筠为西平王。北汉主几次召李筠议事，李筠说自己受周室厚恩，不忍背负。北汉与周为世仇，对李筠的话很反感。北汉主便派宣徽使卢赞监李筠军。李筠见北汉兵少，又派卢赞监其军，深感后悔，并且在许多方面与卢赞的意见又多不协调。于是李筠命令其子李守节守潞州，自己率兵 3 万南下。北汉主知卢赞与李筠有矛盾，遣平章事卫融前往调解，但矛盾依然如故。

宋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分道出击，特命诸将急引兵扼守要害地区，勿纵李筠下太行。又遣慕容延钊、王全斌由东路与石守信会合，同监军李崇矩一起在长平击败李筠军。斩首 3000 级，攻下大会砦。

六月，宋太祖率军亲征，与石守信等会合，再次大败李筠于泽州南，获北汉河阳节度使范守图，杀北汉宣徽使卢赞，李筠退守泽州城。宋太祖督战，列栅栏围城，大将马全义率敢死队，攀城堞而上，攻占泽州。李筠自焚，北汉平章事卫融被俘。宋太祖乘胜攻潞州，李守节降。北汉主闻李筠败，从太平驿返还晋阳。

七月，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又起兵反宋。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与赵匡胤分掌周室兵权。周恭帝即位，李重进出镇扬州，领宿卫如故。赵匡胤代周，拜李重进为中书令，命令他移镇青州，李重进不满，想起兵反宋。正巧李筠已起兵，李重进便派遣亲信翟守珣去潞州与李筠联络，翟守珣却私去京师会见宋太祖。宋太祖遣陈思诲安抚李重进、赐铁券。李

重进欲随陈思诲入朝，部将竭力劝阻，李重进犹豫不决。

李筠被平定后，李重进觉得作为周室亲戚的他，不会有好结果，这才下决心起兵反宋。于是李重进拘留陈思诲，修城练兵，派遣使者以求得南唐的援助，南唐主不敢接纳其使，李重进又派遣使者去邀建雄节度使杨庭璋共同起兵，杨庭璋非但不应，反而将他的使者扣下，并为宋献策取李重进。扬州都监右屯卫将军安友规，不愿随李重进反叛，踰城而逃，归宋。李重进因此怀疑诸将皆不附他，关押军校数十人。

十月，宋太祖想对李重进进行讨伐，询问枢密副使赵普有何意见。赵普分析说：“李重进士卒离心，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攻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宋太祖采纳了他的建议，率师亲征。十一月，拔扬州，李重进自焚，其同谋者数百人被杀。

吴越入朝

吴越地处两浙，自唐末建国，至宋初归服，存在近百年。吴越的创始人钱镠，以镇压黄巢起义起家。乾符二年（875年），黄巢攻浙东，董昌募兵讨伐黄巢，钱镠应募，并率20人，屠杀起义军数百人，他从此崭露头角。光启三年（887年），拜钱镠为左卫大将军、杭州刺史。唐昭宗拜钱镠为杭州防御使，钱镠乘乱夺取了苏州、常州。景福二年（893年），拜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年），封钱镠为彭城郡王。天复二年（902年），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封钱镠为吴王。梁太祖即帝位，封钱镠为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吴越国从此得名。钱镠卒，子钱元瓘卒，子钱佐

立。钱佐卒，弟钱俶立。

钱俶一向依附强者。周世宗伐淮南，令钱俶攻常、宣2州，牵制南唐。钱俶不顾相国元德昭的反对，遣吴程率军攻常州，结果大败而回。周渡淮伐南唐，吴越又招募新兵，遣邵可迁率战舰400艘，水军1.7万人，至通州配合攻南唐。

钱氏统治两浙，不仅赋敛繁苛，而且常常抢掠商贾的钱财，致使百姓痛苦不堪。钱氏搜刮的民脂民膏，一方面任意挥霍，过着奢侈的生活，另一方面，不断向五代各国进贡，维持苟安局面。宋兴，平定荆湖、南汉、南唐以后，吴越更加孤立，所以对宋更是倾国贡献，器服珍奇，奉献不可胜计。

开宝七年（974年），宋伐江南，拜吴越王钱俶为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次年，钱俶自率5万兵攻南唐的常州。丞相沈虎子谏说：“江南是我们的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来如何保卫社稷呢？”钱俶不听，遂兴兵伐江南，先后下江阴、宣兴、常州。江南主李煜致书钱俶说：“今天灭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如不觉悟，等待你的将是汴梁的一个布衣平民，绝不是勋爵奖赏。”钱俶为表示对宋忠诚，立即把信送交宋朝。

开宝八年（975年），南唐亡后，宋太祖令钱俶到京师朝见，许诺入朝后仍叫他回杭州。二月，钱俶携妻子到京师，宋太祖以礼相待，欢宴二个月，赏甚厚。钱俶将归国，行前，宋太祖送他一个包装严密的黄色包袱，告诉说：“途中宜密观。”钱俶打开后，大惊。原来包内不是珍宝，而是宋朝大臣要求扣留钱俶的一封封上书。回国后，钱俶遣大臣献珍宝。吴越的宝物、钱财源源入宋。吴越已完全在宋控制下，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与宋直辖区的唯一区别，是还保留着

国号。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朝宋，大臣崔仁冀、黄夷简等从行。钱俶携带犀象、锦彩、金银、珠贝、茶、绵、服御器用品逾万计。想以丰厚贡献，取悦于宋朝，以求能返回。宋朝宰相卢多逊 30 余次劝宋太宗扣留钱俶，宋太宗不听。当时平海节度使陈洪进献所辖漳、泉 2 州。宋拜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吴越崔仁冀劝钱俶仿效陈洪进，他说：“朝廷的意图很明显，大王如不快快归宋，大祸将至！”其他大臣反对归顺，崔仁冀厉声地说：“现已在人掌握中，我们远离国中千余里，除非插翅才能飞走。”钱俶惧，遂与崔仁冀决策归顺，上书献其所辖 13 州、1 军、86 县、55.068 万户。吴越臣僚知，千余人皆恸哭说：“吾王不归矣！”

宋太宗以淮海国王报答钱俶归顺，并授钱俶弟钱仪、钱信为观察使，钱俶子钱惟浚、钱惟治及将校孙承祐、沈承礼、崔仁冀为节度使，其他亲族、臣僚也皆授以官职。接着，令两浙把钱俶五服以内的亲属及管内官吏，全部送到京师。

漳泉归附

唐朝末年，王审知割据福建，长兴年间其子王延均建国称帝，国号越，都福州。王延钧被部将杀害，其弟王延羲立，天福年间，部将朱文进杀王延羲篡位。

开运元年（944年），留从效邀陈洪进等 50 余人，劫兵库，擒斩朱文进泉州刺史黄绍颇，立王审知孙王继勋为刺史，留从效自为统帅，陈洪进为指挥使。朱文进攻泉州，为留从效所败。开运三年（946年），南唐主李璟讨伐朱文进，围福州，

吴越出兵干涉，李璟攻占汀、建 2 州收兵，福州归于吴越。开运四年（947 年），留从效将王继勋送于江南李璟，自领漳、泉 2 州。李璟以泉州为清源军，授留从效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陈洪进为统军使，张汉思同领兵权。继而封留从效为鄂国公、晋江王。福建 5 州，从此分裂。

留从效卒，少子留绍镒继位。月余，陈洪进诬告留绍镒召越人，叛李煜，执留绍镒送于李煜，推张汉思为留后，自为副使。张汉思年老，事皆决于陈洪进。张汉思诸子皆为衙将，不满陈洪进专权。次年，张汉思父子欲诛陈洪进，结果反被陈洪进父子所治。陈洪进与子陈文显、陈文颢把张汉思锁起来，强令其交出印玺。然后，陈洪进招将吏说：“张汉思昏老，不能为政，授我印，请我莅郡事。”将吏皆贺。即日，囚张汉思。遣使请命于江南主李煜，李煜命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泉、漳等州观察使。

是时宋已平定泽荆湖，威振四海。陈洪进惧，遣魏仁济使宋，自称清源军节度使、权知泉漳等州军府事，表示愿“恭听朝旨”，希望宋承认他对该地区的统治。宋太祖一方面遣使抚慰陈洪进，另一方面，以诏书形式告诉江南主李煜，陈洪进愿听命于宋。江南主李煜对陈洪进的背叛虽然极端不满，但有宋为他撑腰，也无可奈何。

建隆四年（963 年），陈洪进遣使朝贡于宋，冬，又贡白金万两，乳香、茶、药万斤。乾德二年（964 年），宋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节度使，泉、漳等州观察使，检校太傅，子陈文显为节度副使、子陈文颢为漳州刺史。江南归宋后，陈洪进惧，遣子陈文颢献乳香万斤、象牙 3000 斤、龙脑

香 5 斤。宋太祖诏陈洪进入朝，行至途中，闻宋太祖死，陈洪进归，为宋太祖发哀。

宋太宗即位，陈洪进朝宋，赏赐钱千万、白金万两，绢万匹。拜其子陈文颢为团练使，陈文凯、陈文頊并为刺史。陈洪进上书，表示愿以所管漳、泉 2 州献于宋，使区区负海之邦，遂为内地，令百姓得见太平。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四月，陈洪进到开封朝贡，主动献漳、泉 2 州，14 县，户 15.1978 万户于宋。历史上称陈洪进“纳土”。宋太宗拜陈洪进为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留京师朝请。诸子陈文显、陈文颢、陈文凯、陈文頊皆授要职。

太平兴国四年（979 年），陈洪进随宋太宗伐北汉。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封陈洪进为杞国公。雍熙元年（984 年），进封为岐国公。陈洪进年老，而且富贵已极，要求致仕。宋太宗下诏，免其朝请，次年卒。

漳泉归附，标志着宋统一南方大业的完成。陈洪进主动归附，使百姓“得见太平”，适应了“天厌乱久矣”的时代要求。

平定北汉和局部统一的完成

开宝九年（公元 976 年）十月二十日，宋太祖突然在夜间死去，终年五十岁。当时他的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都已成人，皇帝的位置没有由儿子继承，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却在次日登上了皇帝宝座，这在秦代以后汉族皇朝的皇位继承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赵光义就是宋太宗。

宋太宗在后周时就开始戎马生涯。他参加组织陈桥兵变，北宋建立时为殿前都虞候，成为禁军重要将领，后又任职位重要的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在太祖外出时还作为东京留守，坐镇京城，看守朝政。在太祖逝世以前，他已经掌握了宋朝很大部分的权力。所以，他登上皇帝宝座后，没有出现什么波折就顺利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在北宋的皇帝中，宋太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继承皇位以后，也把宋太祖的统一战争等未竟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继“吴越入朝”和漳泉归附后，宋太宗随即将消亡北汉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即位的第二个月到太平兴国三年十二月的两年又两个月内，他先后派遣六批使臣到辽朝，对辽作出和平友好的姿态，把准备对北汉大举进攻的战略意图掩盖起来，使辽放松同宋朝军事对抗的准备。与此同时，宋太宗则加紧精选将士进行军事训练。他亲自到造弓箭院视察，又筑讲武台于开封城西，亲自检阅禁军的演习，厚奖训练有方的将官。他还在靠近北汉的晋、潞、邢、洛、镇、冀等州加紧修造兵器及攻城器械。当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都准备就绪后，宋太宗又同曹彬等大臣一起分析了周世宗和宋太祖进攻北汉皆未能成功的原因，分析了宋朝军队更加精强而北汉却更加危困的新形势，认为这时出兵同宋太祖时已经“事同而势异，彼弱而我强”，必能取得胜利，遂作出立即出兵消灭北汉的决定。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宋太宗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兵分四路，围攻北汉的统治中心太原。又

命郭进占据太原以北的石岭关，阻击辽朝援兵。二月初，太宗下诏亲征，并由开封率大军向镇州（今河北正定）出发。除了中央禁军围城打援外，宋太宗还命令知府州折御卿等人从各路向北汉进攻，使太原处于孤立境地，很快被宋军包围。北汉皇帝刘继元见宋大军压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一面派使者来见宋太宗问伐北汉的原因，企图阻止宋朝进军，一面派兵驰援太原。宋太宗严辞对辽的使者说：“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表示了强硬的态度。辽既未能阻止宋朝向太原进军，派来的援兵也于三月中旬在石岭关附近被早就埋伏在那里的宋兵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太原被宋军团团围住，刘继元派出向辽求援的使者也被宋军捕获杀死于城下。北汉兵出城偷袭宋营，也遭失败。守城的北汉将士见外援断绝，军心发生了动摇。而宋军又在太原周围修筑起长连城加紧围攻，宋太宗还亲自督战，并对北汉统治者发布了劝降的诏令。从三月到五月，在宋军的进攻和劝降的心理攻势下，守城的北汉官兵更加动摇，一些将官出城投降，刘继元的亲信纷纷逃散，一些北汉元老大臣见大势已去，也劝刘继元投降。刘继元就于五月初向宋太宗投降。北汉 10 州、41 县并入北宋。北汉有名的将领刘继业见刘继元已投降，也投降来见宋太宗。宋太宗见他投诚，非常高兴，即让他取消北汉的赐姓，恢复杨姓，赐名业，给予厚赏，并让他领兵屯守边境。杨业入宋后成了抗辽的名将。

北汉灭亡后，宋太宗为了在这一地区彻底消除新的割据势力的温床，下令放火烧掉城坚壁固的太原城，又引汾水、晋祠水淹毁太原城墙，使旧城成一片废墟，另把太原地区改称

并州，把州址设在榆次县，后又迁到唐明镇（今太原市），废除太原的藩镇建制后，北宋的局部统一至此完成了。

宋太宗不仅继承宋太祖的统一战争事业，削平五代最后三个割据政权，奠定了北宋的疆域和北宋局部统一的规模，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强宋太祖重建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

在宋太祖时，藩镇兼领“支郡”的问题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但在中原和陕西等地区仍然有些残余“支郡”存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年八月，因一些“支郡”的知州同藩镇发生矛盾，宋太宗派右拾遗李翰去进行调查，李翰回朝后指出节度使兼领“支郡”的一些弊病，建议进一步采取强干弱枝之术，不使节度使再兼领“支郡”。于是，宋太宗下令陕西、京西、京东、河北各地39个州皆直隶中央。节度使兼领“支郡”的制度至此彻底废除了。

宋太宗还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宋太祖时仅有掌管一路财赋之权的转运使，这时选出方面按察大员，不仅掌一路财赋，还被授与督察弄狱、考察一路官吏的大权，被称为“监司”。但转运使不得荐举官员在自己管理的一路内任职，部内官有阙员，要随时向朝廷申奏，由朝廷委派。转运使所在的府、军、监，每年要把转运使在厘革庶务、平反狱讼、漕运金谷等方面的成绩向中央详细报告，使中央能了解转运使行使方面大权的情况。朝廷通过转运使监察各州、军地方官，又通过各州、军地方官对转运使起监视作用。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太宗又正式把统治区划分为十五路，把转运使管理一路事务的制度确定下来。此外，太

宗还亲自选派各州管理司法的司理参军，随时派官员到地方处理狱讼。宋太宗还从京城派出密探探察外地是否有发生危害中央专制统治的行为。这一切，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

对于中央的官僚机构，宋太宗也在宋太祖分化事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他设磨勘院（后分为审官院和考课院），把原属中书省的考课官吏的权力分割出来，又置审刑院于禁中，掌最后审议案件并向皇帝及宰相呈报，使中书刑房失去作用。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进一步削弱了。负责内外奏章收受和颁发的通进、银台二司，原属枢密院，太宗时也从枢密院独立出来，合并成一个通进银台司直接对皇帝负责。管理财政的三司，有许多事务也由宋太宗亲自裁处。因而朝廷许多行政机构的权力更加分散，许多新设的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的权力更加集中了。宰相吕蒙正曾感激地对宋太宗说：“中书、枢密院，自来难处之地。唐末帝王专委臣下，臻多阙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决万机，臣下止于奉圣旨。臣等实知荣幸”。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大臣只是奉圣旨，不再拥有参加决策的权力。宋太祖时期已经膨胀的皇权，在宋太宗时又膨胀到一个新的高度。

宋太宗还通过扩大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满足用文官取代武将当地方官的需要。在他统治的20多年内，科举考试登第的有近万人。他曾得意地说：“朕亲选多士，几乎忘了饥渴，召见士子亲自提问考查，以观察他们的才干，而朝廷得更多君子。朕每见布衣缙绅中有人才出众被众人所推誉的人，都替他们父母高兴。如果召拜近臣，必为选择吉日，想保他

们终吉。朕对于士大夫无所负了”。由于大批地主阶级文人被吸收参加各级政权，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更加扩大了。

二、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除了要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使宋代的统治长期巩固下去，不致成为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宋太祖及大臣赵普（922—992年）等认为：“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涑水记闻》卷一）于是，“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唐末五代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抗衡，主要在于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新唐书·兵志》），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了使藩镇跋扈的局面不再出现，宋太祖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藩镇的行政权力，规定所有州郡都归中央直接管辖，废除了节度使管辖驻地以外州郡即“支郡”的制度。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这样，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节度使不到驻地赴任，更徒具虚名了。另外，又规定知州三年一易，使之经常调动；并且在知州之外设通判，以分知州之权，监督、牵制知州。

第二，“制其钱谷”。为削弱藩镇的财权，规定各州郡的财赋，除留一小部分作必要开支外，其余全部调动到京师开封或其他指定地点，由中央掌握，废除了从前藩镇以“留使”、“留州”等名目保留财赋的制度。后又把全州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掌握所辖各州财赋及其运输等。

第三，“收其精兵”。为削弱藩镇的兵权，宋太祖多次派遣使臣到各路，选拔藩镇的精兵，“凡其才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涑水记闻》卷一）使地方武装无法再与中央禁军抗衡。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彻底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太祖是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夺取皇位的。他深知要长治久安，掌握军权是至关重要的。因而，即位后不久，就对军队的人事安排、统兵体制以及驻防部署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为了防止陈桥兵变的重演，宋太祖在即位第二年，就解除了曾经拥立他为皇帝的禁军主要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任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将领统帅禁军。

其次，逐渐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同时，设枢密院，主管全国的军政。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范太史集·论曹育札子》）调兵权与领兵权各自独立、互相制约，以利于皇帝的控制。

再次，在兵力布署上，让禁军的一半屯驻京师，另一半

戍守各地。正如深得祖宗家法真传的宋神宗所说：“艺祖（按指宋太祖）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天下永平百余年，盖本于此。”（《曲洧旧闻》卷九）

另外，还制定了更戍法，除殿前司的捧日、天武等军外，所有禁军都要定期更换驻地，领兵将领也要经常调动。名义上是使士兵们“习劳苦”，“均劳佚”，实际上是使“将不得专其兵”（《文献通考·兵考五》），军队不得与地方结下深厚关系，避免造成对皇帝的威胁。总之，是千方百计将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除了加强对地方和军队的控制之外，宋太祖还加强了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

宋代以前，宰相“事无不统”，掌握着中央政府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宋太祖则采取分化事权的办法，大大削弱了相权。设枢密院分掌军政，与中书对称“二府”；又设三司分掌财政，号为“计省”。“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九）这样，就把过去“事无不统”的相权一分为三了。另外，还在中书，枢密院、三司设置了参知政事，枢密副史，三司副使作为副职，以削弱长官的权力，并与之互相牵制。

同时，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收举、弹劾宰执大臣等各级官员，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加强了专

制主义中央集权。

宋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促成了统一、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矫枉过正，其后继者又没有因时变通，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如中央统得过死，地方权力太弱，不利于地方的发展及抵御外侮。对军队防范过甚，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以致在对辽、西夏的战争中，常打败仗。在官僚制度中分化事权和互相牵制过当，造成了机构重叠、官僚队伍庞大而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

宋太宗巩固统治的斗争

开宝六年（973年），宋太祖封弟光义为晋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病，召晋王嘱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宋太祖卒，晋王光义即帝位（宋太宗），改名为炁。宋太宗封弟光美为齐王，兄子德昭为武功郡王，位在宰相之上。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武功郡王德昭自杀。是年五月，平定北汉后，功未赏，宋太宗亲征契丹，武功郡王德昭从行。七月，契丹大败宋军于高粱河，军中夜惊，不知宋太宗去向，有人谋立德昭，宋太宗听说后很不高兴。及还京师，以征契丹不利，有意拖延，不行攻太原的功赏，德昭请求太原之赏，宋太宗大怒说：“到你自已来行赏时，再赏功也不迟。”德昭是宋太祖的长子，本应继帝位，如今遭到宋太宗的训斥、讥讽，一气之下，自杀身亡。十月，宋太宗赏平北汉有功者，封弟齐王为秦王。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权臣卢多逊诬告赵普初不想立

宋太宗，宋太宗疏远赵普，赵普郁郁不得志。这时宋太宗的旧臣柴禹训、赵镒、杨守一告秦王骄恣，将有阴谋窃发。宋太宗怀疑，问赵普。赵普表示愿备枢轴，观察奸变。同时，他陈说自己是忠于朝廷的，今天反为权幸诬告。进而把受杜太后之托，写“金匱之盟”等事作了说明。宋太宗打开金匱，得誓书，又查阅了赵普所上表，证实赵普所说的话，解除了对赵普的误解，拜他为司徒兼侍中，封为梁国公。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有人告秦王光美欲乘宋太宗幸西池时叛乱，宋太宗借机罢了秦王开封尹职，改为西京留守。据金匱之盟，传位顺序是宋太祖传宋太宗，宋太宗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德昭已死，光美深感不安。宋太宗以传位事询问赵普的意见，赵普说，太祖已经失误了，陛下岂能再误！宋太宗在赵普鼓励下，决定放弃金匱之盟，这样作为王储的秦王，很快变成了囚徒。

卢多逊与秦王交往甚密，常以中书机密告诉秦王，并表示待太宗去世，自己尽力事秦王。秦王失宠，卢多逊也被革职，流放到崖州，家属徙于远裔。与此事有牵连的赵白、樊德明、阎密、王继勋等被斩首。秦王归于私第，居西京，继而贬为涪陵县公，安置于房州。命阎彦进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伺察秦王的举动。秦王至房州，忧悸成疾，雍熙元年（984年）正月，死于房州。太宗通过这一场斗争，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三、王小波、李顺起义

四川从秦、汉以来便称为“天府之国”。以成都为中心的

四川盆地，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丝麻。织锦和造纸就是当地的著名手工业品。四川人民生产的丝帛，“号为冠天下”。

在唐宋和五代时期，四川人民在封建割据统治下，贫困到了极点。后蜀政权尽力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并空前剧烈。赵匡胤消灭了后蜀的割据政权以后，四川的封建恶势力并没有受到触动，农民们依然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四川的客户是全国比例最高的，大约占四川地区总人口的十分之六七。许多豪强大姓，拥有几百户甚至上千户佃客，他们过着农奴式的生活。地主阶级把自己的赋税徭役，转嫁到农民头上，弄得他们朝不保夕、惶惶不安。一遇水旱，他们无路可走，被迫铤而走险。少数占有少块土地的自耕农，也是奄奄一息，“耕稼不足以给”。

公元965年（乾德三年），宋军占领了四川，后蜀政权所搜刮的金银财富，通过长江三峡，运到江陵，再转送汴京。宋朝派往四川的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凶暴的勒索。973年（开宝六年），渠州（四川渠县）就掀起了农民的反抗运动，有近万人参加。

北宋王朝为了收刮四川的财富，在成都设立“博买务”，垄断民间买卖，禁止商人贩运布帛。政府又把四川的名产茶叶收归官卖，任意抬高茶税。种茶的农民受到沉重的剥削，采摘的新茶要以低价卖给政府。茶农们哀叹：“种茶好比种祸”。各地的小商小贩，也都陷入了绝境。

四川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在993年（淳化四年）发动了反对贫富不均的斗争。

这一年，四川出现严重的旱灾，到处闹着饥荒。人民实在熬不下去了。带头发动起义的是四川青城（四川灌县）的小贩王小波。开始时，他带领 100 多人起事，提出了“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战斗目标。“均贫富”，这是贫苦农民梦寐以求的最高愿望。大批饥寒交迫的农民，很快投入战斗的行列。不到 10 天时间，就团聚了上万人。

农民军从青城出发攻下了彭山，杀掉了一贯吸吮民脂民膏的知县齐元振，在他的大腹内装满了铁钱，表示人民对贪官污吏的极度仇恨。起义农民没收了大地主官僚的财物，一分散给贫民。

王小波在江原（四川崇庆东）的战斗中，杀死了宋军将领张玘。张玘手下的几百名士兵，都倒向农民军一边。王小波在这次战斗中，身受箭伤，不幸伤重身死，由李顺继续领导战斗。

994 年（淳化五年）初，李顺攻打蜀州（四川崇庆），邛州（四川邛崃），连连获胜。数万农民军连下成都西边的郫县、温江、双流、新津等县，并攻克成都。李顺被拥戴为“大蜀王”，建立了“大蜀”农民政权，用“应运”年号，铸造“应运元宝”钱。农民军的势力南到巫峡，控制了长江上游，北近剑门（四川剑阁东北剑门关），声威大振。

北宋王朝为了镇压四川农民起义，派遣宦官王继恩统率官军分两路入川。一路上宋军血腥屠杀人民，攻占剑州（四川剑阁）、绵州（四川绵阳）等地，逼近成都。

农民军为了把守成都，从攻势转为守势，战斗处于被动地位，遭到宋军的进攻。994 年 5 月，农民军退出成都。在退

却的过程中，李顺和部下失去了联系，由张余领导农民军余部继续战斗。

当时成都城 10 里以外，都还在农民军手里。张余带领万余起义军，连下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泸州（四川泸州）、渝州（四川重庆）、涪州（四川涪陵）、忠州（四川忠县）、万州（四川万县）、开州（四川开县）等 8 州，战斗形势大有好转。这年八月，张余带领 2 万农民军又攻克云安军（四川云阳）。在农民军的沉重打击下，宋朝统治者不得不作些让步。宋朝改成都府为益州，派张咏为益州知州。宋太宗对张咏说：“西川乱后，民不聊生，卿往，当以便宜行事”。张咏到了成都以后，恢复民间米、盐等生活必需品的自由贸易。有一次，王继恩把 30 多个农民军首领交给张咏处理，张咏把他们全部释放，让他们安家归业。张咏说：“化贼为民，何有不可？”张咏还废除了从陕西转运粮食到成都的虐民措施。在这同时，宋朝的一个军官名叫张璘，杀掉王继恩手下的宦官王文寿，带领 500 多名宋军，投向农民军。当时张余有众万余，驻在嘉州一带。

由于宋朝派遣大批官军入川，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使农民军的活动遭到许多困难。公元 955 年（至道元年）2 月，张余在嘉州牺牲。起义军转入四川的深山丛林中坚持抵抗。一直到 996 年（至道二年）还在继续战斗中，最后终于失败。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发展到公元 10 世纪的宋初，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战斗号召。这是为了要改变当时财富和土地占有的不均现象。当时土地集中在士大夫豪强手里，广大贫农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严重地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王小波、李顺起义就是想以暴力手段，改变贫富不均的状况，使农民们能过好的日子。“均贫富”的思想无疑是当时农民阶级进步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真正付诸实现的。

除了四川地区以外，其他地区也发生过小规模农民起义。公元972年（开宝五年），今山东地区爆发过小股的起义，有300多农民受害。978年（太平兴国三年），福建泉州地区有10多万农民攻打州城，后来失败。宋仁宗初年，许多地方发生的“兵变”，就是被迫当兵的农民所发动的反抗斗争。1043年（庆历三年），陕西军士郭邈山和张海等，率领千余饥民起义，活动于今陕西、河南、湖北等地，纵横千余里。他们每攻入一个州县，就打开府库，把粮食和财物分散给贫民。同年（庆历三年），湖南地区的瑶族和汉族人民5000人，并肩联合战斗，坚持了5年之久。

第二节

北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

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北宋是通过军事政变形式建立的。北宋统治者为了取得地

主阶级的支持，故开国初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纵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大发展。同时，北宋在法律上也承认土地买卖和大地主占有制的合法性，地主在前代“犹谓之豪民，谓之兼并之徒，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于是，宋代官田转为私田，而北宋在南方承继的官田数量相当可观。这类官田和地主私田一样，用租佃形式经营，日趋民田化。如江西各地的屯田，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命出卖官田，知吉州徐常上奏道：“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边地。其所立租则比税苗时重，所以祖宗时许民间用为永业。如有移变，虽名立价交佃，其实便如典卖己物。其中得以为业者，于中悉为居室坟墓，既不可例以夺卖。又其交佃岁久，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今若令见业者买之，则是一业而输两直，亦为不可”。说明官田已成为民间永业田，佃户还将官田当作民田一样出卖，甲乙相传，皆随价得佃，说明这类官田已民田化、商品化。

宋代，宋太祖鼓励石守信、王审知等功臣宿将，多积金钱，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致使“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造成天下田畴，半为官僚豪绅所有。土地兼并一方面是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大量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户，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也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封建统治者依靠特权掠夺土地，一旦丧失权势，土地所有权也随之转移。所谓富儿更替做，田宅无定主”就是指这种情况。

从北宋的人户分等中也可以看出土地占有的情况。宋代的编户以身份区分的话，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以

居住地域区分的话，有乡村户与坊郭户。乡村户和坊郭户都依据是否占有土地和资产划分主户和客户，又分乡村主户为五等，坊郭主户为十等（或主客混通为十等）。乡村主户依据占有土地和资产的多少分为五等，故宋代的户籍又称“五等版籍”。但各地区分等的标准并不统一，各有不同。一般第一等为占地三顷至百顷的大地主；第二等占地三五顷。一、二等户称为上户，包括官户和形势户。官户指品官之家，形势户力仅能自足，基本上是自耕农组成，是自食其力的人户，习惯称为中户。第四等是占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第五等占地更少，属半自耕户。客户也叫佃客、浮客、地客，他们完全没有土地，佃耕地主的土地。客户编入户籍，中央户籍上把主户客户分别登记。客户的地位，和过去佃客部曲比较，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身份有所提高。宋代客户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35% 至 40%。

租佃关系

宋代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经营，称为租佃制。租佃制有合种和出租两种形式。合种形式是官私地主招募客户在土地上耕种，客户出卖劳力，在地主租借的土地上进行生产，建立合种的租佃关系。出租形式是指一般佃户具备独立生产条件，不完全依靠地主的借贷，而承佃地主小块土地，互立契约，单独进行生产。合种形式的一般收入是成租，分成租是在收获后，扣除田税和种子，余下产品按约定比例分成。一般佃户有牛和农具者，实行对分制；无耕牛和农具者，只能分三四成。地主得六七成。这种合种制，由于佃客在生产

和生活上都得向地主借贷，经济上的依附必然造成人身依附，而生产的好坏，直接影响地租的收入，所以地主对佃农的生产活动干预较多，甚至施以强制性劳动，不准客户另外投佃，没有人身自由。出租形式是征收定额地租，佃户不论收成的丰歉，都要按契约规定的品种和数量向地主交纳地租。地主净收租课，不关心农田产量，不必干预生产和强制佃客劳动。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较弱，在农事完毕和还清债务后，可另行投佃，有一定的人身自由。

赋 税

为了解决庞大的财政开支，北宋政府加紧压榨纳税户（即主户），尤其是四、五等户（即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北宋的农业税沿用唐朝后期以来的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名曰两税，实即田税。一般是交亩税一斗的定额租。两浙、福建等仍用十国旧制，亩税三斗，但南方有些地区夏税收钱，秋税收米。在交纳两税时，还有“加耗”、“义仓”、“支移”、“折变”等项规定。所谓加耗是田税上的一种附加税，如有的地区宋政府规定，农户每交一石，加输二升为鼠雀耗。加耗名目繁多，税额超过正税两倍。义仓税，按 963 年（建隆四年）规定，正税一石别输一斗，建立义仓，以备凶歉，实际上是巧立名目的杂税。所谓支移是政府借口边地军事需要，迫令税户将税粮送往沿边城镇交纳，人畜盘费自备，不送者或无支移地则纳道里脚钱。折变是收税时不收原定之物，而将物折钱，或将钱折物，每折一次就加重一次农民负担，这是变相的敲诈勒索。

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丁口之赋（人口税）主要在南方征收，规定不论主户和客户，凡20岁至59岁的男丁均要交纳，税额各地不一，如睦州（浙江建德县东）每丁纳695文，苏州每丁纳200文。杂变之赋，是宋代继承五代十国的各种杂税的总称，故又叫“沿纳”，有蚕盐钱、牛皮钱、农器钱、鞋钱等，难以细举。此外，还有官府强购绢帛的“和买”、强征粮草的“和采”，这些都是纳税户的经常性负担。

徭役和差役

北宋的役法分差役、徭役两种（宋代实行募兵制，民众基本不服兵役，但还有许多名目的乡兵，仍征发民户充数）。差役又名职役或吏役，本指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政府头目的差役，一般由一、二、三等户充役，有衙前、里正、耆长、承符等役。衙前主典府库、押运官物；里正、户长督课赋税；耆长、弓长、壮丁逐捕“盗贼”；承符、手力为官府驱使奔走。充当职役的人，有免徭特权。但衙前对保管的官物和押送的纲运，遇有损失要包赔；耆长捕盗，报官缉捕，要招待官兵；而承符又困于久役。因此充役的上户千方百计逃避差役。差役逐渐转移到下户充当，有的地区连官户也充当差役，差役成为下户的极大的负担。徭役，又叫夫役或杂徭，不分主、客户，“以人丁户口科差”，但客户、形势户有免役特权，已承职役的人也不再服夫役。这样，夫役负担都落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身上。徭役的主要内容是修浚河道，土木建筑，运输官物等，无固定期限。有的到百里千里之外服役，一去数月，

受尽官吏的种种欺凌而死于役所。徭役使中下户、客户困苦日甚，促使阶级矛盾尖锐化。

二、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北宋时期封建租佃契约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北宋时期的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都有显著的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出新的繁荣。

农业的发展

农民在生产过程中注意改进和创造生产工具。宋代犁铧式样较多，主要是尖头和圆头两种。在洛阳等地出土的有两式铧、桃形铧，在扬州出土的铁铧犁，刃边是优质钢，带有光泽，这些犁铧便于翻土深耕。脚上安装铁铧的耒车已在北方普遍使用，提高了播种速度。其他常用农具齐全配套，碎土疏土普遍使用铁耙，除草工具有弯锄和耢锄。为解决耕牛缺乏，宋代创制了木质踏犁，四五人使用踏犁，可比一犏牛，提高了人力耕地的效率。北宋劳动人民又创造了插秧新工具——“秧马”，形如小木船，“田行千畦，使之伛偻而作者，劳铁相绝矣”，减少了劳动强度，提高了插秧的速度。在南方较普遍使用龙骨翻车和筒车引水灌田。南方育秧能注意秧田修治，择土所宜，适时播种，还有一套稻麦两熟的耕作方法。南北方作物优良品种得到了交流，福建较早引进了占城稻（原

产越南中部)，这种品种有早熟、耐旱、产量高的特点，宋政府从福建运三万斛稻种，在长江、淮河流域推广。水稻种植也扩大到北方，在河北“自顺安（河北高阳）以东濒海，广袤数百里，悉为稻田”，“民赖其利”；而北方的粟、麦、黍、豆等作物亦在南方种植。经济作物的种植也有发展，桑麻在全国普遍种植，甘蔗在浙、闽、广、川一带种植，四川出现了少量的以种蔗制糖为生的糖霜户。棉花的种植在闽广逐渐推广。茶叶种植遍及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福建茶的质量居全国之首。江南、两浙、荆湖、福建等地区供应给政府专卖机构的茶叶每年达一千四五百万斤。

北宋对农田水利十分重视，经常修治黄河、汴河的堤防。1048年（庆历八年）黄河在濮阳东决口，后采用水工高超提出的“三节下埽”的办法，巧合龙门，取得了治黄的又一胜利。在河北地区广修陂塘，并在雄、莫、霸三州兴筑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南方地区兴修水利的成绩更为显著，主要有今苏北的捍海堰、浙江的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的疏浚工程和福建莆田的木兰陂等，保证了农田的灌溉。

由于工具的改进，水利的兴修，各地因地制宜，开辟了大量耕地。长江淮江和钱塘江一带，凡低洼地均改造为圩田，每圩数十里。湖南、江西、福建山区，开辟为梯田，如江西抚州（临川）、袁州（宜春）等地，农民把岭坂，开辟成田，层层而上，直至山顶；福建还沿山导水灌田；湖南也开辟山田种稻。圩田、山田的出现，使垦田面积大为增加，据《文献通考》统计，976年（宋太祖开宝九年）垦田数有295万多

顷，至 1021 年（宋真宗天禧五年）垦田数达 524 万多顷。可见北宋前期 60 多年间，耕地面积扩大了近一倍。

手工业的发展

北宋手工业仍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官营手工业产品是供皇帝、各级政府和军事上消费，少量投放市场，在手工业中占重要地位；私营手工业主要形式是农副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还有专靠手工业谋生的个体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作坊。宋代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超过了前代。手工业中矿冶、纺织、制瓷、造船、造纸等均有显著进步。

矿冶业在北宋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矿冶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开采冶炼规模的扩大以及产量的增加上。北宋时，煤、铁、铜等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河南鹤壁市曾发现北宋晚期的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直径约 2.5 米，井深 46 米左右，4 条较长的巷道总长 500 余米，将煤田分成若干小块，采取“跳格式”挖掘，先内后外，逐步后撤。并有排水井和排水设备，已接近于近代采煤法。由于煤产品的增加，宋都“汴京数百万家，尽仰碳（煤），无一燃薪者”。河北、河南、陕西的铁矿得到大量开采。铁冶炼和铁器制作一般由民户经营，政府设监督机构，抽取产品作为课税。徐州利国监神宗时有铁冶 36 所，每冶有矿工各百人，共有矿工 4000 人。又用煤冶铁炼钢，提高了铁的质量，制作的兵器十分犀利。河北磁州（河北磁县）用灌钢法炼钢，能冶炼出优质钢，被称为“真钢”，在世界历史上居先进水平。铜的开采主要在浙江、

江西、湖南、广东等处，江西信州（上饶）铜山铜矿是当时第一大铜矿，开采和冶炼主要被官府控制，民营产品必须全部交售政府，铜山铜场规模很大，“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炼铜时使用五代时发明的胆水浸铜法，即在硫酸溶液中加入生铁，经氧化后铜被分解出来，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湿法冶金技术。

纺织业有很大发展，其中丝织业仍占重要地位。花色品种繁多，绢有 50 多种，绫有 27 种。河北定州的缙丝，用各色丝线，织出绚丽的花草鸟兽，当空照视有如刻镂；京东单州成武（山东成武）产的薄缣，“重才百铢（四两），望之如雾”，而亳州轻纱，四川蜀锦，都是丝织珍品，江西抚州的莲花纱，是暑天的珍贵衣料。官营丝织作坊规模很大，开封绫锦院有织机 400 多张，征高级丝织技工服役，产品专供皇家使用。私营作坊称机户，劳动者大多为家庭成员，也有少量雇工的，四川梓州（四川三台）有机户数千家，成都、徽州、河北、京东、婺州等地也出现机户。这些机户脱离农业生产，说明丝织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有了发展。麻织业集中在东南地区，淮南、江南、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都产麻织布。其中黄（湖北黄冈）、宜（广西宜山）、表（江西宜春）、吉（江西吉安）等州的紵布和虔州（江西赣州）的紵，是著名产品。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都比前代有很大提高，逐渐形成官（河南龙泉）、钧（河南禹县）、定（河北曲阳）、汝（河南临汝）、哥（浙江龙泉）五大名窑。江西景德窑、吉州窑亦很有名。它们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又称汴京官窑，政和年间在京师置窑烧造，专为官

廷制瓷，胎骨有白灰红三种，釉色仍以天青为特色，以粉青为上，淡白次之，纹饰以冰裂鳝血（又叫金丝铁线）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

钧窑在今河南禹县，禹县城内八卦洞的窑场曾烧造北宋宫廷用瓷，属北方青瓷系，以窑变色釉为其特色，因釉中含有少量铜，呈色为青中带红，有如蓝天晚霞，非常艳丽，称钧红。而红釉和蓝釉互相溶合又呈紫色，称钧紫，釉中又有曲折线条，称蚯蚓走泥纹。

定窑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和东西燕山村等地，宋定窑主要烧白瓷，兼绿釉、黑釉和褐釉。白釉带乳黄，胎薄而坚硬，因覆烧时迭压，口沿不施釉，称芒口，芒口镶金银边圈，为定窑一大特征，是定窑首创。定窑又以装饰花纺取胜，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和划花。定窑原为民窑，北宋又以装饰花纹取生，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和划花。定窑原为民窑，北宋后期曾一度烧制宫廷用瓷。

汝窑在河南临汝，汝窑主要烧造宫廷用瓷，瓷治多数呈香灰色，胎骨薄而坚细。椭圆形四足盘盆是汝窑特有造型。釉呈天青色，而青中闪蓝，并有蛋青、虾青、豆青等等，釉泡大且稀疏，明朗如珠，有如晨星。

哥窑和弟窑，以章氏兄弟各主一窑命名，在浙江龙泉，皆产青瓷。哥窑以水裂纹片著名，纹片多为黑色，即鳝血，其片特点是上紫上宽，黑色纹片中有时闪黄色，号称自圾碎，冠绝当时。哥窑胎体大都是铁黑色、紫黑色，也有黄棕色。釉很厚，属无光釉，釉色有米白、奶白、粉青、灰绿、奶酪黄等，也有翠青、豆绿色等。器物口部釉最薄，隐约透露胎色，

而足部没挂釉处呈铁黑色，称铁足紫口。弟窑则以无纹者为贵，釉色以粉青为佳，因釉下注，在转折处釉薄，露出白色胎骨，成一条白线，称出筋，这种出筋也出现在凸雕的花纹上。

景德镇，东晋时称新平镇，621年（唐武德四年）改为新平县，因位于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景德镇在汉代已有冶陶 583年（南朝陈至德元年）诏以瓷陶进贡五代时烧白瓷或青瓷，到宋代是其发展时期，以影青瓷（青白瓷）著称。因瓷土白，质薄腻，色滋润，1004年（北宋景德元年）改名景德镇，设官窑。真宗命制瓷进贡，器物底书景德年制，其器光致茂美，于是天下咸称景德瓷器，产品著行海内外。

北宋由于需要东南漕运，海外贸易日趋兴盛，加上技术进步，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北宋在汴京设造船务，在重要州郡设造船作坊，在长江交通要冲设修船所。官营作坊制造漕船、座船（官员客船）、战船为主，民营作坊以造商船、游船为主。主要造船基地有虔（江西赣州）、吉（江西吉安）、潭（湖南长沙）、衡（湖南衡阳）、温州、明（浙江宁波）、处（浙江丽水）、婺（浙江金华）等。当时运河漕船可载3至500石，长江航船最大可载米1.2万石，称万石船，远涉重洋的海船，称客舟，可载粟2000斛。宋徽宗年间造的神船出使高丽，长10余丈，宽2丈5尺，高3丈，载重超过1000吨。在南海的航船，有起碇、驾驶、转帆、测深等设备，船分三舱，中舱分四室即隔离仓，这种隔离仓在船局部撞漏时可以抢修，不致迅速下沉。船用罗盘仪（指南针）测定航向，这是我国古代船工的首创，是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对海上交通的

发展，各国人民的往来，有重大意义。

北宋造纸集中在四川和江南一带，成都、歙州、宣州、越州、婺州、建州、吉州、抚州等是著名产纸区，造纸原料以竹、麻、藤、楮为主，稻杆、麦杆、桑皮也大量使用，北方多用桑，江浙多用嫩竹或稻杆。歙州所产长纸幅长5丈，首尾匀薄如一。在敦煌千佛洞古写本中发现有北宋前期的纸张；浙江瑞安慧光寺塔（仙岩寺塔）发现1015年《妙法莲华经》写本，纸张细腻坚滑，光洁如新。宋神宗时（1068—1085年）苏州承天寺用丝茧制成藏经纸，专供抄写《大藏经》用，为当时珍品。纸张的大量生产，促进了印刷的发展。隋唐时出现的雕板印刷术到北宋有飞跃发展。国子监刻印的书称监本，民营书坊刻印的书称坊本，汴京、杭州、建阳、眉山是印刷业中心，而以杭州雕版最著名，福建建阳西麻沙镇刻印的书目称麻沙本。

此外北宋已使用火药兵器。在汴京有个专制火药火器的官营作坊叫广备攻城作坊，内分火药、猛火油等11个工程。宋初兵部令史冯继升献制作火箭法，灭南唐时使用过火炮火箭。

商业的发展

北宋商业的发达首先表现为城市的繁荣和市镇的兴起。唐朝有20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10多个，而北宋则已达40多个。当时20万户的大城市有开封、成都、兴元（陕西汉中）、长沙、京兆（陕西西安）、杭州、福建、泉州等处。隋唐时城市的坊（住宅区）市（商业区）分开，北宋时则突破了坊市

界限，营业时间亦突破了昼夜界限。这些城市的商税十分可观，如开封和兴元在 40 万贯以上。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在百万以上，城中店铺林立，计有 6400 余家，市内有“瓦子”（即市场），又称瓦市、瓦肆，内有勾栏（娱乐场所），北瓦内勾栏 13 座，而街南桑家瓦子大小勾栏达 50 余座，此外还有卖药、卖茶、饮食、卖画、剃剪纸、算命、卜卦、赌博等摊。宋代画家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开封商业繁荣的写照。图卷描绘了自新成东水门外七里到城西顺天门外金明池一段汴河两岸市容景象。当时的洛阳、扬州、成都等城市，其商业繁盛的景象与开封相类似。

北宋农村集市贸易很活跃。在城市周围有一些定期的集市，其名，有称草市，有的称墟市、集市、坊场等，每隔一天或数天开市一次。各种生活和生产用品都在集市中买卖。有的集市后来发展为固定的市镇，市镇上的贸易品主要有米、谷、麦、豆、鱼、鸭、蔬菜、竹木器、布帛等，应有尽有。由于市镇商业发展，北宋已向市镇征收商税，如蕲州的蕲口镇税收达 26000 贯。市镇的发展打破了原来的州县布局，有的市镇上升为县，而有的县城则降为镇。市镇的发展，活跃了城乡经济，反映了北宋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

北宋与辽、金、西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榷场贸易也非常频繁，榷场即“与敌国互市之所也”。

宋和契丹间的贸易，在太平兴国之前，并未置官署，听任其沿边市易而已。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才正式在镇州、易州、雄州、霸州、沧州等地置榷务，用香药、犀象及茶叶等，与契丹人交易。后因双方关系紧张，皆罢而不通。雍熙

三年（986年），又禁止河北商民与之贸易。端拱以后，虽一度允许沿边“互市”，但不久即复禁，违者处死，北方商人来贸易者，亦扑杀勿论。淳化二年（991年），恢复了雄州、霸州、静戎军、代州雁门砦之榷务，但不久又停罢。

景德二年（1005年），宋重开雄州、霸州、安肃军三榷场，朝廷派都官员外郎孔揆等负责，还传旨三场加强管理，并规定凡不在这三地进行贸易的北商，禁止与其贸易。双方对榷场贸易都有严格规定，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而宋方亦规定，除《九经》之外，其他书籍亦不准在榷场出售。所交易物品，宋方除香药、犀象外，又增加了缁帛、漆器、粳糯等，辽方则为银钱、布、羊、马、橐驼等。每年可获利40余万。

在榷场贸易中，宋、金间的贸易占有重要地位。在绍兴和议以前，宋金间或有贸易往来，但不能正常进行。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遂在沿边地区设立榷场，进行正常贸易。宋陆续在盱眙军，楚州北神镇、杨家寨，淮阴县磨盘、花靥镇，霍仁县封家渡，信阳军齐昌镇，枣阳军，光山县中渡市、西和州等设立榷场，而金则陆续在泗州、寿州、颍州、蔡州、唐州、邓州、凤翔府、秦州、巩州、洮州、密州胶西县等陆续设立榷场。在这些榷场中，不少榷场都随着双方关系的变化而时开时停，只有宋的盱眙军和金的泗州，由于双方经济的需要，比其他榷场来说，相对地较为稳定。因此，宋金的榷场贸易，又可以说基本以盱眙军与泗州的贸易为主。

因是所谓“敌对之国”，故双方对榷场贸易的管理都非常严格。在金一方，明昌二年（1191年）七月，尚书省以泗州

榷场以前关防不严，遂增修屋舍、倍设阑禁，并派场官与提控所监督贸易，以及委提刑司举察，可见管理之严。在宋方，绍兴十二年（1542年）沈该知盱眙军，制订了具体的榷易办法，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这些办法是：一、以资本“百千”为界，百千以下的称小客，要进行贸易，必须找十人为保人，并且只允许先带一半货物去对方榷场贸易，待交易完毕，回来之后，才准许取另一半货物再去交易。资本在“百千”以上的称大商，大商不准离开盱眙榷场，只能请金朝的商人前来交换。但金朝商人在过界时，渡口官司要登记其姓名，然后“押赴本场，博易货物”。二、为防止奸细冒充商人进行军事刺探，交易时，双方商人各处一廊，不得相见，交易全靠“官牙”往来评议，每交易千钱，各收五厘息钱入官。这种办法，既防止了奸细的可能入侵，又在经济上使各自的官方得到实惠。泗州榷场，金大定间，每年官方可得 5.3467 万贯的利钱。承安元年（1196 年），甚至可得 10.7893 万贯高的利钱。而宋亦每年可得 4.3 万贯的利钱。其交易，宋商主要是以茶、荔枝、圆眼、金橘、橄榄、芭蕉、苏木、温柑、橘子、沙糖、生姜、梔子、犀象、丹砂之类，交换北方的皮毛、人参、甘草、马匹及食盐等。宋和辽在榷场交易中书籍的规定甚严，这时似有所放松，大凡刻本，皆可在榷场出售。

宋与西夏的贸易，主要在保安军榷场进行，主要以缁帛、罗绮交易西夏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等，以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换取西夏的蜜蜡、麝脐、毛褐、獐羚角、硃砂、柴胡、苳蓉、红花、翎毛等。宋、西夏关系

较好的庆历年间，曾增开镇戎军为榷场，后随着宋、夏关系的紧张亦罢。

除此之外，宋邕州的横山寨，是与大理商人贸易的主要场点。大理商人在这里出售麝香、胡羊、长鸣鸡、云南刀及云南特产的各种药物，来换取汉人的锦缯、皮毛和各种手工艺品。宋官方还常以盐、丝绸等，换取大理商人的马匹，每年可得 1000 多匹马，是南宋马匹的重要来源之一。

雅州，特别是其碉门、灵门两寨，是与居住在四川各少数民族贸易的主要地方，甚至塞外商人也来这里进行贸易。

榷场贸易沟通了各民族间的往来，繁荣了经济，促进了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北宋初期积极开拓对外贸易，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北宋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友好往来更加密切。唐代仅在广州设市舶司，而宋初则在广州、杭州、明州设市舶司，中期以后又先后在泉州、密州（山东诸城）、秀州（浙江嘉兴）、温州、江阴（江苏江阴）等处设市舶司，管理和开展对外贸易。北宋与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主要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麻逸（菲律宾的民都洛岛）、勃泥（加里曼丹北部）、狮子国（斯里兰卡）、婆阁（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南部）、大食（伊朗）、层拔（非洲一带）等国。北宋主要输出品有瓷器、茶叶、丝绢、金银铜铁锡铅制品，主要输入品有香料、药材、番布、各种奢侈品。

北宋行会大体上与唐朝相似，但组织更严密，活动更频繁，其首领称行首、行头或行老，加入行会称投行，入行的

称行户、行商或行人。行头的职责主要协调政府对行人收税、科买、和雇、平抑物价和监督不法，又代表本行与政府及行际交涉，对内联系贸易、平定物价、办理本行业务、及祭礼和娱乐活动。行会受到封建政府多方面的干涉，并不断通过行会对工商业者进行残酷剥削，而行会中的行老又利用行会的权力操纵物价，垄断市场，打击、摧残一般行户，有的行户因此破产失业，所以行会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也应看到行会制对提高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和技术进步有促进作用。

随着国内外商业贸易的发展，作为商品交换手段的货币不断增加。宋代的货币主要是铜、铁钱，北宋太宗时每年铸铜钱 80 万贯，神宗元丰间铸铜钱 500 万贯，铁钱 88 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但由于交换的发达，北宋尽管每年大量铸造铜、铁钱，仍不能满足市场交换需要，尤以铜钱更显缺乏。又因铜、铁钱不便携带，铁钱更笨重，每千钱 25 斤重，不利于交贸和流通。于是市场上出现“赊”或“赊卖”的信用交易，由赊卖发展到使用“交子”。“交子”起初为民间私人交易使用，到真宗时经政府许可，四川成都 16 家富商联合发行纸币“交子”，以代替铁钱。据本攸《宋朝事实》记载：交子“用同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字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百万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交子是我国最早的纸币。由金属钱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

1023 年（天圣元年）仁宗在益州（成都）设交子务，改民营为官营，正式发行纸币，每年限额 125 万贯，限在四川流通。到徽宗时改交子的“钱引”，除闽、浙、湖、广外，在各路发行，又将交子务改为钱引务。由于钱引不备本钱，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危机，大量印发，不断贬值。引起通货膨胀，钱引成为北宋统治者掠夺人民的工具。

北宋特别重视商税，在全国各地设场、务等征税机构，专门征税。对行商每关值百抽二，称过税。对坐商值百抽三，称住税。正税之外还有杂税，如按疋船所载货物多寡向船主征收，称力胜钱；场务派出巡丁沿路拘拦商人纲税，从每百文税钱中提出十文给拘拦人，称为事例钱，后又改称市利钱。根据官府需要，有时也征收实物。北宋商税在唐代的基础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商税总额在太宗时每年 400 万贯，仁宗时达 2200 万贯，此后每年一直保持着 1000 万贯左右。商税的增加反映了商业的发展。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由官府垄断产品生产和销售。盐的专卖有官鬻、通商两种形式，官鬻是官府直接控制生产，主持运往行、销地区售卖，不许私人插手。通商是商人在京师或边地交钱或粮粟，在官府指定地区取盐销售。食盐专卖使盐价昂贵，盐质低劣，人民深受其害。政府也设置场、务管理茶叶的专卖，除福建路有些官营茶园外，其余各路茶园均为民营，场官先将官府收购茶叶的钱发给园户，称为“本钱”。园户在茶叶收获后，必须将全部茶叶卖给场务，严禁私售。酒的专卖称榷酤，各州县均设酒务，管理酿造和卖酒。矾是冶铜和印染的必需原

料，制矾民户称鑪户，产品由官府收购，不准私卖。专卖制使官府大获其利，但严重影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不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第三节 北宋的政治改革

一、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

宋真宗的“天书”骗局

宋辽“澶渊之盟”订立后，被寇准等人推着北上、一路畏惧万状的宋真宗总算松了一口气。他既庆幸自己“亲征”获得如此的成功，也感激促他此行成功的寇准。所以，当他从澶渊返回都城后，对寇准更加看重。而寇准也因此颇为自得。

但是，寇准在“澶渊之盟”后声望和地位的提高，却遭到曾经力主真宗迁都金陵的王钦若的妒恨。王钦若为人奸猾狡诈，他不甘心于寇准主张的成功和自己逃跑主张的失败，就想设法对寇准在“澶渊之盟”时的行动横加诽谤，以离间宋真宗同寇准的关系。

景德二年（1006年），寇准被罢去平章事（宰相）职务，贬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当知州。

宋真宗自从听了王钦若的挑动以后，感到澶渊之盟是个

难以洗刷的耻辱，经常闷闷不乐。王钦若就对宋真宗说：“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今天不如大搞符瑞，借天命以自重，戎狄就不敢轻看宋朝了”。他向宋真宗提出了“封禅”的建议，说这是个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大功业”。他还告诉宋真宗，“封禅”需要有“天瑞”出现才能进行，而“天瑞”可以人为地制造，只要人主（皇帝）深信不疑布告天下就可以，还说什么这是圣人以神道设教的办法。这些话明显是要宋真宗制造迷信骗局以自欺欺人，但却正中宋真宗之下怀。当时朝中的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等都同王钦若沆瀣一气。

当满朝主要大臣都支持搞迷信骗局后，宋真宗就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煞有介事地说他去年梦见天神下降，让他设道场敬天迎接“天书”，今天果然天降下2丈多长的黄帛，就是“天书”下降了。王旦等人再拜称贺，宋真宗就下诏改元大中祥符，群臣都因此加官晋爵。一场闹腾多年的天书、祥瑞迷信骗局就这样开张了。

“天书”制造出来后，紧接着就是制造请求宋真宗到泰山“封禅”的“民意”。从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起，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沿途修建行宫，调用大量物资。宋真宗遂于这一年十月初四日，带着王旦、王钦若等朝中大批官员及众多的护驾军队，从京城出发到泰山举行所谓“封禅”仪典。在泰山祭神饮宴后，又到曲阜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赐给孔庙钱30万，帛300匹。到十一月二十日才回到京城。满朝官员都因“封禅”典礼而得到封赏。

泰山“封禅”典礼刚完毕，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汾

阴祀后土的准备又开始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初，尽管当时水旱灾害相继，京城近郊谷价踊贵，宋真宗还是不顾有的官员的劝阻，又带着大队人马到河中府等地闹腾了二个多月才回都城。过了两年，又到亳州（今安徽亳县）亲谒太清宫，册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这次谒太清宫，也有东封、西祀那样大的规模。

宋真宗人为制造“天书”骗局，本想借用“天命”来加强宋朝的统治，结果却适得其反。

首先，它腐蚀了北宋的政治，使北宋王朝迅速走向腐败的道路。

在制造“天书”骗局后，宋真宗把主要精力都用在鬼神祭祀的迷信活动方面，一再制造新的“天书”“符瑞”骗局以粉饰太平，朝政方面没有任何建树。晚年更是经常神魂颠倒，满口胡话。朝政方面的大事多由皇后刘氏专决。王钦若、丁谓、陈彭年、刘承珪和林特等五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迷信骗局，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这五个人互相勾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被时人称为“五鬼”。

因为宋真宗热衷于制造所谓“符瑞”，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官员也都群起效尤。王旦当宰相多年，只知道按宋真宗意旨办事，一切遵守旧的法度、墨守成规。陈彭年当翰林学士，所建议的事，不过是兴建符瑞以图升官。许多地方官则争着报告各地所出现的“符瑞”，多以珍禽异兽作为祥瑞之物献给朝廷。甚至连寇准这样有所作为的政治家，在晚年为了获得重新被宋真宗起用，竟也不惜名誉，参加制造“天书”的骗局。而当时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却很少有人关心。朝政一

切因循守旧，任何有益的建议都被“非有大益，无改旧章”这条绳索束之高阁。整个朝廷笼罩在因循守旧的气氛之中。

“天书”骗局对北宋的财政也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到泰山搞“封禅”活动以前，宋真宗曾先向掌管财政的丁谓询问经费情况，得到国库有余的回答后才决定东封。这次“封禅”活动，耗费国库 830 余万贯。在东封结束后，大臣王曾说：“迺者方毕封崇，颇烦经费”。为准备汾阴和亳州之行，大臣李迪说：“土木之役，过往时百倍”，费用比“封禅”更加浩大。除了宋真宗的三次大规模活动外，宋朝自制造“天书”骗局后，又设了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等等，下令各地都要设斋醮祭祀，京城内外有时甚至一夕数处斋醮。每个斋醮，也要有大量耗费。有一次，宋真宗下令京城寺观设斋诵经，花费竟达 150 万贯。

为迷信活动的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兴土木，耗费更是惊人。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宋真宗下令在京城建“玉清昭应宫”，作为敬奉“天书”的地方，又下令各路州、府、军、监、关、县，都建筑道观。“玉清昭应宫”由丁谓主持修建，规模宏大，每天服役的民工达三四万人，所用的建筑材料，分别从全国各地征调，有陕西秦、陇的松，河东岚、石，汾阴的柏，潭州、越州的杉，衡州的碧石等等。原准备 15 年修成，因丁谓下令夜以继日开工，结果用 7 年修成宫殿凡 2610 区。亳州修建的“明道宫”，也有 480 区。其中“玉清昭应宫”中“长生崇寿殿”的三座塑像，就用去金 1 万两、银 5000 两。宋真宗死后，有个叫范雍的大臣说：“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玉清昭应宫”的修建使宋朝的国库大大亏空了。

因为各种迷信活动和大兴土木，都大量使用金银，国库中的金银消耗殆尽，民间的金、银价格也急剧上升，整个社会的物价也因此受到影响。

“天书”骗局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一直闹腾了15年，直到宋真宗死去，“天书”作为随葬品埋入坟墓方才收场。但是，“天书”骗局所造成的北宋政治腐败和财政空竭的问题，却继续影响到宋仁宗统治的时期。

各种社会问题的日益恶化

北宋中期，各种矛盾不断发展，开始激化起来。宋朝“不立田制”，即不限制地主占有土地的数量。宋太宗时，土地集中的情况就已很严重：“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长编》卷27）宋仁宗初年，品官形势之家，占田几乎达到天下耕地的一半。不但土地兼并日益发展，而且赋役严重不均。宋真宗时，就有人上言：“天下税赋不均，豪富、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地薄而税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八）由于土地兼并，赋役不均，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中。正如欧阳修所说：“一岁之耕，供公仅足，而民食不过数月。甚者，场功甫毕，簸糠麸而食秕稗，或采橡实、畜菜根以延科春。……不幸一水旱，则相枕为饿殍。”（《欧阳文忠集》卷五十九《原弊》）广大农民士兵不堪官府和地主的压迫和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斗争连绵不断。早在淳化四年（993年），在四川即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而在庆历三年（1043年），则接连爆发了王伦领导的士兵起义，张海、郭邈山领导的农民起义，及湖南

桂阳监的瑶族起义。庆历七年(1047年),又爆发了王则起义。真是“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于一火。”(《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0《再论置兵御贼札子》)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镇压下去了,但也极大地震撼了北宋王朝的统治者。

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同时,民族矛盾也尖锐起来。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西夏每年都要对宋发动一次大的战争,并且都把宋打得大败。而辽则乘机进行讹诈,宋朝被迫增纳岁币银10万两、绢10万匹。

在各种矛盾互相交织的作用下,北宋中期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这主要表现在冗兵、冗官、冗费及积贫、积弱上。宋朝军队的数量十分庞大,宋太祖开宝间(967—976年),有禁军19.3万人,厢军18.5万人,共为37.8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禁军增至82.6万人,厢军43.3万人,共为125.9万人。到皇祐(1049—1054年)初年,禁、厢军共达140万人。用于养兵的费用,则高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宋真宗对辽议和后,士兵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将领不是“纨绔少年”,就是“罢职老校”。加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因而对西夏作战,屡屡失败。

宋朝官僚队伍十分庞大。据包拯上疏言,真宗景德、祥符年间(1004—1016年),文武官员共为9785员;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猛增至17300余员。40年间,增加了近一倍。而且“其末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人不在数内”。(《包拯集》卷一《论冗官财用等》)英宗时,更增至2.4万员。在庞大的官僚队伍中,那些以恩荫得官者,大多是纨绔子弟;而那些进纳买官、胥吏出职者,则大多为贪赃枉法之

徒。一般官员们也大多以“因循懦弱者为得计”，暮气、官气笼罩着宋朝政府。

养兵、养官、郊祀以及岁币等费用，使宋朝入不敷出，出现了财政危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全国收入15085万余（单位为贯、石、匹、两等，下同），支出12677万余。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全国收入12625万余，“而所出无余”。到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全国收入11613万余，支出为13186万余，出现了1573万余的赤字。

这样，就使宋朝陷入了积贫积弱局面。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不少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弊法的建议，北宋的一些皇帝也感到不能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于是，出现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二、庆历新政

北宋王朝到了宋仁宗时代（1023—1063年），社会危机已经表面化。如何挽救北宋王朝面临的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范仲淹（989—1052年）生长在南方一个清寒的地主家庭。他2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姓谢，无法维持母子两口的生活，不得不带着幼小的孩子再度出嫁给一个姓朱的人家。

青少年时代的范仲淹，经历了艰苦的生活磨炼。他在醴泉寺的庙宇里读书，每天只能吃到稀粥和咸菜。后来入学念书，昼夜苦学，连续五年坚持不懈。每到寒冬腊月，夜深读

书疲倦时，就用冷水泼面来振作精神，继续攻读。

由于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看到了北宋社会下层的黑暗面。了解到人民的生活疾苦和要求，他在年轻时就想“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后来中了进士，就连续上书，议论时政。1033年（明道二年），他上书反对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势力，被驱逐到睦州（浙江淳安）去作地方官。过了一年多，又改任苏州知府。当时正遇上大水灾，民田不能耕种，范仲淹亲自规划农田水利，取得了成绩。1035年（景祐二年），他升任礼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知府。当时朝廷里仍然是吕夷简掌权。他们扩大私人势力，打击新进人物。范仲淹不畏权贵，上书批评时政，主张选择贤能、整顿朝廷吏治。结果，又一次遭到吕夷简集团的排斥而被外调。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西北边疆防守西夏侵扰。几年中他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西北一带的“羌、汉之民，相踵归业”，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军事上，范仲淹“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经过欧阳修等大臣的推荐，1043年（庆历三年）范仲淹被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一年山东地区爆发王伦起义。第二年（1044年），他就向宋仁宗皇帝提出十项政治改革的方案。方案的内容包括考核官吏，整顿吏治；惩办贪污，裁汰冗官；改革科举，选拔人才；提倡农桑，减轻徭役；发展军屯，加强国防等等，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清除贪污犯罪分子，限制特权势力。他认为任用官吏，必须经过科举考试。考试的科目应当先是“策论”，后是“诗赋”。提拔人才，

首先要知道他对国家大事的基本态度，是不是关心“经国王霸之业。”文学素养应放在次要的地位，要把热心于“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寒士”（下层地主知识分子）提拔上来。他还主张政府的法令一旦公布，就必须严格执行。赏罚必须分明，“有功者虽憎必赏，有罪者虽爱必罚”。他深有感慨地说：“国家之衰，莫大于乏人”。如果没有正直奉公的人才，就是有好的政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得到施行。

为了整顿吏治，他审阅了全国各路的地方官政绩，撤换了一批无能的官吏。当另一位大臣富弼看见范仲淹在职官簿上勾去了一批“监司”（就是各路的转运使等官吏）的名字时，心里有些不忍。他对范仲淹说：勾去这些人的名字倒很容易。要想一想，这些人丢了官，岂不是全家人都要痛哭流涕吗？范仲淹当即回答说：与其让这些坏官危害一路之内的老百姓，叫一路人都哭，不如让他们一家人去哭吧。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主张“劝课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他要求各地方官必须随时向朝廷报告兴修水利的建议和办法，陈述发展农业的意见，积极修筑堤堰渠塘，减轻漕运负担，恢复江南圩田。范仲淹认为，如果各级地方官能真心实意讲求农桑和水利，不要几年，就可以减少饥荒。他还主张减轻徭役“以宽民力”，不应当服差役的人，都应当让他们好好地从事农业生产。

在军事上，他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一制度。一年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

这样，才能节省军费开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军事将领应当从士兵中提拔，要真正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充当统帅。北宋有一员名将叫狄青，就是范仲淹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升为国家的大将。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当权的保守派的根本利益，但是在整顿吏治方面，限制了权豪势要的特权，因此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他们无中生有、颠倒是非，诬陷范仲淹引用私人、勾结朋党。甚至诬告范仲淹要想废黜皇帝，捏造一切罪名统统加在他的身上。范仲淹的改革，不到一年就失败了。1045年（庆历五年），他被赶出中央朝廷，调到西北边疆。

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虽然失败，但他敢于向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势力挑战的勇气和他的言行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的影响。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他提倡“养民”、“重农”，使人民能够安心生产。他说：“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这种“修农政”、“足衣食”的思想，把农业生产放在治国的重要地位，是符合人民愿望的。

继范仲淹之后，苏轼也向宋仁宗皇帝多次上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他认为必须限制权豪显贵，遏止兼并势力的发展；要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要节约国家财政费用，调整赋税，量入为出；要清除贪吏，改革时弊；要寓兵于民，制定军制，训练军队，加强国防力量。这些主张对改变当时北宋的政治局面，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苏轼的改革主张，对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是有很大影响的。

三、王安石变法

公元 1067 年，20 岁的赵顼继位做皇帝，这就是宋神宗。他目睹国家财政空虚，官僚政治暮气沉沉，军事力量又不堪一击，很想振作一番，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于是，破格提拔了王安石，支持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1021—1086 年）是抚州临川（江西临川）人，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益是一个州县地方官。王安石在 20 岁之前，跟随他的父亲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一些社会的现实问题，看到了人民的艰苦生活。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 年）王安石中了进士。他 27 岁时任勤县（浙江宁波）知县，以县为单位进行了一些政治改革，兴修了当地的农田水利。后来提任舒州（安徽安庆）通判，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王安石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深有感触。

1058 年（嘉祐三年），他向宋仁宗递交了长篇的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指出北宋王朝已经到了“财务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的境地，原因是不知改变法度。他认为国家的法令和制度，应当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有所“改易更革”。法度是靠人来执行的，必须培植和选拔人才，才能“变更天下之弊法”，才能使国家走上大治的轨道。王安石主张要“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改革

国家财政制度，使人民能够“安土乐业，人尽其力，以生天下之财”。王安石认为要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办法是发展农业生产，不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要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大量剥削所得，一部分收归国家。

1067年，宋神宗把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神宗皇帝身边的大臣。第二年（熙宁元年），王安石送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指出北宋王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十分严重，“农民坏于差役”，“其于理财，大抵无法。”1069年（熙宁二年），宋神宗任命49岁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行变法。王安石于1069年的2月，成立变法的权力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三司是统筹国家财政的，包括盐铁、户部和度支。王安石把重点放在理财方面，准备制订出一系列“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的政策方针。

宋代经过100年的统治，中央集权制助长了封建特权势力的膨胀。大官僚阶级依仗权势，通过非法手段，兼并土地，侵渔百姓，甚至巧取豪夺，聚敛财富。一小撮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利用别人所没有的法定特权和非法特权，攫取最大限度的私利。这些封建特权势力盘踞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他们像洪水猛兽一样，危害人民的利益，使北宋王朝陷于灭顶之灾。

王安石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史学家。他鉴于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变法期间提出一些有关限制封建特权的主张和措施。为了整顿吏治，在选举和用人方面，王安石不问家世和资历、不讲上下关系，而着重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他所提拔的年轻人才，都先加以试用。早在上仁宗皇

帝书中，他就表示：“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其事。”王安石通过对一个人的言行的调查及在工作中试用，来考核其实际能力，这样易于发现和鉴别人才。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从1069年开始实行，到1085年（元丰八年）几乎全部被废止，先后共16年。在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整顿了科举和学校，为培养人才准备条件。国家裁并了100多个州县，减少了大批地方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也相对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关于财政和经济制度的改革，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新法：青苗法打击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高利贷剥削；募役法迫使原来可以免役的品官形势之家也必须出钱来代替服役；方田均税法清丈了被大官僚、大地主阶级隐瞒的土地，国家按照土地面积和等级征收赋税，免除了下户的不合理负担；农田水利法开垦了大量荒地，修通了河道陂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易法的推行，给那些包揽商业、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垄断市场的大官僚、大商人以相当限制，使中小工商业者有一定活动的余地。

在加强防御能力和改革军事制度方面，确立了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和设置军器监等。王安石为了纠正募兵制的严重弊病，逐步过渡到兵农合一制，规定每户人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就以一人为保丁，以10家为一保，50家为一大保，利用农闲，进行步射和骑射等军事训练。从1070—1076年的几年内，全国受过训练的保丁有700多万人。1075年（熙宁八年）统计，全国兵额不到80万人，比宋仁宗庆历年间裁减

了 45 万人，每年减省了军费 1350 万缗。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于富国强兵收到了一些效果。通过限制豪强大姓的土地兼并和漏税逃税，来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减轻下层中小地主和自耕农、半自耕农的不合理负担。熙宁年间，国家每年收入在 5000 万贯左右，收支已经平衡；农田水利也陆续得到开发。从 1070—1076 年的几年内，全国兴修的农田水利有 1 万多处，使数十万顷的田地得到灌溉之利。福建莆田的木兰陂，就是当时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完成于 1075 年（熙宁八年），是一处拦洪、蓄水、排灌相结合的大水库。为了发挥木兰陂在农田水利上的效益，除了陂坝工程建筑之外，又进行了辅助工程，于 1077 年（熙宁十年）在陂的南端修建了一座回澜桥。陂内所蓄溪水，经过回澜桥流入 7 条大沟，每条大沟长达 40 里，沟深 3 丈，广 11 丈。大沟两旁又开小沟，一直引水到田间，使昔日旱涸或水潦的万顷海田，旱涝保收。这一水利工程是王安石变法时期莆田一带劳动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成果。经过了 900 多年的时间考验，至今还屹立在东南海滨。

到了元丰年间（1078—1085 年），出现了经济恢复的气象。北宋学者陆佃（1042—1102 年）说：“迨元丰间，年谷屡登，积粟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王安石在《后元丰行》诗篇中写道：“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元丰年间生产的好转，这是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光辉纪录，与王安石的“熙宁新法”是有直接联系的。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元老重臣的反对。在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守旧和革新、限制和反限制的矛

盾斗争。文彦博、司马光等守旧派和王安石等革新派，都是要巩固北宋王朝的统治、反对农民起义的。他们看到国家财政的困难和军事力量的衰弱，但是在如何维护北宋政权的问题上，司马光等同王安石的政治见解不同。守旧派偏重于保持原来的法令制度，按旧制度办事。他们不同意王安石那样全面而大刀阔斧地改变旧制度。文彦博当面对宋神宗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富弼对宋神宗说，天灾人祸，必须“安静”。御史中丞吕诲上疏给宋神宗说：“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司马光认为必须“谨守祖宗之成法”，并利用向宋神宗讲述西汉历史的机会，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论调。他还写信给王安石，劝告他不要“生事”，即是不要推行新法；不要“侵官”，即是不要损害大官僚的既得利益和特权。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意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在给司马光的回信中说：“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由于王安石深知北宋100年来的局势，已经发展到不变革不能图存的地步，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是很坚定的。

1085年（元丰八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死了。王安石失去了靠山，变法失败了。第二年，66岁的王安石病死在江宁。

王安石的“熙宁新法”，对当时历史的发展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北宋时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决不是靠几个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变法所能解决的。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继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方腊起义和宋江起义。

第四节 北宋 后期的统治与农民起义

一、从元祐更化到哲宗绍圣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仅 10 岁的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五月，即起用守旧派首领司马光（1019—1086）为参知政事；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升为宰相。司马光入京前，已经上疏请求废罢保甲、免役、将兵等法；入京后，又上疏攻击王安石“专用私见，变乱旧章”，主张全部废除新法。并且鼓吹“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为推翻新法制造政府根据。从元丰八年八月罢保甲法起，到元祐元年九月司马光去世，新法已大都被废罢，变法 70 多人也被列为王安石的亲党，榜之朝堂，主要成员蔡确、章惇、吕惠卿、曾布等相继被贬官而排挤出朝廷。此即所谓“元祐更化”。守旧派牢固掌握政权之后，又因政见及学术主张的不同而互相倾轧，使政局愈加混乱。

元祐八年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死，宋哲宗亲政。哲宗早就对守旧派不满，有志于继续神宗新法，亲政后即改元“绍圣”。绍圣元年（1094），罢守旧左相吕大防、右相范纯仁，起用变法派章惇为左相，曾布等为执政。变法派再度掌权之后，

一方面对守旧派进行打击，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流放吕大防、刘摯等于岭南，又将韩维等 30 人贬官；另一方面，基本上按照熙宁、元丰旧制，逐步恢复了新法，并采取进筑堡垒寨的办法，进行对西夏的开边活动。后来，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互相倾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仍然相当激烈。

二、宋徽宗、 蔡京集团的腐朽统治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其弟徽宗赵佶继位，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向太后起用守旧派韩忠彦为左相，变法派大臣除曾布外，诸如章惇、蔡京、蔡卞等全被贬出朝廷。七月，徽宗亲政，曾企图调和变法与守旧两派，改元“建中靖国”。后又主张绍述熙宁之政，改元“崇宁”。崇宁元年（1102）五月，韩忠彦被罢相；七月，蔡京勾结宦官，取代曾布为右相，从此，徽宗与权臣蔡京、王黼、高俅、朱勔及宦官童贯、李彦、梁师成等结成一个腐朽的统治集团，统治北宋长达 23 年之久。

蔡京（1047—1126）初登相位不久，即大肆排斥异己，加剧党争。崇宁元年九月，定司马光、文彦博等 120 人为元祐奸党，后又将元祐末，太后执政时上书主张恢复旧法的臣僚定为邪等。三年六月，又重定元祐、元祐末年党人及上书者，合为一籍，共 309 人，刻石立于文德门，并颁行全国，称“元祐党籍碑”。其中不但有司马光等守旧派，甚至连变法派章祐、张商英等 10 余人也因与蔡京意见不合而被列入党籍，

加以打击迫害。轻则贬官，重则编管安置远地，其子弟也受到种种牵连。

蔡京还借恢复新法之名，行聚敛之实。如免役法恢复后，巩州（今甘肃西）的役钱由元丰时的每年 400400 贯，增加到 29000 余贯，后者竟是前者的 790 多倍！他们还恢复茶叶专卖和屡改钞盐法，极力搜刮钱财。另外，宋徽宗还先后任用宦官杨戡、李彦，设公田所及西城括田所，将大量民田掠为公田，课取“公田钱”。据《通考·田赋·农田》记载，到宣和三年（1121），西城括田所强占的民田达 34300 多顷。

宋徽迷信道教，大建道观，设道官，宠信道士林灵素等，其门徒任道官、领俸禄者将近 2 万人。徽宗时期官员十分冗滥。蔡京等人不但竭力安插自己的子弟、亲戚、门客等做官，而且公开卖官鬻爵，甚至还按照官位的大小列出价格。如当时人说：“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曲洧旧闻》卷十）

蔡京还倡导“丰亨豫大”之说，穷奢极侈，尽情挥霍。崇宁元年，宋徽宗命童贯置苏杭造作局，役使工匠数千人，制作宫廷器用。四年，又命朱勔主持苏杭应奉局，搜刮民间奇花异石，征用大量船只，运往京城开封，以建造延福宫及万岁山（艮岳）。此即所谓“花石纲”。造作局、应奉局对东南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蔡京等人也是宅第宏敞，姬妾成群，每年生日，各地都要奉献大宗礼物，称“生辰纲”。朱勔则是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玉照新志》卷三）

三、方腊、宋江起义

宋徽宗、蔡京集团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在这重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人民被逼上梁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北宋末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南方有方腊领导的起义，北方有梁山泊农民起义和宋江领导的起义。

方腊起义发生在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起义地点是在睦州的青溪，也就是现在浙江淳安县境。这是一个贫瘠的山区，高峰峻岭占了十分之八，仅有的可耕之地，又集中在少数豪强大地主手里，劳苦大众依靠经营山地维持最低的生活。

两浙路是当时财政负担最重的地区。当地人民不仅担负着繁重的赋税和加派，还担负着特有的“身丁钱”。各州县的“上贡”物资成倍地增加。1102年（崇宁元年），童贯在苏州、杭州两地开设“造作局”，为皇室制造器用，包括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雕刻、织绣等各色工匠，每天役使几千名，所需物料，全部取于民间。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江淳安）农民在方腊领导下，以诛朱勔为名，发动起义。朱勔是大地主、大富商、大贪官，他在两浙一带敲诈勒索20年，引起一些官吏的不满。御史中丞陈过庭就大胆上奏章，指控“朱勔父子，本刑余之人，交结权幸，窃取名器，罪恶盈积，宜正刑典，以谢天下。”东南老百姓对于童贯、朱勔

等人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无不切齿痛恨，弄得“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方腊就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动了农民起义。

方腊是今安徽歙县人，原是一个贫苦农民，曾经在青溪县西邦源洞（淳安县碣村北洞源里）大地主方庚家里做佣工。方庚的父亲方有常是个大地主、大米商。这一年（1120年）的十月，方有常和方庚父子全家由青溪邦源洞迁到邻近的歙县七贤村。方腊率众用铁铲等作武器，打死了方有常，杀了方家大小42口。方庚跳墙逃跑了。

方腊利用当地贫苦农民信仰的“食菜事魔”教，把农民们广泛地发动起来。他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追求光明的未来，追求平等的生活。

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利用食菜事魔教，组织广大农民，对宋徽宗集团的黑暗统治发动猛烈的冲击，并宣布“法平等”的主张。

在方腊的宣传鼓动下，农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不到10天，起义的队伍近10万人。方腊自称“圣公”，并用“永乐”为年号，建立了农民政权。1120年12月，农民军乘胜攻占了睦州（浙江建德）、歙州（安徽歙县）、杭州。到第二年的2月，又攻下了婺州（浙江金华）、衢州（浙江衢县）、处州（浙江丽水），共6州52县。农民军所到之处，“劫取大家（大地主）财”，分散给贫民。参加起义的农民，“项背相望”，震动了整个东南。当时两浙地区响应方腊起义的，有台州（浙江临海）吕师囊起义，永嘉（浙江温州）俞道安起义，归安（浙江吴兴）陆行儿起义，苏州石生起义，兰溪（浙江

兰溪）朱言、吴邦起义，剡县（浙江嵊县）仇道人起义等大大小小的起义军。影响所及，包括温州、台州、越州、湖州、苏州、信州（江西上饶）等地。

方腊起义军深得各地人民的拥护。方腊农民军“保全生灵安业”，维护人民利益。方腊起义对北宋王朝的威胁是巨大的。为了保住东南的财赋，宋徽宗必然要倾其全力镇压这次起义。

北宋政府派童贯带领京畿禁军和西北精兵赶赴两浙。陕西六路的军队，在刘延庆统制下顺汴河南下，渡过长江，由金陵、镇江向两浙进发。

公元1121年（宣和三年）的四月，方腊和几十名农民军将领不幸被俘。八月，方腊在汴京被杀害，起义失败了。起义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军事方面来看，由于农民军缺乏严密的组织，缺乏足够的武器，而且战线越拉越长，西攻信州失败，攻取秀州（浙江嘉兴）又未能成功，兵力更加分散，加上双方力量悬殊，农民军更趋劣势。童贯大军水陆两路进攻杭州，农民军数万人又坐困孤城，终于粮尽弃守。其他各州也相继被宋军占领，方腊最后被包围在邦源洞，坚持到最后而被俘。

北宋末年，北方连续不断地爆发小规模农民起义。起义的一个中心地点是梁山泊。

梁山泊又叫梁山泺，就是现在山东的东平湖。梁山就靠近在湖的南边。由于北宋时期黄河的两次大决口，梁山泊变成一个周围800里的大湖泊。北宋大臣韩琦在《过梁山泊》的诗里就说，“巨泽涉无际”。周围的广大贫苦农民，依赖这个

巨泽里的蒲、鱼、莲、藕为生。他们开垦梁山泊附近的湖滩地，向大自然夺取口粮。他们常年从事捕鱼、采藕、割蒲等生产活动，来熬过艰难岁月。

公元 1111 年（政和元年），北宋政府设置了一个“西城括田所”，大肆搜刮北方人民的土地和财富，在梁山泊也设卡征税。农民们进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按照船舶的大小，交纳很重的租税。漏税和逃税的人，被当作“盗贼”来处罚。附近每县除了常赋之外，平均要增加租钱 10 多万缗，遇有水旱天灾，也不许减免。梁山泊周围的农民们，千辛万苦，祖祖辈辈垦荒打鱼，生产自救。他们连这么一点谋生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劳动人民交不起租税，被断绝了生路。他们被逼上梁山，聚集在一起，利用高山和湖泊的有利地形，进行武装抗租抗税斗争。宋军来了就一起战斗，宋军退了就忙着生产。梁山泊成为北方农民进行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据点。《宋史》里也明确写：“梁山泺，故多盗”。以梁山泊为基地的农民反抗斗争，很早就开展了。一直到南宋末年，梁山泊的农民还继续在战斗。

北方除了梁山泊农民的反抗斗争外，还有宋江领导的一股农民起义军。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撓其锋。他们虽然只是小股的起义军，但由于勇敢战斗，避实就虚，采取机动灵活的流动战术，“转略十郡”，以对付几万官军的进攻。宋江起义军从河北打到山东，转战青州（山东益都）、齐州（山东济南）、濮州（山东濮县）、单州（山东单县）一带，并到达江苏北部。

1121 年（宣和三年），宋江被沂州（山东临沂）知州蒋园所败，后来率军南下，攻淮阳军（江苏邳县），进入淮南活动。宋江起义军攻打沐阳县，被县尉王师心击败，由沐阳乘船到海州（江苏连云港西南）。海州知州张叔夜侦察到宋江的动向，以上千名士兵设伏于城郊，用轻兵引诱农民军登陆。宋江中了埋伏，10 多只大船又被焚毁，损失惨重。

但这支农民军仍然在北方继续战斗。《宋会要辑稿》就记载 1121 年 12 月，“河北群贼自呼赛保义等，昨于大名府界往来作过，良民为之惊忧，久之未获。”他们还在打着“赛保义”宋江的旗号，在河北一带活动。

公元 1124 年（宣和六年），宋朝在全国派捐 6000 万贯，引起人民的反对。河北有高托山领导的起义，号称 30 万人；山东有张万仙和张迪领导的起义，人数也有 10 多万人。其他小股的起义队伍，更是不知其数。这些都是继宋江起义之后，北方农民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

第二章

辽和西夏

第一节 辽的社会政治

一、辽世宗之立

辽会同九年（946年），辽太祖长孙耶律阮（小字兀欲）随叔父太宗耶律德光攻打后晋。次年春受封为永康王。四月辽太宗在北归途中病于临城（今属河北），行至栾城（今属河北）病得更加严重，次日死于杀胡林。为了防止腐烂，契丹人剖其腹填上食盐数斤将太宗的尸体渍起来，继续载之北行。

燕王赵延寿因“恨太宗负许代中国之约”，对人说，我不想再回契丹。在太宗死的当天带兵先入镇阳（今河北正定）。永康王兀欲等护送灵车也相继而入。赵延寿欲拒之，恐失大

援，只好让他们进城。

因太宗未留下遗诏让谁来即位，故将士忧惧，不知所措。统率大军的南院大王耶律吼与北院大王耶律洼商议对策，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倘若请示述律太后立谁为帝，肯定是她所宠爱的李胡（辽太祖第三子）。李胡为人暴戾残忍，岂能爱护百姓君临天下？要想满足百姓的希望，则应当立永康王兀欲为帝。耶律洼赞同这一意见。不过，这时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李胡留守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太宗长子寿安王述律（穆宗耶律璟）都在朝，他俩人都拥有相当的实力。永康王兀欲在听到耶律吼等人的建议后，未敢立即应承下来。一天恰好轮到安抟担任侍卫，兀欲便密召他前来问计。安抟的父亲迭里在辽太祖时担任南院夷离堇，因主张立东丹王耶律倍，反对立辽太宗耶律德光，被述律后“以党附东丹王”的罪名下狱，严刑拷打，后处死。所以安抟与兀欲有特殊的关系，经常暗中联系。当永康王兀欲向他问计时便说，你是东丹王耶律倍的嫡长子，聪明稳重、待人宽厚。太宗虽然有子寿安王，但是，天下的人大多认为你应该即帝位，劝他莫失良机。这时，恰逢京师来人，安抟便借机在军中传播李胡已死的流言，大家竟然信以为真。同时与南、北二大王商议，北院大王耶律洼当即站起来说，我们二人正在议论此事。太宗曾经想以永康王为储贰，今天这事，有我们在此还有谁敢不从？但是最担心的是立帝这样大的事不请示太后，国内将会引起争端的。安抟说，既然大王知道太宗要立永康王为储贰，他又贤明，人心乐意归附，现在天下始定，如不当即立断，则大事去矣。若请示太后，必立李胡。李胡残暴，路

人皆知，如果立他为帝，对国家极为不利。于是，耶律吼决定，立即整军，召集诸将拥立永康王兀欲为帝，是为世宗。因以前辽太祖死在东征的归途中的夫余城，述律后杀各部尊长及诸将数十人，其他人皆怕死，莫不欣然从命。

世宗之立燕王赵延寿全然不知，他自称受太宗遗诏，权知南朝军国事，向各道下达命令，对待世宗像对待其他将领一样。有人提醒赵延寿说，契丹诸大人数日频繁聚会，必然有变，“今汉兵不下万人，不若先事图之。”延寿犹豫不决，下令五月一日在待贤馆行权知南朝军国事礼，受文武官员朝贺。因当时形势难测，乃止。五月一日，世宗用计，以赵延寿谋反，将他扣押起来，同时下令：“延寿亲党，皆释不问。”使局势迅速地平息下来。

四月底，世宗命天德（太宗宫人萧氏所生）、朔古、解里等护送太宗的灵柩先赴上京。

述律太后听说立了世宗，大为震怒，以耶律倍叛辽，其子不得立帝为理由，命李胡率兵讨伐。六月一日，世宗到南京（今北京市）。北院夷离勤安端、详稳刘歌请求担任前锋，并在泰德泉击败了李胡军队。李胡气极败坏，将世宗的臣僚家属全抓起来作为人质，并扬言如果打不胜的话，就杀了所有的人质。秋，世宗率大军至潢河横渡，隔岸与太后、李胡军对峙数日。后经大臣耶律屋质调停，订立横渡之约。述律太后同意立耶律阮为帝，各自罢兵。

不久世宗听说太后、李胡有异谋，就将他们迁至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东南）软禁起来；处死参与密谋的司徒划设及楚补里等人。同年八月初一，世宗尊其母萧氏为

皇太后，以太后族人刺只撒古鲁为国舅丈，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同时将述律平的官户“分赐翼戴功臣”，又对的鲁和铁刺子孙“先以非罪籍没者归之”，次日，设立北院枢密使，派安抟担任此职。九月，行柴册礼，群臣上尊号，曰天授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天禄。辽朝皇位转到耶律倍一支。

二、察割政变

察割，也称察克，字率頔，辽太祖之弟，明王耶律安端之子。世宗即位后，安端本打算在世宗、李胡二人之间看风使舵。察割认为李胡疑心重、待人刻薄，不会给自己什么好处，便劝说他的父亲归附世宗。横渡之约后，察割因有功而被封为泰宁王。

辽天禄三年（949年），萧翰与公主阿不里约安端谋反。察割暗中派人向世宗告发。世宗将安端由统领契丹军的大泽稳贬去统领部族军队。天禄四年（950年）春，世宗召见察割。他泣诉甚哀，得到世宗怜悯，得以留为侍从，出入宫庭，深受恩宠。世宗每次外出打猎，察割总是托词手有病，不能使用弓箭。但他却能挥舞链锤策马狂奔。察割常将家中琐碎之事讲给世宗听，表示对皇上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换取了世宗的信任，背地他却在策划叛乱。他见各族杂处，发动政变不易成功，便逐渐将自己的庐帐移到行宫附近。察割的种种诡秘行为引起耶律屋质的警觉，便向世宗告发了。世宗不仅不以为然，反而将耶律屋质所上表章送给察割。察割痛哭流涕，矢口否认，反诬耶律屋质嫉恨自己，蒙骗了世宗。当耶

律屋质再次提醒世宗时，世宗却说：“察割舍父事我，可保无他”。耶律屋质反问说，察割不孝其父，岂能忠君。世宗仍不以为然。

天禄五年（951年）秋，世宗军至归化州（今河北归化）祥古山，与他的生母萧太后祭辽国皇帝耶律倍于行宫，群臣皆饮酒至醉。察割看时机已到，勾结耶律盆都等闯入行宫，杀世宗及太后，自称皇帝。

察割政变时，耶律屋质刚接任右皮室详稳之职，他统领的皇族精锐皮室军，是政变者的主要障碍。察割下令“衣紫者不可失”。耶律屋质听到后，换上外衣而出到外面，急忙召集诸王，下令皮室等军竭尽全力讨平叛军。耶律屋质劝寿安王耶律璟说：“你是太宗长子，叛贼不会放过你的。那样，群臣辅佐谁？社稷将依靠谁？”黎明时候，寿安王耶律璟与耶律屋质率军出其不意地包围了行宫。察割见形势对己不利，急忙派人将皇后杀倒在世宗柩前，仓皇出阵应战，但部下纷纷离去。察割知大势已去，只得处以死群臣家属相威胁。寿安王用林牙耶律敌猎的计策，引诱察割出官帐，由世宗弟耶律娄国亲自将其刺死。然后将耶律盆都凌迟处死，赦安端通谋罪，放归田里，并诛杀耶律牒蜡、耶律朗等叛党，平息了政变。诸臣奉耶律璟即位，是为穆宗。

三、辽穆宗暴虐

辽应历元年（951年）九月，辽平息察割之乱后，群臣拥立辽太宗长子耶律璟，是为辽穆宗。穆宗好游戏、厌国事，每

夜酣饮，达旦乃寐，日中方起，国人称之为“睡王”。他对拥立过世宗的大臣耶律安抟等人不予委用。何鲁不虽然在平定察割之乱中立了大功，但因为他们的父亲耶律吼曾提倡立世宗，也得不到重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应历二年（952年）正月，太尉忽古质谋逆未成被诛。四月，羽林部署辛霸卿等32人南奔后周。国舅政事令萧眉古得和宣政殿学士李浣密谋投奔后周。六月，事情泄露后，萧眉古得于同年八月被杀，李浣受杖刑而获释。此前一个月，即七月，政事令耶律娄国见穆宗昏庸，产生觊觎之心。在诛除察割时立有大功的林牙耶律敌猎因未被重用而心怀不满。于是，俩人互相结纳，并勾结侍中神都和朗君海里，谋立耶律娄国为帝。事情泄露后，穆宗缢杀娄国，以凌迟法处死耶律敌猎，并惩办了两人的党羽。

应历三年（953年）十月，李胡之子卫王耶律宛与郎君嵇干、敌烈谋反，牵连到太宗次子太平王罽撒葛和林牙华割、郎君新罗等。穆宗将他们一并逮捕，并处死华割、嵇干，释放耶律宛和罽撒葛。耶律安抟则被指控参与太平王罽撒葛谋乱，死于狱中。

应历九年（959年）十二月，太宗第四子耶律敌烈与前宣徽使耶律海思、萧达干等谋反。事情败露后，耶律海思和萧达干都死于狱中，而耶律敌烈却被释放。

应历十年（960年）七月，政事令耶律寿远、太保楚阿不等谋反，皆被处死。不久，李胡之子赵王耶律喜隐谋反，牵连到李胡。李胡被监禁，并死于狱中。耶律喜隐供出了当时任太祖庙详稳的韩匡嗣，穆宗却置之不问。次年二月，耶律

喜隐获释。

穆宗镇压了上述谋叛，但反对他的大有人在。世宗次子耶律贤在藩邸秘密结纳韩匡嗣、耶律贤适和女里等人，伺机推翻穆宗。

穆宗的失政也引起部族的叛离。应历十四年（964年）秋，黄室韦掠走马牛叛逃而去。同年冬，统军库古只击败黄室韦，降伏他的部下。这时乌古部也开始叛乱，大掠居民财畜。详稳僧隐战败，死于战场。次年二月，穆宗派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虎军详稳楚思为行军都监，合诸部兵讨伐乌古。乌古部众杀其长罕离底，投降契丹，但不久又发动了叛乱。与此同时，大黄室韦酋长寅底吉也宣告叛乱。五坊人40户叛逃入乌古部。四月，小黄室韦叛乱，雅里斯、楚思等出兵击之，为室韦所败。穆宗以秃里和女古伐雅里斯和楚思主持军务，同时下诏招抚，遭到拒绝。七月，乌古劫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穆宗派遣林牙萧干讨伐。雅里斯等与乌古作战再次失利。十月，常思率兵进讨，大破乌古部。历时一年多的室韦、乌古叛乱才告平息。

昏庸的穆宗十分残暴。早在即位之初，听信女巫肖古用男子胆配制延年药方的妄语，为取胆而杀人无数。直到应历七年（957年）才发觉上当，处死了女巫。应历十年（960年），以镇茵石狻猊击杀近侍古哥。应历十三年（963年）春，曾一连九天昼夜酣饮。同年，以小过甚至无故杀死侍从官员多人。此后，经常不理朝政、昼寝夜饮、滥杀无辜，愈演愈烈。应历十五年（965年）三月，因近侍东儿进羹匙和筷子不及时，穆宗亲自持刀刺死东儿。又因虞人沙刺迭侦鹅失期，施

以炮烙、铁梳之刑致死。十二月以近侍喜哥私自归家，而杀死了他的妻子。应历十六年（966年）正月，杀死近侍白海及家仆衫福、押刺葛、枢密使门吏老古、挾马失鲁。九月，因重九节宴饮，夜以继日数天，杀狼人裘里。

穆宗嗜酒好杀，近侍往往因微不足道的缘故，遭受炮烙、铁梳等酷刑。穆宗或亲手刺杀，或命人斩击射燎，断手足、折腰胫、划口破齿，弃尸于荒野。应历十五年（965年）以后，年年都有近侍无辜遇害，死者达百余人之多。应历十九年（969年）二月，穆宗在怀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打猎，醉于行宫，为近侍小哥、與人花哥、庖人辛古等所杀。

穆宗死后，侍中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等奉辽世宗次子耶律贤命，率甲士千骑火速赶到行宫，拥立耶律贤，是为辽景宗。小哥等人五年之后才被捕遇害。

四、韩德让辅政

辽景宗即位后，人心思治。但景宗自幼患病，多不视朝，刑赏政事、用兵征讨，皆由皇后萧绰决定。这时，辽政权中汉官势力逐渐增长，韩德让地位的升迁便反映了这一趋势。

辽保宁元年（公元969年），辽上京留守燕王韩匡嗣令其子韩德让入侍。景宗以韩德让办事谨慎周密，加授东头供奉官，补枢密院通事。保宁三年（971年）年，升上京皇城使，遥援彰德节度使，自此日见重用。同年秋，代其父为上京留守，暂时管理上京事务，甚有声望。保宁十年（978年），韩

匡嗣由南京留守入权枢密使，韩德让代为南京（今北京市）留守。次年，宋军包围南京，韩德让日夜登城，守御甚力，以战功拜辽兴军节度使。乾亨三年（981年）冬，升为南院枢密使。

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病故，韩德让与耶律斜轸等受顾命，立景宗长子、年仅12岁的梁王耶律隆绪为帝，是为辽圣宗。尊皇后萧氏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是为承天太后。韩德让总领宿卫事，深得太后宠信。当时主少国疑，宗室拥兵自重，内外不安。韩德让劝承天太后更换大臣，令诸王各归其第，禁其私相聚会宴饮，相机夺其兵权。实行上述措施后，人心渐定、政局始稳。

辽统和元年（933年）春，韩德让再次提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后又兼政事令。不久，宋派曹彬、田重进、潘美等率10万大军分三道攻辽。韩德让随从承天太后出师，打败宋师，加官为守司空，并封为楚国公，班师还京后，与北府宰相室昉共执国政。他曾奏言山西4州数遭兵乱，加之灾荒，宜减轻赋税，以招徕流民，得到朝廷批准实行。统和六年（988年）秋，韩德让又随从圣宗、承天太后进攻北宋，在攻打沙堆驿时，守军乘夜偷袭，韩德让严阵以待，击退对方。不久，又败宋兵于长城口（今河北徐水北），杀获殆尽。次年春，因功封楚王。统和九年（991年），韩德让认为燕人挟奸，逃避赋役，贵族容隐奸邪，包庇纵容奸邪不法之徒。在他建议下，派遣北院宣徽使赵智戒谕贵族和民众。统和十二年（994年）秋，韩德让为北府宰相，仍领枢密使、监修国史，赐兴化功臣。当时三京司法官吏中，不少贪赃枉法，韩德让建议下诏

严禁这一陋习，得到批准。他还上表请求任贤去邪，得到承天太后的嘉许，加守太保、兼政事令。统和十七年（999年）秋，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軫死，诏韩德让兼任。不久，拜大丞相，晋封齐王，总南北二枢密府事，总揽辽朝军政大权。他见南京、平州（今河北卢龙）欠收，奏免百姓农器钱。同时实行平抑诸州物价的政策。统和十九年（1001年）春，圣宗赐大丞相韩德让名德昌。他推荐过去顶撞过自己的乌不吕担任统军使。承天太后问他为什么要推荐这个对他不礼貌的人，韩德让回答说：“于臣犹不屈，何况其余！”认为若能任用他，必能镇抚诸藩，得到承天太后批准。

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秋，韩德让随从承天太后和圣宗进攻宋朝，直至黄河北岸，与宋军相峙，促成澶渊之盟。班师后，改封晋王，赐姓耶律。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位在诸亲王之上。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复赐名隆运，赐田宅及陪葬地。次年春，韩德让从圣宗征讨高丽。班师后，患病去世。韩德让病中，圣宗及其皇后亲自请医送药。去世后，在乾陵之侧立庙，帝后以下皆为他服丧。丧葬礼仪完全按照承天太后的规格。

由于韩德让等人的诚心辅佐、革除弊政，圣宗时辽朝由中衰达到鼎盛。

五、辽圣宗改革

辽圣宗在位49年（982—1031年），前27年由太后萧绰称制，后22年由他独立执政。太后萧绰和圣宗耶律隆绪在韩

德让等蕃汉臣僚的辅佐下，对契丹社会实行了全面改革。

吏治的好坏是反映一个国家政治是否清明的重要标志。景宗时，高官勋戚“纳赂清谒，门若贾区”。萧绰称制的第二年，即辽统和元年（983年）诏谕三京各级官员应当秉公办事，不得阿谀奉承。诸县的官员如果遇到州官及朝廷使者无理征求，不得屈从，并以此作为考核官吏的标准。

辽朝历来只从贵族特别是契丹贵族中挑选重要官员，叫做“世选制度”。随着辽朝版图的扩大和民族的增多，改革世选制度势在必行。统和二年（984年），划离部请求今后的详稳只从本部选授，圣宗没有答应，并说选择官员重在是否人才，怎么能固定在一个部族呢？

统和六年（988年）圣宗下诏举行科举考试。这是辽朝开国以来第一次正式开科取士。次年，宋进士17人携家眷投奔辽朝，圣宗让有关部门考核这些人，能通过考核者任命为中央官学国子学的教官，其他人授县主簿和县尉之职。

统和十二年（994年）圣宗下诏契丹诸部将历年俘虏的宋人中的官吏、有才学的儒士、骁勇的军人登记上报，后来真的任命了宋俘卫德开等6人为官。同年，下令地方长官向朝廷推荐通晓经典、文才出众的人。辽朝实行开科取士的主要对象是燕云等州汉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他们升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起初，每科录取进士一般只有两三人，甚至只要一人。到圣宗开泰、太平年间（1012—1031年）一般隔一年一开科，每次录取三五十人。到了道宗时期，每次录取进士一般都在百人以上。

略迟于设立科举，辽圣宗承天太后进行法制改革。统和

十二年（994年），北院宣徽使耶律阿没里进陈说：“兄弟虽是同胞，但秉性不同，一旦有一人犯法，就不分清红皂白地株连，这是残害无辜的弊政。建议今后同胞兄弟不知情者不应株连。”承天太后非常欣赏这一意见，据此制定了新的法令，从此废除了叛逆罪兄弟不知情者也要连坐的苛法。辽朝前期，同罪不同罚的现象很普遍。例如契丹人与汉人互相殴斗致死，处罚却轻重不同。同年，圣宗下诏规定：凡契丹人犯十恶不赦之罪者，与汉人一体治罪。不久又下诏，凡犯了罪应当在脸上刺字受黥面之刑的人，无论贵贱均依法论处，即使是宰相、节度使世选之家的成员也不能赦免。开泰八年（1019年）又下令，有冤屈者，可以到御史台陈诉，委派官员重新审理。

圣宗时还从法律上改善了奴隶的处境。早在统和五年（987年），圣宗曾下诏规定，历年从中原俘虏的诸帐奴隶，只要有亲属是自由人的，可以由官府出钱赎身，使之团聚。到统和十三年（995年），又下诏各地自应历以来沦为贵族部曲者，仍然划规州县管辖，使以上两部分人由奴隶转为自由人。后来在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又下诏规定若奴婢犯死罪，必须交送官府处理，其主人不得擅自杀害。与此同时，圣宗还将宫帐奴隶转为部族民，也不再把新归附者统为宫帐奴隶。

赋税改革是圣宗在朝的一件大事。统和十八年（1000年）圣宗认为北方气候寒冷，应该实行后唐的赋税制度，从而全面推行两税法。所谓分赋二等就是：城镇的市井之赋，各归投下主，只将酒税上交朝廷。从此投下户演变为向官府交纳田租，向主人交纳税课的“二税户”。这些投下户虽然身受

双重剥削和压迫，但他们与投下的人身依附关系却松弛了。

在改革期间，圣宗等人始终没有放松吏治，太平六年（1026年）十二月，他要求北南诸部考察州县等官，不称职者立即罢免。大小官员有贪赃暴虐、残害民众者，不仅立即罢官，而且终身不得录用。不能廉洁奉公的高官重臣也要立刻撤换；能清廉勤政、严于律己的，虽官小位卑，也要予以提拔；皇族中的受贿者，也要按一般人犯罪同等处罚。皇族、贵戚犯罪，不论事之大小，都由所在地方官吏审理，然后再申报北南二院复查，查实之后再上报皇帝。如不审理就直接申报或受人之托为犯罪者开脱的，按所要包庇或开脱的犯人所犯之罪处理。由于重视吏治，圣宗朝地方上出现了不少“有惠政”、任满之后民众要求留任的官吏。

圣宗时期的改革使辽朝达到了它的鼎盛时代。

六、辽钦哀后听政

辽圣宗皇后（齐天后）萧菩萨哥生了两个儿子，都死得很早，未能长大成人。辽开泰五年（1016年），宫人萧耨斤（钦哀后，辽太祖淳钦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孙女）生子耶律宗真，由齐天后收养。齐天后对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萧耨斤因生育皇子被册封为顺圣元妃。元妃嫉妒齐天后，屡次在圣宗面前进谗言，但未能打动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年），圣宗病重，临终遗命齐天后为皇太后，顺圣元妃为皇太妃，但遗命被元妃藏匿。耶律宗真即位，是为兴宗。元妃自立为太后，是为钦哀后。

钦哀后指使护卫冯家奴、耶律喜孙等，诬告北府宰相萧浞卜、国舅萧匹敌谋反，下诏将 2 人处死。此案牵连齐天后姻亲 40 余人，受牵连者皆判死刑，抄没家产，并让这些人诬告、牵连齐天后。兴宗认为齐天后侍奉先帝 40 年，又抚育自己长大，先帝遗诏立为太后，实在不忍心杀她。钦哀后说：“此人若不杀，恐怕会成为后患。”兴宗反驳道：“齐天后无子，年纪也老了，虽留在宫中，但不会有什么后患。”钦哀后执意不从，兴宗只好命人用小车将齐天后从京中送往上京囚禁。从此钦太后听政，兴宗不再亲理庶务。群臣慑于钦哀后的威势，大多不敢仗义执言，只有枢密副使萧朴上书为齐天后辩白冤枉，但也没有任何效果。萧朴气得吐血，后被贬出京师。

辽重熙元年（1032 年）春，钦哀太后在皇宫正殿接受兴宗群臣的朝贺，追封自己的曾祖为兰陵郡王，父为齐国王，诸弟皆封为王。她顾虑兴宗不忘齐天后的养育之恩，会阻挠对齐天后的进一步迫害，便乘兴宗外出打猎之机，派遣使节到上京逼齐天后自杀，同时杀死其左右侍从百余人。同年冬，兴宗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法天应运仁德章圣皇太后。

钦哀太后为人残忍阴毒，居丧未及一年，就把圣宗朝的法度几乎全部改变。她的姨妹封国夫人、弟弟徒古撒娶了燕国公主，哥哥解里娶了平阳公主、陈久娶了南阳公主。这几位兄弟都当了驸马都尉。她命令兴宗娶自己的侄女、哥哥萧孝穆的女儿为皇后，又命令兴宗娶自己的另一个侄女、弟弟高九的女儿为妃。自己的亲戚全部升任显要官职，朝政完全由自己的兄弟掌握。所有军国大事，都是先在兄弟间商议好了，再拿上朝堂。甚至连 40 余名毫无功绩的家奴也升任团练、

防御使、观察使和节度使等重要职位。这些人出入宫掖，谩骂污辱朝臣，卖官鬻爵，无恶不作。钦哀太后的姐姐秦国夫人早年寡居，钦哀后见长沙王谢家奴仪表堂堂，便杀死他的王妃，逼他娶秦国夫人。其妹晋国夫人喜欢户部使耿元吉，她也按照妹妹的要求，杀死元吉之妻，让晋国夫人嫁给元吉。

重熙三年（1034年），钦哀太后见兴宗越来越大，担心难以驾驭，密召诸弟商议废黜兴宗，改立小儿子耶律重元。不料重元反将密谋告诉了兴宗。兴宗先发制人，用内侍赵安红的计谋，率卫兵出宫，召来枢密使萧孝先。当面讲了准备废黜皇太后的理由，萧孝先震惊万状，不敢反对。于是下诏废黜太后，将她迁往庆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右旗以北查干木伦河上游）七括宫为圣宗守陵。处死内侍数十族，耶律重元告密有功，不久被封为皇太弟。

钦哀后篡权是辽贵族内部倾轧斗争的反映，给辽的统治造成混乱，辽朝开始由盛转衰。

七、耶律重元之乱

辽重熙三年（公元1034年），耶律重元因告发钦哀后废帝密谋有功，封为皇太弟。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封其子涅鲁古为安定郡王。重熙十七年（1048年）十一月，兴宗赐以金券，进封涅鲁古为楚王，并任惕隐。在一次饮酒时，向重元许愿传以帝位，重元闻之大喜，从此骄纵不法。秋，兴宗病重，召皇子燕赵王耶律洪基，告诉他治理国家的要点。八月，兴宗去世，耶律洪基即位，是为辽道宗。封重元为皇太

叔，免拜不名。

辽清宁二年（1056年）十一月，封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四顶帽、二色袍，尊宠前所未有的。次年春，封涅鲁古为武定军节度使。清宁四年（1058年）闰十二月复赐重元金券。时皇太子濬生，重元妻进宫祝贺，以美丽自夸。一向庄重的宣懿皇后以为此言不善，告诫她道，身为贵家妇，何必如此！其妻回家后，责骂重元说：你是圣宗的儿子，让人家以皇后之势欺凌我！你若有志，当鞭笞此奴婢。清宁七年（1061年）六月，涅鲁古知南院枢密使事，劝其父重元诈病，乘道宗慰问之机，刺杀他。

清宁九年（1063年）七月，道宗猎于滦河之太子山。久萌逆志的重元父子，趁着道宗的扈从诸官多是自己逆党，企图谋乱。敦睦宫使耶律良听说之后，见道宗特别宠爱重元父子，不敢马上进奏，只敢密奏仁懿太后。太后托言有病，召道宗告之此事。道宗开始不肯相信，太后说：“此社稷大事，宜早为计。”道宗责问耶律良说：“汝欲间我骨肉耶？”耶律良答道：“臣若妄言，甘伏斧钺！不早备，恐堕贼计。如召不至，可卜其事。”道宗这才听从了他的话。道宗急召南院枢密使许王耶律仁先，命他迅速扑灭叛乱。使者到涅鲁古处，即被扣押，后逃回报告道宗。道宗才相信重元父子确实要谋反。

重元父子见阴谋已经泄露，与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萧胡睹，卫王贴不，林牙涅刺溥古，统军使萧迭里得，驸马都尉参及其弟术者、图骨，旗鼓拽刺详稳耶律郭九，文班太保奚叔，内藏提点乌骨，护卫左太保敌不古、按答，副官使韩家奴、宝神奴等400人，诱迫弓弩手，进逼行宫。

道宗听说后，便想逃往北南院。耶律仁先与萧韩家奴说：“陛下若舍扈从独往，贼必穷追，况且南北大王之心尚难预料。”仁先的儿子挹不也说：“圣意岂能违？”仁先大怒，朝他脸上打去。道宗这才开始醒悟，委托仁先平叛。仁先环车为营、拆行马、作兵杖、率领官属近侍 30 余骑，列阵与贼对垒。太后亲督卫士御敌。南府宰相萧唐古身先士卒，与贼拼搏，所向披靡，挫其锐气。贼兵悔过，倒戈投降。渤海近侍详稳耶律阿思和护卫苏在阵前射死涅鲁古。叛军退却后，仁先从五院部萧塔刺所居最近，急派人召之，同时派人四出调集人马。

参与重元谋乱的殿前都点检耶律撒刺竹恰好在围场，听到叛乱的消息之后，劫持奚人猎夫援助叛军。等他到达之时听说涅鲁古已死，大为悲痛。对重元说：“我辈惟有死战，胡为若儿戏，自取灭亡！今行宫无备，乘夜劫之，大事可济。若俟明旦，彼将有备，安知我众不携贰邪！一失机会，悔将奚及！”萧胡睹却说：“仓卒之中，黑白难辨，若内外军相应，则大事去矣。黎明而发，何迟之有。”重元从萧胡睹计，将行宫四面包围，妄图隔绝内外。当夜，重元自立为帝，任命萧胡睹为枢密使。

次日晨，重元与萧胡睹、撒刺竹等率领奚人 2000 直逼行宫。恰巧萧塔刺援兵赶到，北面林牙耶律敌烈亦带兵来援。仁先认为，贼势不能持久，可待到他们气势下去了攻打。令知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南府宰相萧唐古、北院宣徽使韩家奴、北院枢密副使萧惟信、耶律良等也分别率领宿卫及援军，在宫后设阵，乘间奋击，贼兵稍退。这时萧韩家奴起来劝说猎夫们，希望他们改悔，转祸为福。于是猎夫都投杖降服。贼

党大溃，重元负伤，率数骑逃走，仁先追杀 20 余里，耶律撒刺竹战死。萧迭里得、古迭被擒；萧胡睹单骑遁逃至十七冻投水而死。

七月十八日，道宗下令处死逆党。次日，耶律重元逃到大漠地带，自料不能免死，哀叹道：“涅鲁古使我至此”，说完便自杀了。

八、耶律乙辛专权

辽清宁九年（1063 年）七月，平定耶律重元之乱后，辽道宗封赏有功诸臣，耶律仁先任北院枢密使，封宋王。赵王、知北枢密院事耶律乙辛升任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自恃平乱有功，权势显赫，逐渐排挤他人。咸雍元年（1065 年），耶律仁先等忠直大臣被排挤出朝。耶律乙辛独掌北枢密院事。咸雍五年（1069 年），道宗下诏说：“四方有军旅，许以便宜从事”，将兵权交给了耶律乙辛。耶律乙辛权倾内外，投到他门下的人络绎不绝。于是，所有对他阿谀顺从一味迎奉的，都得到提拔，忠诚正直的官员则遭到排挤。

大康元年（1075 年）六月，18 岁的皇太子耶律濬总领朝政，兼知北南枢密院事，削弱了耶律乙辛的权力，耶律乙辛便设计谋害太子生母宣懿皇后。他让宫婢单登和妹夫朱顶鹤伪造《十香词》，诬蔑宣懿皇后与伶官赵惟一私通。然后，密告道宗。道宗命耶律乙辛和北府宰相张孝杰处理此案。耶律乙辛严刑逼供，赵惟一和伶人高长命被迫承认了罪名。结果，赵惟一、高长命被抄家、灭族。宣懿皇后被赐死。事件发生

之后，皇太子耶律濬发誓要为生母报仇，与耶律乙辛的矛盾更深，彼此心怀戒备。于是，耶律乙辛一面将同党萧霞抹之妹坦思献入宫中，立为皇后。又将坦思之妹，自己的已离婚的儿媳斡特懒献入宫中，企图通过后宫操纵道宗。一面与同知枢密事的萧得里特策划陷害太子耶律濬。

大康二年（1076年）夏，大臣萧岩寿向道宗密奏，说耶律乙辛自从皇太子过问国政，心怀疑惧，与宰相张孝杰互相勾结，恐有危害太子的阴谋，不可让其居于重要职位。于是，道宗调耶律乙辛为中京留守。耶律乙辛上疏自言无过，是遭谗言才被贬斥的。其党萧霞抹也向道宗说情。道宗悔恨不已。不久，调萧岩寿为顺义军节度使，召集近臣商议调回耶律乙辛。群臣不敢直言，唯有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撒剌再三谏阻，道宗不听。是年冬，耶律乙辛复为北院枢密使。乙辛复职后，将萧岩寿流放于乌隗部，终身拘禁。

大康三年（1077年）五月，耶律乙辛指使护卫太保耶律查剌诬告都部署耶律撒剌与知北院枢密使萧速刺等八人密谋废道宗，立太子濬。道宗命人查问，尽管没有实据，仍将耶律撒剌调出任始平军节度使，萧速刺为上京留守，鞭笞护卫六人，发配边庭。

六月初一，耶律乙辛又指使其党羽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和祗侯郎君耶律塔不也向道宗自首，咬定密谋废立确有其事，他们自己就是参与者，因怕牵连，才来自首。道宗信以为真，大怒，杖责太子濬，将其幽禁于别室，命耶律乙辛、张孝杰、萧十三等审理。太子濬大呼冤枉，萧十三与耶律燕哥却伪造供词，谎说太子濬已经认罪。耶律乙辛等动用各种酷刑，折磨

受诬陷的人，致使他们不能说话，却诡称已经认罪。先后杀死侍从敌里刺等三人，始平军节度使耶律撒刺等十人。又遣使杀害上京留守萧速刺及已流放的护卫撒拨等六人。六月八日，废太子濬为庶人，将其囚禁于上京监狱。不久，杀死萧速刺等人的儿子，并抄没其家产。同年冬，耶律乙辛密派萧达鲁古、撒八去上京谋害了太子濬，谎称病死。道宗闻讯后心里难过，想召见太子妃。耶律乙辛又秘密派人杀死太子妃灭口。

太子濬被诬陷致死后，耶律乙辛向道宗建议立兴宗次子耶律和鲁斡之子耶律淳为储君。君臣不敢有异议，只有北院宣徽使萧兀纳与夷离毕萧陶隗反对。道宗犹豫不决。

大康五年（1079年）正月，道宗准备外出打猎，耶律乙辛奏请让皇孙耶律延禧留守。同知点检萧兀纳以防不测为由，劝勿留皇孙。道宗有所醒悟，命皇孙随行，并开始怀疑耶律乙辛。三月，道宗令耶律乙辛离京，出任知南院大王事。调萧十三出任保州（今朝鲜平壤西北）统军使。调耶律淳为彰圣军节度使。北府宰相萧余里也出为西北路招讨使。冬，下诏取消一字王的爵位，耶律乙辛由魏王降为混同江王。次年春，改知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事。道宗发现张孝杰也是奸佞之人，便将他调出担任武定军节度使。封皇孙耶律延禧为梁王。秋，特设旗鼓拽刺（勇士）六人为护卫。任命萧兀纳辅佐皇孙。大康七年（1081年），又封萧兀纳为北府宰相兼殿前都点检掌握禁卫军。是年冬，耶律乙辛因出卖违禁物品罪，被囚于来州（今辽宁绥中前卫）。张孝杰在相位时曾说：“无百万两黄金，不足为宰相家。”此时因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

旨罪削去官爵，贬到安肃州（今河北徐水）。数年后，死于家乡。

大康九年（1083年）夏，道宗为太子耶律濬昭雪。追谥昭和太子。冬，耶律乙辛私藏兵器图谋投奔宋朝，事发被杀。辽乾统元年（1101年），辽道宗去世，耶律延禧即位，是为天祚帝。天祚帝彻底为其祖母宣懿太后及父耶律濬昭雪，为受耶律乙辛诬陷的官员平反。次年，下诏诛杀耶律乙辛党羽，将其子孙流放到边庭。对已死去的耶律乙辛、张孝杰及萧得里特皆剖棺戮尸，其家属都分赐给被害者之家和群臣为奴隶。

耶律乙辛的专权是辽朝后期政治腐败的反映。它的出现更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辽朝后期的政治更加黑暗。

九、辽天祚朝内乱及辽的灭亡

天祚帝统治时期，辽朝政治黑暗达到了极点，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愈演愈烈。乾统元年（1101年），天祚帝即位后，以北府宰相萧兀纳为辽兴军节度使、宋魏国王和鲁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北平郡王耶律淳进封郑王。乾统三年（1103年）任命耶律淳为东京留守，进封越国王。耶律淳的势力日益增长。

天庆五年（1115年）秋，天祚帝亲征女真。前锋都监耶律章奴乘大军渡鸭子河（今黑龙江肇县西嫩江一段）之机，带领将卒300余人返回上京，派遣耶律淳妻兄萧敌里及其外甥萧延留去南京告诉耶律淳，欲废黜天祚帝，改立他为帝。正当耶律淳犹豫未决之时，行宫使者乙信持天祚帝御札到达南

京，详细叙述了章奴的叛乱罪行，耶律淳决心拒绝章奴等人的拥立，立即将萧敌里、萧延留二人斩首。单骑走到广平淀（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汇流处东南）晋见天祚帝。天祚帝加封耶律淳为秦晋国王。耶律章奴见耶律淳不从，便攻打上京，夺取府库财物。带领部下至祖州（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祭祀太祖庙，宣称起兵是为了社稷，只有废天祚帝立耶律淳方能挽救辽朝。然后，西去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西拉木伦河河源白塔子）传檄州县，得到响应，众至数万。耶律章奴率众至广平淀，攻打天祚帝行宫。兵败后转攻上京，不克，只好向北逃走，被迫兵击败。耶律章奴伪装使者欲投女真，途中为巡逻兵捕获，腰斩于市。至此，这场政变才得以平息。

天祚帝共有六子，其中晋王耶律敖鲁斡是文妃所生；秦王耶律定、许王耶律宁皆元妃所生。诸子中晋王最贤，素有人望。保大元年（1121年）春，元妃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不得立，便派人诬告南军都统耶律余睹（文妃妹夫）结纳驸马萧昱、耶律撻曷里（文妃姐夫）等谋立晋王，尊天祚帝为太上皇。天祚帝杀萧昱和耶律撻曷里等人，赐死文妃。耶律余睹闻讯，遂引兵千余投降金朝。天祚帝遣知奚王府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袞耶律谛里姑、归德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回离保各率所部急追。至闾山县（大约在今河北卢龙东）追上余睹。诸将议论说天祚帝听信萧奉先谗言，萧奉先平素轻视我们。耶律余睹是宗室豪杰，若将他擒获，他日我们都会和他一样下场，于是按兵不动，放走耶律余睹，以追袭不及搪塞过去。耶律余睹降金后，将辽朝虚实，全部告

诉金朝。金朝决心大举攻辽。同年春，天祚帝在金兵逼迫下西逃。耶律余睹引金兵紧追。天祚帝十分忧虑，萧奉先竟献计说只要杀了晋王，耶律余睹就会不战自回。天祚帝命晋王自尽，于是人心更加涣散。耶律余睹逼近行宫。天祚帝逃亡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后入夹山（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

天祚帝逃入夹山，数日不通消息。在南京留守的大臣李处温与耶律大石、左企弓等人拥立耶律淳为帝。耶律淳自称天赐皇帝，以李处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将兵权全部交给耶律大石。降封天祚帝为湘阴王。耶律淳据有燕、云、平等州及辽西、中京、上京路部分地区，史称“北辽”。而天祚帝仅能控制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两招讨府及诸蕃部族而已。

耶律淳称帝仅三个月，就身患重病，自知难以痊愈，密授李处温蕃汉马步军都元帅，准备托付后事。这时传来天祚帝集中精兵5万骑入燕的消息，耶律淳急忙召集大臣商议。李处温、回离保等主张迎立天祚帝之子秦王耶律定，拒绝天祚帝入燕。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反对，认为天祚帝和秦王是父子，拒则皆拒，自古以来哪有迎子而拒父的道理？李处温想以煽乱军心罪杀耶律宁，耶律淳不听。不久，耶律淳病危，回离保等假传圣旨命南面宰相入宫商议大事。李处温称病不去，暗中聚集勇士应变。六月，耶律淳去世，回离保率契丹兵，宣称立耶律淳妻萧德妃为太后，临朝称制，然后迎立秦王为帝。李处温父子勾结宋大臣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降宋。事情泄露后，李氏父子均被处死。

是年冬，金军至居庸关。耶律大石、回离保等拥兵引萧

德妃出古北口，至松亭关（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发生意见分歧，终于分道扬镳。回离保于保大三年（1123年）春，在箭笥山（今茶盆山，在河北抚宁县东北百里）自立，号大奚国皇帝，改元天复。不到半年败于宋将郭药师，被其部下所杀。同年夏，耶律大石与萧德妃欲西投天祚帝，在袭击奉圣州（今河北涿鹿）时大石为金军所俘，萧德妃往见天祚帝。天祚帝将她处死。

这时，金军攻克青冢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昭君墓侧），天祚帝诸子秦王定、许王宁、诸妃、公主、侍从诸臣皆为金军所俘。只有梁王雅里由硬寨太保特母哥护卫逃出，往见天祚帝。不料梁王等人反遭猜忌。五月，军将耶律敌烈与特母哥等夜劫梁王雅里北走，至沙岭，共立雅里为帝，改元神历。同年十月，雅里病死。兴宗孙术烈继立，不久为部下所杀。

保大三年（1123年）九月，耶律大石从金军中逃出，往见天祚帝，天祚帝责备耶律大石拥立耶律淳。耶律大石反驳说：“陛下弃国而逃，致使黎民涂炭。立十个太祖子孙为帝也不为过。”天祚帝无话可说。耶律大石劝天祚帝养兵待机而动，天祚帝不听。于是耶律大石在次年秋，杀北枢密使萧乙薛等，率铁骑200西去，自立为王。

保大五年（1125年）二月，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灭亡。

十、西辽的建立

西辽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耶律大石建立的王朝。

辽末，在金兵尚未到达的北部和西部游牧地区，大量的马群完好无损，仍属辽朝。这是耶律大石西迁立国的物质基础。

辽保大四年（1124年）七月，耶律大石见天祚帝拒谏昏庸，辽朝灭亡已成定局，毅然率 200 铁骑北行，渡过黑水（今内蒙古百灵庙北艾不改河），白达达部详稳床古儿献马 400 匹，驼 20 头及羊若干头。大石一行到达辽朝的西北军事重镇可敦城（即镇州，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布尔根省哈达桑之东，地名青托罗盖）。在这里，大石召集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柴河、驼等 7 州及大黄室韦、敌刺、王纪刺、茶赤刺、也喜、鼻骨德、尼刺、达刺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紮而毕 18 部部众，宣布了自己重建辽朝的志向，得到诸部拥护。大会之后，耶律大石得精兵万余人，同时设置官吏，重建国家机构。

耶律大石考虑到金兵强大，不可东向与其争锋，便于延庆七年（1130年）二月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祖宗，整军西行。他致书回鹘王毕勒哥，追述自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来辽与回鹘的友好关系，进而说明自己西去大食，借道回鹘之意。毕勒哥得书，将大石迎到回鹘王庭，大宴三日。临行，又献马 600 匹，驼 100 头，羊 3000 只，并愿将子孙送给西辽作为人质。

耶律大石自和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哈拉和卓堡西南）西行，至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东），征服了当地的突厥部落，归附者约 4 万户。于是，在叶密立建立了一座新城。

延庆八年（1131年）春，耶律大石继续西行至起儿漫（今乌兹别克克尔米涅），文武百官拥立耶律大石为帝，采用

突厥称号“葛儿罕”（或译古儿汗，阔儿罕）。不久，又上尊号曰“天祐皇帝”，建元延庆。追谥祖父为嗣元皇帝，祖母为宣义皇后，册元妃萧氏为昭德皇后。大石对百官说，朕与卿等行程 3 万里，跋涉沙漠，历经千辛万苦，我能登上皇位，除托祖宗之福外，都是靠了你们的力量。于是，萧斡里刺等 49 人分别加官进爵。

延庆十年（1133 年）春，耶律大石应哈拉汗朝东支后裔的请求，进驻其都城八喇沙衮（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并将西辽首都定于该地，将八喇沙衮城改称虎思斡尔朵。

耶律大石西迁重建的辽朝，史称“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喇契丹国”。其疆域，北至巴尔喀什湖一带，东至喀什噶尔、和阗，西南达阿母河。

耶律大石西迁后所建立的西辽政权，使辽朝在我国西北地区又延续了 90 余年。西辽末帝天禧三十四年（1211 年），为乃蛮部屈出律所篡，但仍称西辽，八年后为蒙古汗国所灭。

第二节 辽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畜牧业

畜牧业在辽的经济中居于首位，“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

年，群牧之盛如一日”。饲养的牲畜有驼、马、牛、羊等，以马、羊最多。契丹人牧马有丰富的经验，采用集群放牧的同时，使用“一分喂，十分骑”的方法，马“滋生益繁”。辽政府十分重视牧业，设有“群牧使司”、“马群司”、“牛群司”等各级官吏管理牧业，道宗时“牧马蕃息，多至百万”。

二、农 业

辽朝对发展农业十分重视。辽太宗将汉人和渤海人安置在临潢府和辽阳府周围地区，从事耕植，并令在契丹族内“劝农桑”。圣宗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农业，曾下诏允许人民开垦燕乐、密云两县以及滦州荒地，免赋十年，又诏“定均税法”，赐贫民耕牛，“禁刍牧伤禾稼”，令“诸路军官毋非时畋猎妨农”，还“治疏旧渠”，推行屯田。中京地区农牧交错，“田畴高下如棋布，牛马纵横以谷量”，辽海地区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的沃野。1006年（统和二十四年）圣宗“命唐古劝督耕稼，以给西军，田于胪河侧，是岁大熟。明年，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斗米数钱”。道宗时，马人望任中京度支判官，“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辽之农谷至是为盛”。辽境内呈现一派“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兴旺景象。

三、手工业

辽代手工业以盐、银、造船、纺织、营造业等较为发达。

辽太祖父亲时就置铁冶，教民鼓铸，铁利府（沈阳西南）和东平县（辽宁开原西南）是其著名产铁区。在昌图、阜新、大同等地出土的辽代铁制农具，制作技术水平较高，镔铁刀尤为精良。在辽宁建平县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双龙纹鎏金银冠和鎏金铜鞍轡饰，制作精美，技术高超。纺织业生产在幽云十六州和渤海地区原来就较发达。辽时纺织业集中在几个城市里，丝织业以南京（北京）为最兴盛，技术水平高，“锦绣组绮，精绝天下”。上京和中京也有相当规模，上京的绫锦院的都工作坊，为宫廷、贵族和官僚的需要而生产。中京白川州（辽宁朝阳）“地宜桑拓，民知织妊之利”，东京的灵河（大凌河）沿岸的灵、锦、显、霸四州种植桑麻，居民无田租，只供蚕织，名曰太后丝蚕户。此外，辽已普遍生产麻布，而且还用布作交易。制瓷业相当发达。辽瓷的烧制已有较高水平。目前出土的瓷器品种有白瓷、青瓷、三彩、细胎白黑瓷器、缸胎大型器和翠绿釉瓷等，烧制的鸡冠壶、鸡腿罐、凤首瓶、长颈瓶以及海棠长盘等，具有鲜明的契丹民族特色。辽瓷中有一部分是仿北宋定窑烧制的，称仿定。

四、城市和商业

“五京”是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最繁华的是南京，“方三十里”，“大内壮丽，城北有市，陆海百货聚于其中”，有户口 30 万。上京的南城称汉城“各有楼对峙，下列市肆”，经营商业。南城之东是回鹘商贩聚集之地。但上京交易无钱而用布”。中京、东京均有商业市场，东京的“外城谓之汉载，

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西京较小，是军事重镇，商业不发达。契丹和南方诸国交往较多，西夏、高昌、于阗、回鹘与之均有贸易。北宋统一后，宋辽贸易也很发达，辽还同日本、高丽、新罗、大食等国有通商往来。

第三节 北宋与辽的关系

北宋初年，辽统治者对中原地区仍然采取侵扰的政策。宋太祖在统一中原地区的过程中，一直受到辽国军事势力的阻挠。

北汉建国在山西，与辽毗邻。宋太祖征伐北汉，辽出兵援助北汉攻宋。在宋建立后的头10年中，和辽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公元969年，宋太祖亲自领兵征讨北汉，围攻太原。这时，辽也分兵两路，一路从石岭关（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南下，一路从定州（今河北省定县）西侵。但是这两路兵都被宋军击败，辽兵被杀伤1000多人，这是宋建国后在对辽战争中获得的较大胜利。

宋太平兴国四年（辽乾亨元年，979年）至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宋与辽在幽州（今北京）展开了两次大规模攻防战。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亲率大军攻北汉，击败辽援军，破太原，迫使北汉投降，为进取燕云创造了条件。

宋太平兴国四年（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五月，北宋消灭北汉后，宋辽直接对峙。双方接触线大体东起泥沽口（今天津大沽口），西沿拒马河流域的信安军（治所在今河北霸县东）、霸州、容城（今河北定兴东南），然后折向西北至飞狐（今河北涞源北）及灵丘（今山西灵丘）以南，直达代州雁门（今山西代县北）。此界线以北为辽控制的燕云地区，以南为北宋控制区。当时把位于太行山北支东南的檀、顺、蓟、幽、涿、莫、瀛7州称为“山前”，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妫、武、新、云、朔、寰、应、代9州称为“山后”。辽军进攻，可从山前诸州沿河北平原直冲河、洛；退守，又可从山后出兵应援。地理形势处于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有利地位。

辽在幽州，除有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和大将耶律斜轸率兵防守外，并在宋军进攻北汉时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统军使肖托古和伊实王萨哈加强防务。在此以前辽统治者曾在隋唐蓟城的基础上对幽州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幽州城方圆36里，城墙高3丈，宽1.5丈，共有8门，人口30万，成为辽的陪都和军事政治重镇。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初六，宋军消灭北汉时，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赵光义在当月即企图乘胜继续出击，一举夺取燕云地区。但是，宋军“攻围太原累月，馈饷县尽，军士疲乏”，需要休整。同时“人人有希赏意”，需要论功行赏以利再战。因此，大多数将领不赞成立即向辽进军，但无人敢直言谏阻。而殿前都虞侯崔翰却怂恿赵光义说：收复燕云的事，不需要另作准备再进行，现在乘胜攻取十分容易，机不可失。这就更加坚定了赵光义的决心。于是，赵光义立即

命令枢密使曹彬负责部署军队行动；命令潘美负责幽州行府，组织粮运，管理后勤；命原屯驻雁门的巡检郭进继续监视雁门以北辽军的行动，保障侧后的安全。从赵光义的作战部署和尔后的作战过程中看，其战略方针是：以幽州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占幽州；只要幽州得手，其余诸州就会全局震动，然后乘胜收复全部燕云地区。

赵光义决策既定，宋军便于五月二十日，从太原分路东进，翻越太行山，二十九日抵镇州（今河北正定），进入河北平原。六月初七，赵光义遣使调发京东、河北诸州的武器装备和粮秣运往前线。十三日，赵光义亲自率 10 万大军从镇州出发，同时还有许多宫嫔随军行动。十九日宋军进入辽境，占领金台（今河北易县东南的黄金台），二十日进至歧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巨马河北）。由于宋军每天以百里的速度迅速开进，暴露在宋军侧后的辽东易州（治歧沟关）守军孤立无援，刺史刘禹（一作刘宇）举州投降。这时，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统军使肖托古和伊实王萨哈迎战宋军于沙河（今河北易县东南之易水），企图阻止宋军向幽州推进。宋军前锋东西班指挥使傅潜、孔守正率部先到，立即向辽军进攻。接着，宋军主力赶到，投入战斗，击败辽军，俘获 5000 余人。二十一日，宋军进至涿州，辽涿州判官刘厚德开城投降。二十三日黎明，宋军进抵幽州城南。

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看到宋军兵锋甚锐，不敢正面交锋。他鉴于耶律希达被宋军击败，为宋军所轻视，便换上耶律希

达军的旗帜，驻屯得胜口（今北京昌平北）诱敌。宋军挥兵进击，歼辽军千余。耶律斜轸率兵一部袭击宋军之背，宋军后撤，停止进攻。

由于赵光义未能全力夺取得胜口这一要点，反使幽州与得胜口、清沙河结成犄角之势，并保持幽州与山后的联系，因而提高了幽州辽军坚守的决心。赵光义认为耶律斜轸军仅能凭险据守，便以一部牵制其军，部署主力围攻幽州。六月二十五日对幽州展开围攻：定国节度使宋渥所部攻南面，河阳节度使崔彦进所部攻北面，彰信节度使刘遇所部攻东面，定武节度使孟玄所部攻西面。在宋军的四面围攻下，辽大丞相、南京留守韩德让惊恐万状。宋军对城内辽军进行招降，城内军民人怀二心。辽铁林都指挥使李札勒灿出降后，人心更加动摇。辽御盏郎君耶律学古得知幽州被围的消息后，急率所部从山后增援。由于宋军四面合围幽州，耶律学古协同韩德让一面加强守备，一面安定人心。宋军在转攻中，曾有 300 余人乘夜架梯登上城垣，但被辽军击退。

六月三十日，辽景宗耶律贤得到宋军合围幽州的消息，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一作休格）请求率兵 10 万救援。耶律贤接受了他的建议，命他与南京宰相耶律沙统率“五院”之兵越过燕山增援幽州。

七月初三和初五，辽建雄节度使刘延素和蓟州知州刘守恩相继投降。可是，宋军围攻幽州坚城不下，“将士多怠”。七月初六，正当赵光义督军攻城时，耶律沙的援军到达幽州城外，同宋军激战于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之河）畔。战至黄昏，耶律沙部不支，向后撤退，宋军乘势追击。这时，耶

律休哥的骑兵从捷径赶到，数万人各手持两个火把，宋国不知辽军援兵究竟有多少，不敢再进，于高粱河畔布阵抵御。耶律休哥与原屯清河的耶律斜轸会合后，乘夜由两翼向宋军发起反击，城内守军闻援兵至，亦开城出击，城中呐喊助威。宋军三面受敌，陷入重围，顿时大乱，全军溃退，死者万余人，宋太宗乘驴车南逃。耶律休哥受伤，仍率军追击至涿州，获兵器、粮秣不可胜计。

初七黎明，宋太宗赵光义乘驴车南逃。赵光义到达金台驿，令殿前都虞侯崔翰前往整饬，部队才稳定住。崔翰待赵光义及前卫部队退出辽境之后才开始撤军。初九，宋军退至金台驿。十一日，再退至定州。辽军耶律休哥因三处负伤，不能骑马，乃乘轻车指挥部队追击至涿州，但未能追及。赵光义令崔翰及定武节度使孟玄等留屯定州，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镇州，河阳节度使崔彦进等屯关南（高阳关之南），并赋以便宜行事之权，防备辽军袭击。九月初三，辽景宗耶律贤灭宋刚败，任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南府宰相耶律水秋监军，率兵数万出南京（即幽州，今北京），分兵两路南进。东路由韩匡嗣、惕隐耶律休哥、南院大王耶律斜轸等率领，西路由南京统军使耶律善补率领，企图会攻镇州。三十日，辽军进抵满城西集体结。时刘廷翰已率部列阵于满城北徐河，崔彦进亦率所部自关南北上出黑芦堤（今河北容城西南）北西进，沿长城口（今徐水西北）潜师辽军侧后，对辽军形成夹击之势。未几，崔翰、李汉琼抵徐河，按太宗所授阵图布八阵，兵力分散。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远望，见辽军势众，冒违诏改阵之罪，力主集中兵力对敌。监军李继隆附议，崔翰乃改八

阵为前后二阵。及辽军列阵，宋遣使入辽营诈降。耶律休哥识破宋军企图，劝韩匡嗣严阵以待，不可轻信，韩匡嗣不听，放松戒备，果遭宋军突袭。辽军仓促应战，指挥失措，大败。韩匡嗣引军向西溃逃，又遭崔彦进伏兵袭击。宋军俘辽兵万余人，获战马千余匹。宋太平兴国五年（辽乾亨二年，980年）三月，辽帝耶律贤发动其大同之军南侵并州（今山西太原市），以分宋军之势，继而命大同节度使萧咄李率大军10万进攻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北）。此时，宋军在山西境内的戍兵不过5万人，代州刺史杨业的守军仅数千人。杨业侦知辽军大举南侵，报请驻守并州的潘美发兵来援。潘美认为雁门等地只能迟滞敌人，而不能作为长期拒止敌人之地，故欲坚守并州，不肯发兵入援雁门。杨业无奈，亲率精骑数百，自雁门关北口绕到辽军背后，突然由北向南突击辽军中军，萧咄李正准备攻关，不期杨业突自背后来袭，顿时乱了阵脚，被斩于乱军之中。辽军失去统帅，纷纷溃散，奔还大同。是年冬，辽景宗耶律贤亲率大军进攻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获胜。宋遂以南易水为防线，大修边备。七年四至五月，辽军三路出兵，攻宋满城、雁门、府州（今陕西府谷），被宋军击败。后辽景宗病死，圣宗耶律隆绪继位，用兵高丽、女真，无暇南顾。宋则致力于休士养马、广积军储，以图再举。宋辽边境暂趋平静。第一次幽州之战结束。

雍熙三年（986年），宋太宗认为辽（契丹）帝幼弱，太后萧绰摄政，内部不稳，决心分兵三路，大举攻辽。东路以幽州道行营马步水陆都部署曹彬、幽州西北道行营前军马步军都部署米信军率主力10万人出雄州（今河北雄县）；中路

以定州路都部署田重进等率军出飞狐（今涞源）；西路以云、应路行营马步军都部署潘美、副都部署杨业率军出雁门。企图以东路牵制辽军主力，中、西路乘虚夺取山后诸州，尔后转兵东向，三路会攻幽州。

宋军各路自当年正月二十一日相继出动后，辽迟至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大规模发动进攻的消息。萧绰针对宋军情况，以一部兵力先对西线宋军进行牵制性作战，而以主力对幽州威胁最大的东路宋军主力寻求决战，尔后再向山后转移兵力，击破西路宋军。其部署是：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率部阻止曹彬军北上，东京（今辽宁辽阳）留守耶律抹只率军继进；同时下令征诸道兵赴援幽州。以耶律色珍为山西兵马都统进援山后，阻击田重进、潘美军；以耶律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防备宋水师从海上进击辽东。萧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军进驻驼罗口（今北京南口附近）策应。

宋军发起进攻后，开始各路进展比较顺利。

飞狐方向：中路田重进军自定州沿水（今河北唐河）河谷北上后，于三月初九进至飞狐北。辽冀州防御使大鹏翼，康州刺史马，马军指挥使何万通率军前往增援。田重进先命前锋出战，乘辽军不支，将后续兵力投入战场，生俘辽军骁将大鹏翼等，全歼援军。二十三日辽飞狐守将吕行德投降。二十八日辽灵丘（今山西灵丘）守将穆超也举城降。四月十七日宋军进攻蔚州，辽将李存璋杀其主将，以应宋军。

云应方向：西路潘美军自出雁门关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三日、十九日，朔州、应州的辽军守将先后投

降。四月十三日宋军又攻克云州。

幽州方向：东路是宋军主力。米信率军一部自雄州出发后，渡过拒马河，于四月初四击破辽军于新城。

曹彬所率东路主力约 10 万人，三月初五攻克固安（今河北固安）后，十三日即攻占涿州，全歼守军。十七日，部将李继宣率轻骑东渡涿水（从涿州城北流过），败辽军于涿州城南，歼敌千余人，杀奚部宰相贺斯。当曹彬进占涿州后，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因兵力不足，采取避免决战，疲惫消耗宋军的方针。夜间用轻骑袭击，白天用精兵虚张声势，以迷惑宋军，同时派兵绕至宋军后方，截断其粮道。

曹彬军在涿州 10 多天，因粮尽不得已退回雄州。曹彬军的后退使本已有利的战局发生很大变化。

赵光义得知曹彬军后退就食，甚为惊愕。他认为大敌当前而退军就食，甚为失策。遂急令曹彬率军沿白沟河（即拒马河）向米信军靠近，会攻幽州。这时，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克州县，屡战屡胜，耻于东路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都主张出战。曹彬不能制止，遂听信诸将意见，补充粮食后，又向涿州进攻。耶律休哥以一部兵力对曹军进行阻击，使之且行且战，行动迟缓。这时正值夏天，大军行进途中缺水，曹军士卒困乏不堪。到达涿州后曹彬得知萧绰和耶律隆绪率援军从驼罗口南进，有会同耶律休哥军钳击宋东路之势。于是，命部将卢斌携带城中民众先行向西南撤退，曹彬亲率主力断后。但撤退中宋军非常混乱，耶律休哥遂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大败曹彬军于歧沟关。曹军溃退，夜间

涉渡拒马河时，被辽军追上，溺死者甚多；余部继续向高阳（今河北高阳）溃退，途中又被耶律休哥追上，死伤数万人。曹军遗弃兵器、军资甚多，残部退到高阳。

赵光义得知歧沟关战败的消息，即令宋军中路田重进率军退驻定州，西路潘美部退驻代州（今山西代县），以避免中西两路军再遭失败。同时增兵北境，阻止辽军南进。

辽军在歧沟关取得胜利后，又于七月初以 10 余万兵力向西转移，先后攻占蔚州、飞狐、应州、寰州等地。赵光义令潘美等派兵掩护云、朔、寰、应 4 州居民南迁。但是，宋西路军主将潘美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令杨业出击。杨业根据辽军攻占寰州后兵势正盛的情况，不同意出击。他认为可领兵出大石路（今山西代县崞阳石峡口）配合云、朔 2 州守将率民众伺机撤退。监军刺史王侁谴责杨业“见敌逗挠不战”。杨业不得已率兵出战，并与潘美等约定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派兵接应。杨业孤军北进，遭到辽军伏击而大败。杨业退至陈家谷口时，接应兵已撤退，以致全军被歼。杨业受重伤被俘，不屈而死。宋王朝对辽发动的第二次幽州之战，又遭到惨重的失败，仅中路田重进的部队顺利退回。从此，宋朝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

辽在两次击败宋军对幽州的进攻之后，时常派遣骑兵向南进攻。宋端拱元年（辽圣宗统和六年，988 年）辽军大举南下，曾攻占了宋的涿州、祁州（今河北安国）、新乐（今河北新乐）等地。后来，在真宗景德元年（统和二十二年，1004 年）闰九月，辽圣宗和萧绰集中全力南下，但刚入宋境，就

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辽军攻威虏（今河北徐水西）、顺安（今河北高阳），作战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清宛县）、定州仍不克，又东攻瀛州（今河北河间），死伤 3 万多人。以后，辽军虽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但辽的主帅兰陵郡王萧达兰战死，士气受到挫折，加之辽军的重要城镇保州、定州等，仍在宋军手中，辽军有后顾之忧，因而屯兵澶州城下，不敢南渡黄河。宋真宗赵恒在辽军的进逼下，惊慌失措，准备南逃。宰相寇准等坚决主战，并促使赵恒亲征，督战澶州。由于宋辽双方都没有取胜的把握，两军相持中议和。赵恒只希望辽军尽快撤走，就答应了每年送给辽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不得创筑城堡，改易河道；又约定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圣宗为弟，称承天太后为叔母，双方于澶州（又名澶渊郡）订立了“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缔结后，宋辽之间虽然发生过一些争执和摩擦，如庆历二年（1041），辽乘宋与西夏交战之机，遣使求关南之地，宋乃答应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增纳岁币，每年增至绢 30 万匹，银 20 万两。又如熙宁七年（1054 年），辽又遣使要求重新划分蔚、应、朔三州的边界。经过一年多的交涉，宋最终屈从辽的要求，重新划分了边界。但是，直至宣和四年（1122 年），双方再未发生战争，保持了 110 多年的和平共处局面。双方每年互派使节往来，同时在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贸易。这无疑对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第四节

西夏的建立和政治经济

一、我国西北的一个古老民族

党项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大约在公元7世纪，生活在今四川西北和青海一带的党项人，还处于氏族社会趋向解体的历史阶段。他们“以姓别为部”，大的部落有万余骑，小的也有几千骑。他们互不统属，每隔几年聚会一次，过着游牧狩猎生活。

唐朝初期，汉族封建王朝对党项族采取笼络政策，给党项的部落首领以官职，让他们统治本族人民。

这时，同属羌族的吐蕃人，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强盛起来。他们向东伸展。党项人在吐蕃的压力下，逐渐向东北移动。唐太宗时代，一部分党项人迁到岷江上游和今甘肃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陕西以北一带。聚集在庆州（甘肃庆阳）附近的党项人，称为东山部；集中在夏州（陕西横山）地区的，称为平夏部。拓跋部是平夏部的强大部落。还有一部分党项人，当时仍处于吐蕃贵族的统治之下。

党项人自从同汉族人民接触以来，慢慢地发展农耕，向半农半牧的经济生活过渡。特别是东迁陕、甘一带的党项人，

农耕得到了较好的发展，部落人口有了显著的增长。当时汉族人民以自己生产的粮食和精巧的丝绸，同党项人民交换羊和马匹。

到了唐末，震天动地的黄巢农民大起义爆发了。腐朽的唐朝统治者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竟然欺骗少数民族，利用党项人来镇压农民起义。平夏部的首领拓跋思恭，在唐朝的诱惑下参预镇压黄巢起义。后来农民军失败了，拓跋思恭被唐朝封为夏国公，统治着夏州、绥州（陕西绥德）、银州（陕西米脂西）、宥州（陕西靖边西）和静州（甘肃静宁）5州之地，形成割据势力。唐朝还赐拓跋思恭姓“李”，表示和唐朝皇帝是一家人，以此来收买党项族的首领。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族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河套地区，并向河西走廊扩展，同原来生活在那里的吐蕃人、回鹘人、汉人相接触，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联系。

到了982年（太平兴国七年），党项首领李继捧带领族人归附宋朝。宋太宗赏赐银钱和绢帛，给他以彰德军节度使的官职。988年（端拱元年），宋太宗又赐李继捧姓“赵”，与宋朝皇帝同姓，并更名为“赵保忠”，要他忠于赵宋皇帝。宋朝给他大量的金器、银器和锦彩。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上的联系，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增加，党项族和汉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换十分频繁。汉人多以粮食同党项人的食盐相交换。这种经济生活上的联系，加深了各族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党项人从汉人那里学会了锻铁。

随着党项族生产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扩大，党项首领和

北宋王朝的矛盾也出现了。李继捧虽然归附宋朝，他的族弟继迁在契丹贵族的挑拨下，经常在夏州一带进行掠夺。辽朝在北汉政权瓦解以后，就想勾结党项贵族来夹击宋朝。986年（雍熙三年），辽朝册封继迁为夏国王。988年（端拱元年），宋朝赐李继迁名“赵保吉”，并授以银州观察使。北宋王朝对党项贵族采取威胁、利诱和分化的手段来加以利用。

北宋时期，我国西北地区不但居住着党项人，居民的多数还是汉人，还有吐蕃人，回鹘（回纥于788年改称回鹘，是维吾尔的古称）人。他们多数从事农业耕作。西北地区由于气候严寒，全部农业生产依赖人工灌溉。一旦天旱而缺乏水源，农业经济受到威胁，粮食供应就会发生困难。西北地区的人民，要跟内地人民进行粮食交换。

西北盐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不论色和味，都胜过山西解池的食盐。由于制盐的成本低，陕西一带的汉族老百姓，乐于拿出自己的粮食交换党项的食盐。当地的汉族人民不愿购买宋朝政府专卖的高价盐。曾经有一个时期，一斤解池的官盐，要卖30多个铜钱，而党项地区的青白盐，只要15文就能买到1斤。宋朝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强制陕西人民购买昂贵的解池盐，不让党项的食盐流入陕西境内。这种强制手段，破坏了各族人民之间自然的经济联系，损害了各族人民的利益。公元993年（淳化四年），宋朝的一个转运副使名叫郑文宝，他向政府献策，只许商人贩运安邑和解池的官盐，不许买卖党项的青白盐。宋朝政府固然大获其利，但党项人民的生活就更加困难。北宋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加深了民族之间的仇恨。这种民

族矛盾的根源就是阶级压迫。

因此，就在这一年（993年），党项首领李继迁联合42族，会盟于杨家堡，引兵1.3万多人，进攻环州（甘肃环县）的石昌镇，劫掠居民，焚烧财物，社会很不安宁。996年（至道二年），又围攻灵州（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宋军在战斗中都要按照宋太宗的阵图行事，处处被动挨打。加上沙漠地带交通阻滞，军粮运输极度困难，大批士兵和民伕死于饥渴，损失十分惨重。

党项族人民善于骑射。他们崇拜勇敢的英雄人物。李继迁有智谋、有能力、有才干，常常带领10余骑出猎。有一次，遇到猛虎从山坡下冲过来，李继迁并不慌张。他令众人退入林中，独自爬上树巅，引弓射击老虎的眼睛，把猛虎击毙。他的英勇行为得到了党项人民的信赖。

公元1002年（咸平五年），李继迁以重兵攻占了灵州，改称西平府。

灵州是宋代西北交通的据点，也是黄河上游沿岸沙漠地带最肥沃的地区。宋朝政府当然不愿意放弃这个重要据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李继迁战死，1004年由他的儿子德明继承首领。

这时候，正是宋、辽之间关系最紧张的时刻。宋朝为了全力对付辽朝的威胁，对党项只能采取笼络的手段。1006年（景德三年），宋真宗封德明为平西王，授以定难军节度使的虚衔，又送给他绢1万匹、钱3万贯、白银1万两、茶叶2万斤。第二年（景德四年），宋朝在边境保安军（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开放贸易。汉族人民以缁、帛、罗、绮等优美的丝

织品和粮食等，交换党项人的骆驼、马、牛、羊、毡、毯；又以瓷器、生姜、甘草等交换党项的蜜蜡、麝香、毛褐、羚羊角、柴胡、肉苁蓉、红花、翎毛等。北宋和党项之间，从此保持了近 30 年的和平局面，民间贸易十分发达，出现了“商贩如织”的盛况。党项族的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了。

二、大夏地方政权的建立

党项族从唐末据有西北 5 州之地，到 11 纪世时，人口已有数十万户。由于汉族经济和先进文化的影响，又跟吐蕃人、回鹘人生活在一起，使党项族内部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制度发生变化。在经济生活方面，从狩猎转为畜牧和农业并举，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展，党项人已经学会制造铁器。从社会制度的变化来看，部落联盟的首领变成有势力的贵族，控制汉人、党项人和各族人民从事农垦，缴纳赋税，出现了封建剥削制度。德明时代，党项的势力已经扩大到甘州（甘肃张掖）、凉州（甘肃武威）一带。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都比较好，既有适宜于游牧的水草，又有便于农田灌溉的河流，使党项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

德明死后，他的儿子元昊于 1032 年继位。元昊是一位已经封建化的党项领袖。他通晓汉、藏两族文字和语言，接受了汉族的进步文化，也懂佛学，比较了解汉族的封建政治制度，学过汉人的兵法和法律。元昊继位后不断向河西扩展，先后占领了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肃州（甘肃酒泉），迅速控制了全部河西走廊和今甘肃东南地带。在这广

大区域内，汉人占大多数，还杂居着吐蕃和回鹘人。大体上党项人在河套、宁夏一带；回鹘人在河西走廊偏西；吐蕃人在青海一带；汉人在陕西北部 and 甘肃东南部。除了畜牧业外，农业占有一定比重。农产品有大麦、稻子、青稞等，还有药材。从事农耕的，多数是汉人。他们掌握着进步的生产技术，推动少数民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甘州和凉州一带，盛产良马，又是肥沃的农业区。

元昊吸收汉族失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仿照唐、宋封建制度，以兴州（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为中心，建立起统治机构。官府分为五品，职官分文武班。中央政治机构有中书掌行政机要，枢密管理军政，属于“上品”（即一品）；三司管理财政，御史专掌监察，属于“次品”（即二品）；又有群牧司、农田司等机构，属于“中品”（即三品）；党项贵族和投靠他们的汉族地主分子，分任内外各个机构的官职，形成党项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地方政权。他们还建立了一支 50 万人的骑兵队伍，在军事编制上保留了党项的一些旧传统。境内分设 12 个监军司，各司用“豪右”为统领。元昊还在州城之东设置铁冶务，制造各种武器。从榆林石窟中所遗留下来的锻铁壁画看来，当时冶铁已采用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设备，所造的甲冑，“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

在吸收汉族文化方面，他们根据汉文的结构，制成方块西夏文字。西夏文字袭用汉音的字也是很多的，如西夏文的“正”、“名”、“圣”等字，和汉文读音完全相同。西夏文字也有四声的区别。西夏文字典《文海》成书于西夏中期。

公元1038年，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国号“大夏”。大夏地方政权是一个封建性的地方割据政权，无论是官制、法制、兵制、历法和文化，都效法宋朝。由于元昊接受宋朝的封号，名义上仍旧臣属于宋朝。这个地方政权是在宋朝的西北方，习惯上就称为“西夏”。

西夏地方政权的统治区，东到黄河，西到玉门关，地方万余里，倚靠着贺兰山。西夏政权的建立，对于开发我国西北地区是起了作用的，使当时各少数民族进一步融合，采用进步的封建生产方式，向封建化迈进。各族人民兴办水利、开垦荒地；政府设立群牧司管理牧畜，设立农田司推广农业，使少数民族的农牧业日见兴旺起来。

西夏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本来不很发达。西夏政权设立文思院，利用汉族工匠从事手工业生产，使官办手工业甚至民间手工业都有所进展。西夏地区还开设了许多固定的集市，扩大了各族人民的商业贸易。北宋王朝同中亚的贸易，陆路必须通过西夏地区，因此西夏的商业贸易也很活跃。西夏政权设立了通济监，管理钱币的发行，以适应市场流通的需要。

在吸收汉族文化方面，党项人通过西夏文研读汉人写的古籍。汉文的《诗经》等名著，被翻译成西夏文。党项人用西夏文翻译了大批汉人著作，如《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书，都有译本。还翻译《华严经》、《妙法莲华经》、《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等许多佛经。汉族的文化和佛教思想在西北边区得到了传播。西夏政权还办起太学，推崇孔子的儒家学说。党项贵族“尊行儒

教，崇尚诗书”。还经常要求宋朝政府颁赐图书文籍。这生动地表明，随着经济上的封建化，党项族在思想文化上也必然趋向封建化。

三、西夏毅宗改革

西夏毅宗改革是西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夏景宗李元昊去世，年仅2岁的儿子李谅祚继位。西夏大权操于皇后没藏氏之手，国舅没藏讹庞担任国相。没藏讹庞专权之后，与辽朝关系恶化，从延嗣宁国元年（1049年）六月至次年九月，双方爆发五次大战，夏兵先胜后败。没藏太后不得不于延嗣宁国二年（1050年）十月重新臣服于辽朝。

福圣承道三年（1055年）十月，汉臣李守贵趁没藏太后出猎之机，杀死太后。讹庞将李守贵全家处死。为巩固自己的权位，讹庞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毅宗，立为皇后。麟都三年（1059年）八月，讹庞杀死毅宗身边的汉臣高怀正、毛惟昌，试图削弱毅宗身边的汉人势力。后来，竟发展到图谋杀死毅宗，自立为帝。麟都五年（1061年），讹庞的儿媳、汉人梁氏向毅宗告发密谋。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先发制人，处死没藏讹庞父子及其党羽，夺回大权。接着又处死了没藏皇后，迎娶梁氏为后，任命梁皇后之弟梁乙埋为相。

毅宗自幼由汉族妇女养大，与汉人相处日久，熟悉汉文化。所以在亲政之后，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的核心是改蕃礼用汉礼，即用汉礼、也就是宋朝的礼仪制度取

代元昊建国时设立的制度。

麟都五年（1061年），即亲政的当年十一月，西夏毅宗致书宋朝，表示仰慕中原衣冠，请求明年用中原礼仪迎接宋朝使者，得到宋朝同意。次年，毅宗仿照宋朝制度，将西寿等处监军司改为保泰等诸军。四月，毅宗请求宋朝赐予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准备建立书阁存放这些墨宝。同时，向宋朝进贡骏马50匹，换取《易经》、《尚书》、《诗经》、《左传》、《礼记》、《周礼》、《孝经》、《论语》、《孟子》等九经和《唐史》、《册府元龟》等典籍。宋朝给了九经，退还了西夏马匹。

在推行汉礼的同时，毅宗着手解决与宋朝的划界问题。拱化元年（1063年），随着麟州等处边界的划定，恢复了永宁（今甘肃甘谷西）等处榷场，重开边境贸易。同年，毅宗恢复了唐朝所赐的李姓。此后，又大量招徕汉族士人入西夏，委以各级官职。这些措施分别从政治上和文化心理上加强与内地的联系。

当然，毅宗在改革内政，缓和对宋关系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世仇吐蕃唃廝囉。早在麟都二年（1058年），没藏讹庞曾进攻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市），大败而归。唃廝囉乘胜攻入夏境，大掠而还，毅宗亲政后，于麟都元年（1062年）出兵攻唃廝囉之子董毡，又被董毡打败。拱化元年（1063年），西使城吐蕃首领禹藏花麻以其城及兰州一带降夏。毅宗以宗室之女下嫁花麻，命其镇守该地。由于这一怀柔政策的实施，拱化四年（1066年）年底，河州吐蕃首领瞎毡子木征又以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之地降夏。

然而，这时夏宋关系却日趋恶化。先是在拱化元年（1063

年)，西夏遣使吊唁宋仁宗时，夏使吴宗因礼仪问题与宋朝引伴使高宜发生争执。高宜扬言宋朝将以百万大军攻入贺兰山。宋英宗指责夏毅宗用人不当，要求他惩办吴宗等人。毅宗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拒绝了英宗的诏命。拱化二年（1064年）秋，毅宗派兵7万侵扰秦凤、泾原等地，杀掠当地人畜数以万计。拱化三年（1065年）年初，又派万余夏兵进攻庆州（今甘肃庆阳）王官城。年底，再攻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外的同家堡。拱化四年（1066年）九月，毅宗率兵数万，亲征庆州，包围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夏军攻城三日，因毅宗中流矢，才撤围而去。拱化五年（1067年）十月，李文喜等胁迫夏绥州（今陕西绥德）守将嵬名山投降宋朝。毅宗派兵争夺绥州，在大理河被宋军击败。只得加强边备，以防宋军深入。同年十二月，毅宗去世。其子秉常即位，是为惠宗。惠宗年仅7岁，由梁太后摄政。

毅宗亲政时间虽然不长，但他推行的改革促进了西夏社会的封建化。

四、西夏梁氏专权

夏拱化五年（1067年）底，年仅7岁的惠宗秉常即位，政权落入太后梁氏及其弟国相梁乙埋手中。梁氏是蕃化的汉人，顽固坚持党项奴隶主的利益。于是，西夏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后族与皇族的斗争，坚持蕃礼与主张汉礼的斗争。对外，则与北宋发生了剧烈冲突。

梁太后一执政，就宣布废除汉礼，仍用蕃礼。同时，罢

免掌握兵权的皇族成员崑名浪遇，将其贬出京师。在巩固了梁氏地位之后，梁太后姐弟一再发动对北宋的战争。乾道三年（1069年），西夏兵进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攻占刘沟堡。接着又进攻庆州（今甘肃庆阳）、顺安寨、黑水堡等地，包围绥德。次年五月，梁氏出兵，号称10万，修筑闹讹堡。北宋庆州知州李复圭逼部将李信率兵3000出战，大败而还。李复圭将战败的责任推到李信等人身上，再出兵进攻邛州堡、金汤城等地，夏军已从容离去。李复圭竟下令捕杀西夏老幼百姓一二百人，冒充被斩杀的西夏士兵，向朝廷报捷。这一残暴行为引起西夏民众的极大仇恨。八月，梁乙埋率数十万大军进入环庆路，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东北）、荔原堡（华池东南）等处，前锋直逼庆州城下。后因吐蕃董毡率部进攻西夏，梁乙埋担心西部边境不稳，才撤兵而去。

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年）正月，北宋陕西、河北宣抚使韩绛派鄜延钤辖种谔统率诸军，准备攻取横山。种谔率兵在啰兀（今陕西米脂西北）击败夏军，留兵2万，就地筑城。接着，又分兵在永乐川、赏逋岭等处修筑城堡。各城堡之间相距大约40里，企图以此遏制西夏的进攻。不料，才到二月，西夏就大举进攻。种谔惊慌失措，新筑诸城堡全部被西夏占领。不久，西夏梁氏开始与北宋谈判，最后约定以绥德城外20里为界。

绥德定界之后，梁氏集中兵力攻取吐蕃武胜城（今甘肃临洮）。武胜地处进入洮河流域的要害。北宋秦凤安抚使王韶早有夺取武胜之意。于是，在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闰七月，正当西夏大军即将攻占武胜之际，王韶率宋兵突然出

现在城下。夏兵仓促应战，打了败仗，不得不撤退。这时，武胜的吐蕃守将瞎药也弃城而逃，王韶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武胜。次年，王韶又攻占了西夏的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天赐礼盛国庆四年（1073年），梁乙埋派兵7000企图收复河州，又被宋军击退。

梁氏在战场上的连连失利，动摇了自身的权威。大安二年（1076年），惠宗亲政，但大权仍在梁氏掌握之中。大安六年（1080年），惠宗在皇族支持下提出废蕃礼、行汉礼，恢复毅宗时的国策，遭到梁氏反对。次年，惠宗听从汉人将军李清的建议，准备与北宋和谈。梁太后等却害死李清，囚禁惠宗，重新听政。这一消息传出后，拥护皇族的诸将纷纷拥兵自重。保泰军（今甘肃靖远北）的西夏驻军将领统军禹藏花麻甚至向北宋求救，请求北宋出兵讨伐梁氏。

宋神宗君臣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决定派李宪、种谔等将领率30余万大军进攻西夏。宋军分五路出师。大安七年（1081年）八月，李宪出兵熙河，禹藏花麻投降。九月，李宪克兰州。十月，种谔部克米脂，夏守将令介讹投降；至石州（今山西离石），夏守将弃城而逃。种谔入夏州、银州。王中正部攻占宥州。高遵裕部出环州（今甘肃环县），夏清远军守将嵬名讹吓投降。刘昌祚部在堪哥平磨史隘口（今宁夏青铜峡市东南）击败梁乙埋亲率的大军，夺取关隘，直逼灵州（今宁夏青铜峡市东）城下。只因刘昌祚的顶头上司高遵裕嫉妒刘的战功，下令刘屯兵城下，等自己到达后才许攻城，丧失了战机。夏军赢得了喘息之机，从容做好准备。宋军围攻灵州18天，仍未能攻克。

这时，梁太后采纳了一位老将的建议，实行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略。集中 10 万精兵于都城附近，保卫要害，另派机动部队绕到敌后，切断敌人粮道。结果，各路宋军因军粮匮乏被迫退兵。西夏军趁机在灵州掘开黄河河堤，水灌宋营。高遵裕、刘昌祚所部 10 余万宋军死伤无数，大败而退。

大安八年（1082 年）八月，宋神宗命给事中徐禧在银、夏、宥 3 州交界处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以扼守西夏军队东来的要道。徐禧加紧施工，用 19 天的时间就将城寨建好，然后与兵 1 万驻守。永乐城地处兵家必争之地，西夏当然不能坐视。梁氏闻讯，出动全国的精锐部队 30 万人进攻永乐城。夏军的精锐骑兵部队“铁鹞子”首先抢渡黄河，纵横驰骋，锐不可当。主力部队随后跟进，包围了永乐城，前锋直至米脂城下。永乐城的宋军顽强抵抗，但被夏军切断了水源，只好绞马粪汁喝，结果有一大半宋兵渴死。李宪率领的援军受到西夏军队阻击，寸步难进。西夏军队奋勇攻城，终于占领了永乐城，击毙徐禧以下宋军将士、民伕 20 余万，缴获大批辎重。

西夏在战场上的胜利却不足以抵消经济上的巨大损失，更未能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为了笼络皇族一派的将领，梁太后于大安九年（1083 年）闰六月，恢复了惠宗的皇位。惠宗复位后，立即向宋朝求和，但遭到拒绝。于是，惠宗出动 80 万大军进攻兰州，未能攻克。接着，西夏军攻德顺军（今甘肃静宁），围定西（今甘肃天水市西北），后在静边（今甘肃静宁东南）被宋军击败。

大安十一年（1085 年），梁乙埋、梁太后先后去世。乙埋

之子乙逋自任国相，与大将仁多氏分掌兵权。次年，惠宗去世，其子乾顺即位，是为夏崇宗。崇宗年仅3岁，大权操纵于梁乙逋、梁太后（乙逋之妹）兄妹之手。但实权则由皇族嵬名阿吴、仁多保忠分掌。嵬名、仁多、梁氏三大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夏天仪治平元年（1087年）五月，梁乙逋勾结吐蕃阿里骨部进攻宋朝。阿里骨攻占洮州（今甘肃临潭）。梁乙逋也在定西城大破宋军。但仁多保忠因与梁氏不和，竟擅自退兵，致使西夏军队未能扩大战果。不久，仁多保忠率兵10万入泾原路，宋军坚守不出，西夏军未取得大的战果而撤退。频繁战争使西夏、北宋都感到疲惫，天仪治平三年（1089年）夏宋议和。

但是，在辽朝的挑唆之下，梁乙逋兄妹又向北宋进行挑衅。天祐民安二年（1092年）正月，梁乙逋率军进攻绥德，大肆掳掠。梁太后亲征环州，围城七日，无功而还。归途中遭到宋军阻击，夏军狼狈而逃。这时，梁氏兄妹因争权夺利发生内讧。梁太后不让梁乙逋领兵，企图削弱他的权力，乙逋十分不满，阴谋夺取皇位。天祐民安四年（1094年）十月，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杀梁乙逋全家，由梁太后直接控制朝政。

梁太后专权后，继续进攻宋朝。天祐民安六年（1096年）十月，梁太后、崇宗亲征，攻克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县北）。次年，夏兵进攻北宋的绥德、麟州、葭芦城等地，而宋兵则反攻西夏的洪、盐、宥等州，双方各有胜负。天祐民安（1098年）十月，梁太后率40万大军攻平夏城（今陕西靖边北），连营百里，昼夜不停地进攻了13天，终因军粮接济不

上而退兵。梁太后不得不向辽朝求援。次年正月，梁太后去世。长达 30 余年的梁氏专权结束，西夏的国力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害。

五、西夏崇宗亲政

夏永安元年（1099 年）正月，崇宗乾顺在辽朝支持下亲政。他对内削弱政敌，巩固嵬名氏皇族的势力，对外奉行依附辽朝，与宋朝和解的方针。

亲政后，崇宗向宋朝谢罪，宋哲宗答复说，如果真是诚心悔过，可以接受这一请求。但实际上并不相信西夏的诚意，仍然让边将接受西夏的降官降卒，并严加戒备，甚至有时还进入夏境骚扰。当年，西夏兰会正钤辖革瓦娘率本部落降宋，宋朝予以接纳，封官赏金。后来，宋将种朴在赤羊川俘虏西夏人 150 余口、牲畜 5000 头。西夏派兵追击，又被宋军击败。于是，崇宗被迫发动反击。九月，西夏骑兵 2000 出浮图岔，击败陈告所部宋军。闰九月，宋将王愍率兵镇压邈川（今青海乐都）部族的叛乱。西夏派仁多保忠率 10 万人马包围王愍，结果反被王愍击败。接着，夏军又在青唐岷（今青海乐都境内）败于宋将苗履之手。战场上的失利促使崇宗决心求和，在他请求之下，辽朝使节赴宋，为夏宋两国斡旋。夏宋两国恢复和好，两国边民得以休养生息。

崇宗在缓和对宋关系的同时，着手清除政敌。永安元年（1099 年）四月，崇宗将梁太后时的穷兵黷武归罪于大将嵬保没、陵结讹遇，理由是这两个人都劝过梁太后对外用兵。结果是将嵬保没、陵结讹遇二人处死。同年闰九月，仁多保忠

援邈川失利，郁郁不得志。在宋朝当权的蔡京听闻后，便强令熙河军统帅王厚诱降仁多保忠。王厚派出的诱降使者被夏巡逻兵截获，崇宗借机解除了仁多保忠的兵权，这样一来，西夏兵权全部落入嵬名氏皇族将领的手中。

为巩固皇权，崇宗采用宗室封王的办法，大封宗室诸王。罢免仁多保忠之后，崇宗封皇弟察哥为晋王，执掌兵权，后来又封宗室仁忠为濮王、仁礼为舒王。晋王察哥骁勇善战，富于谋略；濮王仁忠、舒王仁礼通晓蕃文汉字，长于文学，他们都是崇宗得力的辅佐。在此期间，崇宗还接受了汉官御史中丞薛元礼的建议，在蕃学之外，特设“国学”，专门教授汉学。崇宗将汉学定为国学的作法表明了大力提倡儒学，推行汉文化的决心。

崇宗在对辽关系上开始是实行依附的方针。特别是贞观四年（1105年），辽天祚帝将宗室女南仙封为成安公主，嫁给崇宗之后，夏辽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在金国开始进攻辽朝之时，西夏采取了助辽抗金的方针。元德三年（1122年）年初，金兵围攻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市），夏崇宗派兵5000援辽。但是，当夏军还在途中，西京已被攻破，天祚帝逃入阴山。五月，崇宗派大将李良辅率兵3万援辽，在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西岸）击败金军。六月，李良辅军大败于宜水。次年，崇宗再次发兵援辽，被金军所阻。五月，崇宗遣使邀天祚帝入夏。天祚帝应允，封崇宗为夏国皇帝。金将宗望闻讯后，遣使要求崇宗扣押天祚帝，并许以割地为酬劳。

在金国劝诱之下，崇宗改变了国策。元德五年（1124年）正月，崇宗向金国称臣。金朝将原属辽国的下寨以北，阴山以南，吐禄泊以西的土地割让给西夏。于是，西夏借金辽

交战以及后来金宋交战之机，大肆扩展疆土。七月，夏出兵攻武（今山西神池）、朔（今山西朔县）2州，并攻占朔州。同时，出兵攻北宋丰（今陕西府谷西北）、麟（今陕西神木北）2州。元德六年（1125年）三月，夏兵攻占天德、云内（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两军及武州八馆等地。四月，破宋震威城（今陕西府谷境内）。九月，夏兵攻占宋西安州（今兰州市东北）。不久，又破麟州建宁寨和平夏城怀德军（今宁夏固原东北）。然而，金国不愿意看到在西北崛起一个强大的西夏国，于是趁西夏军队大掠宋境之时，突然出兵攻占天德、云内等地。崇宗遣使质问。金国不愿归还天德、云内，而是于正德元年（1127年）将原属北宋的陕西北部割给西夏，作为补偿。这一作法给夏金关系投下了阴影。

此后，夏崇宗既与金宋互派使节，又趁两国交战之机争城夺地、招降纳叛。不久宋环庆路统制慕洵降夏，夏兵攻占乐州（今青海乐都）、西宁州（今青海西宁）。次年，金朝按夏的请求，割让乐州、积石军（今青海贵德）、廓州（今青海尖扎北）。大德五年（1139年）三月，夏兵攻占金府州（今陕西府谷）。同年六月，崇宗去世，其子仁孝即位，是为仁宗。

西夏共传10帝。历时190年，亡于蒙古。

第五节

西夏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西夏经济中畜牧业仍是主要生产部门。河西走廊的瓜、沙

诸州，畜牧业兴盛。牲畜主要有羊、马、牛、驼、驴、骡等。

西夏占有河套地区和河西走廊，这里原是党项族和汉族杂居地区，农业相当发达，自唐、宋以来的“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农业，积极兴修水利，在兴州、灵州地区疏通了汉源和唐来两条古渠，引黄河水使两渠沟通，又新修筑了自青龙峡至平罗的“昊王渠”。这些水利工程的修筑，使甘、凉、兴、灵地区成为西夏主要粮食生产基地。西夏已普遍使用耕牛耕作，敦煌榆林窟西夏时期的壁画中，有一幅使用“二牛抬杠”犁地的“农耕图”，与内地耕作大致相同，所以宋人说西夏“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的手工业，主要为官府控制，设有技院、刻字司、金工司、铁工院、绢织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机构，管理手工业生产。手工业中以制盐、毛织和冶铁最为发达。西夏畜牧业兴旺，皮毛丰富，毛织业主要生产由行线织造的氍毹、毡、毯等，质地优良，盛销各地。

盐州（宁夏盐地）是西夏的制盐中心，有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四大盐场，生产青、白盐。而咸隈川则生产红盐。西夏每年产盐至少数十万石，是对宋贸易的重要商品。

西夏的夏州铁矿储藏丰富，设有冶铁务，主管开采和冶炼。西夏冶铁已采用关式风箱鼓风，它是一种先进工艺设备。西夏兵器制造负有盛名，用冷锻制造的甲冑“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受到宋朝人高度赞扬。“夏国剑”锋利无比，誉为天下第一。夏国的弓号称“神弩弓”，能射三百步，是当时公认的利器。

西夏元昊时为适应工商业的发展，就铸造有汉文“天授

通宝”的钱币。仁孝帝时设立铸钱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

第六节 北宋与西夏关系

一、延州之战

北宋建立之初，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定难军节度使李氏表示归顺宋朝，但仍保持割据局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亲自朝见宋太宗，献出夏州等地，留居东京开封，其族弟李继迁反对归附宋朝，起兵反宋，向辽称臣，被封为夏国王。李继迁与宋战争连年，互有胜负。宋真宗即位后，李继迁遣使求和，遂被任命为定难军节度使，但李继迁仍反复无常。咸平五年（1002）攻陷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定为都城。景德元年（1004），李继迁死，子德明继位，表示与宋修好。景德三年，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赐予银1万两，绢1万匹，钱3万贯，茶2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从此双方维持了30余年的和平相处的关系。德明死后，儿子元昊于1032年称王，但他不满足于做宋王室附庸的地位，在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建大夏国，史称西夏，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宋廷不承认元昊独立，立即削其封爵、停止互市，

并声称谁若提李元昊的头颅来献，即授谁为定难节度使。宋夏矛盾更趋激化。宋朝以夏竦不洮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准备出师讨伐西夏。早已做好战争准备的夏国，还没等宋师出境，就先发制人，主动向宋陕西沿边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次年，元昊拟大举攻宋，遣人多方刺探宋军事政治情报，获悉宋鄜延路地阔寨疏、士卒寡弱，主将少谋，遂决计攻取延州。

延州系宋边境军事要地，亦为西夏出入要冲，其北部门户金明寨（今安塞东南）地形险要，周围有 36 寨互为依托，由都监李士彬率近 10 万蕃兵扼守。延州守将范雍听到夏军准备进攻延州的消息，十分恐慌，急奏朝廷请兵支援。元昊为了麻痹范雍，一面遣衙校贺真至延州假作议和，一面声东击西，诈攻保安军（今陕西志丹），暗袭金明寨。范雍没有搞清元昊的意图，急忙派大将刘平、石元孙率军 3 万驰赴保安军救援。当刘、石二将率军至保安军东北面的塞门寨时，夏军以极快的速度南下直逼延州北面的金明寨。金明寨虽有李士彬率 10 万蕃兵扼守，但分据 36 个寨中，因兵力分散，各寨防御力量十分薄弱。元昊首先对金明寨守军行离间策反之计，利用李士彬对部下严酷，上下不和的矛盾，以金帛、爵位收买宋军部将作为内应。当夏军进抵金明寨时，叛降者起而内应，李士彬未及应战，就束手被擒，金明诸寨全被攻破，夏军乘胜南下，直逼延州。

范雍急召刘平、石元孙二将返救延州。刘平轻敌，不了解敌情就率军昼夜兼程疾趋延州。元昊侦知宋军动向，在延州西北面的三川口（今延安西北）设伏行援。刘平贸然轻进，

二十二日夜，进抵三川口西 10 里驻营，令骑兵先援延州夺门。次日晨，因步卒未至，刘平折返回迎，途中与奉命增援延州的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卨、郭遵等会师，合军万余，结阵东进。郭遵建议先行侦察，刘平不听。行至大柳树（延州西 20 里），元昊遣人伪装范雍使者传令，谎称为防奸细混入，命将士分队行进。刘平不辨真伪，依令而行，放及 50 队，伪使逃逸，方知中计。宋军遂整阵前进，进抵三川口，遭到夏军阻击，宋将郭遵、王信奋勇杀敌，夏军“委老弱及牛马以饵之”，宋军为了抢功而追击，进入了元昊的包围圈。元昊以 10 万精骑将宋军团团包围，宋军多次冲击，均被夏军击退。当时，“平地雪数寸”，宋军一直奋战至黄昏，郭遵战死，刘平负伤。夏军主动进攻，居于阵后的黄德和见夏军兵多势众，率部先逃，宋军全线崩溃，都随黄德和逃遁。身负重伤的刘平遣其子宜孙驰追黄德和，令其勒兵还击，黄德和不从，逃往甘泉（今属陕西）。刘平仗剑阻拦，仅留 1000 余人，被迫退至西南山下，立七栅防御。二十四日清晨，夏军四面冲击，攻破山栅，刘平、石元孙被俘。夏军集中兵力围攻延州，连攻七日未下，恰逢连夜大雪，气候严寒，难以久战，又闻宋麟州团练使折继闵、并代钤辖王仲宝率军从侧后攻入夏境，遂引师回国。

二、好水川之役

公元 1038 年元昊称帝建大夏国后，不宣而战，铁蹄不时南犯，西北不得安宁。

宋仁宗遂任命朝臣韩琦、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发抚诏讨副使，共御西夏。韩琦的制敌方略重在进讨，以攻为守；范仲淹的制敌方略则重在招抚，以守为攻。

1041年二月，元昊率军逼近怀元远城。韩琦立即集结兵力1.8万人，命将军任福统帅，出敌后据险设伏，待敌退邀击。

任福是位猛将，曾多次深入敌境，屡建奇功。这次又决心令元昊匹马不得生还。正行进间，忽闻夏军与宋兵某部战于张家堡南，元昊丢下几百具尸体和大量驼、马、牛仓皇北窜。任福求功心切，立即命令全军追击。沿途荒僻，任福兵马三日不得食，穷追不舍，会日暮追至好水川（即今甜水河，源出今宁夏隆德东六盘山）。

翌日晨，任福与先锋桑怱合沿好水川西进。当前方距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北）五里时，川谷已为夏军扼断，进退不得，方知中计，遂与敌军展开格斗。

先锋桑怱在路旁忽然发现几个密封的银泥盒，中有跃动声，甚为疑惑，未敢开视。将军任福后至，尽开泥盒，突有上百只家鸽飞出，盘旋于川谷上空。家鸽皆佩悬哨，哨音清拔，悠远可闻。元昊军闻哨声而四合。

任福布阵未成，元昊铁骑突至，东奔西突，左冲右撞。宋兵难以立足，遂舍川谷夺取两坡，欲居高制下，扭转劣势。这时，只见夏军中忽地竖起一面大旗，长2丈。宋兵莫明其妙。只见大旗左摆，左山后伏兵冲出，大旗右摆，右山后伏兵骤起。两山伏兵有如悬河决堤。猛扑宋兵，杀声震撼山谷，宋兵死伤相枕、满山遍谷。

将军任福身中 10 余矢，仍奋力冲杀。随从小校劝他脱身自免，任福却说：“我身为大将，兵败何颜以求生，愿以身报国！”说完又冲入敌阵，终以死闻。

是役，宋兵死亡 1.03 万人，几十位将校只有一人战至日暮敌退而生还。此即好水川之役。消息传开，关右大震，韩琦因之被降职。

范仲淹主持延州（今陕西延安市）一线防御。他到任后，即整顿军制、训练士卒、修筑城寨，十分注意安抚边民。结果，夏军虽屡次来犯，而终不得逞。

一次，范仲淹修筑大顺城。大顺城的位置突出于敌境，料夏必争，故密作筹备。临筑城时，发兵而随，10 日城成。夏人发觉后，果遣骑兵 3 万来争，城坚不下，遂佯败而走。范仲淹下令但令其去，不得追击。后知西夏果有伏兵。

夏军屡犯不逞，遂自相告诫说：“咱们莫再打延州主意，今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即指范仲淹，大范指其前任范雍。范雍是个只会念佛的人。

范仲淹的成功，重要的是执行了安抚边境羌民的正确政策。以往，边境羌民迫于宋兵的骚扰，多背井离乡去投西夏。范仲淹到任后，立即明令将士不得扰民，并筑城寨来招抚流亡。帮助羌民解决土地、耕牛、籽种、口粮。因此，大批羌民相踵归业，重返家园。范仲淹也很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士，与酋长 600 余人，挚诚相待，引以为助。因此，羌人敬爱范仲淹，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范仲淹曾加“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这样称呼是表示敬重）。甚至羌人还为范仲淹立生祠、图像供奉。10 年后，范仲淹病逝青州（今山东益都），

羌人酋长数百人奔丧，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

宋夏这次交兵历时二年多。初时，元昊多次取胜，亦有掠夺，但兵员亦死伤过半，国力日匮。后来，韩、范合力防御得宜，人心倾归，元昊亦不敢轻易骚扰边境。故边民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夏惊破胆！”

宋夏兵起，互市遂断，两国百姓深感不便，尤其是西夏百姓得不到宋地绢帛粮茶等生活必需物资，更感到开衅不如和好，人民遂作《十不如》谣以讽之。

元昊迫于形势，遂向宋请和。宋也恐夏辽联盟而势盛，故准和议，恢复互市。从此，西夏名义上称臣于宋，以求得岁币；宋每年赐给大夏银 7.2 万两，绢帛 15.3 万匹，茶 3 万斤，以求西北的安宁。从此，西北稍安，边民互市，往来如织。宋与西夏庆历议和之后，维持了 20 余年的和平相处。宋神宗赵顼采纳王韶提出的先复河、湟（今甘肃、宁夏东北、乐都），使西夏腹背受敌之策，陆续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等州，对西夏构成了一定威胁。但在元丰四年（1081）的灵州之战，元丰五年的永乐城之战中，宋军或无功而返，或惨遭失败，损失士卒，民夫 20 余万人。

从宋哲宗起，采用沿边进筑寨堡的办法，巩固了边防，并对西夏构成了严重威胁。元符二年（1099），西夏通过辽的斡旋，向宋谢罪请和，宋哲宗答诏许和，并恢复了“岁赐”及贸易往来。

政和四年（1114），宋徽宗命童贯进攻西夏，双方互有胜负。宣和元年（1119），议和罢兵，又恢复了和平交往。

北宋与西夏之间虽然战争比较频繁，但在双方并存 90 年

间，和平相处的时间仍然多于相互战争的时间。战争给双方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友好交往和榷场贸易往来则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往来。

第三章

金的建立及北宋灭亡

第一节 女真的 兴起和金的建国

一、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

女真族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是满族的祖先。他们很早就居住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王朝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中原地区的汉族封建王朝以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宋朝给他们的部落首领以官职，使汉族和少数民族不但在政治上连结在一起，在经济和文化上也能广泛地取得交流。

早在唐朝初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初，女真族叫作“靺鞨”。当时有几十个不相统属的部落，其中黑水靺鞨和粟末靺鞨是两个比较强盛的部落。

粟末靺鞨部活动于粟末水(松花江)以南地区。7世纪末,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统一各部落。713年(开元元年),唐玄宗李隆基封他为忽汗州都督,又加封为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府又称渤海都督府,建立起渤海地方政权,成为唐朝的藩属,与唐朝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地方政权统治的地区,东到海滨,北抵黑水(黑龙江),西邻契丹,南达新罗。境内有10多万人口。人们种植稻、粟、豆、麦,制造陶器,并能酿酒、纺织。他们从长安传来汉文图籍,使汉族文化和典章制度传播于东北地区。人们用当地的特产貂皮、海豹皮、海东青(小猎鹰)、人参、麝香、马匹等,与中原汉族人民进行物资交流。

黑水靺鞨部活动于长白山和黑龙江下游两岸,即白山黑水之地,位置在粟末靺鞨的北边。公元631年(贞观五年),他们向唐朝纳贡,与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联系有所增加。726年(开元十四年),唐朝在其地建立地方行政机构,先后设置过勃利州(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会合处)、黑水都督府,任命靺鞨首领担任刺史和都督。从此,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边疆地区,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五代时期,渤海地方政权于926年被契丹贵族吞灭以后,黑水靺鞨也从属于契丹统治。这时候,他们已经被称为“女真”。契丹统治者对女真人采取分化和瓦解的统治政策,强迫一部分与契丹毗邻的女真人,南移到辽东半岛等地,编在契丹人的户籍之中。这一部分女真人同汉人、契丹人杂处,在生产和生活上受到进步的经济和文化的影 响,逐渐地跟当地人民自然地融合在一起。还有大部分女真人仍旧留居在东北,

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他们跟汉人和契丹人的接触机会较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比较缓慢。到了 11 世纪初，其中有一个完颜部，在部落首领绥可的领导下，生产有了发展。虽然他们仍以捕鱼射猎为主，但也已经从事一些农业活动，种植粟、麦等农作物。猪的饲养也有了，还用麻和猪毛织成布。夏天用一块布围在腰间；冬天用兽皮御寒。女真人逐渐地定居下来，天暖时，用树枝、树皮建造住房；天冷时，依山挖坑，上面盖着树枝和泥土。他们的定居点集中在按出虎水（哈尔滨东南阿什河流域）东南阿什河流域沿岸。这一带有森林峡谷，又有富饶的土地。女真人民除了建造住房、种植作物之外，还学会了炼铁。完颜部强大起来了，逐渐地形成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庞大部落联盟。11 世纪中叶，完颜部首领乌古迺（1021—1074 年）一边制造铁犁，一边制作兵器，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又加强了武装力量。他们以自己的产品与邻近的部落进行交换；又以武力掠夺财富，把俘获的人口作为奴隶，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剥削奴隶劳动，产生贵族和奴隶的阶级分化。贵族们用不成文法约束部落成员。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更加巩固了。邻近的部落纷纷归向以完颜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

完颜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深受契丹贵族的种种奴役和残酷压迫。女真人每年要向契丹贡纳大量的特产如名马、良犬、珍珠、海东青之类。东北的珍珠是在 10 月间采取的。那时候，河里的冰已结得厚厚的，凿开坚冰，潜入水底，捞取蚌壳，是一件多么艰苦的劳动。当地有一种天鹅，喜欢吃蚌肉。凶猛的海东青能捕天鹅。契丹贵族们要活捉天鹅，因此

就需要海东青。他们向女真人进行勒索。征索财物的辽朝官吏，贪残凶暴。辽朝的军队，经常骚扰和破坏女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辽朝统治者的暴行，引起女真人民无比的愤恨和强烈的反抗。

到了辽朝的天祚帝耶律延禧统治时期（1101—1125年），他们对女真人的压迫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契丹统治者和女真族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了。这时，辽朝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上下穷困，府库无余财”。契丹贵族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斗争十分激烈，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辽朝的统治虽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们并不肯放松对各族人民特别是对女真人的压榨，仍然无止境地索取贡纳品。女真族人民为了反抗辽朝的奴役和压迫，为了民族自卫，更加需要女真各族的联合。

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女真族出现了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杰出英雄完颜阿骨打。

二、阿骨打称帝与联宋灭辽

北宋末年，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强盛起来。

女真族在向奴隶制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一种重要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叫做猛安谋克制度。

“猛安”，就是千夫长；“谋克”，就是百夫长。这种猛安谋克制度，开始出自战争需要，是一种军事组织，后来就成为地方行政组织。阿骨打规定，300户为1“谋克”，10“谋克”为1“猛安”。猛安的官职为从四品，负责军务管理，训

练武艺，也管理农业租税收缴事务。谋克的官职为从五品，负责组织军队训练，相当于县令的地位。这样，猛安谋克又成为官爵、将校等称呼。阿骨打以猛安谋克制度，加强了女真的力量，成为同契丹统治者对抗的势力。

契丹对女真族的压迫和剥削是十分苛重的。它令女真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捕捉“海东青”，按期征贡。契丹贵族向女真人征收“海东青”，乘机敲诈勒索，引起极大的民愤。

阿骨打乘着人民反抗契丹奴役的高涨情绪，发动了反契丹的战争。公元1114年，阿骨打率领2500人，攻克宁江州（治所在今吉林扶余东）。接着，在出河店（吉林扶余县境内）战役中，把辽兵打得落花流水。从此，辽军“士无斗志，望风奔溃”。阿骨打乘胜进军，连续攻克几个州，占领了东北大片土地，获得许多马匹和武器，军队发展到1万多人。

公元1115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建国号大金，建元“收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金国建立后，并立的几个政权，呈现复杂的斗争局面。阿骨打率领金兵不停地向辽朝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北宋政权为了乘机夺回燕云16州，主动派人和金朝取得联系，采取联金抗辽的政策。西夏政权却站在辽朝一边，支持辽抗金的战争。

公元1115年9月，金兵攻占辽朝的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公元1120年，金兵又攻陷辽的上京临潢府（今昭乌达盟林西东北）。金与宋双方制定联合作战的计划：金兵攻打辽的中京大定府（今昭乌达盟宁城县境），宋兵攻取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大兴县境）。同时，宋朝答应了屈辱的条件：灭

辽以后，原来每年给辽朝的财物，都献给金朝。

公元 1122 年，辽的一个军事将领耶律余睹投降了金。从他口中，了解到辽朝内部矛盾重重、政权腐败、国库空虚。金就派耶律余睹作向导，攻克了辽的中京，不久又攻下辽的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

北宋皇帝徽宗赵佶，任命童贯为统帅、蔡攸为副统帅，向辽进攻。由于这些将领只懂得“太平娱乐”，不会带兵打仗，一经交战就吃败仗。在进攻燕京的战役中，宋军将领刘延庆看见辽军营中起火，以为辽兵打来了，吓得慌忙烧毁自己的军营逃跑了。宋军被辽兵打得死伤无数，遭到重大损失。

宋军作战失败，就去要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太祖阿骨打亲自带兵，在这年 12 月一举攻下燕京，大肆抢劫财物。第二年 4 月，金兵退走，又把燕京男女掳去做奴隶。宋朝得一空城，但要给金朝 100 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租钱”。

1125 年，辽天祚帝被俘，辽遂灭亡。

第二节 北宋的灭亡

一、汴京保卫战

1123 年，完颜阿骨打死后，他的弟弟吴乞买继位，这就是金太宗。他的汉名叫完颜晟。

金太宗继续以武装力量消灭辽朝的残余统治势力，于1125年完成了彻底灭辽的战斗。

灭辽之后，女真族长期受契丹贵族奴役的历史从此结束。金朝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新的统治权力。以金太宗为首的女真贵族，凭借强大的兵力和胜利者的威风，并不以灭辽为满足。他们为了追求中原的土地和财富，不愿意把战斗停止下来，而把武装的锋芒针对中原地区。女真贵族的军事行动，破坏了中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们把原来属于正义性的抗辽斗争，转变为以掠夺为目的的非正义战争。

以宋徽宗为首的北宋王朝，是一个已经腐烂了的封建王朝，正陷于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北宋统治集团为了转移内部的阶级矛盾，打着收复北方失地的招牌，妄图勾结女真的强大兵力，借“联金”的名义，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北宋在联金的过程中，完全暴露了他们军事上的虚弱，这就更加引起女真贵族们入侵中原的野心。宋徽宗一伙对于金朝的这种掠夺野心，毫无戒备。金兵终于在灭辽之后不到九个月，立即分兵渡河南下。

1125年冬，金兵分两路南下，他们的意图是两路会师于汴京，消灭北宋政权。西路金兵由粘罕（宗翰）统帅，从西京（山西大同）直攻太原。这一路金兵遭到太原军民的痛击，一时间无力向南推进。东路金兵在斡离不（宗望）统帅下，由平州（河北卢龙）直攻燕京（北京市），并迅速向南推进，攻掠邢州（河北邢台）、相州（河南安阳）、浚州（河南浚县）。黄河北岸的宋军，望风而溃。守河的士兵慌忙放火焚毁桥梁，弃甲逃奔，使金兵从容地用小船一批一批渡过了黄河，黄河

南岸的宋军不敢抵抗。韩离不嘲笑宋朝将帅实在无能，如果有一两千人守河，金兵也就不能安然渡过黄河。

北宋统治集团顿时陷入慌乱之中。一部分只顾个人私利的求和派官员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主张放弃汴京，向金朝屈膝求和。当时只有少数深明大义，能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官吏像李纲等，坚持抗金，保护北宋的都城，反对求和。宋徽宗一面遣使求和，一面把皇位让给他的儿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带着宠臣蔡京、童贯等人，连夜向南方逃奔。

然而广大人民和士兵们，抗金的情绪十分高昂，纷纷自动起来抵抗。以宋钦宗为首的北宋王朝，面临金兵的侵略，一心想着求和。但是大敌当前，不得不暂时顺从军民“愿以死守”的坚定意志，任用抵抗派李纲为亲征行营使，由李纲主持汴京防务，等待四方援军。这时，金兵已经包围了汴京。全城军民在李纲指挥下，决心誓死保卫都城。

北宋都城汴京，既是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它既利于攻，又利于守。都城的结构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个部分。外城是主要防线，土城建筑得非常坚固。外城的四面共开了十几座城门。城门是交通和运输的出入口，有利于分头出击和防守。这些城门中，有七座是水门。各水门跨河设有铁栅闸门。一到晚间，放闸闭门，防止敌人沿河潜入城内。各座城门口，都设置圆形或方形的瓮城，这是为了加强城门入口处的防护而建筑的。瓮城之上设有战棚，供守城士兵们的防御和休息之用。外城城墙每隔六七十步，就配置一座“马面”，它突出于城墙之外，可以交叉射击，保护城墙不受敌军的破坏。城中心区的东边有鼓楼，西

边有钟楼。指挥作战的号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城内还分区设立望楼，专门瞭望敌人的动静，随时掌握敌情。沿着外城的城墙，大约每隔 200 步设置一座库房，贮藏各种武器和军需品。为了加强外城的防守能力，环绕外城周围，把各条河道互相沟通，形成一条护城河。河的内外两岸，栽植榆柳以巩固堤岸，又能增强障碍力。

汴京防御的准备工作，时间十分紧迫。李纲在每一面城墙上配置 1.2 万名士兵，并准备炮、弩、砖石、檣木、火油等军用物资。城内设前、后、左、右军共 9 万人，中军 8000 人。前军保卫西北水门（通津门），后军保卫东面的新宋门，其余三个军留在城里，随时支援各防区的战斗。

全城军民在李纲的组织和指挥下，士气大振。城内居民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捕捉奸细，参加城防工程，四处搜集砖石和石灰，准备随时修补城墙。

金兵向汴京城西面的西水门（宣泽门）进攻，几十只火船顺流而下，采取凶猛的火攻战术。李纲派 2000 名勇士和当地人民结合在一起，用长钩吊住敌船，纷纷投掷石头，把金兵打得七零八落。

金兵发动好几次攻城，用弓弩炮石向城上射击，又用云梯爬城。城头的炮石和箭矢，如雨点般向墙脚下的金兵射击。经过了激烈的战斗，金兵遭到惨重的伤亡。

长驱南下的金兵有 6 万人。他们孤军深入，又无后援，完全陷入腹背受击的不利地位。北宋军民以逸待劳，不但全城人民动员起来了，各地的援军也纷纷来到。西北种师道、姚平仲等将领统率的劲旅就不下 20 万人。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宋

朝。

可是腐败的北宋统治集团，既害怕金兵，又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李邦彦等一小撮人忙着策划求和。

金兵在宋朝军民的反击下，经受巨大的挫折。女真贵族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利用北宋求和之机，向宋朝进行敲诈勒索。金朝提出了以下苛刻的要求：要北宋政府割让太原、中山（河北定县）、河间（河北河间）三镇地方给金朝；每年要给金朝统治者 500 万两黄金，5000 万两白银，100 万匹绢帛，1 万头牛马；还要宋朝派亲王和宰相作抵押，护送金兵安全渡河北撤。北宋求和派把这些条件全部接受下来，并派康王赵构和宰相张邦昌到金营作抵押，下令割让三镇，并立即在京城内搜刮金银，“犒劳”金兵。被掠夺的民间钱财有黄金 20 万两，白银 400 万两，而贵族官僚们的财富却丝毫没有触动。

以李纲为代表的抵抗派，对这种屈辱求和的作法表示极端的愤慨。李纲向宋钦宗指出：金人所勒索的金帛，竭全国人民的财力尚且不足，何况光靠一个汴京。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屏障，丢掉三镇，国家怎能保得住？李纲的正义呼声，更加引起求和派的恐惧。1126 年的 2 月，李纲被罢免了。宋朝以求和派分子蔡懋接替了李纲的职位，并下令守城战士，不得随意向金人放一矢、投一石。

北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汴京军民数万人响应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的号召，展开了反对求和、反对内奸的政治斗争。陈东等上书请愿，要求宋钦宗不要轻信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蔡懋等

奸贼的诡计，赶快把他们革职，立即起用李纲，上下齐心、抵抗金兵。请愿的群众要求亲眼看到李纲官复原职。在都城人民的压力下，宋钦宗不得不宣布恢复李纲等爱国将领的原职。奉命召李纲和群众相见的官员朱拱之，由于行动迟缓，当场被愤怒的群众拖下马来活活打死。

当李纲和广大军民见面时，数十万群众欢声雷动。在这次群众性的政治斗争中，有 20 多名官员被群众殴伤和击毙，人民在斗争中赢得了巨大的胜利。

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请愿活动，是古代青年知识分子参加爱国斗争的光辉的一页。宋朝的太学生都是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妥协求和的爱国行动，深得广大军民的支持和拥护。

汴京人民的反投降、反内奸斗争，壮大了抵抗派的声势，显示了人民的巨大力量，大大地打击了求和派的嚣张气焰。李纲复职后，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重新布署了都城的防卫力量。金兵集中兵力多次进攻西边的城门，都没有得逞。当金兵急攻万胜门时，西城墙多次遭受金兵炮石的破坏，城内军民奋力抢修，用大石和条木堵住缺口。在西城的攻守战中，宋军采取从固子门和新郑门两座城门同时出兵夹击的战术，迫使金兵败退。

汴京保卫战进行了将近 1 个月。守城军民在久经战场的爱国将领李纲的领导下，越战越勇。宋朝的援军纷纷到来，孤军深入的金兵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后路被宋军所切断。1126 年的 2 月，女真贵族只得仓皇向北方退兵。

汴京保卫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二、靖康之变

金兵北撤以后，腐败的北宋王朝并没有接受都城被围的历史教训，依然敌视人民的力量，打击和排挤抗金将领，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粉饰太平。曾经退位的宋徽宗又匆忙赶回汴京，继续过着荒淫的宫廷生活。求和派大肆宣扬，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一位有远见的大臣名叫吕好问，他向宋钦宗提出警告：女真贵族如此藐视北宋王朝，他们决不会就此罢兵。到了秋冬的时候，天高马肥，女真的铁蹄又将卷土重来，应当及早提防。宋钦宗一伙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命令各地的援军都撤回原地。宋朝政府仍然不加戒备。

爱国将领李纲非常担忧这种粉饰太平的危险局面。他多次向朝廷提出防御金兵的方略，都被奸贼耿南仲等人所扣留。李纲又被排斥在朝廷之外。

金兵经过半年的休整，于1126年的8月再度分兵两路南下：东路兵在宗望率领下，从保州（河北保定）直逼真定（河北正定）。真定知府李邈先后上书30多次，恳求朝廷派出援兵，都被置之不理。真定孤立无援，很快陷落，李邈被俘后不屈而死。金兵又攻陷庆源府（河北赵县），经恩州（河北清河）、大名府，在李固渡横渡黄河。西路宗翰的金兵也在9月间攻破了被围250多天的太原，守将王禀奋力战，最后牺牲。金兵随即抵达黄河北岸的河阳（河南孟县）。黄河南岸有12万宋军扼守，竟被对岸虚张声势的战鼓所吓倒，连夜溃逃，使金兵很快渡过黄河，进占西京（河南洛阳）、郑州，直

扑汴京城。

北宋求和派耿南仲、聂昌一伙，颠倒黑白、降祸于人，把金兵第二次包围汴京，归罪于李纲等人主战的后果，借此打击抵抗派。

1126年（靖康元年）11月，宗望的部队已经进抵汴京城东北的陈桥驿；宗翰一路也到达汴京。金兵两路会师，汴京再度遭到包围。北宋朝廷议论纷纷，文武大臣惊惶失措。当时京城内有守军7万，河东、河北大部分地区仍在宋军坚守之中，陕西方面的援军以及宗泽的部队，正在向汴京靠拢。局势固然危急，宋朝完全有力量奋起还击。但是宋钦宗代表汉族大地主阶级的腐朽力量，是软骨头。他们一心只想求和，派出奸贼耿南仲和聂昌，分别到宗望和宗翰军前议和，并答应以黄河为界，把黄河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奉送给金朝。

人民群众切齿痛恨向金人乞和的奸贼。当聂昌到达绛州（山西新绛）时，被愤怒的群众挖掉眼睛，砍成肉泥。

汴京城内的军民，克服一切困难，准备抗击来犯的敌军。人们自动组织起来，杀死了金朝派来的使者刘晏等四人。在朔风刺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里，被围困的军民饥寒交迫，连水藻和树叶都被吃光。每天都有冻死和饿死的百姓尸体，漂流在汴河和蔡河里。北宋王朝的求和国策，把汴京人民逼向死亡的深渊。闰十一月初，金兵乘大雪破城，钦宗到金营投降，北宋王朝灭亡了。

陪同宋钦宗到金营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是一个刚直而有正气的官吏。女真贵族要宋钦宗脱下皇帝的服装，换上老百姓的便服去会见。李若水十分气愤，破口痛骂金人，被金兵

拖住殴打一顿，晕倒在地。宗翰千方百计引诱李若水投降，他绝食表示反抗。在金人的多方威胁和利诱下，李若水的一名仆从，思想动摇了。他从李若水的家庭私利出发，对李若水说：老爷的双亲都已年迈，稍为迁就一下，不是就能返回故乡，与老父老母团聚了吗？李若水怒责他的仆从说：为了国事，早已丢掉自己的家庭了。在敌人面前，他毫不畏惧，骂宗翰是“强盗”。金人滥用毒刑，惨无人道地割去李若水的嘴唇，血溅满面。但他决不示弱，仍然骂不绝口。最后，金人活活地将他害死。死时仅有 35 岁。李纲听说李若水为国牺牲，沉痛地表示：宋朝的官僚士大夫，多“寡廉鲜耻”，只有李若水这样的人是知廉耻的。

金兵攻陷汴京，人民群众掀起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金兵不敢久留中原，于 1127 年的 4 月，俘虏了宋徽宗、钦宗以及宫廷中的后妃、宗室、贵戚等 3000 人，撤出汴京，还军北方。宫中库藏金银、绢帛、珍玩、宝器、图籍、天文仪器、仪仗等，几乎被劫一空。

北宋徽宗和钦宗的屈辱求和政策，不但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自食恶果、自取灭亡。

由于人民的反抗，金兵一时不能在中原站住脚跟。他们在退出汴京之前，一手扶植一个“大楚”傀儡政权，册立曾经充当北宋宰相的奸贼张邦昌为“楚帝”，并指定要建都金陵（江苏南京）。女真贵族妄想利用这个傀儡政权，统辖黄河以南地区，为金朝统治南方作准备。

徽、钦被俘之后，黄河以南和陕西等广大地区，依然在宋朝统治之下。就是河东、河北地区，金兵也只是打通一条

通往汴京的道路。河东只是失去太原等几个州；河北也仅失去真定等几个州。北方军民仍在坚守阵地、抗击金兵。

1127年5月，在抗金老将宗泽的支持下，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称皇帝（宋高宗），重建汉族封建政权。高宗赵构就是南宋王朝的第一个皇帝。宗泽和一班主张抗金的文武大臣，都盼望高宗政权能领导军民奋起抗金、收复失地，建立中兴大业。广大人民群众也希望南宋王朝能振作起来，完成抗金大业。

第三节 金国的汉化改革

一、金熙宗改制

金初，朝廷政治制度基本上是承袭女真旧制，但当金朝统治者在进入封建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地区后，女真贵族内部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就愈来愈深，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认识到学习汉族统治者的统治经验，崇儒尊孔、推行文治，对加强统治有重要意义。许多汉族儒生被女真贵族延置门下，充当贵族子弟的师傅，讲授儒家经典及史籍。金熙宗就自幼跟随辽代进士韩昉学习汉文经典，被那些旧贵族视为“汉儿”，韩昉对他后来进行改革起了很大的诱导作用。女真贵族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中原封建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也要求改变女

真旧制，早在太宗初年，当权的斜也、宗干等人就曾劝太宗改革女真旧制，采用汉官制度。但太宗在位 12 年间，基本上还是遵从太祖的既定方针，沿袭了女真旧制，没有对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熙宗完颜亶为太祖长孙，太宗在位时，本以弟完颜杲为勃极烈，充任储嗣，后完颜杲病故，宗室大臣请太宗立完颜亶为储嗣。天会十三年（公元 1135 年）正月，太宗卒，年仅 16 岁的熙宗即位，从这一年起，熙宗就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废除了女真旧制，建立起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

熙宗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废除金初的勃极烈制度，而以三省制度取而代之。金初朝廷的中枢机构，是在皇帝之下，由出身宗室近亲、地位显赫并具有终身职务的数名勃极烈组成的勃极烈会议，它是带有氏族制残余的贵族议事机构，皇帝就依赖这个机构来议决国家大事。勃极烈贵族会议的职能十分有限，而且任勃极烈的宗室大臣职守也没有明确的分工，这样就势必造成国家机器的无秩序和低效率。在勃极烈制度之下，国家大事更多地取决于参加勃极烈会议的宗室勋贵的共同意见，而皇帝的私意有时是起不了决定作用的。这样的状况同君主专制统治是不相适应的，因而统治者要对它加以改变。还在太宗在位的最后一年，就颁布了“初改定制度”的诏书，准备对原有的勃极烈制度加以废除，建立新的朝廷中枢机构，诏书颁布之后，虽然到太宗去世时，三省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但这个方案正在积极地付诸实施。太宗专门把知云中枢密院事韩企先调入朝廷，让他参与制定新制度的工作，

而韩来到朝廷后就被授予了尚书右丞相的职务，这也表明新尚书省的机构在太宗死前就已在筹建之中。

天会十三年（1135年）正月熙宗即位以后，首先在中央建立了三省六部等机构，新的官僚制度主要是采用辽、宋官制，并兼采唐制而形成的。在皇帝之下设立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位高而无实权，专以安置位尊权重的大臣，熙宗任命国论忽鲁勃极烈宗盘为太师，国论左勃极烈宗干为太傅，国论右勃极烈宗翰为太保，在三省之上设置领三省事一职，以三师并领三省事，而实际上这一职位也是形同虚设的。熙宗通过这样的改革，首先把军权和行政权分开，授予宗翰等势力最大的军事贵族以最高行政职务，剥夺了他们的军权，并规定以后各地的军事统帅均不得随意从州郡签军，军权收归中央的都元帅府，大大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

在官制改革所建立的三省制度中，以尚书省为新的行政中枢机构，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均由尚书省官员兼任，其中门下侍中由尚书左丞相兼，中书令为尚书右丞相兼。尚书省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其下设左、右丞相（号宰相）及左、右丞（号执政官，即宰相之副手）。三省六部的建立，彻底摧毁了旧的体制，促进了整个官制改革的进行。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一日，朝廷正式颁行新官制及换官格，史称“天眷新制”。颁行新官制时，在尚书省增设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其地位分别在左右丞相和左右丞之下，为宰相和执政官的助手。从熙宗即位以来至新官制的颁行时止，新建的中央机构除三省六部外，还有御史台、宣徽院、翰林院、国史院、殿前都点检司、太常寺、秘书省等。此外，在官吏的选举、考

核、俸禄等方面，也都进行了改革。所谓换官格，就是将原来女真和辽、宋的旧官职，按照新定的官制进行统一换授的规定。同年十月，又正式制定了封国、封爵制度。新的官僚制度至此基本上得以完善。

官制改革大大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提高了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旧有的勃极烈制度实行的是终身制，而新的官制规定官员任期为 25 个月，实际上尚书省的宰执常常由皇帝随时任免。新的官僚机构分工明确，直接对皇帝负责，完全成为皇帝实现其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熙宗以后直至金朝亡国，这套官僚制度基本上没有改革，成为金代的定制。

新官制颁布以后，熙宗又开始对朝廷礼仪制度进行改革。金朝初年，朝廷上下保留着一种较为淳朴的风尚，君臣之间不甚注重礼仪，尊卑界限还不是十分严格，这种状况对皇帝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不利的。天眷二年（1139 年）三月，熙宗命百官详仪制，开始这个方面的改革。前后七八年间，熙宗在宗庙、社稷、祭祀、尊号、谥法、朝参、车服、仪卫及宫禁制度等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建设，制定了周密详尽的礼仪制度。新的礼仪制度处处表现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例如金初君臣朝见皇上本无什么具体的规定和限制，但熙宗制定朝参礼仪后，规定每月以六天为朝参日，后来以朔望日为朝参，余下为常朝，而且朝参及常朝都要遵照复杂的仪式行礼，然后方可奏事。有了这些礼仪规定之后，臣下要见皇帝的面就十分不易了，皇帝的威严得到了充分的维护。

君位继承方式的改革，也是熙宗改革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女真的传统继承方式是兄终弟及，从金六代祖乌古

乃以下，酋长职位都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在家族内承袭的，太祖死后，也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吴乞买。太宗在位时，仍立弟弟完颜杲为储嗣，后因完颜杲早死，才把皇位传给太祖的嫡长孙熙宗。熙宗对这种君位继承的传统方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皇统二年（1142年）三月，熙宗立自己的亲子济安为皇太子，确立了父子相传的皇位世袭权，这一改革对皇权的加强具有重要意义。

金熙宗时期政治制度的改革，对金朝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金代的各种制度大多在此时形成了它的基本面貌。同时，熙宗的改革对金朝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海陵王改革

海陵王完颜亮，本名迪古乃，是金太祖庶长子宗干的第二子，他对宗干的养子熙宗立为皇帝心怀不满，对于皇位素存觊觎之心。熙宗在位后期无所作为，悼平皇后干政使他变得猜忌多疑，常常借酒浇愁，酒后妄杀无辜，以此尽失人心、非常孤立。海陵王伺机纠合朝廷大臣及宫中近侍，于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九日谋杀熙宗，自立为帝，改元天德。

海陵王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帝位，开了金朝弑君的先例，他担心皇位的得来名不正言不顺，更害怕别人也仿效他的做法，于是即位后就大开杀戒，把所有他认为有可能威胁他地位的人统统除掉，与他一起发动宫廷政变的同谋者完颜秉德、康括辩、宗懿等首先被他杀掉，但他杀得最多的还是对他威胁

最大的宗室贵族：宗翰子孙 30 余人、太宗子孙 70 余人、太祖弟斜也子孙 100 余人全都被他杀绝，此外他还杀了宗室疏族 50 余人。海陵王残暴嗜杀，使后代修史者对他持一种完全批判的态度。

和熙宗的情况相似，海陵王也是一个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的女真君主，他自幼读经史、能诗文，主张女真汉化，因此在施政方针上他和熙宗是一脉相承的。在用人方面，海陵王和前代君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大量任用汉人、契丹人和渤海人。汉人如刘筈、刘萼、张中孚、刘磷、张通古、蔡松年、张晖等都被他任为宰执，渤海人如大臭、张浩甚至还被任为三师和尚书令。海陵王在大杀女真贵族的同时，更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人才加入中央最高统治机构。这种做法对于促进女真的汉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海陵王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金朝的政治、经济制度做了进一步改革，巩固和发展了熙宗开始的女真族的汉化和封建化进程。

海陵王即位的次年，就废除了行台尚书省的设置，把原汴京行台尚书省所辖的河南、山东之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政令统一于朝廷，这显然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同年，废除都元帅府，改置枢密院主管军事，枢密院须受尚书省节制，其权力较之都元帅府大大缩小了。与此同时，海陵王还对军制进行了若干改革，熙宗时曾把猛安谋克分为上中下三等，以宗室为上等。海陵王取消了猛安谋克的等次，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宗室猛安谋克的地位，他还诏令罢废女真贵族世袭的万户之职，以限制宗室显宦的权力。

海陵王在位期间采取的一项最重要的改革措施是迁都燕京。金朝原来的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子）是女真族开肇基业的旧地，而此时的金朝，已是一个疆域南至淮河，地跨长城南北，拥有北方广大地区的大王朝，仍以女真故地作为这个王朝的统治中心显然是不适宜的。海陵王在镇压了女真旧势力之后，就颁布了求言诏，自内外公卿大夫至平民百姓，均可上书建策，于是有许多人上书建议：上京远在一隅，作为都城多有不便，以迁都燕京（今北京）为宜。当时朝中许多女真旧贵族都对这一动议表示反对，他们说上京有一股“旺气”支撑着国家长盛不衰，况且这里是女真族的根基所在，怎么可以离弃？海陵王不理睬这种种非议，最后采纳了迁都的建议，遂于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五日下午下诏迁都，并命令尚书右丞张浩主持修建燕京都城。上京现有的都城十分简陋，不合海陵王之意，张浩仿汉人都城宫室制度修建新都，宫殿九重，内外三十六殿，楼阁倍之，皇帝居中，皇后居后，内省在东、妃嫔在西。新都三年完工，海陵王遂于天德五年（1153年）三月二十六日正式迁都燕京，因谓“燕”为列国名号，于是改为中都，同时又改汴京为南京、辽中京大定府为北京。加上辽阳府的东京和大同府的西京，至此五京之制乃备。都城南迁之后，金朝的政治中心由女真故地移到了中原汉人居住的地区，这不仅有利于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直接统治，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地区的生产、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对金朝的发展，特别是对女真族的汉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为了彻底断绝女真贵族的旧土之恋，海陵王迁都后就都在中都附近的大房山营建山陵，把太祖、太宗的棺

榑由上京迁到这里安葬、祭祀，同时又把女真贵族大批南迁，他甚至还下令全部毁掉会宁府的旧宫殿和诸大族宅第，把整个旧都完全夷为平地，在上面耕种庄稼。这些措施表明了海陵王同女真旧制决裂的决心。

海陵王在熙宗改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中央官制作了较大的改革和调整，以利于皇权的加强。正隆元年（1156年），海陵王颁行“正隆官制”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只保存尚书省作为唯一的朝廷中枢机构，自尚书省以下，朝廷各种官僚机构分为院、台、府、司、寺、监、局、署、所，并且规定了每个官僚机构、每个职位的定员，明确了职守，提高了效率。自此以后直至金末，中书和门下二省未再恢复，各个官僚机构之内所设职位也再没有大的变动。

金代的科举制度也是在海陵王时期逐步正规和完善起来的。首先是考试程序的健全，金初科举考试的程序极为简单，甚至有只经一次考试就录为进士的，至太宗后期才有乡、府、省三级考试，海陵王即位后始确立殿试制度。此外熙宗时府试地点只有燕京、云中、汴京三处，海陵王时为了适应科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将府试之地确定为大兴、会宁、大同、东平、开封、河中六处。科举考试科目在金初是南北有异的，即北人应词赋，南人应经义，因此称为南北选，熙宗时期过渡到南北选各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只是还保存南北士人分别考试的旧规，到了海陵王时期才改南北选为南北通选，即将原来的南北分考改为全国统考，又罢去经义科，专以词赋取士。科举考试的年限在金初没有任何规定，有3年、5年开考一次的，也有年年都考的，甚至还有1年之内开考两次的，

完全随需要而定，随意性很强，熙宗时才大致形成 3 年一考，但仍不严格，没有定出制度。海陵王时正式规定了 3 年一试的制度，此后直到金末未加改变。

海陵王时期的诸多改革措施，为金朝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海陵王后来南侵失败被杀，不免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但在他之后金朝却进入了它的极盛阶段。

第四章

宋金对峙时期

第一节 宋室南迁时的抗金斗争

金军撤离汴京之前，册立了原北宋宰相张邦昌（1081—1127）为“楚帝”，企图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女真贵族的傀儡政权。金兵一退，张邦昌遭到宋廷旧臣与开封军民的唾弃，被迫退位。这时，宋徽宗的近属被金军掳掠殆尽，只有活动在河北地区、刚刚担任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康王赵构（1107—1187）幸免于难。1127年5月1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被拥戴即位，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改元建炎，是即宋高宗。

高宗赵构即位之初，为组织起一个初具规模的政府，以具备能够与金国对抗的气势，起用深孚众望的抗战派代表人物李纲为相。李纲力倡“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他主张把各地抗击入侵金军的忠义民兵组织起来，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他推荐宗泽（1060—1128）任东京留守，张所任河北西路招抚使，王玠、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并且提出改革军制、整顿军纪、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议，部署收复河东、河北失地。

宗泽等人立即赴任，招募战士，修造兵器并与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取得了密切联系。前此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农民起义军，鉴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也转而与宗泽等人联合，共同抗击金军。

这些措施，对于日后的抗金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所部将王彦（1090—1139），后来曾经率部在共城（今河南辉县）抗金，部属都在面部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以表示奋战到底的决心。这支军队此后即以“八字军”著称，骁勇善战。两河民兵山寨绵亘，金鼓相闻。河东地区的红巾军、河北的五马山寨义军，屡败金军，力量迅速扩展。

面对逐步发展的抗金形势，高宗赵构及其倚信的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却只想用割让土地、缴纳岁币的办法，乞求金人不再进军，而决不敢积极组织民众以武力抵御入侵者，对于抗金的谋划，他们百般阻挠、破坏。从宋政权重建之日起，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在如何对待金人的问题上，即展开了主战、主和两种主张、两派人物的尖锐斗争。

李纲任相仅75天，即被罢免。他在相位期间的全部措施，也都随之废除了。上书言事、力主抗金的太学生陈东、欧阳澈亦被杀害。同年十月，前线并无警急，高宗与汪、黄等却自动放弃应天府，把“行在”迁往扬州。他们不打算收复河北、河东之地，就连整个黄河流域也弃置不顾了。这伙人惧怕民众的力量，而寄希望于通过降服于女真族，换取自身对

于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只有在欲投降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暂时对女真南侵军进行抵御。

1128 年秋至次年春，金军又发动攻势，前锋直指扬州。高宗仓皇逃往江南，驻跸杭州（数年后改名临安府），以为行在。金帅完颜宗弼（兀术）率大军渡江，占领建康府（今南京），高宗自杭州出奔，漂流海上。金军追至明州（今浙江宁波），沿途遭受南宋军民不断袭击，遂于 1130 年春在大肆掳掠后北撤。韩世忠（1089—1151）在黄天荡拦截金军，相持 40 天后，金军靠火攻才得以撤归。随后，岳飞（1103—1142）率部克复建康。金军退至长江以北，继而在缩头湖败于张荣义军，被迫放了淮东。江淮地区暂时稳定下来。金人深以此次南下后北撤被阻为教训，对于渡江与擅长水战的宋军交手，一直心存戒忌。

在西北战场上，张浚（1097—1164）所组织集中大兵团主动出击的富平之战惨遭失败；而吴玠（1093—1139）、吴玠（1102—1167）在和尚原、仙人关奋力激战，大败金军。金军退守凤翔，暂时不敢窥伺四川。这一系列战事，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大批主力金军被调往西北，从而解除了金军对宋廷的直接威胁，为南宋政权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在建炎年间（1127—1130），宋高宗赵构始终处于要向金人投降而不可得的情况之下。而南宋政府的军队和各地忠义民兵，却是人自为战、军自为战，与南犯金军进行周旋。在几年的鏖战过程中，虽屡受挫折，却也锻炼出了几支劲旅。经过抗金将士四、五年的艰苦奋战，绍兴初年，南宋统治得以稳定下来，宋金对峙的局面初步形成。

第二节 战争与 妥协交替的宋金对峙时期

一、仙人关之战

北宋灭亡后，金朝为进一步夺取中原及陕西等地，于南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年）开始，至建炎四年，先后三次南下，向南宋大举进攻。金统治者对南宋的全面进攻未能达到灭亡南宋的预期目的，便改变战略部署，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集中力量进攻川陕，企图控制长江上游，为从西北迂回包围南宋创造条件。金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陕西方面发动了数次大规模进攻。富平之战，宋军损失惨重，陕西落入金军手中，宋军在西北战场陷入困难境地，只得退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等州，凭险设防，以阻金军入川。绍兴二年冬，宋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吴玠，鉴于和尚原距后方路途遥远，恐粮运不继，难以久守，便以其弟吴玠驻守和尚原，自己率守军主力退屯仙人关，并在仙人关右依山据险筑垒，特称之谓“杀金坪”，与仙人关互为依托，控扼入蜀隘口。翌年冬，金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率军攻占和尚原，吴玠引军退屯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南）。吴玠为实施纵深防御，又于“杀金坪”后边险峻之处设置第2道防线。

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二月，金将完颜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撒离喝）、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宝鸡等地，集结步骑10余万，进攻仙人关，决心破关入蜀。二十一日，金军自仙人关以北铁山凿崖开道，循岭东下进至“杀金坪”，扎营40余座与宋军对垒。吴玠闻讯，率部自七方关（今甘肃康县东北）入援，转战7昼夜，突破重围与吴玠军会师。二十七日，金军开始进攻，吴玠军以万人据险抗击，经反复激战，将金军击退。二十九日，金军立炮数十座攻击宋军，吴玠命将士以弓矢，炮石并力捍御。翌日，完颜宗弼命金军架了300余座云梯猛攻宋军营垒，宋军则以炮石、撞竿击毁其云梯，以长枪刺杀金军。宗弼久攻不下，遂将全军分为二阵，自率精兵阵于东，命骁将韩常阵于西，轮番进击企图夹攻宋军。吴玠命吴玠等率军于金军两阵之间往复冲杀，在大量杀伤金军之后，因宋军久战疲惫，乃退守第二道防线。金军接踵而至，人披重甲、铁钩相连，前仆后继，鱼贯而上。宋军依托险隘坚垒，以劲弓强弩轮番发射，打退金军多次进攻。三月初一，完颜杲集兵攻宋军营垒西北楼，并焚烧楼柱。吴玠命部将杨政等督励部下持长刀、大斧，左右冲杀，将其击退，是夜，吴玠乘金军久战兵疲，实施反击，宋军在四面山上点燃火把，鼓震天地，又以王喜、王武等将率精锐，分二队冲入金营。金大将韩常中箭左目受伤，金军惊溃，死伤数以万计。初二，金军企图改道由七方关、白水关（今徽县西南）入川，吴玠暗遣精兵迂回至金军寨后，袭破宗弼及完颜杲大寨，金军死伤万余，连夜逃走。吴玠又命部将王俊率军疾驰至河池（今徽县）设伏，

扼其归路，斩俘千余人。宋军乘金军溃退之势，挥师追袭，迫使金军退回凤翔府。自此以后，金军暂时放弃了进入四川的企图。吴玠乘胜于绍兴四年四月收复了凤州（今陕西凤县）、秦州、陇州。南宋川陕的防务趋于巩固，金军的重点进攻又遭失败。

二、藕塘之战

藕塘之战是南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十月，宋军与伪齐军在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地区的遭遇战。

南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十二月，宋济南知府刘豫降金。建炎三年三月，金将挾懒以刘豫为京东、西、淮南安抚使，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兼诸路马步军都总管，节制黄河以南诸军，其子刘麟知济南府。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年）九月，在挾懒等人支持下，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大名府，建元阜昌，后迁都汴京。金划黄河以南所占地区为齐国辖地。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年）金军攻占陕西后，又将陕西划归齐国管辖。于是齐国成为金与南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自此，齐开始了与宋长达8年的战争。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年）春，金朝指使伪齐主刘豫，遣军攻占襄阳府、郢州（今湖北襄樊、钟祥）等六郡，在南宋长江防线打开缺口。五月，宋廷命岳飞率军反击，收复襄阳府等地。九月，完颜宗弼与伪齐合兵进攻西淮地区，遭岳飞、韩世忠军抗击。继闻金太宗病危，渡淮北撤。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年）初，宋廷遣军大举北伐，企图

收复中原失地。

绍兴六年八月，宋决定攻齐，宋高宗下诏亲征。岳飞遣部将牛皋攻克齐镇汝军，遣部将杨再兴攻下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张俊修筑盱眙城，进屯泗州。岳飞又攻克蔡州（今河南汝南）。岳飞率军收复陕西、河南大片失地后，进逼西京（今河南洛阳）。伪齐王刘豫闻宋高宗亲征，急向金朝乞兵，金命刘豫自行抵御，令元帅左都监完颜宗弼率军进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以作声援。刘豫为挽回败局，发兵 30 万，号称 70 万，分三路南下进攻淮西，反击宋军。其侄刘猊统领东路兵，出涡口（今安徽怀远东北），渡淮攻定远（今属安徽）；其子刘麟统领中路兵，由寿春（今安徽寿县）攻庐州（今合肥）；孔彦舟统领西路兵，由光州（今河南潢川），攻六安（今安徽六安）。南宋右相张浚闻伪齐军南下，急遣主管殿前司公事杨沂中率部赴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会合江东宣抚使张俊军，共同阻遏金军。十月初四，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遣将于霍丘（今属安徽）、正阳（霍丘东北）一带击退伪齐中路军，遏制了刘麟军攻势。初八，刘猊率东路军数万越过定远县，企图经宣化（今江苏江浦东北），直趋建康（今南京）。其前锋进至越家坊（今定远东南），被杨沂中军击退，遂即转向庐州，企图与刘麟合兵。初九，进至藕塘镇时，与杨沂中军遭遇。刘猊军倚山据险，列阵发矢。杨沂中命摧锋军统制吴锡率 5000 骑，从正面攻击其阵，乘刘猊军阵乱之势，率大军攻其翼侧，短兵相接，大声鼓噪，以壮声势。张俊军前军统制张宗颜等自泗州来援，两军合力夹击，大败伪齐军。刘猊仅领数骑遁去，其谋主李谔与部将数十人被俘，降者万余。宋

军缴获伪齐军舟船数百艘，车数千辆。刘麟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孔彦舟于光州，闻知刘猊军败讯，皆退军北遁。齐军的此次攻宋，遂告结束。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十一月，金帅挾懒、完颜宗弼入汴京，执刘豫父子，废刘豫为蜀王。齐政权在维持8年后宣告灭亡。废黜伪齐政权后，挾懒、完颜宗弼加紧向宋高宗诱降。

如此一来，宋高宗又看到了议和的希望。在此之前他便重新起用被罢相不久的秦桧为枢密使，并免去主战派宰相张浚之职。金国内部的主和派头目又捎信给高宗，表示愿意归还徽宗的灵柩与皇太后，以及河南诸州。宋高宗闻讯大喜过望。更加坚定了议和的决心。议和自然要倚重与金国有特殊“渠道”的秦桧，他向高宗说：陛下要想议和，单独与我商议就可以了，不要群臣参杂干预，那么事情一定会办成。于是，在1138年3月，秦桧被任命为宰相兼枢密使，军政大权全部落在他一人手中。秦桧的再度复相，使投降势力成为南宋朝廷中的主导力量，影响甚大。特别是抗金事业开始出现波折，致使终宋之世，“国家一统之业……裂而不复合”。朝廷中虽然也有许多大臣反对议和，但高宗无论如何是听不进去的。1139年正月元旦，南宋朝廷正式宣告宋金议和达成，宋帝向金称臣，并且每年向金贡献银25万两，绢25万匹。这是一个屈辱的条约，宋高宗不但不引以为耻，反而心安理得、自鸣得意。李纲、张浚、韩世忠、岳飞、胡铨等主战派人物纷纷上书反对，朝野群情激愤。南宋朝廷内主和派与主战派的矛盾开始升温。

三、顺昌之战

绍兴九年（1139年）秋，金朝宗弼等发动政变，杀死曾主持与南宋议和的大臣挾懒等人。兀术领行台尚书省、都元帅，兼掌军政大权。接着，宗弼撕毁和约，于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出动大军，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他令撒离喝进入陕西、孔彦舟取开封、王伯龙攻陈州、李成下洛阳，自己则率主力直奔亳州、顺昌府，打算渡淮南侵。

五月中旬，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着八字军和殿司卒3万余人，在前往开封的赴任途中，由水路到达顺昌（今安徽阜阳）。这时传来了金军已占领东京开封，其前锋距顺昌只有300里的消息。刘锜与知顺昌府陈规商定坚守此城，他给将士们分析形势，力陈防守顺昌的意义，坚定了大家固守顺昌的决心。他组织修筑城防工事，还下令凿沉船只，以示决不逃跑，将与该城共存亡。战士们纷纷表示，平时人家欺负我们八字军，今天我们要为国家杀敌立功。全军上下，战斗热情非常高涨，“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剑”，准备迎击来犯金军。

五月二十五日，金将中韩常和翟将军的兵马率先到达顺昌城外，在城北30里的白沙龙涡一带下寨，其游骑数十名则涉过颍河，出没于顺昌城下。刘锜设下埋伏，活捉了2名游骑，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韩、翟两军的情况，遂于二十五日夜，派遣千余名战士袭击敌营，取得杀伤金兵数百人的胜利。

二十九日，金军龙虎大王和三路都统葛王褒率众3万余

人来到顺昌城下，将顺昌城四面包围起来。刘锜大开城门，派兵从四门出击，并令城上的守军与他们配合作战。宋军用神臂弓和强弩逼退敌人，然后乘胜追击，许多金兵溺死在河中。是役，杀伤金兵数千人。夜里，刘锜又派勇将阎充带着 500 壮士前往斫营，那天晚上，天将下雨而闪电不绝，宋兵借助闪电光，杀死许多金兵。第二天晚上，依然是这样的天气，刘锜不失时机地再派出 100 名壮士去斫营。闪电一亮，壮士们就奋力杀敌，黑暗时，大家就伏着不动，金兵不知虚实，乱成一团，互相攻杀而死伤无数。金军士气大伤。

六月初七日，宗弼亲率大队金军赶到。在顺昌城下，他看见城垣低小，便一面大骂众将无用，一面以轻蔑的口吻说：“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并下令道：破城之后，城中成年男子，统统杀掉，子女、玉帛，任便掳掠。

初九日凌晨，宗弼统领大军来攻打顺昌城。金军“甲兵铁骑 10 多万，陈列行布，屹若山壁”，将顺昌城围得水泄不通。宗弼身穿战袍，骑着战马，亲自在敌阵中回环指挥。时方盛夏，刘锜军早晨凉爽时重在防守，中午过后，当身穿铁甲、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的金军酷热难熬、力疲气衰时，突然出击，猛攻敌人。刘锜还令人在颖河上游和城外草中，撒下了毒药，嘱咐部下，无论如何不要去喝河中水。金军人马又饥又渴，不知底细，喝了水，吃了草，中毒的很多，使金军的战斗力遭到削弱。刘锜的军队只有 1.8 万多人，比金兵的人数少得多，刘锜把一部分兵力分布在城上，另外的将士则每 5000 人分为一支，令其轮番出城作战，轮换休息就餐。

宋军以逸待劳，在战斗中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宋军在战场上集中打击的重点，是金军的左右翼骑兵，以及宗弼的铁兜重甲的亲卫军，这些，都是金军的精锐部队。宋军将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他们用长枪挑去敌人的铁兜，刀砍斧劈，使敌人断臂碎首，有的战士甚至徒手把敌人从马上拉摔下来。统制官赵樽、韩直，身受重创，仍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有的战士在战斗不利的情况下，抱住金兵滚入河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这场战斗，杀死金兵 5000 余人，杀伤 1 万余人，使得“兀术平日所恃以为强者，十损七八”。金军大败后，退到城西扎营，企图坐困宋军。恰逢天下大雨，平地积水一尺多深，刘锜不断地派兵来劫营，金兵人心惶惶，日夜不得安宁。宗弼迫不得已，于六月十二日率军狼狈地撤离顺昌，抛弃的车辆旗帜器械甲仗，堆积如山。

顺昌战役，宋军以少胜多击败金军主力，震动了金朝，大灭了金军的嚣张气焰，挡住了金军自两淮南侵的矛头。

四、郾城、颍昌 之战与宋王室自毁长城

顺昌之战后，金都元帅完颜宗弼率军退回东京（今河南开封）。南宋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亲率大军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出发，准备乘胜收复中原。岳飞命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将分别经略河南诸州郡，又命梁兴、董荣等将潜渡黄河，联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兵，夺取西河州县，袭扰金

军后方。北征先头部队连连告捷。绍兴十年闰六月二十日，岳家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法，先后收复颍昌、陈州（今河南淮阳）、郑州、洛阳等重镇，切断金军东西联系，对东京金军形成威逼之势。完颜宗弼为了扭转局势，利用宋军分兵攻占州县、宋淮南东路之张俊、王德军已由亳州（今属安徽）退回庐州（今合肥）、岳家军孤军深入之机，亲率昭武大将军韩常、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等部 1.5 万精骑，奔袭岳飞宣抚司驻地郾城，企图一举摧毁岳家军的统帅机构，打破岳飞反攻计划。七月初八，金军进至郾城北面 20 里处列阵。当时，岳飞已将重兵派驻颍昌府城，其他部将也率兵分路与敌作战，留在郾城的宋军人数很少。岳飞探明了金军情况，知道来军是完颜宗弼精锐部队，便针对金军作战特点，令其儿子岳云率背嵬（背嵬一词为西夏语，意为亲随、骁勇。绍兴二年，韩世忠创背嵬军，后成为南宋许多将领设置的亲军的名称）、游奕马军与金骑鏖战。骁将杨再兴为生擒宗弼单骑突进，击杀金军近百人，多处受伤，仍拼死力战。正当两军激战之时，岳飞亲率 40 骑驰入阵中，射杀金军多人。岳家军士气倍增、奋勇杀敌。完颜宗弼见势难以取胜，遂将头戴铁盔、身披重甲的“铁浮图”和号称“拐子马”的精骑投入交战。“铁浮图”一字排阵，从正面推进；“拐子马”自两翼迂回包抄，对岳家军形成很大威胁。岳飞灵机应变，待金军进至阵前，令步卒持麻扎刀、提刀、大斧入阵，专砍马足，“铁浮图”大乱。同时令背嵬、游奕马军专门对付金军的“拐子马”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忽攻其前、忽击其侧，致金军于被动。岳家军步骑密切配合，从午后战到天黑，鏖战数十

回合，金军伤亡惨重。完颜宗弼率余部仓惶溃逃。

郾城之战后，完颜宗弼不甘失败，为扭转危局，率军攻取郾城与颍昌之间的临颖（今属河南），企图切断南宋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与部将王贵军的联系，尔后各个击破。岳飞识破金军企图，料其必攻颍昌，遂重新调整部署，遣其子岳云率部分背嵬军绕道驰援颍昌；同时令统制张宪率背嵬、游奕等军向临颖挺进，寻求与金军主力决战。七月十三日，岳飞军部将杨再兴率 300 骑兵，到临颖以南的小商桥侦察军情，与金军遭遇，击杀金军 2000 余人，后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完颜宗弼为了避免与张宪军决战，遂将各路金军集结一起，除留部分兵力守临颖外，亲自率主力北攻颍昌。十四日，张宪进攻临颖，击溃金军，收复临颖县城。同时，完颜宗弼率昭武大将军韩常等部，以 3 万余骑兵列于颍昌城西，以 10 万步兵列于舞阳桥以南，连阵 10 余里。驻守颍昌的宋军有 3 万，由王贵、董先、岳云、胡清等统领，是岳家军的主力部队。王贵将守城任务交给董先、胡清，自己统帅中军和游奕军，会同岳云率领的背嵬军，出城迎击金军。宋军以岳云的 800 骑兵居中，正面冲击，猛冲金军步兵；又以步兵为左右翼，攻击金两翼骑兵。岳云身先士卒，先后出入金阵 10 余次，裹伤奋战。从早晨战到中午，血战几十回合，双方胜负难分。负责守城的董先、胡清二人见状，立即率军出城增援。顿时，宋军士气倍增。董先、胡清与王贵、岳云合兵奋击，战局迅速扭转。激战中，宋军杀死完颜宗弼女婿统军上将夏金吾及副统军粘罕索孛董，还先后杀死金千户 5 人，大小首领 78 人，歼灭金军 5000 余人，俘获金军 2000 余人，战马 3000 余匹。

完颜宗弼退回东京。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东京仅 45 里的朱仙镇。完颜宗弼集结 10 万金兵迎战。岳飞一面同金军对阵，一面派兵向黄河渡口进逼，侧击金军。

郾城、颍昌之役，宋军大获全胜。金兵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踌躇满志，决定向朱仙镇进军。看来收复旧都，已是指日可待。想到这，岳飞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流泪了，盼了多少年，就是盼这一天的到来。他抑止不住满怀的豪情，劝勉部下说：“直捣黄龙府，与君痛饮耳！”就在岳家军进军朱仙镇的同时，从“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杭州凤凰山宫廷中接连发出下令撤军的十二道金牌，令岳家军即刻班师回朝。这些红漆金字的木牌都是由宋高宗亲自签发，以快马加鞭的速度，驰送至岳飞手中。

主战派及广大抗金义军在前线取得的节节胜利，对心存苟安思想的宋高宗、秦桧等主和派来说并非是个好消息，因为自偏安一隅以来，他们从不以恢复中原，兴复宋室为己任，一天所想的只是小富即安。宋高宗自做皇帝以来，他尝到的都是失败的滋味，从建康到扬州到杭州，一路上如同丧家之犬，至今仍惊魂未定、记忆犹新。稍有小胜，他想的不是乘胜追击，而是以这点胜利的成果作为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此外，宋高宗还没有忘记自北宋开国以来历代皇帝都采取严厉的措施防范武将擅权，以免其拥兵自重、尾大不掉，重蹈唐末五代地方藩镇割据的覆辙。岳飞当时是众望所归，而且拥有精兵良将，如果让岳飞打过黄河，那后果是宋高宗所不敢想的。另外，如果岳飞直抵燕京、迎归钦宗，高宗更怕自己的位子就要让出了。善于揣摩主子心思的秦桧很快就摸准

了宋高宗的心病，而且他自己所得到的一切荣华富贵可能也会付诸东流。一开始秦桧唆使高宗让岳家军孤军深入，以借金兵之手除掉自己的心腹之患。但可惜事与愿违，岳家军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仍然将金兵打得大败。秦桧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好让高宗迫使岳飞退兵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岳飞实在不愿功亏一篑。经过自己10余年的惨淡经营，眼看胜利在望，然而这无言的十二道金牌有多少分量，他心里清楚得很。他不禁仰天长叹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班师南回后，业已收复的故土又尽落于金人之手。

举兵南征的金兀术几经挫败，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准备与南宋讲和。这对于宋高宗是求之不得，于是，一股议和的声浪便在朝廷中波及开来。为了使议和顺利达成，就必须除掉那些挡在“和平”道路上的抗金派将领。那些反对议和的文官还好办，他们手无寸铁，一道圣旨就可以把他们通通赶出朝廷、远贬他乡。而武将，特别是岳飞、韩世忠这些身拥重兵的人就不是那么容易对付了。为此，宋高宗与秦桧等人还处心积虑地谋划了一阵，第一步先是剥夺这些武将的兵权。这样，既可以向金人表白议和的决心，又可以预防这些武将将来拥兵自重、不服管束。

1141年4月，宋高宗密诏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入朝，论功行赏。在丝歌管弦的悠扬声中，宋高宗当场提升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且规定这三人自任命之日起在枢密府办公，不再返回各自的宣抚司领兵。北宋开国初年，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伎俩在他后代的身上又重

演了一次。没过几天，宋高宗宣布罢除宣抚司，把三大将原统帅部全部解散，把指挥权分散于偏裨诸将，彻底将三大将架空。宋高宗、秦桧的第一个阴谋已经得逞，便又设下陷阱，等着岳飞。

1141年5月，宋高宗命张俊、岳飞前往楚州，视察韩世忠的部队，搜集韩世忠的错误与缺点，目的是想让这三大将之间彼此离异反目。当岳飞看到韩世忠的部队阵容整齐、英勇雄壮，不禁暗称韩带兵有方。而妒功忌贤的张俊却认为高宗的意思，是要他与岳飞分掌韩世忠的军队。岳飞当面驳斥了张俊的不良用心，张因此而怀恨于心。回到杭州之后，张俊反咬一口，诬告岳飞。这给预谋陷害岳飞已久的秦桧提供了口实，于是，一班早已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小丑便麇集于秦桧周围，开始了陷害岳飞的勾当。

先是万俟卨发难。万俟卨乃秦桧门下一走狗，在徽宗朝时，曾任枢密院编修官。岳飞转战于两湖时，与万俟卨交往颇多，但他深知其为人阴险狡诈，因此将他冷落于一边。其后，万俟卨钻营至秦桧门下，入朝当上了监察御史。主子的指使及对岳飞的仇恨，使万俟卨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充当陷害忠良的马前卒。他捏造了岳飞的两大罪状，一是增援淮西时，违背圣旨；二是楚州之行，有意沮丧士气，要求朝廷将岳飞革职。万俟卨的胡言乱语，就连三岁的小孩都不信，然而宋高宗却出面对万俟卨的谎言加以肯定，至此，他“始有杀飞意”。

在此之前，宋高宗对岳飞还仅仅是疑忌，因为他还要用岳飞。“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到了万俟卨诬

告岳飞时，宋高宗感到有必要将这位抗金英雄除掉。1141年8月中旬，金兀术放归扣押在金国的南宋使节莫将、韩恕，并要求宋高宗派重臣到北边谈和，于是宋金和议重开，双方使者往返不绝。这时，岳飞对于宋高宗只是一块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了。当然，杀了岳飞还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并可使金兀术相信南宋议和的决心。

1141年10月13日，岳飞被逮入大理寺监狱。他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就不承认自己有罪，“不食求死”，作绝食斗争。秦桧等人忙把岳飞16岁的儿子岳雷与他关押在一起，毕竟是骨肉情深，岳飞不愿丢下家人撒手人寰。岳飞是个有功于国家，而且受百姓爱戴的一个大将，要杀死他却也不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但只要给他戴上一顶“谋反”的帽子，那么岳飞就永世不得翻身，宋高宗、秦桧等人都作如是观。于是，一场罗织岳飞“谋反”罪名的丑剧便紧锣密鼓地导演起来了。

他们找到了王贵、王俊。这两人先前都在岳家军里效力，后因怯战或行为不轨，受岳飞责罚，他们因此对岳飞心怀不满。王俊的诉状漏洞百出、前后矛盾，但秦桧只要有白纸黑字就行了。他先将岳飞手下得力干将张宪捉拿归案。张宪在重刑之下，没有屈打成招，他们只好再一次捏造张宪口供，称岳飞有“谋反”之迹象。宋高宗明知是假，但他已顾不得许多了，下令大理寺设立审查岳飞的专案机构，彻底进行追究。

审理岳飞案件的有主审御史中丞何铸及大理寺卿周三畏、右谏议大夫万俟卨、侍御史罗汝楫等人。何铸也出自秦桧门下，并弹劾过岳飞。当他盘问岳飞是否与张宪通书谋反

时，岳飞撩起衣服，露出脊背，只见上面“精忠报国”四个大字深入肌肤。何铸见此，也不由肃然起敬。在审讯过程中，何铸发现很多疑点，而且原告没有出示任何物证。仅凭王贵、王俊的一面之词是难以定案的，他认为岳飞无罪。秦桧听完何铸的汇报，不禁放下脸来，称给岳飞戴上“谋反”的罪名是宋高宗的主意。何铸还算正直，不愿奉命，还表示强敌当前，无故杀戮一员大将，使众心涣散、误国误民。秦桧不料门生竟如此顶撞，气急败坏，连忙改命万俟卨为主审。万俟卨心狠手辣，对岳家父子及张宪施以毒刑严打，试图让三人开口认罪，但也没能达到目的。在此情况下，万俟卨只好捏造材料，说岳飞曾令王贵假造金军入侵的军情上报，而且岳飞也写信给王贵，要他谋划其事。岳飞当堂要万俟卨拿出物证，万谎称王贵当时已将物证焚烧。快一个月了，万俟卨虽费尽心机，仍不能让“谋反”这顶帽子戴在岳飞头上，搞不到定案的供词。

岳飞一案牵动了朝野上下，一个住在南剑州的读书人——范澄之，挺身而出，上书指斥宋高宗、秦桧为向金人献媚达成协议和的目的，一手操纵这个冤案。革职还乡的韩世忠也去找秦桧，当面质问他岳飞到底有啥罪，秦桧只是含糊其词地回答：“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大部分军民眼看岳飞身陷牢狱，但惮于皇帝的威严，秦桧之流的跋扈，也就敢怒不敢言了。

年底，秦桧亲自下令以岳飞增援淮西时违抗圣旨的罪名，重新审问岳飞。秦桧派万俟卨立即派人抄没岳家，搜走高宗给岳飞的全部诏书，使岳飞无以自辩；然后，又令大理寺评

事官元龟年将岳家军西行日期胡乱进行编排，因此“临军征讨，误期三日，律当斩”这一条罪名就硬凑成了。王俊又被拉来告发岳飞说过“反话”，在威逼利诱之下，几个人又充为假证。又有人告发岳飞，说他曾说“宋太祖三十岁就是节度使了”。岳飞的原话是“我三十二岁建节，自古少有”。这样被恶意地篡改，岳飞就被说成他是有意比附宋太宗。于是，他又犯有大逆不道罪。经过深文周纳，张冠李戴，岳飞的罪名就定下来了。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提出判岳飞两年徒刑，周三畏当即批准。然而万俟卨欲置岳飞于死地，对大理寺的判决十分恼火，一脚踢开周三畏、李若朴等人，自行修改了判决书。绍兴十一年十一月，秦桧收到了万俟卨的“杰作”，在岳飞“不伏”、缺乏物证的情况下，竟以所谓旁证判定岳飞两大罪状：一，据旁证称，岳飞曾说自己与宋太祖一样30岁就封节度使，构成触犯皇上，大逆不道的谋反罪，按律当斩；二，金兵侵犯淮西时，高宗曾给岳飞十三道诏命，但岳飞没有立马行动，犯有“拥兵逗留”罪，按律当斩。高宗收到秦桧、万俟卨炮制的“岳飞断案”后，就当即批复：“岳飞特赐死”。

1142年1月27日，时为绍兴十一年除夕，岳飞、岳云、张宪等人惨遭毒手。岳飞于临刑前，在狱案上挥笔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遇害时，这位抗金英雄年仅39岁。

自此，南宋的政治、军事开始发生大的转折。威震四方的岳家军被张俊的女婿田师中掌管。田师中毒死猛将牛皋，还遣散效忠于岳飞的将领，昔日精兵上万，猛将如云的岳家军

在田师中的手中还不到一年就变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其他抗金力量也受到排挤和打击。以宋高宗为首的议和派终于自毁抗金长城。除此之外，那些敢于言战、反对议和的文武官员几乎被赶尽杀绝，再也没有人提起北伐中原、恢复故土的事了。朝廷成了议和派，实际也就是投降派的天下。秦桧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高宗还封他为魏国公、加太师衔。最为卖力的万俟卨也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就是副相。卖友求荣的张俊被封为益国公，死后还被宋高宗破例进封为王。这样，宋高宗便可高枕无忧了。从此，南北分裂的局面基本形成。

五、采石之战

南宋政权建立后，宋高宗面对金军的多次入侵，采取了力求议和的态度，甚至不惜以解除张浚、韩世忠、刘锜等主战派兵权，杀害岳飞、张宪等抗金名将来求得金王朝谅解，以保黄河以南的半壁江山。但金军从未放弃对南宋的进攻。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金在多次激战之后，南宋政权和金国签定了丧权、割地、纳贡的屈辱和约《绍兴和议》。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两国领土东以淮河，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为界，淮河上的唐、邓2州及西方的商、秦2州的一半割给金国。此后，双方在力量相当的情况下，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的局面。金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金发生政变。金太祖之孙平章政事海陵王完颜亮杀死金熙宗，自立为帝。完颜

亮受汉文化影响很深，自登基之初，就打算有朝一日南侵江南，进而统一海内，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主宰全中国的正统皇帝。正隆四年（1159年）冬，他派遣翰林侍讲学士施宜生为贺宋正旦使，并派一名画工冒充施的随从人员去临安，回朝后画工将所绘临安图献给完颜亮，完颜亮命人裱为画屏，并题诗其上云：“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这首诗充分显示了完颜亮统一南北的愿望。

从金宋双方的国力来看，金朝当时并不具备统一中国的条件。完颜亮的南侵主张，招致朝廷内外的一片反对之声。尚书令耨碗温敦思忠再三谏阻，完颜亮气恼不已，本欲杀之，因念他为四朝老臣，名高望重，才姑且作罢。左丞相张浩婉言规劝，被完颜亮施以杖刑。太医使祁宰听说完颜亮欲用兵，也上疏谏奏，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南北形势以及金朝的内部情况，说明宋不可伐，南伐必定失败。完颜亮看了非常恼怒，下令将祁宰杀之于市，籍没其家产。完颜亮的嫡母、皇太后徒单氏也反对南伐，认为金朝国力疲弊，需要休养生息，完颜亮竟令人将太后杀死，并焚烧尸骨、抛之水中，此举令朝中大为震动，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反对用兵了。

完颜亮为了发动侵宋战争，在全国调集大量兵力，诸路猛安谋克军，凡军20以上，50以下者，全在征发之列，有的家丁多而双亲又年老体弱，乞求留下一子侍亲，也不获许可。猛安谋克部所征兵源主要是女真、契丹及奚族人，总共征发24万人，按体力强弱一分为二，壮者为正军，弱者为阿里喜（随从士卒），一个正军配备一个阿里喜。此外还征集了大批

汉军，全国 19 路内，除上京、东京两路无汉人，中都路造军器、南京路修汴京免征外，其他 15 路每路征发 1 万人，共计 15 万。同时，又大括天下骡马，七品以上官才准留马 1 匹，其余民间骡马尽数囊括一空，总共搜括了 56 万余匹，括马过多没有饲料，完颜亮就下令把括来的马放到尚未收割的田中牧养，还说民间粮食储蓄甚多，就是今年绝收也没有什么关系。完颜亮又命工部尚书苏保衡在通州（今北京通县）督造战船，为南渡江淮做准备。同时还遣使分赴诸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并将诸路旧存的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为了进行南侵准备，完颜亮不惜竭尽民力，在全国范围内预征五年租税，天下怨声载道，社会危机日益深重。

完颜亮为南侵所作的另一个重要准备是营建南京（汴京）。为了南侵，他打算把都城从中都迁到南京。为此，早在正隆三年（1158 年）冬天，他就令左丞相张浩和参知政事敬嗣晖营建南京宫室，张浩觉得刚刚建完中都，民力尚未恢复，不宜又建新都，完颜亮根本听不进去，张浩只得从命。他们按照完颜亮的旨意，将南京所存原宋朝的宫室台榭全部拆除，然后重新构筑，新建的南京宫室务极华丽，耗费了大量钱财。正隆六年（1161 年）初，南京营建完毕，此时完颜亮为南侵所作的各种准备也已基本就绪，他准备离开中都前往南京，为了不引起南宋的怀疑。他特告诉宋使徐度说，他将于近期去南京巡幸，此行并无其他意图，只是想到淮北打打猎，请南宋方面不必为此过虑。这年二月，完颜亮动身赴南京，同时将尚书省、枢密院等朝廷主要机构迁往南京，只剩下少数官员留守中都。金正隆六年（1161 年）九月，金军分四路南下，

水陆并进，企图一举灭宋。一路从海上直取临安；一路从宿州（今安徽宿县）、亳州（今安徽亳县）取淮泗；一路从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取荆襄；一路出凤翔取四川。

金正隆六年（1161年）十月，完颜亮率金军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逼近淮河北岸。宋高宗起用老将刘锜为淮浙西制置使，领兵抵御。刘锜当时身患重病，副帅王权怯懦畏敌，刘锜命他引兵迎击敌人，他贪生怕死，不愿从命，并借口劳军，用官船把自己的家私全部运走。刘锜命他进驻淮西重镇寿春（今安徽省寿县），他却龟缩在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城内，死也不肯前往。经刘锜一再催促，他出于无奈，才每隔3天派一支军队到距淮河前线较远的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探听一番。十月初九，完颜亮率大军抢渡淮河。王权一兵不发，深夜丢了庐州城，逃至昭关（在安徽含山县西北）；接着，又自昭关撤退到和州。由于王权不战自退，金军就追踪而至。二十一日，王权假称“奉旨弃城守江”，又放弃了和州城。在弃城逃跑时，王权竟命令他的部将韩霖纵火焚城。王权不战自退，完颜亮的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不到半个月时间便顺利地夺取了真（今江苏仪征）、庐、扬、和等州，直抵长江北岸，准备大举渡江。金军盘踞在西采石一带；溃散下来的王权余部流散在东采石镇附近。两军隔江相持。刘锜的军队原在淮东一带和金军隔河相持，由于淮西方面的牵制，又因连奉退守大江的指示，也不得不一步步地往后退。他先后退出淮阴（今江苏清江）、扬州，撤至长江南岸的镇江。

宋廷为了挽救危局，解除了王权职务，以李显忠为建康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并派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到

采石犒军。虞允文（1110—1174年），字彬甫，隆州仁寿县（今四川省仁寿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他考中进士。虞允文虽然身为文官，却也很注意边防武备。早在完颜亮大举进攻的前一年，他就曾上书皇帝，指出金国一定要撕毁盟约；并且预料金军如果南犯，必以全力出淮西，用奇兵出海道。但是，这些正确的估计，并未能引起宋高宗的注意。这次虞允文以中书舍人参谋军事的身份，奉命到芜湖催促武将李显忠尽速到东采石接管王权的军队，并代表政府慰劳采石的驻军。十一月初六虞允文到达采石。这时候采石一带由于无人负责，秩序非常混乱，散兵游勇到处都是，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人们的心中交织着愤恨苦恼、茫然无主的复杂心情。虞允文决定从振奋士气着手。他立刻召集将士讲话，要大家立功报国，虞允文慨然以国事为己任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将士们的心，激发了他们的斗志。虞允文马上又和将官时俊、盛新等人共同研究了沿江的军事部署问题。他们根据双方兵力的悬殊，以及金军士气低落、不明地形、不善水战等条件，决定以逸待劳，用后发制人的办法来对付金军。虞允文命步兵和骑兵列好阵势隐蔽在岸边滩头高地的后面。又命江面水军分成五队，各队由海鳅船和战船组成：一队停泊大江中流，做为主力；两队分做东西两翼配合主力；另外两队隐蔽在附近的小港汊内，做袭击敌船和援助前阵之用。

十一月初八，完颜亮亲自指挥大军抢渡长江。他先派出一部分水军做试探性的进攻。宋军不急于反击，江面上没有什么动静。完颜亮以为可以像当年兀术过江那样长驱直入了，于是亲自挥动小红旗，冒着江上的大风，率领几百艘战船从

杨林渡口出发。他站在船上志满意得，自以为稳操胜算。金军的船只向对岸冲去，快到岸边时，才发现岸头高地的后面，隐伏着队伍齐整的宋军。金军异常震惊，欲退不得。走在前面的70余只战船勉强靠岸，部分金兵登陆；但是大部分船只，由于船底宽平，行动不便，又不熟悉水道，在江中飘摆不定，无法前进。已登陆的金军被宋军全部消灭，停于长江中的金军战船也被宋水师截断，金军大败，只得退往杨林河口。虞允文预料敌经重创之后，必将卷土重来，于是连夜布阵。第二天虞允文亲率战船，将杨林渡口封锁起来。不久，金军果然来了。他立刻命令部将盛新带领一批优秀的射手用“克敌神臂弓”射杀金军。同时，他又派人到杨林渡口上渡处放火袭击敌人，焚毁金军战船300艘。十二日，金军被迫转向淮东，欲与扬州（今属江苏）、瓜州（今扬州南）军会合南渡。虞允文识破其谋，率师驰援镇江（今属江苏），于江岸布阵设防。金将见宋军有备，不愿再战，建策收军北还。

此时，金朝后方人民群起反抗。济南府一带耿京，辛弃疾（1140—1207）领导的起义军，胶东赵开领导的起义军，海州魏胜领导的起义军，大名府王友直领导的起义军纷纷举事，给金朝上下以很大的震动。金军攻宋的其他几路也纷纷失利：从海上进攻临安的一路，在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县）陈家岛被宋将李宝所率舟师联合魏胜赵开所部义军打得大败，副统制完颜郑家战死，这场海战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将火药大规模地运用在海战上；进攻川陕的西路金军遭到宋将吴玠的痛击，失去了秦陇等16州；进攻荆襄的中路金军也被宋军张超击退，失去了蔡州、邓州、河南府等地。完颜亮南侵的四路

大军均告失败。这时，燕京又发生了一次政变，金东京留守完颜雍（即金世宗，1123—1189年）乘完颜亮南下，夺取了皇位，并宣布废黜完颜亮。完颜亮后退无路，只好孤注一掷，企图渡江占领江南。行至扬州，部将完颜宜元率将士袭击完颜亮营帐，完颜亮被乱箭射死。完颜亮点燃南侵战火，而自己却在这场战火中自焚。这时的宋金战场，再次出现对宋军有利的局面。南宋朝廷再次面临着是继续前进还是妥协投降的抉择。

六、“隆兴和议”与开禧北伐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赵构传位于孝宗赵昚。孝宗锐意抗金，为岳飞父子昭雪，并且召回抗战派张浚、胡铨，驱逐了朝中的秦桧党人。

隆兴元年（1163），张浚出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派大将李显忠、邵宏渊出师北伐，连破灵壁（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进据宿州州治符离（今安徽宿县）；金军大举反攻，李显忠奋力激战，邵宏渊坐视不救，宋军失利，损失惨重。

符离战败后，孝宗抗金决心有所动摇。秦桧余党汤思退以太上皇宋高宗为后盾，力主议和，排挤张浚出朝，撤销海州，泗州戍守，并暗中示意金朝以重兵胁迫议和。隆兴二年冬，孝宗罢黜汤思退，却被迫与金朝再签和约。南宋皇帝不再对金帝称臣，改称侄；每年缴纳银、绢各20万两、匹；双方各守旧疆。是为“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后，宋孝宗对于不平等的宋金关系感到愤慨，整军理财，注意备战，准备伺机雪耻。张浚、陈康伯、虞允文等人相继去世，加以受制于太上皇赵构等主和势力，北伐计划无法实现。

宋宁宗前期，主战的舆论形成相当大的力量。开禧二年（1206），总揽军政大权的韩侂胄（1152—1207）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北伐战争。诸路军纷纷出战，虽声势浩大，却很快败退下来，唯有勇将毕再遇屡获胜捷，但亦无补败局。金军乘胜分路南下，渡过淮河，攻陷州军。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降。四川官员、军民强烈抵制降金，合力平定了叛乱。

韩侂胄北伐失利，派人与金议和。金朝以斩韩侂胄为议和先决条件。朝中主和派代表史弥远（1164—1233）与杨皇后等人勾结，秘密杀死韩侂胄，继而恢复了秦桧的王爵与赠谥。嘉定元年（1208），主和派完全遵照金朝要求，与金重订和约。改金宋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岁币由银绢各 20 万两匹增至各 30 万两匹；宋朝另付“犒军银”300 万两。是为“嘉定和议”。

第三节 南宋的社会经济

从南宋王朝建立以来，南方劳动人口在一个半世纪中，有了明显的增加。其中有一部分劳动力是从北方转移过来的。

当时北方的一部分汉族和各族人民，不愿在女真贵族的奴役下生活。他们千方百计地渡江南下，来到生产条件较好的江南富庶之地，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重建新的家园。

当时南方人口的增长情况，根据 1159 年（绍兴二十九年）的统计，南宋地区有 1684 万人。到了 1169 年（乾道五年），就增加到 2477 万人。10 年之内，人口增加将近 800 万。到了 1179 年（淳熙六年），已达到 2950 万，与 1159 年比较，20 年中人口增加了 $3/4$ 。像西南的夔州路，在 1080 年（元丰三年）时只有 24 万多户，46 万多口，到了 1162 年（绍兴三十二年），已有 38 万多户，113 万多口。80 年间人口增加了 1 倍半，速度是比较快的。其他如福建路、荆湖南路、江南东路、江西南路、两浙路，人口都增长得很快。

南宋时期，南方人口的增加和天然资源的丰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南宋王朝在经济政策上的某些改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的潮流中得到苟安，不得不正视社会现实问题。由于战争造成的创伤，土地荒芜、人口流移，这不仅是人民的苦难，对地主阶级的统治也是不利的。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 年）起，南宋王朝在政策措施上，一方面安顿从北方不断南下的流民；一方面督促各级地方官吏，想方设法扩大耕种面积。建炎初，国家拨款给淮东路各地购置耕牛。民间买卖耕牛，可以免税。由于战争的影响，耕牛十分缺乏，政府又下令访求北宋初期曾经使用很有效的“踏犁”式样，加以推广，以代替耕牛。

南宋初，很多北方人流移到江南，政府把他们吸引到平

江一带开垦农田，先免 3 年租课。国家还规定：凡是在 2 年以上没有人耕种的荒地，都允许农民开垦，并贷给耕牛和谷种，或借贷现钱给他们购买生产资料，或减低税额等等，从多方面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南宋王朝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当地的农业生产究竟好坏。1132 年（绍兴二年），知兴国军王絢和知永兴县陈升，都因为引导人民垦田成绩显著而晋级。1145 年（绍兴十五年），国家规定：每年春季，各县地方官都要亲自到郊外召集近郊老百姓，向他们宣讲政府提倡农业的政策。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京西和淮南等路的官田，由于战争的影响而还没有开垦出来，一片荒凉。1156 年（绍兴二十六年）规定：农民承佃以上地区的荒地，在 5 至 10 年内可以不交租课。承佃 3 年以后，即作为农民自己的产业，还可以典卖。政府贷给的耕牛和种子，3 年以后分期还纳。四川地区人口众多，政府出榜文要他们赴京西垦种，并给以路途津贴。

从宋高宗到宋孝宗的 60 多年里，南宋王朝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对安顿劳动力和扩大耕地面积，采取了具体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果。

南宋时期，江南的江东路和浙西路都已播种麦子。1165 年（乾道元年），这一带的沙田租课是纳大麦或小麦的，称为“二麦”。1171 年（乾道七年），据扬州知州晁公武的调查，江北的真州（江苏仪征）、扬州、通州（江苏南通）、泰州、楚州（江苏淮安）、滁州、高邮、盱眙军（江苏盱眙）等地所种的麦田，已有 2800 多顷。这一年的 10 月，政府又在江南地区的江东、江西、湖南、湖北诸路推广种麦。朱熹在南康军

(江西星子)任职时,每遇早稻因长久缺雨而干旱时,就通令把稻田改种荞麦和大、小麦,以保障民食,防止饥荒。

南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农田水利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推广。

南宋初,东南地区的河渠及塘堰之类的水利建设,遭受战争的影响,形成残破局面,大大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战后由于政府的提倡和人民的积极行动,农田水利得到开发,如浙东路、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川峡四路(即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夔州路),都是水利办得比较好的地区。

钱塘江以东的浙东路一带,南宋时出现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越州(浙江绍兴)在1163年(隆兴元年)浚复会稽、山阴、诸暨等县的旧湖,又开辟了鉴湖,灌溉废田170顷。明州在1169年(乾道五年)开凿了东钱湖,利用湖中泥土修筑埂岸。台州在淳熙年间(1174—1189年),开凿了黄岩县的官河,利用支流灌田。像这些塘堰古渠的修复和增辟,都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兴旺。鉴湖和东钱湖一带的田地,地势比湖面低,天旱时可以利用湖水灌田;水涝时又可放水入海。据统计,越州鉴湖的湖田有2300顷,明州广德湖的湖田也有720顷。

在浙西路(江苏南部和钱塘江以西地区),主要是兴修太湖水利。从宋高宗到宋孝宗时期(1127—1189年),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浦导入江海。宋孝宗时,太湖出海的河浦,都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的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太湖流域一带,由于水利的浚通,排除了严重的水灾,使低田和

高田都能得到灌溉，单位面积产量不断上升。一般田地，每年收成两次，每亩共收农作物 5 石（合今 3.3 石）左右。浙西路成为南宋时代农业产量最高的地区。当时人们都这样说：“苏（州）湖（州）熟，天下足”。每当农村大忙季节，农民们从夜晚忙到天亮。他们用最新的农具“连枷”来脱粒。南宋人范成大（1126—1193 年）是苏州人，他在 1186 年（淳熙十三年）写的《四时田园杂兴》诗中，有“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四句。这是描写江南农村丰收时节的农忙景象。

在宋、金交界的淮南地区，虽然由于战争的影响，遭受的破坏比较严重，但是一旦转入和平局面，由于农民们的辛勤努力，水利事业也慢慢地恢复起来。如淮南东西两路（苏北、皖北和湖北、河南部分地区），修复了真州的陈公塘，建筑了泰州的月堰。在高邮和楚州（江苏淮安）之间，筑起了长堤。京西南路（河南西南、湖北西北和陕西东南部）的襄阳府，1163 年（隆兴元年）修复了长渠和木渠，可以灌溉土地 1 万顷左右。在靠近金统治区的农业人口，也有所增长。如淮南东路在 1223 年（嘉定十六年）时有 12 万多户，到 1276 年（景炎元年）时，已达 54 万户。淮南西路也在同一时期内由 21 万多户上升到 51 万多户。

南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圩田的大量开辟。

当时的江南东路，包括今江苏南京以西以及皖南和江西东北部。这些地区开辟了大量的圩田。

圩田在北宋时代已经取得了丰产的经验。到了南宋，江南劳动人民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扩大了圩田的面积，使过去

还没有利用的土地，都逐步开发起来。

江南东路一带的土地，由于地势低，必须修筑高厚的圩岸，使稻田不会遭受水灾。天旱时，可以打开圩岸的闸门，引水灌溉。建康府的永丰圩，是 1115 年（政和五年）围湖而成的，南宋时逐渐扩大到 950 顷的面积，四至相去皆 50 里左右，圩岸建筑得很高很长。芜湖一带的圩岸，接连有 290 多里长；当涂一带的圩岸有 480 里长，高阔而壮实。长堤上，濒水的一边榆柳成行，可以阻挡风涛；又有道路供行人和纤夫们行走。宽大的圩岸，仿佛一座土城墙，可以并马奔驰。宁国府（安徽宣城）的圩田，在宋高宗和宋孝宗时都添筑了圩岸。1131 年（绍兴元年），那里的化成圩和惠民圩，相连 80 里。到了 1171 年（乾道七年），两圩周围又置了 24 所斗门。1174 年（淳熙元年），又增筑了 9 里长的圩岸。化成圩有田 880 顷。

南宋时期，江东一带的圩田面积不断增加。乾道年间（1165—1173 年），宁国府的圩田已有 4000 顷，太平州（安徽当涂）共有 7.9 万顷，当涂县有 6000 顷。这是江东圩田最集中的地区。总计江南东路所修筑的陂塘沟堰，1174 年（淳熙元年）时已达到 2.2451 万处，使 4.42 万多顷的田地获得了灌溉之利。江东地区圩田的增辟，使地势低洼的土地变为高额丰产田，一亩田地的产量可达 3 石到 7 石。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 年）描写江东一带圩田的丰收景象是：“周遭圩岸缭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处，翠茸锦上织黄云。”

在耕作技术方面，劳动人民总结了一套深耕细作的经验。文献上记载说：“土膏既发，地力有余。深耕熟犁，壤细如面。

故其种入土，坚致而不疏。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根既固矣，复车水入田，名曰还水。其劳如此。还水之后，苗日以盛。虽遇旱蓰，可保无忧。”深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优良传统。

南宋时期，南方农田水利的兴修，圩田的大量开辟，深耕细作技术的推广，这是南方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取得的成果。“苏湖熟，天下足”，反映了江南劳动农民对祖国的伟大贡献。

第四节 钟相、杨么起义

洞庭湖的农民起义是钟相、杨么等人领导的。起义开始在公元 1130 年，与方腊起义仅隔 10 年。

北宋末年，洞庭湖地区遭到金兵的洗劫。当地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赶走金兵之后，宋军又接踵而来，前门赶走了豺狼，后门又闯进了老虎。洞庭湖一带的人民，日夜得不到安宁。当时在江南地区察访过的大臣朱胜菲，就曾经指出：朝廷横征暴敛，贫民不能谋生，不得不起来作斗争。一斛米的赋税，要付出五六斛的代价；1000 文的税钱，要交七八千。正税之外，苛捐杂税和额外勒索，竟重到这般地步，人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另一个官员洪利也说：“兵兴累年，馈饷悉出于民，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不时之需，无名之敛，

殆无虚日，所以去而为盗。”这些言论反映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洞庭湖一带遭受金兵蹂躏之后，房屋倾倒、田园荒芜，生产还没有恢复过来，而宋朝政府的经济剥削又如此之重。钟相、杨么起义就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下发生的。

钟相是洞庭湖畔鼎州武陵（湖南常德）人。早在起义前的20多年，他就在武陵一带利用宗教联络各方群众。他所宣传的宗教，是不同于佛教和道教的“左道”，其实就是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在南方群众中秘密流传，宋朝屡次下令禁止，但禁不胜禁。一位名叫王居正的官吏向宋高宗赵构报告说：“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以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钟相组织起义的荆湖一带，早在唐代宗时（763—779年），荆州（湖北江陵）就有摩尼教寺——大云光明寺。这里早就成为摩尼教活动的中心地。

钟相提倡入教的群众要分财互助、团结一致，入教以后，可得“田蚕兴旺，生理丰富”。钟相向农民们作宣传：“法分贵贱，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他自称“天大圣”。于是，洞庭湖一带农民，为了追求光明的未来，都来“投拜法下”。

公元1127年，钟相就组织农民武装力量结寨自保，抵御金兵的劫掠。1130年初，金兵掳掠潭州（湖南长沙），宋朝孔彦舟的溃兵又来趁火打劫。洞庭湖的人民忍无可忍，钟相就在这关键时刻发动起义。

农民军活动于鼎州、澧州（湖南澧县）、潭州、峡州（湖北宜昌）、岳州（湖南岳阳）、辰州（湖南沅陵）等广大土地。所到之处，焚烧官府、寺观、神庙、豪门住宅，屠杀官吏、儒生、儒道，建立“大楚”农民政权。钟相自称“楚王”。农民政权宣布：宋朝的国法是邪法；起义军镇压地主官僚，这是行法；夺取官僚地主的财产和土地还给贫民，这是均平。这些行动冲破了封建的旧教条，打乱了封建的旧秩序，“人皆乐而附之，以为天理当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农民起义队伍扩大到40万人。

起义军力量越是强大，敌人的手段也就更加卑鄙。孔彦舟勾结地主反动武装，施用阴谋诡计，派匪徒以“入法”为名，混入钟相的起义营垒，内应外合来进行破坏。钟相缺乏高度的警惕。他和他的儿子钟昂最终被俘而惨遭毒手。余部在杨么等人的领导下，进行顽强抵抗。

杨么是穷苦农民出身的孩子。他原名太，因为年龄少，当地人民习惯叫孩子为“么”，因此人们就亲热地喊他为杨么。

杨么团结杨广、夏诚、杨钦、周伦、黄诚、刘衡、黄佐、高老虎等起义首领，沿着洞庭湖筑起几十处栅寨，准备长期作斗争。他们一面战斗，一面从事生产，春夏耕耘、秋冬收粮，自给自足，出现一派兴旺景象。为了适应水上战斗，他们自己砍伐木材，创造了一种“车船”。这是一种轻快的战船，利用人力踏动木制的机车，车轮激水、舟行如飞。最大的战船，装有24部机车，桅长10多丈，楼高5层。船的两旁还有护车板，使踏车的战士不会遭到敌人的射击。人民群众有

无穷创造力，农民军能在“两月之间，水寨大小车楼船十余，制样愈益雄壮”。

洞庭湖的起义军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地理形势，采取灵活的作战艺术。当敌人从陆地上来袭击时，他们就潜入湖中；当敌人下水时，他们又机动地登岸作战，使宋军疲于奔命、无从下手。到了1132年，杨么领导的农民军扩大到20万人。1133年，杨么自称“大圣天王”。

宋朝政府为了镇压杨么的起义军，调动了不少统帅，但是无法消灭革命力量。狡猾的敌人采取软的一手。当时也有个别农民军将领如杨华等，上当受骗，在敌人面前放下了武器，投靠了宋朝。但是杨么领导的起义军，越打越强。宋朝王昶率领的6万水军，在1133年（绍兴三年）的一次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宋高宗在多次惨败的情况下，最后把精锐的岳家军从淮西前线抽调到洞庭湖。

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五月，岳飞到了洞庭湖。他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使杨么陷于孤立的境地，终于把洞庭湖的农民起义瓦解，杨么被俘后壮烈牺牲。

杨么牺牲之后，其部下夏诚等继承他的事业，据守水寨、奋起抵抗。后来由于寡不敌众，终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从王小波、李顺起义到钟相、杨么起义，反映了宋代的农民阶级反对土地兼并，要求土地重新分配的强烈愿望。他们针对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的封建制度，提出了平均和平等的要求。在我国农民战争史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第五节 南宋内部的政治斗争

一、苗刘之变

高宗时内忧外患，压力重重。由于南宋王朝敬且偷安，不思进取，屡屡丧师失地。建炎三年（1129），高宗赵构被金兵追逐，仓皇逃至杭州。扈从军官苗傅、刘正彦因不满朝政而发动政变，迫其退位，改立年仅三岁的太子赵昀为帝。宰相朱胜非暂时稳住政局，吕颐浩、张浚联络韩世忠等人起兵勤王，政变终至失败。这次兵变使高宗内心深感震恐，对于武将“逼宫”的可能性极端戒惕。

绍兴初年，时局危急，朝廷不得不给予岳飞、韩世忠等诸将统御一方的大权，同时又猜忌诸将，担心“功高震主”、担心演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成为宋高宗与秦桧等人后来力图收夺诸大将兵权的主要理由之一。

二、秦桧专权

“绍兴和议”后，秦桧独揽大政十余年。高宗所宠信的医官、宦官，都与秦桧声气相通，狼狈为奸。对宋金和议不满、反对割地的牛皋、邵隆等将领，被秦桧一伙先后毒杀。很多

抗战派人士被贬逐流放。

秦桧采用高压手段钳制抗金舆论，任命其子秦熺主编官史日历，恣意篡改史实，并且严禁私史、大兴文字狱，实行特务统治。皇城司逻卒遍布临安府，发现稍有不满意言论者，即处以毒刑。与此同时，他们大力提倡点缀“升平”，凡进献阿谀逢迎、歌功颂德文字者，即予升官。

南宋初年，浩大的军费开支成为政府增敛赋税的借口。在他们以“爱养生灵”为标榜，实现了屈辱的和议之后，人民负担却丝毫未得轻减。秦桧凭藉个人威势，密令诸路暗增民税；逼使州县把民户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皆估为物力，摊派捐税差徭，将百姓推至贫困冻馁的深渊。而在竭力搜刮民脂民膏的基础上，帝王与达官贵戚们纷纷营造豪华的宫殿、宅邸，任意挥霍享受。官场贪污成风，贿赂公行。仅秦桧一家的财富，即超过左藏库数倍。

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朝野人士纷纷揭露其罪恶行径。高宗虽在舆论压力下，贬黜了一批秦桧亲党，也为一些受打击的官员平反，却仍然委任投降派万俟卨、汤思退等掌政，并且声称与金议和“断自朕志”，维持着屈辱的“绍兴和议”。

三、孝宗图治

“隆兴和议”后，孝宗锐意恢复国力，一方面努力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一方面设置左藏封桩库，逐年储备，作为军需。

孝宗时期是南宋历史上较好的一段。政治上比较稳定，经济生产有所发展。他图治心切，躬亲政务，鉴于秦桧专权的教训，他设法限制和贬抑宰相的部分事权。他任用张浚、虞允文、王淮等人，整军备战。然而，由于长期受制于太上皇赵构，未能突破某些腐败的成规旧法，始终难有大的建树。

孝宗在位 27 年，传位于他认为“英武类己”的光宗赵惇。光宗上台后，所作所为一反其父主张，父子关系日益紧张。绍熙五年（1194），宋孝宗在悒郁中去世。

四、韩侂胄、 史弥远、贾似道擅权蠹国

宋孝宗病逝后，宗室赵汝愚（1140—1196）和外戚韩侂胄等共同策划，取得宋高宗、吴皇后的赞同，迫使光宗退位，当太上皇，而立其子赵扩为帝，是为宋宁宗。

宁宗朝前期，朝侂胄参预朝政。韩侂胄结交内廷，设法贬逐了赵汝愚、朱熹一派，独握军政大权达 13 年之久。

庆元二年（1196），宋廷宣布程朱理学为“伪学”，禁毁理学家的“语录”之类书籍，科举考试稍涉义理之学者一律不予录取。次年，将赵汝愚、朱熹一派及其同情者都列为“道学家”，定为“逆党”，开列“伪学逆党”党籍，名列“党籍”者都受不同程度的处罚，凡与之有关系的人员，也都不许担任官职，不许参加科举考试。这就是“庆元党禁”。庆元党禁持续时间不长，嘉泰二年（1202）宣布弛禁。因此而被牵连者相继复官。

“嘉定和议”之后，主谋杀死韩侂胄的史弥远任丞相，开始长期专擅朝政。韩、史先后专权，官场中结党营私，腐败侈靡。由巨额军费及赔款带来的财政危机日益加重，物价飞涨，民生憔悴。

嘉定十七年（1224），宋宁宗病死。史弥远矫诏拥立宗室子赵昀即帝位，是为宋理宗。与此同时，将宁宗原先所立、痛恨史氏专权祸国的皇子赵竑废为济王，令其出居湖州。后因湖州人潘王、潘丙企图拥立赵竑为帝，史弥远派兵捕杀，逼使赵竑自缢，湖州又名霅川，史称“霅川之变”。

理宗即位后的最初九年，处处听命于权相史弥远，朝政昏暗如故。绍定六年（1233），独相两朝 26 年的史弥远病死后，理宗亲政，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于是，任用了一批被史弥远排挤的知名人士。但在联蒙灭金战争之后，蒙古军事压力日益强大，理宗却沉溺于声色之中，宠信宦官董宋臣、卢允昇。主张戒饬不法官僚、贵戚的丞相董槐，遭到怨恨，被强行劫持出朝。自景定元年（1260）起，宋理宗贾妃之弟、右相贾似道（1213—1275）独擅朝政。

景定五年（1264），理宗去世，度宗赵禔即位。贾似道被尊为师臣，又加以“平章军国重事”的头衔。度宗与贾似道昏庸荒淫，自身不理政务，又不许其他执政大臣问政，一切朝政均由贾似道宠佞的门客、堂吏办理。贾似道嫉功害能，文天祥等正直士大夫受到排斥，潼川府路安抚使刘整等武将因不满朝中措施而投降蒙古军。贾似道在浙西强制推行“公田法”，骚扰民间，造成极大祸害。

五、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

高宗前期，金兵所到屠戮；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溃兵、游寇，结为叛乱武装，流窜各地，烧杀掳掠；加以赋税繁重、征敛横暴与地主压榨等原因，不断爆发地区性的武装起义。在信州、饶州一带（今属江西），王宗石利用摩尼教发动起义，贫苦农民纷纷参加，义军迅速发展。宋廷派刘光世军前往镇压，残杀平民达20万。福建路范汝为、叶铁等人领导农民起义，攻取建州（今福建建瓯），前后坚持三年，在韩世忠优势兵力围攻下失败。其它地区的小规模起义亦很频繁。

当时规模最大的，是钟相、杨么在洞庭湖地区的起义。

孝宗时期，阶级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中小规模的起义时有发生，淳熙二年（1175），荆湖北路的茶农、茶贩在赖文政领导下举行起义。转战数路，多次击败官军。江西提刑辛弃疾集结大批乡兵配合宋军，才灭了这场起义。其后又有郴州（今湖南郴县）的陈峒起义、广南的李接起义和汀州（今福建长汀）的姜大老起义。

宁宗时期，郴州黑风峒瑶族首领罗世传和汉族举人李元砺起事，义军纵横于荆湖南路、江南西路和广南西路，后因受招安及内讧等原因，而被官军各个击破。

理宗时期，汀州再度爆发了盐贩晏梦彪领导的起义，斗争持续了将近四年之久。赣州陈三枪、张魔王起义，也得到江西、福建、广东人民的响应。

第六节 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金统治下的北方，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女真贵族屠杀掠夺，人口大量减少，黄河南北“荆榛千里”。但金建国后，把从中原地区俘掠的汉人和各族人民，迁置东北各地，充实户口，开垦荒地。女真族的封建化和金熙宗以后战争较少，世宗、章宗时又蠲免一些租税，使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东北地区是金的发源地。在黑龙江阿城发现金代的铁矿井 10 多处，炼铁遗址 50 多处，最深的矿井达 40 余米。铁制工具广泛使用，种类繁多，铁农具有犁铧、犁铧、锄、镐、铲、镰、斧、凿、锯、双股垛叉和鱼形铡刀等；日常用具有锅、熨斗、刀剪、锁钥等；兵刑具有刀、剑、枪、矛和脚镣、手铐等。其中铁农具和元初王桢《农书》绘制的形状相近，种类齐全。金的火器制造较发达，所制的“震天雷”、“飞火枪”，威力很大。

陶瓷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辽宁抚顺大官屯窑和辽阳江官屯窑是陶瓷生产的基地。产品以黑釉缸、瓶、罐、壶等日用粗瓷，也烧造少量白釉器。在上京会宁府宫殿遗址发现有黄绿琉璃瓦，龙纹或兽面纹的瓦当。北宋时期北方的许多著名瓷窑，如河北曲阳的定窑、磁县的观台窑、河南禹县的

钧窑、陕西铜种的耀州窑等，在金世宗以后都得到恢复。河南的临汝窑，安徽萧县的泗州窑等生产的瓷器，胎质较细，釉质纯粹，色泽滋润，工艺各具特色。

北方重要造纸基地是平阳府（山西临汾），生产的白麻纸闻名天下，多达 5000 余卷的赵城藏经就是在平阳用白麻纸印的。用白麻纸印的汉文医书、字典、诗词和戏文等，远销各地。山西稷山生产的竹纸也很有名。

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金初遭到严重破坏。到世宗、章宗已全面恢复，并呈现发展的景象。在中都、河北、河东、山东等地已“寸土悉垦”。单位面积产量也提高，陆田亩产 1 石左右，南阳上等水田亩产高达 5 石，已接近北宋水平。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也增加了，1187 年（大定二十七年）金全国有 678.9 万多户，4470.5 万口，已超过北宋哲宗元符二年的户口数。

商业也有发展。会宁府是女真族的新兴都市。1153 年迁都中都燕京后，燕京成了金的最大都市。人口约 100 多万，城北三市是商业中心。南京开封人口最多时达 74 万多户，金人设有榷场，与西方和西北各族交换牲畜战马。

宋金之间的榷场有多处，贸易频繁，民间私相交易的数量也很大。金在主要城市设市令司，管理市场，各地还设商税院务，负责收商税。金初通用辽宋旧钱，后来自铸铜钱。因北方产铜不多，不能大量铸造，就仿宋发行交钞，作为永久流通。金朝后期银币已作为货币通行，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

第七节 金朝的衰亡

大定二十九年（公元 1189 年）正月，金世宗病故，皇孙完颜璟即位，是为章宗。章宗时期（1189—1208 年）是金朝发展的极盛阶段，同时也是金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

经过世宗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至章宗初年，金朝国势达到了它的顶点。从人口的增殖来看，明昌六年（1195 年）全国户数为 722 万，人数达 4849 万；泰和七年（1207 年）户数为 768 万，人数为 4581 万。这两次统计是金朝户口的最高数字，以户数算，泰和七年为其最高点，但以口数算，明昌六年已达顶峰。国势的兴盛充分显示在国家的富裕上，章宗初年，史称“府库充实，天下富庶”。章宗即位的次年，有臣子上奏章乞减免租税，其缘由是怕府库里的粮食存放太久腐烂了，为防止公粮岁久霉坏，朝廷曾发文，令诸路将仓库里的陈粮不时拿出来晾晒，如有霉坏，要追究有关官员的责任。明昌三年（1192 年），全国各地常平仓共计 519 处，积粟 3786 万余石，可供官兵食用 5 年；积米 810 万余石，可供官兵四年之需。章宗时期，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明昌二年（1191 年），全国库存金 1200 余铤、银 55 万余铤，财政收入不断增加，税收达到创纪录的数字，以最大税收盐课为例，世宗时全国七盐司岁课仅 622 万余贯，而承安三年（1198 年）就增至 1077 万余贯。

在章宗时期经济繁荣、国势兴盛的背后，已经蕴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由于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侵袭，南北两面连年不断的战争，使金朝耗费了极大的财力，出现了财政危机。于是只好滥发交钞和银币，实施通检推排和括地的经济政策，以维持日渐困蹙的统治，同时作为金朝一个重要支柱的猛安谋克制度也开始陷于崩溃，猛安谋克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减弱。这种种因素导致金朝的统治在章宗后期开始走下坡路。

章宗时自然灾害频繁，由于官僚政治的腐败，酿成了黄河三次大决堤，致使大批耕地被淹，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黄河在曹州（今山东菏泽）境内决堤，沿岸大批农民丧生，幸存者还要负担沉重的河防差役，当时营筑河堤用工600余万，多半由沿岸农民负担，他们不堪重负，纷纷逃离乡土。明昌四年（1193年），黄河又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决堤，由于这一带都是平原，洪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从大名府往北直到沧州、青州（今河北清县），全被洪水淹没。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在南京北阳武（今河南原阳）故堤第三次决口，这是黄河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大水灾，黄河由于这一次决堤而导致改道。当时泛滥的洪水分为两支，一支向北由北清河入海，一支向南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阴以下的淮河河道。这次黄河决口完全是由于治河官员腐败无能、有失维护造成的。河决后，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作了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淹没南京而已。

章宗时，北方的鞑靼、蒙古等游牧部族不断侵扰金朝，使金朝在北境的征战连年不已。鞑靼诸部在世宗之前一直与金

朝保持着臣属关系，后来他们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的威胁。章宗初年鞑靼诸部中势力最强的是阻鞑、广吉刺两部，他们时叛时服，反复无常。明昌六年（1195年），鞑靼诸部起兵反金，章宗命右丞相完颜襄率军征讨，自临潢府两路进兵，蒙古诸部也出兵相助，结果才击败鞑靼。两年后，鞑靼又再次起兵，完颜襄出师征讨，鞑靼酋长斜出率部归降。承安三年（1198年），鞑靼广吉刺部又叛，章宗令完颜宗浩领兵北伐，迫使广吉刺归降，然后再北上进攻叛金的蒙古诸部，获胜而还。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骚扰，金朝在北境开掘了一条西起临潢府左界，东至北京路的界壕，壕深三四米，宽达十几米。同时在西京路也修治障塞，工程极为浩大，但仍不能阻止外族的侵扰。

在南方，宋朝也发动了对金的战争，权臣韩侂胄想利用金朝内忧外患的机会收复中原，便于泰和六年（1206年）四月出兵北攻。章宗以平章政事仆散揆为左副元帅，枢密副使完颜匡为右副元帅，出师应战。战争初期，宋军攻占了淮北的部分州县，十月间仆散揆督率金军分九路对宋进行反攻，很快就取得全线胜利，但金军损失也很大。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事消耗了金朝的国力，章宗不想再扩大与宋朝的战争，因此在取得胜利后就从淮南退军北归，准备与宋朝议和。次年，南宋史弥远发动政变，杀死韩侂胄，和议得以达成，南宋将岁币增至30万两，另赔款300万两。

频繁的自然灾害对外战争耗尽了金朝的国力，庞大的官僚机构开支也与日俱增，在章宗统治后期的泰和七年（1207年），总计有仕官达4.7万余人，比世宗时增多3倍，金朝的

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章宗开始滥发交钞和宝货（银币）。交钞有大小两种，大钞自1贯到10贯，小钞自100文到700文。承安二年（1197年），因交钞发行过多，民间常常拒绝使用1贯以上的大钞，官府不得不将大钞回收一部分。三年（1198年），又因百姓只愿用铜钱作交易，而不愿接受交钞，朝廷便规定凡1贯以上的交易必须用交钞或宝货。宝货发行不久，民间出现大批假币，多用铜锡杂铸而成，于是朝廷才不得不下令停止铸造和使用。由于币制屡变，民间议论纷纷，怨声载道，章宗下令禁止百姓私议币制，违令者论罪，告密者赏钱300贯。滥发交钞引起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甚至所印的钞币还不敷印刷纸张的工本费用。章宗末年，至以万贯交钞只买得一个烧饼；章宗死后两年，金军在会河堡与蒙古会战，朝廷竟以84车交钞作为军赏，可见交钞贬值到了什么程度。币制的紊乱，是金朝统治趋于衰败的一个象征。

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的难题，章宗继续实施通检推排和括地两项政策。在承安二年（1197年）、泰和元年（1201年）和八年（1208年）对农户物力进行了三次推排，但到了章宗的晚期，由于朝政的腐败，通检推排之法已遭破坏，民户家产很难核实，有权势者纷纷逃避赋税，贫苦农民要负担越来越重的赋税。括地更是经济政策上的一大弊政，金朝统治者为了挽救日趋崩溃的猛安谋克制，以括籍被百姓“冒占”的官田的名义，大量括取民田，分授给猛安谋克屯田军户，把括地当作维持屯田军户生活和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承安五年（1200年），枢密使宗浩等在山东、河北、陕西等路一次就括

地 30 多万顷，括地的过程中弊端百出，大批汉族农民的私田被强行夺取。括地导致了阶级乃至民族间的严重对立，当时就有人指出这种做法为害至深，认为夺民田而与军户，其结果是“行军心而失天下之心”。

金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1189——1208 年），北方逐渐落入新兴的蒙古族之手，金朝所控制的北方地区只剩下了黄河以南。黄河两岸连续不断地发生水灾，使人民处于求生不得的境地。金朝统治在行将崩溃的时候，对人民的压迫更加疯狂。金章宗时，由于滥发纸币（称为“交钞”），买一个烧饼要付出 1 万贯交钞。根据 1195 年（昌明六年）统计，金朝统治下的人口有 722 万户，4800 多万人，而所征收的物力钱竟高达 260 万贯，平均每 3 户人家要出一贯铜钱。在物力财力之外，还有铺马、河夫、司吏、输庸、桑皮……等各种各样的额外税收，使人民走上绝路，被迫举行武装起义。

1211 年（大安三年）以后，山东境内到处爆发农民起义。在东部有杨安儿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莒州（山东莒县）、密州等地；在中部有李全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潍州（山东潍坊市）、安丘、临朐一带；在南部有刘二姐、彭义斌等领导的起义军活动于沂蒙山区。起义群众，以红袄为标志，称为“红袄军”。

13 世纪初，女真贵族的统治已经发生根本动摇。他们害怕蒙古军的袭击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1214 年（贞祐二年）把统治中心从中都南迁到开封。蒙古军于 1215 年攻占了中都。

红袄军战斗在山东、河北一带，狠狠地打击了女真统治

者。1214年，杨安儿在莱州（山东掖县）建立政权，年号“天顺”，军势大振。杨安儿牺牲后，余部由她的妹妹四娘子杨妙真率领，转移到磨旗山（山东莒县东南）。杨妙真勇敢善骑射，自称“梨花枪天下无敌手”，起义的农民都叫她“姑姑”。她带领杨安儿的余部1万多人，与李全会师于磨旗山。杨妙真和李全都善使长枪。两人通过比武竞技而相互倾心、结成夫妇，从而把双方的部队结合在一起，在磨旗山建立抗金阵地。至今在山南麓半山坡大石上，还刻有“嘉定九年四娘子此山下寨”等11个大字。

活跃在山东南部的农民军，在刘二姐牺牲后，余部由彭义斌等人领导，继续战斗于兖州等地。后来彭义斌部也归李全领导。山东的各支红袄军基本上统一起来了。

1217年以后，红袄军在杨妙真、李全、彭义斌等人率领下，由山东经徐州等地，向南宋境内转移。南宋统治者害怕人民的武装力量，不仅不愿与红袄军配合，打击女真贵族，收复故土，反而用一切恶毒的手段对付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处境十分不利，他们仍然坚持反金斗争，并多次打回山东，会合当地起义群众，重新攻克密州、沂州等地。

这时候，蒙古贵族的骑兵已经深入河北、山东一带。起义军面临的敌人有女真贵族和蒙古贵族的武装，斗争更加艰巨。红袄军的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但连续数年的战斗，动摇了金朝的腐朽统治。女真贵族的政权在本族人民和汉族、契丹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长期打击下，已经没有力量继续维持其残暴的统治。1234年，金朝被北方新兴起的蒙古军所消灭。

第五章

宋、辽、夏、金时期的文化

第一节 哲学与宗教

一、两宋理学和著名的理学家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都有一套统治思想。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以后，随着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也必然要加强思想上的统治。

隋、唐时期，佛教思想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他们的主要统治思想。但是，经过了隋末农民起义和唐末农民起义的巨大冲击，佛教的有神论已经不能有效地欺骗人民群众。因此，到了北宋时期，就产生了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统治思想。这就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新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理学。

理学反对佛家和道家的虚无主义，认为它破坏了封建的伦理秩序。但是理学是在改造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佛、道思想中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的一些思想而形成的。

理学的中心思想是一个“理”字。理学家们把“理”说成是宇宙的本源。理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的东西。理产生万物，也就是说精神产生物质。

理学家们又说理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就是封建统治制度，就是“三纲五常”。这都是先天地而存在的，也是永恒不变的。因此，理学家们强调君权、父权、夫权都是绝对的。理学替维护封建统治的君权作辩护，也就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作辩护。这正适应北宋统治阶级的需要。

理学又称“道学”，这是因为在理学家们的思想体系中，道和理是一个东西。程颐说：“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

两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有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陆九渊。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他们是亲兄弟，河南人，都是周敦颐的学生。由于哲学思想上的一致，人们称他们为“二程”。

二程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叫做“道”，或“天理”。程颢说：“天者理也”，认为天就是最高的实体。这个“理”凌驾于万物之上，先于万物而存在，永远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他又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所讲的永恒的理，就是君臣、父子的封建等级关系，封建伦理道德，这是唯一的理。所以程颐就说：“天下只有一个理”。二程主张

“明天理”，对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不能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就是饿死，也不能违背“天理”，不许反抗封建统治。理学就是这样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理学家们还要求人们通过对封建道德的自我修养，做到“存天理，去人欲”。他们把劳动人民正当的生活要求，一律斥之为“人欲”，要人们放弃求生的一切欲望，去顺从封建统治者的“天理”。存天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达到“仁”。仁就是“万物一体”，对万物无有不爱。理学家们通过超阶级的“爱”，来消除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二程的学说中，也承认万物变化无穷。程颐说过，“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但是他们特别强调变中有不变的东西，认为不变才是根本的。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道，也就是理。万物的变化，都要受道或理的支配。

程颢也讲过“万物莫不有对”，承认有长有短，有大有小，有高有低，有善有恶，有贫有富。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差别是由“天理”决定的，是不能改变的。这就是说，封建等级差别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贫穷的人民永远只能受富贵者的统治。

二程所宣扬的理学思想，是同他们的政治保守态度和复古的历史观相联系的。他们都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提出“新学”，作为实行变法的理论根据。二程对王安石的新学全盘否定。理学家们根据封建的等级制度、法律、伦理道德等，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用贱凌贵，以邪妨正”，完全颠倒是非。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不得不摆脱保守势力，起用一批新人。二程等一班理学家就退居洛阳。洛阳成为理学的根据地。二

程的理学被称为洛学学派。他们与王安石的新学学派是水火不相容的。

到了南宋时期，封建小朝廷偏安于江南，民族矛盾和农民起义更趋激烈。理学思想在二程学说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代表人物就是朱熹。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号晦庵。他是安徽人，晚年在福建讲学。他的学派称为闽学学派。他的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太极图说解》等。他的弟子还把他在讲学时发表的言论，编成《朱子语类》。

朱熹认为宇宙间有两种东西，就是“理”和“气”。理是精神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气”才是物质。他说没有天地之前，先有一种理。理是独立于客观事物之外，先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朱熹是有神论者。他说：“帝是理是主”。上帝就是理，就是万物的主宰者。理是统治一切的。他又说：“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有父子之理。”不论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君臣父子虽然有生有死，但君臣父子的理，也就是忠君孝父的伦理道德是永恒不变的。按照朱熹的说教，对皇帝就是要忠，不问这个皇帝是贤还是愚，是圣君还是昏君。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的理学是以封建道德标准为出发点的，这就更加适合南宋腐朽封建统治的需要。

朱熹还提出过“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理论，就是要通过推究事物，来认识先天的、永恒不变的理，达到“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的目的。这就是要人们以封建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以维护封建统治。

朱熹还提出复古的历史观点。他同永康学派陈亮从通信中开展了辩论。朱熹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帝王是按“天理”行事的，因此出现盛世；汉朝和唐朝的皇帝是照“人欲”行事的，因此出现乱世。他主张要恢复三代之治，走历史的回头路。这就暴露出朱熹在政治上倾向保守的一面。

朱熹的理学体系，目的是为了宋朝的封建统治能永久延续下去。在宋、金矛盾激化时，从维护南宋王朝出发，朱熹最初也是主张北伐“复仇”的。他在给陈俊卿的信中，斥责求和派的无能，认为“祖宗之仇，万世臣子之所必报而不忘者。”从宋孝宗“隆兴和议”告成之后，朱熹对恢复中原故土失去了信心。于是一意讲学著书，在政治上只是主守，守住南宋的半壁江山。这是他的保守思想的反映。

朱熹的理学体系，是直接继承二程学说的。因此后人称它为“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起，程、朱理学被统治者尊为正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程、朱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毒害是很深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朱熹和他的弟子们，在学术文化上做了大量工作，涉及政治、宗教、教育、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朱熹为了“致知”，他博览各种图书，接触到许多知识部门，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他说地球是由物质的气凝聚而成的。地球是圆形体的。月亮本身没有光，月光是日光的反射。朱熹一生创办书院、收罗门徒，从事教育工作。他的博览精神、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当时和后世学者产生较深的影响。

朱熹亲手制订了《白鹿洞书院学规》，规定学习的程序和

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提出了：学、问、思、辨、行这五个字，是他办学的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他是提倡“循序渐进”的学习原则的。这是符合认识发展规律的。他还提倡“熟读精思”的学习方法，认为“大抵读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之于我之口；继之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之于我之心，然后可以有得耳。”读书是否有所得，要看能不能把书本知识加以消化，变为自己的东西。朱熹也强调学是为了用。他说：“大抵读书须要看那道理是何作用。只读过便休，何必读书。”这些都是作为教育家的朱熹的经验之谈。由于有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眼光，朱熹在整理文献、考证文字、注释古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贡献。

南宋另一位有影响的理学家是陆九渊（1139—1192年）。他是抚州（江西抚州）人，字子静，号象山。

陆九渊长期从事讲学活动。1187年（淳熙十四年）在贵溪应天山讲学，来访问他的各地学者先后超过1000人。在哲学思想上，他把“心”看作是世界的本体。他完全否认在人的感觉之外还有什么客观存在的东西。

陆九渊也承认有“理”。但是与朱熹的说法不同。朱熹把“理”看作是离开人心的客观存在。陆九渊认为“理”就在人们的心中，“心外无理”，“心即理”，“人心”就是万物存在的基础。他有两句很得意的话：“宇宙便是我心，我心便是宇宙”。他的学派被称为心学学派。心学学派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他们和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学派之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在维护封建制度、维护南宋王朝这一根本点

上，则又是一致的。

二、北宋关学和新学

北宋时期，我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当时科学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认识逐步深入。一些地主阶级学者如沈括等人，留心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科技知识，加上自身的刻苦钻研，从事科学观察和实验，使宋代出现了灿烂的科学文化。例如对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三大发明，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前提。宋代农业生产不断有所提高，公私手工业作坊的生产技术有所改进，商品经济有显著的发展。这些都会导致唯物主义思想达到新的境界。宋代气势磅礴的农民起义浪潮和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对社会思潮都会产生巨大的反响。

北宋时代，有两位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思想家，就是张载和王安石。

张载（1020—1077年）字子厚，陕西关中人。他在凤翔府郿县横渠镇讲学，人们尊称他为横渠先生。因为他是关中人，他的学派就称为关学学派。

张载是一位进步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正蒙》。这是一部论述他的哲学思想的著作。后人把他的各种著作编成《张子全书》。

在政治上，张载主张变革旧制度；在军事上，他主张巩固国防。当时西夏统治者侵扰宋朝的西北边疆，张载不满意

朝廷采取退缩和妥协的政策。他比较注意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社会实际问题。年青时，他就向焦寅学习兵法。他不但研究军事，也研究自然现象。他反对“玄虚”之学，主张学以致用。

在哲学思想上，张载与当时理学家的学说是根本分歧的。理学家们认为：属于精神的“理”是万物的本源。张载与他们相反，认为万物的本源是物质的“气”。他提出了“太虚即气”的学说，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这就是说，宇宙（太虚）是物质的“气”形成的，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气，气是物质的原始状态。天空并不是空无所有的，气散便是太空，气聚就形成万物。张载说，气是经常运动和不断变化的，气为什么会变化，这是由于宇宙内部有对立的两个方面，即阴和阳的相互作用。他承认物质自身的运动。

张载以上的一些论述，明显地带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的理论对批驳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张载是无神论者。他否定佛家宣扬的鬼神迷信。他驳斥“灵魂不死”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气聚则生，气散则死，死后气归太虚。他以无鬼论推翻佛教的人死要转世投生，以及人能得道成佛等唯心主义谬论。

张载还说过：“有物则有感，无则何所感？”这是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是感觉的源泉。犹如房间里有一张方桌子，才会感觉到这张桌子是方的。如果没有这张桌子，就不可能有桌子的感觉。他又说：“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表明人们产生感觉，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结

合。因此，他认为孔子不是“生而知之者”，而是“学而知之者”。

张载的哲学思想有进步的一面，也有唯心主义的杂质。他得到当时和后来理学家们的称赞，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人性是善的，恶是由于受到物质欲望的蒙蔽，老百姓们有了善的本性，就能做到“无欲”。这实际上是要求人们放弃个人的物质要求，以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他还宣扬“仇必和而解”的调和论。张载作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他既有革新愿望，又不敢触动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又害怕农民起义浪潮的冲击。他同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仍然有相通之处。

王安石是与张载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实践家。他生于1021年（天禧五年），比张载年轻一岁。他的学说当时被称为“新学”。他的学说与理学家们的理论是格格不入的，是有明显分歧的。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说过，王安石“尽黜先儒之说，以自为一家之言。”他的新学自成一个学派，被理学家们视为“离经叛道”的东西。这也正好说明王安石新学的进步性。

儒家各个学派，从西汉的董仲舒一直到北宋的司马光，都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司马光就是迷信“天地不易”、“日月不变”的天道观，来论证北宋的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制度，也是永远不能变的。

王安石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尚变者天道也。”作为自然界的天是经常在变的。日蚀、月蚀、飓风、水灾、山崩、地震、雷电等等，都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自然界的这些变

化，同国家的盛衰没有直接联系。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人们不应当害怕这些自然灾害。正因为有这么多的自然灾害，就要“修人事”，以人力去战胜自然，决不能束手无策。这是人定胜天的思想。

他又认为天地万物是由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构成的。“行”就是运动、变化的意思。他说五行是“往来乎天地之间而不穷者也。”五行的变化是无穷的。

王安石对宇宙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但有其局限性。他把天地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归结于“五行”的作用，这是不正确的。这主要还是由于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王安石还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总是新的代替旧的。因此他提出了“新故相除”的思想，也就是新陈代谢的意思。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他坚持主张要实行变法，就是“变风俗，立法度”，旧制度不能作为当今立法的依据。所以他说“祖宗不足法”。

王安石并不反对读儒家的书，而是主张读儒家的经典要做到融会贯通、有益于当世，不能死抱住先王的教条不放。他在给精通儒家经典的学者曾巩（1019—1083年）的信里，就自己对于诸子百家以及医药、小说等各类图书，“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广博的知识，而不会局限于一家的学说。王安石感到，古今时代不同，当代的知识要比前代更加丰富，要不断取得新的知识。王安石看不起当时那些死守孔孟教条的“儒者”，认为当时“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对于他们那一套气势汹汹反对变法的论调，用不着去顾虑。所以他又说，“人言不足恤”。王

安石明确表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王安石的新学，就是他在宋神宗时代实行变法的思想基础。

三、异军突起的南宋浙东两学派

南宋时期，南方广大人民在政治上要求抵御金兵、恢复中原，在经济上要求发展农业生产、振兴工商业。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东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他们不但要求抵抗金兵对南方的破坏，而且迫切要求繁荣农业和工商业。于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哲学思想领域出现了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新兴学派。

当时有两个新起的学派，都出现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浙东地区：一个是永康学派，一个是永嘉学派。这两个学派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都起了推陈出新的作用。

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亮（1143—1194年）。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浙江永康）人。他出身于一个趋于没落的普通地主家庭。少年时，他爱读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李白的“凛凛气节”，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又喜读屈原的作品。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的推动下，他在十八九岁时就学习《孙子兵法》，并探究历代兵家用兵的得失。《酌古论》是他最早的著作，共有21篇，对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历代战争进行了分析，提出自己的议论，从中汲取对抗金斗争可以取法或引为鉴戒的东西。在《苻坚》这一篇文章

中，他对秦、晋淝水之战作了论述，认为“夷狄”并不可怕。苻坚发重兵南攻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前秦的军队虽然号称 90 万，但是内部矛盾重重，“根本空虚”。东晋军民只要万众一心，奋起反抗、乘胜追击，不仅淝水（安徽东淝河）之战可以取胜，而且“中原之地可复，百年之仇可雪”。陈亮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总结了历史经验，认为南宋军民的抗金事业是正义的，必然会取得胜利。

1164 年（隆兴二年），南宋王朝与金朝订立和议。当时陈亮正在临安，看到宋朝文武大臣如此无能、国势一蹶不振，感到十分痛心。1169 年（乾道五年），陈亮赴礼部参加进士科初试，乘机向宋孝宗上《中兴五论》。这是一篇关于救国救民的政治论文，共提出了 24 条革新政治和加强防御的建议。这些有独特见解的建议，被朝廷里的求和派丢在一边。陈亮愤愤地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奋读书，研究“古今沿革之变”，寻求治国的方案。他一边读书，一边授徒讲学。经过 10 年的努力，他更加注重实事求是的“事功”之学，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各方面的问題，都有自己新的见解。1178 年（淳熙五年），陈亮三次上书给宋孝宗，提出了具体的“变而通之”的改革方案。他主张政治上要发挥各地方郡县守令的作用，在经济上要“劝农商，务宽大”，扶植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在用人方面，反对“官以资格而进”，要不拘一格引用有才能的人。他不满南宋王朝苟安于江南一隅，认为“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要振作起来，去恢复故土。

1188 年（淳熙十五年），陈亮亲临京口（江苏镇江）、建业一带观察军事地理形势，访问当地父老，感到这一带地形

险要，是归复中原的重要基地。这一年，他又上书给宋孝宗，根据实地调查，指出“江南不必忧，和议不必守，虏人（指金兵）不足畏，书生（指理学家们）之论不足凭。”他对当时理学家们的议论，是很不以为然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班“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他把理学家看作是头脑已经僵化、思想已经麻木的蠢人。陈亮同情江南人民的苦难，在上书中指出：“南方之红女，积尺寸之功于机杼，岁以输虏人，固已不胜其痛矣。”陈亮在政治上坚持抗金、同情人民；在思想上反对专讲“正心诚意”的理学；在文学上，迸发出爱国主义的光彩。他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词人。他曾同爱国词人辛弃疾在信州鹅湖相会，谈论国家大事、互相赠送词篇、抒发爱国的抱负。

陈亮在哲学思想上，提出“道在物中”的理论。就是说，任何道理或法则，都不能离开具体的事物。因此他主张要“因事作则”，即从客观存在的事物当中，去探索事物的规律或法则。陈亮不满当时理学家们空谈“道德性命”，空谈什么“义理”，而主张从当时社会现实状况出发，讲求“实事实功”。他深深感到南宋王朝需要有一批图抗金之“事”、谋中兴之“功”的英雄人物，才能挽狂澜于即倒。

永康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讲求“务实”，反对“空谈”。他们是根据事功的实际效果，来检验思想、主张方针、政策的正确或错误。这种事功之学的理论基础，就是道不离物的朴素唯物论。

1191年（绍熙二年），陈亮作为一位进步的思想家，遭到了政治陷害被捕入狱。第二年出狱后，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

但是他对国家的命运，仍然寄予极大的希望。1193年（绍熙四年），他考中了进士第一名（状元）。像他这样有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的人，竟没有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视，只给他建康军判官厅公事这么一个职务很低的小官。陈亮还来不及上任就一病不起，1194年（绍熙五年）他与世长辞，年仅52岁。

永加学派的著名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而叶适是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永加入。他对于发展地方农业生产，组织抗金战斗等方面，都作出过贡献。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金朝完颜亮大举南犯，江淮一带形势十分紧张。当时他担任武昌知县，亲自组织民兵，积极加强防御，依靠人民的力量保卫了武昌城。他看不起理学，说“义理之学不必深究”。在哲学思想上，他提出了“道不舍器”，“常存乎形器之内”的观点，为永加学派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他生平对于历史、地理、法制、礼乐、财政、军事、农业、文学等许多方面，都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探讨、以求实用。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也是讲求事功的学者。他主张理论要能通当世之变、切合实际，并能解决实际问题。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加入（浙江温州）。他同陈亮一样，既是进步的思想家，又是有实干精神的实践家。叶适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儿童时代，他住在瑞安。当时陈傅良正在瑞安林家教书，时常有见面机会。1166年（乾道二年），温州、台州一带遭受“飘没数百里”的特大水灾，他家也遭到了洗劫。他的父亲叶光祖依

靠教书过日子。由于家庭生计困难，叶适更加勤奋好学。20岁左右，他访问过学者薛季宣，在学术上虚心向长者请教。23岁时到过永康与陈亮会面，在学术上相互有所启发。

1178年（淳熙五年），叶适中了进士第二名（榜眼），从此以后参加了30多年的政治活动。他有时在中央朝廷做官，还在今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担任过行政、司法、财政、军事等许多方面的工作，并有所改革、有所建树。1194年（绍熙五年），曾担任中央教育机构的副长官——国子监司业。

南宋王朝内部的党派斗争和学术思想上的门户之见是错综复杂的。叶适曾两次被诬陷而落职。

叶适一贯主张北上抗金、收复故土。但是韩盍胄北伐的失败，与叶适并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地，叶适事先就告诉韩盍胄，不能轻率从事，“宜先江防”，作好准备。叶适的战略思想是“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要把握敌我强弱之势，不打无把握之仗。韩盍胄没有接受叶适的意见。北伐失败后，当权者竟捏造“附韩”的罪名，解除了叶适的官职。直到1206年（开禧二年）金兵直闯淮南，江南为之震动，才让叶适出任建康府知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江防。他在江淮地区组织民兵，加强防御措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但不久又被求和派赶下了台。

陈亮和叶适都遭到过南宋朝廷的排挤、打击和迫害。当时政治腐败、纪纲紊乱、法度废弛、豪贵恣横、民生凋敝、兵多而弱、士气低落，在这危急时刻，南宋统治集团仍然是苟且偷安，对外求和、对内镇压。因此，对于要求抗金和政治

革新的力量，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迫害，以维护一小撮当权派的特权利益。

叶适对南宋王朝这样衰败下去，感到痛心。他认为事在人为，决不可以悲观失望。他向宋孝宗提出“四变”的主张，就是“变国是、变议论、变人才、变法度”，中心意思是要改变妥协求和的国策；改变“空谈心性”的议论；改变懦弱无能的官吏；改变不合时宜的制度。他认为金兵不论如何“强大难攻”，都应主动克服困难，下定“恢复故疆”的决心，决不能“甘为退伏，拱手奉虏”。绍熙初，他又向宋光宗条陈必须整顿的六项大事：国势、士、民、兵、财、纪纲法度。他对光宗说，应当“知病所在”，对症下药。关于用人方面，他明白地提出：必须任用“忠信诚实，尽公忘家”的人。叶适具有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南宋国势虽弱，只要“修实政，行实德”，是可以转弱为强的。他深望最高统治者能下决心“改弱以就强”。叶适提出国家最急迫的任务是裁减“害民最甚”的苛捐杂税，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节约财用，使“小民蒙自治之利”。他认为当时的总经制钱、折帛、和买、茶盐专卖等等，都是对人民的横征暴敛，都应当废除。关于“变国是”的问题，他说：“固外者宜坚，安内者宜柔”。就是说：对金人的侵扰，必须坚决抵抗，对国内人民，应采取缓和矛盾的办法。在叶适看来，整饬纪纲、节用理财、苏息民困、以民为兵、提拔人才、守土保民，这些就是“今日之实事”。

叶适对待一切事物，采取明辨是非的审慎态度。他认为“当代之学，有是有非”。凡是空谈性命，脱离实际的学说，他

都加以否定。他说：“道”或“理”都是依存于物的，不能脱离具体的物而空谈什么永恒不变的理。“道”或“理”是否正确，要通过全面考察事物之后，才能作出判断。

浙东地区新兴的这两派，是代表东南地区广大兼事工商业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他们强调“功利”。这两派实际上就是功利学派。为了满足兼事工商业的地主阶级的功利，他们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和统一，主张抗金、反对求和；在经济上不但要求发展农业，而且要发展工商业。永康学派和永加学派的异军突起，是南宋时代东南地区农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当时浙东和浙西两路，是南宋的经济中心。这两路 15 州的人口，几乎占南宋总人口的一半。陈亮和叶适的学术思想，不仅影响浙东和浙西，而且影响到江西、湖南一带。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事功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四、宋金时期的道教

宋代道教流传很盛。宋真宗于 1014 年（大中祥符七年）到亳州太清宫拜谒老子，加号老子为太上老君。次年召信州龙虎山道士张已随入京，同年诏赐张已随为“虚静先生”，敕改龙虎山真仙观上清观，蠲其租税。真宗还命王钦若等编辑道藏，大修宫观。徽宗更加崇信道教，1105 年（崇宁四年）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号“虚靖先生”，1113 年（政和三年）于福宁殿（徽宗出生地）建玉清和阳宫，后又在禁苑旁建上

清宝箓宫，他示意道箓院上章，称徽宗为“神霄帝君”，是上帝元子，奉上帝之命降世为人主，册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徽宗还下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校定镂板，刊行全藏，又于太学置《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并建立道阶，道官凡 26 等。又诏令天下“洞天福地”善建宫观，每一宫观赐田不下数千顷，道士都有俸禄，一时道教大盛。

宋代道教流派以张天师的嫡系为首，称正一教。此派原为东汉张陵（即张道陵）所创的五斗米道，故奉张陵为“天师”。其后裔袭承道法，居龙虎山，世称张天师。龙虎山在今江西贵溪县西南，由龙、虎二山组成而得名，其祀神祀庙为上清宫，相传原为张陵炼丹修道之处。至南宋时道教方稍衰息。

金代道教也很兴盛，共分全真道、大道教、太一教三派。其中全真道势力最大，此道据说是王喆（王中孚），于 1167 年在山东宁海（山东牟平）全真庵聚徒讲道时创立，自称“重阳真人”，认为“识心见性”即为全真，主张道、释、儒三教合一。后长春真人邱处机继续传教。1188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召邱处机到中都传教，承认全真教的合法地位。大道教为金初刘德仁所创，以老子的“清静无为”、“少私寡欲”、“慈俭不争”为宗旨，提倡道德修行而不言“飞身化炼”之术。太一教为金初萧抱珍所创，因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而得名。教旨以老子之学修身，认为“做仙做佛不做，只依一弱字便是”。又以巫祝符箓之术济人，故与全真道、大道教相异。

第二节 文 学

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初年，以杨亿为领袖，以刘筠、钱惟演、李示谔、陈越、李维、西谓、刁衍、张泳、钱惟济、任随、舒雅、晁迥、崔遵度、薛映、刘秉等 18 人为羽翼，形成了一个文人小团体。他们标榜学习李商隐，实际上则丢弃了李商隐诗歌的内容和精神，专取其艳丽、雕镂、骈俪的技巧，大家倡和、互相仿效，遂成风气。宋景德（1004—1008 年）年间，杨亿等人在修书和写作制诰的余暇，以作诗为消遣，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诗。后来这些诗由杨亿編集并序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磨；而予以固陋之姿，参酬继之末；入兰游雾，虽获益以居多；观海学山，叹知量而中止。……其属而和者又十有五人，析为 2 卷，取玉山策府之名，命之曰《西崑酬唱集》云尔。”

杨亿等人，天才都不甚高，只知摭拾字句，以粉泽华艳为能事，引起许多人反感。陈从易深恨杨亿等人的应酬游戏之作，认为它们破坏了古代诗歌的传统，便向皇帝上书说“或下里如会粹，或丛脞如急就，”深中其弊。一次，皇帝宴请百官吃酒，一个优伶打扮成李商隐的模样，故意穿着破破

烂烂的衣服，苦着脸向众人说：“我是李商隐，被修书写制诰的诸公把我拉扯成这个样子。”满场百官笑声大作。优伶的这种讽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窃取李商隐的特点。尽管如此，但由于西崑诗人政治地位高，且同入馆阁，各人俱有文名，再加上社会比较安定，也需要点缀升平之作，他们仍然主盟文坛，被称为“杨刘风彩，耸动天下。”

浮艳文词可供粉饰和享乐之用，但不能作为加强封建统治的工具。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反对浮艳文词的人愈来愈多。宋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下诏指责说：“近代以来，属词多弊，侈靡滋甚，浮艳相高，”并告诫各级官僚“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遮复古风。”宋仁宗时，范仲淹于天圣三年（1025年）提出改革时弊的政纲中，也要求“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此后，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年）和明道二年（1033年）连续下诏申戒浮华，提倡古文。在这20余年间，朝廷的表态和有见识的文人对西崑体的不满互相呼应，主张改革文风的人士接踵而至，显示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前期的活跃局面。

与此同时，河北大名人柳开第一个提出了复古写作韩柳式的散文。他在《应责》中，提倡一种“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扬文道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但他的总倾向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女恶容之厚于德，不恶德之厚于容也；文恶辞之华于理，不恶理之华于辞也。”他的古文创作未能实践他的理论，因而影

响不大，但他首先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反浮靡等观点，对人们很有启示。与柳开同时倡导古文而创作也有成就的是王禹偁。他“遇中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他主张写“传道明心”的古文，和杜甫式的对现实有独特认识的诗歌。他以自己的作品《待漏院记》、《唐河唐姬传》等语言平易的古文和《感流亡》、《畚田词》、《对雪》、《十月二十日作》等单行素笔，直抒胸臆的诗歌，初涉宋初诗坛文坛。稍后，时称徂徕先生的山东人石介开始对西崑派正式进行了严厉的攻击和批判。他在《怪说》中力诋杨亿，不遗余力：“昔杨翰林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忧天下未尽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见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灭，乃发其盲，开其聾，使天下唯见己之道，唯闻己之道，叵知其他。今天有杨亿之道四十年矣。……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剗镞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入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其为怪大矣。”而穆修则在西崑体风靡之际，不顾流俗的诋毁和耻笑，勇敢地校对、刻印韩愈、柳宗元文集数百部，亲自在京师出售，声称“践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余所敢知也。”

此后不久，欧阳修开始登上文坛，从而将这场诗文革新

运动引向了最后的胜利。欧阳修小时家贫，靠母亲郑氏盛沙练字，学问猛增。少年时代，人人以杨、刘等西崑之作相标榜，他偏不取。17岁那年参加州考时，被考官所黜。他仍不回头，又拿出韩愈之文细加研读。七年后的天圣八年（1030年）才中进士，任馆阁校勘。在政治上他支持范仲淹，在文学上他推崇韩愈。他曾在西崑名家钱惟演幕府中作事，但丝毫不受其影响，而与尹师鲁（即尹洙）等人共同作古文。他继承穆修之事，继续校定、编印韩愈文集。在《记旧本韩文后》说：“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接着，又从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并根据实践经验有所取舍：就道而言，趋向平实，就文而言，趋向平易。他反对“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文章，也反对“弃百事而不关于心”的态度，主张为现实、为时事而创作；使古文从高谈道统的论文变成为实用的散文。而且，他还以自己丰富的诗文创作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写出许多为时为事的作品。散文有《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序》、《泝冈阡表》、《醉翁亭记》等名篇，诗歌有《食糟民》、《答杨子敬两长句》、《明妃曲》等卓然不群之作。宋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始任知贡举，于是，便借助行政职权严格禁止考试用华而不实的骈文，而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并通过此来选拔诗文革新的后起之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人，都是在他的直接或间接的培养和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在欧阳修的热情努力下，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欧阳修的弟子中，为诗文革新运动立下大功的是苏

轼。苏轼诗文创作的特点是重视“文”。他论道论文，远异于柳开、石介诸人，亦不同于欧阳修、王安石等。他讲道，不局限于孔孟儒家之道，而是指天地间每一事物背后的“内在物理”。他讲文，是“求物之妙”，“了然于心”和“了然于口与手”的辞达之文。一扫浮艳、用典和艰涩，使诗文革新运动步入新阶段，将西崑体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苏轼在创作上极为辛勤，在提拔青年人上也不遗余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和陈师道、李廌等，后来也都成为文坛著名人物。如果说欧阳修奠定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胜利的基础，那么，苏轼则是最后完成它的人。

二、璀璨夺目的文学奇葩——宋词

词，又称“曲子词”“曲子”，是从唐代配合当时的音乐而新兴的歌词发展而来。原是为乐曲（燕乐）配唱的，后来逐渐脱离乐曲而成为独立的文体。词的体制比诗复杂。每首词最初都有与其相配合的乐调，称为词调，每一词调都有一个或几个名称，称为词牌。每一词调为配合乐曲，在句数、字数和声韵方面都有特定的格律形式，被称为词谱。写词，要依词谱填写，叫作填词。每一词调一般反复吟唱，分上下两段，叫做上阙和下阙，或上片和下片。词又称长短句。因为多数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有些词调如《浪淘沙》、《雨霖霖》等，原是唐代七言绝句体，后来为配乐而增减字句，演变为长短句。所以词在声律、手法等方面都受到唐代近体诗的影响。

词源于民间，现存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甘肃敦煌石窟

发现的曲子词写本残卷，有 160 多首，题材广泛，特别是那些反映妇女生活感情的词，有较高的艺术性。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些有名的诗人开始填词，如张志和的《渔歌子》，王建、韦应物等人的《调笑令》。而白居易和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填词较多的诗人。白居易的《忆江南》3 首、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枝词》至今脍炙人口，含意深远。而相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和《忆秦娥》意境阔大，感慨深沉，在当时词的创作中矫首独立，令人刮目相看。

在词的发展史上，《花间词》所收诸词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晚唐五代，尤其是西蜀曲子词的第一部总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共 500 首，18 家，其中温庭筠的词数量最多达 66 首，并被列在词集之首，称为“花间鼻祖”。他精通音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量填词并以词名家的文人。其词多写妇女容貌、服饰和情态、字面艳丽精密，词调轻柔婉约、意境含蓄典雅，确立了词体的独特风范。花间词人中与温庭筠齐名的是韦庄。风格清新疏朗，自成一家，其词除多写男女爱情之外，也写直抒个人感情之词，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开了以词抒情的先例。“温韦”之外，孙光宪、欧阳炯、李珣等堪称名家。

与花间词几乎同时，偏安南方的南唐国主李璟、李煜周围也聚集了大批词人。李璟词仅存四首，其《摊破浣溪沙》语意深沉，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李煜是南唐亡国之君。其词以亡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亡国前过着纵情享乐的帝王生活，其词多写宫廷豪华场面和艳情生活，充满

了浓烈的脂粉气、珠光气。亡国后，从帝王沦为阶下囚，地位的巨变，感情亦为之一变，其词多写对故国往事的追思。诸如《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饷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类词，念往伤今，感情真切，又明白如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和共鸣，历来为人传诵。国家的沦亡，词风的转变，使李煜成为南唐成就最高，对宋词影响最大的词人。李氏父子而外，冯延巳亦堪称南唐词作大家，遗有《阳春集》，其词情思深婉、语言清丽。善于因情设景，以景写情，细腻地表达词中人的复杂心绪，又常常流露出更为深沉的人生感慨，与《花间集》中的艳词有不同的境界，并直接启发了北宋晏殊、欧阳修的词风。

词至宋代，发扬光大，遂为洪流，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文学史上，词以宋称，宋词代表了一代文学，和唐诗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及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录存作品两万多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 1430 多人。可见其作家群之庞大，作品数量之丰。而其题材之广泛、风格之多样、艺术上的成就亦是其他各朝无法比拟的。宋词的发展可分为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三个阶段。北宋词第一位重要作家是晏殊。而前于晏殊者如夏竦，潘阆之流者皆不称。其词作风格闲雅、飘逸旷达，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于抒情之中别具思致，韵味悠长，足为后世楷模。晏殊之子晏几道，人称“小晏”，早年富贵，中年家境衰落，其词多写梦境与追忆的内容，情调感伤，章法曲折多变，情感起伏婉转，整个词风凄清顿挫。一

代文宗欧阳修以其德业文章自命为一代名臣。其词既有一种豪放之气，沉着之致，又具有抑扬唱叹之美，正所谓“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樽前看取衰翁”，在北宋词坛起到了“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的启迪作用。一代名臣范仲淹，词作不多，却风格独具，其词融豪放，婉约为一体，颇见其出将入相的才能与胸襟。张先词作虽难入大家行列，却也以“三影”郎中出尽风头。

北宋词坛，柳永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位大量创制慢词，推动慢词兴盛的重要词人。其词精于铺叙。颇具声律之美，意境高妙，气象开阔。章法结构开合自如、富于变化。内容上，取材广泛，并且直接来自市井生活，感情真挚，不仅真实反映了北宋广阔的市井生活，而且从中流露出的感慨悲凉，也使我们能感受到一个真挚敏感，才华横溢，却又落拓失意，潦倒江湖的伟大身影。柳词在体制、题材和技法方面都有发展和创新，对宋代慢词，金元曲子词产生了很大影响。柳永也成为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人物。

一代文豪苏东坡的文集中，词只占了很小一部分，但正是这一小部分却为宋词开辟出一片新天地，其词不再局限于男女恋情、离愁别绪，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为诗人惯用的题材皆可入词。词风豪迈奔放，坦率开朗，如“大江东去”，汨汨滔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北宋后期词家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贺铸和周邦彦为代表。秦观词以“情韵兼胜”著称，在当时的地位超过苏轼。他早年有过结交歌女的经历，词风受柳永影响，多写春愁别怨、风格清丽婉转，《鹊桥仙》（纤云弄巧）是这一特色

的代表作。晚年遭遇党祸被贬谪，词作多为抒发政治失意后的悲凉心绪之作，风格转为凄厉深婉。如《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鸣）。

贺铸是位豪爽近侠的人物，不少词肆意而成风格近似苏轼，但其令词情思深婉，风格清丽，近似秦观。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贺词还有大量用典和化用前人词句的特点。表现出以学问为词的倾向。

周邦彦被称为集婉约词之大成者，他精通音律，善于制谱作曲，其词多写艳情，咏物和羁旅愁绪，韵味深婉《拜星月慢·秋思》、《苏幕遮》、《燎沉香》《西河·金陵怀古》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得意之作。总体看来，周词章法更多变化、音律更为严格，语言更加典雅，代表了婉约词走向典雅工巧的趋势。

南宋前期词人首推李清照。其词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写伤春怨别的闺阁生活，表现女人多愁善感的个性，风格灵秀，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南渡，面对国破家亡，其词多写亡国之恨、破家之痛和个人身世的不幸，风格沉健，充满“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伤情调。如《声声慢》下片，触景生情“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感伤之情，不言而喻。李清照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其创作上，更体现在他对词学的造诣上，她早年曾作《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注重词体协音律、重铺叙，有

情致的特点，并批评了从柳永、苏轼到秦观、黄庭坚的不足。

南宋前期，面对着金兵的入侵，不少爱国词人振臂高呼，爱国之情溢于词表。张元干、岳飞、张孝祥是早期代表。张元干那“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的忧国忧民之情，和“要斩楼兰三尺剑”的抗战激情，正是那一时代许多爱国词人的共同心声。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更令无数爱国志士为之振奋。

南宋爱国词人中，辛弃疾可谓独树一帜，号称大家。其词驰骋百家，搜罗万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都达到两宋词的最高峰。辛词现存 600 余首，向来被人们称为“英雄之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如《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破阵子》“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等都体现了辛词的这一特点。当然辛词中表现壮志难酬，报国无门心情的也不少。《江城子》中“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便可见一斑，风格沉郁顿挫，悲壮慷慨。辛词中也不乏风格婉约，格调清新，寓意深曲的佳作，“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颇有田园风味。《摸鱼儿》中全篇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通过美人迟暮，惜春、伤春，表达了自己怀才不用，壮志难酬的苦闷心情。

在辛弃疾豪壮爱国词风的影响下，陈亮、刘过、刘克庄、

刘辰翁也挥洒战斗之笔，激扬爱国之情，写出了不少感慨国事，笔力雄健、风格豪放粗犷的佳作。他们也被称为辛派词人。他们和辛弃疾的词作对南宋后期文天祥的爱国词有很大影响。

南宋中期以后，宋金对峙局面形成，政局暂时稳定，爱国词退温，中后期以姜夔为首的姜派词人崛起。姜夔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精通音律，能自制曲谱。其词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尤以意境清苦、语言凝炼著称。内容大部分是纪游、咏物和感慨身世的。尤其是咏物词更令人拍案叫奇。如咏梅的《暗香》和《疏影》，托物怀人，语意深婉。《暗香》上片从往昔梅边相会时写起“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唤起玉人，不管清寒与攀摘。”接着写离别后无心赏梅却被梅花的“暗香”触动了心事：“何逊而今渐老，都忘却春风词笔，但怪得外竹疏花，香冷入瑶席。”下片幻想折梅寄远，感叹重逢无期“江国正寂寂。叹寄与路遥，夜雪初积，翠花易泣，红萼无言耿相忆。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姜词中也不乏伤时悯乱的佳作，如自度曲《扬州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怨言兵。”“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姜词对后世影响较大，历史上颇多争议的吴文英也受其影响。宋代最后一位著名词人张炎，尤其推崇姜词的“清空”，并遗有论词专著《词源》，强调“词之作必须合于律”，注重“词婉于诗”的抒情性，其词在元初颇负盛名，对清初浙派词人有很大影响。

宋以后，词的发展渐趋衰落，元明清三代，虽也不乏词

作大家，且流派迭起，但大多模拟成性，无论其题材和艺术造诣，都没有突破宋人的框架，倒是纳兰性德的词从蒙古而来，多少有些清新的味道。当然王国维的词论《人间词话》还是备受人推崇的。

三、启迪后代的文学大家

苏 轼

苏轼（1037—1101 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他自幼与胞弟苏辙受教于乃父苏洵。苏洵是位文学家，文章写得很出色。苏轼刚过 20 岁，就与胞弟随乃父告别了故乡的巴山蜀水，进京赴试。翌年（1057 年），恰逢大比，兄弟一起进入考场，结果，双双金榜题名。苏洵在这时也誉满京城，以才文宏辩，被比为“当代荀卿”。荀卿即荀子，是战国的思想家，以文章雄辩闻于世。从此，苏氏父子名动天下，世称“三苏”。

苏轼初露头角，即得到了如此的赏识，其官运似可亨通无疑了。然而，他混迹宦海 40 余年，虽在几任地方官时颇有政绩，但政治上却总不甚得意，时浮时沉，始终未能展其才，竟其志。

王安石变法，苏轼持异议，成为反对派，因而遭到贬谪。后又因作诗讥讽新政，被关入狱中，险遭杀头。变法失败，旧势力上台，又不分良莠，尽去新法。苏轼并不赞同这种偏激做法，曾与旧党领袖司马光面争，故而又遭旧党排斥。十几

年后，新党重又得势，苏轼再被目为旧党，继续遭到迫害。最后，被贬到岭南惠州，再贬去荒凉的海南岛，欲置之于死地。后虽遇赦北归，未至京师，即病逝途中，时年 66 岁。葬于汝州郟城（今河南郟县）钓台乡上瑞里的小峨嵋山。

苏轼一生，虽不得意于官场，却得以纵横驰骋于文坛，大显身手，成就惊人。苏轼于文、诗、词、赋，无所不精，传之后世的诗有 4000 余首，词 340 余首，加之其他各种体裁的文章，号称“万篇”，共 200 万字左右。

苏轼是散文大手笔。他主张写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文真切自然、姿态横生，考科举的学子们争相仿效。故时有谚云：“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后世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并称为“韩柳欧苏”，号称“唐宋四大家”。他们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苏轼的诗，以艺术性见长，往往富有美学情趣与哲理意味。试看他题于庐山西林寺壁上的一首七绝：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明白如话，通俗易懂。然而，细细咀嚼，其味至深、其理无穷。“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诗句，已成为人们通用的成语，

比喻对事物的本质尚没有真正的了解。

苏文、苏诗创作甚丰，但他的最大成就还在于词。苏轼的词超迈古人，独步于文坛。试看其《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这是诗人 47 岁时，因作诗得罪当朝，被贬官黄州（今湖北黄冈）游赤壁时的咏怀之作。开篇即以滚滚长江为喻，站在哲学的高峰，纵观历史长河，感叹浪淘千古，不知出现过多少英雄豪杰。继而，具体赞颂了三国赤壁之战时吴国主将周瑜，年轻有为，谈笑间，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立下了千古功业。诗人此时此刻，面对如画江山，忆及千古英俊，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不觉悲从中来。然而，到此笔锋一转，竟以“一樽还酹江月（即倾杯洒酒祭江）”作结。这就令人想到诗人胸存浩气、激荡不已，犹如大江东去、万古不息。

这词意境雄奇、风格豪迈。有个故事说：苏轼在汴京时，有次问一名歌手：“我的词与柳永的词相比，怎么样？”柳永是北宋著名的词人。那歌手风趣地回答说：“柳永的词，只适宜十七八的女孩儿，手拿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词句)。你的词，须要关西大汉，手拿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了哈哈大笑。这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苏词的风格特色以及诗人的品格风貌。

苏轼在写这首“大江东去”的名词时，不仅官场失意，而且生活上也艰难拮据。友人因而代其向郡守乞得几十亩旧营地。苏轼躬身垦壁，并在营地东坡盖一草屋，名曰“雪堂”，因而自号东坡居士。他就在那东坡雪堂，著书立论，并写下大量诗、文，成为其一生中创作最丰的时期。与《念奴娇·赤壁怀古》齐名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就是这时期的杰作。

苏轼 62 岁时，流放在海南岛。他登高北望，有四顾途穷之感。可是，他心境豁达，泰然处之，甚至认为海南为岛，九州之外也皆环海，也不过是一大岛，海南与中原，无所谓优劣，犹如仓中的米粒，谁能分出高下雌雄？就在这人皆以为绝境的去处，苏轼却写下了“回顾环一岛，百洞蟠其中，……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这样气势磅礴的诗句。

这位诗人，处逆境，临死地，却通达豪放若此，写下一篇篇千古传诵的名作，真堪称是位“千古风流人物”！

这位才子，不但是位文学家，也是位艺术家。他不但长于诗、词，也擅于书、画。在中国书法史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代四家”，而苏轼书法，为四家之冠。他的书法，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苏轼为官，颇有政绩。他出任杭州太守时，疏浚湖水、提倡农桑，为民教化，至今杭州人民还很怀念他。西湖中的苏堤据说就是在他当年的主持下筑成的。苏堤是西湖胜景之一。

至今那漫漫长堤上，垂柳成荫、烟雾葱茏。凡游西湖，漫步于此的人，谁不缅怀这位奇伟的诗人呢！西湖，又名西子湖（西子，即春秋末年越国漂亮的女子西施），它的得名就是来源于苏轼下面的这首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辛弃疾

陆游生长在江南，与陆游齐名的辛弃疾（1140—1207年）出生在北方。他是山东济南人，字幼安，号稼轩，比陆游小15岁。

辛弃疾是宋代杰出的爱国词人。词从广义上说，也就是诗。词有许多不同的词调，句子的长短、韵位和平仄，都有一定的格律。大约从唐朝中期以后，许多作家喜欢填词，词就成为一种新的诗体。

在金朝统治下的北方，人民群众反奴役的斗争浪潮起伏不已。辛弃疾少年时代，生活在北方人民抗金的热潮中。他曾经跟一位学者刘瞻读书。1154年，辛弃疾参加进士科考试，没有考中。在旅途中，他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见闻。北方壮丽的山川和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质，深深地触动了这个青年人。北方人民反压迫斗争的坚强意志，对辛弃疾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

就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在北方投入了抗金战斗。

1161年，金朝完颜亮发动了对南宋的又一次进攻，淮水以北、潼关以东的人民首当其冲。北方群众纷纷举行抵抗。济南人耿京联络各地起义军，队伍扩大到25万人。22岁的辛弃疾也在济南山区聚集了2000多人，与耿京联合在一起。1162年，耿京派他南下联络南宋的将相大臣，准备大举北上抗金。从此以后，辛弃疾就留在南方，积极策划抗金活动。抵抗派张浚发动北伐，陆游和辛弃疾都是一心赞同的。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辛弃疾感到失望。第二年（1165年）他写了长篇的政论文章，从十个方面分析抗金斗争对南宋军民是有利的。金朝在北方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北方人民随时都能配合南宋大军袭击金兵。辛弃疾认为：金朝的财政又不充裕，女真贵族越是搜刮民财，越要引起人民的怨恨。金兵数量虽多，大多是被强迫充军的汉人和契丹人，他们并不愿为女真统治者效命。辛弃疾说：战争的胜败，取决于“顺”（正义的）和“逆”（非正义的）。金兵多次虏掠，这是倒行逆施；南宋军民的抵抗，这是自卫报国。如果南宋将士决心战斗下去，先攻山东，再取河北，中原失地一定可以收复。

辛弃疾的这些理论，慷慨激昂，有独到见解。南宋的求和派当然是听不进去的。1168年（乾道四年），辛弃疾被派遣担任建康府通判。他的一片爱国心愿没有得到实现，心境不免有些忧郁。到了建康以后，登上赏心亭眺望，写了一首著名的词篇《水龙吟》，其中有这么几句：“……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有谁能了解他的抗金卫国的远大抱负呢？离开了家乡山

东，跑到了江南，把佩带在身上的吴钩宝剑看了又看，但英雄无用武之地。由于心情的焦急，频频地拍着赏心亭上的阑干。辛弃疾空流英雄的眼泪。

这一时期，辛弃疾和陆游一样的不得志。1181年（淳熙八年），辛弃疾在江西信州郡城外建造了“带湖新居”，还有一片田园。他在农村过了20年被迫退休的生活。后来南宋政府派他充任浙东路安抚使兼绍兴知府。辛弃疾到了山阴，会晤了老友陆游。他们两人欢聚在一起，倾吐了至死不变的爱国心情，在精神上互相得到了安慰。辛弃疾看到陆游的房子已经破旧不堪，很想替友人修建几间安适的住宅和书房，却被陆游婉言谢绝了。80多岁的诗人陆游，如同年青时一样，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贪求享受。他不愿耗费友人的资财，为他建筑新居。他安心地过着平淡、艰苦、朴素的生活。

1206年（开禧二年），南宋大臣韩侂胄利用金朝趋向衰世的时机，兴师北伐。这是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辛弃疾和陆游都是支持韩侂胄北伐的。辛弃疾对韩侂胄决定伐金，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两个都写了诗词赞颂韩侂胄的出兵北伐，并对恢复失地的斗争充满信心。但是南宋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腐朽，韩侂胄仓促兴师、急于求成，在军事上准备不足。加上将帅乏人，内部不和，宋军当中出了内奸，伐金的部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韩侂胄因出兵失败而遭到求和派的暗杀。南宋王朝接受金朝的苛刻条件，于1208年（嘉定元年）订立了和议：金、宋改称伯侄之国，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两匹，犒军钱300万贯。金朝退出原属南宋的淮南、陕西各地。这就是历史上十分可耻的“嘉定和议”。

辛弃疾和陆游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都有奔放豪爽的性格，都有坚强不屈的爱国愿望，能文能武。他们憎恨南宋小朝廷对金朝奴颜卑膝的可耻行径，主张恢复中原，完成国家的统一。在政治上，他们都遭到求和派的压抑、打击和陷害。但是在文学上，他们的作品引起千千万万人的共鸣，跟人民的呼吸息息相通。

爱国诗人辛弃疾留下的作品，有词 600 多首。在作品中，流露出作为一个爱国志士的沉痛心情。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激发了他的战斗意志。他离开了北方，来到了江南。在南方的 40 年中，他对南宋朝廷的懦弱无能，十分愤慨。在许多作品中，辛弃疾表露了收复北方故土的强烈愿望。他写过如下一首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这一首词是为韩元吉祝寿写的，但不是应酬之作，而是表白作者对国家前途的无限关怀。辛弃疾从遥远的北方南来，就是为了担当起卫国的重任。词的上段是指那些渡江南来的人，并不是都同辛弃疾一样，有那么远大的爱国抱负。有些人像东晋时代渡江而来的名士一样，只是消极地在新亭触景

伤情。而南宋的当权者，又像西晋时的王衍（字夷甫），只会清谈误国，对“神州沉陆”，无动于衷。因此，他感到“平戎万里”的伟大事业，只有他和他的好友韩元吉等人来承担。词的下段是对韩元吉的一番鼓励，认为他有才能，应该做一番大事业。等到国家大事告成以后，再来祝贺他过安适的晚年。但是目前决不能如唐朝宰相裴度那样，退居在绿野堂；也不能学李德裕的样子，退居在平泉庄；或者如东晋的谢安那样，隐居在东山。可见辛弃疾对国家的前途是积极的，对统一南北是具有信心的。

辛弃疾认为“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他把农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酷。在辛弃疾将近 20 年的退休生活中，也曾经把心情寄托在农村，写出描绘农村景物和农民生活的好作品。他懂得农民们的希望是成群的鸡鸭和长得比茅屋还高的桑麻。当他看到农村的丰收情景，心里十分喜悦。“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辛弃疾和陆游一样都是具有爱国思想的文学作家。他们的创作活动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他们以诗词为武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豪门权奸，反对南宋王朝的屈辱求和，反对贪污腐化和骄奢淫逸的生活，反对残酷的压榨人民。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被千千万万人民所传诵，不仅由于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艺术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作品的内容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他们在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时，明朗地表示了自己的爱憎和理想。

辛弃疾和陆游如同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总要受到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是地主阶级的爱国分子，

爱国是和“忠君”紧紧地结合一起的。为了“忠君”，辛弃疾接受南宋王朝的命令，于1175年（淳熙二年）参加过镇压赖文政领导的农民起义。赖文政终于在江州（江西九江）被杀害。并且在辛弃疾和陆游的作品中，都有一些封建糟粕。

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年），号易安居士，前半生时处于北宋，后半生时处于南宋。她44岁那年（1127年）南渡，从北方到了江南。这是宋代的，也是她个人一生的重要分界线。

李清照在北宋时期的生活是安适而富有诗意的。

清照出生在历城的柳絮泉畔，父亲李格非为朝官，也是文坛名士，著有《洛阳名园记》传世，母亲王氏为状元孙女，也知书能文。她自幼受到了良好的熏陶，晓音律，工书画，长于诗词。十四五岁即以才女闻名于朝野。

清照年方18，嫁给了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儿子太学生赵明诚。明诚长清照3岁。夫妻感情甚笃，流传后世不少佳话。

明诚喜金石，著有《金石录》传世，清照也同丈夫一样有金石癖。清照长于诗词，明诚也有同好。他们的住处，并不豪华，但所藏古器图籍，真可谓汗牛充栋。

每当饭后烹茶，夫妻二人常以猜中某事载于某书、几卷、几页、几行，而决胜负以为乐。胜者得先饮茶。清照记性较强，故多中。举杯欲饮，忍俊不禁，往往将茶水泼在衣上。

每晚，夫妻二人则在一起切磋学问，约定燃烛一支，烛不尽不得作罢。

清照的词，清新婉约，才气横溢。可是，年轻的丈夫却

总想胜过爱妻。有次，清照寄赠明诚《醉花阴》词一首，明诚杜门谢客、废寝忘食，用了三日三夜，做得词 50 首，将清照那词也抄在其中，拿给友人陆德夫去看。德夫玩诵再三，说：“有三句绝佳。”明诚问何所指，德夫答曰：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这恰是清照那新词中的佳句。

不料，随着赵宋王朝的南迁，李清照夫妻的美满生活也来了个急剧的变化。那是靖康之变那年（1127 年），京都陷落、山河破碎。就在这一年，赵明诚病故于建康，青州故居中十几间屋收藏的古玩图籍在兵变中化为灰烬，护送过江的 15 车金石书画也在兵荒马乱中散失殆尽。国破、家亡、夫死……，巨大的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她袭来。最后只剩下词人孑然一身、颠沛流离，漂泊于杭州、绍兴、临海、温州、衢州、金华各地，备尝人生的艰辛。

就在这样的一种愁苦不堪的绝境中，词人抑郁地唱道：“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是啊，那金华双溪中的小船怎能载得动这许多的哀愁呢！这不仅是鬓发霜染的老妇个人的愁，也是整个国家、民族共同遭遇的愁啊！

南渡，是李清照个人生活的、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重大转

折。这之前，其词的内容多写闺情，风趣活泼；之后，多写思乡离愁，格调沉郁。但其词风，却一贯以委婉蕴藉为特色，是继五代李煜、北宋柳永之后的佼佼者，达到了婉约词的顶峰。

词人晚年孤苦无依，得寿多少，至今未能考证清楚。她至少活了 70 多岁，留下了文集 7 卷，词集 6 卷。可惜，后世多有散失。现传世的包括残篇断句在内总共只有 70 多篇。

作为婉约派的一代词主，李清照的作品并不都是沉溺于个人的哀愁，特别是她在后半生所写的一些诗作。我们不妨读读她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诗人虽是一个弱女子，可在民族危难之际，面对苟安的南宋君臣，却一扫凄凄惨惨的愁容而变得金刚怒目了。她赞美西楚霸王，虽然失败了也不肯渡江苟安的知耻有节的品格，以此鞭笞那些无耻无节的南宋君臣。她自己则“愿将血泪寄河山，去洒青州一抔土”，即为恢复中原而捐躯。

从这里，不难看到词人的内在品格。

陆游的爱国主义诗篇

陆游活了 85 岁。由于他长期地、辛勤地从事创作，给我

们留下了将近 1 万首诗和许多其他作品。他的诗集叫《剑南诗篇》，在数量上是古代诗人中首屈一指的，在质量上也达到了高峰。在我国文学史上，他的名字可以和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最伟大的诗人并列。

陆游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诗人，他对中国文学的杰出贡献，就是他的那些反映了南宋前期社会现实的爱国主义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发自诗人内心，而体现于优美的艺术形式。在他将近万首的诗篇里，都贯串着这种爱祖国、爱民族的思想感情。比如，他抒写早年抱负的诗说：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抒写壮年志趣的诗说：

逆胡未灭心未平，孤剑床头铿有声。

抒写 82 岁时的意气的诗说：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

他甚至希望和想象，就是将来自己死去的时候，也要死在战场上，壮烈地为国捐躯，他说：

白发萧萧卧泽中，只凭天地鉴孤忠。厄穷苏武餐毡久，忧愤张巡嚼齿空。细雨春芜上林苑，颓垣

夜月洛阳宫。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从这一系列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从少到老始终不渝的爱国和报国的雄心。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爱国思想的进步性。他的爱国思想是以国家和民族为重，而不仅是忠于宋朝皇帝一家一姓的。构成陆游爱国思想的主要因素，首先是他对沦陷区人民的关怀，如他在 68 岁，曾愤然唱道：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
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这里的河，指黄河；岳，指西岳华山。三万里和五千仞并非实数，是一种夸张的写法，但用来形容山河的壮丽则是相称的。诗人以祖国有这样壮丽的山河而自豪，失掉了它们，则非常痛惜。特别是想到那些沦陷区的人民，诗人更为关切。他称他们为“遗民”，暗示那是由于宋朝统治者的撤退逃跑而把他们遗弃在那里的。他们含悲垂泪、年复一年地盼望着宋军的到来。可是，他们的希望却总是落空。诗人对他们充满着同情，他们的希望也就是诗人的希望，所以写得这样真切，使人感动。

正由于他的观点进步，所以他对南宋时代的社会现实，能够认识得比较正确而深刻，并且能够在诗里全面地反映出来。试看《关山月》这首诗：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这首诗是淳熙四年（1177）陆游在成都时写的。大意是说：自孝宗隆兴二年向金人屈辱议和以来，豪门贵族一直过着极其奢侈腐朽的生活，将军们按兵不战，士兵们白白地在边疆驻守，消磨岁月，因而金人得以长期占据中原；沦陷区的人民却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殷切地盼望着宋军。

在这首诗里，陆游用了三方面对照的写法：遗民是渴望恢复的；战士是极愿为国效死、杀敌立功的；只有朱门里的达官贵人在那里酣歌醉舞，甘心向金人称臣纳贡。从这三方面的鲜明对照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就其所表现的内容来说，几乎概括了南宋一代的全部社会现实，而作者的忧国忧民的悲愤也充分地流露出来了。

陆游的诗也真实地反映了在南宋统治者压榨下的人民生活。他的名句：“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是那样鲜明地写出了当时社会上阶级对立的情况。而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他在另外一首诗里具体地解答说：“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话，封建社会的剥削实质——官府的掠夺和地主的兼并，形象地反映在这 20 个字之中了。

陆游的诗就是这样：它不但深刻地写出了当时尖锐的民

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揭露了劳动人民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榨，并竭诚地为他们呼吁，因而也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爱祖国、爱人民是他的诗歌的两项主要内容，而二者又是紧密结合起来的。

另外，陆游也写了一些日常生活、农村景物，以及歌颂祖国壮丽山川的诗歌。这些诗也贯注着诗人的真情实感，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如《游山西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
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这首诗是陆游在 1167 年闲居家乡时写的。前面六句十分概括而又形象地描绘了这个村庄里柳暗花明的风光，热热闹闹的节日景象，农民款待客人的纯朴真挚的感情。最后两句，说出了作者对农村生活的喜爱。作者在这里无异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景色绚丽的年画，使我们宛如身临其境正分享丰年的快乐。

陆游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对用词遣句，常常反复推敲、改了又改。现在流传的《剑南诗稿》是经过他亲手删定的，有很多诗都淘汰了，没有编进去。他的诗虽然不能说每首都好，但在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灵活地运用各种形式的诗体来表现丰富多彩的内容，概括地说来，他的古体诗的特点是气势豪放、词句精炼，而结构尤其严谨。所以往往篇幅很短，而意思却表达得非常明确清楚，如前面我

们提到的《关山月》就是这样。他在律诗方面的成就，比古诗要更高些；七言律诗更博得历来评论家的赞扬。它的特点是“使事（用典）必切，属对（对仗）必工”。如前引《游山西村》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一联，就是对仗工整、千古传诵的名句。又如《书愤》诗中，以“苏武餐毡”来形容自己的“厄穷”，以“张巡嚼齿”来表现自己的“忧愤”，都非常贴切，而又能突出自己的处境与心情，这是善于运用典故所收到的效果。至于他的绝句或抒写一时的感触，或描绘眼前的景物，也往往深入浅出、由小见大，能给读者以启发和艺术享受。

陆诗在语言方面，具有一个共同特色，那就是“清空一气，明白如话”，因而通俗易懂，加强了说服和感染的力量。

陆游的词也很有名。他的词虽然内容不如诗的广阔，风格不如诗的豪迈，但是其中表现的思想感情基本上和诗是一致的，如《诉衷情》：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
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
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这首词的大意是说：从前我为了建立功名，曾经到过遥远的梁州去从军。可是现在边疆的要塞，我连做梦也捉摸不到了。在军队里穿过的皮衣也因多年不穿而陈旧不堪。金人还没被消灭，而我的鬓发早已白如秋霜，只有空流眼泪罢了！我本来是一心一意到前线去担任抗敌工作的，那里料得到这

一辈子却老死在故乡镜湖边上呢？陆游在川陕从军的时候，是很想干一番恢复工作的，可是却失望而归。他后来直至老死，都念念不忘这个志愿，曾经多次表现在他的诗里。这里是又借词的形式抒发出来了。

在另外一首小词《卜算子》里，他还曾借梅花来比喻自己不幸的遭遇和高尚的品格：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种坚贞高洁的情操，这样清新秀美的意境，在他的诗里也是常见的。

总的来说，陆游的诗在南宋诗人中是成就最高的，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着极其光辉的一页。他的词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南宋词坛上也是杰出的。另外，他还有《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优秀的文史著作。

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年），字裕之，因曾在遗山（在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书，自号遗山山人。祖系属鲜卑族拓跋部。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父亲元德明累举不第，放浪山水间，以诗知名。他从小过继给叔父元格，随居掖县、陵川县。从十四岁起，从陵川郝天挺学习六年，淹贯经传百家。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至山西。次年，他从家乡流亡到福昌（今河南宜阳县西），兴定二年（1218年），又移家登封。兴定五年（1221年）进士，不就选，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中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馆编修。历任内乡令、南阳令、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被羁管于聊城，后转回家乡。元好问这时成为文坛宗主，写了大量的碑板铭志。他立志致力于金史的著述，在家筑亭，名“野史亭”，终于编成《壬辰杂编》，成为元代修《金史》的一个重要依据，现已亡佚。编纂金诗总集《中州集》（包括辑录词集《中州乐府》），保存了金代作家的生平资料和作品。

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元好问在福昌县三乡镇时写下了著名的《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了自汉魏迄于宋代的诗人和诗歌流派，发表了自己对诗歌的主张，目的是分清诗歌发展中的正伪之别。他主张诗歌应表现真情实景，诗人应当立诚，不自欺，不伪饰，因此他标榜真淳自然、刚健豪放的诗风。如：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望这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年华，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世闻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新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好问对建安以来诗歌优良传统的肯定和对西昆体、江西诗派的批评，这些观点直接关系到元明文学的发展，在文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元好问的诗歌真实地记录金末蒙古初期的社会现实，特别是蒙古灭金的过程。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十二月，哀宗出走就兵，元好问在围城在写的《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五首中的一首：

郁郁围城度两年，愁肠饥火日相煎。焦头无客知移突，曳足何人与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西南三月音书绝，落日孤云望眼穿！

次年，崔立降蒙古，元好问等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蒙古军羁管出京，暂住青城。元好问又写《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赐金，当时南牧已骎骎。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逐陆沈！华表鹤来应有语，铜槃人去亦何心？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在阅古今！

五月三日，元好问等又被从青城北渡押送聊城，他途中作《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帝僵臣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器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诗歌反映了蒙古灭金战争中的杀戮和虏掠的罪行，抒发了诗人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这些诗可以看到杜甫的影响，是金亡的史诗，此餐，金末写的《宿菊潭》、《宛正叹》等，描写租赋和征役带给的痛苦；蒙古窝阔台十年（1241年）元好问自山东返回故乡途中写的《雁门道中书所见》，揭露蒙古统治者对人民多方面的迫害，“食禾有百犏，择肉非一虎”，已经到了“呼天天不闻”的地步，诗人虽写一首诗，但“感讽复何补！”真是可歌可泣。赵翼在《瓠北诗话》中说：“（元好问）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

元好问诗的题材比较广泛，除丧乱诗外，还有不少描写自然景物和个人抒情的作品。如《游黄华山》，记诗人游河南林县黄华山（即林虑山）观瀑布，全诗气势雄伟，动荡心魄。又有描写历史人物的诗篇，如《赤壁图》：

马蹄一蹴荆门空，鼓声怒与江流东。曹瞒老去不解事，误认孙郎作阿琮。孙郎矫矫人中龙，顾盼叱咤生云风。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帜北卷天为红。至今图画见赤壁，仿佛烧虏留余踪。令人长忆眉山公，载酒夜俯冯夷宫。事殊兴极幽思集；天澹云闲今古同。得产电江山在眼中，凡今谁是出群雄。可怜当日周公瑾，憔悴黄州一秃翁。

作品写赤壁之战历史英雄叱咤风云的业绩，又因事感人，对周郎、坡公的命运，也包括诗人个人的命运，颇多不平。

他的词学习苏辛，他的散文追步欧苏，就其成就而言，不愧为金元两代大家。

四、话本与宋金 杂剧及其他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在宋代文学领域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因为城市经济的日趋发达，城市里的各阶层人民需要有通俗文学。宋代的话本和戏曲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话本就是白话小说。在汴京、临安等大都市，为了适应人民的娱乐，当时有一批说书的艺人，叫做“说话人”。他们说书的底本，就称为“话本”。这些话本都是民间文学创作。北宋末年，汴京有以专讲三国历史故事出名的说话人霍四究，有专讲五代历史故事的尹常卖。南宋时，临安的著名

说话人有蔡和、李公佐等 50 多人。

宋代流行于民间的话本，同唐代的传奇比较，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传奇是用文言写的，话本是宋代的口语白话；传奇的主要人物以统治阶级中的文人学士、才子佳人为主，而话本是以劳动人民包括手工业者、小商贩、农民等为主；传奇是封建文人的作品，话本是无名氏的民间文学作品。宋代的话本，包括短篇小说、长篇的讲史故事和讲经三类，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数量最多，也最能体现宋代民间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小说里，描绘出当时被压迫人民和各阶层人物的不同形象，反映出当时社会各阶级的真实面貌。小说比较深刻地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和反抗斗争的情况，讽刺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这些作品，开始时是民间的口头文学，后来因为说话人便于讲述和传授，才由民间一些有文化的人如贩书商等，把它记录下来。这些小说，大部分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的黑暗面作了大胆的揭露和控诉，对被压迫人民寄予深厚的同情。话本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加工，情节逐步完整，语言简练生动，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成就。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一些封建糟粕。

讲史的话本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如《五代史平话》、《武王伐纣平话》，对封建统治者和封建道德，有不同程度的揭露和否定，因而也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

宋代的民间戏曲，主要有杂剧和讲唱戏。

杂剧又叫滑稽戏，内容以带有讽刺性的滑稽故事为主，暴露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杂剧的形式偏重于念诵和对白。到了南宋时期，才有歌舞或故事表演，比较广泛地流行于北方。

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省晋南地区，考察有关北宋和金朝杂剧的流行情况。当时北方的城镇和农村，有流动性的戏曲艺人，他们利用各地的寺庙场地，演出各种戏曲。北宋和金朝时期，北方许多比较大的寺院，往往建筑专门为戏曲演出用的舞台。甚至在一些乡村小庙之中，也建立起戏台，反映出农村人民对杂剧艺术的欢迎。在今山西万荣、沁县、洪洞、临汾等县，当时都有固定的“舞亭”、“舞楼”、“露台”等建筑。这些戏台都设在寺庙里，人民群众利用迎神赛会的机会，欣赏各种戏曲演出。杂剧在北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宋代杂剧演出时所用的乐器，有鼓、笛、拍三种。擂鼓、吹笛、打拍配合得很自然。杂剧演员一般是四或五人，脸部化装只有黑、白两种颜色，一种是白粉，一种是黑墨。后来人们惯用“粉墨登场”这一成语，出处就在这里。考古工作者在金朝的墓葬中，发现过用白粉和黑墨化装的“戏俑”，还发现过仿照木结构的砖砌舞台模型。

宋、金时代，还有一种讲唱戏，包括鼓子词和诸宫调。鼓子词是一种叙事的讲唱文学，有唱有白，但没有舞蹈。诸宫调的曲调能讲唱长篇故事。诸宫调流行于北方，流传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就是金朝文人的作品。

从北宋末到南宋时代，我国南方流行一种南戏（也称南曲戏文）。它首先出现在温州，又叫做“温州杂剧”。宋代的温州，即今浙江省温州市。温州之所以成为我国戏剧的一个发源地，是因为从北宋初年起，温州就是东南沿海的商业都市，是瓯江流域乃至浙东、闽北、赣东北一带手工业品和土特产的集散地，水路交通直达明州和泉州。当时温州是一个

十分繁华的商业城市，四面八方人士，包括民间伎艺，都集中到那里。民间的各种伎艺互相渗透，于是产生更能迎合人民需要的“温州杂剧”。从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来看，大多是民间作品，也有“书会”中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创作的。当时温州有一个闻名的书会叫做“九山书会”，有些剧本就是这个书会中人集体创作的。

南戏基本上是运用民间歌谣，再吸收鼓子词、诸宫调等戏曲的优点，比北方的杂剧更加生动热闹。南戏的故事情节十分丰富，演员的角色也增多了。宋、金对立时代，北方的杂剧和南方的南戏，平行发展，为后来元曲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第三节 史 学

一、《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根据大量史料，经过19年的努力终于编撰成这部年经事纬的巨著。于元丰七年（1084）成书进呈。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圣旨下杭州镂版，元祐七年刻成。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山西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元年（1038）中进士，以奉礼郎为华州判官。改签书苏州判官事。累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学士。曾撰《通志》八卷，颇得英宗重视。治平三年（1066）受诏继续修史。神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时王安石当政，推行新法，他与之政见不合，乃求外任。熙宁三年（1070）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次年改判西京御史台。从此住在洛阳，六任冗官，皆以书局自随，专意编修《资治通鉴》，元丰七年成书，迁资政殿学士。第2年春天，神宗卒，哲宗以冲龄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不满新法，立即启用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不久又进尚书左仆射。任相年余，尽废新法。元祐元年（1086）九月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司马光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以至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但不喜释老之学。他著作甚多，著录在《宋史·艺文志》中的就有三十七种。著录在《四库全书》中的还有16种、477卷之多。

《资治通鉴》294卷，约300多万字。《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为35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元年（959）。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历史。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毕生精力所萃的一部历史名著，诚如他在《进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他编此书的原因是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苦于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

通史，感到困难。“《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因此“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从政以后，鉴于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国势倾颓，“以史自负”的司马光，企图“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来总结历史经验，为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服务，这是他编书的目的。

他计划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开始于仁宗嘉祐年间。他先编了一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大事年表，名为《历年图》，共分五卷，于治平元年（1064），进献给英宗。接着在这一基础上写成《通志》，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止秦二世三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进奏以后，引起英宗重视，治平三年四月，命司马光设局于崇文院，自择协修人员，编辑历代君臣事迹。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司马光进读《通志》，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并为他写了一篇序文，鼓励司马光编写成书。

《资治通鉴》体大精思，在史学、文学等方面成就巨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为历史编纂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通鉴》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贴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要求史料尽量详备。第二步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然后重新组织，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的理由，作为附注，叫做长编。其原则为“宁失于繁，毋失于简”。丛目和长编都由协修人员负责编写。刘攽负责汉史，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

史（包括隋朝），范祖禹负责唐史。刘恕死后，刘攽接替刘恕剩下的南北朝部分工作，五代部分由范祖禹完成。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通鉴》的定稿。这种编纂方法为后来学者所经常应用。此外司马光在运用史料时还建立了考异方法。由于《通鉴》采摭繁富，往往一事用三、四出处写成，其间传闻异词，势所难免，既择其可信者从之，又参考同异，辨正谬误，以明去取之故，别为《考异》三十卷，与《通鉴》并行，后胡三省注《通鉴》，将考异散注于正文之下。这是司马光的又一创造。《四库提要》说：“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可见司马光为历史编纂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2. 《通鉴》占有广泛而丰富的大量历史资料。

司马光奉诏编书，置局崇文院，有条件利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秘阁的国家藏书。所以他“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他所采的资料据宋人高似孙《纬略》统计，“《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作《〈通鉴〉引书考》，除文集不录外，“凡得二百七十二种。”《四库提要》说：“其采用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其残稿在洛阳者，尚盈两屋，既非拾掇残剩者可比。”近人张煦侯据《通鉴》和《考异》所引各书加以考索，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碑碣附）、奏议（别集附）、地理、小说、诸子十类，其得三百零一种。可见《通鉴》采用材料之丰富。《通鉴》内容虽以政治、军事为主，但经济、文化等均有反映。诚

如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此外《通鉴》广征博引之书“已半亡佚”。不少资料赖以征引而保存。

3. 《通鉴》把编年体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通鉴体”。

《通鉴》是用编年体写成的宏篇巨制，年经事纬“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编年体是我国古老的史书体例，隋唐以后，由于官修史记均用纪传体，因而将编年体冷落在一旁。《通鉴》一出，将编年体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继作不绝，呈现出精彩纷呈局面。《通鉴》继承和发展了编年体固有的优点：做到按日、月、年排比事迹，突出时间为记叙之中心；年经事纬，在同一时间内多方面的事情毕列并陈，一览了然，并相互对比，考见一时代的形势及相互关系；将重复之文，尽行删除，理尽一言，语无重出。《通鉴》也吸收了纪传体的优点：根据“资治”目的突出重点；吸收以人物为中心的优点根据编年体特点而加以应用；纪录有关典章制度。所以《通鉴》既有编年体之善，又有纪传体之胜，不仅是一部单纯的编年体，而是记人记事相对集中的纪传体式的编年体，把编年体推到一个新的高度，超出了编年体的范畴，而成为别具一格的“通鉴体”。

4. 《通鉴》结合史实的史学评论为我们提供借鉴。

司马光在《通鉴》中认为比较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作出评论，据统计共有二百一十八条。“臣光曰”为一百一十九条，“前人论”为九十九条。一项史事下有两论者为十一处；

两论之中有一“臣光曰”者为六处。这样《通鉴》全书中二百零六项史事下附有史论。这是《通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史事具有解说和总结的作用，既可以反映司马光对史事的精辟分析，为现实服务；也可以为我们研究司马光的思想提供重要资料。此外这些史论，还为我们在史论结合上提供借鉴，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与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由此也表明《通鉴》是一部为当时现实服务的教材。

5. 《通鉴》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史学著作。

《通鉴》是史学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但文学性很强。他善于刻画人物，着力于心理活动、特征、言谈、议论等的描写，并把人物放到具体矛盾斗争中去刻画，在他笔下的人物各具个性，栩栩如生。他善于在典型环境中开展故事情节，赤壁之战的描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善于使用文学语言，读来琅琅上口，为人们所喜爱。

总之《通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问世以后人们对它评价很高。宋神宗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自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胡应麟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而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四库全书总目》说：“网罗宏富，体大精思。”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梁启超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

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愈之者焉。”近人岑仲勉说：“《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由于《通鉴》是一部世界公认的史学名著，所以历代有人研究，成了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在南宋研究《通鉴》学者可分为三支；一支是以李焘、李心传、刘时举为代表的续《通鉴》学者。一支是以朱熹、袁枢为代表的改编《通鉴》学者。一支以史炤、王应麟、胡三省为代表的注释《通鉴》学者，就中以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成就最高。元、明两代《通鉴》研究可分为两支，一支是续《通鉴》学者，如金履祥的续前，薛应旂、王宗沐的续后，陈锡仁、杨仲良的别续。（指续《通鉴纲目》和《通鉴纪事本末》）。一支是订补《通鉴》学者，如明严衍。清代研究《通鉴》学者可分为四支。一支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研究《通鉴》的学者。一支以徐乾学、毕沅为代表的续《通鉴》学者。一支以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通鉴》学者。一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论《通鉴》学者。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间《通鉴》研究出现了带全面性总结的著作，如崔万秋《通鉴研究》、张须的《通鉴学》、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目前《通鉴》研究空前热烈，方兴未艾，各家所论，见仁见智，把《通鉴》研究推向纵深发展。

二、《通志》等其他史学成就

《通志》是一部叙述历代君臣事迹和典章制度的通史，南

宋郑樵编撰。《通志》共 200 卷，全书共分帝纪、后妃传、年谱、二十略、世家、列传、载记等。本书的贡献体现在《二十略》的设立，二十略概括了古代文化各个方面，如民族、六书、七音、昆虫、草木、都邑等，反映了郑樵在文化史方面的独创精神，南宋还有王应麟编的《玉海》，共 200 卷，分天文、地理、官制、食货等 21 门，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类书。

宋代史学家十分重要当代史的编修。北宋以前，从来没有设官编修本朝历史，而宋则在政府中设置专门的史官，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史书。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一部残缺不全的书，但内容丰富，其中十分之七八的史料，是《宋史》中所没有的。两宋史学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更多，流传至今的重要著作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专记北宋九朝史事的编年体巨著，原书 980 卷，今存 520 卷。该书采摭广博，考记详悉。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专记宋高宗一朝的史事，是继李焘的《长编》而作的一部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和战关系，该书广泛收集了当时官府和私人有关宋金交涉的言论和记述，所引史料，有很大部分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外交使臣、各种当事人亲手记录下来的材料，且引用时一律照录原文，不加取舍更改，故史料价值很高。

宋代志书很多，编纂体例渐趋完备，如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等，无不汇于一编。全国性的志书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忞的

《輿地广记》、王象之的《輿地纪胜》等，都是关于全国的地理沿革，城邑、户口、风土、物产、名胜古迹的专著。地方性的志书有：朱长文的《吴郡国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是苏州方志；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是杭州方志；陈公亮的《严州图经》，郑瑄的《景定严州续志》，是浙江严州（州治在建德）方志。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述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专记南宋杭州的繁盛，这三部书是富有城市史料价值的地方史著作。

南宋有赵明诚的《金石录》，他与其妻李清照同好金石图书，收藏商周彝器及汉唐石刻拓本，仿欧阳修的体例而成书。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对文字考释很仔细。郑樵的《通志·金石略》，很重视实地考察，审定考释。著名钱币学家洪遵的《泉志》是最早的钱币著作。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收藏金石拓本，集汉魏碑刻文字，加以解说和论证，并据以证实史传讹误，考核颇精。这些著录对史籍考订提供了新资料，对以后史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第四节 绘 画

一、两宋画苑的绘画

五代十国时，南唐社会较安定，统治者也爱好书画，故

开始创立专门性的画院。西蜀则自晚唐始也不断有画家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宋朝初建，原西蜀画家，如黄荃、黄居寀、赵元长、高文进、夏侯延祐等；原南唐的画家，如王齐翰、周文矩、厉昭庆、顾德谦等，在其国灭后，随同故主来到汴京，又召中原和其他地区的画家集中于京都，并在宫廷中设“翰林图画院”专门安置他们，从而形成了全国性规模的创作中心。

景德（1004—1007年）末年，宫廷为营造玉清昭应宫而要画壁画，各地应募的画家逾3000，其中合格者有100多人。在竞选中，武宗元获左部之长，王拙获右部第一。这是由宫廷组织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绘画创作活动。至宋徽宗时，画院日趋完备，并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其中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为考题，中试后按身份分为“士流”与“杂流”，分别居住于不同地方，加以培养训练，并常有进一步的考核。进入画院的画家又授以不同的职称，有画学正、艺学、待诏、祗候、供奉、画学生等名目。画家的地位也至此而得到显著提高，于服饰上被允许与朝官一样服“绯紫”和“佩鱼”，支取钱粮时，称画家和书家的为“俸值”，而其他艺人的则称“食钱”。加之徽宗本人极喜书画，又是位优秀的书画家，故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达到鼎盛，并成为我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盛的时期。

北宋画院中花鸟画甚发达，西蜀黄筌父子自进入宫廷后，其画法与画风，受到皇帝的赏识，一时成为画院的标准，“较艺者视黄氏体制为优劣去取”。南唐徐熙也是著名的花鸟画

家，与黄筌齐名，也到过北宋宫廷，但因其画法受黄筌批评，而迫使其孙崇嗣不得不改变祖传家风而转效黄作，黄氏的花鸟画风因此而在宋初占统治地位达百余年之久。宋徽宗本人也是著名的花鸟画家，他独创粗笔水墨一体，注重师法自然。北宋花鸟画还在提倡追摹自然的同时，注意使其唤起一定的道德伦理情感，将“传神”之说由原人物画扩大到花鸟画。另外，宫廷由于宣传宗教的需要，而组织画家创作大量宗教画。当时的宗教画的名家便有王霭、高益、王瓘、武宗元、王拙、孙梦卿、赵光辅、孙知微、勾龙爽、高文进、武洞清等等，以创作寺庙壁画为主，并主要受吴道子传派的影响。宫廷画院中也有一批肖像画写生名家，专为皇帝画“御容”，如牟谷、僧元霭、僧维真、朱渐等。宫廷画家又长于人物故事画，或取材于历史、或取材于近事，或取材于神仙佛道。宋真宗赵桓的遗孀章献明肃太后，曾为教育其10岁的仁宗皇帝，命儒臣采摭历代君臣事迹、祖宗故事及郊礼仪仗编为《观之览古》、《三朝宝训》、《鹵簿图》三部书，由高克明等画院画家绘制成图，“镂板于禁中”。至哲宗时，又再取摹板，将其发至近臣及馆殿。

北宋之亡，兴盛一时的徽宗宣和画院随之结束，一些画家经辗转流迁，又逐渐集结于南宋都城临安，先后被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遂成为南宋画院中的中坚力量。这些南渡的著名画家有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宋高宗赵构无意收复失地，苟安一隅，从而也对画学给予重视，特别是需要用绘画来为政治服务，因而南宋时期的绘画创作中心，仍在画院之中。其中李唐、萧

照、苏汉臣等是南宋人物画的主要代表，李唐绘有《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等，前幅是借题发挥，以古讽今；后幅则有赵构亲手书写的简短内容题要，以表达他的政治需要。萧照是李唐的学生，名作为《中兴瑞应图》，以 12 幅画面，描绘赵构于不久前北上求和，在河北磁州为人拦阻，杀死了要北上的副使王云，以至赵构能得机南返，而作了南宋第一个皇帝的事件。画还特别表现赵构南返时，得到天神的保佑。南宋画院还创作了许多没有留名的历史故事画，如《折槛图》、《望贤迎驾图》等，也是通过绘制历史故事来服务于朝廷。南宋的人物和人物故事画，在技术上取得了许多突出的成就，特别是绘制历史故事方面，人物的情节安排、主题的突出、及人物内心的刻画，均较前代更趋精心营构。

南宋画院中的山水画也很发达，与前代比有创新。李唐是开创南宋山水画一代新风的大师，代表作有《万壑松风图》轴。刘松年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突出成就，技法上袭追李唐。他们的特点是不再讲究山川形势的完整性，而常常是突出某一局部，加以集中和强化的描写，即注重所谓具有抒情目的的偏角山水，笔触也更大胆潇洒，水墨成份发挥得更充分。其后有马远、夏圭等，都是绘偏角构图的典型代表，马远之家族自曾祖直到其子都是画院画家，时人有“马一角”之称，用笔上扩大斧劈皴法，画山石用笔直扫，水墨俱下，见棱见角，夏圭为画院待诏，其小幅山水多笔清简括、墨色苍润、诗意浓厚，其“拖泥带水皴”是山水画水墨技法的重大发展。

两宋画院是全国绘画的创作中心，不仅创作了一大批重

要的作品，而且也吸引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画家，使画家们能一起互相竞争、学习，并也借此培养人才，因而极大地推动了绘画的发展。元代取消画院制，然而宋画院的画风仍一直对后代产生着重大影响。

二、文人学士画在北宋中的兴起

这一时期文人画家的花鸟画开始着力于“象随笔化、景发兴新”（汤垕跋王庭筠《幽竹枯槎图》）的写意。北宋中叶出现的文人仕宦画家，作画不过是他们业余文化生活的次要方面，更主要的方面是诗歌与书法。在诗书画三者的关系上，他们强调一脉相通，而且主张把诗歌中抒写不尽的情思流溢在书法和绘画里，以补充文章诗歌的形容不足。在这样一种认识下，中国诗歌的托物言志与借物抒情变成了花鸟画的借物抒怀与托物寓兴，中国书法的点画传情与直摅胸臆也变成了花鸟画的笔墨写心与直抒情性。这种新的体貌后来被称为写意画，由于写意画讲求寄托，所以一开始文人花鸟画的题材就比较集中，集中于早已因生长特点而人格化的古木、竹子与梅花等植物。因为需要抒发，所以又不能不简化过于雕琢的画法，把艺术形象的创造集中于“无常形而有常理”（苏东坡《净因院画记》）的竹影与木石。这样，只要熟悉其生长规律，了解其变化形态，便可以不必拘泥于枝枝节节的形似而加以总体把握，把整个艺术形象伴随着思想感情酝酿于胸中，达到物我交融，身与物化，形成充满“象外之意”的艺术意象，再出之心手双畅的笔墨。宋代文人花鸟画家心目中

的形似，也包括色似，他们的“不专于形似”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摒弃五颜六色而崇尚单一的水墨，这样也有利于发挥早在书法中得到发展的笔法形态的丰富表现力，于是，大量的墨竹、墨梅与水墨木石在北宋兴起了。

死前受命担任湖州地方官的文同，是文人画倡导者苏轼的表兄。他以擅画墨竹著名，开创了“湖州竹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墨竹图》轴，描写一枝纤曲之竹，枝节茂密，偃卧潇洒，恍若临风可动。虽然没有使用勾勒设色的画法，但不忽略形似。因以墨代色，所画偃竹仿佛粉墙纸窗上的竹影一样，单纯而生动。至于他不画修竹凌霄，而画偃竹“所托非地”，显然又别有寄托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墨竹图》轴在画法上也大体如此。苏轼向文同学习墨竹，他说文同主张“画竹必先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苏轼《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文同所以主张“胸有成竹”，关键在于胸中有了竹子生长变化的规律才可能“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做到“竹如我，我如竹”，借画竹画出自己的心胸，象外之意自然流露于笔下。

“身与竹化”的理论，为写意花鸟画家指出了借物抒怀的途径，也为艺术形象的不拘泥于形似开辟了前景。苏轼虽学画竹于文同，但作为一个深通禅宗思想的文人，他敢于放胆落笔，直指本心，不刻意于技法上的苦修，不把形似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尺度。他画竹不分节，画木石也为了强化感情表现而不惜夸张变形。传为苏轼所作的《古木怪石图》卷（藏于日本）可能为了表达内心的郁闷，便以盘屈如圆的老树

枝干渲泄郁勃的心情。正像他的好友米芾所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硬，亦怪怪奇奇，如其胸中蟠郁也。”（米芾《画史》）

王诜、赵令穰等人的小景山水，虽然表现了诗人细腻的感受，不乏“画中有诗”的意味，但艺术幻化还不很多，画法基本上也是写实的。能否使画山水小品也像写诗一样即兴吟成，重要的文人画家米芾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祖籍山西太原的米芾后迁居于襄阳，曾任地方官，在宋徽宗当政时进入宫廷成了鉴书博士。他不但精于书法而且对于古代书画的风格形态有深入的研究。由于他曾工作于烟雨迷茫的镇江，对雨树云山多有会心，又偏爱表现“一片江南”的董源山水，欣赏董源水墨山水画的“用笔甚草草，近视几不类物象，远望则景物粲然”，（沈括《梦溪笔谈》），所以便把董源点线组合的笔墨技巧参以唐代王洽的泼墨，创造了“多以烟云掩映树木，不取工细”（《画继》）的“米家山水”。这种新的体制极适于描写雨树烟峦，能在模糊而单纯的团团水墨中率意而真切地表达江南的风雨云烟，抒发诗人的感受。可惜他的作品已无真迹流传。继承发展米点山水的人物首先是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他进入南宋之后，因皇帝的喜爱，成了专为皇帝作米氏云山的特殊画家，以致当时的爱好者发牢骚说：“解作无根树，能描懵懂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与闲人！”（邓椿《画继》）米友仁的传世作品均创作于南宋，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云山图》轴，作于绍兴甲寅（公元一一三四年），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奇观图》卷作于绍兴乙卯（公元一一三五年）。两件作品都用笔草草，皴染结合，点法也随意多变，

生动地表现了烟云的流动与山树的葱郁。也许这是米友仁在家学基础上的新发展，也许米芾的戏墨便是这个样子。但从上述两图的题跋可以看出，米芾“墨法出润州（镇江）城南”（笪重光《画筌》）；米友仁的《云山图》也来自“新昌泛舟”（《云山图》自题）的体验。

标志着北宋人物画风向精致文雅演变的重要人物是文人画家李公麟。他考中进士后一直担任下级官吏，在政治上不甚得意，然而文章、书法、绘画、鉴古无所不精，尤善人马。加以学佛悟道，有极丰富的文化修养，而且志趣高迈，“从仕三十年，未尝一日忘林泉”（《宣和画谱》卷七人物三李公麟传）。他作画精能高妙，却耻于被人视为画工，不愿为供人玩好而创作，主张“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同上）虽然如此，李公麟决不以为为之，相反十分重视观察生活与自然，在作品中恰到好处地表现不同阶级阶层地域的各种人物的特点。因此，在文人画家中，他的艺术不但能率略，而且尤能精工，更能在两种面貌中得吴道子的精诣而体现晋宋人的俊逸潇洒。他的人物画尽去豪放雄强而追求细腻微妙的格调，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洗尽铅华的人物“白描”画法，成为一代宗师。李公麟一生画了大量作品，但真迹多已不传。能反映其艺术面目的真迹，画法精能者有绢本淡设色的《临韦偃牧放图》卷、纸本白描的《五马图》，画法率略者只能从齐仲常的《后赤壁赋图》卷中领略了。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临韦偃牧放图》是一长卷，虽摹自唐人，不失唐人画法的朴实洗练，但已杂入了精工而又典雅的气质。曾藏日本今已毁失的《五马图》尽管不像《临韦偃牧放图》一样有作

者的名款，但因有他好友大书法家黄庭坚的标题，已被确认为真迹。画家在澄心堂纸上用白描画成五马，或静立，或徐行；各有一牵马人伴随。人马形体结构极为准确，每匹马每个人的不同气质性格亦得到充分显露，画家完全摈弃了色彩，只靠着流畅而极尽变化的“行云流水有起倒”（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二）的笔法，辅以《朝元仙杖图》尚未发挥妙用的淡墨渲染，便呈现了对象的体感与毛皮的光泽，把白描画法推向了极尽单纯而又极尽精微的境地。根据黄庭坚的标题，可以知道五马都是皇家饲养的名马，文献记载说李公麟“尝写骐驎院御马，……写貌至多，至圉人恳请，恐为神物取去”（《宣和画谱》卷七人物三李公麟传），就此可见《五马图》的成功竭尽了李公麟的良工苦心。齐仲常是李公麟的学生，他的传世孤本《后赤壁赋图》，（美国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藏），反映了李公麟另一种比较简率脱略的面貌。它取材于苏轼脍炙人口的名篇，按文章顺序铺陈为长卷，环境清幽，人物生动，甚至史无前例地画出了月光下的人影，笔墨亦简率自然。从中可了解李公麟艺术的另一侧面。

三、城乡风俗画与《清明上河图》

描写城乡风俗的山水人物画，在北宋前期已经出现，文献记载中有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和叶仁遇的《淮扬春市图》。这种风俗画以城市生活的丰富详赡引人入胜，适应了世俗百姓的趣味。发展到十二世纪初叶，张择端创作了千古巨作《清明上河图》卷（故宫博物院藏），把风俗画提高到了空

前的水平。山东人张择端是北宋后期的读书人，工于界画、舟车、市桥，后进入徽宗画院。他的《清明上河图》描写了首都汴梁市内外的风光和各式各样的人物活动。自市郊的村落农舍，踏青扫墓的人骑，到汴河两岸、虹桥内外的漕运和工商业活动，再到东角门内的街道。真是车水马龙，店铺鳞次栉比，行人摩肩擦踵，一片繁荣景象。画家由于运用了不断自右至左推移视点的构图，因而使汴梁城中的三百六十行和各阶层的人物活动尽收眼底。市区中的茶坊、酒肆、脚店、当铺、寺观、公署、香店、布店、药铺、卜摊，街市上的游人、摊贩、乞丐、驼队、官员、小轿，熙熙攘攘，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宏伟的长卷中描绘了五百余人，牲畜五十余头，车船二十余只，店铺无数。作者还抓住了首都经济命脉的汴河，突出表现京都在沟通南北经济上的枢纽作用，真实地描写了劳逸贫富的生活和时尚风俗，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为了克服平铺直叙的描绘，作者刻意描写了几个富于戏剧性的情节，诸如船过虹桥时将放未放的桅杆过高、水流过急、造成了的即将发生事故的万分惊心动魄的场景，充分描写了船夫、游人的种种心理状态，使全卷波澜起伏，引人入胜。这一幅集山水画、界画与人物风俗画大成的宏篇巨制，造形准确，笔墨流畅，着色淡雅，构图统一多样，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致使明清以来出现了无以数计的摹仿者。

南宋时期风俗画与节令画的流行，比北宋更为丰富多样，反映城乡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唤起了画家对市俗生活的兴趣。《清明上河图》一类包罗万象的风俗画不见了，画家们的注意力似乎转向了更平凡琐细的生活小景与多种生活情味。对儿

童情态与心理的描绘，在时令画与一般风俗画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著名的儿童画家苏汉臣是河南开封人，本来是宣和画院的待诏，南渡后继续供职。他的《秋庭婴戏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画风精细严谨，赋色明丽鲜艳，描写庭院中秋花盛开，湖石矗立，花荫下两个孩子正在镶嵌罗钿的绣墩上全神贯注地玩玩具。花丛中的另一个绣墩上下也放满了玩具，烘托出儿童的玩兴正酣。这种对儿童琐细生活情致的发掘，显示了画家观察生活的细腻入微。苏汉臣等人在节令画中不厌其烦地画儿童，大约是为了满足观赏者多子多福的心理。传统年画的儿童题材也许即滥觞于此。

苏汉臣同时又画过《货郎图》，但描写儿童簇拥货郎最多的画家是比他晚一辈的院画家李嵩。当过木匠的李嵩是北宋宣和画院名家李从训的养子。他多能兼善，所画人物、山水与花鸟都有风俗画的意趣。在他的人物风俗画中，《货郎图》是一大类（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都收藏了他同一题材的作品）。在这些作于公元一二一零、一二一一、一二一二年的画卷或扇页的《货郎图》中，人们可以看到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被货郎担所吸引，蜂拥而上。急欲得到玩具的儿童开始自行攀取，稍稍懂事的孩子拉扯母亲的衣衫必欲购得而后快，尚在吮奶的幼儿也忘不了以手触摸玩具。在此情景下，画家还描写了母亲的耐心，货郎既希望畅销又惟恐丢失损坏的矛盾心理。他把传统“界画”手法用于描写使人眼花缭乱的货郎担，自然是别出心裁。人物衣纹用线的颤动顿挫，大概不仅

在于对比货郎担用笔的精严,还可能是为了显示布衣的质感,从用色比苏汉臣简朴这一点上,也可以窥见出这位宫廷画家的趣味更接近于普通的欣赏者。他的另一类作品则旨在批判陈风陋习。相传他画的《四迷图》便是鞭撻了酗酒、嫖妓、斗殴等城市病态生活。联系他曾经画过《宋江等三十六人像》的创举,应该说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画家。

类似的风俗图画,不少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其中藏于南京博物馆的闫次平的四季《牧牛图》卷与李迪的《归牧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十分细腻动人。前者从不同方面展现了牧童在四季中的种种生活情状,冬景生动地刻画了寒风凛冽中,牛背上的牧童匍伏于蓑衣里的畏寒形态。后者表现斜风细雨中的牧童在牛背上寻找被风吹落的草帽,充满了生活情味。这说明了画家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再如描写顽皮的农村儿童捉弄午睡冬烘先生的《村童闹学图》页与传为李唐的《村医图》(一名《灸艾图》)同样是反映农村生活风俗的优秀作品。

四、靖康之变后的人物画

北宋中叶至北宋末人物画流传甚少,除去画院摹古作品以外,仅有被称为宋徽宗所作的《听琴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传世。这实际上是宣和画院能手的作品。它描写清幽的宫廷园囿中的音乐活动:一黑衣人于松下焚香抚琴,一朱衣人与一蓝衣人洗耳恭听。引人注意的是设色的鲜丽,笔法的精巧,人物神情的刻画入微与似乎随琴韵摇曳的松竹画法的

纤细。这种穷工极巧的画风多少有点流于靡丽，是文人画家的人物画向着精致文雅方向发展之后出现的现象，至南宋几乎很少看到了。然而，这种把人物的情感状态投射到环境中去，造成一定的意境和情韵的手法却可以从马麟的《静听松风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仍然看得异常分明，只是作为人物活动环境的背景占有了画面的绝大部分，而且像山水画一样地进行周详的描绘，连淡淡的远山也未忽略，人则相对地变小了，应该说这是一种盛行于南宋的山水人物画。

《静听松风图》尽管在运用环境描写渲染情韵气氛方面与《听琴图》一脉相承。可是就人物画法而言，不但衣纹用线变得挺劲有力，而且用色也变得素雅不艳了。从总体而言，这也是南宋人物画的主流风貌。在各类人物画中，勾勒重着色的画法已较少被画家使用，有之便是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的《梵像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件作于公元一一八零年的纸本重彩大描金的稀世珍品，画法以继承唐北宋传统为主，佛像面形的圆满犹存唐风，装饰的繁丽与色彩的绚烂和谐已显出北宋绘画的特点。其它人物画无论为道释、为历史、为风俗、为文学，在画法风格上约呈三种面目。一种是《静听松风图》与下文将述及的《伯夷叔齐采薇图》所代表的水墨淡色画法，环境描写是水墨的或水墨淡色的，只在人物部分略施粉赭。又一种是水墨淡色与重彩的结合，下文提及的《中兴瑞应图》可为代表。画家既用半透明的植物颜料，也使用一些有覆盖力的矿物质颜料，但水墨淡色占有画面较多部位，因而色调是素静沉着中略有跃动，并无新艳佻薄之感。再一种便是水墨或白描的画法了，张激《白莲社图》可为代

表。流行于南宋的人物风俗画或人物故事画的作风，大约受李唐影响不小，或接近于他的水墨淡色与重彩结合画法，或接近于他的水墨淡色画法。

被誉为南宋开派画家的河阳人李唐，本是北宋宣和画院多能兼善的老画师，进入南宋画院时年已八十。他的人物画擅长于选取启示人们思索和感奋的历史故事，表达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晋文公重耳复国图》卷和《伯夷叔齐采薇图》卷属于这一类作品。前者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分段描写重耳从流亡到复国的过程，大约创作于北宋危亡之际，后来由宋高宗赵构逐段书写了故事情节，成为借古喻今之作。后者藏于故宫博物院，描写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这两位不愿投降新朝的商代遗民、为了坚持气节，宁可逃到首阳山中以野薇为食，后来干脆绝食而死。他们反对武王伐纣，本不值得歌颂，但李唐本意并不在此，而是针对“南渡降臣”的。为此，他把伯夷、叔齐英勇坚毅的形象安排在肃穆沉郁的环境中，着重渲染绝壁的坚劲、老松的斜撑、枫枝的僵蹇披拂，造成阴风飒飒的不安定气氛。画中侧坐倾身的叔齐似乎在诉说亡国之恨，挺胸低首的伯夷则双手抱膝，双目凝视，面露坚定不移又幽愤不平之气。挖野薇的锄头和盛野薇的小筐就在他们身旁。可以看出，画家通过刻画人物性格的坚强和内心的不平静，成功地歌颂了宁可饿死也不投降的民族气节。这在“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胜旗”的当时，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拿它与画法风格接近李公麟的《晋文公重耳复国图》比，不仅神情刻画深入到人物内心，就是衣纹用线也由挺细圆劲变为富于节奏的折芦描了，足见它的创作时间更晚，

大约作于新风格炉火纯青的晚年。

同样以历史故实讽喻现实的名作还有佚名的《折槛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徐悲鸿纪念馆各藏一本。就画法而论，它与《伯夷叔齐采薇图》绘景奔放而人物精微有所不同，人物与环境都画得工细严谨，设色也较浓重。所画故事取材于《汉书·朱云传》，但画家突出了正义与邪恶斗争冲突的白热化：犯颜直谏的朱云因弹劾权臣张禹，引起了汉成帝的勃然大怒，身披甲冑的武士拖住朱云即要将他处死。朱云则手攀栏杆，抵死力争。据历史记载，由于辛庆忌为朱云进言，他的坚定意志也感动了皇帝，朱云不仅没有被斩首，被他攀折的栏杆还按皇帝的旨令不再修复，以纪念他的忠直。可是，在画轴中，画家却抓住了矛盾转化前的瞬间，把力量对比的优势依然放在汉成帝与张禹一边，没有去颂扬皇帝的英明，而是在即将被处死的朱云身上突现了他的忠心耿耿。画家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在艺术处理上，除了以两军对垒的形式强调了矛盾冲突的戏剧性之外，作者还用成帝、朱云身后的太湖石夸张了斗争双方的气势。画法是精工而准确的，体现了画院勾勒设色的精密作风。

此外，院画家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无款作品《胡笳十八拍图》卷（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都是以蔡文姬故事及其诗歌为题材的历史故事画，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后者在告别一图中对亲子之情的描写尤为动人。类似题材的作品还有金张璠的《文姬归汉图》卷（吉林博物馆藏），它的水墨淡色的画法风格与宋人无异。随行者畏寒呵手的细节与旌旗衣带的飞舞，生动地表现了万里

穷荒中的刺骨寒风，在宋、金政权的对峙下，南北画家却不约而同地画着同题作品，画风也比较接近，这也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除去这种借古喻今的历史故事画之外，还出现了若干寄望于南宋中兴而描绘当代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的作品。李唐的学生肖照便创作了《中兴瑞应图》。肖照山西护泽人，在北宋灭亡后入太行山为“盗”，巧遇李唐，于是随李唐南渡入画院。他的《中兴瑞应图》卷（宋摹本，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描绘宋高宗赵构从出生到即位的生平经历，并附会成神话故事，渲染赵构即位乃天意，反映了人民对南宋中兴的渴望。摹本在设色人物画中，像《晋文公重耳复国图》一样精致，但更简劲有力而不琐细。与李唐并称为南宋四家的钱塘人刘松年，大约晚于李唐半个世纪。他描绘抗金英雄刘锜、韩世忠、岳飞和张浚的《中兴四将图》卷（中国历史博物馆藏）也具有同类性质，可惜传摹本质量不高，不能像《罗汉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那样体现其人物画的精工。

取材于宗教或文学作品的人物画，虽比历史画和风俗画略为逊色，但也有所发展，其风格上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南宋人物画风的承传变异。官至工部侍郎的马和之，活动于宋高宗当政时期，善于描写文学题材，尤爱画《诗经》。流传在国内外各博物馆的《毛诗图》有些未必是马和之的原作，但《后赤壁赋》（故宫博物院藏）是一致公认的真迹。这幅画布置空阔，以描绘微风吹动下的江水为主，一叶小舟飘荡江心，落墨用色异常简淡，用笔多为柔软的曲线，飞动流利，人物衣纹用两头尖中间粗的兰叶描，形成了

极强的节奏韵律感。如果同李唐的作品比，更会觉得马和之画风的超逸。据说，他的画法从吴道子变出，当时有“小吴生”的称号，可是柔细已远不同于吴生的奔放了。他可以说是南宋初最早改变北宋作风的重要画家之一。

在佛教题材的绘画中，原传为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卷（故宫博物院藏）经专家鉴定已断为宋金人之作，与收藏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元代王振鹏所摹金人马云卿《维摩不二图》卷构图画法完全相同。此图描绘维摩居士向文殊菩萨以及僧侣、天女讲授大乘教义情景，维摩形象继承了顾恺之以来着重刻画其“清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的传统，造型极为准确，神情刻画入微，实属白描人物的上乘之作，也说明了李公麟一派白描法对北方金代画家深远影响。

在白描画法绵延不绝的同时，水墨减笔的人物在南宋大有发展，成为南宋人物画新突破的重要标志，在人物画上体备众法的梁楷便是最突出的代表。

梁楷是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的画院待诏，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能，在人物画上开创了前所未有的笔减神完的面貌。他在宗教画风格上的数次变法，也反映了南宋人物画风的几次变化。这位不接受皇帝所赐金带，并自号“梁风子”的人物，谁也不容易想到他的人物画起步于工细的白描，然而这毕竟被美国翁万戈收藏的《黄庭内经神像图》证实了。那疏密的敷陈，造型的严谨，透露出追踪李公麟白描法派的消息（其师贾师古即学李公麟）。笔法的挺劲，锋芒的外耀，又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性。上海博物馆藏的《八高僧故事图》与日本私人藏的《出山释迦图》，是稍后的风貌，人物

多取半身，迥出凡格，形象传神，衣纹笔法遒劲而稠叠，设色古艳沉厚，尚且属于精工中饶有气岸的形体。发展到《六祖斫竹图》（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与《六祖破经图》（日本私人藏），可能受到禅宗思想的陶铸已形成“简笔”的体貌了。在这两轴作品中，梁楷均以极不经意的寥寥数笔，飞快而又节奏鲜明地勾画出对象的形神，刻意求工的迹象被一扫而光。画树的皴法也用破笔的挥扫表现得妙造天成，很像牧谿和尚的树法。日本东京博物馆的《李白行吟图》轴也是一件简笔名作，画家只用十数笔便巧妙地画出了李白的潇洒出尘，尽管有人以其用笔的圆熟而不刚劲疑为明初人之作，多数学者还是放在梁楷名下不忍割爱的。梁楷最后的体格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泼墨仙人》轴为代表，这件作品的画法又从简笔演化为泼墨。彻底摆脱了线条的局限，在一片淋漓酣畅的墨迹中辉映出仙人浪漫风姿。使形象与笔墨融为一体，也使得着重于对象描绘的传神与偏重于主体抒发的写意相互为用了。

第五节 科学技术

一、誉满世界的三大发明

中国印刷技术的革命，就是从雕版印刷跃进活字印刷。

大约在 1045 年（庆历五年）左右，平民毕升创造了胶泥活字印刷技术。毕升的发明，是在北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之后，在经济和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文化事业的兴起而产生的。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图书印刷行业，不仅官家刻书，还有私家刻书。城市里出现了许多书场，有大量刻书工人从事雕版印刷。正是在这样的形势推动下，毕升总结了广大印刷工匠的经验，发明了胶泥活字排版印刷。

胶泥活字就是用胶泥做的单字。字印很薄，用火烧硬就能使用了。排印时用一块铁板，上面敷上一层松脂、蜡和纸灰，再在铁板上放一个铁框，把一个一个活字排进去。排满一框后，放在火上让松脂和蜡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待冷却凝固后，框中的活字就很平整而坚固，成为一页图书，可以上墨印刷。印书时，同时使用两块铁板交替进行，一版在印刷，另一版就继续排字，使印刷不会中断，进度很快。经常用的字，就刻制几十个活字；冷僻的字，随用随刻，临时用草灰烧硬使用。印刷完毕，再用火把脂蜡熔化，活字就从铁板上脱落，把一个个活字按韵装在木格里，贴上纸条，待下次再用。

毕升是世界活字印刷技术的首创者。他的这一发明，是印刷史上的一次革命，引起当时科学家沈括的重视。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详实地记录了毕升的这一创造。沈括说：这种活字印刷，“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沈括还说毕升当时“不以木为之者，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毕升的胶泥活字排印法，已

具有活字印刷的三个主要环节，即：制作活字、排版和印刷。这是一套完整的印刷技术。毕升以后的几百年，活字印刷有了很大改进，但基本上还是这三个环节。

我国的活字印刷技术，首先传入东方的朝鲜。朝鲜人民称为陶活字。朝鲜铸造金属活字是在13世纪初的高丽王氏王朝。1234年前后，朝鲜崔怡用铸字印成《详定礼文》50卷。

我国的活字印刷技术，又通过朝鲜传入日本。日本在16世纪时才有活字印书。日本封建主丰臣秀吉实现了国内的封建统一以后，向外从事领土扩张，侵略朝鲜和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率领10多万军队侵略朝鲜，把朝鲜的活字也一并抢走了。后来日本也流传着活字印书。日本长庆二年（1597年），他们用木活字印行过一部《劝学文》，书中有“命工每梓镂一字，棋布之一板而印之。此法出朝鲜，甚无不便。因兹摹写此书”等字句，说明日本的活字技术来自朝鲜。

我国的木活字在19世纪时又传到了越南。越南在绍治年间（1841—1847年）从我国引进木活字，开始印刷《钦定大南会典事例》等书。

至于欧洲各国采用活字印刷，时间也很晚。大约在公元1448年前后，日耳曼人谷登堡先制成字母活字。从此以后数十年间，活字印刷才遍及欧洲各地。

指南针在航海上和军事上的使用，是宋代中国人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我国早在东汉以前，已经知道利用天然磁石制成一种形状像勺、能辨别南北方向的工具，叫做“司南”。这就是最早

的指南针。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军事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开拓，无论在陆地行军或海上航行，都需要辨别方向的工具——指南针。

根据《梦溪笔谈》里的记载，北宋时已经用人工制造磁针。沈括说：“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由勺形演变为针形；从天然磁石进而使用人工磁化方法，这是指南针使用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宋代指南针有四种不同形式：一种是把指南针浮在水面上，让它自由转动；一种是把指南针放在手指甲上，利用指甲的光滑，指针可以灵活转动；另一种是把它放在光滑的碗唇上，使它旋转；而最好的一种方法，就是用蜡把细丝线缀在指南针的正中，将它悬挂在无风的场所，让它灵活转动。

北宋的科学家沈括，对指南针的使用方法及其性能的观察是十分细致的。他利用指南针进行地形测量，发现磁针所指的方向不是正南，常常是稍微偏东。这是世界上关于地磁偏角的最早记载。欧洲一直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远渡大西洋时，才发现这种物理现象。

宋代我国军事科学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军事科学上带有总结性的著作《武经总要》。这部著作是曾公亮等人编写的。在书的前集中，曾经提到一种“指南鱼”。当行军遇到天色阴霾或夜色暝黑时，就利用指南鱼来辨别方向。这种指南鱼是利用长2寸、阔5分的带有磁性的薄片制成的，两端略尖、形状像鱼。使用时，把盛水的碗放在无风的地方，将指南鱼放在水面上，就能显示方向。

除了军事上使用指南工具外，宋代在航海交通上已经普

遍地使用指南针。这种航海指南工具，起初是装在罗盘里的水浮磁针，也就是南宋人吴自牧所说的“针盘”。这种“针盘”，宋代已经直呼为“指南针”。

北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书中，讲述他在广州的亲自见闻：海船上的“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在万里晴空的白天或满布繁星的夜晚，海船的航行可以根据太阳和星斗来辨别方位。如遇天阴，就要利用指南针。朱彧的书是在宣和年间（1119—1125年）写的，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录。

公元1123年（宣和五年），一位被北宋王朝派往高丽去的使节徐兢，在他归国后所写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描述了我国海船在狂风巨浪中前进的情景。每遇阴霾的天气，就靠指南针来辨别航向。徐兢说：“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可见这是一种水浮式的罗盘针。

公元1225年（宝庆元年），担任福建提举市舶的赵汝适写了一部《诸番志》，也讲到我国海船不论白天或黑夜，都使用指南针。我国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中航行，平稳地通往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各国。大船“南对占城，西望真腊，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塘（指海南诸岛），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当时我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地理知识比前更加丰富，而且用指南针导航，能战胜风涛险滩，到达南海诸岛。同一时期的占城国人，就害怕经过南海诸岛的海面到中国来。《宋史》里记载说，1018年（天禧二年），占城国王尸嘿排摩磨派遣使臣罗皮帝加等，带了象牙、犀角等物来中国。罗皮

帝加说：“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说明他们对南海诸岛一无所知。他们无法通过南海到中国来。因为他们不会使用指南针，也就不能避开南海诸岛的暗礁和险滩。1064年（治平元年），他们是从陆路到中国来的。

两宋时期，我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贸易上的往来是相当频繁的。很多阿拉伯商人和水手们留在中国的广州和泉州等地。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文献里，最早大约在13世纪才有使用指南针航行的记载。他们是从中国的商船获得这种知识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都是乘坐他们的小船南行，到了印度半岛以后，就换乘中国的大船东行。在中国的大船中，他们了解到指南针这种先进的航海仪器。指南针也就很自然地传入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各国。

宋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又一标志，是火药在军事上的应用。大约在9到10世纪，火药已经应用于制造火器。公元970年（开宝三年），冯继升进献了火箭制造法。经过北宋政府的试验取得了成功，受到北宋王朝的奖赏。1000年（咸平三年），一个水军队长名叫唐福，也把火箭、火毯、火蒺藜等新发明的火药武器献给政府，也得到了奖励。1002年（咸平五年），石普制成了火毯和火箭，宋真宗和大臣们亲自观看试验。当时发明的火箭，箭头是靠火药燃料喷射推进的，是基于流体力学原理。

公元十至十一世纪，北宋王朝为了对付辽、西夏的武装进犯，十分重视武器的改进。北宋初所发明的火箭等新式火药武器，在《武经总要》这部军事著作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包括火药鞭箭（简称为火药箭）、烟球、毒药烟球、蒺藜火球、

铁嘴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等。毒药烟球是一种带有毒性的烟幕弹，用炮车（即抛石机）放射，是一种攻城的武器。北宋时代的炮车，种类很多，其中有一种“双梢炮”，就是放射火球的。它能把 25 斤重的石块打到 80 步以外的目标去。由于最初炮车是放射石头的，所以炮字用“石”字作偏旁。后来炮车放射火器，又改用“火”字作偏旁。

《武经总要》是 1044 年（庆历四年）出版的。书中对宋代的军事组织、军事制度、步兵和骑兵的训练、行军、营阵、战略、战术、武器制作和使用，以及军事地理知识等，都有具体的论述和分析。武器部分还附有大量的插图。

北宋的首都汴京，有一个制造武器的工场，名叫“广备攻城作”，内分 11 个生产部门，其中有一个“火药窑子作”，是专门生产火药和火器的。宋朝南迁后，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地区继续大量制造火药和各种火器。1221 年（嘉定十四年），金兵攻袭南宋的蕲州（湖北蕲春），宋军在 1 天之内就能在 53 座战楼上准备好 1.7 万支火药箭，3000 支蒺藜火炮，2 万支皮火炮。可见当时火药兵器的产量是很可观的。

宋代火药武器的发展，是先有燃烧性的火药箭、火枪等管形火器，然后再发展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制成爆炸性的铁火炮，也就是炸弹。

公元 1132 年（绍兴二年），南宋将领陈规在守卫德安（湖北安陆）的战斗中，使用过一种飞火枪。它是用长竹竿装置火药，两名士兵使用一支，临阵点放。1232—1233 年间，蒙古兵攻打开封和归德时，金兵也用过一种名叫“飞火枪”的箭形火器。这种火器是用 16 层很厚的纸卷成两尺长的筒，内

装火药和铁渣末之类，临阵点放，火焰能射到 1 丈多远。火药燃着之后，纸筒不会受损。

大约在 13 世纪，我国已能制造爆炸性的炸弹。当时是用铁罐装满火药，通过引线，使火药爆炸伤人，称为“铁火炮”。这种武器是用抛石机放射出去，或者点着引线之后，用铁绳沿城墙吊下。由于它的威力大，爆炸时发出巨响，故又名“震天雷”。南宋政府在荆、淮地区，每月能制造 2000 只铁火炮。根据《金史》里记载，蒙古兵包围开封时，金兵就利用震天雷还击蒙古兵。公元 1279 年，蒙古兵攻打南宋静江府（广西桂林）时，守将马汧就利用这种铁火炮守城，坚持了 3 个月。

火药的制造方法，13 世纪时由我国传入回教国家。南宋时，这些国家都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经济上的交流促进了科学文化上的交流。一直到 13 世纪末，欧洲人从阿拉伯文的著作里知道火药的制造方法。欧洲人制造火药武器，那是在 14 世纪前期，是从跟回教国家的战争中获得的。

宋代的三大发明，对欧洲工业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活字印刷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封建城堡，并建立了新兴的市民军队。恩格斯在谈到欧洲各国从中国人那里学到火药和火器时指出：它是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势力的有力武器。指南针的应用，帮助欧洲资产阶级发展航海业和对外贸易、开拓殖民地和世界市场。所以 1863 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肯定“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

二、天文学和数学

天文学是我国历史上一门古老的科学。北宋时期，由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更需要有完善的天文历法来指导农耕。科学家沈括在历法上的新创造，就是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而产生的。他主张以节气来定月份，不从月球的朔望来定月份。沈括以立春为元旦，用 12 节气来定日历。大月 31 天，小月 30 天，一大一小相间，去掉闰月。

沈括的这个新历法，是根据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加上自己的观测，发现一些新的自然现象而产生的。这个“十二气历”适合农业生产的需要，因为一般农活都要按节气而进行。至于月亮的圆缺，与季节的变化无关，只要在历书上注明“朔”、“望”供备考足够了。沈括举了元祐元年（1086 年）的孟春和仲春两节气为例：“孟春小，一日壬寅，三日望，十九日朔。仲春大，一日壬申，三日望，十八日朔。”沈括这些革新历法的创见，并没有受到当时政府的重视，甚至遭到冷遇。虽然如此，沈括仍然坚信他的主张将来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所采用。沈括死后 800 多年，英国气象局的一位科学家萧纳伯，提出了类似的历法。英国气象局统计农业气象和生产，就是根据这个历法。

我国古代，对于天象的观测十分精确。例如对于新星的观测。古代文献上称为“客星”。还有一种超新星，光度的变化比新星还大，亮得特别惹人注意。在《宋史》、《文献通考》等历史文献中，曾记载北宋景德三年（1006 年）发现的

一颗客星。《宋史》还记载了至和元年（1054 年）发现的一颗超新星。这是世界公认的第一颗超新星的记录。又如南宋淳熙八年六月（1181 年 8 月），我国又发现了一颗新星，在《宋史》和《金史》里都有记载。但西方国家就没有这颗新星的记录。

在世界上，我国是创制天文星图最早的国家。在江苏省苏州，现在还保存着全世界最古老的石刻天文星图。

这幅图是宋代科学家黄裳根据元丰年间（1078—1085 年）的天文观测结果绘制的，淳祐七年（1247 年）由王致远摹刻在石碑上。全图总高 8 尺，宽 3 尺半，绘有 1440 颗星星。图以北极为中心，黄道和赤道斜交，形成 24 度的夹角。图上有 28 条经线，各经线的宽度不等，表示 28 宿中各宿的赤道宿度。“二十八宿”就是我国古代对黄道附近天空区域的划分。

这幅天文图的下半部，附刻图说 41 行，记述太极、天体、地体等形成的理论，地经、赤道、日、黄道、月以及日月食的原因，恒星命名的方法等，对当时天文学的知识作了总结性的说明。现在世界上都承认这块石刻天文图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星图。

我国古代对天文仪器的制造，也有悠久的历史。北宋时，我国天文学界出现了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名叫苏颂（1020—1101 年）。他是 1042 年和王安石同榜考取进士的。由于他在科学上能“探其源，综其妙”，并“验之实事”，能从实践出发，因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苏颂的一部科学著作是《新仪象法要》，是在绍圣（1094—1097 年）初年完成的。这部科学著作反映了我国 11 世纪时期

天文学上的巨大成就和机械制造技术的先进水平。全书分为3卷：上卷记载浑仪的设计，有总图4种，分图13种。浑仪是备观测计算天体运行的仪器，我国很早就已经发明，苏颂又作了一些改进。中卷介绍浑象的设计，除总图外，有分图4幅，又有星宿位置图5种，四时昏晓中星图9种。浑象是假想天体象一个球体，在球面列布天体的星宿位置。球可以转动，宛如一个天球仪。下卷介绍水运仪象台的创制，有台体总图2种，分图21种。总计全书附图有63种之多。

水运仪象台是世界上首创的水动天文钟，在世界天文学史和钟表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苏颂和韩公廉带领着一批青年科学工作者，共同创造了这座构造相当复杂的天文仪器，其中有巧妙的擒纵装置，是钟表的祖先。他们继承了汉朝和唐朝以来我国天文学上的优秀成果，吸收了北宋时代的机械制造技术，通过集体努力，才完成了这一重大发明。

这座水运仪象台高约12米弱，合宋朝木矩尺是3.565丈。这是一座利用水轮为原动力，带动仪器运转的自动化的天文钟。它利用机械构造，把机械的运动控制得很缓慢，使它保持一定的速度，跟天体的运动相一致。仪器通过几组机械的转动，表达天体时空的运行。为了使人们正确掌握一昼夜的不同时间，又利用4种不同的打击乐器：钟、鼓、铃、钲；3种司辰服色：绯、紫、绿；158个木人和44个活臂木人，来表达时刻的变化。11世纪时，我国能制造如此复杂的科学仪器，这是值得自豪的。当代世界科学家中，还有人在研究苏颂的创造发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在1956年3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在7至14世纪，中国有制

造天文钟的悠久传统，并认为中国天文钟的传统，很可能是后来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李约瑟等科学家还翻译了苏颂的著作，并由古代天文钟学会出版专集。1958年，我国完成了苏颂这座水运仪象台的复原工作，揭开了世界最早的天文钟的秘密。

宋代在中央朝廷设立司天监。这是专门从事天文学研究和推算天文历法的机关，有12名工作人员，负责天文观测和历书的编造。北宋元丰以后，司天监改称太司局，隶属于秘书省。宋代有好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沈括等，都是在司天监里做过实际工作的。

宋代不但在天文学上取得如此光辉的成绩，在数学研究方面，也同样走在世界的前列。

数学是和天文学有密切联系的一门科学。在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下，我国较早地发展了这门科学。

北宋的一位数学家贾宪，在代数学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公元1050年左右，他发现二项式高次幂（指数为正整数的）展开式各项系数的规律，制成一个二项定理系数表，称为“开方作法本源图”。贾宪是天文学家楚衍的弟子。他的著作《黄帝九章细草》中，讲到开方作法本源图。后来另一位数学家杨辉，在《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成书）中，引用贾宪这个图。图的构造法则是采用二等边三角形的形式，两腰都是“一”，其中每数都是二肩两个数字的和。这是二项式定理中系数的基本算法。世界其他各国数学家们所作的二项定理系数表，有各种形式，但都晚于我国。后来这个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欧洲从16世纪才出现与我国类似的方法，即“巴斯

加三角”。

宋代数学家在方程论上也有突出的成就。北宋数学家刘益，大约在 1080 年（元丰三年）完成一部《论古根源》的著作，提出二次方程式的求根法。此后，数学家贾宪在《黄帝九章细草》中，对这一项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他根据开方作法本源图的构造原理，创立了“增乘开方法”，不仅可以开平方和开立方，而且可以运用求任何高次方程的正根，数字的计算十分简便。到了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提出更为完备的算法。1247 年（淳祐七年），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运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式的例子很多。世界数学家们研究三次方程式以上正根的，大约是在 19 世纪以后。1819 年，英国数学家和涅（1786—1837 年）以研究数字方程正根的近似解法著名，但比我国数学家晚得多。

从北宋数学家创造了增乘开方法以后，到 13 世纪初的南宋时期，又有天元术的运用，使我国代数学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体系。

用天元术来表示一个代数方程是十分简便的。“天元”简称为“元”，是指所求的未知数。这和我们现在设 x 为未知数是一样的。我国古代数学是以“筹”记数或作加减乘除的计算，而不用纸笔。筹是竹头制的，后来也有用木或象牙制的。遇数字有空位的时候，就空一个位置，不放算筹。用算筹记数是我国古代人民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制度。到了宋代，又采取算筹的形象，出现了数码。北宋司马光在他的《潜虚》中，已有 10 以内的数字符号。南宋时，数学家们演算天元术，都采用数码。当时数学家们还把天元术推广运用

到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未知数从天、地二元到天、地、人三元，再到天、地、人、物四元。

南宋数学家秦九韶又创造了“大衍求一术”。他是普州（四川安岳）人，年轻时跟他的父亲到过首都临安，学习了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他的著作《数书九章》的第一、二两卷，探究了“大衍求一术”。这个问题渊源于公元三四世纪的《孙子算经》。在这部古算书中，曾经提到这么一个问题：“今有物不知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答曰：二十三。”书中并提出简单的解法。宋代周密的《志雅堂杂钞》中，把这个问题的解法，简化成以下一首诗：

三岁孩儿七十稀，
五留廿一事尤奇；
七度上元重相合，
寒食清明便可知。

诗中的“上元”就是正月十五日，暗指 15。从寒食到清明共有 105 天。诗的本意就是：三三数之的余数乘以 70；五五数之的余数乘以 21；七七数之的余数乘以 15，3 数相加，减去 105 或其倍数，便得所求数。后来秦九韶加以研究和发展，称为“大衍求一术”，因为： $70 \div 3$ 、 $21 \div 5$ 、 $15 \div 7$ ，它们的余数都是 1。“大衍求一术”在世界数学史上是有光辉地位的。在 19 世纪时，世界数学家介绍我国的“大衍求一术”，称它为“中国的乘余定理”。

科学家沈括根据人民群众在水利工程、建筑工程和军事工程中计算土方和用料的经验，经过自己的研究，创造了“隙积术”。这是计算长方台形垛积的一种方法，是求积方法的新创造。在沈括之前，早已有了计算各种立体体积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把各种立体进行分割和拼凑，由直观来证明它们的求积公式。沈括在隙积术中讨论了两类体积：一个是积，即实体；一个是隙，即虚隙。所谓“隙积”，是指球面有虚隙的堆积体的体积，如垒起来的瓮、缸、瓦盆之类或一层层筑起来的阶梯形土台。隙积术采用分层计算，然后再用级数求和的方法。它以几何的表示法和独特的几何代数变换，来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问题，用以求累层堆积的缸之类物体的总和，即高阶等差级数求总和的算法。这在世界数论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宋数学家杨辉和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等，又进一步加以研究，发展成为“垛积术”，解决了更为复杂的高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

沈括在数学上的另一个重要创造是“会圆术”。这是我国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这一公式后来由元代科学家郭守敬在制订《授时历》时，多次反复地应用于推算“赤经”和“赤纬”，并得到了相当于求面三角法的新成果。

日本数学家三上义夫在《中国算学的特色》中说：“中国数学家像沈括那样多艺多能，实不多见。不用说在日本，就是在全世界数学史上，也没有发现像他那样人物。”

三、地理、地质和气象科学

两宋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国内外贸易和交通的

开拓，以及军事上的需要，地理知识更加丰富起来，使地理学成为一门重要的科学。

在地理图的制图方法以及绘图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宋代都有显著的进步。从 993 年（淳化四年）起，国家规定各州郡每 5 年绘送地图一次。当时国家已经统一，需要编绘更加精密的全国舆地图。北宋朝廷拨出 100 匹绢作为制图用，根据各州郡报送的地理图，编制《天下图》。到了 1001 年（咸平四年），除了规定各州送图外，还通令各路每 10 年绘制本路图送给中央朝廷，由兵部职方保管。为什么送给兵部保管？这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1073 年（熙宁六年），国家又完成了《十八路图》的编绘工作。这项地图由画院里的画工担任绘图，由学者赵彦若负责地理考订。地图的绘制和地理考订采取分工合作的办法。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宋代以后一直是这样。公元 1076 年（熙宁九年），科学家沈括主持《天下州县图》的编绘工作，经过了 10 多年的时间，直到 1089 年（元祐四年）才完成这项艰巨的编绘任务。沈括当时采用古代的“飞鸟图”（即鸟瞰图）法，以比例尺表明距离，2 寸折 100 里，按 24 至把郡县的方位详细记录下来。“二十四至”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中逐渐形成的定位法：即：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卦（乾坤艮巽），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沈括说：“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这是科学的地图测绘法。

宋代的地方行政区域图有 140 多种，大约有 3000 多卷。区域图之外，又有山川、历史、交通、军事、物产及外国图等专图。根据《宋史》里的记载，有《契丹疆域图》、《交广

图》、《西南蛮夷朝贡图》、《益州地理图》……。此外，还有《海外诸域图》、《岭表花木图》、《海外诸番地理图》、《经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鄜延安图》等等。这些专门记载山川、交通、军事、物产及外国地理图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地图学的成就和地理学的发展。现在流传下来的宋代地理图，是刻在石头上的《禹迹图》和《华夷图》，是在 1137 年（绍兴七年）刻的。两幅地图刻在一块石碑的正反两面，尺寸大小相似。《华夷图》大约是根据唐代贾耽（730—805 年）的《海内华夷图》为蓝本而加以改订和缩制而成的。这两幅石刻的宋代地理图，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地理图，距今已有 840 多年了。

《华夷图》长宽各为 3.42 尺，图中对我国山脉、河流、长城以及各州的地理位置，都描绘得相当清楚。山脉是以人字形来表示的，河流的流向和实际情况也是基本上相符合的。从图中的黄河在山东历津入海看来，这图的河道还是 1048 年（庆历八年）以前的情况。《华夷图》对黄河和长江的源流还不甚清楚，海岸线也还不够准确。这些都是受到当时地理知识的限制。

《禹迹图》是一幅按比例划方的地图，每方折地 100 里，共有 3796 方。我国古代按比例划方的地理图，这是现存最早的一幅。图中对黄河和长江等大川，标得比较清楚，山东半岛突出于海中。这些都是已往地理图所未曾注意到的。《禹迹图》所绘的海岸线，比《华夷图》准确得多，说明宋代对沿海地理情况，了解得更多。《禹迹图》所绘的黄河是从天津入海的，这是 1048 年（庆历八年）以后的情况。可见这幅图的

测绘时间比《华夷图》要晚一些，所根据的地理资料也相对地丰富一些，而且又掌握了比例尺。因此，《禹迹图》的轮廓面貌，同近代我国形势地图基本上已经相近似了。

北宋时，王洙（997—1057 年）写了一部《图绘要览》，是一部研究地图绘制方法的著作，可惜早已失传了。

宋代的科学家也制造过地图模型。1075 年（熙宁八年），北宋政府派沈括到北方去与辽朝办理外交事务。他在行程中根据实地调查，制造过地图模型。最初是用木制的。后来经过的山川多了，地形相当复杂，又改以面糊混合木屑，在木案上标明地势。北方天气寒冷，面糊粘的木屑容易碎裂，又改用熔蜡，既轻便，又不易损坏。沈括回到开封后，再把山川形势图用木头雕刻送给朝廷。宋神宗十分赞赏，并下令北方各行政区，都要制造这种木图，藏于内府。宋代这种木制的地形图，比欧洲最早的地形模型早 700 年。

到了南宋，地理学的专著不断增多。著名的有王象之的《輿地图》、陆九韶的《州郡图》、黄裳的《天文图》、《地理图》等。王象之所编绘的地图很详细，每路有图，每州的名胜都有文字记载。他所搜求的资料十分丰富，对四川地区记录尤其周密，得到当时学者陈振孙等人的称赞。

地理学家黄裳的《地理图》，是他在 1190 年（绍熙元年）所献的八图之一。这幅图与他的《天文图》，如今还保存着，是仅次于《华夷图》、《禹迹图》的现存最早的古地图。图中的海岸线和河流，和《禹迹图》有相似之处，地名很详细，所绘的山脉增加了立体感，有些地区还绘出森林。如居庸山长城以北，画了一片森林，并加上“平地松林，广数千里”的

文字说明。这是《禹迹图》所不及的。

宋代由于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州县城市也繁盛起来了。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赋税也不断上升。国家为了掌握各州县的人口、土地、物产、赋役以及各地的文化发展情况，提倡地方志的编纂。在地方志中，记载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和地方历史沿革。宋代有关地理学的著作，大约有 8/10 是地方志。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城市，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地方情况变动很快，每隔 10 多年或几十年，就要续编或重编一次地方志。宋代的地方志书，有 95% 是属于长江以南地区的，说明 12、13 世纪时期，我国的经济重心是在南方。

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是从宋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北宋时期，我国就有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吴儼的《历代疆域志》，就是通考历代地理的专著。又如杨湜的《春秋地谱》，是专考一个时代的地理著作。作者把春秋时期各国的地名加以注释，古今地名对照，并绘了图。南宋史学家郑樵（1104—1162 年）所著的《通志》中，有一门“地理略”和一门“都邑略”，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标志。南宋末的史学家马端临在编写《文献通考》时，继续在这方面作了努力，编成“舆图考”，以禹贡 9 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主，每州都比较详细地考证了历代疆域的沿革。南宋的一位著名学者王应麟，他编写了一部 100 卷的巨著《通鉴地理考》，对历代疆域的历史变迁，详细地作了考查和研究。

两宋时期，由于我国对外交通和贸易的发达，对于国外的地理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记载有关朝鲜国家的情况；赵汝适的《诸番志》，专记东南亚各国的地理和历史情况。这部书有外文译本，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表现在有关水利方面的地理著作相继出现。如单锷的《吴中水利书》和魏岷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都是重要的著作。单锷（1031—1110年）是今江苏宜兴人，考取进士以后，并没有做官。他经常乘一叶小舟，遍历常州、苏州、湖州各地的水道，甚至一沟一壑都不放过。经过了30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科学著作。魏岷是今浙江宁波人。他在嘉定年间（1208—1224年）疏通鄞县它山的水利，通过实际观察，把当时工程的经过和水道的源流，一一加以记载，编辑成书。

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宋代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地球表面上最重要的地质现象是水的浸蚀、搬运和沉积作用。把高山冲刷成深沟，把泥沙带入海中，构成所谓水成岩。这种地质作用，宋代科学家已有了可贵的研究成果，初步接触到地质学的原理。

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沈括到东南地区两浙路的温州和台州一带作考察。当时他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他用了好几年的时间到各地访问新法实施的情况和效果。这一年，他到了浙东，对雁荡山（浙江乐清县境内）的地貌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他看到雁荡诸峰，险崖高峭、挺拔千尺、山水秀丽。可是从岭外眺望，一无所见。他在山谷中作了实地考察，并把考察的结果写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沈括对雁荡山奇峰深谷的特殊形状，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这是地面被大水所

浸蚀，沙土被水流冲刷而去，只有坚硬的巨石得以保存下来，因而挖切成为山峰。这种水的浸蚀作用，沈括称为“水凿”。雁荡山的大龙湫、小龙湫、初月谷等处，都有流水浸蚀而成的深谷。

沈括又把浙东雁荡山的地形，同河南、陕西一带的黄土高原地形作比较，认为“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沈括判明两地都是水的浸蚀作用，只是组成的物质不同，此土彼石。可见他对于水的地质作用，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已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这一年（1074年）的秋天，沈括又到河北北路考察。当他经过太行山北麓时，看见横亘于岩壁中间的一条螺蚌壳皮和卵形石子的带状堆积层，认为这是古代生物遗体堆积而成的。他根据岩壁上的螺蚌壳和成带状的卵石层，推断“此乃昔之海滨”，如今已距离海岸将近千里。从这一推断出发，他认为远古时代的海岸，当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太行山一带。他还进一步根据黄河、漳水、滹沱河、桑干河等河流中都挟带泥沙，成为浊流，东流入海，来说明造成陆地的物质来源，推知华北平原的形成过程。他认为华北平原就是由黄河等许多河流挟带大量泥沙冲积而成的。这是我国对冲积平原成因的最早解释。沈括把河流浸蚀、搬运、沉积等一系列地质作用，互相联系起来，指出了海陆变迁的原因。西方地质学界，直到1788年，被誉为“近代地质学之父”的英国人郝登（1726—1797年）出版《地球理论》，才提到浸蚀作用的理论。

沈括又曾观察陕北一带的地质现象。他从延州（陕西延

安)永宁关黄河岸崩塌时,发现地下数十尺的地方有和竹笋相似的古代植物,已经“悉为化石”。沈括对它的成因作了分析。他认为延安一带向来没有“竹类”植物,可能是古代气候不同,适宜竹类生长。从这里他形成了古今气候变化的概念。这种判断较之意大利学者达·芬奇的类似观察,至少要早400年。根据当代我国科学家研究陕北延安一带中生代植物群的结果,证明沈括所指的化石,是“新芦木”(Neocalamites)植物化石,并不是“竹类”化石。但是他能够从古植物化石推论到古地理和古气候,这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当时对这种化石是否就是“竹类”,并不主观武断,只是说是不是由于古代“地卑气湿而宜竹耶?”他的态度是谨严的。沈括是我国第一个提出“化石”这个科学概念的科学家。

沈括还观察了陕北一带所出产的石油,详细记录了石油的性能和用途,认为我国“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不若松木有时而竭。”他还断定“此物后必大行于世。”沈括对石油的作用提出这样的估计,是很了不起的。今天我国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不是已经证实了沈括在900年前的科学预见吗?石油古称“石漆”,五代以后又称“猛火油”,也有单称为“火油”或“石脑油”。“石油”这个名称是在北宋时才有的。

此外,沈括对湖盐和井盐的开采,各种药用矿物和宝石矿物的特性,陨星的坠落,地震引起海岸山石崩塌、河流改道,含铜泉水的变化等等与地质有关的自然现象,都作了观察,提供了有价值的科学资料,为我国古代地质学作出卓越的贡献。

在气象学方面，宋代劳动人民广泛流传利用物象、天象进行天气预报的经验。科学家沈括曾经把民间的这些经验，记录在《梦溪笔谈》里面。例如人们利用动物鳗来预测水旱灾害。又如“白雁至则霜降”，这是北方初霜的预报经验。又如夏季江湖的风暴，往往发生在午后。如果天亮前“视星月明洁”，当天就不会出现风暴，可以稳妥行船。

沈括还记载了1077年（熙宁九年）发生在恩州武城县（山东武城）的龙卷风，对这次破坏力极大的灾害性天气，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又对发生在河州（甘肃临夏西南）的一次冰雹作了记录，说雹粒“大者如鸡卵”。

在平静无风的海面航行，或在海边瞭望，往往会看到空中映现出远方船舶、岛屿或城市楼台的形象。到过沙漠的人，有时也会看到远处忽然有一片湖水、湖畔树影摇曳，当大风一起，这些景象就会消失。通常称这种现象为“海市蜃楼”。沈括记载出现在山东渤海的一次海市蜃楼。他询问当地百姓，百姓们称为“海市”。沈括虽然还不能对这个大气光学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但是他否定了这是“蛟蜃之气所为”的迷信说法。当时人们都以为这是海里的蛟龙和蜃蚌吐气而成。

沈括还把观察、研究所得的气象知识，应用于天气预报。有一天，首都汴京久旱不雨，老百姓都在求雨。后来遇到连日阴天，人们以为要下雨了，而天气突然转晴，“炎日赫然”。这时，沈括正因为有事进见宋神宗。宋神宗问他什么时候有雨？他回答说：“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他敢于如此有把握地告诉皇帝。人们不相信这样的大晴天会下起雨来，但是，第二天果然下了雨。沈括的预报之所以准确，是因为有科学根

据。从现代气象学来看，连日阴云，说明空气中水分十分充沛，但热力条件不足，缺乏空气上升运动，所以不能成雨。后来一旦骤晴，近地面的气温剧增，引起对流不稳定而产生降雨。

宋神宗统治时期，为了解决宋、辽之间的矛盾，曾派沈括北上办理交涉。沈括在北上途中，一次雨过天晴的黄昏，看到帐幕前的小涧上出现了“虹”。虹的两头坠入涧中。他叫随行的人渡过小涧，隔虹对立，相去几丈，中间如隔一层透明的绢纱。他在《梦溪笔谈》中记载虹的生成，同意孙彦先的看法，虹是“雨中日影”，“日照雨则有之”。沈括还指出虹与太阳的相反方位，这是虹的基本特征。由于时代的限制，当时他不可能理解光的反射与折射原理。南宋学者朱熹，对于大气中的各项现象，也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他打破古人“虹能截雨”的不正确看法，认为云薄雨稀，才能透露日光。有了日光的透露，就形成了虹。虹是不能“止雨”的。这是合乎科学的见解。

朱熹还留意到云雨生成的原因，并用日常生活中通俗易懂的道理来解释空气中水蒸气的凝结。朱熹说：“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这些解释，都是很宝贵的科学知识。

四、医学和药物学的优秀遗产

在医学方面，宋代的医学家们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和艰苦努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针灸疗法是我国医学的优秀遗产。宋代有一位学问渊博、技术精湛的针灸学家名叫王惟一。他精通古今医学理论，对针灸医疗有很深的造诣。王惟一在铜器工匠的协助下，铸造了两座针灸铜人。铜人的外壳分腹背两半，合起来成为一个整身。身体的外表按照脏腑十二经（即五脏、六腑、心包络）来定穴位，每一穴位都刻有穴名。铜人是作为医学教学模型和测验医官的针灸技术水平用的。铜人外表的穴位有空眼，表面全部涂上黄蜡，体内灌满水。考试时，就让医官按穴试针。穴道刺中了，水就跟着金针流了出来。这种考试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十分严格的。我国古代凡是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经过刻苦学习，严格训练，才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学者。王惟一是这样对待自己，也是这样对待别人的。正因为他有“从难从严”的治学精神，才促进了针灸学的发展，终于完成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这部著名的针灸学著作。过去，医学专家们考定了 313 个穴位，王惟一增加到 354 个穴位。这是针灸学的一大发展。

除了王惟一的这部著作外，我国现在还流传着两部宋代的针灸学著作：一部是王执中的《资生经》，汇集了南宋以前我国针灸学的精华；另一部是闻人耆年的《急备灸法》，是一部专治急性疾病的针灸学。

医学上的妇产科，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为独立的专科。唐朝的太医署还没有专设产科。到了北宋，国家办的太医局分设九科，妇产科是其中之一。宋代的医学家中，出现了张锐、李师圣、郭稽中、杨子建、陈自明等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李师圣和郭稽中合著的《产育保庆集》，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医学

遗产。这部书后来被收辑在明初国家编的大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中。北宋的医学家杨子建，在1078年（元丰元年）完成《十产论》的专著，叙述正产（正常的分娩）以外的10种难产情况及治理方法，并作了详尽的分析，反映了我国妇产科的高度水平。

宋代在药物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果。当时的制药方法，已有了统一的标准。在宋代以前，我国药物剂型仍以汤药为主。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就说过，“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从宋代以后，药物剂型起了很大的变化，汤剂不占主要地位，丸、丹、散、膏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宋代的官药局——“熟药所”里制造大量的丸、丹、散、膏，一般医家也广泛应用。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由裴宗元等名医整理编成了一部配方手册。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到1151年（绍兴二十一年）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配方手册，共记录方剂788个，其中汤剂只有128个、丸剂有290个、散剂有193个，都超过了汤剂。这部手册在两宋时期，成为医学家们临诊处方的主要依据，也是太医局“卖药所”制造成药的配方蓝本。当时官办的“卖药所”把生药经过加工，制作丸、丹、散、膏、酒等出售，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宋代并由国家组织名医，审订编写药物学的文献资料。公元973年（开宝六年），医学家刘翰、马志、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温等人，集体研究药性和药剂制炼，修订唐代的本草，编成药剂处方要目——《开宝本草》。这是北宋初医学上对于药物研究的总结性科学著作，共收录新旧药

物 983 种，其中新增加的药物有 132 种，外来进口的药物有 30 多种，一一根据临床经验，加以说明和注释，在药物分类上已经超过前代。

公元 1057 年（嘉祐二年），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苏颂、掌禹锡、林亿等许多人，又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作增补，编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记载药物 1082 种。后来苏颂又在 1064 年（治平元年）主持修成《本草图经》。他根据各地报送给政府的药物图样，详细地加以查核审订，使科学性超过以前的各种本草书。苏颂是一位科学家，又精通医学。他对医药学的贡献，主要是依靠集体力量，把全国各地关于药物学的知识集中起来，把实物与文献资料相对证，使我国的药物学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朝的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就称赞这部《本草图经》“参考详明，颇有发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 74 种药物是采用苏颂主编的这部书的。

此外，还有唐慎微在 1108 年（大观二年）编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 1746 种。这书是北宋末年药学的名著。不久，又编刻了一部《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增加了 628 种新药物。这部名著被后来的医药界沿用了将近 500 年。

宋代对于医学教育，也比前代有较大的进展。1060 年（嘉祐五年），太医局办起了医药学校，招收了 120 名学生。第二年，各府道也仿照太医局，设立地方医学。1076 年（熙宁九年）以后，在王安石新政的影响下，教育事业有了发展，太医局的学生增加到 300 名。在医学教育方面，提倡医学理论和实际临床经验相结合。太医局为了考察学生们的实际技能，

规定要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里的学生治病，或替各营将士们治病。每人发给印纸，记录治病的经过和结果，作为年终考查成绩的依据。这是我国古代教育方面的优良传统。两宋时期，医师是深受人民尊敬的。当时的医官称大夫、郎中、翰林。直到现在，在南方一带还有人称医师为郎中、北方一带称医师为大夫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经说过：“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宋代医师地位之高，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视和迫切需要。

宋代医学著作有 509 种之多。由于医学的进步，印刷事业的突飞猛进，使医学著作能大量刻印和流传。公元 1026 年（天圣四年），政府派晁宗懿、王举正诸人校正古典医籍。1057 年（嘉祐二年），北宋朝廷还成立了校正医书局，由医学家掌禹锡、孙奇、高保衡等人从事古代医书的整理工作。他们先后校订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玉函经》、《金匱玉函略方论》……等一批医书。这些古代医学文献的整理和重版，对医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两宋时期，我国医学和药物学之所以得到如此显著的进展，也是同世界各国进行医药交流分不开的。宋代海外贸易进一步扩大，有大量国外药物进口。北宋初的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进口的外国药物还只有 37 种。到了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 年），已增加到 300 多种。不仅品种增多了，数量也是惊人的。公元 1155 年（绍兴二十五年），仅从占城进口的沉香等 7 种药物，就有 6.3334 万斤。当时从世界各国进口的药物，主要有降真香、乳香、檀香、丁香、沉香、木香、龙涎香、槟榔、胡椒、龙脑、麝香、肉豆叩、白豆叩、安息香、

砂仁、玳瑁等等，大多数来自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国家。

宋代大批外来香药进口，提高了临床治疗的效果，出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最突出的如龙脑、苏合香、麝香等辛香开窍药物的输入，使过去认为无法治疗的神志昏迷的重危病人得以再生。例如由苏合香、乳香、龙脑、沉香、丁香、安息香等大量香料药物组成的苏合香丸，不仅在宋代是很有名的特效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治疗冠心病的抢救药物。

宋代有许多医方书，都大量采用进口的药物，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第十卷治小儿病的医方有 119 个，其中有 68 个药方采用进口药；又如北宋的儿科名医钱乙，在 1119 年完成的《小儿药证直诀》书中，共载医方 120 个，其中有 37 个用进口药物。南宋妇科名医陈自明，他又精通外科。1263 年（景定四年），他完成了《外科精要》一书，共载 63 个医方，其中有 26 个医方含有进口药物。以上这些生动的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成果。

五、建筑工程技术的光辉成就

宋、辽、夏、金时期，由于人民物质生活要求的提高，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比隋唐时期丰富了。宋代人民的生活用具中，如桌子、椅子等，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考古工作者曾经在河北巨鹿的宋城旧址内，发现宋代的桌椅。

由于人们生活的需要，居住条件也逐渐有所改进，建筑事业也随之而兴盛起来。宋代的建筑工程技术从实践中不断

提高，人们更加讲求建筑的独特风格。

我国古代的传统建筑体系是以木构形式为主的，包括梁、柱、斗拱和屋顶。木架结构是以木架为骨干，下面是立柱，上面是梁、枋，构成一座建筑的架子，承载全部房屋的重量。这样，屋顶的重量不全靠墙壁支持，墙面主要是间隔内外，并可以任意开窗，使光线和门户都可以自由地灵活处理。这样独特的木构建筑，到了宋代日臻完美。在宋、辽、金时期，北方和南方的各种建筑，丰富多彩，有殿宇、楼阁、居民住宅、碑亭、佛塔、桥梁、厅堂、廊庑、大门等各种类型，还有城市建筑的总体规划。

宋代的木构建筑，还有很多一直保存到现在的。甘肃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四座宋代的木窟檐，其中有一座是距莫高窟 30 里的三危山中的慈氏之塔。这是一座小木塔。第 427 窟的窟檐内部还有完整的彩画，是目前所知宋代最早的彩画，证明在北宋初还保存着唐代的彩画风格。

宋代的建筑组群，有河北正定的隆兴寺。这个寺院现存的重要建筑物，都是北宋和金代所建。但它的总平面布局，可以追溯到北宋初的开宝四年（971 年）。

天津市蓟县城内的独乐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教建筑之一。这个寺院的主要建筑之一观音阁，是辽代统和二年（984 年）建筑的。这是一座面阔五间，以两个正层和一个暗层构成的三层建筑。这三层建筑是围绕着一尊非常高的泥塑立像建造的。在上两层的楼板当中，都留出一个“井”，让立像贯穿三楼。这座建筑物的主要特点是斗拱结构。斗拱形式多样，具有实际的承重作用，并与其他构件组成一个优美

而统一的整体。它是我国目前保存的时间最早的木结构高层楼阁式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今辽宁义县城内东北，有一座奉国寺。寺内的大雄殿建于辽代开泰九年（1020年）。除了蓟县的独乐寺外，这是我国现存辽代的早期建筑之一。这个大殿内塑有七尊大佛，又称为七佛殿。大殿向南、面阔九间、单檐四注，耸立在高台上，非常雄伟而壮丽。它和山西大同华严寺的大雄宝殿（也是辽代建筑），同为国内佛殿中罕见的高大建筑物。这个大雄殿经过 900 多年，一直完整地保存下来，是由于在结构力学方面，合乎科学原理。例如荷重梁至今还平直挺健，没有弯折现象。事实证明，早在 1000 年前，我国的木构建筑工匠们，已经掌握了建筑学方面的基本规律，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木构古建筑上的彩画，一般很难保存。可是这座大雄殿的内檐，保存了辽代建筑的彩画，不仅内容丰富，艺术水平也是很高的。

在山西太原，有一座晋祠，其中有一组建筑物：圣母殿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鱼沼前的一对铁狮子铸于北宋政和八年（1118年）；献殿建于金代大定八年（1168年）。山西大同的善化寺也是金代建筑，是天会六年（1128年）到皇统三年（1143年）间重建的。

除了我国北方以外，南方也还保存着宋代的建筑。例如浙江余姚保国寺的大雄宝殿，是在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建筑的，比北方的独乐寺仅仅晚了 29 年，在结构和艺术创作上，都十分相似。福建泰宁甘露岩，发现了一组宋代建筑，包括上殿、厓阁、南安阁、观音阁、韦陀亭、仓库等，建

于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到乾道元年（1165年）之间。建筑物的面积并不大，大都是面阔一间的单层重檐。但是气势雄伟，设计手法很高。在那一间小仓库的灰泥墙上，还保留着许多题有宝庆、绍定等年款的游人题记。江苏苏州元妙观的三清殿，是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建筑的。又如广州的光孝寺，是南宋淳祐年间（1241—1252年）建筑的，它带有南方建筑上的特殊装饰手法。

宋代建筑中，塔的建筑技术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山西应县佛宫寺的释迦塔，是在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建筑的。这座宏伟壮观的楼阁式木塔，五层六檐，各层间又夹设暗层，实际上共有九层。塔高约67米，重约3000吨，估计用木材在3500立方米以上，这座木塔建成后，至今已900多年，仍然岿然屹立。木塔经受住狂风暴雨和强烈地震的考验和人为的袭击。1926年山西军阀混战，许多发炮弹落在塔身上，没有遭到毁坏。这座木建筑的持久性证明了我国建筑学的高度科学性。只有合乎科学的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山西应县的这座辽代木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大的木塔。

宋代还有许多仿照木构形式的砖塔和石塔。河北丰润车轴山寿峰寺的药师塔，是一座单层塔，建于辽代重熙年间（1032—1054年）。塔顶是一个庞大的尖锥体，周围镶砌着重迭达九层的方形小塔，每个小塔内都雕有佛像。呼和浩特市的大白塔，原名万部华严经塔，是辽代晚期建筑的一座八角七层楼阁式的砖塔，高约42米。这座砖塔建筑在古代丰州城内。丰州是辽代在呼和浩特平原上建立起来的大城市，是大青山后广大草原地区和内地交通的重要枢纽，各族人民以及国外

友人都到过这里。这座塔的墙壁上留下了游人的题记，除了大部用汉文外，还有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畏吾儿文、古叙利亚文、古波斯文等各种民族文字书写的题记。辽代的砖塔很多，北京涿县居云寺塔和智度寺塔，都是辽代建筑的多层砖塔。开封祐国寺的铁塔建于北宋庆历元年（1041年），是一座八角十三层的砖塔。塔的内部是灰色砖，外部是褐色的琉璃砖。下层有四个门。琉璃砖的形式多种多样，都是按照塔的建筑需要而特制的。因为塔的颜色像铁，故称“铁塔”。宋代的石塔有福建泉州开元寺的东西塔。东塔名镇国塔，最初是唐朝咸通六年（865年）建的木构塔，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年）改为砖塔。到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才改为现存的五层石塔，费时12年，高48米，八角式，纯为花岗石仿木构建筑形式。西塔名仁寿塔，最初也是木塔，建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到了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改为砖塔，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才改造石塔，高44米，结构与东塔相同。这两座石塔充分体现了宋代石构建筑的卓越成就。两塔的石刻雕凿十分精细，别具风格，表现了宋代泉州人民石雕艺术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性。

宋代由于交通运输的发展，桥梁建筑也大大超过前代，出现了又长、又坚固、又有丰富艺术创造的桥梁建筑工程。泉州是两宋对外交通的枢纽，又是我国有名的花岗岩产地，可以就地取材。因此，泉州在宋代增加了许多石桥。例如晋江安平桥，是1138年（绍兴八年）建的，前后经历了14年才告完成，明、清时代都有重修，现在基本上保留原状。桥的位置在晋江安海和南安交界处，长达2070米，共有362个孔，

在这座石桥上，建筑了三座大亭子供人们避雨和小憩。如今这些亭子还依然保存着。桥上有一条楹联是这样写的：“天下无桥长此桥”。这是当时国内最长的大石桥。这座石桥是在面宽约 5 华里的海滩上建筑的。来潮时，波涛汹涌，劳动人民仅靠手工操作，征服困难、建筑桥墩、铺设桥面、从事雕刻，处处都体现出工程的浩大和艰巨，表现了宋代劳动人民卓越的创造精神。比安平桥建筑的年代还要早的，还有一座洛阳桥，跨于洛阳江入海的海滩上，全部是石结构，全长有 900 米，1053 年（皇祐五年）始建，1059 年（嘉祐四年）完成，先后花了 6 年的时间。这座大石桥用 46 个船形的桥墩砌出水面。桥面两旁扶栏外的桥墩上，还有石塔。现在还有五座石塔保存下来。

在泉州的临漳门外，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 年）曾建造过一座大石桥，名叫石笋桥。工匠们费了 6 年才把它建成。南北桥墩上，各有四座石塔。桥梁所用的花岗石板，根据实测，最大的一块重 3.64 万公斤，石板下面发现有人工凿过的石眼，并且有火药炸裂岩石的痕迹。可见宋代工匠们在建造石桥中，已用火药爆破。当时工匠们能把几万斤重的石板横架于桥墩之上，想必是采用简单而有效的机械搬运。

泉州的宋代石桥，数量较多，如东洋桥（又名东桥），建于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 年），普利大通桥建于绍兴十二年（1142 年），苏埭桥也建于这一年，长 2400 多丈，是泉州最长的一条大石桥，顺济桥（又称新桥）建于嘉定四年（1211 年），鸟屿桥（又名盘光桥）建于宝祐年间（1253—1258 年）。这些大石桥的先后建成，标志着泉州在宋代海外交通和贸易

上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宋代桥梁建筑工程的辉煌成就。

关于宋代的都市建设，现在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在苏州，有一块宋代苏州城厢的石碑——《平江图》。这幅城市建设图是南宋绍定二年（1229年）重建平江坊市时设计的，可以了解南宋时期江南城市建设的雄伟规模。图中包括城墙、坊市、街道、河流、桥梁、官厅、寺观以及郊区的名胜古迹。《平江图》所反映的城市建设规模之大，也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又一个标志。

宋代建筑技术的高度发展，产生了优秀的建筑学著作。北宋初有喻浩的《木经》，北宋末期有李诫的《营造法式》。

喻浩是一位木工，他在建筑学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和很高的技术水平。公元989年（端拱二年），他建造一座木塔。这座木塔建在首都汴京开宝寺，名叫福胜塔，八角十三层，高达360尺。喻浩在这座塔的建筑上，花了8年的心血。他先制作塔模型。著名的画家郭忠恕对塔的设计也参加过意见。塔建成后，看起来有些向西北方向偏斜。人们就问为什么会偏斜的？喻浩回答说，京师地平无山，多西北风。过了100年之后，塔自然地会端正了。可见喻浩的观察能力和因地制宜制的建筑技术水平多么高深。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处理事物能从实际出发的一个生动事例。喻浩曾经把当时在建筑学上所取得的经验，写成一部《木经》，可惜早已失传了。

李诫（1035—1110年）是一位有名的建筑工程专家。他把宋代及以前的建筑技术和工匠们的操作经验，加以全面的总结，完成《营造法式》这部巨著。它不但是我国建筑学史上富有创造性的专著，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建筑学著作。宋

代的建筑工程技术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李诫曾经参预北宋朝廷的建筑工程 10 多年。当时国家所设的“将作监”，就是专门管理宫廷、城廓、桥梁等建筑营造工程的。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使他有机会了解技术工人们的实际操作经验。他善于综合和分析，把当时的建筑工程知识和群众集体创造的智慧，一一加以记录和整理，加以比较研究，从熙宁年间（1068—1077 年）开始编写，经过了 30 年的长期努力，才完成这部带有总结性的科学著作。

《营造法式》涉及的范围很广。全书分为 34 卷。第 1 和第 2 卷是对建筑方面的通用名词解释，以及有关建筑的规定和数据。如计算木料中的方圆几何关系和圆周率等等，都分别作了说明。第 3 至 15 卷叙述 13 种建筑制度。例如壕寨制度是研究城寨建筑的；石作制度是关于石作的结构和雕饰的；大木作制度是研究木构架的方法的，其中包括柱、梁、枋、斗拱等，分析极为详尽。大木作制度是木构建筑中最重要的部分。此外还有小木作制度，包含的内容更多，如门窗、隔扇乃至佛龕的形制等；瓦作制度是讨论瓦的使用和瓦饰方法的；彩画作制度是关于各种建筑的艺术装饰。书中还涉及石作、砖作的工程做法。第 16 到 28 卷的内容是按照前面 13 种制度，分别指出估工、算料等技术问题，其中对斗拱的技术问题，列举特别详细。第 29 卷到 34 卷是极珍贵的建筑图样，包括壕寨、石作、大木作、彩画、雕饰等图样。通过这些图样和装饰设计，可以了解宋代的工艺水平。在这些装饰品中，已经融合了各族人民的优秀艺术创造。

《营造法式》全书有 357 篇，3555 条。其中有 308 篇、3272

条直接反映了宋代建筑工匠的操作经验和巨大成就。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部比这更为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第六节 友好 的中外文化交流

宋、辽、夏、金时期，我国同世界各国发展了友好的文化交流。当时我国是世界上文明高度发展的封建国家，大约有 50 多个大大小小的亚非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包括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乃至埃及、地中海沿岸与东非沿岸等广阔地区。中国人民同亚非各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外国商人把香料、药物、犀角、玳瑁、琥珀、玛瑙等特产运到中国，然后把中国的瓷器、纺织品、金银、铜锡、铜钱等物品带回本国。中国的青瓷和白瓷是亚非人民最喜爱的日用品。

泉州和广州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重要地区，也是宋代对外文化交流的枢纽。特别在南宋时期，泉州离文化中心临安较近，是外国使节来访的重要门户。三佛齐国是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心，同我国泉州、广州都有固定的航线，每年船舶往来不断。从三佛齐开出的商船，顺风行驶只要 20 多天就能到达广州。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就有三佛齐的商人李甫诲，满载香药、犀角、象牙等特产前来中国贸易。三佛齐出产的花酒、椰子酒、槟榔酒、蜜酒，源源输入中国。当时临安的居

民，把椰子酒作为暑天的冰凉饮料，槟榔酒成为中国人民款待贵宾和举办婚礼的上品。

两宋时期，三佛齐国先后派遣过 30 多次使者前来中国访问。建隆元年到三年（960—962 年），每年都有三佛齐的使臣来到中国，朝贡方物。宋朝政府回赠白瓷器、银器等一批珍贵礼品。开宝四年（971 年），他们又带水晶、火油等物向中国朝贡；开宝七年（974 年），朝贡的礼品有象牙、乳香，蔷薇水、万岁枣、扁桃、白沙糖、水晶指环、琉璃瓶、珊瑚树等。各国使者大多乘中国海船，从泉州上岸。宋朝政府以贵宾的礼节欢迎各国来访的使节。泉州所设的“来远驿”，就是专门接待外国客人的宾馆。外国使者把一批珍贵的礼品送给宋朝政府。例如 1156 年（绍兴二十六年），三佛齐送了近 2 万斤的檀香。通过这种“朝贡”的关系，双方互相赠送礼品，包括图书文物，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

除了国家之间的互相访问，东南亚各地的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甚至居住在中国。中国的商人也频频出海贸易。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 年），就有泉州商人朱仿乘船到三佛齐贸易。每年冬季，顺风一个月左右，就能从泉州到达三佛齐的外港凌牙门（新加坡），然后进入三佛齐的巴林邦（巨港）。在新加坡，曾经出土宋代的瓷器碎片和铜钱，这些都是当时两国经济交流的遗物。

东南亚的其他许多国家，也同样与我国发生较多的联系。赵匡胤刚建立宋朝不久，占城国于建隆二年（961 年）派使者前来朝贡，贡品有犀角、象牙、龙脑、香药、孔雀等物。宋朝政府回赠隆重的礼品。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摩逸国

(菲律宾民都洛岛)的商船到了广州。政和六年(1116年),真腊(柬埔寨)派专使鸠摩僧哥带领副使和随员14人来访问宋朝。此后,多次派遣使者前来中国。当时是吴哥王朝时期,真腊成为印度支那半岛上一个繁荣而强盛的国家。宋朝政府对外国使者前来友好访问,或者是外国商船前来贸易,都给予友好的接待,表示欢迎。对于暂时居住在中国的外国商人,尊重他们本国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生活上给予各种照顾,并规定拯弱救难、给资遣送等办法。东南亚各国对待中国商人,也同样是采取友好的态度。有一次,宋代开往渤泥(加里曼丹)的一艘商船,抵岸三天,渤泥国王就同眷属及有关人员前来参观。商船的跳板铺上锦缎来迎接国王,并请国王饮酒、赠送礼品。商船上的货物,双方先议定价格,然后鸣鼓,召集远近人民前来自由贸易。我国商船返航时,渤泥国王办酒席送行,还回赠了礼物。渤泥国的使臣也来到中国访问。1082年(元丰五年),渤泥国使臣访问我国以后,从泉州乘海船归国。北宋政府规定,各国使节所经过的地方,都用鼓乐热烈迎送、隆重接待。宋代同东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繁荣,而且增进了各国人民的深厚友谊。随着友好关系的发展,我国侨居东南亚国家的侨民日渐增多,中华民族先进的生产技术,流传到东南亚各地。宋代中国外销的瓷器、铁器、丝织品以及各种手工艺器,丰富了东南亚人民的物质生活。铁器的输出,有利于各国发展工农业生产。同样,东南亚各国的香药,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和保护人民的健康,起了巨大的作用。胡椒是东南亚输出的特产之一。我国的药材川芎,对医治采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的效果。根

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南宋临安城里，每天要消耗 42 车胡椒，每车重 220 斤。胡椒不仅是温胃散寒的良药，也是中国人民广泛使用而有益于健康的调味品。淳熙五年（1178 年），三佛齐国就向宋朝进贡了 1550 斤的胡椒。

宋代铜钱流行东南亚各国，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宋钱在东南亚各国是很有影响的货币，促进了各国的商品流通和双边贸易。

宋代与东方的高丽、日本，保持了传统的友谊，公私友好往来更加频繁。宋太祖建隆三年（962 年），高丽国王派使者李兴祐、李励希、李彬等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第二年，又遣使者时赞到中国来，不幸遇上大风，船破，淹死了 70 多人。北宋政府当即予以救济。宋太宗时，中国也派出使节访问高丽。后来高丽派学生金行成留学宋朝，入国子监求学，斐然成章，荣获进士的称号。后来他在宋朝做官，一直到淳化初，病歿于安州（湖北安陆）通判任上。

宋朝与高丽两国，除了互派使团访问外，民间的商业贸易以及僧人的来往，也是十分密切的。端拱二年（989 年），高丽僧人如可前来中国。宋朝政府应他的请求，赠送一部大藏经。淳化二年（991 年），高丽又派使臣韩彦恭前来求印佛经，宋朝又赠送了佛经等图籍。天禧年间（1017—1021 年），高丽海船因遇大风，多次漂流到中国明州、登州（山东蓬莱）等地。宋朝政府对罹难人员，一一予以接济，给他们带足回国途中所需的粮食等必需品。宋朝政府并对救济海上遇难的海船，专门作了规定。天圣八年（1030 年），高丽前来中国的使团，共计 293 人，是人数相当多的一次。他们带来金器、刀

剑、人参、铜器、硫磺、青鼠皮等名贵礼物。宋朝政府也回赠丰厚的物资。宋哲宗时，高丽国王的兄弟义天出家为僧，从海道来中国求经学法。他在杭州跟中国僧人净源学习。净源死后，义天亲自写了祭文，由高丽国王派遣专使来中国祭奠。义天和净源在沟通两国佛学方面作出了贡献。当时泉州有一个商人名叫徐戡，受高丽之托，在杭州刻印《华严经》，书板有 2900 多片。刻成之后，用海船运往高丽，得到 3000 两银子的厚赏。

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两国的僧人往来十分频繁，对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日本有一位僧人名叫荣西（1141—1215 年），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坐商船来到中国，访问过台州的天台山和明州的育王山。同年回国，带去天台宗的佛经。淳熙十四年（1187 年），他又来中国，到过天台山和明州的天童山，学习禅宗。宋孝宗给他“千光法师”的荣誉称号。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 年），荣西坐中国商船回国，带去中国的茶种和佛经，一面宣传佛教禅宗，一面提倡饮茶。他还写了一部《吃茶养生记》。饮茶后来逐渐成为日本人民生活中的一项新的内容。南宋时代，日本僧人经常来中国求法。日本收藏家收藏的一幅南宋古画，描绘中国学者拱手送别日本僧人的动人场面。画面的左边，有一艘正在扬帆行驶的中国商船，日本僧人就是乘这艘商船离开中国的。画的上幅题了两首诗：一首是钟唐杰的题诗，另一首是龚从周的题诗。这两人都是朱熹的弟子。两首诗的大意是说这位日本僧人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游学，游览了武林（即杭州）山水。他们能与这位“上人”结交，共同讨论佛教

哲学和写诗，十分荣幸。如今要分手了，他们对这位异国高僧怀有无限的敬意。窦从周的诗中还特别提到，这种建立在两国文化交流基础上的友谊，与商人们唯利是图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他希望僧人归国之后，能经常托人带信来。窦从周死于庆元二年（1196年），与荣西两次到中国来的时间相近。可能他们送别的这位“东海上人”就是荣西。这幅画反映了宋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场面。南宋时期，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物产中，黄金、硫磺、水银等都是名贵商品，还有大宗的木材。诗人陆游曾经提到，日本商船每次来到临安或四明（浙江宁波）时，人们就能买到廉价的木材。中国的出口货，特别是瓷器最受欢迎。中国的造瓷技术首先传入高丽。高丽在康津建窑造瓷。后来又从高丽传入日本。1223年，日本加藤四郎到中国学习造瓷技术。回国后，在濑户地方建窑仿造。日本人民称加藤为“陶祖”。

我国和伊朗都是世界上有名的文化古国。波斯摩尼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影响。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立的。摩尼教吸收了祆教（拜火教）、景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内容。公元7世纪，摩尼教传入中国。到北宋时代，摩尼教逐渐流行，从福建传到温州，遍及两浙，在南方劳动人民中间有相当广泛的基础。摩尼教的哲学思想是以二宗（光明与黑暗）为基础的二元论。这种追求光明的未来，反对黑暗社会的思想，在被剥削阶级中有较深的影响。如吃菜不吃肉，一家有事，大家救济，提倡团结互助等，都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北宋末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就是利用摩尼教把分散的农民发动起

来的。

摩尼教徒来到中国，也带来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如七天为一个星期，中国古代称为“七曜”，就是摩尼教徒传入的，对我国天文历法产生一些影响。

波斯的造瓷技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他们制造的瓷器，吸收了中国特有的凤凰图案。

宋代有不少埃及人来到中国。他们除了经商外，还促进了两国科学文化的交流。埃及仿制中国瓷器，开始于法特米王朝（969—1171年）。当时有一位名叫赛尔德的工匠，在埃及传授宋代名窑的造瓷技术。南宋时，埃及大量仿造中国瓷器，并采用中国的蚕丝织成丝织品。当时担任过泉州市舶司长官的赵汝适，在他的著作中比较详细地记载勿斯里（埃及）、遏根陀国（亚历山大城）和憩野（开罗城）等地的情况。这些情况大约是从留居在泉州的埃及商人中了解到的。赵汝适记载遏根陀国有一座大塔，这就是古代亚历山大城的法鲁斯岛灯塔，高达100多米。当时中国同北非国家的友好交往中，埃及是首屈一指的。古代阿拉伯人，遵照穆罕默德的遗言：要寻求学问，即使它远在中国，亦当求之。阿拉伯人千辛万苦地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扬州等地经商、访问、学习，传播各族人民的友谊。宋代的中国人民也不辞劳苦，迎着狂风巨浪，前往阿拉伯各国，学习外国的文化。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讲到北宋初年中国人学习阿拉伯文的动人故事。他说，阿拉伯学者纳丁（死于995年）在《科学书目》中记载一位中国学者，在巴格达住了一年。他只用五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文。当他

离开巴格达时，请房东拉齐读一部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拉齐读得很快，这位中国学者能正确地用汉文草书速记下来。这是中埃友好关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页。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创造了伊斯兰教，有一部经典叫做《可兰经》。伊斯兰教历（即回历）的元年，就是公元622年。早在唐朝的时候，伊斯兰教就传到广州、泉州、扬州。到了宋代，随着阿拉伯商人的纷纷来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阿拉伯人普哈丁在扬州传教。德祐元年（1275年），他在扬州城内建造一座仙鹤寺，它与广州的怀圣寺（光塔寺）、泉州的麒麟寺、杭州的凤凰寺齐名，都是我国伊斯兰教的著名清真寺。普哈丁死后葬在扬州。他的坟墓俗称“回回堂”，又名“巴巴窑”，至今还保存它的原貌。墓塔的建筑形式，与埃及法老的金字塔（即墓塔）的外形十分相似。在第三层塔基上，还刻有阿拉伯文《可兰经》的一些章节。南宋末，还有一位伊斯兰教士名叫撒敢达，也到过扬州传教，死后葬在普哈丁墓的附近。他们都是传播阿拉伯文化的友好使者。根据《宋史》上记载，两宋时期从968年（元宝元年）到1131年（绍兴元年），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友好交往，有23次之多。

在福建泉州，至今还保留着宋代海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资料。泉州南安县的九日山，是古代泉州著名的风景区，遗留不少关于宋代中外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史迹。当时外国商船从泉州返航回国时，泉州的地方长官和市舶司官员，登上九日山的昭惠寺等庙宇，举行隆重的“祈风”典礼，预

祝外国友人顺风返航，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国家。典礼之后，还在摩崖上刻石题名记事，作为永久纪念。现存最早的宋代石刻，是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太守司马伋和市舶司长官林劭等，在延福寺祈风的摩崖石刻。这是宋代中国和亚非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1974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泉州湾出土一艘宋代的大海船，这是一艘远洋航行的尖底海船。船内装有大量的香料、药材和玳瑁、凤螺、货贝等遗物。这些动、植、矿物，主要出产于东南亚一带，都是宋代东南亚各国向我国进口的特产品。在船板上还附着一些贝类。这些贝类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海和东南亚一带海区。根据各种因素分析，这艘商船大约是南宋末由东南亚装载货物后返航的中国商船。它的发现，有力地证明宋代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往来。这是宋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又一新的历史见证。

第六章

元朝

第一节 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统一

一、蒙古的兴起

蒙古族的起源

早在五六世纪的时候，从呼伦贝尔草原向东延伸到嫩江，南抵洮儿河，北迄额尔古纳河下游，已经居住着语言上和东胡有渊源关系的室韦部落。进入七八世纪，室韦部落逐渐发展起来。当时，在北方称雄的突厥人称他们为达怛。室韦——达怛人是蒙古族的祖先，我们可称他们为原蒙古人。

室韦部落中有一支叫“蒙兀室韦”。“蒙兀”是蒙古一词的最早的汉文译写，见于《旧唐书·北狄传》。后来，在汉文典籍中，大致同音的不同译写还有很多，如“萌古”、“朦

骨”、“萌骨”，等等。写作“蒙古”，最早见于《三朝北盟会编》所引《炀王江上录》。到了元代，人们已普遍用“蒙古”这个写法。在古代蒙古语中，“蒙古”这个词是“质朴、无力”的意思。它开始只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后来才成了一个新兴的民族的共同称谓。

蒙古族的先人室韦—达怛从氏族发展到了部落。随着部落的繁衍，他们沿着额尔古纳河，从呼伦贝尔草原，渡过呼伦湖，向西进到了斡难河（今鄂嫩河）的源头。

这个室韦—达怛人的西迁运动大约是从8世纪以后开始的。当时，在蒙古高原上，回鹘势力已走向衰落，而后契丹势力和女真势力相继进入并得到发展。到十一十二世纪时，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构成了这样的部落分布状况：蒙古乞颜部居住在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上游不赉罕山（今大肯特山）一带。蒙古泰赤乌部居住在斡难河中下游。要是以成吉思汗所属的乞颜部为中心，那末东面是塔塔儿部，在怯绿连河下游和呼伦贝尔地区。再东是弘吉剌部，在额尔古纳河、海刺儿河（今海拉尔河）、合剌合河（今哈拉哈河）流域。南面是汪古部，在阴山之北。西面是克烈部，居土兀剌河（今土拉河）、斡耳罕河（今鄂尔浑河）流域。再西是乃蛮部，居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地区和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流域。西北是篾儿乞部，居薛良格河（今色楞格河）流域，北至贝加尔湖。再西北是斡亦剌部，居华克木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上游）。更西北是吉得吉思部，居谦河（今叶尼塞河中上游）流域。在篾儿乞部以北，贝加尔湖的东西两侧，还有八剌忽诸部。

在这些部落中，偏东偏北的乞颜、泰赤乌、塔塔儿、弘吉剌、篾儿乞、斡亦剌和八剌忽是蒙古语族部落，偏西偏南的克烈、乃蛮、吉利吉思和汪古是突厥语族部落。在室韦—达怛人西迁和蒙古族形成的过程中，原来在蒙古高原上的突厥语族部落逐渐蒙古化了。同时，突厥文化也对新的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13世纪，这些部落终于形成了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

在十一十二世纪时，蒙古高原上的部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森林狩猎部落和草原游牧部落。

斡亦剌部、八剌忽诸部以及邻近的林木中兀良哈部是森林部落，他们居住在贝加尔湖畔和华木克河流域。森林部落主要从事狩猎，也进行采集和捕鱼。他们用兽皮缝制衣服，居住在用木头和桦树皮搭盖的棚子里。在割取桦树皮时，他们喝饮桦树上流出的甜汁。他们驯养野牛、野羊和白鹿，食用这些兽畜的肉和乳，还把野牛和白鹿用作驮运。冬天，大地冰封、白雪遍野，他们乘“察纳”出去行猎。“察纳”是这些森林部落创造的木制滑雪板，也叫“木马”。在旷野、在斜坡，他们驾着“察纳”飞快地追捕猎物。

其余的多数部落是草原部落，分布在从额尔古纳河到也儿的石河的广袤地带。草原部落主要从事游牧，也进行狩猎，在饥馑时甚至还以采集和捕鱼作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这些部落都放牧马、牛、羊，有的部落还放牧骆驼。他们吃这些牲畜的肉和乳，穿这些牲畜的皮和毛。在不同的季节，为

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习惯于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作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不过，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各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遵循一定的路线。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毡和皮构造的帐幕中，这种帐幕很容易搭盖和拆迁。在迁移的时候，马和牛车是普遍使用的驮载工具。“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长春真人西游记》中的这句话，简要地描述了这些草原部落的游牧生活。

两类部落的区分只是大致而言。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部落都可以明确地归为森林部落或草原部落。有的森林部落正在向草原部落过渡，而草原部落则又往往继续从事狩猎活动。就某些部落来说，很难弄清他们究竟是狩猎民还是游牧民，他们正处于过渡的中间状态，可以称为半狩猎半游牧部落。这种复杂的情况恰好使我们看到了从森林狩猎部落到草原游牧部落的历史发展过程。此外，在邻近汉族、契丹族和女真族的农业文明地区的部落中，如在汪古部中，已出现粗放的农业。

在十一十二世纪时，草原游牧部落是蒙古高原的主体。这些游牧部落大体上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中原文明、突厥—畏兀儿文明的影响正在使他们跨进文明的门槛。他们在蒙古高原上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

这些草原部落原来的社会基本组织是“斡孛黑”——父系氏族。氏族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实行族外婚、一夫多妻制，盛行氏族的特殊祭仪和血族复仇。牧地共有，各个家庭从事个体放牧。“别乞”（氏族长老）既是酋长又是祭

司，享有掌握氏族事务的一些特权。牲畜是很容易变成私有财产的，也便于进行交换。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各个家庭有可能越来越多地积累财富。渐渐地，财产关系的私有制形式占了优势。贫富分化，出现了贫者和富者。有一种比较模糊的子嗣继承的习俗：既承认长子的优先权，又给予幼子以受产权。同时，寡妇享有其已故丈夫的地位和权利，这又是先前母权制氏族的残余。

到了12世纪，这样的氏族社会结构发生了激剧的变化。氏族中的强者成了“那颜”——草原上的父权制贵族。他们常常各有称号，如“把阿秃儿”——勇士，“孛可”——力士，“蔑儿干”——善射者，“薛禅”——贤者，“必勒格”——智者，等等。他们控制了本氏族。在他们手下，有本族的“兀鲁黑”（氏族成员）和他族归附的“兀鲁黑”，有“额闷迭纳·孛斡勒”（门户奴隶），有“孛斡勒”（奴隶）。本族和他族归附的“兀鲁黑”构成“哈阑”——人丁、平民。哈阑占有的一些牲畜，但是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受那颜的直接统治，向那颜提供无偿劳动。额闷迭纳·孛斡勒和孛斡勒源自被征服的氏族部落，大多数是在战争中掳获的人口。额闷迭纳·孛斡勒是门户奴隶，被那颜占有，为那颜从事一些劳动，但主要是在家内备鞍子、开门，服侍主人。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但是有自己的家室和财产。这种门户奴隶不断地在不知不觉之间溶化到主人的家族中去。取得主人信任的门户奴隶往往成为主人的“那可儿”——伴当，在为主人效力和建立功劳以后可以掌握一定权力，甚至可以转化成新的那颜。孛斡勒是奴隶，被那颜占有，主要从事劳动，没有任何人身自

由和个人家财。但是，当时的游牧生产容纳不下众多的奴隶劳力，因此多余的奴隶不是用于生产，而是用于战争。孛斡勒大多战死沙场，但也有一些活了下来，他们之中，有的经过几代而转化成门户奴隶，有的因立功而转化成平民。

这个时候，草原上的氏族、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通过战争来掠夺人口、牲畜和财富成为经常性的社会行动。战争是那颜扩大权力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在战争中，强胜弱败。为了保存自己、击败敌人，几个氏族结成部落，几个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同时，一个“有胆量、有力气、刚勇能射”的人，只要有自己的伴当和隶属人口，就可以从原来的氏族部落分化出去，组成新的氏族部落。氏族部落不断产生新的分化和结合，逐渐使原来氏族的血缘关系被地缘关系所取代。这样，原来的血缘氏族只剩下了外壳，成为游牧比邻公社。

当时蒙古高原上的部落都有“忽邻勒塔”——部落议会。那颜们有权参加忽邻勒塔，在会议上选出首领——“罕”。这种罕，只是部落的首领，还无君主、皇帝的含义。战争和围猎是罕所领导的主要事业。那颜都想进行更多的掠夺，又害怕自己遭到侵犯，因而竭力依靠强有力的罕。而罕为了争霸则也力图赢得那颜的支持。每个罕都组织自己的那可儿队伍，庇护和赡养他们，依靠他们去从事战争。那可儿的出身，可能是平民，也可能是门户奴隶，甚至可能是奴隶。但是，谁一旦成为那可儿，他就是主人的亲兵和僚友。另一方面，当几个部落结成联盟时，这样的联盟是以罕之间“安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安答”是“结义”、“契交”的意思。弱小的罕不得不依附一个强大的罕，否则很容易覆灭；强大

的罕也必须联合更多的罕，以壮大自己的力量。所以，罕之间常常结成安答式的联盟关系。但这种部落联盟又是相当松懈的。由于利害关系的变化，今天是盟友，明天可以变为敌人，反过来也一样。

星空旋转，诸部争战

12 世纪蒙古高原各部正处于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各部之间经常争战，社会生活很不安宁。在各部落的争战中，一位被后人称为伟大的征服者的英雄人物铁木真脱颖而出。

铁木真 1162 年，生于蒙古高原上的斡难河畔，他就是后来创建大蒙古国的成吉思汗。铁木真的父亲叫也速该·把阿秃儿，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他的母亲叫诃额仑。乞颜部常常和塔塔儿部交战。当铁木真出生时，也速该刚好俘获了两个塔塔儿部人回来，其中年长的一个叫铁木真。也速该按照古代蒙古人的命名习惯，就把自己刚生的儿子称作铁木真了。

铁木真 9 岁时，也速该在路途吃了塔塔儿部人下毒的食物，死了。也速该死后，他的大多数部属渐渐离去。母亲诃额仑带着铁木真弟兄们靠采集、捕鱼和打猎为生，十分困苦。他们不断遭到邻近部落的袭击。有一次，铁木真为了躲避泰赤乌部首领的捕捉而逃进山林，后来忍受不住饥饿，下山来寻找食物，不慎被俘虏了。铁木真被带上了木枷。夜深人静时，他乘人不备，用木枷击倒看守者，机敏地逃跑了。又一次，他的妻子孛儿帖被蔑儿乞部掳获去了，并被匹配给了该

部的人。过了一阵子，他才联合其他部落打败篾儿乞部，把孛儿帖救了回来。青少年时代的铁木真艰险备尝，不止一次大难临头，但又往往奇迹般地度过了难关。重重困境锻炼了铁木真的意志和性格。他成长起来了，“眼内有火，面上有光。”他遇事机敏而慎重，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不过，他自己相信这是“长生天”对他的护佑。

当时部落混战的局势是这样的：你不战胜对方，对方便会来消灭你。铁木真在这种不断的混战中表现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1189—1196年，铁木真与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的结盟关系破裂。双方各率13部3万兵力会战于答兰版朱思之野。这是著名的十三翼之战，铁木真败北。但是，札木合在胜利后显得极为凶残，他命令用70口锅烹煮归附铁木真的赤那思地方的贵族。结果，反而有些归附札木合的部落的成员倒向铁木真。

1196年，塔塔儿部篾古真薛兀勒图叛金，金兵大举征讨。铁木真得知情况后，联合克烈部王罕，协助金军打败塔塔儿部，杀死篾古真薛兀勒图。金封王罕为王，封铁木真为“札兀惕忽里”——百夫长（或说是招讨使）。铁木真这一行动，既打击了宿敌，又联络了金朝。

1197—1200年，铁木真擒杀攻打塔塔儿部时不肯奉命出兵的主儿乞部的撒察别乞和泰出。大败宿敌篾儿乞部。联合王罕征乃蛮部不欲鲁罕，乃蛮部战败。联合王罕与泰赤乌部大战于斡难河上，取得胜利。

1201年，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塔塔儿、弘吉剌、乃

蛮、篋儿乞、亦乞剌思、火鲁剌思等 11 部共举札木合为古儿合罕。铁木真与王罕联合，把他们打败。札木合向王罕投降。弘吉剌部归附铁木真。

1202 年，铁木真再伐塔塔儿部，又获胜。战前誓师：战胜追击时，不取遗物，待事毕散发。本族有三人背约，铁木真夺没他们的全部掠获物，分给军中。

1203 年，铁木真与王罕分裂，大战于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之地，败剩 2600 骑。他与战友 19 人来到班朱尼河，什么吃的也没有了。一匹野马走来，有一个战友把它射死了。他们剥马皮当锅，击石取火，汲取河水煮了马肉充饥。铁木真举手仰天立誓说：“如果我建树大业，定与你们同甘共苦。违背这话，有如河水。”这就是著名的班朱尼河之盟。接着，铁木真率领余部，反而袭击并战败了王罕。王罕在逃亡中被乃蛮部人杀死，克烈部亡。

1204 年，铁木真进而伐乃蛮部。进军时在春天，马瘦，但将士振奋，军势很盛。乃蛮部首领太阳罕麾下的兵力也还不小，但太阳罕轻敌无谋。铁木真方面有些羸弱的马跑到乃蛮军营，太阳罕见了，以为蒙古军队的马这么瘦，应该“诱其深入，然后战而擒之”。他的一个部将说：“打仗应该勇进，不能叫敌人见到马尾人背。要是惧怕，让后妃来统军！”太阳罕一怒之下，当即与铁木真的军队对阵。铁木真大胜，擒杀太阳罕，掳获掌印官塔塔统阿。太阳罕之子屈出律向北投奔其叔不欲鲁罕。当时在乃蛮地方的札木合也向西逃亡。札木合的札答阑部以及追随他的合答斤、散只兀、朵儿边、塔塔儿等部纷纷投降。原来太阳罕与铁木真都争取过南面的汪古部，

现在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吉忽里也归顺了铁木真。

1205年，铁木真进兵西夏，大掠而还。这年，札木合逃到倪鲁山（即唐麓岭，今唐努山），被他的部下捉住献给铁木真。铁木真说，侵害主人的人是不能留用的，先把他们在札木合面前处死。然后，由于札木合曾是盟友，使他“不出血而死”。这是一种恩惠，因为根据古代蒙古萨满教的观念，一个人的灵魂是住在他的血液里的。

到了这个时候，铁木真已经把蒙古高原上主要的游牧部落都统一起来了。

在统一各部的斗争中，铁木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他雄才大略、气度恢廓；他善于团结和使用自己的伴当，善于联合盟友去击败自己面临的强敌，善于在败时保存和恢复力量、在胜时迅速发展力量，善于在各种情况下维护和提高贵族的权力和尊严。在铁木真手下，造就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拥有一批善战的将帅和指挥官。这支军队是快速的骑兵，具有严格的组织和纪律，能够吃苦耐劳，敢于冲锋陷阵。这支军队把征战和杀掠视为英雄的行为和美德。铁木真及其统帅的这样一支军队在蒙古高原上兴起了，这是13世纪初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对中国以及广大亚欧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成吉思汗与蒙古统一

蒙古国的成立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头召集诸弟、诸子、驸马、伴

当和部落首领举行忽邻勒塔。忽邻勒塔原是部落议事会，现在，铁木真把它变为一种议决国家事务的聚会。在这次忽邻勒塔上，铁木真建树了九游白旗，接受了“成吉思汗”的称号，正式成立了大蒙古国。蒙古尚九尚白，九游白旗成了大蒙古国的标记。“成吉思”的意思，说法不一，或为“坚强”，或为“大海”，或为“天”，等等。“汗（罕）”的意思，原来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现在已演变为“君主”、“皇帝”。柔然、突厥、回纥等北方民族也都曾用这个词指称最高统治者。总之，“成吉思汗”是一个最尊崇的称号。

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编组千户，委任了 95 个“敏合敦那颜”（千户长）。全部牧民都按十进位的军事体制编组，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或称牌头，十户为一牌。），每百户设一个百户长，每千户设一个千户长，由下至上，层层隶属。这样编组的千户，不仅是军事单位，而且是行政管理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单位。千户长以及百户长享有军事、行政和社会经济的各方面权力，成为大蒙古国的新兴的贵族阶级。

千户之上，成吉思汗任命博尔术为右翼万户长，管辖西面，直至按台山地方；木华黎为左翼万户长，管辖东面，直至哈刺温只都山（大兴安岭南部）地方。同时，任命纳牙阿为中军万户长，管辖著名的“怯薛”——亲卫军。

亲卫军是大汗的常备军队，也就是大蒙古国国家机器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在长期的战事磨练中，成吉思汗深知建立一支亲卫军对于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203 年时，他已经组成了一支亲卫军，但当时只有 550 个成员。现在，这支队伍扩充到了 1 万人。亲卫军成员选自

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以及白身人（自由民）的儿子，要求身体健全，具备军事技能。每个成员，千户长出身的可以带 10 个伴当，百户长出身的可以带 5 个伴当，十户长出身的可以带 3 个伴当。他们都必须自备乘马，但其他供应则从他们所属千户内征用。1 万亲卫军分为散班、箭筒士和宿卫。散班和箭筒士负责白天的护卫，分四班，三日一轮换。宿卫负责夜里的护卫。护卫的纪律十分严格，误班一次，罚打 3 条子；误班二次，罚打 7 条子；误班三次，罚打 37 条子，流放远处。成吉思汗还规定：“夜里，宿卫在宫帐的附近守门。如有人闯门，砍断他的肩，切掉他的头！”“不准在宿卫中间行走，不准探问宿卫的人数。在宿卫跟前行走的人，就逮捕他。”除了护卫，亲卫军还要服侍成吉思汗，负责汗帐内全部日常生活事务。亲卫军职责重大、地位崇高，享有特权。成吉思汗规定：“我的护卫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长之上，我的护卫的伴当高于在外的百户长、十户长之上。在外的千户长和我的护卫相互斗殴，罪罚千户长！”亲卫军成员虽然已经离开原籍，但是对本户仍旧享有继承权。无疑的，怯薛——亲卫军是成吉思汗专制统治的强大支柱，它维系和控制各个千户长、百户长，并随时准备镇压牧民的反抗。它又是整个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成吉思汗对外征战时最得力可靠的精锐的中军。

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还委任他的义弟失吉忽秃忽为“古儿·札鲁花赤”——总断事官，负责科断“盗贼诈伪的事”和“分家财的事”。“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作为不许更改的成例。从 1202 年起，铁木真已开始制订札撒。随着

大蒙古国的建立，札撒逐渐从成吉思汗的命令发展成为不可逾越的法规。据说，成吉思汗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且对每种罪行制定一条刑罚。编订成册的大札撒现已不传，但它的概要和片断还保存在一些著作之中。从这些概要和片断可以看出，大札撒是一部规模相当大的法典，大约包括国际法、公法、刑法、私法、商法、立法和司法等多方面的内容。它的主要原则是维护汗、汗室和蒙古贵族阶级的权益。例如：札撒承认私有财产的子嗣继承权；确认父权和夫权；禁止人户转移，也不准有人收容和庇护；禁止奴隶逃亡，逃奴必须还回原主；禁止逃避服役；禁止临阵退缩；禁止盗窃、奸淫、妄语和背叛。凡是违反上述札撒的，一律处死。但是，汗的宗室违反札撒，仅处以监禁或流放。除了札撒，成吉思汗还有许多箴言，那也是大蒙古国的臣民们必须遵循的。这些箴言同样表达了蒙古贵族的意志和愿望。

当时，蒙古—突厥部落原有的萨满教还有很大的精神力量。成吉思汗本人就始终信仰萨满教宣扬的“长生天”——永恒的天神。在这次大会上，成吉思汗又任命兀孙老人为“别乞”，让他掌管萨满教事务。他规定：担任别乞的人，穿白袍，骑白马，坐在众人上面，选择吉日良辰，发表议论，受人敬重。

千户制、亲卫军、总断事官以及别乞，这些就是大蒙古国建立初期的国家机器。这套国家机器是成吉思汗参照蒙古社会的传统习俗，根据建国时的实际情况创制出来的。在这里，成吉思汗表现了杰出的政治才能。同时，这套国家机器

的创制也反映了历史的巨大变革。大蒙古国的建立，标志蒙古高原诸部落从野蛮进入了文明。从原始社会进入了早期游牧封建社会。大蒙古国的建立，也标志蒙古民族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蒙古为名称的、强大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了。

臣服“林木中百姓”

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后，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地区还居住着许多依靠狩猎为生的蒙古部落和属于突厥语系的乞儿吉思人。这些蒙古部落由于生活在无边无际的森林中，被称为“林木中百姓”。成吉思汗对“林木中百姓”的征服，是蒙古各部统一的继续。

“林木中百姓”主要生活在今叶尼塞河以东、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他们人数较少，经济和文化水平比蒙古高原上的草原部落落后。他们住在白桦树皮覆盖的棚屋里，从事猎兽和捕鱼，以兽皮为衣、桦树汁为饮料。“林木中百姓”的主要部落有：贝加尔湖周围的不里牙惕部（即后来的布里亚特），叶尼塞上游的斡亦剌部（即后来的瓦剌），靠近乞儿吉思部的秃马惕部、巴儿忽惕部等。

成吉思汗等奴隶主对西伯利亚出产的珍贵毛皮是十分羡慕的，因此决定于1207年派他的长子术赤出兵征服林木中百姓。不里牙惕、秃马惕、斡亦剌等部纷纷投降。接着术赤又进兵乞儿吉思部。乞儿吉思部是突厥语族人，就是唐朝时黠戛斯人的后代。公元840年，黠戛斯曾击败回鹘，统治大漠南北，后来臣服于唐朝，部分黠戛斯人退居叶尼塞河上游。蒙

古军队来后，乞儿吉思的首领表示臣服，将白海青（鹰）、白骟马、黑貂鼠等名贵动物献给术赤。这样，西伯利亚地区的各部落都接受了蒙古国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对各部的统治是很残酷的。成吉思汗为了自己的享受，派豁儿赤到秃马惕部去挑选 30 名美女，引起秃马惕人的极大愤慨，他们把豁儿赤抓了起来；成吉思汗只好派忽都合别乞去镇压，结果又被抓了起来。成吉思汗不得不派他的心腹“四杰”之一的博尔忽领兵前往，不料博尔忽进入秃马惕境内后，被秃马惕人截断去路，抓住杀了。连续损兵折将，使成吉思汗大为恼火，他决定亲征，诸将竭力劝阻，改派朵儿伯领兵马出征，这样才把秃马惕人的反抗镇压下去，并把秃马惕人分给有功人员为奴隶。

三、蒙古的征服

统一畏兀儿和西辽

成吉思汗为了使自己的统治范围进一步扩大，让他的弟兄、儿子们“各分土地，共享富贵”，决定继续向外进行军事行动，降服蒙古境外的相邻政权。这些向外扩张的战争，具有很大的掠夺性和破坏性，暴露了蒙古奴隶主阶级的贪婪本质。

13 世纪初蒙古周围的形势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它的西部有畏兀儿和西辽，在它的南部有西夏和金朝。成吉思汗在征服畏兀儿和西辽的同时，对西夏和金朝进行了骚扰和掠夺。

畏兀儿是突厥语系中文化比较发达的一个古老民族。唐朝时称回纥、回鹘，曾在蒙古高原建立过回鹘汗国，后被黠戛斯击败，开始西迁。其中有一支迁到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到公元10世纪末期时，地域已扩大到西抵葱岭，东达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2州，北界天山，南越戈壁，并建立了高昌回鹘政权。其都城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或称“哈拉和卓”；其首领称“亦都护”。公元12世纪初西辽建立后，畏兀儿臣属于西辽，西辽于畏兀儿境内设立了一个专门监管畏兀儿事务的官员一少监，他像太上皇一样，为所欲为、骄恣用权，激起了广大畏兀儿人民的极端不满。所以，自从畏兀儿沦为西辽的藩属后，境内的社会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不仅广大畏兀儿人民和西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就是畏兀儿统治者与西辽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

西辽是契丹贵族耶律大石建立的。公元1124年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在女真军队的打击下，正处于灭亡的前夕。这时辽宗室耶律大石自立为王，率其部众西迁，在我国今天的新疆西部及中亚一带建立了政权，历史上称为西辽，也称“黑契丹”、“哈刺契丹”。其都城在虎思斡耳朵（在前苏联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建立后不久便控制了畏兀儿，战败了中亚大国花剌子模，势力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西的两河流域，成为中亚地区势力强大的政权。

成吉思汗称汗后，虽然统一了蒙古各部，但是篾儿乞部的首领脱黑脱阿和他的两个儿子——忽秃、赤老温，乃蛮部塔阳汗的儿子古出鲁克，依然盘踞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

斯河)。1208年,成吉思汗命速不台和者别分别追袭脱黑脱阿和古出鲁克。结果,脱黑脱阿战死,其子率残部逃奔畏兀儿,当时畏兀儿的亦都护叫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没有收容他们,并把他们打败后驱逐走了,又派人向成吉思汗通好。1209年,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不满西辽少监的横征暴敛,杀了西辽少监,并于1210年遣使投顺成吉思汗。这样,蒙古国的统治扩大到畏兀儿。

古出鲁克被畏兀儿打败后逃奔到西辽。当时西辽的大汗叫直鲁古,他是一个昏庸无能、不理政事的统治者。古出鲁克奔西辽后,直鲁古对他毫无警惕,反而将女儿嫁给他,并供应他费用去招集乃蛮和篾儿乞残部,使古出鲁克势力渐渐增强起来。古出鲁克为了达到篡夺西辽政权的目的,先是挑起花剌子模与西辽互斗,继而于1211年抓获直鲁古,夺取西辽大汗位。古出鲁克统治下的西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十分尖锐,政权是极不稳固的。1218年,成吉思汗命者别率2万人进军西辽,讨伐古出鲁克。者别利用西辽境内的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宣布信教自由,并保证对居民不干涉,立即赢得了广大回教徒的支持,他们纷纷起来杀掉住在老百姓家里的古出鲁克的兵士,使蒙古军队很快就占领了西辽都城,古出鲁克仓惶出逃,者别追至撒里黑·昆地面(今新疆喀什附近),擒杀了古出鲁克,西辽终于被蒙古军队征服。西辽的灭亡为蒙古军队的西征扫除了障碍。

征夏与伐金

新建的大蒙古国南面邻接两个国家:东为女真族建立的

金，西为党项族建立的夏，两个都是多民族国家。金朝建于1115年，1125年灭辽，1126年灭北宋，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后称中都。金世宗统治时期（公元1161—1189年）是金的全盛期，当时它领有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七省之地以及内蒙、陕西、甘肃的一部分，南与南宋隔淮相望，西邻西夏，北抵外兴安岭，东至于海，人口逾5000万，是个文化、经济相当发展的大国。夏国建于公元1038年，本名大夏，宋人称它为西夏，又称唐古、唐兀、河西。其地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内蒙的部分地区。到13世纪初，西夏已立国160余年，先后与宋、辽、金等国并存，与它们时战时和。西夏国家虽小，人口最多时不过300万，但能利用宋辽或宋金的矛盾以自保，经济、文化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就是金、夏两国的基本情况，成吉思汗在决定大规模南侵以前，必定对它们作了了解和比较。论关系，金与蒙古有旧仇，在历史上金一直利用塔塔儿部牵制和削弱蒙古高原各部，也直接派兵攻打过它们。成吉思汗的曾祖父杀过金的使臣，金朝杀过俺巴孩汗，成吉思汗的叔祖忽图剌汗曾率军攻金。成吉思汗本人虽在1196年接受了金的封号，其后每年还向金进贡，但祖先的仇恨并未忘记，他也不能长久忍受称臣进贡的地位。可是金是大国，不能轻易侵犯，与金相比，西夏要小得多，故而西夏成了首先掠取的目标。1207年秋，成吉思汗借口西夏不肯纳贡称臣，再次出兵征夏。

公元1205年那次抄略，曾使夏国感到震惊。夏桓宗在蒙军撤出后下令修复遭受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

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兴府。有的史书记载，这年冬天西夏还主动派兵往击蒙军，行数日，不遇而还。次年，西夏王室内讧，桓宗弟李安全废桓宗自立，是为襄宗。蒙军再侵西夏，破斡罗孩城，四出劫掠，襄宗集右厢诸路兵抵御。蒙军见西夏兵势尚盛，不敢冒进，于第二年春季退还。

公元 1209 年春，蒙古军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第三次南征西夏。四月，陷兀刺海城。七月，蒙军进逼中兴府外围克夷门，襄宗增派嵬名令公率兵 5 万抵御。相持两月，夏军防备渐松，蒙军设伏擒嵬名令公，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引河水灌城。襄宗自即位以来一直与金交好，纳贡称臣、受金册封；此刻中兴府危急，一面坚守，一面遣使向金乞援。金朝群臣普遍主张出兵援夏，以为西夏若亡蒙古必来攻金。然而即位不久的卫绍王却说：“敌人相攻，吾国之福，何患焉？”拒不出兵。十二月，眼看中兴府城墙行将倒塌，外堤突然决口，河水四溢，淹及蒙古军营，蒙军只好撤围。成吉思汗遣讹答为使入城谈判，迫襄宗纳女称臣。西夏既服，成吉思汗便集中力量准备攻金。

公元 1211 年春，成吉思汗以替祖先复仇为名，誓师伐金。从这年到 1215 年，他连续五年亲自率兵南下，取得一系列胜利。

第一年，蒙军兵分两路，越过金的边防。一路由成吉思汗本人统领，者别为先锋，攻破金西北路边墙乌沙堡，进陷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抚州（今河北张北），继续南下。金以 30 万（一说 40 万）大军守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膳房堡北），凭险抵御，被成吉思汗

一举击溃，金军精锐丧失殆尽、遗尸蔽野。九月，蒙军前锋突入居庸关，攻中都，金人坚守，不克而还。另一路蒙军由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领，以汪古部首领阿剌忽思惕吉忽里为向导，入金西南路，攻取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今山西朔县）等州，大肆抄掠后离去。《金史》记载，这一年“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过平、滦，南至清、沧，由临潢过辽河，西南至忻、代”，一时均陷于蒙军。

第二年，蒙军继续骚扰上年侵掠过的许多地区。成吉思汗攻取山后一些州府，进围西京（今山西大同），因中流矢而撤退。者别攻入东京（今辽宁辽阳），大掠而还。

第三年秋，成吉思汗领大军再越野狐岭，重陷宣德、德兴诸城，在怀来重创金军，追至居庸关北口。金兵坚守居庸关，成吉思汗留部分军队继续攻打，自率主力由紫荆口（今河北易县西）入关，败金兵于五回岭，拔涿（今河北涿州市）、易2州。不久，者别攻取居庸关，进逼中都。蒙军兵分三路：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山而南，掠河东南、北诸州府；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等为左军，东取蓟（今天津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辽西诸州；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为中军，取河北东路、大名及山东路、西路诸地。木华黎领一军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其城。《元史·太祖纪》称：“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

公元1214年（金宣宗贞祐二年）春，成吉思汗会诸路军将于中都北郊，以退兵为由，派使臣向金朝索取贡献。金宣宗遣使求和，进献卫绍王女岐国公主（成吉思汗纳为第四妻）及童男女、金帛、马匹，并派丞相完颜福兴送成吉思汗出居庸关。五月，宣宗见河北、山东州府多已残毁，恐蒙军再来，即以完颜福兴和参政抹撚尽忠辅助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率宗室迁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史称“贞祐南迁”。六月，驻于中都南面的金军将领斡答等哗变，杀其主帅，投降蒙古。成吉思汗得知上述情况，派大将三摸合和金降将、契丹人石抹明安率兵与斡答等共围中都。金太子守忠立即逃往南京。十月，木华黎征辽东，收降高州卢琮、锦州张锦等。

1215年春，蒙军陆续收降中都附近州县金朝将官，击败前来救援中都的金军。五月，完颜福兴眼看中都解围无望，服毒自杀，抹撚尽忠弃城出逃。蒙军遂入中都。成吉思汗当时在桓州凉泾避暑，闻报后命石抹明安镇守中都，遣失吉忽秃忽等登录中都帑藏，悉载以去。

金由公元1115年建国，至1215年中都失陷，正好100年。它以一个中原大国，竟在5年时间里被建国未久的成吉思汗打得落花流水，必有它自身虚弱的原因。历史学家们举出过许多原因，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猛安谋克丧失战斗力、经济衰敝，等等。这些原因都存在，但仍难解释的是，就在成吉思汗攻金前四五年，金朝还从容打败了南宋韩侂胄的北伐军队，在中都失陷以后又能同蒙古周旋近20年，何以在蒙军来侵初期了无招架之功。这个问题尚待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对蒙古将士来说，伐金的5年就是恣意掠夺的5年。他们攻城略地，但没有久驻的念头，至少在前4年里成吉思汗还没有打算把蒙古兀鲁思扩展到中原地区。蒙古军每得一地，都大肆烧杀掳掠。然后把他们掠得的财物、牲畜、人口席卷而走，最终弄到塞北。当时金、夏的统治者已深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他们的军队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战争，都还需要找一些理由，把自己扮成王者之师、仁义之师。成吉思汗的军队根本不管也不懂这些，他们只是赤裸裸地一味抢劫，并且从大汗到士兵各有一份。史籍记载：“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及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皇帝献。余物皆敷表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亦有其数焉”。这样的军队最残暴，造成的破坏最大。“自贞祐元年（公元1213年）冬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90余郡，所至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者几尽，所有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其焚毁室庐，而城郭亦丘墟矣”汉族理学家刘因记述了保州（今河北保定）被屠的情形：“贞祐元年十二月十七日（1214年1月29日）保州陷，尽驱居民出。……是夕下令：老者杀。卒闻命，以杀为嬉。……后二日，令再下，无老幼尽杀”。只有工匠可以免死，因为他们对蒙古军队有用。严格地说，这一时期蒙古军队从事的只是抄掠，还不足称做征服。征服者总要设法守住已征服的地区，而抄掠者总是一走了之，宁可日后再来攻打。只是由于降附蒙古的契丹、女真、西夏和汉族的人增多了，成吉思汗及其将领通过他们才逐渐懂得征服要比单纯的抄掠更加有利。大约是在攻陷中都以后，成吉思汗开始想到把大蒙古国扩展到中原地区。

这年七月，成吉思汗派使臣到开封，晓谕金宣宗献出河北、山东全部地方，放弃帝号，改称河南王。宣宗不从，战争继续下去。据统计，迄至秋末蒙军已攻破城邑 862 处，但许多州县无人留守，随后有的被金收复，有的被趁乱而起的地方豪强或原金朝将官占据。

公元 1215 年冬，成吉思汗留木华黎攻伐辽东、西诸地，自己率蒙军主力返回塞北。1216 年，成吉思汗驻于克鲁伦河行宫，《史集》说“他幸福如愿地驻扎在自己的斡耳朵里”。他一边休整，一边注意着远方的战事。这年秋天，三摸合率兵经西夏趋关中，越潼关，进拔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度逼近开封。

公元 1217 年 8 月，经过两年的考虑，成吉思汗终于下决心要变金地为大蒙古国的一部分。他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对木华黎说：“太行之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赐给誓券、黄金印，要木华黎“子孙传国，世世不绝”。这就是叫木华黎安心专一经略中原，不要再有北归故土的念头。他命木华黎统领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兀鲁、忙兀、札剌亦儿等部军和投降过来的契丹、女真、汉诸军，又把自己树建的九尾大旗赐给木华黎。成吉思汗告谕诸将说：“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

木华黎少年时代就是成吉思汗的那可儿，勇敢善战，受命后全力以赴。金朝自从南迁，重心移到河南，凭借黄河天险，集中诸路军户来加强防御。木华黎避开中坚，先扫外围，前后分别在东、北、西三方面用兵。公元 1217 年，蒙军自燕南攻拔遂城、蠡州、大名（以上在今河北），东取益都、淄、

莱、登、潍、密诸州（以上在今山东）。1218年西入河东，攻克太原、忻、代、泽、潞、汾、霍、平阳等州府（以上在今山西）。1219年，克岢岚、石、隰、绛诸州（以上在今山西）。1220年，收降真定（今河北正定）、潞阳（今河北邯郸南），略卫、怀、孟3州（在今河南），东取济南。1221年夏，克东平（今属山东）。同年8月，木华黎驻兵青冢（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俗称昭君墓），由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经西夏南下，取葭州（今陕西佳县）、绥德，进围延安，克洛川、鄜州（今陕西富县）。1222年冬，取河中府（今陕西永济），渡河拔同州（今陕西大荔）、蒲城。趋长安（今西安），不下；西攻凤翔，又不下。1223年3月，木华黎渡河至闻喜，病卒，年54。临终以未能灭金为憾。

木华黎经略中原六年，正值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留给他的兵力有限，故而与金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河北、山东地主武装颇多，他们依附于蒙、金之间，互争雄长，常有反复，蒙、金都要争取他们，使战事呈现多元状态。木华黎留意招集契丹、女真、汉族地主武装头目，给他们各种职务，并能听取他们的意见，改变了蒙古军队早先一些做法。例如，史籍记载，公元1220年木华黎以史天倪为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史天倪对木华黎说：“今中原已粗定，而所过犹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木华黎称善，“下令敢有擅剽掠者以军法从事，所得老幼咸遣归之，军中肃然”（《元史》卷147《史天倪传》）。这段记载无疑是把事情过于美化了；史天倪究竟是怎样讲的，木华黎能否懂得“王者吊民伐罪”，都是问题。但是，在木华黎时期，

蒙军一味杀掠的做法的确有所收敛，并且引起了金朝的注意。1222年（金宣宗元光元年）6月，金晋阳公郭文振向宣宗上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不嗜戕杀”、“恣民耕稼”和“盛暑不回”，反映出此时中原蒙军已不再是单纯的抄掠者，它已按照成吉思汗的意图转化为征服者。这一转化对金朝造成更大的威胁，郭文振所谓“殆不可测”，就是这个意思。

木华黎死后，其子孛鲁继为国王。孛鲁按木华黎的方略经营河北、山东，重点依靠降蒙的原汉族地主武装。公元1226年，宋将、原红袄军领袖李全攻克益都，俘蒙古军元帅、汉人张林，控制了山东东路大部分地区。秋九月，木华黎弟带孙与严实率兵围益都。冬十二月，孛鲁领兵入齐，派人招降李全。次年四月，益都城中粮尽，李全出降。蒙古一些将领主张杀掉李全，孛鲁则表示应留李全以劝山东未降者，便以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继而攻克滕州，尽有山东全境。与之同时，成吉思汗率领征西夏大军进入金地，攻破临洮、信都、德顺等府州。金朝眼看两面受敌，形势危急，恰遇成吉思汗病逝，孛鲁北上奔丧，次年病死于漠北，给了金朝喘息的机会。

东侵高丽

成吉思汗向外扩张时，高丽由王氏所统治。1216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因不满蒙古的统治，率9万人进入高丽。1217年金山等攻占江东城作为据点，金山自称辽东王。不久，

统古杀金山，喊舍又杀统古。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讨伐契丹人，遣哈只吉、札刺等侵入高丽，与高丽军合作攻破江东城，喊舍自杀。高丽王王黻称臣，并纳贡方物。1224年，由于蒙古使臣被高丽人杀，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231年，窝阔台命撒礼塔率军进攻高丽，华裔高丽人洪福源投降，并协同蒙古军攻克许多州郡。王黻被迫投降。撒礼塔在高丽安插京、府、县达鲁花赤72人实行监督。

1232年，高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蒙斗争。王黻杀蒙古达鲁花赤，倾朝徙居江华岛抗敌。蒙古再派撒礼塔前往镇压，为高丽军击毙，高丽军收复西京（今平壤）等地。从1233—1241年，蒙古虽多次派军联合洪福源入侵高丽，王黻却始终没有投降。

1241年，王黻派族子王倬入质。贵由、蒙哥统治时期，又以“岁贡不入”为由，四次派兵入侵，对高丽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迫使王黻又派子王倬入朝。直到忽必烈上台后，两国关系方有好转。当时王黻已死，子王倬继位，蒙古以高丽“永为东藩”，令其每岁入贡。两国使臣和商旅往来频繁，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很密切。

元朝建立后，利用高丽作侵略日本的基地，对高丽人民的剥削加重，高丽人民曾多次举行反元的武装斗争。

窝阔台侵宋

窝阔台汗六年（1234年）年初，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与南宋仅隔一条淮水。蒙古违约，不肯将河南地归还南宋。南宋不敢坚持原议，反而让蒙古占领了陈州（今河南淮阳）、

蔡州（今河南汝南）西北的大片土地。南宋也想乘金国灭亡，河南处于空虚的状态之机，收复洛阳、汴京（今河南开封）、归德（今河南商丘）等地。蒙古和南宋的冲突势所难免。

同年六月，宋朝在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兵汴京。庐州知州全子才奉命率军万人进至汴，汴京人立即举事响应。汴京军民杀死蒙古所立的长官崔立等人，迎接南宋军队。宋将赵葵率兵5万进入汴京。七月，宋将张迪率兵进攻洛阳，也受到洛阳民众的欢迎。但是，由于河南经历连年战乱，到处是断壁残垣，田野荒芜，粮饷极度缺乏，宋军士气大受影响。蒙古军在都元帅塔察儿的率领下进攻洛阳。洛阳城中缺粮，宋军只得退出。在汴京的赵葵也因无粮饷，再加上蒙古军掘黄河堤放水，不得不退出汴京。昏庸的宋朝君臣又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于和议。但是，由于南宋曾经接受过将陈、蔡西北之地归属蒙古的要求。窝阔台便以此为理由把这次出兵归罪于南宋先启边衅，召集诸王贵族大会，决定进攻南宋。

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兵分两路进攻南宋。东路由皇子阔出率诸王口温不花、国王塔思、汉将张柔、史天泽等统兵攻宋荆襄和长江中下游；西路由皇子阔端率元海塔海，汉将刘黑马等率兵攻取四川。南宋的防御重点是以襄阳为中心的镇北军。该军全部由招募的中原豪杰组成，骁勇善战。七月，东路口温不花部攻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十月，塔思部攻陷枣阳后南下攻郢州（今湖北钟祥）。宋军坚守，塔思未能破城，掳掠大批人口和牛马数万头而还。同月，西路阔端军进入巩昌（今甘肃陇西）。原金国守将汪世显投降。阔端大喜，

命其率兵攻宋，同时要求他约束部队，不要扰民。年底，蒙古军将宋将赵彦呐所率部包围在青野原。宋将曹友闻知后说：“青野原是入蜀的咽喉要地，决不能丢失。”便率兵星夜前往援救，击退了敌军。解青野原之围后不久，曹友闻率兵援救大安（今陕西宁强北），击退汪世显部，并扼守仙人关，挡住了蒙古军的攻势。

但是，这时镇守襄阳的宋将赵范由于用人不当，军纪废弛，内部矛盾尖锐。窝阔台汗八年（1236年）三月，王旻、李伯渊等发动兵变，焚毁襄阳城廓，投降了蒙古。荆襄重镇的失守，使东路蒙古军得以长驱直入，攻克了郢州、随州、荆门等地。阔端的西路军由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南下取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九月，由于四川宋军主将赵彦呐拒绝了曹友闻凭险据守，伺机伏击敌军的建议，下令曹部守大安以保蜀中门户，结果，曹友闻的军队在大安阳平关全军覆没。阔端长驱入川。一个月之内，攻占了成都、利川（今四川广元）、潼川（今四川三台）等20余地，宋军只剩下川东的夔州一路和潼川路的顺庆府。蒙古军队在大肆抄掠之后，退回陕西。阔端又派按竿迓攻占金遗臣郭斌据守的会川（今甘肃兰州西北）和南宋的文州（今甘肃文县）。与此同时，东路蒙古军口温不花等部进攻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安庆）、光（今河南潢川）3州守将望风而逃。蒙古军直逼黄州（今湖北黄冈）。同时，派轻骑自信阳奔袭合肥。蒙古军另一部进攻江陵（今湖北荆州）。宋将孟珙命部下多次改换服色、旗帜，以迷惑敌军，使敌军不敢轻动，接着连破蒙古军24寨，救回被俘的2万多百姓。攻真州（今江苏仪征）的蒙古察罕

部也被宋将邱岳击退。

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十月，东路蒙古军口温不花、史天泽部再度南下攻占光州，在复州（今湖北天门）打败南宋水军，并迫使复州宋军投降。接着又转攻秦春（今安徽寿县）、黄州。宋将孟珙率兵援黄州，击退蒙军。同月，西路蒙古军攻克夔州（今四川奉节）。

窝阔台汗十年（1238年）年初，东路塔思蒙古军队抄掠安庆府（今安徽潜山）后北返。九月，察罕、张柔率80万大军围攻庐州（今安徽合肥），宋将杜杲死守，迫使察罕退兵，然后派水军扼守淮河，派其子杜庶率勇将占文德、聂斌等精兵强将埋伏在要害之地。蒙古军无法前进，只好北撤。两淮得以稳定。宋将孟珙收复了荆襄等地。

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年），蒙古军接连三次败于孟珙手下。南宋收复了襄阳，樊城、光化、信阳等地。同年八月，蒙将塔海等率兵80万入蜀，攻占重庆、万州、夔州等地。但出川时，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大垭寨遭到宋将孟珙的阻击，未能顺流而下进入湖湘。孟珙乘胜收复夔州。次年二月，蒙古按竺部再攻万州，在夔门击败宋军。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年）十月，东路蒙古军再围安丰。十一月，达海绀、汪卜显等部进攻成都、汉都（今四川广汉）、遂宁（今四川遂宁）、叙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资州（今四川资中）等地。同月，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称制，继续进攻南宋。

自从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蒙古大举进攻南宋以来，荆襄、两淮、四川的许多地区遭到蹂躏。蒙军虽从这些地区掠

夺了大量财物，但在各地遭到宋军民的抗击，损失也不少，蒙古贵族一面进攻，一面也派使者来宋议和。南宋也于嘉熙二年（1238年）和嘉熙四年（1240年）两次派人到蒙古议和，均未达成和议。

在此期间，双方无大战，而各有胜负。宋朝于淳祐二年（1242年）曾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置制使，收复了被蒙古占领的一些州县，改革弊政，安抚遗民，招聘贤才，并想出兵收复汉中地区，但没有成果。而蒙古由于贵族宗室内部矛盾的尖锐化，直到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蒙哥即汗位之前，也未能对南宋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

拔都西征

窝阔台关于再次大规模西征的决定，是与伐宋的决定同在公元1235年作出的。事实上，他在即位之初就已经开始向西方派兵了，那是由札兰丁图谋重建花剌子模帝国引起的。1224年成吉思汗东归后，札兰丁从印度回到伊朗，很快夺得起儿漫（在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伊斯法罕等地，被花剌子模旧将和各地诸侯拥戴为王。其后四五年内，札兰丁进取阿塞拜疆全境，占桃里寺，侵谷儿只，攻巴格达，恢复了许多原先被蒙古军攻占的地方。因此，窝阔台一即位就派箭筒士绰儿马罕领军3万征讨札兰丁。绰儿马罕从呼罗珊进攻阿塞拜疆，札兰丁本人不战而逃，于1231年8月死于土耳其东部的山中。此后绰儿马罕就留在那里，他的军队在1233年抵桃里寺，在1236年入大阿美尼亚。1241年绰儿马罕病死，其妻代领其众，次年由拜住接替。

公元1235年窝阔台决定大举西征时，由于绰儿马罕已经在中亚站稳脚跟，主要目标便集中在钦察草原和罗斯地区，那里有许多地方是10多年前者别、速不台风驰电掣般地抄掠过的。据说，窝阔台本想亲征钦察草原，其时蒙哥在旁，表示有事可由子弟服其劳，使他放弃了亲征的想法。他根据察合台的意见，命令各支宗室的长子参加西征，各万户、千户、百户那颜以及公主、驸马的长子都要从征。窝阔台说：“这派遣长子出征的意见是察合台兄提出的。察合台兄曾说：增援速不台可令诸皇子的兄长出征。如果以长子出征，则兵多将广。兵多了就表现威力强大。那里的敌人多，敌国广；那里的国家百姓也厉害，据说愤怒的时候能用刀砍死自己，而武器也很锐利。依照察合台兄这样谨慎的话，所以派遣长子出征”。因为有窝阔台这番话，有的历史书就称这次西征为“长子出征”。但是，参加西征的不限于长子，《史集》列出了参加者的名字，他们是：术赤子拔都、斡儿答、别儿哥、昔班，察合台子拜答儿、孙不里，窝阔台子贵由、合丹，拖雷子蒙哥、拔绰，等等。窝阔台明确指示：“这些远征的皇子和大臣们以拔都为首领导”，因而习惯上称这次西征为拔都西征。这一年贵由、拔都、蒙哥都是二十六七岁的人，虽然过去20多年从别国掠得的财富已足以供他们尽情享受，察合台、窝阔台仍要他们领兵远征，他们本人也不辞疲劳，足见那时蒙古统治者的尚武精神如何强烈。窝阔台同他父亲一样，肯把几个儿子（贵由、阔端、阔出和合丹）同时投入战场，这是南宋皇帝绝对做不到的。就这一条，也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西征军的灵魂是速不台，他早有西征经验，而且在灭金战争中

又一次显示过他的统军才干，足以辅导诸王。

公元 1236 年春，速不台与大部分参征诸王动身西行，所率军队大约有 10 余万人。他们在秋天到达不里阿儿人境内，与先已抵达的拔都兄弟会合。蒙古军很快攻克不里阿儿城，这是座大木城，1223 年速不台与者别曾攻打该城，没有取胜。此次攻克后，大肆掳掠，将城焚毁。入冬以后，蒙古军沿伏尔加河而下，居住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玉里伯里山的钦察部首领之子班都察率众归附。另一钦察部首领八赤蛮不肯降，被蒙古军击败后逃至里海一岛上藏身。蒙哥听说后迅速前往，涉水登岛，擒杀八赤蛮，屠其部众。然后蒙哥又攻打附近的阿速人。

公元 1237 年秋，拔都召开了一次忽里台，决定诸王共同征伐罗斯（13 世纪的罗斯不等于今天的俄罗斯，它包括第聂伯河中游地区，今天乌克兰首府基辅亦在其中）。蒙古军首先征服位于伏尔加河丘陵地西北部的莫尔多瓦，进抵梁赞国。他们先向梁赞大公尤里·伊戈列维奇（玉里吉）提出要全体居民缴纳什一税，遭到拒绝。尤里·伊戈列维奇一面派人向邻近其他大公求援，一面派儿子费多尔率领使团带着礼物去见拔都，但是他的努力都失败了。1237 年 12 月 16 日，蒙古军包围梁赞城。经过六天激战，至第七天城陷。大公被杀，居民有的被杀死，有的被烧死。“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接着，蒙古军队经科洛姆纳和莫斯科绕向弗拉基米尔公国，在科洛姆纳击溃弗拉基米尔大公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军队。当时莫斯科城尚小，居民没有抵抗，仍被屠掠，守城大公也被俘虏。1238 年 2 月 3 日，蒙古军抵达弗拉

基米尔城下，四天后攻陷该城，纵兵大掠，继之以火。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正外出召集军队，整个弗拉基米尔公国很快落到蒙古军手中。3月4日，拔都军队在西齐河上击溃罗斯军队，尤里·弗谢沃洛多维奇战死。次日，蒙古军别部攻占托尔若克。在此期间蒙古军分兵四出，攻陷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戈罗杰茨、尤里也夫、德米特里也夫、沃洛克诸城。

3月中旬，蒙古军向诺夫哥罗德方面前进，但不久因气候转暖、湖泊解冻、道路泥泞，被迫后退。拔都在回路上转向东南，顺路攻打科集尔斯克城。这是个小城，但其军民英勇抵抗，苦战七周后方才陷落。居民被屠杀。由科集尔斯克再向南便进入钦察草原西部。钦察汗忽滩被击溃，带着残部逃往马札儿（匈牙利）境内。拔都军在钦察草原休整一段时间，又返回罗斯，朝第聂伯河推进，灭彼列亚斯拉夫尔公国。这年冬季，蒙哥、贵由统兵征讨库班河的阿速人，攻阿速都城蔑怯思，三月方克。阿速一部首领杭忽思率众降，蒙哥命其子阿塔赤及阿速军千人从征。

公元1240年夏间，蒙哥率兵来到基辅，据说他对这座城市的美丽与宏伟感到惊奇，不想毁掉他，派使者入城劝降。基辅人杀死使者，基辅大公米哈伊尔逃往匈牙利。虽然形势危急，罗斯王公们仍不断内讧。斯摩棱斯克的一位王公被请到基辅执政，却被伽里赤公丹尼尔抓走，后者让德米特尔千户镇守基辅。不久，拔都亲率大军围攻基辅。蒙古军用攻城机击破城墙，冲入城内，在教堂附近与居民战斗。德米特尔受伤，城陷后他因表现勇敢被拔都赦免。拔都、速不台、蒙哥、贵由、斡儿答，拜答儿、不里、合丹都参加了攻城战役。此

后，贵由、蒙哥便被窝阔台召回蒙古。

公元1241年春，蒙古军继续西进。他们分成两支，一支由拜答儿与速不台子兀良合台等率领侵入波兰（亨烈儿），另一支由拔都和速不台率领侵入匈牙利。当时波兰处于分裂状态，国王无力组织抵抗。拜答儿军于2月渡过维斯瓦河，蹂躏桑多梅日和波兰首都克拉科夫。继而进入西里西亚，渡奥得河，攻西里西亚都城弗洛茨拉夫。西里西亚大公亨利在利格尼茨城集结波兰军、日耳曼兵和条顿骑士团共3万人，准备迎敌。蒙古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均占优势。4月9日，两军交战于利格尼茨附近的尼斯河平原，波兰条顿军大败，亨利被杀。传说蒙古士兵在战场计算杀敌数目，从每个尸体上割下一耳，总计装了九大袋。当月蒙军进入摩拉维亚，一路焚杀，直到今天的德、捷、波三国交界处。拜答儿又领兵围攻摩拉维亚境内的奥洛穆茨城，城中军民坚守，不克。6月24日夜，城中军民突袭蒙古军营，蒙军不备，损伤较大，拜答儿战歿。蒙军杀战俘祭拜答儿，三日后撤围南下，入匈牙利，与拔都大军会合。

拔都军在3月进入匈牙利，兵锋直指匈都城佩斯。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在位已五年，与诸侯、贵族不和。1239年贝拉四世接纳被蒙古击败的钦察汗忽滩数万人入境，他们所过搔扰，激起原有居民怨恨。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削弱了匈牙利的战斗力量。3月12日，当边防将领归报蒙军已入境时，贝拉正在布达城召集诸侯、贵族开会。他立即让与会者各还本地征集军队，自己纠集军队屯驻布达对岸的佩斯城（两城今合称布达佩斯）。蒙军不日至佩斯城下，连续挑战，贝拉坚

守不出。这时居民见蒙古军中有不少钦察人，怀疑忽滩与蒙古军同谋，招之来匈牙利，便杀忽滩及其左右人员。各地农民闻讯，纷纷杀钦察人，钦察人也杀匈牙利人为忽滩复仇，国中大乱。贝拉原来指望钦察人组成军队与蒙军作战，至此希望全部落空。4月，各地援军稍至，贝拉率兵出战，蒙军后退至撒岳河东。贝拉营于河西，附近有桥，以为蒙军只能过桥来袭，派千人守桥。4月10日夜間，速不台在下游结筏偷渡，绕至贝拉军营后方，拔都率诸王先从上流涉浅滩过河，置七炮攻桥，黎明，匈军发现被围，士兵丧失斗志，竞相夺路而走。蒙古兵在后追逐，杀敌无数，在速不台率领下乘胜攻拔佩斯城，尽杀居民，纵火而去。据《元史·速不台传》记载，速不台在此战役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诸王对是否立即进取佩斯有些迟疑，要速不台转回，速不台说：“你们要回自回，我不多瑙河佩斯城决不返回。”说完驰马直扑佩斯，诸王立即跟上。后来拔都说起此事，赞道：“当时所获，皆速不台功也。”

公元1241年夏秋间，蒙古军队仍在多瑙河东面匈牙利平原驻扎，休养兵马，时而外出抄掠。8月，一支蒙古军进至维也纳新城附近，当时城中仅有戍兵50、弩手20。奥地利公和波希米亚王等合兵来御，蒙古兵退走。12月，拔都率军踏冰过多瑙河，于圣诞节那天攻取匈牙利另一大城格兰。1242年初，派合丹领一军追逐匈牙利王贝拉。贝拉先逃到奥地利，维也纳公弗里德里希二世起初伪装欢迎，很快就乘人之危多方逼迫贝拉。贝拉携家属出走克罗地亚境内的萨格勒布，最后逃入亚得里亚海边岛上。合丹军一边追赶，一边沿途抄掠，于

3月间屯驻海边，守望贝拉所栖小岛。不久，进兵达尔马提高地，取道塞尔维亚，与拔都军会合。此时窝阔台去世的消息已经传到，拔都正准备东返。他们在高加索山北部驻扎数月，因钦察人又起来反抗蒙古统治，攻拔都之弟升豁儿，需出兵镇压。1243年初，拔都大军回到伏尔加河下游营地。

这次西征的结果，是在钦察草原及其邻近地区的辽阔土地上形成了一个大国，它在中亚史料中称为术赤兀鲁思或钦察汗国，在俄罗斯编年史中称为金帐汗国。

四、忽必烈攻宋

进攻南宋和统一吐蕃和大理

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却没有实现将河南地归宋的诺言，反而迫使宋朝将陈州、蔡州西北的大片土地归蒙古占有。蒙宋开始对峙。历史又开始重演了：100多年前，当女真进攻辽朝时，约北宋联合灭辽，结果辽被灭后女真大举进攻北宋；现在蒙宋联合灭金后，蒙古又大举进攻南宋。

这时的南宋政权，已经腐朽到极点。宋理宗赵昀在位达40年（1225—1264年）之久。他先后重用权臣史弥远、史嵩之、董宋臣、丁大全、贾似道等人，这伙人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依然过着纸醉金迷、腐化挥霍的生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情景，有增无减。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不是加强国防、坚决抵抗，而是束手无策、和战不定，把希望寄托在委

屈求和、敌人自动退兵上。所以蒙宋 40 年战争，南宋一直被动挨打，直到灭亡。

1251 年，蒙哥即大汗位。开始作进攻南宋的新的部署。由于四川宋军防守严密，蒙古军队不敢轻易进攻。因而采取了绕道吐蕃，进攻云南的大理，然后南北合兵进攻南宋的战略。1252 年蒙哥之弟忽必烈、老将速不台子兀良哈台奉命出征。1253 年秋，忽必烈取道吐蕃向大理进发。当时吐蕃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下。蒙古强大起来后，还在灭西夏之前，有的吐蕃地方势力就已向蒙古表示臣服。后来，窝阔台派阔端和掌握吐蕃地方实权的萨斯迦派宗教首领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达成协议，吐蕃正式接受蒙古大汗规定的各项制度。忽必烈入藏后，击败了反抗的吐蕃军队，吐蕃归于统一。

1253 年 10 月，忽必烈和兀良哈台率军进入大理境，在金沙江附近降服了大理以北的么些蛮各部，酋长唆火脱因、塔里马等投降。忽必烈遣使入大理招降，使臣被杀。大理是五代后晋天福二年（937 年）白蛮的首领段思平所建，辖今云南全境及四川西南境，当时的国王是段兴智，大权操于高祥、高和兄弟之手，忽必烈的使臣就是被高祥杀死的。1253 年 12 月，忽必烈攻占大理城，段兴智逃奔善阐（今云南昆明），高祥逃奔姚州（今云南姚安），蒙古军追至姚州，杀高祥。忽必烈留兀良哈台继续平定大理国境的未征服各部，自己返回蒙古。兀良哈台攻占善阐，获段兴智。自 1254 年至 1256 年，兀良哈台先后平定了乌蛮、白蛮、罗罗、金齿、白衣等部，大理国八府四郡皆附。

1258 年初，蒙哥再次发动三路大军进攻南宋。他自率主

力军进入四川；命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又命兀良哈台从云南北上攻潭州（今湖南湘潭），然后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准备三路军会师后同时东进，直抵临安，灭亡南宋。

蒙哥先派纽璘占领成都，自率大军攻下利州（今四川广元）及其附近地方，然后沿嘉陵江南下，准备进攻重庆。1258年底，蒙古军到达合州。合州在嘉陵江东岸，地势险要，是重庆的北边门户。合州宋将王坚调集 17 万人增筑钓鱼城御敌，军民抗蒙情绪高涨。1259 年春，蒙宋双方在合州及其周围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蒙国始终未能攻破钓鱼城。入夏后，天气炎热、疾病流行，被阻在合州城外的蒙古军病倒很多。七月，蒙古军围合州，先锋汪德臣差一点被炮石击中，回营后得病死去。随后，蒙哥等率大军攻城，宋军发炮石，蒙哥被击中负重伤，回营后终因伤势严重，死于军中。大汗一死，蒙古军只好撤退。

忽必烈一路于 1259 年 8 月渡淮河，入大胜关，抵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向鄂州推进。九月，蒙哥死讯传来，忽必烈企图攻下鄂州后再北上夺取汗位，因而攻城更加激烈。由于南宋援兵来到，忽必烈一直未能得手。12 月，在汉阳声援鄂州的南宋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这时，忽必烈已得知其弟阿里不哥准备在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即大汗位，于是便采纳谋臣郝经计，匆匆与贾似道签订密约：双方以长江为界，南宋每年献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给蒙古。然后，急速撤兵北上争夺汗位。

兀良哈台一支军队到达潭州后，因南宋军民奋战抵抗，未能攻下，兀良哈台便绕道北上与忽必烈会师。

忽必烈夺取汗位

1259年7月，蒙哥在合州钓鱼城战死后，以阿里不哥为代表的守旧派和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汉法”派，都积极活动起来，准备夺取汗位。

阿里不哥是拖雷的第七个儿子，蒙哥即汗位后，命阿里不哥留守都城和林。阿里不哥长期在蒙古本土，与外界接触不多，特别对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了解甚少。后来，以他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墨守蒙古成规的保守集团，他们主张维持蒙古原来的统治方式，反对采用中原地区原有的封建统治方式。

忽必烈是拖雷第四个儿子，他很早就结识了一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像信佛崇儒的刘秉忠，熟读孔孟之道的张文谦、王鹗等，都是忽必烈十分信任的。他们把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蒙哥即位后，以漠南汉地委托给忽必烈来管理，从此忽必烈与各族地主阶级进一步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他一方面继续网罗人才，像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汉族地主知识分子，都纷纷前来投靠。这些人都是忽必烈的谋士，对忽必烈影响很大。刘秉忠对忽必烈说：“今天谁能重用士大夫，又能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就能当中国的皇帝！”这对抱有统治全中国愿望的忽必烈无疑是极大的启发，因此，像官吏的任用、对南宋的作战方略、经济政策、屯田措施等事，甚至后来的夺取汗位，建立元朝，几乎都出自这些人的策划。除了汉族地主分子外，忽必烈对其他各族上层人物也是加以争取的，像回回人赛典赤·瞻思丁、思兀儿

人廉希宪、西夏人高智耀等接受汉文化很深的一些人也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另一方面，忽必烈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采取了拉拢、利用北方地主武装的方针。早在蒙古灭金时，北方地主武装头目董俊、严实、史天倪、张柔等就投靠了蒙古。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后，继续对他们加以重用，像董俊的儿子董文炳，在忽必烈进兵西南和灭宋战争中就非常卖力；史天倪的弟弟史天泽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璫的战斗中出力很多；张柔和他的儿子张弘范也是忽必烈十分信用的，最后灭亡南宋、逼迫赵昺投水而死的就是张弘范；红袄军头目李全的儿子李璫，忽必烈也给他很大的权力，封他为江淮大都督，忽必烈十分信用的王文统，就是李璫的岳丈。忽必烈联合汉族和其他各族地主阶级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学会统治汉地的方法。因此，在忽必烈夺取汗位之前的10多年间，他已跳出了蒙古“黄金家族”的小圈子，逐渐成为懂得汉法、决心抛弃蒙古旧法的新的封建统治者。忽必烈是蒙汉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

忽必烈不仅为自己夺取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还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他主持漠南汉地后，十分注意招抚流亡的人民，大搞屯田积粮，并采取整顿财政等措施。早在1252年，忽必烈就已在河南的唐、邓等州实行屯田，后来又在陕西凤翔等地屯田，这样就使他掌握了大量军粮。忽必烈又立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忽必烈完全控制了蒙古国的财政大权。

1256年三月，忽必烈命刘秉忠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岗，营建营室、房屋，三年后建成，

称开平府。在这里聚集了忽必烈的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采取夺位措施。他命令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各方面；又命令各地军队听从调度，由阿兰答儿纠集漠北各地军队，脱里赤纠集漠南各地军队，形成对开平的包围势态。阿里不哥企图先发制人，迫使忽必烈就范。

忽必烈这时还在围攻鄂州，蒙哥死讯传来后，他召集诸将、诸谋士研究蒙哥死后的形势和对付阿里不哥的策略。这时郝经提出了如下建议：一面遣军去迎接蒙哥的灵车，接收大汗的宝玺，一面赶快与南宋贾似道议和，签订密约，迅速撤军，派轻骑兵赶到燕京，防止阿里不哥的势力南下。忽必烈采纳了此计。1260年三月，忽必烈抵达开平，诸王合丹、阿只吉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等率东道诸王，会集开平。他们都是忽必烈的支持者。忽必烈废弃了贵族选汗的旧制，宣布即位。并定当年为中统元年，开始建元纪岁。

同年四月，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宣布为大汗。支持他的除阿兰答儿、脱里赤等外，还有窝阔台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哈台后王阿鲁忽，旭烈兀子出木哈赤等。

阿里不哥和忽必烈双方为争夺地盘开始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阿里不哥命霍鲁海、刘太平等去陕、甘地区任职，忽必烈则命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双方发生冲突，廉希宪擒霍鲁海，杀刘太平等，忽必烈控制了陕甘地区。阿里不哥又派遣阿兰答儿南下联合浑都海作乱。但两人均被忽必烈的

军队所杀。

1260年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闻讯后不敢抵抗，逃至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忽必烈占领和林，命亦孙哥驻守，自回开平。1261年秋，阿里不哥至和林，伪装愿意归顺，却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占领和林，并南下骚扰，被忽必烈击败。由于阿里不哥多次战败，支持他的诸王纷纷向忽必烈投降，加上连年饥荒，阿里不哥不得不于1264年向忽必烈投降。经过四年的战争，阿里不哥的分裂势力终于被消灭，漠北和中原地区重新恢复统一。忽必烈战败阿里不哥后，取消和林为蒙古国的都城，改设宣慰司都元帅府。

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胜利，从本质上来说是蒙古统治集团内部“汉法”派战胜了守旧派，这对于蒙古国最后完成封建化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襄、樊保卫战

咸淳三年（1267年）十一月，降蒙宋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灭宋方略，当“先攻襄阳”，并指出：“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如果置南宋而不问，是“自弃正统”，更坚定了忽必烈消灭南宋的决心。次年九月，命刘整前往襄阳地区，协同蒙军主将阿术围攻襄、樊，襄、樊军民从此开始了历时五六年，关系到南宋政局命运的襄、樊保卫战。

襄、樊虽然被攻，援军也多次为蒙军所败，但是南宋仍得以从汉水运送粮食衣甲前往，使襄、樊军民能够坚持抗蒙斗争。蒙军攻不下襄、樊，就采取切断汉水通道以困死宋军的战术，遂于鹿门山、白河口筑鹿门、新城等堡，以后又在

汉水中流筑台，上设弩炮，与夹江堡相应，以控制汉水通道，从此以后南宋支援襄、樊的衣甲粮食也被切断，南宋的水、陆援军又都被蒙军打败，襄、樊军民的抗蒙斗争进入了困难时期。

蒙军又针对水战不如宋军的缺点，造船 5000 艘，训练水军 7 万，为攻襄灭宋作准备，襄、樊的形势更加危急。然而襄、樊被围 3 年，贾似道却对宋度宗封锁消息，凡是敢说蒙军攻宋的，就被贬斥，甚至被借故杀死。南宋任命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督军进援襄、樊，贾似道又答应宋将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节制，而听命于贾似道，从而牵制了李庭芝的援襄战斗行动。

咸淳七年（1271 年）五月，忽必烈因襄、樊军民坚决抵抗，蒙军久攻不下，一方面命令蒙军继续进行围攻，同时派赛典赤、郑鼎率蒙军水陆并进，攻打嘉定；汪良臣、彭天祥部蒙军出重庆，札剌不花部蒙军出泸州，曲立吉思部蒙军出汝州，以牵制宋军，进一步孤立襄、樊。

就在这年十一月，蒙古建国号为“元”，诏书说：“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从而表明元王朝是封建正统，为灭亡宋王朝作了最后的舆论准备。

从此以后，元军更加紧进攻襄、樊。次年三月，樊城外城为元军攻破，宋军退守内城。襄、樊被围 5 年，外援断绝，城中虽还有粮食，但是缺乏盐和布帛。这时宋将李庭芝移屯郢州以援襄、樊，得知襄阳西北有一条清泥河，发源于均、房州，于是造轻舟百艘，三舟联为一舫，中间的船装载衣甲等物资，左右二舟用作掩护，招募了抗元义军 3000 人，以义军

首领张顺、张贵为都统，伏于襄阳西北的团山之下。五月二十四日，宋军船上带着火枪、火炮、巨斧、劲弩和燃烧着的炭，半夜出发，乘风破浪，冲破重围，将士们无不英勇作战，转战 20 余里，黎明时到达襄阳城下，张顺已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襄、樊长期与外界隔绝，张贵等船队的到来，使得城内军民勇气倍增。

张贵又派人从水中潜往郢州与宋军范文虎相约，在龙尾洲会师。但是，范文虎部宋军却于“前二日以风水惊疑，退屯三十里。”元军得逃卒之报，事前驻军龙尾洲以逸待劳，当张贵率水军奋死冲出重围，到达龙尾洲附近时，看见官船旗帜，以为是宋军范文虎部，遂不以为备。元军出其不意地向张贵水军杀来，宋军虽经奋力抗击，终因寡不敌众，张贵身中数十枪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从此，襄、樊又与外界隔绝，处境更为艰苦。

襄阳、樊城隔着汉水，宋军在水中植木，联以铁索，中造浮桥，作为襄、樊两城支援的交通要道。元军久攻樊城不下，于是派军攻断浮桥，切断襄、樊之间的交通。元军又集中兵力连续猛攻樊城。咸淳九年（1273 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都统范天顺自杀，统制牛富率领将士进行巷战，渴饮血水，继续战斗，杀死不少元兵，牛富身负重伤后赴火自尽。二月，襄阳宋将吕文焕向元军投降，从此元军得以长驱顺江东下。

南宋首都临安的陷落

襄、樊失守，南宋朝野震动。当初襄、樊被围，贾似道

装模作样要亲自率军前往救援，暗中又指使其党羽上书阻留，说什么贾似道出兵，则“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这时襄、樊失守，贾似道又说：“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理宗）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这时群臣纷纷提出救亡之策，陈仲微上书说，襄、樊失守，“君相当分受其责”，如今“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只有“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因而触怒了贾似道，被贬出任江东提刑。张梦发给贾似道上书陈危急三策，也不被采纳。襄、樊失守后出任京湖安抚制置使的汪立信，写信给贾似道说：“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而乃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并提出把内郡的兵充实沿江守备，南宋兵籍有 70 多万，汰去老弱，可得 50 余万每隔百里设屯，要害处守军增倍。“有事则东西齐备，战守并用。刁斗相闻，馈饷不绝，互相应援，以为联络之固”，这是上策。不然应讲和以缓兵，二三年后边防稍固，可战可守，这是中策。如果这二策都不采用，那你准备投降吧！贾似道看信后把信扔在地上，并大骂说““瞎贼（以立信目微眇）狂言敢尔”。以后，又将汪立信罢官。以贾似道为首的南宋反动统治者，拒绝了一切抗元救亡的建议，置南宋王朝的安危于不顾，文过饰非，依然歌舞升平，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

咸淳十年（1274 年）七月，宋度宗死，贾似道立了一个 4 岁的小孩赵昀为皇帝。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首的元军主力自襄阳南侵，抗元名将张世杰所在的鄂州首当其冲。在鄂州军民的奋勇抗击下，伯颜所统的元军主力被阻击在鄂州城下，

决定越过郢州，继续南下。元军到达长江边的阳罗堡，南宋军民在王达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元军进攻多日仍未能攻占，于是分兵从上游 40 里的青山矶强渡，接着阳罗堡也被元军攻占，宋将王达、刘成以及 8000 将士英勇战死。元军渡江后，鄂州就向元军投降，伯颜遂率元军主力东下，直奔临安，沿途宋军纷纷投降。

消息传来，南宋政府大惊，一面下诏要各地起兵“勤王”，同时要贾似道出兵抗元，贾似道不得已，拖到德祐元年（1275 年）才出兵，但是一到芜湖就派人向元军投降求和，愿意称臣纳贡，为伯颜所拒绝。贾似道只得派孙虎臣率军 7 万驻守池州的丁家洲，夏贵以战船 2500 艘横亘江中，贾似道自将后军屯鲁港。宋军先锋姜子才率宋军奋勇杀敌，主将孙虎臣地弃阵而走，夏贵也不战而逃。贾似道惊慌失措，命令收军，宋军大败，贾似道与孙虎臣乘船逃到扬州。南宋政府迫于舆论，不得不将贾似道罢官，贾似道以后被押送官郑虎臣杀死于贬途中。

贾似道战败，南宋地方官相继逃降，太平州、和州、建康、常州、镇江、平江等重镇，先后被元军占领。南宋朝中的官员也纷纷出逃，形势越来越恶化。率领军队自荆湖入卫临安的抗元名将张世杰，收复了平江、安吉、广德、溧阳，宋将刘理由勇也收复了常州，在此形势下，浙右降元的不少地主才又反正归宋。李庭芝、姜才也率宋军坚守扬州，打败了元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南宋的形势因而略有好转。这年七月，张世杰与刘师勇等率战船万余艘，主动进攻元军，进到镇江焦山，宋军奋勇作战，为元军火攻所败，张世杰退往崙

山，刘师勇退回常州，张世杰要求增兵以继续进攻元军，南宋政府不予理睬。

南宋政府下达“勤王”诏书以后，地方官中只有赣州知州文天祥组织了一支像样的“勤王军”，几经周折，于这年八月下旬才到达临安，文天祥随即被任命为抗元前线的平江知府。

元军的烧杀抢掠，激起南宋军民的无比愤怒，无不英勇杀敌。潭州李蒲以不满 3000 的宋军，和潭州人民在一起浴血奋战，抗击元军的围攻达半年之久，德祐二年（1276 年）正月城破自杀。扬州军民在李庭芝、姜才等率领下也英勇地抗击了元军的长期围攻，城中粮尽，扬州军民抗元意志并不稍衰，继续抗战。

常州保卫战是南宋末年带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之一。常州被围两月，抗蒙名将，合州保卫战的指挥者王坚的儿子王安节，与刘师勇以及知州姚嵩、通判陈炤，组织常州军民誓死抗敌，伯颜的元军主力被阻地常州城下不能前进。平江知府文天祥派来的援兵与元军展开血战，由于临安来的援军袖手旁观而被元军打败。尽管常州的外援断绝，但抗战的意志更加坚决。伯颜无法攻下常州，残酷地强迫城外的居民运土筑垒，并把运土的人民杀死后一起筑在垒中，以防止城中宋军冲杀出来。由于南宋反动统治集团一心梦想投降求和，没有组织有效的援救，常州终于在十一月间被攻破，刘师勇冲出了重围，王安节巷战后因臂伤被俘不屈遇害，姚嵩、陈炤英勇牺牲，数千战士奋战而死，有战士 6 人，背靠背地杀敌，在杀死成百的元军后英勇牺牲，剩下的军民全遭元军屠杀。

元军在总攻常州之前，于十月间发起了向南宋首都临安的最后攻击。自镇江分兵三路，阿剌罕率右军出广德攻独松关，董文炳率左军（水军）出江入海南奔澈浦，伯颜自率中军主力进攻常州，三路元军约期会攻临安。消息传到临安，南宋政府立即调文天祥率军自平江赶往独松关抵抗，可是为时已晚，还没等文天祥赶到，独松关已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失守，文天祥只得退往临安。南宋政府又任命张世杰任平江知府，但是十一月二十日常州失守后，平江守臣随即向元军投降，张世杰还没有赶到，伯颜已进入平江，张世杰也只好退往临安。

这时到达临安的“勤王军”有三四万人，文天祥与张世杰商议，应与元军决战，如果战胜，就命令尚在淮东抗元的宋军切断元军的后路，国事尚有可为。但是，宰相陈宜中正向元军投降求和，根本不同意他们的意见，南宋反动统治集团不断派出使者，先是求元班师通好，继求称侄纳贡，再求称侄孙，最后求封小国、称臣。伯颜利用南宋的投降求和，逐步进迫，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军游骑已到临安北关，文天祥、张世杰请太皇太后、皇帝等逃到东海上，由他们率领临安军民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所反对。正月十八日太皇太后谢道清与宰相陈宜中派使臣送出传国玺和投降书，向元军投降，陈宜中随即逃走。次日，太皇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实际上是要他接洽投降事宜。文天祥与其他执政官前往元军营谈判时，却还梦想保存宋王朝，被伯颜扣押。三月，伯颜入临安，全太后和小皇帝赵昀被送往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道清因病暂留杭州，以后也被解往大都。临安朝廷虽然投降，但是，南宋军民在文天祥、张世杰

和陆秀夫的带领下，继续进行抗战。

南宋的灭亡

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伯颜率元军进入临安的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从临安逃往婺州（金华），伯颜进入临安后，派元军追赶，他们又逃到温州，赵昰被奉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随后南下福州。五月一日，赵昰即位（宋端宗）并改元景炎，陈宜中被任为左丞相兼都督，尚在江北扬州抗元的李庭芝为右丞相，著名的抗元将领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重新建立南宋政权。

文天祥被扣留在元营中，拒绝投降后被押解北上，到镇江时，文天祥历尽艰险逃到江北的通州（江苏南通），又从那里出海南下，四月底到台州，五月下旬到福州后，被任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他提出回温州，组织水军，由海道收复两浙，为陈宜中所阻。由于和陈宜中议论不合，七月以同都督的身份外出组织军民抗元，先到南剑州，以后又到汀州，这时宋的江西官员已降元，文天祥派赵时赏、赵孟滢率军取宁都，吴浚取雩都，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等自江西起兵来会，声势大振。但是，整个形势已更加恶化，南剑州宋军于十一月投降之后，宋端宗和陈宜中、张世杰等大臣就上了海船，接着福州宋军也向元军投降。这年十二月，他们逃到了广东的甲子门，文天祥也于景炎二年（1277年）春从汀州移屯于漳州，这时，部将吴浚投降后又来劝降，文天祥立即把吴浚杀死。随后移往惠州，又将跋扈的王福、钱汉英斩首以明军纪，士气稍振。五月间，文天祥反攻江西，进入会昌，六月入兴

国，七月派赵时赏率军直达赣州城下，吉州所属八县，收复一半，只有赣州孤城还在元军手中。临川、南昌等郡以及湖南的赵璠、张虎、张唐、刘斗元、吴希爽、陈子全、王梦应等也都起兵响应，先后收复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潭和萍乡等地，给元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文天祥所组织的人民武装，缺乏经验与训练，被元将李恒所部击溃，文天祥的妻子被俘，由于部将赵时赏冒充文天祥，迷惑了元军，文天祥才得脱身，赵时赏后被元军杀害。

文天祥收拾残兵奔循州，驻南岭（广东永安东南）时，又将企图投降的黎贵达斩首，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这时，11岁的宋端宗已于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中旬病死，8岁的赵昀即位为新皇帝并改元祥兴，左丞相陈宜中看到形势越来越恶化，再次逃跑了。朝政由张世杰和陆秀夫主持。张世杰派兵进攻雷州失利后，就从硃州移到崖山。

文天祥和南宋朝廷联系上以后，继续组织军民抗元，十一月进屯潮阳，讨伐叛徒陈懿、赵兴。陈懿逃走，赵兴被捉并被处死。十二月往南岭，旧部邹洵、刘子俊又起兵从江西来会，兵势稍振，但是，由于叛徒陈懿的引导，在五坡岭上，文天祥和部属被元军俘虏。

至此，只剩下张世杰、陆秀夫领导的一支有组织的抗元力量，他们决心守崖山，与元军决一死战，全体人员都上了海船，1000多条海船结成了水上的堡垒，自正月中旬起战斗了20多天，由于淡水道被元军切断，宋军吃了10多天的干粮，渴得不得了只好喝海水，呕吐不止，宋军大困。张世杰仍率领苏刘义、方兴等宋军将士与元军大战，拒绝了一次

又一次的招降，决心抗战到底。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初六日（3月19日），元、宋两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宋军战败，宰相陆秀夫眼看要被元军俘虏，就背起9岁的小皇帝赵昀跳海自尽，张世杰、苏刘义等冲出重围后，又回军进攻元军，战败后退走，但船为大风所坏，溺水而死。

元朝结束了南北长期的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一统。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宋金的对峙，西夏、高昌、大理、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并存的局面，忽必烈用武力征服了各割据政权，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状态，元的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际不及焉”。元朝将这辽阔的国土划分行省，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派遣官吏，征收赋税，进行有效的统治。云南、西藏、四川、甘肃、辽阳、岭北等边陲地区均从此时被置于元朝的行省统治之下，为我国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基本轮廓。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少数民族涌入内地，与汉人杂居通婚而融合。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汉人迁往边疆，他们在与少数民族的杂处过程中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和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在元代，一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波斯、阿位伯人来到我国，经与汉、蒙、维吾尔等族融合，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元代也比较重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统治，在东北直至混同江口，西北远及叶尼塞河上游，东南越海至台澎西沙，西南包括云南西藏等地，都设置了行政机构，派遣官吏理民征税，戍兵屯田，积极从事边地开发，加强了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所有这一切，都使我

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进一步得到发展。

第二节 元代的社会政治制度

一、迂回曲折的汉化道路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在中国历史上，不时有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王朝的情况，这些王朝也的确无一不受到汉族农业文明的薰染，逐渐走上汉化的道路。然而，具体分析起来，它们所受薰染的疾缓、深浅程度，还是大有差别的。就元代而言，它的汉化过程无论与以前的北魏、金代，还是与以后的清代相比，都显得尤为艰难。迂回曲折的汉化历程，几乎贯穿了全部蒙元政治史的始终。

大蒙古国时期汉化的初步尝试

第二代大汗窝阔台在位时，蒙古统治者已经开始在汉化道路上进行试探性迈进。导致这一迈进的关键人物是汉化很深的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最初以星相占卜术获得成吉思汗的信任，到窝阔台时被任命为怯薛中的必阁赤长，主行文书，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于是，他着手说服窝阔台，在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推行一系列旨在促进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族封建文明的改革，其中包括设立十路课税所，制定五户丝制，设立编修所、经籍所编印经史等等。1238年，耶律楚材专门奏准，在中原诸路进行了一次儒士考试，共选取4030人，皆免其赋调，优秀者任以官职，史称“戊戌选试”。他常常向窝阔台进说儒家治国思想，灌输“天下虽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道理。

然而，耶律楚材的上述改革措施，在施行当时就受到了保守的蒙古贵族和西域斡脱（突厥语，同伴）商人的竭力阻挠、破坏。在耶律楚材失势之后，这些改革也大都中止了，后来为耶律楚材作神道碑的宋子贞（字周臣，1185—1266年）评论说：当时“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耶律楚材“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耶律楚材神道碑》）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蒙古统治者最初汉化的努力，并未有很大成效。

忽必烈推行汉法

随着蒙古帝国分裂趋向的日益加剧，以及蒙古在汉地统治的不断加强，接受汉族历代封建王朝的一套典章制度、统治方式，就成为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不可避免的问题。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元史》卷一160《徐世隆传》）。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进步势力，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汉法”，建立起蒙汉地主阶级的政治体制，从而使蒙古统治集团在汉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忽必烈推行的“汉法”，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改元建号，定都汉地。

建立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如前文所述，大蒙古国的国家体制比较简略，在征服中原过程中也曾随事沿用一些金代旧制，但无一定之远见。忽必烈即位后，命刘秉忠（字促晦，12616—1274年）、许衡（字促平，1209—1281年）等人考定前代典制，参照当时情况，逐步建立健全了国家机构和职官制度。中央设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统军务，御史台掌监察。地方上一开始设立十道宣抚司，主持日常军民政事，后逐渐把临时设置的行省固定下来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下辖路、府、州、县。又设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作为地方监察机构。忽必烈还专门采取措施限制诸王勋贵的特权，解除汉人世侯的兵权。

实行重农政策。在中央设大司农司专管劝导督察农业生产，又把“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核地方官治绩的首要标准。一再下诏招集流亡、鼓励垦荒、发展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重农政策的实施，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

尊孔崇儒。重申儒户免去赋役的规定，修复各地孔庙，大力发展地方儒学教育。在中央立国子学，任命大儒许衡为国子祭酒，用汉文化教育蒙古、色目勋戚子弟。

然而，忽必烈对汉族封建文明的学习和采纳，今天看来是很不彻底的。他建立的元王朝，实际上是一个部分吸收汉族历代封建王朝制度，同时又大量保留蒙古旧制的混合体。对这一点，忽必烈在即位之初的几个诏书中就讲得很明白。如其《即位诏》一方面提出“文治”的纲领，另一方面又把新

王朝的创建原则规定为“祖述（继承旧制）变通（进行改革）”。在《中统建元诏》中，则把这个原则表达为“稽列圣（蒙古历代大汗）之洪规，讲前代（汉族封建王朝）之定制”（均见《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在“祖述”的幌子下，大量落后的蒙古旧制如投下采邑制、斡脱制、蓄奴制、军事长官世袭制、岁赐和朝会赐赉制、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都在新王朝得以保存下来，忽必烈本人的政治主张，也在即位以后渐趋消极、保守。汉族儒臣受到猜忌、排斥，色目官商集团则得到倚信。很多事关进一步推行汉法的大问题如定法典、行科举等等，都屡议屡挫，悬而不决。到忽必烈在位后期，以汉制改革蒙古旧制的政治革新工作已经完全停顿，元代政治体制的二元格局基本上就此定型了。

元代中后期汉化的曲折进程

忽必烈的继承者成宗铁穆耳（1265—1307年）在位期间，以恪守前朝“成宪”自我标榜，基本上保持了守成的局面。他下诏崇奉孔子，在大都重修孔子庙宇，优礼汉族旧臣，限制诸王贵族的非法活动，又下令编辑整理律令。但另一方面，仍然滥行赏赐，信用色目官员以“回回法”理财。就成宗本人而言，虽然在尊孔崇儒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他自己对儒家学说那一套并不完全相信。大德三年（1299年）正月，中书省臣因天变引咎辞职，成宗就不耐烦地说：“此汉人所说耳，岂可一一听从耶？”（《元史》卷20《成宗纪三》）他在推行汉化的道路上没有取得什么大进展并不奇怪。

1307年成宗病逝，武宗海山（1281—1311）夺取皇位。武

宗长年在漠北统兵，对汉文化十分隔膜。即位后，大行赏赐，滥授官爵，政令失当，朝政紊乱，忽必烈以来的汉化成果受到很大破坏。但其中也有例外：武宗即位不久就下诏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头衔之高，超出了以前历代尊孔的规模。

继武宗登上皇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285—1320年），与武宗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经历。他即位前曾拜汉族儒士本孟（字道复，1255—1321年）为师，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即位后，罢废武宗为理财而设立的尚书省，整顿朝政，裁减冗员，征用有声望的老年儒臣参与议政，命人用蒙古文翻译《孝经》、《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大学衍义》等汉文经史著作，限制吏员出职的最高品秩，使元代在汉化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而在这方面最集中的表现，还是科举制的实行。

自从窝阔台时昙花一现的戊戌选试以后，汉族儒士们又曾多次向蒙古统治者提出实行科举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被采纳。仁宗即位，决意开科。1323年，正式以行科举诏颁于天下，规定“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元史》卷八一《选举志一》）。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殿试、会试三级，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别考试出榜。仁宗时制定的这一套科举制度，虽然在录取人数、进士地位与仕途等方面与唐宋相比还差得很远，但毕竟部分地满足了汉族士人广开仕途的愿望，也促进了汉文化在蒙古、色目人中的进一步推广。另外，规定以程朱理学作为考试取士的标准，从而使理学在元代正式获得了官方学术的

地位，大大扩展了它的影响。

仁宗在位后期，以皇太后答己（？—1322年）、右丞相铁木迭儿（？—1322年）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保守势力把持朝政，使推进汉化的改革事实上陷于中止，英宗硕德八剌（1303—1323年）即位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继病死。年轻的英宗得以摆脱掣肘，任用汉化较深的蒙古贵族拜住（1303—1323年）为相，专意改革，英宗与他的前辈相比，从小在一个最易接受汉文化影响的环境之中成长，因而具有比较高的汉文化素养。1322年春，在元代建太庙40年以后，英宗首次按前代汉族封建王朝的仪节行亲享之礼，“鼓吹交作，百姓耸观，百年废典一旦复见，有感泣者”（《元史》卷136《拜住传》）。这年秋天，英宗将拜住由左丞相升为右丞相，并在命相诏书中宣布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使邪正异途，海宇义康”（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八《特命右丞中》），充分表明了改革的决心。此后近一年间，英宗和拜住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改革措施：

大规模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和儒家知识分子。发布《振举台制》，要求选举贤能，奖拔人才。

罢汰冗员。减罢蒙古贵族巧立名目设置的崇祥院、寿福院等13个机构，又罢徽政院属下江淮财赋总管府等60多个机构。

行助役法。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交纳助役费，用以补偿一般农民因劳役而造成的经济负担。

审定颁行《大元通制》。元代建立以来，曾经多次着手修纂律令，但都没有最后完成。英宗继位后，继续进行仁宗时

未完成的律令编纂工作，于1323年春正式修成，定名为《大元通制》。全书共2539条，分为制诏、条格、断例、别类四个部分。《大元通制》是一部以《唐律》为范式的完整而系统的法典。它在内容上虽然还包含有明显的蒙古法因素，并且打上了一些蒙古族统治下元代社会特有的印记，但就其基本精神而言，仍然是唐以来中国封建法典的延续。《大元通制》的颁行，可以看作是元代汉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323年秋，英宗和拜住在上都南面约30里的南坡被以御史大夫铁失（？—1323年）为首的一批保守蒙古贵族所刺杀，史称“南坡之变”。南坡之变反映了蒙古统治内部汉化和反汉化两派的激烈冲突。继位的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276—1328年）虽然与谋杀行动颇有牵连，但还是迅速诛杀了铁失谋逆集团，同时也采取一些推进汉化的措施。力图树立起合法继承者的形象。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开经筵。经筵是中国古代皇帝为学习儒家经史著作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元初以来，虽有断续的经筵进讲事例，但一直未形成制度。泰定帝于1324年春正式开设经筵，命儒臣以《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进讲，后来又规定：经筵讲读官员没有人代任不准去职。这样就使经筵进讲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

泰定帝去世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在混战中登上皇位的元文宗图帖睦尔（1304—1332年），有比较高的汉文化修养。他即位不久，就专门设立了一个奎章阁学士院，集儒臣于阁中，用蒙古语翻译儒书、刊刻经籍。在1329年到1331年，文宗还组织一批文人学士，模仿唐、宋

《会要》体例，编纂了一部政书《经世大典》。全书共 880 卷，是一部集元代典制之大成的著作，也是文宗推行汉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宗极力尊孔崇儒，对孔子的父母以及重要弟子一一加封。又遵循儒家礼仪，在大都南郊亲祀昊天上帝，以太祖成吉思汗配享。

元顺帝妥帖睦尔（1320—1370 年），是元代最后一个、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他的童年基本上在汉地度过。因而受汉文化影响很深。虽然权臣伯颜（？—1340）一度掀起反汉化运动，但他很快就被逐出朝廷，元王朝在汉化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逐权臣伯颜之后，顺帝复行科举，诏修辽、宋、金三史，开宣文阁延儒臣进讲，一时也颇有“儒治”的气象。然而这时的元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各种社会矛盾严重激化，统治集团腐朽不堪，难以振作。顺帝的上述措施，最多只能起到一些点缀和粉饰的作用，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二、元代的中央官制

忽必烈即位之初，面临着建立一整套适应统治汉地需要的封建国家机器的任务。他从前的幕僚郝经（字伯常，1223—1275 年）为此提出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赤经《陵川文集》卷 32《立政议》）的定制原则。但实际上元初各项制度的制定，并没有做到兼采唐、宋、辽、金诸朝之长，从基本上是直接照搬金制。当时主要参与定制的王文统（字以道，？—1262 年）、刘秉忠、许衡等人，都生于金代，对金

制十分熟悉，因此大量照搬金制是很自然的。元代中央一级统治机构，主要由统政务的中书省、掌军务的枢密院、司监察的御史台构成，这一格局十分明显地体现出脱胎于金制的特点。其余重要的中央机构，虽有一些属于元代新设，但大部分都能在金代找到原型。

中书省 元代中书省统掌全国政务，金代总政务的机构为尚书省。两者名称虽然不同，性质则完全一样。汉文史料将窝阔台时期的怯薛必阁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那只是临时附会中原官称，并非定制。元代中书省的正式设立时间，是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一日。此时忽必烈即位还不到10天。

中书省最高长官为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此职空缺。实际上的长官是右丞相、左丞相各1员，皆正一品，总领政事，统率百司。元制尚右，所以右在左上，这一点与前代不同。右、左丞相以下，为平章政事4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1员，皆正二品，参知政事2员，从二品。上面这些官员共同构成宰相班子。元代宰相员额变动比较频繁，上述员额是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的定制。宰相下面的僚佐，有参议中书省事4员，典掌左右司文牒，参决军国重事。左司、右司分别设郎中、员外郎，都事各2员，分别掌管六部上禀中书省的各项具体事务。其余僚佐还包括断事官、客省使、检校官等等。

元代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很广。“军国之务，大小由之”；“凡选法、钱粮、刑名、造作、军站民匠户口一切公事，并经由中书省可否施行”（《元典章》卷二《圣政一·振朝纲》）。除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少数几个

特殊机构外，其余所有中央、地方机构上呈事务，选用僚属，都必须通过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虽与中书省并称，得自行奏事、自选僚属，但在文书往来上仍然显示出与中书省地位的差别。中书省发送枢密院、御史台的文书，行文用由上行下的“札”；而院、台发送中书省的文书，行文则用由下行上的“呈”。与此相联系，作为中书省长官的宰相，也体现出位高权重特点。宰相中居于首位的右丞相，除个别非常时期外，必以蒙古勋贵担任。其余宰相，则参用色目人和汉人。中书省工作时，宰相们列坐于一堂，就所议政事各抒己见，最后由右丞相作出决断。大事申报皇帝，小事便宜施行。有时讨论重大决策问题，也往往由中书省召集枢密院、御史台、六部等衙门有关官员举行集体会议。终元一代，出现过不少权相。他们有的是凭借皇帝的信任把持大权，有的则干脆挟持皇帝，为所欲为。这些权相往往身兼多职，擅专威福，朝廷百官都不得不仰其鼻息。明初朱元璋废中书省，罢宰相不置，原因之一就是鉴于元代权相专横之弊。

中书省下令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3员，正三品；侍郎2员，正四品。元初仅左三部（吏户礼）和右三部（兵刑工），后来分为四部，到至元十七（1270年）才正式分立六部。元代六部职掌基本上与前代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兵部和刑部。元设枢密院掌军务，兵部的管辖范围则是“天下郡邑、邮驿、屯牧之政令”（《元史》卷85《百官志一》），也就是说负责主管军事方面的通讯、后勤等事务，两者分工比较明确。全国驿站的管理，也曾一度划归兵部负责。刑部与大宗正府分掌全国刑狱事务，两者权限屡有变动，原

则上汉人刑狱归刑部，蒙古、色目人刑狱归大宗正府。后来又规定上都、大都两地蒙古、色目人与汉人之间的诉讼事务归大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的类似案件则交付刑部。遇有重大案件，还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宗正府、刑部分别委派官员，联合审理，号称“五府”。元代六部是中书省下属机构，不直接对皇帝负责，它们的地位远不像后来明代那么高。元成宗当了好几年皇帝，还弄不清六部官员究竟是哪些人。泰定帝时祭礼太庙，以户部尚书为亚献官，遭到御史的反对，认为是“人既疏远，礼难严肃”（《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

中书省之外，元代还曾三次设立尚书省。第一次是1270年到1271年，第二次在1287年到1292年，第三次在1309到1311年。这几次设立尚书省，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以“理财”为尚书省的主要任务。然而尚书省也设丞相到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员，六部和各行省均归其领导，实际上已经夺取了中书省的行政大权。中书省建置虽然保留，但不过是备员充数而已。到尚书省罢设后，政柄才复归中书省。

枢密院 元代枢密院置于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除四怯薛由天子直接节制外，全国内外军队都由枢密院统一管理、调度。枢密院长官枢密使，与中书令一样，例由皇太子兼任，无太子时空缺。实际上的长官是知枢密院事（简称知院）。枢密院官员员额屡经变动，后来定制为知府6员，从一品；同知枢密院使（同知）4员，正二品；枢密副使（副枢）2员，从二品；金书枢密院事（金院）2员，正三品；同金书枢密院事（同金）2员，正四品。以下还有院

判、参议、经历、都事等属官。遇地方有战事时，还在地方上设行枢密院、分枢密院，其官员设置大体与中央枢密院相仿。

与以前的朝代相比较，元代枢密院权力尤重，职掌也更为广泛。首先在统领、调拨军队上。京城周围的侍卫亲军和镇戍腹里的诸万户均由枢密院直接控制。地方镇戍军日常军务由所在行省主持、枢密院进行监督，遇战事则由枢密院统一调遣。军队屯田、应役诸事务，也由枢密院管理、安排。其次是奏举属官、铨调武臣。枢密院用人可以自行举奏，不必通过中书省。铨选、考核武官，也是枢密院的专职。枢密院可以根据武官的武艺、战功、出身、资历等因素决定其升降、品秩。再次是对军人进行赏罚、存恤。军官立有战功，由枢密院奏闻行赏；犯罪则奏闻治罪。军士劳苦、阵亡、疾病，军户贫困，都由枢密院负责存恤。除去上面的职掌外，枢密院官员还经常与朝廷大员论议，参加大案要案的审理，并受皇帝差遣充任一些临时性职务。

蒙古统治者以武功起家，因而对秉持兵柄的枢密院非常重视。枢密长官知院，皆例由蒙古、色目勋贵充任，不用汉人。只有元末的汉人贺均（字公秉，1320—1363年），因世为宿卫重臣，一度被任命为知院，这是元代仅有的例外。枢密院同知由汉人担任的例子也很少。以下副枢、佾院、同佾诸职，则较多地参用汉人。一些蒙古、色目的勋贵家族，如蒙古阿儿剌氏玉昔帖木儿（1242—1295年）家族，许兀慎氏月赤察儿控制，皇帝专门从四怯薛中各选代表一人，参决枢密院军务。另外，元代还常以中书省宰相在枢密院兼任知院、副

枢等职，或让宰相挂上“商议枢密院事”的头衔，参掌枢密院事务。这样就便于沟通中书省和枢密院的联系，保证中央政令在军队中的统一贯彻执行。

御史台 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设立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初建之时，基本沿袭了金代御史台的人员编制。后来台官的数量和品秩都逐渐增加，超出了金代和以前各朝。其中主要包括：御史大夫2员，从一品；御史中丞2员，正二品；侍御史2员，从二品；治书侍御史2员，正三品；殿中侍御史2员，正四品；监察御史32员，从七品。其中，御史大夫为长官，中丞为副长官，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协助御史大夫、中丞总理监察事务。殿中侍御史掌殿中司，专门负责纠肃朝仪，监察百官内殿奏事。监察御史隶属于御史台中的察院，负责刺举百官善恶、讽谏政治得失。地方上，设江南、陕西两大行御史台，简称南台、西台。它们的官员设置，大体上与中央御史台相同。中央御史台相对于南台、西台来讲，又习称为内台。再向下，全国各地共设置了20道肃政廉访司（简称宪司），分属三台，而南台和西台又受制于内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御史台为中心，行御史台为重点，各道宪司为经纬的庞大监察网络。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自成系统，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元代御史台地位很高。忽必烈曾经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两手的。御史台选用僚属，可以不通过中书省自行奏闻。御史台官员上奏，皆实封直达御前，他人不许拆视。中书省、枢密院奏禀公事，都要与台官一同闻奏。台官不仅能纠弹不称职的官吏，

还可以举荐贤能的官吏，吏部根据台官考察结果，对百官进行升迁降转。台官对吏部的铨选情况也有权进行监督。当迁转不迁转，或迁转不依格，都要加以纠察。元代不设专职谏官，台谏合一，御史台官员实际上承担了前代谏官的职责，“监察职当言路，有犯无隐”（《元六类》卷68：李术鲁翀《姚天福神道碑》）。很多台官都以直言敢谏著称。除监察官吏外，元代御史台还对社会上的普通老百姓负有“肃清风俗”的责任，包括劝农、兴学、表彰忠孝节义行为等等。

御史台官员的选用也受到特别的重视。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授”。顺帝时拜汉人勋旧子孙贺惟一（字允中，1301—1363年）为御史大夫，特地赐给他蒙古名太平。御史中丞虽然“非勋旧德望不轻授之”（苏天爵《滋溪文卷》卷12《董守简墓志铭》），但实际选用上也比较注重才干，元代不少汉人名臣担任过这一职务。御史中丞以下官员大抵由蒙古、色目、汉人中相参任用，但对南人严格排斥，仅个别时期例外。御史台吏员的补用比其它机构更为严格，主要从下级官员、地方学教授、终场下第举人和其他官府的吏员中甄选。首先要有官员的举荐，再由台官进行“行止”考核和“吏能”考试，才能加以录用。被录用者日后出了问题，保荐和负责审试的官员都要承担责任。

其他重要中央机构 《元史·百官志》中罗列的元代中央一级机构数目繁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元代后期陆续设立的、专管皇室和贵族供奉事务的衙门。它们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大，并且材料也比较有限，这里就不再一一加以叙述了。下面着重介绍几个省、院、台之外比较重要、也比较

有特色的中央机构。

三公、三公是官称，并不是一个专门机构，但它们都能开府置僚属，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元代以前，皆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属于“坐而论道之官”，地位极高。元代太师、太傅、太保所授，都是“国之元勋”，汉人中只有开国文臣刘秉忠一人当过太保。而太尉、司徒、司空则授予极滥，僧侣、宦者、匠官都时常挂上这些头衔。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礼部一次就铸造了太尉、司徒、司空印共26枚准备颁发，大概元人自己也觉得这种情况记述上去会贻笑后世，就在修《经世大典》时遮掩说：“我国家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元文类》卷40《经典大典序录·治典·三公》），而对车载斗量的太尉、司徒、司空则以“或置或否”四个字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样，到后来的《元史·百官志》中，三公就变成了前代的三师——太师、太傅和太保。太师、太傅、太保皆开府，下设谏议、参军、长史等属官。担任三公的都是元勋重臣，往往就由当丞相的权臣兼任。不由丞相兼任时，也通常可与丞相一同参加禁中议事。

宣政院 宣政院是元代特有的机构，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负责统辖吐蕃地区。它最初名叫总制院，设于至元元年（1264年）。至元二十五年（1289年）改名宣政院，秩从一品，以帝师领院事，又设院使2员（后增加到10员）。宣政院可以自选官属，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代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地方上一度设立行宣政院，路府州县则设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为宣政院下属机构。

大宗正府 关于大宗正府，我们在前文已经有所涉及。前代宗正府的主要职掌是管理皇族事务，元代的大宗正府则有所不同，专门负责审理诸王、附马投下中蒙古、色目人的犯罪案件和婚姻、驱良等户籍争讼，也审理汉、南人中的重大刑事案件，长官札鲁忽赤，共设 42 员，皆从一品。属官包括郎中、员外郎、都事等等。

宣徽院 前代宣徽院一般掌管朝会、宴享、祭礼、礼仪、御膳等事务。元代宣徽院亦掌宴享、御膳，但又有很多具有独自特色、为前代所无的新职掌。主要包括：征收漠北蒙古万户、千户所纳差发（即赋税），掌管诸王怯薛、怯怜口名籍并供给粮草，送进和推荐怯薛人员，抚恤蒙古部落，等等。初置时正三品，后升从一品。设院使 6 员，以下同知、副使、佾院、同佾、院判各 2 员。院官大都出身怯薛，由皇帝的亲信近侍担任。元代宣徽院不仅负责皇帝和怯薛的日常生活，也起着沟通皇帝与漠北诸王部落之间联系的作用。漠北蒙古游牧民所纳差发，不经行省，直接交付给代表皇帝斡耳朵的宣徽院。皇帝通过宣徽院主管的朝会进行宴享、抚恤蒙古部众等工作，对漠北诸王、部落进行控制。由于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元代宣徽院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明显要高于前代的宣徽院。

翰林国史院 唐、宋、金诸朝，均设翰林学士院，负责为皇帝起草制诏，又设国史院（或史馆）掌修史。元代把这两个机构的职掌并到一起，设立翰林国史院，负责纂修国史、起草制诰、并备皇帝顾问。院官设翰林学士承旨 6 员，学士、侍读学士、侍讲学士、直学士各 2 员。元代重吏轻儒，汉族

儒士很难做到高官。翰林国史院则是汉族儒士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中央机构，而且终元一代，还一直有不少南人在院中供职。因此，翰林国史院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一种缓和民族矛盾、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它的品秩升到从一品，远远高于其它朝代的翰林学士院，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然而，另一方面，元代翰林国史院事务闲散，实权微弱，统治者对院中的汉族儒士人才储而不用，从而又与元代的民族政策和用人方针保持了一致。

蒙古翰林院 蒙古翰林院是元代特有的机构。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下诏颁行由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作为官方法定行用的文字。十二年（1275年），从翰林国史院中分立蒙古翰林院，专门负责用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其中主要是译写下令的各种诏令文件。院官名称、品秩皆与翰林国史院相同，承旨设7员，学士和直学士各2员。由于各种诏令经过拟议、起草，最后都要送到蒙古翰林院译写，蒙古翰林院就成为下发诏令的最后一道关口。统治者对这道关口非常重视，规定蒙古翰林院译诏的诏稿必须呈送中书省检查。然而怯薛人员直接奏准皇帝，越过中书省，将圣旨径自送到蒙古翰林院译写下发的情况也经常出现，成为元代一个屡禁不止的现象。

通政院 通政院也是元代特有的机构。元代疆域广袤，交通发达，驿站众多。因此于至元七年（1270年）设诸站都统使司统一进行管理。十三年（1276年），改名通政院。此后曾将汉地驿站事务划归兵部掌管，通政院还曾一度罢设。但到仁宗延祐七年（1320年），仍恢复旧制，全国驿站皆归通政院

管理。通政院秩从二品，分大都、上都两院，均设院使、同知、副使、佥院、同佥、院判等官。

大司农司 大司农司是元代统一掌管劝课农桑、水利、乡学、义仓等事务的中央官署。元初，经长期战乱，生产凋蔽。至元七年（1270年），始置司农司，负责劝农事务。同年，更名大司农司以重其事，地方上设劝农司作为下属机构。二十七年（1290年），罢劝农司，并其事入地方监察机构——提刑按察司（后改肃政廉访司），有关农桑事务申报大司农司，监察事务申报御史台。元代大司农司秩正二品，后升从一品，置大司农4员，大司农卿、少卿、丞各2员为院官。

三、行省制度的建立

元代疆域空前广袤，“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元史》卷58《地理志序》）。为了对如此广阔的疆土实行有效统治，元代建立了一整套以行省为核心的地方行政制度。它在中国地方行政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行省制度及其特点

元代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为行省，全称行中书省。“行省”一词，源于金代。当时为处理地方上的一些重大军政事务，派尚书省宰臣出外便宜行事，行使尚书省职权，叫做“行尚书省事”，简称为“行省”。金代行省只是中央派出机构，并不是固定的地方行政单位。大蒙古国时期，曾对一些投降的汉

族军阀，仿金代制度授以“行省”官号。后来，这一类官号渐被取消。另外，窝阔台在位时，曾在新征服的中原、中亚地区设置了三个大行政区进行管辖，汉族文人也把它们附会称为“行省”。

忽必烈即位后，遵用汉法，立中书省统领全国政务，地方则置十路宣抚司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时常以中书省宰臣挂上“行某处中书省事”的头衔，出外行使中书省职权，主持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事务。因事而设，事已则罢，没有固定的治所和辖区。大约到1283年前后，各处行省的设置已经渐趋稳定。鉴于以中书省宰臣行某处省事系衔偏重，因此改衔为某处行中书省丞相、平章，或左、右丞、参知政事，不再以中书省官入衔。这样，行省基本上已由中央派出机构转变成了固定的地方行政机构。1286年，铨定省、台、部、院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设平章政事为行省最高长官，以与都省（中书省相对于行省又称为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各行省的职官，通常为丞相1员（不皆设），从一品；平章政事2员，从一品；右丞1员、左丞1员，皆正二品；参知政事2员，从二品。元末，一些行省还曾额外“添设”平章、左右丞，参政等官。属官与都省分置左、右司不同，行省左右司合并为一，设郎中2员，从五品；员外郎2员，从六品；都事2员，从七品。下辖吏员包括掾史、蒙古必阁赤、回回令史、通事、宣使、知印等。此外，行省下面还设有检校所、照磨所、架阁库、理问所、都镇抚司等一系列附属机构。

除去一些因对外用兵而临时设立的行省建置之外，元代

正式设立的行省共有 11 个。这 11 个行省当中，征东行省置于高丽（今朝鲜），属于半独立机构，性质与作为中央直辖行政区的其他 10 个行省不同。通常所说元代的行省，主要就是指以下 10 个行省：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省以及甘肃、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大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地区；辽阳行省，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今属苏联的地区；河南江北行省，辖境包括今河南省，以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四川行省，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以及陕西、湖南两省部分地区；云南行省，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两国北部。湖广行省，辖境包括今湖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部，以及湖北、广东两省部分地区。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浙江、福建两省全境，安徽、江苏两省南部，以及江西省部分地区；江西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西、广东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岭北行省辖境包括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两自治区一部分，以及苏联西伯利亚地区。

以上 10 个行省，统治着元王朝 60% 以上的国土。十省之外，邻近都大都的地区，共 29 路、8 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山东三省全境，以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被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接统辖。管理腹里地区有关事务的一些专门机构，都直接统属于中书省下面的六部。吐蕃、畏兀儿地区，未建行省，分别由宣政院、大都护府统领。

附带介绍一下征东行省的情况。终元一代，高丽都臣属

于元王朝。1283年，因征伐日本，在高丽始设征东行中书省，后两度罢设，又两度建立。行省辖境，除高丽国外，还包括直属元王朝统治的二府一司。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可以自辟官属，高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也不上交都省。元王朝统治的二府一司地区，则由元廷任命的征东行省参知政事进行管理。

元代行省制度在中国地方行政史上有很大的独创性。省的名称，一直沿用到当代。元以前各朝代的地方行政，无论实行两级制（州、县或郡）还是三级制（州、郡、县或路、州、县），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中央与一级地方行政区之间空档过大的缺陷，加重了中央行政部门的负担。而元代行省既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本身又具有中央派出机构的特点，管辖范围相当大，这就使全国的行政体制基本上做到了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权力很重。按照《元史·百官志》的记载：“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郡，与都省为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代地方上也设立过行枢密院，但都是临时建置，旋设旋罢。地方军政大权，基本上都集中在行省手里。这种情况与隋唐以来地方权力渐被分割、削弱的趋势呈现出某种不协调。然而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形势下，又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元代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固然重要，巩固地方统治的任务则更为迫切。为此，各地军、政两方面必须密切合作，以便遇事能够迅速作出决策、采取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行省就成为军政合一的地方统治核心。另一方面，各行省只有丞相、平章之类高官才能掌握军权，而这些职务都

由蒙古、色目人充任，因此地方分权之弊事实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的弥补。在行省辖境的划分上，元代也比较注意相互钳制，一般不以自然屏障为边界划分行省，从而使行省不至于单独控制一块形胜之地。

路府州县和基层行政组织

中书省（腹里）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依次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有达鲁花赤、总管，为长官；同知、治中、判官、推官，为正官；经历、知事、照磨，管理案牘，统领吏属，为首领官。府设达鲁花赤、知府（或府尹）、同知、判官、推官、知事等官。州按户数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等，设达鲁花赤、县尹、县丞、县尉等官。路与省之间，还有道的设置，但通常不构成一级行政区。道可分两类：一是监察道，全国共设二十道肃政廉访司、掌地方监察事务。一是宣慰道，在一些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分道设立宣慰司，就便处理当地军民事务，是若干路、府与行省之间的承接机构。

元代路、府、州、县的设置上有一些混乱之处。路皆直属于省。府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平级；一类隶属于路，与属州平级、下辖若干县。州也有两类：一类直属于省，与路、直隶府平级；一类则隶属于路和直隶府。概而言之，省为一级地方行政区，路为二级行政区。府与州有时是二级行政区，有时是三级行政区，但府可以辖州、州不能辖府。州无论作为二级还是三级行政区，都只能辖县。因此县有时是三级、有时是四级行政区。换一个角度来讲，元代省、路、府、州、县的地方行政体制，基本上也可看作省、路（府、州）、

县的三级行政制度。省与县两级基本稳定，因此中间层次虽乱，而地方行政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到明代，就在元代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省、府（州）、县三级行政制度。

元代县以下的基层行政组织，主要包括坊里制和社制。坊里制在金、宋都已经存在。它包括农村中的乡、都组织和城镇中的隅、坊组织。农村中一般以乡统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但也有很多地方、都只设其一，乡、都统称为里。城镇中隅、坊的设置亦与乡、都类似。通常以隅统坊，也有地方只设隅或只设坊。隅、坊分别设隅正、坊正。充任里正、主首，或隅正、坊正，属于当役的范围，一般按田地、资产的多少进行选派。它们的职责主要是催输税粮、科差，督促徭役，维持地方教化，监督、防范和压制下层人民的反抗行为。

坊里制之外，元代还开始大力推行社制。社的组织在前代已经出现，但没有统一推行。元初，针对战乱之后经济残破、土地荒芜、人民流亡的情况，于1270年颁布农村立社法令，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措施。这项法令规定：以自然村为单位，原则上每50家立为一社。一村50家以上，立为一社。多至百家者，增设社长一员。不足50家的，与附近村落合并为一社。无论何种人户，都必须入社。社长由社众推举年高、通晓农事、家有兼丁的人担任，免去本人差役、专门负责督促农业生产。每社还设立义仓、社学，社众之间要在生产上互相协助。后来，社制与坊里制逐渐合而为一，社长除劝农外，还往往负责诸如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维持治安、处理诉讼等多种事务，成为里正的下属。与颁布农村立社法令大致同时，城镇立社制度也确定下来。城镇的社设在

坊下，每社户数一般多于农村。凡城镇居民均须入社，社长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封建法纪和地方治安。

元朝对边疆地区的行政管理

以上所叙述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有关情况，主要是对内地而言的。元代的边疆地区，无论是设行省还是不设行省，它们的行政管理都多少不等地具有和内地相异的特点。

漠北地区。漠北原是大蒙古国的政治中心。终元一代，它一直在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元代初期，漠北地区直隶于中书省统辖。1272年，在漠北设立和林转运司。约在1282年左右，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和城郭、工局、仓廩、屯田、驿站等事务。元成宗在位的后几年，漠北形势发生了变化。元军打败了窝阔台汗国的军队主力，将势力扩展到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窝阔台汗国的部众因而大批涌入漠北草原，达百余万口，需要加强管理。针对这种情况，在1307年，元武宗刚即位，就下令罢和林宣慰司，设和林等处行中书省，治和林。后来又更名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岭北行省是元朝中央政府在漠北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行省丞丁一般都以蒙古勋旧重臣担任，有节制诸王的大权。行省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元史·地理志》仅载有和宁路和称海宣慰司两个机构，设有府、州、县等建置。实际基层行政单位，仍然是蒙古社会中传统的千户、百户组织。诸王分地是岭北行省境内的一类特殊政区。诸王各有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民户、牧地，各置王傅、府尉和断事官等职进行管理，因而形成一批独立性较强的藩国。这

些藩国不直接隶属行省，但承袭王位、设官等事务都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

东北地区。元代东北地区民族成分复杂，除汉族、蒙古族外，还有契丹、女真、水达达、兀者、吉里迷、骨嵬等多种民族或部族。元初，在这里设立山北辽东道、开元等路宣慰司进行统治。1287年，罢宣慰司，设辽阳行省，下统七路一府。辽阳行省面积很大，东南与高丽接壤，东到大海，辖境包括今天的库页岛在内。州、县等下层统治机构，基本都设在行省中、南部的诸路。北边的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土地旷阔，人民散居”，“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乐（《元史》卷59《地理志二》）。元代在这里设立了桃温、胡里改等5个军民万户府进行统治。

云南地区。蒙古征服大理国之后，在云南地区设置了将近20个万户，下辖千户，兼摄当地行政。1274年，始设云南行省，下辖37路、2府，边陲地区又设立若干宣慰司、宣抚司或招讨司。与岭北、辽阳两个边疆行省不置州县或州县稀少不同，云南行省的州县设置比较普遍，因此在形式上它的行政体制与内地行省没有什么两样。云南行省的统治的最大特色，在于各级地方机构广泛任用土官的制度。大抵行省、宣慰司两级机构中，主要由流官大员坐镇主治，兼置土官。路（宣抚司、招讨司）一级机构中，土官地位已经相当重要，但仍有流官见于记载。州、县等下级机构，则绝大部分都是任用土官进行统治。土官一般由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担任，有品秩而不入流，即使犯罪，也仅罚不废。死后由子侄兄弟袭职。没有子侄兄弟，则妻承夫职。

畏兀儿地区。畏兀儿也就是宋代的高昌回鹘，据有以哈

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别失八里为中心的地区的君主称为亦都护（突厥语“神圣陛下”之意）。畏兀儿较早降附蒙古，蒙古保留亦都护世袭统治畏兀儿的权力，又在哈刺火州、别失八里等重要城市派驻达鲁花赤监督统治。元代前期，畏兀儿地区成为元朝中央政府与察合台、窝阔台两汗国作战的一块前沿阵地。1286年，元廷在这里设立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同时，还在亦都护下面设立畏兀儿断事官，管理畏兀儿人的民政事务，后来畏兀儿断事官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机构——大都护府，设大都护、同知、副都护等官，秩从二品。

吐蕃地区。元代吐蕃作为一个单独的大行政区，由中央的宣政院直接统辖，没有另设行省。关于宣政院这一机构，我们在前文已经专门提到过。宣政院以下，吐蕃地区共划分为三道，分别设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进行统治。三道宣慰司以下，分别设立元帅府、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万户所、千户所等统治机构。邻近内地的藏、汉各族杂居地区，则仿内地制度设立路府州县。从宣慰使到万户各级官员，皆由宣政院或帝师荐举、皇帝予以任命。其中有的从朝廷选派，有的则直接任用当地僧俗上层人物。万户以下较低的地方官，一般都由当地僧侣首领充任，可以世袭其职。

四、军事、法律制度

元朝的军制在蒙古军制的基础上，混合了中原和南宋的

多种因素，逐渐完备。实行军民异籍，军民分治的政策，使军职不得干预民政，军官世袭。军队的调遣和军官的升迁由枢密院掌握，枢密院的长官只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兵部只管郡邑的邮驿屯牧。军队的编组为牌（十户）、百户、千户、万户。全部军队分宿卫和镇戍两系统。宿卫军有怯薛、五卫（左、右、前、后、中）亲军，是中央禁军。怯薛军由贵族子弟充任，负责皇帝和宫城防卫，由皇帝直接统率；五卫亲军负责京城和腹里的镇守，隶属枢密院，也是皇帝直接掌握的精锐部队。镇戍军基本上按士兵的民族等级分编，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蒙古军由蒙古人、色目人组成，都是骑兵。探马赤军最初由蒙古各部抽出的精锐组成，后来有色目人、汉人参加；是一支专门打前锋、攻城池、留驻占领区的骑兵部队。汉军是在金朝汉族地主（汉人世侯）武装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主要是步兵，也有骑兵和水兵。此外，有些地方不出戍的乡兵，用于保卫该地区的稳定。这些都是正式军队，各地驻军有屯田，军户另编户籍，子孙世袭。元朝设有管理军籍机构，称奥鲁（意为营盘），负责管理军户、签发军籍和征收封椿（或作装）钱。

元朝的军制特点是集军权于中央，以保证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为镇压各族人民反抗，元政府在全国遍驻军队，蒙古军和探马赤军驻在河洛山东，据全国心腹之地，监视汉人；汉军驻在淮河以南，以防南人。新附军驻在各地镇戍军之间，由各行省的蒙古人、色目人两个长官统辖，而且元朝还屡次下令禁止汉人执持兵器，如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江西行省规定新附军的兵器平时入库，遇事发放，使蒙古人紧紧掌

握军权。

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颁行了《至元新格》，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但只是一个法律大纲。后经一再修订，到1323年（至治三年）元英宗时又颁布《大元通制》，规模宏大，分诏制（94条）、条格（27目，1151条）、断例（11目、717条）、别类（577条）等四部分共2539条。同时又修定《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对《通制》的修改补充。《大元通制》使元代法典基本上定型。这部法典的最基本特点是在阶级压迫之外，增加了民族压迫的内容。分民族为四个等级，保障了蒙古贵族的特殊权力，同时，还确认了蓄养奴婢的合法性，是蒙古传统法的延续。

五、重吏轻土的官员铨选制度

元代政治制度的二元性，不仅表现在由中央到地方职官、机构的设置上，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在官员铨选制度上。自隋唐时起，科举制度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具有代表性的选官制度，官员登用有了比较理性化、普遍化的评价标准，历来宋、金、明、清，大体不变。唯独元代的情况与前后诸朝有些不同。元科开设时间很短，取士人数相当少，而且大都不获重用。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从怯薛中选拔的上层蒙古、色目贵族以及极少数汉族勋贵所垄断。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则以吏员为主。叶子奇说：“仕途自木华黎王等回怯薛大根脚出身分任省、台外，其余多是吏员。至于科举取士，止是分万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草木子》卷4下《杂俎

篇》)。这段话概括出了元代官员铨选制度的主要特征。

官员铨选概述 1264年，也就是忽必烈即位的第五年，罢诸侯世守，裁并路府州县，定官吏员数、品级，立迁转法。至此，任命、铨调各地官员的权力完全划归中央，有元一代的铨选制度基本确定下来。1277年，中书省又奏准颁行了《循行选法体例》，对内外官员铨注、迁转、升降等的规定，更加详细、系统。

元代制度，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三大机构委任下属官员，可以自行拟人闻奏。除此以外，其它机构百官的任免进退，都必须经过中书省。职官的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主管，正七品以上由中书省决定，三品以上，则要报请皇帝批准。六品到九品的官职，由中书省牒署拟授，称为“敕授”；一品到五品，由皇帝下制书任命，称为“宣授”。

官员的迁转升降等，分为三个系统。随朝诸衙门及行省、宣慰司官，常例30个月为一考，一考升一等；外任地方官，常例3年为一考，一般2—3考升一等，蒙古、色目官员不在其限；匠官只在管匠官范围内流转，对外任地方官有所谓“五事”的考察标准。五事即“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平”。地方监察机构以这“五事”为标准，对地方官进行考察、保举，再由吏部进行升迁降转。五事俱备为上选，在应得品级上再升一等。四事备，则在应得品级上添加一资。三事备为中选，按常例迁转。四事不备，在应得品级上减去一资。五事不备，则降一等叙用。无论内外官员，满考后评价政绩，除监察机关提供政绩材料外，还要由原所在机构提供一个类似于鉴定的“解由”。“解由”的含

义，“考满职除日解，历其殿最为由”（徐元瑞《吏学指南·榜据》）。它一般有专门的体式规范，内容包括该官员的祖宗三代、年龄籍贯、民族姓氏、出身根脚、人仕资历、请俸时间、身体状况、有无过犯、治政成效、何人保举，等等，实际上也具有官吏档案的性质。为了保证吏部能够公正合理地迁转官员，元代还专门安排御史台官在吏部监选。

元代还制定了官员承荫制度。元成宗在位时，规定：正、从一品官员之子可以承荫正、从五品官，正、从二品官员之子可以承荫正、从六品官，以下依例递减。正、从五品官员之子即可承荫正、从九品官，六、七品官员之子就只能承荫不入流品的吏职了。品官子孙承荫，以一人有限。武官基本上都是世袭，阵亡则子弟按原等级袭官，病故则降二等。承荫是元代官员选拔的一个来源，但比例很小，社会影响也不大。一般研究元代官员的选用，主要还是从怯薛入官、吏员出职、科举制度三条途径入手。

怯薛入官 我们在前文叙述怯薛对元代政治的影响时，主要是从怯薛集团对朝政进行外在干预的角度进行论述的。事实上，怯薛不仅能对朝政进行外在干预，而且还可以直接进入省、院、台等中央机构充任要职，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许衡《庚申外史》）。所谓“根脚”，系指社会出身。怯薛作为皇帝的私人亲军，原则上皆世袭，其成员都是蒙古贵族和其它各族勋贵高官子弟。因此，怯薛出身被称为“大根脚”，最为显贵，它既是元代蒙古、色目人入仕的主要途径，也是元代高级官员的基本来源。当时人说：“凡入官者，首以宿卫近侍”（朱德润《存复斋

集》卷四《送强仲贤之京师序》)。

怯薛是元代政治上的特权阶层，但其中每个怯薛成员所享受的特权，又因门第、与皇帝亲疏等关系不同而有所不同。以入官而言，“或大而宰辅，或小而冗散，不可齐也”（《元文类》卷40《经世大典序录·治典·入官》）。怯薛中地位最高的是怯薛长。成吉思汗以四大功臣博尔忽（？—1217年）、博尔术（生卒年不详）、木华黎、赤老温（生卒年不详）分任四怯薛长，并使子孙世袭其职。其中，赤老温的后人后来被拨归窝阔台之子阔端（1206—1251年）统属，不再担任大汗的怯薛长，到元代社会影响已经很小。空下来的一个怯薛长职位也大多从博尔忽等三家子孙中选人担任。这三家在元代成为除皇族之外最有权势的家族。“朝廷载功选德，必首三家焉”（《元文类》卷23；元明善《太师淇阳忠武王碑》）。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博尔忽等三家子孙的仕进情况作了不完全的统计。统计结果表明：三家子孙中袭世爵和担任三品以上官职的差不多占了总数的75%，做到正一品官的也达15%。其中不少人年纪轻轻就出任高官。如木华黎后裔安童（1245—1293年）20岁拜住、23岁即出任中书右丞相；博尔忽后裔瓜头（1286—？年）22岁遥授右丞相，拜太师，23岁兼知枢密院事。这对按正常程度提拔的官员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元顺帝时，右丞相博尔术后裔阿鲁图（？—1351年）受到御史弹劾，竟对他人说：“我博尔术后裔，岂以丞相为难得耶？”当即辞职（《元史》卷139《阿鲁图传》）。

其余怯薛成员中，像必阁赤（掌文书）、宝儿赤（掌服膳）、速古儿赤（掌服御）等执事官，都是世袭职位，比一般

家庭出身的怯薛成员地位要高。《元史》中有传的必阁赤、宝儿赤、速古赤一共 26 人。他们初入仕的官阶大多在五品到三品之间（18 人，占 69.2%），最后也大都做到了三品到一品官（21 人，占 80.7%）。一般的怯薛成员，可以通过武职世袭、文职荫叙的正常途径得官，更主要地是依靠怯薛长推荐、皇帝直接加以拔擢，不必经过中书省议奏。这种情况，在当时被称为“别里哥选”（“别里哥”为蒙语符验、凭证之意）。“别里哥选”是怯薛入官的主要形式。据元代中期姚燧（字端甫，号牧庵，1238—1313 年）的估计。怯薛入官人数，要占到当时入官总人数的 10%（《牧庵集》卷四《送李茂卿序》），这个比例乍看不算大，但与 11 万名怯薛成员在 6000 万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比较，就会发现它是相当惊人的。

终元一代，怯薛组织从未纳入政府官僚体系，平常的怯薛成员全都是白身人。但怯薛入官的情况不仅数量大，而且有很多是骤列高位，拔置要津。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独特的。它实际上主要建立在元代皇帝与怯薛成员之间特有的主从关系上。怯薛成员无论入官或退職，这种主从关系都不受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怯薛成员与政府高官本属于同一贵族集团。无官职的怯薛成员可以随时出任外朝官，而出身怯薛的高官也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怯薛执事身份，“昼出治事、夜入番直”（《元史》卷 100《刑法志一》），并未丢掉本职工作。元代皇帝正是通过这种怯薛成员与政府职官之间的往来流动，对庞大的官僚机器实施有效的控制。

吏员出职 吏员出职，即指吏员脱离吏职、出任官职，它是元代最主要的一种入仕途径。元代吏员名目繁多，比较重

要的有以下 10 种：令史、司吏、书吏、必阁赤（以上负责处理公文案牒）、译史、通史（以上负责翻译）、宣使、奏差（以上负责传达命令、汇报工作）、知印（负责掌管印信）、典吏（负责发送、保管文书）。这 10 种吏员，根据所在衙门的品级高下、吏职地位的主次高低、执役时间的长短，都可以出职担任不同品秩的官职。元代吏员出职制度纷繁多变。

元代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主要吏员都能够出任任官。其中，基层官府吏员出职多任流外官，而且必须考满。中、上级别衙门的吏员，即使不考满也可以根据执役时间长短出任不同官职，考满则直接补六、七品官，为以后的升迁奠定了基础。中上级衙门吏员的出职前途虽然优于下级衙门吏员，但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后者也可以渐次升入中上级衙门担任吏职。吏员出职制度的系统化和全面推行，造成了官员多来自吏员的现象：“我元有天下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六《善余堂记》）。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每年由吏员升官入流品者即近 1000 人。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有元一代科举取士人数的总和。

与中国古代其它王朝相比较，元代的吏员出职可以说是一项比较特殊的制度。它产生的原因有三：一是对金代有关制度的继承，二是蒙古贵族统治意识的渗透，三是元代社会政治的现实需要。在元以前，金代已有关于吏员出职的规定，但尚未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随后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在观念上并没有汉族社会官、吏概念的严格区别，相反对前代作为官员主要来源地位较高的儒士却有“迂腐”的坏印象。为了迅速运转国家机器、巩固统治、满足聚敛财富的需要，他

们在选用官员时很自然地就把目光投向了吏。在上述特定历史背景上产生、完善起来的吏员出职制度，在盛行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随着元代的灭亡，很快地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吏员出职制度对元代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通过吏员出职这一途径入仕相对容易，但受执役时间因素的限制，要想做到高官是很困难的。这就既达到蒙古统治者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稳定统治基础的目的，又维护了建立在民族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用人格局。其次，吏员出职的盛行，大大提高了吏的社会地位，导致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巨大改变。很多人在做到下级官员之后还要想方设法钻入中央各部门担任吏员，再求出职，以加快升迁速度。儒士习学吏业也成为一时风尚。这在其它朝代都是很难想像的事情。再次，吏员出职的盛行，加剧了元代政治腐败的速度。吏员出职的各类标准虽然纷繁复杂，但最根本的是一条还是时间，也就是资历。由吏入仕的官员，大多文化素质低下，并没有巩固统治的长远目标，只知一味贪污聚敛、营私舞弊。元代重吏轻儒，官府中吏员权重，也导致吏弊百端、行政效率低下。元代政治长期不上轨道，与吏员出职制度有不可否认的联系。

科举制度 自隋唐以来盛行 600 余年的科举制度，到元代戛然中断了半个世纪之久。大蒙古国窝阔台汗在位第九年，即 1237 年，曾采纳耶律楚材等人的建议，下旨中原诸路以论、词义、经赋三科考试儒生，中选者都蠲免赋役，任命为本地议事官。考试于次年举行，史称“戊戌选试”。戊戌选试是元代最早一次恢复科举制度的尝试。然而，这一尝试事实上失败了。选试在执行时就被蒙古统治者同“考试僧道”混在了

一起，中选儒生只得到与僧道相同的蠲免赋役的优惠。除议事官的规定，则基本上未付实施。忽必烈即位后，推行汉法，恢复科举的问题又重被提出来，但即屡议不果。元代前期 50 余年，科举一直处于停止状态。儒士传统的做官途径既已断绝，只好通过补吏、教官两途入仕。补吏主要是指岁贡儒人为吏，名额很少。通过教官入仕，则升迁极慢。从最低一级的直学升到最高一级的教授，要经过层层考试，最快也得十几年。而教授仅是从八、正九品，想做高官仍须进入中央官府充任吏职。大多数人尚未做到下级州县官，就到了致仕年龄。况且全国的教官名额，加起来也只有大约 4600 人。当时人说：入仕者宿卫（怯薛）占了 10%，由吏员出职者占了 85%。而靠做教官升上来的只有 5% 左右，仅占吏员出职比例的一个零头。

元代前期科举长期停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忽必烈立国之始，官员来源比较充足，另辟入仕途径的客观需要并不迫切。其次，科举制度长期推行积累的流弊，造成了蒙古统治者对它的不信任。再次，忽必烈在理财问题上与朝中诸儒的观点分歧，加深了他对科举的排斥态度。最后，吏员出职制度的逐步完善、系统化，进一步阻碍了科举制度的推行。而贯穿其中、把这些具体原因综合在一起的因素，则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被统治地区、被统治民族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

直到元代中期，受儒家教育较深的元仁宗即位以后，为了整顿吏治、消除吏员出职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才决意恢复科举制度。1313 年，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元代科举每三

年举行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乡试是地方一级考试，蒙古、色目人试二场，汉人、南人试三场。命题答卷，规定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经书的注疏为依据。乡试科场全国共设 17 处，从中共选 300 人到大都参加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相同，录取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 25 名。最后参加殿试，试策一道。殿试诸生不再被黜落，只是重新厘定等次。以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一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秩正八品。

元代科举一共开科 16 次。其规模，无论就取录人数还是进士的地位前途而言，与唐、宋时期相比都很不足道。十六科共取士 1200 余人，仅占相应时期文职官员总数的 4.3%。这个比率，大体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 1/10。唐宋进士在官僚构成中占有极优越的地位，朝廷主要大臣大都是进士出身。元代则不然。复科后 50 余年中，可以断定是由科举入相的只有 9 人，其入相年数总和仅占同时期入相官员在职总年数的 3% 强。进士中官至省、部大臣、行省宰相、路总管一类较高高官职的，就现在所知，也不超过六七十人。大部分进士，不过仅终于州县卑秩而已。另外，元代科举还有一个为前代所无的特点，即体现了民族歧视政策，优待“国族”，压抑汉人。因此，科举的开设，对元代前期既定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有人说：“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徐一夔《始丰稿》卷五《送赵乡贡序》），这话是很恰当的。然而，元代科举最早将程朱理学规定为考试取士的标准，这

一点对后代却有很大影响，沿袭五六百年不变。

六、元朝的民族分化政策

元朝统治集团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还有色目等各族的上层统治者；而被统治的人民，则是以汉族为主体，包括蒙古族下层农牧民在内的各族人民，他们遭受着残酷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蒙古贵族统治者在借鉴金朝所推行的民族分化政策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将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而且在选任官吏、法律诉讼、科举条例、名额和待遇等方面，均有一系列不平等的规定。

从民族成份上看，各等人中包括若干族、部、种。蒙古族为第一等，系元朝的“国姓”。据拉拖特《史集·部族志》载，蒙古人由两部分组成，其一为与成吉思汗皇室出于共同祖先的尼鲁温蒙古人，有泰赤乌、兀鲁、忙兀、札只刺等 20 余部；其二是被称为迭列列斤的蒙古人（指一般蒙古人），有兀良哈、弘吉刺、伯牙兀等 10 余部。此外，札刺亦儿、塔塔儿、蔑儿乞、斡亦刺、八剌忽、克烈等部，在元代也被看作蒙古人。但在陶宗仪《辍耕录·氏族》中记有蒙古氏族 72 种（当然，其中有 18 种是相互重出，钱大昕在《元史氏族表》中已指出）。

色目人为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包括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据《辍耕录·氏族》称有 31 种，诸如钦察、唐兀、阿速、秃八、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乞失迷儿

等（其中也有同名重见，异译并存之误）。据《元典章·刑部》载，大德八年（1304年）规定，除汉儿、高丽、蛮子外，俱系色目人。这些色目人多属于西北地区各族，还有些是属于中亚等地。成吉思汗扩张领土之后，将所占领的广大地区分封其诸子。长子术赤的封地为钦察汗国（也译金帐汗国），据有花刺子模和康里国故地，领有今额尔齐斯河以西，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其子拔都西征，又扩大了领地，曾在伏尔加河下游建都萨莱城。次子察合台初领有西辽河之间的地区，称察合台汗国。初建都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水定镇西北）。三子窝阔台封于乃蛮故地，则以叶密立和霍博两地为中心，包括新疆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称窝阔台汗国，建都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而幼子拖雷按照蒙古幼子守产的习俗，主要领有蒙古本土。

汉人（也称汉儿、乞塔、札忽歹）为第三等，一般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省人，东北的高丽人也属此等。据陶宗仪《辍耕录》载，汉人有8种，即契以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南人（也称蛮人、囊加歹、新附人）为第四等，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和河南行省南部）各族，大部分为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元统治者根据被征服的先后将汉人分为两等，以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便分而治之。

上述四等人在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蒙古贵族居最高统治地位，享有很多特权；色目人中上层分子则

是被蒙古统治者利用为帮手，对各族人民进行压迫，故他们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贵族，而高于汉人和南人；汉人中少数官僚地主在元朝被笼络利用，而其余广大人民与南人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南人在四等人中处于最末等，其地位还不如汉人，就连充任官吏的南人在与汉人出身的官吏发生争执时，也要忍气吞声。可见，元朝推行四等人制，蒙古、色目贵族利用民族压迫政策欺凌汉人、南人，广大汉人、南人劳动者更处在最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况之下。不过，也应指出，蒙古统治者实行这种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政策，只是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并没有给广大蒙古劳动人民带来好处。

第三节 元朝的 统治者的内部斗争

一、平定李璘之叛

李璘是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的儿子。红袄军起义最早爆发于 1211 年，他们在杨安儿、刘二祖等领导下曾与金朝统治者进行过英勇斗争，后来杨安儿、刘二祖等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之妹杨妙真和李全领导，两人结合后队伍逐渐壮大。

1218年，李全降宋，他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一面在金宋之间要挟，博取高官厚禄。1226年，李全投降蒙古，换取了“山东淮南行省”的官职。1230年10月，李全发兵突然袭击南宋的扬州，次年败死。杨妙真逃回山东，子李璿承袭益都行省职。

从那以后，李璿在山东擅权达30余年之久。他继承其父的衣钵，或假名攻宋，向蒙古要钱要粮要官；或联宋反蒙，发动叛乱。其真正目的是要把山东变成他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

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不久，加封李璿为江淮大都督。李璿乘机谎报敌情，大修益都城堑，骗取赐银、军饷、军械。他的岳丈王文统这时已当上了中书平章政事，他们内外勾结、互为表里，选择时机准备叛乱。

1262年（中统三年）2月，作为朝廷质子的李璿儿子李彦简溜回山东，这时阿里不哥的叛乱尚未平定，李璿以为时机已到，攻占益都、济南，发动武装叛乱。他将涟（今江苏涟水）、海（今江苏连云港）等3州献给南宋，南宋封他为保信宁武军节度使。其实，这是李璿害怕蒙宋联合夹攻所耍的花招。因为在这以前，李璿攻宋都是不遗余力的，这次叛乱又未事先与南宋联系。为了壮大叛乱力量，李璿四出联络汉族地主武装，但几乎无人响应，山东人民也纷纷逃避，叛乱势力十分孤立。

忽必烈得知李璿叛乱后，立即杀了王文统，命诸王合必赤总督各路军马，进攻李璿，来自河南、河北、山东各地的蒙古军、汉军纷纷围攻济南，困守在济南的李璿无计可施，被迫投大明湖自杀，由于水浅未死，被俘杀。1264年（至元元

年)，李璫，4 余党毛璋再次发动叛乱，结果兵败被杀。

忽必烈迅速平定李璫叛乱，对于巩固刚夺取的政权、对于巩固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对于避免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具有很大作用。李璫之死还有杀鸡吓猴的作用，投降蒙古拥有地主武装的北方汉族军阀，从此更加死心塌地为新王朝服务了。

二、海都、乃颜之乱

中统建元和平定阿里不哥后，守旧的蒙古贵族对忽必烈推行“汉法”依然强烈反对。西北藩王遣使到朝廷来，气势汹汹地责问忽必烈：“蒙古风俗制度与汉法素不相同，现在你竟留居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全都遵用汉法，到底是什么原因？”因此，守旧与推行汉法的矛盾，在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尖锐。

阿里不哥投降后。守旧的藩王以争夺汗位的名义，继续发动叛乱。其中以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势力最大，叛乱的时间也最长。

海都以其父合失未能承袭汗位，即自己要求袭汗位为由，一直心怀不满，但苦于兵力不足，只好等待时机。当阿里不哥在和林称大汗并发动叛乱时，他竭力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后，海都即返还其在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东南）的封地，勾结术赤后裔诸王，占有窝阔台汗国封地，组织叛军，时时企图南下。忽必烈为了阻止海都势力的扩张，册封八剌为察哈台汗国之汗，以争取察哈台汗国服从中央夹击

海都。察哈台汗国军队在铎儿河击败海都，海都又求助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击败八剌。后来，海都请窝阔台孙乞卜察克调解，双方结盟，海都势力反而伸展到察哈台汗国境内。八剌死后，海都于1272年（至元九年）立八剌子笃哇为汗。海都与笃哇勾结在一起，在西北地区不断进行骚扰。

1275年（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率诸王镇守西北，蒙哥子昔里吉、诸王脱脱木等随行。那木罕驻守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西北）。脱脱木是成吉思汗弟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与忽必烈一直不和，蓄谋叛乱已久。1277年（至元十四年），脱脱木勾结阿里不哥子药木忽儿、察哈台子撒儿班等，劫持北平王那木罕，立昔里吉为帝，率叛军进攻和林。忽必烈急命正在进攻南宋的主帅伯颜率土土哈等北征。伯颜用断绝粮道的办法阻困聚集在鄂尔浑河的诸叛王。土土哈在土拉河和鄂尔浑河两次大捷。1278年（至元十五年），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叛军内讧，脱脱木又立撒儿班为帝，药木忽儿不服，执送脱脱木至昔里吉处，脱脱木被杀。撒儿班又执昔里吉押送至忽必烈处，忽必烈将昔里吉流放至海南岛，后来死于该地。

在昔里吉等发动叛乱时，海都又乘机占领阿力麻里，骚扰天山南北。忽必烈特置别失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派兵戍守。

为了防止西北藩王的叛乱势力与东北藩王的叛乱势力相联结，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忽必烈改山北辽东道宣慰司为东京行省，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早与海都有勾结的帖木格斡赤斤的后裔乃颜，立即纠集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

温后裔哈丹等发动叛乱。海都闻讯后，答允率 10 万军队前来汇合。忽必烈一面让伯颜驻军和林，阻止海都东来，一面率军镇压乃颜。1287 年（至元二十四年）乃颜被俘，忽必烈将其处死。1288 年（至元二十五年），忽必烈命皇孙铁木耳率军镇压哈丹，哈丹逃至高丽。1292 年（至元二十九年），在高丽军民的配合进攻下，哈丹兵败自杀。

忽必烈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置辽阳行省统辖各路，并在叛王封地内设万户府。这些措施大大削弱了藩王的权力，巩固了东北地区的统一。

正当忽必烈镇压东北叛乱诸王时，海都、笃哇等气焰更加嚣张了。1289 年（至元二十六年），74 岁高龄的忽必烈决定再次亲征。海都得知忽必烈亲征，急忙逃遁。忽必烈仍命伯颜负责西北军事。到忽必烈去世前，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金山之外，平定西北叛王的战争基本上取得了胜利。

忽必烈在位 30 多年中，与分裂割据势力和叛乱势力进行了十分激烈的斗争，通过在军事上对叛乱势力的坚决镇压，对巩固元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阿合马、桑哥事件

忽必烈统治的 30 多年，是从连年不断的战争向全国安定过渡的时代。诸王叛乱、南下灭宋、镇压反元武装起义，迫切需要军饷；百废待兴、恢复封建经济，迫切需要金钱。因此，谁善于理财，谁就受到忽必烈的重用。忽必烈时期主要帮助他管理财政的是花刺子模人阿合马、汉人卢世荣和畏兀

儿人桑哥。他们三人在旧史书里是大大有名的奸臣，其实他们做的事未必每件都是坏事，在理财上他们都有一套本领，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忽必烈是办不成这许多大事来的。正因为忽必烈宠信他们，他们自以为理财有了功，就居功自傲、专权不法，干了不少坏事，引起了统治集团中其他人的不满，最后遭到杀头的下场。

1262年（中统三年），阿合马任诸路都转运使，专理财政，他在钧州（今河南省禹县）、徐州（今江苏徐州）兴办了炼铁业，每年产铁103.7万斤，铸成农器20万件，换成官粮4万石；又因太原私盐盛行，盐课收入大减，他大大增加了当地赋税，不论僧道军民户，一律不得免税，于是收入大增。这两件事办成后，忽必烈非常高兴，升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从此，阿合马深受忽必烈宠爱，日益骄横，连中书右丞相安童也不放在他眼里，左丞相史天泽等也常被 he 弄得很窘。他还让他的儿子忽辛当大都路总管，又不通过中书省，安插自己的亲信任要职。还依仗自己的理财特权，派人经商，从中获得巨额财富。1278年（至元十五年）中书左丞崔斌上书，揭露阿合马任用亲信，一家身居要职等罪，忽必烈罢免了阿合马子侄们的职务，但仍对阿合马十分信任，并认为他有当宰相的才能。1280年（至元十七年），阿合马以清理江淮钱谷的名义，打击诬陷异己。当时崔斌已调任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马乘机诬陷他与江淮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等盗官粮40万、擅自更换朝廷任命的官员800人，加以杀害。皇太子真金知道这件事后，立即派人去制止，竟来不及了。

阿合马搜刮钱财，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大失人心。1282

年(至元十九年)3月,益都千户王著秘密铸造了一个大铜锤,准备击杀阿合马。这时正好忽必烈和皇太子到上都去了,阿合马留守大都。王著知道皇太子很痛恨阿合马,就伪装皇太子返京作佛事并假传太子命令,命阿合马等中书省臣来见,当阿合马来迎接假太子时,王著对他加以痛斥,并用铜锤把他打死了。王著被捕处死,临刑时高呼:“王著为天下除害,现在虽然死了,日后必有人将我载上史册!”后来忽必烈知道了阿合马的罪恶,下令剖棺戮尸,他的死党和忽辛等4个儿子都被杀。

阿合马死后,朝廷里没有人再敢言及理财的事了。总制院使桑哥推荐卢世荣到朝廷来理财,忽必烈任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任后提出改革钞法、制定市舶条例、将没收来的各地权豪私造的铁器卖掉以充实常平仓、官营酿酒、于上都等地收购羊马选蒙古人放牧、选拔阿合马原来任用过的一些理财能手等一系列主张,忽必烈一一采纳。卢世荣得宠后,引起了一批官僚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他干了不到一年,就被杀了。其实卢世荣被杀是有点冤枉的,他的理财措施有不少还是可取的,只是因为触犯了不少富豪、官僚、贵族的利益,在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很深的情况下做了牺牲品。

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卢世荣死后不久,忽必烈起用桑哥理财,第二年任命为平章政事。他更改钞法,发行至元钞,解决了朝廷的财政危机,于是声名大著,升任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接着,又清理江南六省钱谷,增加江南赋税和盐酒醋税,大大加重了剥削,引起了天下骚动。他的权势

非常大，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特地为他立了德政碑。桑哥更加跋扈，于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意调动内外官员，官爵刑赏全凭钱买和贿赂，引起了一批朝臣的反对，纷纷上奏弹劾。当时百姓失业，起义烽火连年不断，忽必烈深感事态严重，为缓和社会矛盾，于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把桑哥杀了。在抄家时发现桑哥收藏的珍宝至少有宫廷里的一半那么多。

忽必烈统治时期发生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事件，牵涉面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它反映了元朝初期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很尖锐的，也是很残酷的。

四、真金继行汉法及其失败

在忽必烈后期，汉法派与理财派之间斗争激烈。当忽必烈本人趋于消极保守，往往倾向于理财派的时候，真金成了元廷中力图继续推行汉法的主要代表人物。

真金是忽必烈的长子，1243年生，从1252年起，正是忽必烈本人让他接受了长期的儒家教育。真金成年时，正值忽必烈创建元朝，他追随父亲经历了元初激烈的政治斗争。1262年他被封为燕王，守中书令，后又兼枢密院使。不过长期以来朝政是由忽必烈亲自掌握的。

忽必烈推行的汉法，上面已经叙述。此外，汉法派还重视两件事，那就是行科举和定国本。

行科举问题，争议很多。不仅蒙古贵族和西域官僚极力反对，而且在汉人官僚儒士中意见也不一致。因此，科举制

度长时间内得不到推行。

定国本问题，也十分尖锐。从成吉思汗起，汗位继承制度就不明确，继位事务混乱得很。窝阔台以后，每逢汗位继承都形成一次贵族内部的激烈斗争，导致大蒙古国政局的严重不稳。元朝建立以后，汉法派认为汗位继承的混乱状态必须改变，应当确立中国传统王朝的嫡长子继位制度，并按照这样的制度预立皇太子，这是使王朝稳定、国家久长的根本大事。后来阿合马控制朝政，破坏汉法，汉法派更把立国本视为当务之急，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皇储就是真金，而真金是坚决支持汉法的。1267年，姚枢议政时已十分强调“建储副以重祚”。第二年，陈祐上《三本书》，又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陈祐说：“这是天下公论，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确定嫡长子继承、预立皇储的制度是多数蒙古宗室成员难以接受的。但是，当时忽必烈具有最高权威，新制度能否确立，关键还在于忽必烈是否同意。汉法派儒臣对忽必烈反复劝说。有一次，忽必烈驿召张雄飞，问他：“当今什么是急务？”张雄飞说：“老百姓有点积储，还懂得托付给后代。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不早立皇储呢？如果蒙哥皇帝懂得这个道理，陛下今天能坐在皇位上吗？”张雄飞讲时，忽必烈躺着，他听到这最后一句话，匆忙坐了起来表示赞同。忽必烈为了传子传孙，接受了建皇储的建议。1273年3月，他正式册立真金为皇太子。

真金完全奉行儒学，对阿合马十分厌恶，见到他就面有怒色，甚至当了忽必烈的面都责打他。真金为皇太子后，在

东宫自有个怯薛班子和一批官员，形成了一支新的汉法派力量。1275年安童镇北后，真金成了汉法派的靠山和主要代表人物。

阿合马被杀事件已如上述。表面上，王著是假借真金的名义杀了阿合马。但是，真金与这个事件的关系，史书中有掩复。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是张易，而在审理过程中，真金及其亲信张九思有意掩盖了张易的案情。在处理阿合马问题时，真金的态度更加明朗。和礼霍孙担任右丞相，真金对他说：“阿合马死于盗手，你担任了中书丞相，凡是‘便国利民’的事，你不要怕改弦更张。如果发生阻挠，我一定全力支持。”和礼霍孙正是恪遵真金意旨，严惩了阿合马一党，并准备继续推行汉法。

阿合马一党遭到严惩的情况表明，当时汉法派在真金支持下还有相当实力。汉法派老臣多半已卒，但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汉法派官员。他们还悉心培养和联络了一批支持汉法的蒙古显要。而且，新的汉法派官员，除汉人外，还有南人。忽必烈在宋亡后大量召用了南人儒臣，这些南臣与汉臣存在一定矛盾，其中有的人后来甚至与桑哥合流，但大部分南臣也是主张维持汉法的。现在，真金为了继续推行汉法，又进一步征召和起用儒士。他对儒臣们说：“你们学孔子之道，今天才开始得以应用。把你们平生所学到的，努力实行吧。”他甚至明确要求蒙古生员主要学习汉文，而对他们学习蒙古文不以为然。忽必烈迟不推行的科举，在1284年也由和礼霍孙旧事重提，在真金的支持下，准备推行。

然而，真金与他的父亲已有很大距离，忽必烈已不似当

年。阿合马死后，朝廷之中讳言财利，这不符合忽必烈的心意。1284年11月，忽必烈终于罢去和礼霍孙等人官职，重新任命从北边返回不久的安童为右丞相，并任命原先投靠阿合马的卢世荣为右丞。卢世荣苛刻诛求，真金认为他不仅害民，而且是“国之大蠹”。卢世荣为右丞不到半年，御史陈天祥即进行弹劾，得到安童的支持。忽必烈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不得已在1285年11月又诛杀卢世荣。结果，“中外归心”，真金的威望更高了。

但是，这时发生了奏请忽必烈禅位事件。大约是1284年底或1285年年初，南台御史上奏说，“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给皇太子，皇后不应当干预朝政（当时忽必烈已通过南必皇后来过问朝政）。”这显然是汉法派的一个大胆行动，其用意昭然若揭。可是，这样的行动只能引起忽必烈的恼怒。真金听到消息，深感不安。御史台都事尚文把这个封章秘藏起来。阿合马的余党答即归阿散等得知，奏请钩索天下钱谷，清查各官衙案牍，实际上企图揭发这事。尚文告知安童、月律鲁（御史大夫）后不让清查。答即归阿散等立即奏闻，忽必烈便下敕索取这个封章。事急了，安童、月律鲁去见忽必烈，先揭发答即归阿散等人过去的罪恶，同时发动多人奏劾，使忽必烈迁怒于他们，将他们问罪。但是，真金受了惊惧，不久竟也亡卒。

真金一死，汉法派失去了有力的靠山，而新的儒臣们的政治影响毕竟还弱，从此汉法派的力量就大不如前了。因此，后来1287年到1290年间桑哥再行聚敛之政时，就变本加厉，超过了阿合马；而汉法派对桑哥的斗争也就力不从心，更加困难了。真金死后，忽必烈一朝支持汉法派的蒙古重臣中，安

童硕果仅存。但第二年，安童也被罢相，他以后也不再积极从政。

真金继续推行汉法以他的惊死而宣告失败。有元一代，汉法的推行大体上就处在忽必烈达到的程度，忽必烈以后只有少许修正和变化。忽必烈推行汉法而又有很大局限性，这种情况决定了元代的政治格局，对忽必烈以后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南坡之变

元世祖忽必烈去世后，他的儿子铁穆耳继位，就是成宗。成宗在位 12 年，《元史》说他“承天下混一之后，垂拱而治，可谓善于守成者矣”。成宗死后，他的两个侄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嗣位，就是武宗和仁宗。后来仁宗的儿子硕德八剌即位，就是英宗。到英宗统治时期，元朝皇室内部的矛盾再次尖锐化，爆发了著名的南坡之变。

自从忽必烈建立元朝，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的保守势力总是千方百计要加以阻挠和破坏。但是，推行“汉法”以适应中原地区固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需要。因此，主张行汉法的势力与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总是时暗时明地进行着斗争。英宗即位后这种矛盾又逐渐突出起来。

当武宗取得帝位后，武宗和仁宗兄弟之间曾达成协议，兄终弟及、叔侄相承。武宗死了，仁宗即位；仁宗死了，武宗的儿子即位。但仁宗即位后，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了取得皇帝的欢心，勾结太后答己，废武宗子和世琜，改立仁宗子硕德

八剌为太子。他们满以为硕德八剌年幼无知，易于控制。然而，硕德八剌却是一个自幼就接受儒学很深、熟读汉儒著作的蒙古贵族，与答己、铁木迭儿的政治主张很不一致。仁宗死后，英宗硕德八剌即位，答己十分懊悔。为了巩固她的地位，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再次任命因侵吞田地牧场贪赃枉法而被仁宗罢官的铁木迭儿为右丞相；诛杀和罢免反对过铁木迭儿的一批官吏，幕后指挥失烈门等搞废立阴谋；……英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任命功臣木华黎的后代、有“蒙古儒者”之称的拜住为左丞相；千方百计限制铁木迭儿的权力；……元朝统治集团内部两派的斗争日益尖锐。

双方矛盾正在进一步发展时，铁木迭儿和答己太后都在1322年（至治二年）相继死去，御史大夫铁失成了这一派在朝中的代表，但力量已大不如前了。这时水旱灾荒连年发生，各族人民不断起义，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英宗深深感到再不调整原有的统治政策，将会发生统治危机。他在拜住的协助下实施了一系列新政：

任用大批汉族官僚和知识分子，如张珪、虞集、吴元珪、王约等都得到了重用。他还颁布《振举台纲制》，提倡“举善荐贤”，到处搜罗人才。

罢冗官，使大批依靠特权获得肥缺的蒙古色目官僚失去官职；

推行“助役法”，规定拥田百亩者以三亩入官，作为补偿一般农民徭役的助役费，使豪家大姓稍有损失；

减轻徭役，减免赋税；

颁布《大元通制》，把这些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英宗是比较有作为的元朝皇帝，这些措施对于扩大元朝统治基础、适应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多少是有些好处的。但由于这些措施触犯了一部分蒙古贵族的利益，因而也遭到他们的拼死反对。

1323年（至治三年），英宗下令追查铁木迭儿的贪污案，处死了一批有牵连的官吏，同时追夺铁木迭儿官爵，抄没其家资。这使铁木迭儿的余党铁失十分恐慌，于是串连了一批诸王贵族，于1323年8月5日夜晩，当英宗自上都南返大都，途经上都以南30里的南坡店时，刺杀了英宗和拜住。这就是“南坡之变”。

英宗被刺后，铁失等拥立在漠北高原的晋王也孙铁木儿（忽必烈孙子甘麻刺之子）为帝，即泰定帝。

泰定帝即位后，先是加封拥立他的人官爵，但是只过了30多天，他为了维护皇权的尊严，对“大逆不道”的铁失、也先帖木儿等一概加以诛杀。

第四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农业与畜牧业

户口的变化与分布

农业是蒙元时代最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全国80%以上

的人口是农业人口，因此，在生产资料（其中主要是土地）对于人口的负荷量尚未超过一定限度时，人口的变化与分布是农业生产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

元统一之前，北方户口的减少是非常严重的。如金时泽州（今山西晋城）有 5.94 万余户；1242 年（乃马真后元年）只有 1800 余户；邢州（今河北邢台）原有 8 万余户，元朝建立前一度只剩 700 余户；亳州（今安徽亳县）原有 6 万户，金末不断南逃，存者不足 1/10。关中地区 8 州 12 县历经战乱，户不满万。类似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当然，随着战乱的逐渐平息，统治秩序的逐渐稳定，户口又有一定回升，有些地方的回升还很显著。如刘肃治理邢州，户口很快又增加 10 倍。但是，从整个北方的情况看，和金朝相比，还是减少甚多。1207 年（金泰和七年）金境内有 7684438 户，45816079 人。到 1262 年（元中统三年），元政权辖区已和金大体相当，而当时仅有 1476146 户，每户以 5 人计，人口仅有 7380730，户不足金时的 1/5，口不足金时 1/6。直到 1291 年，北方户数才 1999444，也仅有金时的 26%。当然，无论是金还是元，官方的户口统计都不会是精确的，尤其是元代，遗漏甚多。但是作为人口变化的一种基本态势，这些统计还是可信的。

南方户口变化不是很大。1223 年（宋嘉定十六年）南宋境内共有 12670801 户，28320085 口。元灭南宋，得户 937 万余，1291 年江淮、四川共有 11430878 户，和南宋相比，差距不大。

忽必烈以后直到元顺帝初年，全国户口总的发展趋势是不断增加的。有人估计，元代实际户口最高时约为 1900 多万

户，近 9000 万口。元末时，又减至约 1300 万户，6000 多万口。

南方、北方人口地理分布的极不平衡，是元代人口状况的一个显著特点。根据 1291 年（元至元二十八年）的统计，南方（江淮、四川等地）与北方（即所谓内郡）户数的比约为 5.7 : 1，南方人口所占比例很大。江浙行省（包括今浙江、福建和苏南、皖南部分地区）和其他行省相比，户数最多，近 600 万，约占全国总户数的 46%。各地人口密度十分悬殊。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江浙行省为 91.23，江西行省为 42.95，湖广行省为 14.74，河南行省为 8.70，中书省（腹里）为 3.96，四川行省为 2.17，其他地区则不足 1 人。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自然条件，但也与政治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从全国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可以大体看出全国各地的农业发展状况。

北方人口的不断南移，是元代引人注目的人口现象。有人估计，1283 年时，南移人口已达 15 万户之多，约为当时北方人口的 1/10。这种人口南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元末，政府虽屡禁而不能止。另外，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密切，民族间的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元朝初年起，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迁往蒙古草原以及西北、东北、西南等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内地。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 10 万以上，大都、上都以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地，都居住着许多蒙古、畏兀儿、回回、河西、契丹、女真等各族人，这对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显然是十分有利的。

土地的开发与农田水利兴修

与人口的增减分布相关联，各地的土地开发利用情况也存在着很大区别。一般说来，人口稠密的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土地的开发利用比较充分，而人口稀疏的北方，尤其是边疆地区，土地的荒芜现象则比较严重。

江南地区，用于农业以及各种家庭副业经营的土地范围非常广泛。以学田为例，就有围田、湖田、上岸田、碛田、泉田、天田、坑塘田、沙田、海涂田、演田（即湿地）、山地、桑地、熟地、荒闲地、草塌地、沙岸、芦荡、菱荡、水池、鱼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都被用来进行农副业生产。当时土地面积的统计和记载，一般都精确到一分、一厘、一毫，地租的计算也常常确到一升、一勺。所有这些都表明，江南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利用是相当充分的。

与江南地区迥然不同，北方荒芜土地则很多。蒙宋战争期间，双方交接的河南地区以及汉水与两淮地区，战事频繁，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元统一后，上述地区的军民屯田规模也最大。南阳地区的屯田属于民屯，曾一度设立南阳屯田总管府以领其事，后又改由地方政府经营。两淮地区的屯田主要是军屯，集中在洪泽、芍陂一带，是元代屯田效果较好的地区之一。德安（今湖北安陆）地区的屯田是军民混合屯田，屯田者有9000余人，规模也很可观。枢密院各卫屯田以及大司农司、宣徽院的屯田主要集中在今河北省的永清、武清、涿州、霸县、新城、沧州、保定等地。上述地区屯田规模所以较大，除自然条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地区荒芜

土地较多。

为了加速土地开发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以河南为例，原来民疏土旷，地价甚低，到 14 世纪前期，民众日集，土地也“价倍十百”。两淮地区也逐渐人口集聚，烟火相望了。

元朝建立后，对农田水利的兴修比较重视。中央置有都水监及河渠提举司等行政机构，负责河渠治理与水利兴修等事宜。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等，曾为水利兴修作出了重要贡献。1262 年郭守敬在磁州（今河北磁县）引滏河、漳河之水，由滏阳（今河北磁县境内）、邯郸、永年和鸡泽（今河北永年东北），合入澧河，溉田 2000 余顷。1264 年郭守敬随张文谦行省西夏，修复了唐来、汉延诸渠，可溉田 9 万顷。有些地方官吏，也注重开渠引水，发展农业生产。如平阳路（今山西临汾）总管郑鼎导汾水，溉民田千余顷。怀孟路（今河南沁阳）总管谭澄曾令民凿塘修渠，引沁水以溉田。提举王允中、太使杨端仁奉诏开凿广济渠，引沁水以达于黄河，“渠成，甚益于民”（《元史·河渠志二》）。安阳总管高文忠浚万金渠，溉田千顷，民得其利。赛典赤赡思丁行省云南，修渠筑坝建闸，溉田万顷。廉希宪在荆南，泻蓄于于江，得田数百万亩。衢州（治今浙江衢县）总管朱景周修复黄堰，溉田数万顷。哈刺哈孙行省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浚古渠，溉田数千顷。如此记载甚多，不胜枚举。据不完全统计，元朝兴修的大型水利工程，见于文献记载的有 260 多处，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在南方。有些水利工程技术水平很高，能长期发挥效益。如郭守敬等在西夏修筑的闸坝，直到明代中期还在使用。

作物品种、分布与产量

元代的粮食作物品种，南北仍有所不同。北方以粟、麦为主，南方则多种水稻。引人注目的是，水稻的品种在不断增加，种植区域也在不断扩大。据《至顺镇江志》记载，稻有大小之分。大稻 16 种，即有香子、鲫鱼、灰鹤、时里白、八月白、芦花白、浪里白、白莲子、红莲子、早红芒、晚红芒、青州黄、秆川口、马尾乌、老子乌、下马看。小稻 6 种，即白、红尖、晚粳、六十、八十、百日。百日即来自占城，又称占城稻。糯稻亦有 9 种，即芒、香、晚、抄社、羊脂、牛虱、虎斑、柏枝、长秆。另有记载说，粳稻品种有 50，糯稻品种有 20。品种之多，由此可见。有些优良品种，很受农家重视。如小香稻，“赤芒白粒，其米如玉，饭之香美”（王桢《农书·百谷谱·早稻》）。占城稻抗旱力强，成熟时间早，江淮、两浙地区广为种植。元代北方（包括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也有不少地方种植水稻。元朝中期，有人建议在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之内捍水为田，种植水稻，元政府还专门设立了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以掌其事。1330 年朝廷曾下令禁止私决通惠河上游堤堰以灌稻田等，可见当时大都西郊已有水稻种植。1252 年由于农民起义爆发，海运中断，为解决京师用粮问题，朝廷遂令在河南注下水泊之地置屯田八处，并于汴梁（今河南开封）置都水庸田使司，掌种植稻田之事。第二年，又在西自西山，东至称霸民镇，南起保定、河间，北到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的广大地区，大规模种植水稻，并从江南召募农师千人参与其

事，取得了一定效果。

在水稻北传的同时，北方的粟、麦、黍、豆等作物也推广到了南方。在江浙以至湖广，大麦、小麦、黄豆等多有种植。

粮食亩产量，各地区间有不少差别，北方麦、粟亩产通常在1石左右，南方水稻生产一般都在2石以上，两浙地区亩产一般为三四石，有的高达五六石甚至七八石。云南、黔东南、桂北地区，水稻产量一般也在2石左右。

元代腹里与各行省的税粮数，大体上反映了各地的粮食生产水平。如江浙行省年税粮4494783石，占全国税粮总数的37.1%，河南行省年税粮2591269，占21.39%；腹里年税粮2271449石，占18.75%；其余各行省均占全国税粮总数的10%以下。

另外，单位面积（平方公里）的税粮数，也基本上可以显示和行省土地开发利用与农业发展状况。据有关资料统计，腹里与各行省每平方公里税粮数为：江浙行省14.27石，居第一；河南选举处5.47石，居第二。以下顺序为：江西行省4.26石，腹里2.93石，湖广行省1.32石，四川行省0.41石，甘肃行省0.11石，陕西行省0.09石，辽阳行省0.05石。江浙行省为其他行省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由于北方粮食生产不足，元朝政府从1283年起，每年从江南地区海运大批粮食到京师。开始每年海运数十万石至百余万石，元文宗时达350余万石，江南海运粮成为大都（今北京）用粮的主要来源。海运一断，京师用粮便处于极端困难之中。

元代的棉花种植更加广泛。古代棉花又称吉贝、野人芹、

木棉、白叠等，汉唐以来多有记载。我国境内种植棉花较早的是云南、四川、新疆、海南、广东、福建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唐宋以来分两路向内地传播。一路由新疆经玉门关移植陕西，然后由陕西移植河南，在黄河流域推广。一路由海南移植广东、福建，然后又分作两路，一路越武夷山，入江西，一路由海路、陆路传到松江（今属上海），然后再沿扬子江流域移植到浙江、江苏，继而传向淮南。四川和云南地区的棉花则长期局限于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未能向更远的地区传播。元代，陕西兴元（今陕西汉中）、河南新乡等地已有植棉记载。畏兀人燕立帖木儿官陕西西乡，当地百姓不知种木棉之利，他便从兴元求籽以赠，并教授种植方法。元司农司所编《农桑辑要》也记载说，陕右木棉滋盛繁茂，与西域所产无异。元代诗人迺贤有《新乡媪》诗一首，写到新乡妇女纺棉情况：“蓬头赤脚新乡媪，青裙百结村中老。日间炊黍饷夫耕，夜纺棉花到天晓。”江南地区植棉的记载也很多。1289年元政府于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置木棉提举司，规定每年征收本棉10万匹。1296年规定的江南夏税中，即包括木棉布等物。由此也可看出江南棉花种植已相当广泛。元人马祖常作诗说：“江东木棉树，移向淮南去。”（《石田集》卷五）可见淮南也开始种植棉花。

棉花的推广，丰富了人们的衣着生活。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棉种、棉布又传向周边国家。据高丽（今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高丽的棉花就是从中国引进的。

但是，从全国的情况看，元代棉花的种植面积还不小，人们的衣着服用还主要依赖桑麻。元朝政府对于桑麻种植仍十

分重视。桑树的种植情况，被列为考课地方官员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官吏积极提倡植桑，成效显著。如邢秉仁在广平路（今河北永年）植桑亿万计，高伯温在长清（今属山东）植桑 170700 株，姜彧因积极倡导广种桑麻被誉为“太守桑”，如此事例甚多。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江苏邳县、镇江、宝应、河南开封、陕西西安、山东临清、河北正定、福建福州、安徽歙县、山西太原等地，都是桑多蚕多、丝产富饶的地方。据统计，1286 年元政府收缴丝料 712171 斤，1265 年为 986912 斤，1266 年为 1053226 斤，1267 年为 1096489 斤。当时尚未统一，丝料都是自中原地区，其数量之多，也间接地反映了北方桑蚕业的发展状况。元代苧麻种植也很普遍，人们的穿着大多是苧麻织成的布，这在元诗中多有反映。“白苧衣掌懒自裁，手摇罗扇此徘徊”（陈基：《夷白斋稿》外集）；“江南三月踏残芳，白苧衣轻树影凉”（萨都刺：《雁门集》卷五）；“吴宫美人青犊刀，自裁白苧制舞袍”（张宪：《玉笥集》卷三），白苧即是苧麻织品。

茶叶是我国特产，古已有之。元代茶叶产地遍及闽、浙、蜀、荆、江湖、淮南、云南，从江苏到四川的长江两岸，许多地方都有茶场。元政府置榷茶都转运司等专门机构，对茶叶实行专卖，茶课最高时，每引为钞十二两五钱。1314 年全国茶课 25 万锭，当有茶叶 100 万引。以每引 90 斤计，全国产茶当在 9000 万斤以上，数量之多是很惊人的。许多名茶被指定为贡品，年年进贡朝廷。当时名茶种类很多，据忽思慧《饮膳正要》记载，计有金字茶、紫笋雀舌、燕尾茶、范殿帅茶、川茶、藤茶、夸茶、孩儿茶等。还有加入其他原料制成

的“合成茶”，如枸杞茶、玉磨茶、香茶、炒茶、三玉川茶等。宣徽院还专设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掌有 23000 多茶园户，采茶以供内府。

其他产业，诸如果产、林产、渔产、药材等，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的还成为当地的主要特产，对农业经济起着重要的补充和辅助作用。

畜牧业生产

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历来重视畜牧业生产。孟珙《蒙鞑备录》记载说，蒙古“地丰水草，宜羊马，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羊”。蒙古建元后，畜牧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官私牧场迅速扩展，畜牧产品成为官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来源之一，马匹等牲畜在军事、交通、农业生产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畜产品加工业日益发达，畜牧业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私牧场的扩大 元朝政府直接掌管着 14 处范围广阔的官营牧场，分布在东起耽罗（今辽东及朝鲜北部），北逾火里秃麻（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北），西至甘肃，南至云南的广大地区。“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大都（今北京）以至玉弥伯牙、折连怯呆儿（约今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东），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史·兵志》）。这十四处牧场的具体地点是：（1）东路折连怯呆儿等处。（2）玉弥伯牙、上都周围。（3）哈刺木连等处。（4）阿剌忽马乞等处。（5）斡斤川等处。（6）阿察脱不罕等处。（7）甘州（今甘肃张掖）等处。（8）左手永平等处。（9）右手固安州（今河北固定）等

处。(10) 云南亦奚卜薛。(11) 芦州。(12) 益都。(13) 火里秃麻。(14) 高丽耽罗。这些牧场都是水草肥美的地区，是国家最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在各牧场都有朝廷任命的千户、百户负责掌领，父死子继，相承任事。牧人称哈赤、哈刺赤。蒙古西征时灭钦察部，迁其部长班都察及族属东来。命掌牧皇家马畜，并制马奶酒进奉皇帝，号黑马乳。蒙语称黑为哈刺，遂称其属为哈刺赤。后来，哈刺赤成为服务皇室的牧人的通称。朝廷每年九、十月间都派太仆寺官员赴各牧场巡察，检查马匹繁殖生长情况，并将其数量分别用蒙古、回回、汉文字登统成册，报告朝廷。官马左肥都以官印，以与私马相区别。政府规定：病死官马一匹，牧人要赔偿一匹大母马，病死两匹，赔偿一匹二岁马；无马者要以羊、驼、牛折纳。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在官营牧场放牧的不仅有官府的马匹等，还有牧人个人的牲畜。牧人依然保持着个体经济。

官营牧场马匹的数量，蒙古人把它看作军事机密而不向外透露。但数量之多是可想见的。1211 年成吉思汗攻金，破居庸关，夺金朝群牧监马匹几百万匹。蒙古牧场远比金朝广大，马匹数量定会远远超过此数。1308 年元中书省官员曾经提到前一年诸卫饲马 94000 匹，外路饲马 119000 匹，合计 213000 匹。这实际上是中书省所属各部门的官府用马，而不是军马，因为军马数量是保密的。

诸王贵族的私人牧场也很广大。其中有些牧地是朝廷分封的，如晋王甘麻刺封地在克鲁伦河、土刺河流域；北安王那木罕封地在和林西北的帖木儿河上，等等。有的诸王贵族也往往侵占民田以为牧地。如安西王曾冒占民田 30 万顷作牧

地。赵天麟《太平金镜策》讲到元初情况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元朝初年，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但这种以损害中原农业为代价来扩大畜牧业的作法，对国家说来很不利，因此朝廷曾多次明令禁止。

各级官吏、地主豪强与大的寺，也往往饲养大量牲畜，有的牧养马、牛羊成千上万有的则农牧兼营。北方大量荒闲土地的存在，在客观上为牧场的扩展提供了条件。

饲养技术与兽医水平的提高 元代的几部农书，对饲养技术与兽医知识有许多详细介绍。例如，关于牲畜饲料的区分，不同情况下喂不同饲料的方法，牲畜饮水的时间和数量，牧畜的保养与劳役结合，以及牲畜栏圈的修建等，书中都作了专门说明，其中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一直到今天还被牧民们广泛采用。元代的兽医学也有所发展。牲畜阉割的方法已为人们所认识，并被广泛地采用。人们已经掌握了许多诊治牲畜病症的医方，而且，同一种病症，牲畜不同，医方也有别。《农桑辑要》中记载马的病状有 29 种，医方 32 种，羊的病状 9 种，医方 11 种。关于食盐在牲畜饲养中的作用，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1330 年云南行省官员向中央报告说，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官马，以往每年给盐，定时饲用，马健壮无病。后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支，马多死。朝廷闻讯，立即命四川行省供盐给云南，以满足牧场所用。这一事例和农书中关于饲养牲畜时适当加用食盐，以强筋骨、防疾病的记载是一致的。元代的牲畜饲养技术与兽医知识，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畜牧学和兽医学。

畜牧业产品的广泛利用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产品的利用日益广泛。马是古代战场上最主要的机动力量，蒙古族主要是凭借迅猛的骑兵来从事征服战争的。蒙古族对养马业格外重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有元一代，朝廷通过和买、拘刷等方式，征集了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元代的驿站遍布全国各地，马又是驿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在农业生产中，马、牛是主要动力，尤其是耕牛，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肉类、奶类不仅是牧民们的主要食品，而且成为内地人民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蒙古贵族、官僚，甚至皇帝，都把马乳、羊肉等作为主要食品。大都城里每天都要宰杀数以千计的羊只。宫廷作佛事，每天宰羊上万只，畜产品的消耗量是空前的。

值得一提的是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忽必烈建元之初，为了准备同阿里不哥的战争，在燕京（今北京）、北京（今内蒙宁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阳（今山西临汾）、大名（今属河北）、东平（今属山东）、益都（今属山东）等处，多次征集皮裘、皮帽等军需品，各处均以万计。没有发达的畜产品加工业，是根本做不到的。元代的毛纺织业很兴盛。毡毯生产量很大，而且品种很多。据《大元毡毯工物记》记载，即有地毯、察赤儿铺设毛毯、剪绒花毯、杂用铺陈毯、脱罗毡、入内药白毡、入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毡帽、毡衫、胎毡、披毡、衬花毡、骨子毡、悄白毡、杂使毡、黑毡、柿黄毡、银褐毡、掠毡、内青毡、厚毡、纳苦宝簟毡、蒙鞍花毡、白脱罗毡、花掠绒毡、海波失花毡、妆驰花毡、明绿

毡、粉青毡、深色红毡、做襜赤哥白绒毡等等，有六七十种。各种畜产品除满足官府需要外，还大量进入商品市场，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二、手工业

手工业发展概况

元代的手工业生产，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发展，特别是棉织、丝织、皮毛加工、印刷、制瓷、火器制造、酿酒、制盐等方面，进步都比较明显。

棉纺织业是元代新兴的手工业部门，这是与棉花种植的推广密切相关的。一位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为棉纺织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黄道婆早年流落崖州（今海南崖县），向黎族人民学会了纺织工具的制造与棉纺织技术，后来回到家乡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乌泥泾，把错色、配色、综线、絮花等技术，传授给了家乡的人民。他们织出的布图案美丽，深受人们喜爱。乌泥泾从事棉纺织的有一千多家，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赢得了“松郡棉布，衣被天下”的盛誉。此后，棉纺织业从松江传播到江南广大地区，纺织工具也有很大改进。例如，棉花去籽，过去用铁轴或铁杖，后来出现了木棉搅车，功效提高数倍。弹松棉花过去用小型竹弓，黄道婆改用大弓椎击、弹力大，效果好。纺线过去用手摇小纺车，后来创制出脚踏纺车，提高了绳轮牵引力，加快了速度。当时，还广泛采用比较先进的提花织机。印染技术也有发展，元

未松江所染青花布宛如苑画，芦雁花草动人，颜色久洗不褪。

丝织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产部门，汉唐时代就有极高的技术水平。分散的家庭生产依然是最基本的生产方式，但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手工业作坊。只是，这样的作坊在江南还是个别的，规模也还不够大。当时，全国有许多盛产丝织品的城市，像大都（今北京）、真定（今河北正定）、京兆（今陕西西安）、开封等地，是北方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据马可波罗记载，每天运进大都城内的丝多达千车。真定居民金锦丝罗，为数甚多。南方最大的丝织业中心是杭州，每年供给官府的绉缎就有10万匹。其他如集庆（今江苏南京）、庆元（今浙江宁波）、镇江、苏州、吴兴等地，丝织品产量都很高，许多居民以丝织为业维持生活。四川成都城内，“千家万户夜灯起，机器轧轧满城市”（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就连都江堰两岸，都是碓碓纺绩之处以千万计，四时流转无穷。丝织业之兴盛，由此可见。丝织品种类繁多，苏缎、京缎、湖绉、杭纺、府绸、拷绸、潞绸、蜀锦等，都是享有盛名的丝织品。在对外贸易中，丝织品是主要出口商品。

皮毛加工与毡毯也是元代新兴的手工业部门。中央政府设有许多皮毛加工的专门机构，如工部属下，有上都毡局、大都毡局、大都染局、隆兴毡局、剪毛花毯蜡布局；徽政院属下，有大都软皮局、斜皮局、上都软皮局、牛皮局、上都异样毛子局、上都斜皮局、丰州毛子局等，工匠有数万人之多。解放后大同元代墓葬中出土的毡帽、毡靴等，质地细软，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

瓷器的发明和创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之

一，唐宋以来享有很高的声誉。元代的瓷器生产遍及全国各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河南、河北、陕西、浙江、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都发现有元代瓷窑遗址。景德镇是南方最著名的制瓷中心，有瓷窑 300 余座。景德镇唐时称昌南镇，宋景德六年（1004）始改名，建御窑。元代，这里仍是宫廷瓷器的主要产地。浙江龙泉一带的瓷窑又称哥窑，为数也很多。青花瓷是元代瓷器中的精品，它色白微青，光润透亮，装饰层次多，主次分明，比宋代的青花瓷有很大进步，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的瓷器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外，龙泉窑与福建德化的建窑，产品也很著名。瓷器不仅在国内有广阔的销路，而且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是出口商品的大宗。

北宋人毕昇发明活字印刷，开创了世界印刷史上的新时代。元代的王祯，选用优质木料刻字，避免了泥活字、锡活字的缺点，进一步推动了活字印刷术的发展。王祯还发明了“转轮排字盘”，依韵编号，检字迅速。他用这套木活字印制一部 6 万字的《大德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便印成百部，可见效率之高。元代开始用铜板印制钞币，在印制史上也是一个进步。此外，元代还发明了套版印刷。1340 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解》，卷首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木刻套印，它比欧洲的套色印刷品早 170 年。元代书籍的印刷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刻，由中央兴文署负责。宋元之际著名史学家胡三省注的《资治通鉴》，就是由兴文署刻印的。二是儒学书院刻书。三是民间书坊刻书。从刻印质量看，以杭州最好，其次是大都

(今北京),再次是福建。这些地方都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的麻沙镇和崇化镇是私家书坊最集中的地方。所印书籍除经典、史书与诗文集外,笔记、小说、杂剧、戏文、历书、医卜星相等,无所不有。为了营利,书坊大多投合时人的需要和爱好。

元代的火器及各种军需品的生产也有新发展。中央设有武备寺,专门负责兵备。大都、上都之外,其他北方重要城市,如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原、大同、平阳(今山西临汾),怀孟(今河南沁阳)、汴梁(今河南开封)、益都、济南、彰德(今河南安阳)、归德(治今河南商丘)、大名等,是当时主要的兵器与军需品生产地。元代生产的火炮、火枪、火箭、霹靂炮等,曾广泛地应用于对宋战争。遗存至今的1332年铸造的一枚铜炮,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重6.94公斤,和金代火炮相比,进步很大。元朝在溧阳、扬州等处设有炮库。1280年扬州一炮库发生爆炸,炸死兵士百人,平地被炸成一丈余深的大坑,可见炮库规模很大。蒙古军队在进攻襄阳时还使用了一种类似投石机的回回炮,炮重150斤,所击无不摧陷,威力也很大。

元代酿酒业很兴盛,杭州酿一年用粮28万石;大都日用米千石,一年用粮当在30万石以上。元世祖时,杭州(江浙)、湖广、龙兴(江西)等省酒课曾高达36万锭。酿酒技术的进步突出表现在蒸馏法的采用。在此之前,一直采用酒曲酿造的办法。蒸馏酒,也称烧酒,阿拉伯语称阿拉吉酒。用蒸馏法制造的葡萄酒,称葡萄阿剌吉,哈刺火州(今新疆吐鲁番)生产的葡萄阿剌吉,是当时最有名的。

食盐生产规模超过了前代。据统计，元代全国共有盐场 160 余所。世祖末年，年产量达 170 余万引（每引 400 斤）。到元中期，增至 260 万引左右，远比南宋为多。从事盐业生产的人户称为盐户，全国盐户约五万二千余。煮盐法是传统的制盐方法，但燃料消耗大，成本高。元代福建地区的大部分盐场开始采用晒盐法，这是制盐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进步。

元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是多方面的，但官营手工业与民间手工业又有很多区别，这是应该予以说明的。

官营手工业

为了满足皇室、军队与各级官府在生活用品，军需品、工艺品以及各种奢侈品方面的需求，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历代封建王朝都直接控制着一部分手工业生产，称为官营手工业。元代的官营手工业门类多，机构庞杂，工匠数量大，强制性强，和前代相比，有不少自己的特点。

首先，组织机构之多是历代罕见的。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储政院、大都留守司以及各地方官府等，各有所属，各自为政。中央工部掌百工政令，负责城池修浚、土木建筑、原材料调拨供应、工匠管理、局院工匠官员的选任等。其下属机构有诸色民匠都总管府、提举右八司、提举左八司、诸路杂造局总管府、茶迭儿局总管府、大都人匠总管府、诸路诸色民匠总管府、提举都城所、符牌局、撒答刺欺提举司等。其下又设众多司局院所，具体负责绘画，塑造佛像，制蜡、铸铜，制金银器皿，琢磨玛瑙玉器，制造毡毯皮件，织造纱、罗、撒答刺欺，绣造缎匹，造作镔铁、铜、钢、铳石、东南筒铁，

烧窑，织染，出纳各种物料等等。将作院负责制造金玉、珠翠、宝贝、冠佩、器皿，以及各种工艺品、奢侈品等。其下属机构又有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异样局总管府、大都等路民匠总管等。大都留守司兼掌宫廷、官府营建，内苑花木种植，御用车服与宫室物供应等。其下属机构有修内司，辖大木局、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祗应司，辖油漆局、画局、销金局、裱褙局、烧红局等；器物局，辖铁局、减铁局、盒钵局、成鞍局、羊山鞍局、网局、刀子局、旋局、银局、轿子局等；犀象牙局，辖雕木局、牙局等。另外，还有许多窑场、木场等。武备寺掌兵器制作，下辖兵器库与各地军器人匠提举司数十处。此外，皇太子名下的储政院，后妃名下的中政院，以及各地方官府，还有众多的手工业局院，进行各种专门性生产。

官营手工业生产的门类很多。《经世大典序录·工典总序》中记载的门类即有：宫苑、官府、仓库、城郭、桥梁、河渠、郊庙、僧寺、道宫、庐帐、兵、器、毡薄、玉工、金工、木工、砖埴、石工、丝枲、皮工、毡毯、画塑、诸匠等 22 项。建筑业是官营手工业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次就是工艺品生产与其他手工业生产。在封建社会里，普通的民用建筑是无法讲求艺术水平和建筑质量的，一些地主豪强的比较华丽的宅院也无法和宫廷建筑相媲美。因此，中国古代的建筑水平，主要体现在官府主持营建的各种大型建筑上。官营建筑业是古代建设业的主体，元代是如此，其他朝代也是如此。兵器生产为国家所垄断，因此官营兵器业的水平自然也就是当时的最高水平，当然这并不排除当时包括兵器在内的许多军需品

是粗制滥造的。工艺品的制造是官民兼营，但由于原料和资金的限制，民间的工艺品制造也很难与官营者相抗衡。而且，许多工艺品为皇帝和贵族、官僚所专用，民间是不准生产的。至于木工、石工、埴埴、丝帛、皮工、毡毯等，与民众生活有着密切关系，民间生产的比重远远超过官府生产。民间的技术力量虽然分散，但技术水平并不低。

由于统治阶级的奢侈与官僚机构的庞大，官营手工业的生产量是很大的。以大都毡局为例，据《大元毡罽工物记》记载，1262年刚一建局，就织造了羊毛毡3250大段。此后三年内，又织成白毡810片，俏白毡180段，大糝白毡625段，熏毡100段，染青小哥车毡10段大黑毡300段，另外还染毡1225斤。丝强业生产更大。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建康（今江苏南京）有东西两个织局，东织染局管人匠3600户，机154张，额造缎匹4527段，丝11502斤。全国织染局有30余所，每年生产缎帛等至少有数十万匹。其他部门的生产，很难进行数量统计。元灭南宋后的1276年，从江南一次签发工匠30万户，三年后又在北方籍人匠42万，虽然事后又有分拣淘汰，但数量之大依然是非常可观。

官营手工业的原料大部分是官府组织开采或征集。山林川泽之产一向为国家所垄断，诸如金、银、铜等各种矿产，竹木等各种林产，政府大都直接组织人力开采和砍伐。各种丝料与农产品、畜产品等，主要依靠赋税形式无偿征集。有些原料，名义上是购买，实际上是强买，往往少给钱或不给钱。各地官府还经常向朝廷进贡各种土特产品，这些贡品也有一定部分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原料。总之，无偿地强制性剥夺与

征集，加上对某些原料生产的垄断，是官营手工业原材料的基本来源。

元代的系官匠户，起初多是战争中的俘虏，其身份无异于驱口。灭金过程中，蒙古统治者又接收并拘括了部分金朝官营手工业者。灭宋后又从江南地区签发了大量工匠。另外，还有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户，从事矿冶生产的冶户。所有匠户、盐户、冶户等，都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专门户籍，子孙世袭，不能脱籍。元朝建立后，工匠的地位较蒙古国时期有较大变化，他们部分有了家庭和少量财产，定时入局造作，其身份与普通民众大体相当。工匠中还有一部分称作怯怜口的人，他们原系皇室或贵族官僚的私属，地位类似奴仆，人身依附性要比其他系官匠户严重。另外，还有一些驱口、无主逃奴、罪犯等，被强制进行手工业劳动。匠户中有许多能工巧匠，但也有不少人名隶匠户而实无技艺。蒙古军屠城时往往赦免工匠，所以有不少人冒入匠籍。在匠户以及盐户、冶户中，还有少数富户。他们拥有大量资产，本身并不劳动，而是雇人或役使奴仆完成额定任务。他们常常被选充局院场所的头目，成为工匠们的直接管理者与压迫者。

管理的腐败是官营手工业的痼疾。各级官吏利用职权克扣原料、冒支工粮、从中贪污的事件屡有发生。官吏们还常常夹带私造，政府屡禁而不能止。官营手工业有低廉的劳动力，有充足的原料，绝大部分产品供皇室、官府与军队享用，并不进入商品流通市场。这样的生产不属于商品生产，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尽管官营手工业中也能生产精美的产品，但从整体上看，这样的生产必然是落后的，低效率的，缺乏竞

争力的。

系官匠户受着残酷剥削和压迫，生活十分悲惨。他们采取种种方式进行反抗。例如，故意提高生产费用，降低产品质量；消极怠工，拖延生产进度；成批逃亡，甚至举行武装斗争。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有感到官营手工业的种种弊端，也主张“百工诸府可罢”（胡適祇《紫山集》卷21《政事》），还有的提出停罢一切系官工役。元朝统治者虽然有时也被迫停罢某些矿冶、工役，但为了方便自身的挥霍享乐，始终仍保持较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不肯放弃。

民间手工业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生产，范围也很广泛。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业品，除食盐、铜等少数物品的生产受到国家严格控制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民间生产的。丝织、棉纺织、制瓷、畜牧业产品加工、矿冶、造纸、印刷、金银玉石工艺品制作等，是民间手工业的主要门类。

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生产，仍然是民间手工业生产的基本方式，尤其是丝织、麻织、棉织、畜牧业产品加工等是如此。丝、棉、麻以及各种丝织品、麻织品、皮毛制品等不仅为人民生活所必需，而且是封建国家赋税的主要内容。在商品生产还不甚发达的元代，这些生活与赋税的必需品，绝大多数农户都得自己生产。这是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是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基本特征。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与农业相脱离的手工业者也在

逐渐增多。而且，随着行业生产内部分工的发展，一家一户的手工业者很难独立完成生产流程。在某些生产部门，规模经营的趋势在日益加强。如元代制瓷业，内部分工已比较细致，有土工、模工、胚工、画工、釉工等，一件上等瓷器的制作，要经数十人之手，这是一般家庭生产所不能胜任的。一些瓷器的底部往往刻有姓氏标记，它所表示的只有窑主姓氏，并不说明这些瓷器是一家一户制作的。矿冶生产中的规模经营更为明显，如有的冶铁户，役使者达千人之多。有的大户鼓铁煮矾，一些丧失生产资料的贫民，如“鱼聚水而鸟投林，相率来归”（《紫山集》卷十八《李公墓志铭》）。有的淘金者招募随从达数百人。

在民间手工业中，已经出现了雇佣关系。徐一夔《织工对》所描写的情况最具有代表性。文中说，在杭州的相安里，有的富户，有杼机四、五具，雇佣工人数十人纺织。工人工值每天二百缗，技艺出众者，工值还可加倍。织工往往劳动到深夜，以工值所入养父母妻子。这一记载反映的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有雇佣关系。类似的情况，还存在于矿冶业中。

民间手工业要自筹资金，自备原料，其产品或自己享用，或交纳赋税，或作为商品出卖，这样的生产活动是受价值规律制约的。生产者必须尽最大努力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以增加收益，否则就很难持续生产，这是与官营手工业的不同。

但是，由于政府的控制和压制，民间手工业又很难得到充分发展。许多生产部门完全为官府所垄断，没有民间手工业插足的余地。民间手工业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局限，在资金、原料、产品销售等方面，也受到很多限制。例如，在矿

冶方面，好的矿山都被官府掌握，民间开采的都是条件差的矿山。再如，冶铁本为官府所允许，但铁产品却受国家控制。要凭铁引才能贩运，否则将以私铁论。官府还往往对民营手工业课以重税，并经常拘捕匠人充役。有些富民也在官府支持下，垄断某些物品的产销。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重重束缚下，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是十分艰难的。

三、交通运输

元代疆域辽阔，政治上空前统一，各地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非常密切，交通运输获得了极大发展。全国驿道驿站四通八达与海运事业的兴盛，是元代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标志。

元代驿站的设置，是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的。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刘仲禄到山东去邀请长春真人丘处机，就曾利用过驿骑。丘处机在前往中亚以及返回燕京（今北京）的途中，都曾得到驿站的帮助。太宗窝阔台时期驿站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蒙古本土，经察合台汗国，到欧洲的钦察汗国。已有驿路可通。窝阔台本人也把建立站赤（即驿站）作为自己的一项功绩。忽必烈建元后，建立起了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东北至黑龙江江口的奴儿干，北通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抵云南、西藏。如此规模庞大的驿站系统，是以前历代王朝没有过的。据《元史》记载，全国各类驿站有1500余处，服役站户当在二十三万户以上。驿站又分陆站、水站。陆站的交通

工具主要是马，也有的地方用牛、车、轿等，东北辽东还有狗站。水站则用船。中央管理驿站的机构是通政院，地方由路、府长官提调，不另设专门机构。驿站依其大小设驿令或提领，交通枢纽之处往往置脱脱禾孙，即检查官，专门检查乘驿人员是否违犯乘驿制度。

站户由民间签发而来，一般都是中等以上的民户。他们要负责管理驿站的交通工具，喂养马、牛，如有死亡、损坏，则必须赔偿。驿站的马、牛、车、船等，有的是国家购置的，也有不少是站户提供的。站户还要为过往使臣提供规定标准的饮食，轮流充当驭手或水手。国家设有专门的站户户籍，他们世代相专，不得改易。

驿站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朝政府严格控制给驿范围。但王公贵族、官僚、上层僧侣等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谋取乘驿特权。有的甚至搬取家属、迁葬送灵、娶妻嫁女等都要利用驿站。滥用驿站的结果，使驿马、车、船等损失严重，同时增加了站户负担。许多站户因此而破产逃亡。国家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诸如进一步限制给驿，救济贫困站户等，但效果并不显著。元朝后期，驿站制度已逐渐废弛。

与驿站相辅而行的还有急递铺，专门为朝廷和官府递传紧急文书。元制，每10里、15里或25里设一铺，置铺卒5人，重要的地方铺卒多至十五六人。据《元史》记载，铺卒行进时都腰扎皮带，带有悬铃，手持纓枪，披戴雨衣。所携文书都用夹板夹好，用漆绢包妥。夜间行进，还举着火把。路狭之处，其他行人见到铺卒要躲避让路。前铺铺卒听到铃声，便提前在路旁守候，接到文书继续传递。按规定，文书一昼

夜要传递 400 里。

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立，虽然主要是为了政治的和军事的目的，但客观上也加强了全国各地间的经济联系。四通八达的驿道为商业贸易提供了方便。元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驿站系统的完善是有一定的关系。

元代海运事业的迅速兴起，是中国交通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秦汉以来，近海短途航运曾多次进行，但在航线长度、货运数量等方面，是无法和元代相比的。

元代海运始于 1276 年。这年元军攻占临安（今浙江杭州），大将伯颜遂命朱清、张瑄等造平底船 60 艘，运粮 46000 余万石，由海道至京师。这次首航，因信风失时，中途停于山东刘家岛（今山东蓬莱县境），第二年始达直沽（今天津）。元代海上运粮自此始。1283 年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剌为万户府达鲁花赤。1287 年设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又增置万户府二。1288 年设漕运司二，一在直沽河西务，接运南来粮物；一为京畿都漕运司，负责将直沽的粮食运往大都。1291 年又应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由朱清、张瑄专掌。

海运路线先后开辟过三条。前两条都是朱清、张瑄开辟的。1293 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辟第三条路线：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入海，至崇明三沙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海河）。航行这条路线，如风顺时，全程只需 10 天左右。

从江南海运大都的粮食，自 1283 年后逐年增加，最多时

一年运粮 350 多万石。这对保证大都的粮食供应，发挥了关键作用。海运和陆运、河运相比，省时、省力、省费。有人估计，河运可比陆运省费十分之三四；海运可比陆运省费十分之七八。

随着海运的发展，沿海港口逐渐兴起。大仓刘家港是海运的起点，可容万斛之舟。山东的密州（今山东诸城）、登州成为定期寄泊海港。上海也成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直沽是海运的终点，海运、河运的物资都在这里汇集，然后再运往京师，这里成为北方最大的港口。

海运的发展，不仅保证了元朝政府的粮食需求，而且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加强了南北间的经济联系。成千上万的船工水手，在与惊涛骇浪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推进了我国航海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海运史上，元代海运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元代在发展海运的同时，还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浚修整治。1281 年至 1283 年间，首先开通了由济州（今山东济宁）到须城安民山（今山东东平西南）的长达 150 多里的济州河。1289 年又开通由安民山到临清的会通河。1291 年在郭守敬的建议和主持下，引大都西北白浮泉等诸泉水，经大都西门汇于积水潭，然后再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今北京通县）高丽庄入白河，全长 164 里，称通惠河。这样，从大都经通惠河至通州，再经白河至直沽，然后经御河至临清，继而经会通河、济州河和旧运河相接，而不必再西入河南。经过整治的大运河，和隋代大运河相比，缩短了六七百里的路程。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互相贯通，南

北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四、商业贸易

和农业、手工业相比较，元代的商业贸易显得更加发达和兴盛。国家长期分裂的局面结束之后，地区之间，民族之间，乃至国际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而商业贸易显然是经济往来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元代商业兴盛发达的明显标志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全国出现了以大都、杭州、泉州等城市为代表的一大批商业贸易中心，并以这些城市为连接点，形成了遍及全国的商业网。

元朝初年刚刚建起的大都城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而且是北方最大的商业集散地。全国各地连同国外的奇珍异宝、名贵商品以及普通民用商品，都从水路、陆路集中到这里。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称誉大都是“商业繁盛之城”，世界诸城无能与比。据中书省官员王恽记载，元朝初年的燕京路已有回回商人 2900 余户。有不少商人来自欧洲、中亚、南亚、非洲沿海，以及日本、朝鲜等地。国内商人则更多。城内的商品市场以类区分，有缎子市、珠子市、皮帽市、沙刺（珠宝）市、鹅鸭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煤市、文籍市、羊市、马市、骆驼市等，商品相当丰富。大都主要是一个消费城市，皇室贵族与百官臣僚侈靡之风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杭州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马可波罗赞扬它是“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元代著名剧

作家关汉卿描述杭州说：“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南吕·一枝花·杭州景》）。据《元史》记载，1329年全国商税收入76万余锭，江浙省就有269000余锭，占全国商税总数的35%以上。江浙商税以杭州为最多，由此也可见杭州商业之繁荣。

泉州是元代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居住着许多异国他乡的富商巨贾，集中了大量国内外的珍宝奇玩与名贵商品，其中有从国外运来的胡椒、姜桂、豆蔻、纱布、珍珠、钻石、毡等，也有准备出口的丝绸、绢帛、绫锦、瓷器、茶叶、大黄、樟脑、荔枝、金、银、粮食等。到过这里的外国旅行家都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港，其贸易额远远超过亚历山大港。

元代的商业城市，如北方的涿州、真定（今河定正定）、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地区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今湖南长沙），江西的九江，江浙地区的扬州、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平江（今江苏苏州），沿海港口上海、庆元（今浙江宁波）、福州、广州等，商业贸易都很兴盛。此外，在北方草原还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如岭北的和林以及作为陪都的上都等。

元朝政府对商品贸易严格控制，许多商品如金、银、铜、铁、盐、茶、水银、矾、铅、锡、酒、醋，以至农具、竹木等，都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其具体经营方式，有的实行官产官销；有的是民产官销；有的是民间生产，官府抽成；有的则是商运商销。政府通过专卖制度，获取了巨额利润。

许多贵族官僚、豪强地主、色目商人与寺院上层僧侣，也

常常依仗权势，经商货卖，牟取暴利。贵族官僚的经商活动得到了皇帝支持，他们经营的商店、邸舍不少是皇帝赐予的，有的还有朝廷颁发的制书驿券，再加上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普通商人根本无法和他们竞争。如官至中书右丞相的马札儿台，在通州设榻房，开酒馆、糟房，并贩运长芦、淮南盐，拥有大量财富。元仁宗曾建寺于云州九峰山，未成而卒，马札儿台遂以私财助成。忽必烈时，权臣阿合马与中书左丞张惠等凭借权势为商贾，网罗天下财利，欺压民众，激起很大民愤。元文宗时，右丞相燕铁木儿经营邸店商货，还享有免税特权。色目商人的势力异常强大是元代经济领域中的奇特现象。他们遍及全国各地，而且与皇帝贵族保持着密切关系。他们常以进奉珍宝为名索取巨额财富。如一块红刺估价高达14万锭，一件押忽大珠售价竟60万锭。阿合马、桑哥等，出身商人，竟官至宰相。有的地主豪强与官府勾结，常垄断某些物品的产销，巧取豪夺。大的寺院也常经营商业。如大都的大护国仁王寺，仅酒馆就有140所。不少寺还开设浴池、药店、铺席（商店）等，资产之多，一般地主官僚都不能与之相比。

民间也有些豪商巨贾。有些大盐商贿赂官府，谋取盐利，富甲天下。有人写诗说：“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盐商本是贼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盐商行》）民间商人中绝大多数是小商小贩，他们受到官府以及封建特权阶层与富商大贾的压迫，本小利薄，处境艰难，但他们遍布城乡，对促进各地，特别是城乡间的物资交流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

经营的商品以日常生产、生活用品为多，因而与城乡民众的联系也最为密切。

元代的海外贸易也非常发达，政府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广东等地设置市舶司，以外贸进行专门管理。

第五节 元末农民大起义

一、元末社会矛盾的激化

土地高度集中

蒙古贵族和权臣通过受赐和占夺等方式占有大量土地，皇帝赐田动辄千顷万顷。武宗时一个蒙古大臣在江南占田1230顷，顺帝时权臣伯颜得赐田2万余顷。蒙古贵族都崇信喇嘛教，喇嘛僧除受大量钱财外，也受赐大批良田，泰定帝时大天源延圣寺得赐田1000顷，文宗、顺帝时大承天护圣寺得赐田32.5万顷。汉族地主也大肆侵占民田，如南宋降将范文虎在湖州南浔一带强占大量民田，松江大地主曹梦炎有湖田数万亩。蒙古色目贵族、上层僧侣和南人汉族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则丧失土地，破产流亡。土地高度集中是阶级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

繁重的赋税差役及民族压迫

统治者挥霍无度，国库日趋枯竭，已难以支持，便加紧搜括民财。仁宗时征收的包银数比元初增加 10 倍，一般课税（包括商税）增加 50 倍；而贵族官僚又利用特权将一切赋役（如兵役、筑城、开河、运输、开矿等），转嫁到农民头上，使大批自耕农破产，逃亡四方。地主对佃户的剥削更加残酷，农民除交地租外，还要交水脚钱、鼠耗等。地主对佃户可以随意撤佃，私刑凌辱，甚至将佃客随田出卖。斡脱又乘机放高利贷，负债往往以妻子为质，到期还不出，则受其拷掠。此时元朝的阶级矛盾已极度激化。

“开河”和“变钞”

如果说元末农民起义是元朝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开河”和“变钞”就是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线。朝廷里是奸佞当权、法纪败坏、贤愚不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弄得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天下的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迟早有一天要举起义旗，把腐朽的元朝统治推翻掉！

正当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候，恰巧又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那就是“开河”和“变钞”。

1343 年（至正三年）5 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次年 5 月，大雨连续下了 20 多天，黄河水暴涨，平地水深 2 丈，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农田被淹，民屋倒塌。

大水之后，又是大旱。

谁知祸不单行，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百姓连年遭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总数达到 100 余万户、500 余万人，他们之中不少人悲惨地死去。

大水也冲坏了沿河一带的盐场。元朝政府每年要从盐课中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有个官员说：“国家收入盐利居十之八。”黄河泛滥后，奔腾的洪水沿着运河北上，冲坏了山东地方的盐场，使政府的收入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为此，丞相脱脱决定修治黄河，把黄河勒回故道。他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于 1351 年（至正十一年）4 月，调发汴梁、大名等 13 路民工 15 万人，又派驻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 2 万士兵负责监督，开始治河。按照贾鲁设计的方案，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280 里河道要加深，然后把黄河勒回旧道入海。

黄河泛滥后七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洪灾、旱灾、瘟疫和饥荒，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统治。现在被强征为民工后，待遇极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们所得更少，这些半饥半饱的民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治河工地。“开河”使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发泄不满，形成了一股反抗元朝政权的力量，为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元顺帝上台后，统治集团的挥霍浪费更加厉害，赏赐、佛事远远超过了过去，光宫廷支出就猛增了 20 倍。由于国库空虚，1350 年（至正十年）那年，发行了一种新的纸币，叫

“至正宝钞”，用它来代替早已通行的“中统宝钞”和“至元宝钞”，所以叫“钞买钞”。为了搜括民脂民膏，政府拚命印造这种纸币，老百姓拿了这种货币买不到东西，在大都钞十锭（等于铜钱5万文）不够买一斗米，所以大家干脆不用了，都以货物进行物物交换。这种“钞买钞”的局面，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所以说：“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不过，红巾起义并不是“祸”，而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反动腐朽的元王朝，正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中被推翻了。

二、反元教会组织的活跃

元末农民起义是通过宗教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当时利用的宗教主要是白莲教和弥勒教。

白莲教最初称白莲社，是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它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他代表光明，就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便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到12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发展成为白莲教。金末、南宋时，全国都有白莲教。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据佛教传说，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爱的好国王，后来在释迦牟尼旁边听法，释迦牟尼灭度（死）后56.7亿年，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世界变坏了，气候变坏了，庄稼变坏了，人心也变坏了。幸亏释迦牟尼在灭度前留下遗言：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出世了，等

弥勒佛下生，世界立刻变样子，到处有宽阔、干净的土地，青山绿水，满地铺着金沙，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了，寿命也长了，人口增加了，城市富庶了，稻麦播一次种子有七次收成……弥勒教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斗争到最后，明和好将取得胜利。

除了白莲教、弥勒教外，民间的秘密宗教还有摩尼教等。北宋方腊起义，南宋钟相、杨么起义都曾利用过摩尼教。但到元朝时，摩尼教的势力渐渐减弱了。

白莲教和弥勒教的教义给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们一经信教，就坚信不移、虔诚地等待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因此，不少农民领袖就利用这种宗教来鼓动农民起来反抗当时的政权。元朝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扶箕诗》：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
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

《扶箕诗》是宗教活动时歌唱的，这首诗尽管含意不十分清楚，但它充满着对“不平”的憎恨，渴望实现“太平”，并且鼓动人们去“杀尽不平”，因此对那些在痛苦中生活的教徒无疑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元朝时白莲教的势力在民间占了上风。元朝初年，江西都昌白莲教徒杜万一曾利用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等迷信工具发动过武装起义。后来这种类似的起义也多次发生。所以在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时白莲教就被元朝政府取缔了，祠庙也被捣毁。到元仁宗时，白莲教又公开活动，但不少白

莲教主成为元朝统治的拥护者，只有民间秘密活动的白莲教还继续从事反元活动。

元朝末年时，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他们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彭莹玉。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是一个教书先生，人称韩学究，在栾州一带宣传白莲教，烧香聚众，大约在元武宗取缔白莲教时，勒令他迁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到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周围还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忠实信徒。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韩山童等加紧了宣传组织工作，用“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等宗教迷信来吸引群众，鼓动武装起义，把斗争矛盾引向元朝统治者。

彭莹玉（又叫彭翼、彭和尚、彭祖，敌人叫他“妖彭”）是南方白莲教领袖。他出身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东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1338年（至元四年）彭莹玉与徒弟周子旺在袁州发动起义，周子旺被捕牺牲，他的妻、子也被杀。彭莹玉只身逃到淮西。元朝政府拚命搜捕，但江淮一带的老百姓早就听说彭莹玉的大名，都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因此官府总是不能抓获他。彭莹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埋头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到元末大起义爆发前，他的徒弟已经布满在江淮一带，其中邹普胜在江汉流域宣传“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形成了一个中心；赵普胜、李普胜等在江淮一带也形成了一个中心。总之，由于彭莹玉的辛勤活动，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的爆发作好了准备。

三、波澜壮阔的红巾军大起义

“挑动黄河天下反”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是元朝末年民间流传的一阕《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末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迫使民众纷纷组织起义。当时北方的韩山童、刘福通和南方的彭莹玉都是以摩尼教（又称明教）、弥勒教和白莲教等宗教组织形式进行起义的宣传活动。他们宣传明王即将出世，弥勒佛快要降生，黑暗很快就会过去，世界就要大变样的舆论。恰好至正三年（1343年）黄河在白茅口决口，连年黄水漂流，人民成了鱼鳖。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朝政府强征民夫15万开黄河故道。监修黄河的官吏鞭挞民工，克扣工粮，河工怨声载道。在这种形势下，韩山童派人四出散播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又派了许多教徒去当挑河夫，在民工中进行宣传。一天，修河的民夫在黄陵冈挖出韩山童暗地派人埋下的一个石人，只有一只眼睛，背上分明刻着“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民夫一见石人，个个瞠目

结舌，打心里相信天下就要大乱的宣传，整个黄河工地顿时沸腾起来。

至正十一年五月，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白鹿庄聚集了3000人，斩白马乌牛，祭告天地，共推韩山童为明王，选定日期，准备起义。并派人四出联络，约好同时行动，以头裹红巾为记号。不料消息走漏，官兵包围白鹿庄，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趁着混乱逃出，躲入深山，隐姓埋名，等候消息。刘福通苦战突出重围，整顿队伍，提前起义，攻克颍州城。黄河工地上的民夫闻讯，一声呐喊，杀了监工河官，加入刘福通的起义军。起义军头包红巾，身穿红衣，打着红旗，老百姓称之为“红巾军”或“红军”。贫苦老百姓早就盼望着这一天，纷纷从各地投奔红军，起义队伍很快就发展到几十万人，迅速攻占了河南、安徽的十几个州县。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起义，占领蕲水（今湖北浠水县），建立政权，尊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意为压倒大元），年号治平。设置莲台省（代替中书省），下设六部等机构，铸有“天启通宝”、“天定通宝”。并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受到了贫苦人民的欢迎，势力很快发展到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的许多州县。刘福通和彭莹玉、徐寿辉分别成为北方和南方的红巾军主力。彭莹玉率领的红巾军经江西、安徽、浙江、苏南，转战千里，1353年冬在瑞州（江西高安）兵败牺牲。彭莹玉牺牲后，徐寿辉领导红巾军被迫转移到沔阳湖中和黄梅山中，等待时机。1355年，南方红巾军在倪文俊领导下东山再起，在湖北汉川击败元军，占领武昌。1356年正月，徐寿辉迁都汉

阳，以倪文俊为丞相，并占领了湖南、湖北、浙江、安徽等广大地区。1357年，徐寿辉派明玉珍率军攻入蜀地，占领川属全境，控制了云南部分地区。这时南方红巾军内部互相争权，1357年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遂，被部将陈友谅杀死。1360年夏，陈友谅又杀徐寿辉，在江州（江西九江）自立为帝，改国号汉，改元大义。除红巾军系统外，浙江黄岩土豪方国珍于至正八年（1348年）起兵，占有浙东；至正十三年（1353年），盐贩张士诚在泰州起事，割据长江下游的苏、杭等地。至正二十年（1360年），南方系统的红巾军领袖徐寿辉被部将陈友谅所害，徐旧部明玉珍不服，断绝与陈友谅的联系，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在重庆称帝，国号为夏，据有两川，设置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并置翰林书院、国子监、设科举，策试进士。1366年明玉珍死后，子明升继位，后为朱元璋所灭。这是元末群雄割据的大略形势。

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响应红巾军的起义，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县）起兵。起义军袭杀州官，占领濠州城。

元朝统治者不折不扣地陷入了人民起义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小明王”亳州称帝

伴随着农民起义高潮的迭起、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和红巾军队伍的不断壮大。从1355年初开始，刘福通率领北方红巾军的主力开始大规模出击，元朝统治者对刘福通率领的主力军仍然采取“围剿”和堵截战术。1355年1月，元顺帝命河

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兴元（今陕西汉中），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商州（今陕西商县），通政院使朵来守山东，企图形成对刘福通起义军的包围圈，在这包围圈里，让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元军对农民军进行“围剿”。但这个战术很快就遭到了失败。起义军在击败了元军后更加壮大了。

为了进一步联络、调遣北方各支红巾军，建立牢固的根据地，1355年2月，刘福通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从碭山夹河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改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小明王”是“明王出世”的标志，表示光明已经来临，黑暗势力即将被驱逐。

宋政权的建置与天完政权类似。中央政权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和六部。当时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由于杜遵道擅权，与刘福通不和，不久被刘福通杀死，刘福通为丞相，后来封为太保，所以刘福通又叫“刘太保”。随着各支起义军的发展，占领的地方越来越多，宋政权还设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行政机构。管军机构也逐步完善起来，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并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等相应的军职。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反动军队进一步加紧了对红巾军的镇压。1355年6月，答失八都鲁被提升为河南省平章，进攻许州（今河南许昌）、长葛，为刘福通所击败。答失八都鲁退

到中牟（今河南中牟），红巾军袭击他的军营，夺去辎重，俘获答失八都鲁的儿子孛罗帖木儿。但这支红巾军又遭到元军刘哈喇不花部伏击，辎重及孛罗帖木儿得而复失。刘福通遣赵明达攻取嵩（今河南嵩县）、汝（今河南临汝）、洛阳，北渡孟津至怀庆路（今河南沁阳），黄河以北大为震动。但察罕帖木儿自河南南部赶来，赵明达战败。同时，答失八都鲁又调兵向宋政权的都城——亳州进犯，刘福通在太康（今河南太康）失利，元兵进围亳州，韩林儿逃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次年3月，刘福通与元军激战于亳州，答失八都鲁大败退走，亳州得安。

宋政权三路北伐

1356年9月，刘福通为了分散元军对宋政权都城亳州的压力，扩大战果，开始分兵出击，遣李武、崔德经潼关入陕，毛贵入山东。1357年夏，由于毛贵在山东的战果辉煌，刘福通作出了重大的战略决策，即三路北伐。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以关先生、破头潘一支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形成对大都的包围；李武、崔德的西路军由于在陕西受阻，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前往支援。可惜这一战略没有取得成功。

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最先出兵。1356年9月，西路红巾军连克陕州、虢州（今河南卢氏），占领潼关。答失八都鲁急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追击，李武、崔德折往山西南部，攻取平陆（今山西平陆）、安邑（今山西安邑），察罕帖木儿又急追而来，红巾军战败，队伍溃散。

1357年初，李武、崔德又重新组合一支红巾军，突然由襄樊出兵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2月，又夺取七盘，进据蓝田（今陕西蓝田），前锋直抵灞上，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路（今陕西西安）。同时，又分兵攻克同（今陕西大荔）、华（今陕西华县）诸州。元廷对于红巾军这一突如其来的神速行动大为震恐，陕西省台也连连告急。元廷不得不又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刘哈喇不花等由陕州、潼关进攻陕西红巾军。由于察罕帖木儿等已经赶来，红巾军只好放弃进攻奉元的计划。

1357年6月，刘福通决定增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他们入陕后，夺取兴元路，占领秦（今甘肃天水西）、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10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1358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军”。后来青巾军被徐寿辉部将明玉珍逐走，李喜喜不得不率部到武昌，投奔陈友谅。留在陕、甘、宁一带的李武、崔德等曾于1359年攻占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1360年5月，李武、崔德等被打败，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是由红巾军的著名将领毛贵率领的。毛贵原是赵均用的部将。1354年濠州解围后，赵均用、彭早住东击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盱眙（今江苏盱眙），据安东州（今江苏涟水），与董搏霄战于北沙、庙湾、沙浦等寨，败元军于泗州。1356年3月，驻守扬州的地主武装“青军”在其头领张明鉴率领下赶走了元朝的镇南王孛罗普化。孛罗普化逃奔淮安。不

久，由盐丁组成的“黄军”也参加了起义。10月，赵均用联络青军和黄军攻克淮安，杀镇南王李罗普化等元官。宋政权在此置淮安等处行中书省，以赵均用为平章。赵均用派毛贵攻取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由于元将也先来攻，毛贵夺取海船，率军由海道进入山东。

毛贵进入山东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1357年2月至4月这短短2个月时间里，先后攻下胶州（今山东胶县）、莱州（今山东掖县）、益都（今山东益都）、滨州（今山东旧滨县）、莒州（今山东莒县），元朝统治集团惊恐万状，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董搏霄等出兵堵击毛贵。7月，元镇守黄河的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不久被元义兵万户孟本周夺去，田丰被迫出走，转战济、濮（今山东济宁、鄄城、临清一带），后又占领济宁。是年冬，在棣州（今山东惠民）的元义兵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宣布起义。这时，元朝派往山东镇压农民起义的元军总指挥是太尉纽的该，他一直龟缩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不敢出战。

1358年1月，田丰攻克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的南北漕运从此中断。同时，毛贵在益都西南的好石桥击败孛兰奚，孛兰奚退至济南，毛贵乘胜于2月初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

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任命毛贵为平章。为了把山东建设成北伐的基地，毛贵设立了“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政权的官吏，还颁发了铜印，使各级官吏行使权力，维护地方的秩序。同时，毛贵又在莱

州立了 360 处屯田，每屯相隔 30 里，造大车百辆，运粮储备。不论官田、民田，一律十收其二，赋税标准是很低的。由于毛贵十分注重生产建设，因此山东的局势一直很稳定，并为毛贵北伐奠定了物质基础。

1358 年 2 月，毛贵开始挥师北伐，他亲率起义军进入河北。当时董搏霄驻兵南皮（今河北南皮）魏家庄，元顺帝为嘉奖董搏霄屠杀红巾军的战功，升他为河南行省右丞，这时毛贵兵已至，击败并杀死了董搏霄。接着，毛贵兵攻克清（今河北清县）、沧（今河北沧县）2 州，据长芦镇。3 月，克蓟州（今河北蓟县），至灤州枣林（今北京通县西南）、柳林，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毛贵兵进逼京师大都。大都城内以元顺帝为首的元朝统治集团慌作一团，有的主张北逃，有的主张迁都西安，甚至准备派人到高丽去造宫殿。真是乱糟糟，不知如何是好。可惜毛贵只是孤军深入，其他各支红巾军并未配合。当时元廷召四方军队来援，毛贵又在柳林败于刘哈喇不花，不得不退师济南。这次北伐尽管没有成功，却是红巾军的一次重要演习。1359 年 4 月，从淮安来山东投奔毛贵的赵均用，竟杀了毛贵。7 月，毛贵部将续继祖从辽阳回益都，欲杀赵均用。山东红巾军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但罪魁祸首是赵均用。

在毛贵北伐的同时，田丰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先后夺取了东平、济宁、东庆路（今河南沁阳）、晋宁路（今山西临汾），后又折回山东。这时山东大部分虽为红巾军占领，但由于毛贵被杀，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下。田丰、王士诚两部较大，田丰称花马王，王士诚称扫地王，互相攻伐。

1360年（至正二十年）夏，察罕帖木儿开始向山东红巾军进攻。冠州（今山东冠县）、东昌相继失陷。8月，察罕帖木儿遣其子扩廓帖木儿及其部将阎思孝、关保、虎林赤由东阿（今山东东阿）造浮桥渡河，田丰率2万人夺桥未成，长清（今山东长清）陷落。元军进攻东平，田丰将崔世英战败，东平被围。田丰投降，元授田丰山东行省平章职。察罕帖木儿令田丰为前锋，先后招降了守棣州的余宝、守东平的王士诚、守东昌的杨诚，进而围攻济南。同时南陷泰安，北攻济阳、章丘，东略沿海州县。济南的红巾军坚守了3个月后，由于叛徒刘珪的出卖，于是年8月落入敌手。察罕帖木儿因镇压红巾军有功，升中书平章政事，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10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獠头等坚守。次年6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重返红巾军队伍，进入益都城。扩廓帖木儿继续围攻益都。11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獠头俘送大都。接着莒州也被攻陷，山东的红巾军至此全部失败。

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等率领。这一路军的任务显然是为了配合毛贵进攻大都的。

1357年9月，中路军逾越太行山，攻取陵川（今山西陵川）、高平（今山西高平）。闰九月，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接着进攻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当时察罕帖木儿在这一带驻有重兵，红巾军又退入太行山。

1358年春，毛贵率军进入河北，前锋直指大都。为配合进攻大都的战略计划，并加强中路军，这年2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路（今河南沁

阳)，杀元怀庆路总管王得贞。3月，王士诚等攻占晋宁路。这时，在山西的中路军，势力大增，决定分兵二路：一支攻绛州（今山西绛县）；一支由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攻冀宁、大同（今山西大同）等地，准备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可惜由于元军的堵截，计划未能实现。

这年10月，关先生等由定州向西，占领大同，又北向进攻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12月，关先生、破头潘等攻克上都。上都为元朝建立前忽必烈经营汉地的基地，元世祖以后的历代元朝皇帝差不多年年要巡幸上都，所以红巾军占领上都、焚毁宫殿，是有很重大政治意义的。接着，关先生等又攻破全宁路（今辽宁昭盟翁牛特旗），焚鲁王宫府。又夺取辽阳行省所在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并以此为基地，准备进攻高丽。元左丞相太平派他的儿子也先忽都儿总兵攻辽阳，他以为关先生等不会久留在辽阳，他儿子进攻辽阳可以马到成功，不料红巾军根本没有撤退的意思，也先忽都儿大败而归。

红巾军出兵高丽是为了进一步打击元朝的封建统治。他们在高丽前后有三年的时间，到1362年（至正二十二年）初，红巾军被打败，关先生等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退守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中路军在进军高丽的同时，1360年，由汤通、周成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攻克大宁路（今辽宁昭盟宁城东北），为元将也速战败，汤通、周成牺牲。由雷帖木儿不花、程思忠率领的一支红巾军曾占领永平路（今河北卢龙）及其附近州县，后亦被也先等镇压。

北方红巾军失败及宋政权的灭亡

宋政权三路北伐后，牵制了元朝的许多兵力，刘福通亲率的中央红巾军解除了压力，于是便开始向外出击。

1357年6月刘福通攻汴梁。汴梁是北宋的首都，北方红巾军以“复宋”为号召，因此进攻汴梁，对于推翻元朝封建统治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但当年并未攻克。8月，刘福通攻占大名路（今河北大名南）、卫辉路（今河南汲县）。于是豫北、冀南广大地区均为刘福通占有，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圈。当时，太行山以东的豫北、冀南地区，元朝派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驻守，答失八都鲁曾多次败于红巾军之手，面对强大的红巾军，他自知必败，因而不得不求朝廷增援。元顺帝增派知枢密院事答里麻失里来援，结果元军大败，答里麻失里战死，答失八都鲁被迫退驻石村。由于屡战屡败，答失八都鲁忧愤而死，其子孛鲁帖木儿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

1358年5月，刘福通再次发动对汴梁的进攻。元汴梁守将竹贞逃跑。这样，北方红巾军多年的愿望实现了，刘福通便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都城，韩林儿也从安丰迁来。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旧史书上记载：“造宫阙，易正朔，号召群盗，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

但是，由于三路北伐军的失利，形势发生了逆转。敌人对宋政权的“围剿”愈益加剧。由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最凶狠的反动军队，对宋政权的包围圈进一步紧缩。1358年7月，察罕帖木儿移军洛阳，加紧了对汴梁的包围。孛罗帖木儿则竭力切断汴梁与山东的联系，拚命进攻曹

州。11月，曹州陷落，红巾军首领武宰相、仇知院牺牲。1359年初，李罗帖木儿又北上代州（今山西代县）、丰州（今内蒙陶卜齐）、云内（今内蒙土默特左旗北），驻守大同，以切断中路军与汴梁的联系。至此，宋政权的处境极其危急。察罕帖木儿移军虎牢，分兵南路出汴南，攻陷归、亳、陈、蔡，北路出汴东，置战船于黄河内，派兵据守黄陵渡。又发陕西、山西各路元军，把汴梁包围得水泄不通。8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汴梁城内数万红巾军战士及宋政权官吏、家属被俘。

1363年2月，曾经投降元朝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大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进行了顽强抵抗。安丰城里粮食断绝，军民饥饿不堪，甚至腐烂的死尸也挖出来充饥。就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抵抗。小明王韩林儿不得不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来救，可惜已经迟了，刘福通力战牺牲，朱元璋的军队击败了吕珍和前来助吕珍的、原属南方红巾军系统的庐州左君弼，救出小明王。后来，小明王被安置在滁州，到了1366年12月，朱元璋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到应天，途经瓜步，将小明王韩林儿沉死在长江里。

北方红巾军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他们在元末农民起义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他们最有力地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正因为有他们的英勇斗争，才为后来朱元璋最后灭亡元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四、张士诚集团的蜕变

盐贩子出身的张士诚自泰州起兵后势力不断扩展，高邮

一战，张士诚所部大败元军，势力扩大到扬州一带。1355年，张士诚决心渡江南下。

张士诚首先占领了通州（今江苏南通），接着渡江入福山港，占领常熟，进逼江南大都市平江。江浙行省右丞相达识帖木儿令参政脱寅、达鲁花赤哈散代、总管贡师泰重兵防守平江。前锋张士德出其不意地连夜长驰直达平江北门城下，率领三四千勇士乘夜翻过城墙，与守城元军激战。脱寅逃至娄门十八营俞家园，为乱兵砍死；哈散代投河自杀；贡师泰由水路逃脱。张士诚军占领平江后，周围的昆山、嘉定、崇明、松江等地的元军相继投降，无锡、常州、湖州等地也被张士德先后攻下。7月，张士诚又派军队占领杭州。这样，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都被张士诚占领了。

张士诚在占领平江后，就把平江改为隆平府，政权机构也从高邮迁到隆平，任命阴阳先生李行素为丞相，张士德为平章，李伯升为司徒，潘原明、蒋辉为左右丞，史文炳为同知枢密院事，周仁为隆平府太守。

正当张士诚不断扩张的时候，朱元璋的军队已经攻下集庆，势力向东伸张，张、朱两军在镇江相持。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张士诚，根本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朱元璋派杨宪与张士诚通好，并致书道：“近闻阁下由通州占领平江，称雄于天下，深为阁下高兴。现在，我与阁下东西相邻，我们如能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保境安民，互通往来，互不寻衅，实是莫大荣幸。”张士诚不予理睬，并把使者杨宪也拘留了。接着派张士德西进，先败于龙潭，后败于常州。吃了败仗的张士诚不得不向朱元璋求和，致书给朱元璋：“本人起兵泰州，

实因元朝政治败坏，民心思乱。今春占领平江，虽然称王，目的只是收服群众。阁下兵起淮右，跨有江东，又以应天（朱元璋占领集庆后改为应天）为都，建立了大业，真要为阁下祝贺。上次承蒙阁下遣使通好，但我愚昧无知，不明大事，竟得罪了使者，造成互相攻伐，今愿每年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银三百斤，作为犒军之费，以求各守疆土，保境安民！”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朱元璋当然不会接受张士诚的请求，反而指责张士诚来信是骗人的“浮言夸辞”，不予理睬。

1357年初，张士诚连失常州、泰兴、江阴、长兴、常熟等地，张士德也在常熟被朱元璋军队俘获。张士诚四面都受到朱元璋的袭击，逼得他陆路不能出兵马，水路不能入大江，处境很不好。这时他思想上开始动摇了，在他周围的一批旧官吏、政客、儒生，都纷纷劝他投降。原来，张士诚迁都平江后专门设学士员、开弘文馆，搜罗地主知识分子和元朝旧官吏为他服务，一批旧官吏、地主分子、儒生像蝇营狗苟那样，纷纷前来投靠。这些人投靠张士诚的目的本来是为了取得荣华富贵，现在看到张士诚处境不妙，连连败给朱元璋，因此就竭力劝他投降元朝，参军俞思齐一再劝张士诚说：“投降了元朝，既可以用元朝的兵力打退朱元璋，又可以不被人家骂为盗贼，岂不一举两得！”这时被俘的张士德也秘密托人带来口信，说宁肯投降元朝，也不要屈服于朱元璋（后来张士德绝食死去）。张士诚考虑再三，决定派周仁去元江浙行省请降。1357年8月，元顺帝封张士诚为太尉。张士诚降元后，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政治经济上，为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打气输血。而他们自己则更加腐朽堕落，完全成

了一伙新地主分子。

为了扭转被朱元璋包围的被动局面，张士诚从1358年开始，曾多次进攻常州、江阴，均遭失败；朱元璋为了进一步缩紧对张士诚的包围，曾于1358年10月克宜兴，派廖永安率水军入太湖，被张士诚俘获。又多次进攻杭州、湖州、绍兴等地，也未得手。双方对诸暨的争夺很激烈：1359年1月，胡大海克诸暨；6月，张士诚将吕珍决水堰灌城，胡大海夺堰反灌，吕珍败退；次年9月又来攻城；1362年3月，张士信率军再次攻城，又未占领。所以到1363年前，双方在江南地区基本上仍维持原来的形势。但是，张士诚趁宋政权三路北伐，造成苏北、鲁南空虚之机，其势力扩张到济宁，甚至连朱元璋的老家濠州亦被张士诚占领。

对于摇摇欲坠的元朝反动统治，张士诚也是为其输血打气的。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江南地区的起义军，湖北有徐寿辉，安徽有朱元璋，江苏有张士诚，三支起义军把元朝统治拦腰一刀，切断了南北。特别是张士诚控制的苏南地区，本是元朝政权的财源和粮源，据当时人统计，顺帝即位初期，元朝政府从江浙一带搜括的金、银、钞、丝、棉、布帛等为全国总收入的一半，粮占1/4。张士诚、方国珍起义后，元朝政权发生财政危机，海运粮也中断，1358、1359年京师大都发生了大饥荒。1359年9月，元朝不惜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要他护送海运粮。从1360年到1363年，张士诚和方国珍，一个出粮、一个出船，每年海运粮11万石至13万石，从而延长了元朝的反动统治。

张士诚集团占据平江、特别是投降元朝后，更加贪婪地

追求财富和享乐。张士诚自己终日不出门，不理政事，与一批地主文人、官僚谈古论今，舞文弄墨；他的弟弟张士信最腐朽堕落，拥有妻妾百余人，让她们学着天魔舞队，用金玉翡翠装饰得十分华丽，后花园造得十分讲究，采莲的小船，用沉香、檀木等名贵木材制造；其他将领也十分腐化，他们成天考虑的是如何弄到良田美宅，搜括钱财。张士诚等人腐朽透顶，早已背叛了人民的利益，成为人民的罪人了。

1363年2月，乘着北方红巾军宋政权十分衰弱的情况下，张士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派吕珍攻占安丰。

这一段时间内，朱元璋把主要力量用来对抗陈友谅，所以张士诚的日子比较好过些。1363年9月，张士诚自称吴王，请求元朝批准，元朝不准；元朝要张士诚运粮，张士诚不给。双方关系又紧张起来。

1364年8月，张士诚为了进一步在江浙地区建立一个割据的独立王国，逼迫元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木儿让位给张士信，达识帖木儿没有办法，只好交出权力，移居到嘉兴，不久就被毒死在那里。张士信当了丞相后，还是只顾寻欢作乐，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大小政事全由黄敬天、叶德新、蔡彦文三个文人办理，老百姓气极了，编了一首十七字歌谣来讥讽这伙人：

丞相作事业，专用黄菜叶，
一朝西风起，干瘪！

张士信一伙专权后，由于任用亲信、排除旧将，造成了

将帅之间离心离德。将领带兵打仗，多不听命令，有的装病卧床不起，非得加官赏赐之后才勉强出兵；军队出征时，不是带着妓女歌舞享乐，就是带着那些善于高谈阔论的人下棋欢宴。吃了败仗、丧师失地回来，张士诚也不问。军纪败坏到了这样的地步！和生气勃勃的朱元璋相比，张士诚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

五、朱元璋集团的崛起和元的灭亡

朱元璋集团的崛起

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安徽凤阳人。幼时给地主放羊，17岁时因父母长兄相继去世，入皇觉寺为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郭子兴红巾军。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识得一些字，很快就被提为亲兵九夫长，留在郭子兴的身边。郭元帅见他年纪虽轻，却有见地，有胆略，交给他办的事情，无不办得很好，又很得下面战士的心，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材，就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他。朱元璋做了元帅的女婿，他在军中的地位也就与众不同了。

这时濠州城里有五个元帅，互不服气，互不统辖，时常在闹矛盾，五股力量合不到一块。打下濠州大半年，竟不能出濠州城一步。朱元璋看出，长此下去，不是自家闹事火拼，就是要被元军吃掉；如果想干一番事业，就非得发展队伍、扩大地盘不可。于是，他回到老家钟离乡，竖起一面招兵大旗，

小时候的放牛朋友徐达、周德兴和乡里的几十个青年都来投军。这些人后来长年在朱元璋身边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又同是淮西人，逐渐地就都被任命为带兵的将帅，形成朱元璋军队中的骨干。不上十天功夫，朱元璋就招募了700人，郭子兴见此大喜，升他为总管。朱元璋不愿局促呆在濠州，想到外面继续发展队伍，扩大势力范围。他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就带着徐达等24位贴身体己的将士往南攻打定远。

定远被攻克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俩带着队伍前来投顺。冯家兄弟是个中小地主，因害怕红军，组织乡兵，结寨自保。他俩听说朱元璋吃掉了附近的两支地主武装，又听说朱元璋打下定远后军队纪律还不错，就带领自己的乡兵主动归顺。朱元璋见他兄弟俩身着儒服，知道是个读书人，就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冯国用回答说：“金陵（今南京）的地理形势正如古人所说的龙蟠虎踞，是帝王建都的地方。您可先攻下它作为根据地，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取财宝女色。这样，天下是不难平定的。”朱元璋听了非常高兴，把他兄弟俩留在军中，参预机务。

紧接着在进军滁州（今安徽滁县）的途中，定远人李善长到军中谒见。李善长也是地主出身，从小读书，研究法家学问，颇有智谋。见面后，朱元璋问他：“如今四方战乱，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答道：“秦末大乱时，汉高祖以布衣起兵，他为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乱杀人，五年而成帝业。”他接着说：“你是濠州人，距刘邦的家乡沛县不远，只要你认真学习这位老乡的长处，天下是可以平定的。”朱元璋听后连声称善，把李善长也留在身边，帮助筹谋划策。李

善长的这次谈话对朱元璋的影响很深，自此，他事事以刘邦为榜样，一直到建国后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也都是向刘邦学习的。

文人们的一席话更使朱元璋立下雄心壮志，也使他更加明白读书人的用处，懂得历史上许多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都写在书上，只有读书人才能取得这些知识。但是，自己书读得很少，没有读书人的帮助，要取得天下是不可能的。从此，他对有学问的读书人更加尊重，只要能提出合理的建议，都给予优厚的待遇，也就是所谓“礼贤下士”。

要想成大事，首先就得整顿军队纪律，取得老百姓的支持。但是，起义军的成分复杂，其中有投降的元朝官军，也有收编的地主武装，因此，不少士兵染上了元军抢掠奸淫的恶习。朱元璋下决心整顿自己部队的纪律，使自己的军队成为一支仁义之师。打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后，他看到将士掠人妻女，搞得百姓夫妻母子不能团圆，就召集诸将说：“诸军自滁州以来，不少将士掠人妻女。军队如果没有纪律，怎么能安定民众呢？”他下令把营中抢来的妇女全部放出，让其亲人认领。营门外，早就在等候的父母、丈夫、儿女重又和自己的女儿、妻子、母亲团聚，一时悲喜交集，哭声、欢笑声融成一片。自此以后，每攻下一城，都严申纪律，叫李善长这班文人写成布告，到处张贴，并派执法队沿街巡逻。在渡江攻进太平（今安徽当涂）时，一个士兵违犯纪律，马上被斩首。后来接受杭州投降时，主将李文忠睡在谯楼，不住民房。有一个士兵私自向百姓借铁锅，被斩首。将士出征前，朱元璋每每告诫他们：攻下一城，不许妄杀，不许掳掠。他

常说：“取得地盘，如果没有百姓，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当时，群雄并起，大多只图子女玉帛，不惜荼毒生灵，朱元璋以夺天下为目的，约束军队，纪律严明，因之仁义之声远近传闻，有些地方举城归降，省了许多攻城之力。这也是他战胜群雄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元璋对下面的将士赏罚分明，有功必奖，犯了过错，即使是主要将领，也不能随便饶过。当时军队曾一度缺粮，军中严禁喝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犯了禁令，朱元璋准备按法令行事，有一个官员提醒说，胡大海正在前方带兵打仗，杀了恐怕不妥当。他一听更加愤怒，说：“宁可使胡大海反了，也不可坏我号令！”说完，亲自抽刀把他杀掉。由于朱元璋执法严厉，所以在他的军队里没有行不了的号令。

至正十五年（1355年）三月，郭子兴病亡。这时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又称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龙凤。郭子兴死后，小明王就任命其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军中文告均用龙凤年号。不久，郭天叙和另一副元帅双双战死，朱元璋遂成为大元帅，郭子兴的旧部全都归他指挥。

朱元璋在开始的头几年，地狭人少，力量单薄。因此，他用优待降人的办法，瓦解敌人，壮大自己。至正十六年（1356年）春二月，在攻打集庆（今南京）的战斗中，元将陈兆先战败，率所部 3.6 万人投降。这些降兵不清楚朱元璋将如何处置他们，内心疑惧不安。朱元璋觉察到降兵的疑虑，就在 3.6 万人中挑选了 500 个骁勇健壮者，把他们带到自己营房，夜里让这 500 人环绕自己睡觉，而他自己平时的卫士一个也

不留。朱元璋脱下战甲，倒头酣然入睡，一觉直到天明。第二天，这 500 勇士非常感激朱元璋对他们的信任，在攻城时个个奋勇先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那 3 万多士兵也都安下心来为朱元璋效命。

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把它改为应天府，以它为中心，东起句容至溧阳，西起滁州至芜湖，把这么一块地作为向四周发展势力的根据地。虽然地盘不大，有被吃掉的危险，但也正因为他目标小，不招引元朝的注意。而且，这时他的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这样，东、西、北三面都有别股力量隔着，不与元军直接接触，只有南面有零星几支元军。而这时元朝的主力正在北方和刘福通激战，无力他顾。他利用这一有利形势，消灭周围一些处于与大部队隔绝、孤立、分散的元军、地主武装和其他割据政权的军队。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今安徽贵池）、徽州（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应天周围的据点都在至正十六年至十七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被攻克。至此，朱元璋的地盘更大，根据地更巩固，已有足够的力量向更远的地方发展。于是，他决定集中兵力，出击浙西、浙东，消灭该地处于孤立无援的元军。

当攻下徽州时，朱元璋召见名儒朱升。朱升向他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第一条是巩固后方军事；第二条是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第三条是不要急着称王，以免树大招风。朱元璋对这三条十分赞赏，留朱升在军中办事，他的建议也逐步实施。至正十八年（1358 年），他任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等项农业生

产的工作，并拨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定下生产任务，超产者赏，没完成的罚。这些措施解决了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不上几年的时间，粮食堆满仓库，军队不愁乏粮，也减轻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农民负担，军民皆大欢喜，增强了日后战胜群雄的经济实力。

到至正十九年（1359年），婺州（今浙江金华）、诸暨、衢州、处州（今浙江丽水一带）等地又被攻克。浙东的攻取，不仅使朱元璋得到一块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好地方，有着经济上的重大意义；而且消灭了这里的元军，也消除了日后与其他群雄决战时的后顾之忧。这一年，小明王任命他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

浙东虽已平定，但地方上的望族刘基、叶琛、章溢还躲在深山里，不肯出来。他们三人都当过元朝的官，抗拒过红巾军。朱元璋派人带了厚礼，并叫军中的文人写了好多书信，再三地聘请。刘基等人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并不与地主作对，才答应出山。这三人和婺州的宋濂一起被请到应天。朱元璋称他们为四先生，特地为他们盖了一座礼贤馆，恩礼备至。他还经常叫宋濂等人为他讲经史，认为这些东西对他很有用，学得很认真，常常和宋濂在一起研究儒家的经典和历史上的成败原因。刘基则为朱元璋明确提出了先图陈友谅，后取张士诚，然后举兵北伐一统天下的策略，这对朱元璋最终统一天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从此，朱元璋已由一个小步卒发展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他的政治地位变了，再也不用反对阶级压迫来号召起义，而是突出了民族斗争的口号。攻下婺州时，他在衙门前树了两

面大旗，上写“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用来号召一切反元力量，争取那些不满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地主阶级加入自己的阵营。

灭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

朱元璋针对西有汉国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东有张士诚的形势，决定对东南取守势，集中兵力消灭力量最强的陈友谅，而陈友谅也欲吞并朱元璋。1360年（至正二十年）陈友谅密约张士诚夹攻朱元璋，但张士诚慑于朱元璋的兵力，不敢出兵。陈友谅乃独自率兵东下，占领安庆、池州、太平，进驻采石矶，逼近集庆。陈友谅志骄意满，以为集庆期在必克，而朱元璋则集中优势兵力，层层设伏，诱敌深入，结果在龙江关（南京市西北）一战，陈友谅主力几乎被全歼，朱元璋收复太平。1361年朱元璋亲攻陈友谅，破安庆水寨，占江州等地，接着陈友谅的守将胡廷瑞等投降朱元璋，袁州（江西宜春）、饶州（江西波阳）、建昌（江西南城）、吉安诸城相继而下。陈友谅于1363年4月率兵救援洪都，进抵湖口，朱元璋撤洪都围，迎战于鄱阳湖。当时陈友谅拥兵60万，巨舟大船。联成阵势。朱元璋兵力只有20万，又因船小，仰攻不利，但机动灵活。七月，双方展开决战，开始陈军占优势，后朱元璋利用东北风起，发动火攻，陈军舰船被焚数百艘，败退草鞋山。朱元璋旋即封锁鄱阳湖到长江的出口，八月陈友谅在突围时中流矢而死，其子陈理逃奔武昌继位。1364年朱元璋进兵武昌，陈理势穷投降，汉政权灭亡。

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之后，即回师东进，兵锋直指东面的张士诚。1365年10月朱元璋发布讨伐文告，以徐达为大将军，率师东进，其方针是先取长江以北的通、泰诸郡，翦其羽翼，再取浙东，然后一举扫灭张士诚。徐达先攻占泰州、通州、兴化、盐城、高邮等地夺取了张士诚长江以北的地盘；又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了对平江的包围圈。1367年9月攻破平江，张士诚被俘至应天，自缢而死，这时方国珍为了抵抗朱元璋，便北通元将，南交福建陈友定，准备对抗朱元璋。

朱元璋在消灭张士诚后，即派兵分两路进攻盘踞浙江的方国珍。朱元璋军一路势如破竹，方国珍败逃海中，仍难以摆脱追击，不得不在1367年11月投降。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的相继平定，使朱元璋据有长江中下游大片富庶土地，拥有强大的军队，具备了推翻元朝，统一全国的实力。

朱元璋北伐与元朝的灭亡

正当朱元璋逐个削平南方群雄的时候，北方军阀集团之间的火并愈演愈烈。至正二十年（1360年）以后，孛罗帖木儿以元顺帝及其支持者老的沙、秃坚帖木儿一派做靠山，联合张良弼，拥兵跋扈。扩廓帖木儿则以奇皇后、皇太子及其支持者搠思监、扑不花一派为后台，联合李思齐，锋刃相抗。双方旗鼓相当，在中原、关陕一带混战不休。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搠思监、扑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逼元顺帝下诏解其兵权，削其官爵。孛罗帖木儿不服，发兵

入大都，皇太子逃。元顺帝执搠思监、扑不花，并复孛罗帖木儿官爵，孛罗帖木儿才回师大同。皇太子命扩廓帖木儿讨伐，孛罗帖木儿再次兴兵进攻大都，皇太子败，走太原依扩廓帖木儿。元顺帝命孛罗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总制天下兵马。

皇太子企图在太原称帝，扩廓帖木儿不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扩廓帖木儿举兵伐大都，孛罗帖木儿战败，七月被刺死于宫中。奇皇后要扩廓帖木儿带重兵拥皇太子进京，逼元顺帝让位，扩廓帖木儿不肯。九月，扩廓帖木儿驻师大都城外三里，以数骑入朝，元顺帝命为中书左丞相。扩廓帖木儿拥兵恃强，既结怨于奇皇后、皇太子，又为元顺帝所忌，在大都站脚不住，只好请求出外带兵。闰十月，元顺帝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制关、陕、晋、冀、山东诸路兵马，代皇太子出征南方。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扩廓帖木儿回河南军中，下檄调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四将统兵前来会师，李思齐等抗命不听。扩廓帖木儿见军令不行，暂罢南征，引兵西向进攻关陕。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李思齐等会盟于长安，合力抗拒扩廓帖木儿军，双方争战数百次，胜负难分。七月，扩廓帖木儿调部将貊高、关保等捣凤翔，貊高等倒戈不进，并列其罪状上报元廷。十月，元顺帝下诏夺扩廓帖木儿统兵权，只领本部兵马，特设抚军院，以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扩廓帖木儿统兵权被削后，驻军泽州。皇太子为防扩廓帖木儿再起，又命李思齐、貊高等发兵围攻。

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把被红巾军打得七零八落的元朝

残余军事力量进一步削弱了。

朱元璋攻取东吴以后，洞察这一形势，及时地决定了北伐的方针和策略。吴元年（1367年）十月，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由淮入河，进军北伐，决定：“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然后进兵元都”。也就是先肃清外围的守敌，待到“天下形势入我掌握”，“彼势孤援绝”之时，一举夺取元朝的统治中心。

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朱元璋在大军出发前，告诫诸将说：“汝等师过，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还发布由宋濂起草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人民的檄文，申明北伐的目的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号召各地人民不要逃避，“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宣布：“予号令严肃，无秋毫之犯，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

朱元璋的北伐檄文，具体而明确地提出了重建汉族封建王朝的目标，有利于消除元政权下汉官汉兵的敌对情绪，分化蒙古、色目贵族集团的抵抗力量，同时也符合饱经军阀混战之苦的各族人民要求统一和安定的强烈愿望，因而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为北伐的胜利进军铺平了坦途。

北伐大军按既定方针，先取山东。徐达兵驻淮安，遣人往沂州招降盘踞山东的元淮南淮北义军都元帅、沂国公王宣父子。王宣假意奉表投降，暗派其子王信往莒州、密州求援。朱元璋推断王宣投降有诈，令徐达带重兵往沂州，以观其变，相机进取。十一月，徐达率军进驻沂州北门外，派人入城劝降，王宣口头答应，来使出城后却闭门拒守。于是徐达督军进攻，王宣被迫出降，莒州、峄州、海州、沭阳、日照、赣榆等地元军跟着相继投降，王信走山西。徐达取沂州后，兵向益都，并分兵扼黄河要冲，断益都元军后援之路。益都守将、元平章老保企图顽抗，但得不到河上援兵，很快就被势重力专的徐达大军所打垮。取益都后，徐达又连下寿光、临淄、昌乐、高苑、潍州、胶州、博兴等地。十二月，徐达进至济南，守将瞻同脱因帖木儿（扩廓帖木儿之弟）遁，其属将献城投降。部将汪兴祖也连克东平、济宁。至此，山东诸郡纷纷望风降附。

在北伐大军进取山东、撤除元廷屏蔽的胜利声中，朱元璋在李善长等人奉表劝进下，在吴二年（1368年）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

洪武元年（1368年）三月，徐达实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门槛”的作战计划，引舟师由郢城渡黄河，直趋汴梁。元将左君弼、竹昌迎降。四月，徐达大军西下河南府（洛阳），大败元军于洛水北，元梁王阿鲁温降。又乘胜收复荥阳、福昌、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河南

平”。同时，徐达命冯宗异（即冯国胜）、康茂才等分兵取陕州。五月，冯、康等长驱崤函，直抵潼关，据关而守，阻住了李思齐等援军东来之路。至此，战局已经明朗化，大都的克复指日可待。于是，朱元璋亲到汴梁，从容布置进克大都战略。

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率师北上，经彰德、磁州、广平，大会诸将于临清。接着，马步舟师沿运河北进，克德州，下长芦、青州，至直沽，元将也先自海口逃遁。二十七日，进克通州，元顺帝闻报大惧，于次日夜三鼓带后妃太子出居庸关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军从齐化门填濠登城，克复大都，元朝亡。

第六节 元代的文化

一、哲学和宗教

程朱理学的提倡

始创于宋代理学，中经二程（程颢、程颐），至南宋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学的正宗。但由于宋金对峙，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理学在北方的广为传播始于赵复被俘到北方以后。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

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5年窝阔台伐宋,攻破德安,赵复被俘,欲赴水自沉,被姚枢救出留在幕中,后随姚枢至燕京,受到忽必烈召见。忽必烈在燕京立太极书院,请赵复传授程朱理学,培养了一批理学家,姚枢、许衡、刘因等皆出其门。

许衡、刘因、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许衡曾配合元朝推行汉法,为元朝立官制、订朝仪、兴教育作了很大的贡献,又和刘因共传江汉之学。吴澄一生从事教育,弟子众多,他虽授受朱学,但却能调和朱、陆之学。他的学说继承了朱熹“理在气先”的精华,并提出“以道事君”,即在理论上把推行道学与推行汉法相结合,并广加宣传。许衡曾向忽必烈讲授《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并阐发了孔子“为君难”的思想,指出为君必须做到修德、用贤、爱民。由于理学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元朝统治者便大加称颂,如武宗加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仁宗还下诏让许衡从祀孔子庙廷,又于1313年诏令考试和教学以朱熹章句集注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但另一方面元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把学校和书院视为汉人、南人的专利,屡加破坏;蒙古贵族又重释抑儒,故民间有“九儒十丐”的说法;元统治者标榜理学,重用许衡等儒士,是制造顺民,笼络江南地主,维护蒙古贵族统治的欺世之谈。总之,元代理学虽不如南宋发达,但其对于儒学发展至明清阶段的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不应抹杀的。

邓牧的“异端”思想

邓牧(1247—1306),字牧心,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南宋灭亡时，邓牧已到了而立之年。社会的大动荡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变化，他的后半生基本上是怀着悲愤的心情在“遍游方外，历览名山”（《洞霄宫图志·邓文行先生传》）中度过的。1305年，元廷派道教大宗师吴全节（字成季，号闲闲，1269—1346）前往邓牧隐居的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请他出山做官，被邓牧拒绝。次年，邓牧无疾而卒。

邓牧的挚友有谢翱（字皋羽，号唏发子，1249—1295）、周密（字公谨、号草窗，1232—1298）二人，他们在南宋灭亡后同以“抗节遁迹”著称。谢、周二人著述多涉时政，而邓牧传世的著作《伯牙琴》，则极少直接论及时事，主要是通过谈论山水、叙述寓言以及一般性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伯牙琴》之命名，就是借用古代钟子期为俞伯牙知音的典故，希望世上再出现一个钟子期；懂得自己的“琴声”，理解自己的心意。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包含着现实政治的深刻批判，尤其是对秦汉以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

在《伯牙琴·君道》一文中，邓牧对封建国家的最高政治代表——君主进行了分析。他说：尧、舜等上古时代的君主，只为大家服务，并不享有特权。因此当时不以君位为贵，往往互相推让。后世的君主则不然。他们“竭天下之财以自奉”，凡是能用来“固位而尊养者”，无所不用其极。并且“惴惴然若匹夫怀一金”，生怕别人抢占。结果，君位就成了人们觊觎、追逐的目标。在此，邓牧实际上已经暗示：君主是封建国家中最大的剥削者，君主专制制度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在《吏道》篇中，邓牧对封建国家的大小官吏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他说：上古时期的官吏员数不多，又没有什么特权，“故为吏者常苦不得已，而天下阻受其赐”。后世则不然：“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官吏中大的食邑数万，小的就算没有多少俸禄，也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巧取豪夺。这类官吏事实上和盗贼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用他们治理国家，就好像是“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何可得也”！由此，邓牧对下层人民群众的造反行为表示了同情。他说：人的天性都一样，绝没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的道理。凡是老百姓造反，必有其不得已的原因。“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在此，邓牧实际上已近乎肯定了下层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合理性。

不过，邓牧的政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他看不到历史的进步，过分美化上古时代的生活，并且希望回到“废有司，去县令，使天下自为治乱安危”（《吏道》）那样的社会状态。尽管如此，邓牧在历史上仍不失为具有民主性、反封建性的一位杰出思想家。

金元时期的全真教

金大定三年（1163年），陕西咸阳道士王喆与道士和德瑾、李氏结茅刘蒋村，倡道关中。大定七年（1167年）王喆自焚其居，东行至宁海（今山东牟平）收马钰（道号丹阳）为弟子。后陆续收谭处端（长真）、刘处玄（长生）、丘处机（长春）、王处一（玉阳）、郝大通（广宁）、孙不二（清静散人）等人入室，这就是后来的全真道北宗七真。

大定八年（1168年）王喆等在宁海创建三教七宝会。次年，建三教金莲会，在福山县成立三教三光会，至登州建三教玉华会，至莱州建三教平等会。从而创立了全真道。

全真道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三教圆融，勿分彼此。王喆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鄙视服饵药石，烧炼外丹，祈禳禁咒等修道方法，吸取了禅宗的“见性成佛”观点，主张“养气守神即内丹”。认为心性为本、性命为末，心性清净、不染杂念，精、气、神自然不会外泄，也就能“独全其真”了。因此，全真道以清修为得道法门，不婚配、不食荤腥。无论出家为道士，还是在家修行，都强调身安、心净、意诚，于“清虚冷淡，潇洒寂寞”中“识心见性”，以证大道。

全真道的教义投合了士大夫的情趣，给身处乱世的人们找到一条遁世之路，逐渐在各地流行开来。大定十年（1170年），王喆去世。遗著有《重阳全真集》、《重阳立教十五论》等，均被奉为全真道典籍。马钰等人分头传教，辛苦奔波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信徒日益增多，形成了全真道的七个门派。即：马钰的全真遇仙派，谭处端的全真南无派，刘处玄的全真随山派，丘处机的全真龙门派，王处一的全真崑山派，郝大通的全真华山派，孙不二的全真清静派。

全真道的发展引起了金朝的重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金世宗召见王处一。这时马钰、谭处端已去世。次年，又召见丘处机。向其询问保养之术，未得要领。金章宗即位后，担心全真道像张角一样造反，于明昌元年（1190年）以“惑乱民”的罪名，下令禁止全真道。承安年间（1196—1200

年)，一些将相为全真道辩解，金章宗又放松了禁令。并召见王处一封其为“体玄大师”，赐给一处道观。不久，又召见刘处玄，让他住在有名的天长观里。金章宗宠妃元氏遥礼丘处机，送给王处一、丘处机《道藏》各一部。于是全真道迅速在北中国流行开来，成为北方一大道教教派。

全真道得到封建王朝的认可后，与统治者的关系日益密切。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年），山东爆发杨安儿、耿格等人起义，丘处机亲至山东劝谕道众、民众不要反叛朝廷。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派使节邀请丘处机西行。丘处机率18名弟子登程，经历10余国，行程万余里，于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年）到雪山朝见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他长生之术，他对以“清心寡欲为要”，并劝告说：“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希望成吉思汗以敬天爱民为本。这些劝告对减少蒙古军的杀戮多少起了作用。成吉思汗称他为“丘神仙”，下诏由他管领天下道众，赐以虎符、玺书，免除全真道士的赋役。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年）丘处机在成吉思汗派出的千骑护送下从漠北回到燕京。丘处机在燕京住于大天长观（太极宫，后改名长春宫）。四方招揽徒众，人数大增。全真道达到极盛，成为北方最大的道教教派。

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丘处机去世。弟子尹志平、李志常、宋德方等嗣其教业。窝阔台汗九年（1237年），宋德方秉丘处机遗命整《道藏》，至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年）完成，凡7800余卷，名之曰《玄都宝藏》。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崇信佛教，全真道地位下降。蒙哥汗八年（1258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八年（1281年），道教徒两次在大

都与佛教徒辩论失败，被迫焚毁部分经书。但总的来说，元朝统治者对全真道还是保护的。元世祖曾封丘处机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刘处玄为长生辅化明德真人，谭处端为长真云水蕴德真人，马钰为彤阳抱一无为真人，郝大通为广宁通玄太古真人，王处一为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孙不二为清静渊真玄虚顺化元君。元武宗时（1308—1311年），又加封丘处机为长春全道神化明应真君，刘处玄为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人，马钰为彤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郝大通为广宁通玄太古真君，王处一为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直到明清时期，全真道仍然是北方势力强大的道教教派。

对各种宗教的宽容和利用

元朝时候，各种宗教都比较兴盛，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为什么呢？因为蒙古统治者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政策。

蒙古人原来信萨满教。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信仰万物有灵，尤其信仰“天”。“天”是至高无上、永恒不灭、力量无穷的，这就是元朝诏敕中总是写在最前面的“长生天”。但是萨满教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义和仪式，因而还不像其他宗教那样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蒙古贵族接触到了许多宗教，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不取此舍彼，不尊此抑彼。他尊敬各宗教中虔诚的、有学识的人，乐意向他们优礼求教。他只是要求他们各自宣扬的教义符合他对长生天的信仰，要求他们用

各自的宗教仪式来为自己告天祝寿，要求他们用各自的宗教权威来使自己的信徒们顺从蒙古的统治。这样，蒙古武力所到之处，各种宗教都渐渐成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除贵由比较倾向基督教外，其他诸汗本人都保持着萨满教的信仰。但是，后来的忽必烈不同，他特别尊崇佛教，而且本人终于改信了佛教在西藏的分支喇嘛教。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变化是各民族接触过程中蒙古族较落后的文明接受较先进的文明的表现之一。而忽必烈之所以接受了喇嘛教，恐怕是因为喇嘛教的教义和仪式与萨满教较为合拍，同时，喇嘛教以及佛教在元朝疆域内影响最大。

忽必烈本人虽然信了喇嘛教，但是他基本上保持了成吉思汗以来的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的态度。说他是“基本上保持了”，因为他有时候表现有所偏袒。譬如佛教与道教之间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在蒙哥时代，两教的首领已在和林汗廷进行过两次辩论。在两次辩论中，道教均告失败。第二次辩论实际上是由忽必烈主持的，辩论结束以后，17名理屈词穷的道士削发为僧，许多道观改为佛寺，不少道教经典毁为灰烬。他即位以后也还打击过道教势力。另外，忽必烈对伊斯兰教的教义也产生过怀疑。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是宿敌。有一次，一个基督教士告诉忽必烈《可兰经》中有“杀尽所有多神教徒”的话。忽必烈听后大怒，因为他信奉喇嘛教，他觉得自己也在被杀之列。他召来一个伊斯兰教士，问道：“真主是那样说的吗？”那教士说：“是的。”又问：“你们为什么不杀呢？”回答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忽必烈气极了，把那教士杀了。

后来另一个教士对他解释说：“陛下以真主之名冠于诏令之首，陛下不是多神教徒。”听了这样的巧辩，忽必烈才息怒。不过，大体上说，尊崇佛教而又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这是忽必烈基本的宗教政策。马可·波罗曾经记述忽必烈的如下谈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有摩诃末（穆罕默德），犹太教徒说有摩西，偶像教（指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元廷对各个宗教的要求和待遇是一样的。在大的寺、观、教堂的所在地，元廷往往立有石碑。在这种石碑上一般都刻有如下的文字：“……皇帝圣旨里：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拣甚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么道有来。如今依着在先圣旨体例里，不拣甚么差发休着者，与咱每告天祈福者么道。……这的每庙宇房院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祗应休拿者，商税地税休与者。但属他们的水土、园林、碾磨、铺席，不拣甚么他每的，休倚气力夺要者。……”对于佛教、基督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僧侣们来说，他们都只纳商税地税（起先免纳，规定纳后也不严），而不充当任何差发，他们的职责都在于为皇帝告天祝寿祈福。使臣不得占用他们的庙宇房院。他们所有的土地财产，不得强夺。这些特权，各宗教的僧侣同样享有。此外，元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

当然，由于皇帝的尊崇，佛教的势力最大。据1291年的统计，全国共有寺宇42318所，僧尼213148人。大的寺宇，僧从多至数百上千。一些上层僧侣在地方上仗势欺人，霸占土地，搜括民财，奸淫妇女，以致戕害人命。忽必烈任命的江淮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在浙江一带把南宋故宫改成梵刹，大

肆掠夺财宝，甚至发掘南宋帝陵和大臣冢墓达 100 余所，成了当时骇人听闻的事件。道教虽然遭到一些打击，但势力仍旧不小，在北方主要是全真教派，在南方主要是正一教派，太一教派的掌教教师也一度受到重视。即使在中国未扎深根的基督教，它的发展也令人注目。一部分蒙古人和色目人信仰了基督教。尤其不可忽视的是传统上信奉基督教的阿速人、钦察人和斡罗思人都组成了重要的卫军。1315 年时，全国也里可温掌教司达 72 所，全国各地几乎都有也里可温的活动。当时，元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各宗教的事务。宣政院，院使从一品，掌管佛教；崇福院，院使从二品，掌管基督教；集贤院，院使从二品，掌管道教。伊斯兰教由地方官兼管，没有专设机构，可能是因为在内地只有一些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信奉而且他们并不从事传教活动。掌教机构的院使，官品都很高，这也说明了元廷对宗教的重视。

元代的大都是各种宗教活动的中心。在宫廷内，各教的僧侣经常为皇帝祈祷。大都城里，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萨满巫祠，什么神圣的殿堂都能见到。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动使大都笼罩着光轮。宗教以其特殊的手段佐理着元代帝王的统治。

二、史 学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马端临，字贵与，乐平（今属江西）人。马端临的父亲

马廷鸾，少时家贫，他自己说：“绍定之元，先人即世，兄才九龄，弟甫四岁，我生七年，亦未毁齿，母抱群雏，家徒四壁，画荻而教，采杞而食。”（《碧梧玩芳集》卷20，《祭亡弟总干文》）据此，可推马廷鸾当生于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据《宋史》本传等材料，其卒年应是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马廷鸾“甘贫力学”，登淳祐七年进士第，调池州教授，前后计六年时间，马端临出生在池州。宝祐二年，马廷鸾调主管户部架阁，三年迁太学录，召试馆职。他对外戚厉文翁，内侍卢允升、董宋臣把持朝政很反感，在试策中，申言要“强君德、重相权、收直臣、防近习”，为此，得罪一些权贵。后丁大全把持朝政，企图拉拢马廷鸾，廷鸾不理睬这一套。贾似道专权，马廷鸾不与之亲近。马廷鸾于宋咸淳五年（1269年），进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三年以后求退。马廷鸾与贾似道不合，受到排挤。马廷鸾著作有《碧梧玩芳集》、《读史旬编》、《语孟集传》等。《碧梧玩芳集》今传。其主要史学著作是《读史旬编》。

《读史旬编》是他“暮年之作”，开始写作是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冬，历时三年，成于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四年以后，廷鸾即辞世。《读史旬编》全书38帙，汇集了经史百氏嘉言善行以及前贤议论并断以自己的见解，在编纂体裁上吸收了吕祖谦、邵雍、朱熹以及张栻的成果，写出上自唐尧，下至后周世宗显德七年的历史。《读史旬编》今佚，《碧梧玩芳集》中有一卷《读史旬编》的材料。马廷鸾的综罗文献的写史治学方法对马端临写《文献通考》有重要的影响。

马端临的史学渊源另一个来源，是其师曹泾。曹泾，字

清甫，休宁人。曹泾是朱熹的续传。入元，曹泾曾为紫阳书院山长，卒年 82，著述较丰，但可能未曾刊刻，因此，记载称这些著作“藏于家”。马端临师事曹泾，受朱学的影响，因此，《文献通考》中不少议论与朱熹的观点相近。

马端临以荫补承事郎，宋亡不仕，著《文献通考》。留梦炎与马端临父亲马廷鸾同在宋做过宰相，想用马端临，马端临以亲老辞。廷鸾卒，马端临曾为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教授台州路。元至治三年（1323 年）三月，在家辞世。

《文献通考》有“文”，即叙事本之经史，参之以历代会要和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有“献”，即前贤诸儒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只要是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即使是一言一语也采而录之。另一部分是马端临的议论。全书有总序，每考之前一般都有序文。

《文献通考》24 考，包括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金杂、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这包含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民族、边邻、风俗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封建社会的剖视图。《文献通考》比《通典》加重了经济生活的内容的记载，并且把“田赋考”放在首位，这很能显示马端临的见解。

马端临在论述按语中，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并且提出要探求历史变化的变通因张弛之“故”，要寻求历史中的必然了。他认为古代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施行有一定的条件，到了宋代再谈恢复封建、井田，是书生之论。但他又把

封建、井田的施行归之于三代有“公天下之心”，这又看出他思想的局限。他也认为历史发展有阶段性的区别。对王安石的变法他基本上是赞同的，但对某些措施也有批评。马端临生活在宋末元初的历史大变动时期，他通过文献的综罗，来思考历史的兴衰。《文献通考》也是两宋三部通史巨制（另两部是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之一，与郑樵《通志》、杜佑的《通典》一起合称为“三通”。

其他史学名著

元朝建立后，就沿袭中原旧制，很注重编写《实录》，至元年间成书的有《圣武亲征录》、《元太祖实录》。《圣武亲征录》记载成吉思汗一生的主要事迹，兼及窝阔台一朝的历史。以后承袭此制，各帝死后，都由翰林园史院或指定史官编纂《实录》，从成吉思汗到顺帝共14帝，共有13部《实录》，只有顺帝因国亡因未及编写。现13部《实录》已佚，但是明洪武二年修的《元史》中保存了部分内容。

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制度，于元顺帝时修成了《宋史》、《辽史》、《金史》。《辽史》116卷，篇幅最短。《金史》135卷，详细得当。《宋史》496卷，卷帙浩繁，是24史中规模最大的官修史书。元顺帝时，宰相脱脱自为总裁，参加修史的有汉族、畏兀儿族、蒙古族的学者，开创了各民族史学家合作修史的先例。三史因成书仓促，谬误，牴牾之处甚多。但也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

《资治通鉴注》的作者胡三省，是南宋时与文天祥、陆秀夫同科的进士，南宋灭亡后隐居不仕。因《资治通鉴》征引

史事不易读懂，需要训释之处很多，便写成了《资治通鉴注》，共 294 卷。胡三省对《资治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通鉴注》是后人读《通鉴》的一部不可少的参考书。《资治通鉴》的另一名注是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14 卷，成书于 1280 年，内容包括历代州城、都邑、十道山川、各国地理形势及唐代河湟 11 州、后晋幽云 16 州的诠释，记叙简核，对后人读《通鉴》颇有帮助。

《蒙古秘史》这是 13 世纪蒙古国官修的史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作者佚名。该书从成吉思汗的 22 代祖先写成，记叙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起源时的史事。书中突出记载成吉思汗的生平业迹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当时的社会组织、军政制度、部落战争和社会意识等方面的宝贵史料，是一部资料丰富的蒙古典籍。

三、语言、文学和书法艺术

《中原音韵》的成就

《中原音韵》是中国古代韵书。元周德清著，初稿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定本大约刊印于元元统元年（1333）。

周德清（1277—1365），字挺斋，元江西高安人。音韵学家、戏曲家。著作除《中原音韵》外，又作有许多散曲，收在元杨朝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中。

周德清作为一个散曲作家，对于北曲的创作和演唱都有深入的研究。他鉴于当时一些作家和艺人的不讲究格律，同

时为使北曲的体制、音韵和语言具有明确的规范，于是把当时著名戏曲家关汉卿、马致远等人作品中的韵字汇编成韵谱，并根据自身的体验总结出一套创作方法，写成了《中原音韵》一书。

《中原音韵》共2卷，分为两大部分：一、韵谱。收集了曲子里常用作韵脚的5000多字，按照当时北方话的语音系统加以分类编排。二、正语作词起例。这是关于韵谱的编制体例、审音原则和宫调的创作方法的说明。

《中原音韵》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曲韵韵书，其中的有关理论和创作方法是从当时北曲的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材料归纳出来的，因此在戏曲史上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对于北曲的创作和演唱发挥了很强的规范作用，尤其是在审音定韵方面，后人甚至“兢兢无敢出入”。（明王冀德《曲律·论韵》）即使在北曲衰替、南曲勃兴的时候，南曲韵书如范善溱的《中州全韵》、王鹄的《中州音韵辑要》、周少霞的《增订中州音韵》等，也无不承袭《中原音韵》的编制体例。

《中原音韵》又是历史上第一部以当时口语为描写对象的韵书。在此以前，《切韵》一系的韵书都是把当时甚至前代的文学语言的读书音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而读书音总是跟当时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活生生的口语有着一定的距离。周德清则不然。他批评“动引《广韵》为证”的人是“泥古非今，不达时变”，指出：“欲作乐府，必正言语，必宗中原之音。”（《自序》）同时周氏一再申明他的书是根据“前辈佳作”，而十三四世纪的北曲语言是极为接近当时口语的，由此可见，周氏之书实在是当时中原雅音的忠实记录。也正因为

如此，所以此书就不只是后人研究戏曲的重要参考，而且也是后人研究十三四世纪近代语音的重要史料。

《中原音韵》共分 19 个韵部，即东钟、江阳、支思、齐微、鱼模、皆来、真文、寒山、桓欢、先天、萧豪、歌戈、家麻、车遮、庚青、尤侯、侵寻、监咸、廉纤。每一韵部中又以四声分类，即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在每一声调中，又以同音字分组，同音字组之间用圆圈隔开。此书不立入声韵，入声字分别附在平声阳、上去和去声之后。据研究，《中原音韵》包含声母 21 个、韵母 46 个，声调 4 个或 5 个。其中最重要的语音现象是：1. 浊音清化。中古全浊声母普遍清声母化，如果这个全浊声母是塞音，那末在平声字中变为相应的送气清声母，在仄声字中变为相应的不送气清声母，如果这个全浊声母是擦音，则变为相应的清擦音。2. 平分阴阳。中古的平声依据声母的清浊分为阴、阳两调，凡清声母为阴平调，浊声母为阳平调。3. 浊上变去。随着全浊声母清化，全浊上声字全部变为去声字，随着全浊声母清化，全浊上声字全部变为去声字，跟中古的去声字合流。4. 入派三声。入声字分别派入阴声韵的平声阳、上声、去声之中。

关于《中原音韵》一书的研究，明清时代已经开始，如王骥德《曲律·论韵》、吕坤《交泰韵·辨五方》和毛先舒《声韵丛说》等，都对周氏之书是否真正代表中原语音之正，有过讨论。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语言学界对此也曾有讨论；而六十年代以后，这一讨论渐趋热烈。各家讨论的焦点是：1. 声母的数量和音值，罗常培认为有 20 类声母，赵荫棠认为 25 类，陆志韦认为 24 类，杨耐思认为 21 类。2. 入声

的存在与否，陆志韦认为周氏之书仍有入声，王力认为当时实际语音已无入声，董同和认为周氏自己的方言中有入声。³周氏之书的音系基础，王力认为音系基础是元朝大都话，陆志韦主张《中原音韵》不是现代北京系的祖语，李新魁认为音系基础是以洛阳为代表的河南方言。

八思巴字的创制和推行

元朝统治者虽然推行严格的民族等级制度，但是对于各民族的文化风俗是很少干预的。除了禁止明显的反抗活动，他们主要用一种宽容的政策使各民族的固有文化来为他们的统治利益服务。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如此，对汉族的儒学也是如此。即使南宋遗民中有上述的不合作态度，元廷也不予严禁。至于强迫薙发改俗之类的事，更没有发生过。

不过，作为实现了大一统的蒙古族皇帝，忽必烈在文化上也实行过一个重大的措施，这就是创制和推行八思巴字。

蒙古族原来是没有文字的。1204年铁木真攻灭乃蛮时，掳获了乃蛮的掌印官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是畏兀儿人，深通畏兀儿文。他遵照铁木真的意旨，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来教育铁木真的子侄，这样就创制了畏兀儿体蒙古文（或称回鹘体蒙古文）。忽必烈信奉西藏喇嘛教，尊奉喇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帝师。八思巴（1239—1280年），原名罗古罗思·监藏（慧幢），7岁时就能诵读数十万字的佛经，号称圣童，长大后学识渊博。忽必烈认为畏兀儿体蒙古文只是一种文字的借用，不能算作蒙古自己的文字，因而让八思巴创制新字。八思巴在畏兀儿人文书奴等人帮助下终于把这种新

文字创制出来了，并在 1269 年由忽必烈下诏，颁行天下。这种文字开始时称为蒙古新字。但 1271 年元廷就明令“不得将蒙古字称作新字”，只称“蒙古字”，这是要确立它唯一的合法地位。元人又称它为“国字”。由于是八思巴主持创制的，也称为“八思巴字”。又由于字呈方形，也称为“方体字”。

八思巴字是拼音文字，它的字母是参照藏文设计出来的。当时，忽必烈要求这套字母能够“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所以基本字母达到 41 个，而在后来的实际运用中还增加了若干符号。

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比原来的畏兀儿字准确得多。例如畏兀儿体蒙文，一个读 s 音的字母，又可以读作 sh、ds、c、z、zh，一字六音，太容易读混了；但在八思巴字中，这六个音是用六个字母表示的，分得很清楚。用这种八思巴字来拼写汉语，就当时水平来说，也是很精确的。而且这是汉语拼音文字的一次尝试，是一个重大的创造。

忽必烈很喜欢八思巴字。1269 年初，他下令推行八思巴字蒙古文，宣布以后颁降诏谕，都以这种文字为主，同时以各地各民族通用的文字为副。这年 7 月，元廷决定在各路府州设立蒙古字学，吸取地方官员子弟和民间子弟入学，教这种文字。后来元廷又规定路府州蒙古字学的教授官员比儒学教授高一级，生员学成后经过考试可担任学官或译史，以表示重视和鼓励。1281 年，元廷在京师设立蒙古国子学，选各民族官僚子弟入学，也着重教八思巴字蒙文。同年规定，省部台院的奏文和其他文书都要用这种蒙古字，怯薛（护卫）和必阁赤（文书）在 100 天内都要学会，到了 1284 年，元廷再

进一步要求各处大小衙门的表章都用这种蒙古字书写。

由于元廷以行政手段大力推行，八思巴字蒙古文当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使用，蒙汉各族中都有一些人把它学会了。但是，这种文字的字形相当复杂，书写起来也很不方便，因此它本身是难学难用的。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官方特用的文字，在民间没有普遍流行。而一旦元朝灭亡，这种文字也就失去了原来的使用范围，慢慢地变成了死文字。

当时，用八思巴字蒙古文译编过一本《通鉴节要》，刻印颁发，作为京师和各地的教材。此外，还译过一些儒家著作以及《贞观政要》、《帝范》等书。可是这些八思巴字译作都已失传。现在留存的八思巴字蒙古文见于传世的诏书、诰封、碑铭、印章、牌符、纸钞、花押、秤权……，等等，也还有藏族《萨思迦格言》译本的残叶。这些八思巴字资料对于古代蒙古语和元代历史的研究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我们现在也还可以看到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百家姓》和《蒙古字韵》等书籍，这些又是研究元代汉语音韵的重要资料。

八思巴字使用的时间只有 100 来年，但是它是我们祖国文化库藏中的一块闪烁着奇异光彩的瑰宝。

大书画家赵孟頫

元代的书法和绘画艺术达到很高的成就。著名的书法家有鲜于枢、虞璜、杨维桢，等等；大的画家有高克恭、钱舜举、柯九思、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等等。而赵孟頫则在书画两方面都造诣深湛，“书法称雄一世，画入神品。”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生

于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年）。他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刻苦。年轻时，他有强烈的学以致用思想，当过南宋的小官。不久，他就遇到了元亡南宋、统一中国的时势。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裔，按照中国传统的眼光，他自然更不应该奉仕元朝。可是青年赵孟頫另有想法。孔子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赵孟頫以为，求志与达道两者相比，达道才是读书人的目的。适逢忽必烈再三派人到江南求贤，他于是决心出仕。他在《赠别夹谷公》诗中写道：“青青蕙兰花，含英在中林，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他这枝兰花，与郑思肖的大不相同，根植于新朝的泥土中了。

1286年，他随忽必烈的求贤大臣程钜失到达大都。他的长相极不平凡，“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照耀殿庭。”忽必烈见后很欣赏，让他坐在右丞叶李之上。忽必烈不止一次想重用他，但总是遭到一部分廷臣的反对。“故宋宗室”的出身成了旁人阻挠他担任要职的口实。当时在朝廷里汉人与南人有矛盾，他成了汉人官僚排斥南人的主要目标。他很快就感到自己行义达道的初衷在元廷中是难以实现的。

更严重的是他同色目官僚桑哥的矛盾。当时桑哥专权，对官员常施笞刑。赵孟頫认为这是“衣冠之辱”，不予执行。有一次他议事迟到，按条例他也要受笞刑，后来得到叶李的保护，才算脱免。眼看桑哥在各地理算钱粮，苛敛百姓，赵孟頫内心十分忧虑。在他的推动下，大臣彻理奏劾桑哥罪状，不忽木又出来证实，终于使桑哥伏诛。这时忽必烈想任用他进入中书省，但是他感到自己进处要地，必定为人所忌，反而

力请补放外官。从 1292 年起，他历任地方官职，元仁宗时（1312—1320 年）才入大都任集贤侍讲学士，后又升任翰林学士承旨。官做到从一品，但毕竟只是“文学侍从之臣”。声名相当显赫，但用世的抱负是没有得到多少舒展的。所以，尽管当时人认为他的大本领是“经济之才”，然而这种经世济民的才能是没有发挥出来的。

至于在文化领域里，赵孟頫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士的才华首先要表现在诗文之中。南宋时期，文体破碎，诗格卑弱。宋亡以后，戴表元、赵孟頫等人登上诗坛文苑，提倡诗法李杜，文宗韩柳，才扫除了靡丽纤弱的习气。赵孟頫也写出了不少好诗。例如在众多的歌吟岳飞的诗中，他的《岳鄂王墓》就长期被人传诵：

鄂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只是元代的诗文没有构成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加上他的书画影响太大，所以他在诗文方面的表现就被书画的成就淹没了。

在书法上，赵孟頫是一代大师。他向晋、唐诸代书法家学习，而后融合变化，自成一家。“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湛。

从幼年起，他就苦练写字，喜好临写陈朝智永的《千字

文》，写尽了 500 张纸。通过长期的刻意临摹，他能做到临谁像谁。有一次，他在与友人谈论书法后，当即复临唐人颜真卿、柳公权、徐浩、李邕四家法帖，件件与真迹绝顶相似。又有一次他写了一卷《千字文》，用唐人褚遂良的笔法，他的友人从市面上买到了，以为真是唐人作品，拿给他请他写跋语。他最佩服东晋王羲之，“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为了师法右军（羲之别号），他成百遍临写过《兰亭帖》。他“胸中皆右军全书”，因而临摹出来的《兰亭帖》“能极风神之妙”。

他对写字的要求极其严格。他教子弟写字，要求执笔必须坚实有力。他常躲在后面抽笔管，凡是抽出手指的，就要责备。他对自己更从来一丝不苟。有一次，他得到一卷北宋米芾写的《壮怀赋》，中间缺几行。他取来刻本摹写，以求补缺，但换了好几次，始终不满意，最后只好用刻本去填补。他叹息说：“今不逮古多矣！”他还十分注意写字时纸笔要调和，他认为纸笔不佳，即使能写也是写不好的，如同骏马走到泥淖里，能奔驰吗？他晚年时写《大洞经》，求得良纸后，每天清晨起来，盥漱焚香，然后聚精会神下笔势作书，一天不超过三张纸，达到了笔意超绝的境界。

在绘画上，赵孟頫也是元代的泰斗。山水、花木、竹石、人物、马牛、禽鸟，诸种题材，他下笔都成妙品。像书法一样，他学画同样是博采众长，而后自成一格。他学阎立本的人物，学唐人的鞍马，学南唐董源的山水，学宋人李公麟的人物和马，学花光长老以墨晕作梅花，学赵孟坚用笔轻拂作石。也像书法一样，他学画同样经过苦练。他从小爱好画马，

每得到一张纸，总要画了马以后才肯丢弃。又像书法一样，他临摹古画，同样能做到气韵形似兼得。他主张“作画贵在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而他自己作画的最大特点乃是以书法施绘，所谓“用篆籀法施于绘事”。翰墨法度深稳，画面自然有神。他变革了南宋院体的旧格调，开创了元代文人画的新风貌。

在他的各种作品中，马堪称上乘。他画的马神形兼得，栩栩如生。观赏他的马，有人感到“满纸萧萧朔风起”，有人感到“卷轴风沙满天下。”他的密友戴表元有一天看他画马，当即题诗，有如下句子：

赵子奇才似天马，顷刻飞龙生笔下，
画成抚卷复长歌，坐客喧喧不停写。
蹄势轻鞭秋跌荡，鬃毛出趺风萧洒，
似嫌文绣减天真，尽脱鞍鞿轡轻把。

除了马，他的竹石也佳。在画面上，竹往往只写三两枝，但意境深邃。“清而不寒，高而不畏。”“两竿瘦竹一片石，中有古今无尽诗。”他爱神州的自然风貌，在山水画方面尤有创新。他画烟波浩渺的长江，“敛收万里江，都付尺许中。”他画的群山，郑元祐题诗说：“鸥波亭前千叠山，缥缈峰峦烟霭间。”他和高克恭等人的山水画对元明清画坛有很大影响。

“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赵孟頫书画双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四方万里，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登门求字的人多极了。“车门所至，填门

倾郭，得片言只字，人人心惬意满而去。”他仕元后，田产废弃，家境难以维持，后来常常靠卖字为生。

赵孟頫仕元后遭到排挤，出仕用世的抱负实现不了，因而常常后悔自己没有干脆做个遗民。他吟道：“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但皇帝又不让他退休，他只能在诗文翰墨中寻求寄托。他晚年写了一首《自警》诗，对自己做了一个总结：

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
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王冕

元末隐士王冕，出身牧童，自学成才，工诗善画。他志行高洁，鄙视官场，隐居避世，终老林下。

王冕，字元境，浙江诸暨人。出身于地道的农家。自祖辈以来，三代都是在诸暨乡下，以农为业，老实巴交的农民。父母亲老实巴交的，与诗文无缘，只知为生计而一年四季地忙碌。这样的父母既未能在他体内植入艺术的遗传基因，也未能在他幼小心田中播撒过诗画的种子。

王冕自懂事时起，稚嫩的肩头便承担起一部分农家生活的担子，成为一个放牛的牧童了。牧童的生活，在文人的笔下，颇具浪漫、悠闲的诗意：“倒骑水牛横吹笛”，“牧童遥指杏花村”，真正的牧童哪有这种体会！小小的王冕只知道牛吃饱了，犁田耙地才会有力气，地里才能多收庄稼，他才有饭吃。因此，他总是找肥嫩如茵的绿草地，让牛痛痛快快地吃

个饱。

王冕每次牵牛出村，都要经过村里学馆的门前，学童们琅琅的读书声，对王冕渐渐地产生了吸引力。一次，王冕把牛牵到一块草地后，让牛在那里吃草，自己忍不住跑了回来，站在学馆的窗下，专注地听着教书先生授课，觉得挺有趣。自此以后，他便成了学馆窗下的常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悟性极强的王冕，默默地记诵，竟在不知不觉中认识了许多字，也背下了不少蒙学篇章。

有时，王冕不能去学馆听课，他就把偶然得到的旧书，放在牛角上，自己俯卧在牛背上诵读。有时，他折根小树枝，在松软的泥沙上，照着葫芦画瓢，对着书写字画画，渐渐地写得画得有点像模像样了。王冕自学时十分用心，好几次他的牛溜进了人家的庄稼地里，别人喊起来，他才如梦初醒，连忙跑过去将牛牵走。有时他也遇到麻烦，牛跑远了还得四处去找。牛偷吃别人的庄稼，有人会找上门来，父亲像老鹰抓小鸡似地把王冕抓起来，结结实实地揍一顿。事过之后，父亲也觉得内疚，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父亲还是照揍不误。

王冕对读书识字的喜欢，简直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任凭他父亲怎样揍他，他还是一瞅有空便往学馆跑。父母亲为孩子的好学精神所感动，狠狠心变卖些家产，让王冕堂堂正正地走进村学馆，与其他学童一起读书。转眼三年过去了，王冕的父亲突然生病死去，家里再也供养不起王冕读书了。三年学馆的读书生涯，便是王冕全部的学历了。

王冕回家参加劳动，依然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极高的

悟性与求知的恒心相结合，使他无师自通、自学成才。

王冕十七八岁时，投师当时著名学者韩性门下。王冕以其过人的才华、出众的人品，受到韩门弟子的推重，被誉为通儒——一个很有成就的学者。

王冕尤擅绘画，他画的荷花逼真极了，“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是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王冕更擅长画梅花，他自号“梅花屋主”，可见他对梅花的特殊感情了。王冕的画，独辟蹊径、别具一格，世称“无骨体”。在王冕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王冕是靠卖画为生的。

王冕的经历与众不同，王冕立身处世的价值观念更与众不同。

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意识可谓深入人心。当官才有地位、名望、财富，一人当官，妻荣子贵、荣及故里，因此，兴起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既为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梯，也为统治者找到了笼络读书人的一个有效工具。

科举制度对社会下层出身的读书人，尤其具有吸引力。正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王冕开始也未能免俗，而是随波逐流，加入了应试者的行列。王冕当时 20 多岁，满腹经纶，自认为断无不中之理，结果却名落孙山。

王冕从挫折中清醒过来，他感叹道：“我真是糊涂啊。科举考试如同剃光了头往刺里钻一般，连一个懂事的小孩都不愿去做，我为何要去做呢？”王冕庆幸自己毕竟没有失足，决心从此断绝追求功名利禄的念头。为表示自己绝意不再踏入仕途的决心，王冕把自己为应付考试而积累了几年的资料，为

参加考试而写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

王冕有位同乡叫王良，是他的少年朋友。王良后来任行中书省职掌公事文牍的官员。一次，因公路过诸暨，他特地到王冕的家中来拜望王冕，并对王冕的母亲，恭恭敬敬地行了子侄之礼。第二天，王冕便去驿馆中回拜这位同乡。王良见王冕穿一双张开了口的破鞋，脚趾头也露在外面，蓬头垢面、不修边幅，出于好意，王良叫人拿了双新鞋子来，并劝王冕说：“先生这么好的学问，何不出来做官。做官为政，对上报效国家，对下体恤百姓，您的经邦济世之才就有了用武之地。退一百步说，做了官您也不至于会陷入今天如此潦倒的窘境啊！”

王冕听完了王良的话，大失所望，记忆中的讲义气、重感情、通情达理的少年朋友的形象，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觉得面前的这位元朝官员俗不可耐。于是他也不接言也不搭腔，放下新鞋子，站起身来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待十分尴尬的王良回过味来，王冕早已走远了。

不久，王冕来到绍兴，以卖画、教书为生，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一天，李孝光来看望他。李孝光年轻时隐居雁荡山五峰山下，以光复弘扬先秦两汉散文为己任，非先秦两汉文不读，非先秦两汉文不写，以此名扬四海。四方之文人士子，不顾路途遥远，纷纷前往五峰山下受教求学。但李孝光最终还是不堪忍受隐士生活的寂寞、清贫，下山接受了元政府秘书监著作郎的官职，后升至秘书丞。他的职位虽不高，但接近中枢，身处机要，令人刮目相看。这次他回浙江省亲，路过绍兴，特意看看王冕。他非常赏识王冕的人品才学，似乎

从王冕的身上看到了自己过去的身影。他对王冕说：“人生在世不过百年，一晃之间，我已老矣。回想以前那在五峰山下离世索居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真难以想象，当时为什么要自找苦吃呢？下山后，好日子没过上多久，人又老了，生活的乐趣还来不及充分享受呢！你现在尚年轻，又有才学人品，还不如及早放下这学馆教职，到官府去，我负责为你推荐。”

王冕对这位老先生的文章十分佩服，因而对他也十分敬重。两人畅谈文章绘画时，甚是投契，但王冕一听到做官之事，脸上的笑容马上消失了。王冕毫不掩饰他对官场生活的厌恶，正色回答说：“我有田可耕，有饭可吃，有书可读，去做什么官呢？做官有什么意思呢？无非是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排场大一些而已。整天抱着公文，站在上司面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受别人的奴役，把自己的人格都抛弃了，哪有我现在这般自由自在。请先生再勿提入仕一事！”

几句话的回答，表明了王冕心迹。李孝光听了，对王冕多了几分佩服，对自己感到有些羞愧，只得报以苦涩的一笑，告辞而去。

王冕后来北上元大都（今北京）游历、卖画。曾任过绍兴路总管的蒙古人泰不华，此时正在元政府内任秘书卿，参予编撰宋、辽、金史。他在绍兴任职时，就早已知道王冕的才学。这次，在京城遇到王冕后，他表示要为王冕通融一下，谋个舞文弄墨的馆阁之职，让王冕领一份俸禄，过安逸的生活。王冕不仅不领他的情，反而冲着他将他奚落了一通：“您这位先生好不愚蠢呢？眼下朝政日非、民怨沸腾，不出十年，

这里将破败不堪、荒凉一片，将成了狐兔出没之地，我还做什么官呢！”泰不华讨了个没趣，快快而去。

翰林学士危素为人贪鄙。一天，危素慕名来访王冕。危素落座后，王冕最瞧不起这种小人，只说了一句话：“不就是住在钟楼街的那位先生吗？”然后，旁若无人似的，默然良久，再不开口。危素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冷遇，但他又无从发作，只好愤然拂袖而去。而王冕见他离开，连头也不点一下，眼皮也不抬一下。

王冕终身不仕，鄙视官场中人，不仅仅是他自许清高，其根本原因在于王冕有较强的民族感情。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把人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蒙古人政治地位最高，南人的政治地位最低，王冕自然被列入南人这一等级。蒙古人又把社会职业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人最受敬重，被看作是士农工商中的第一等人，如今被蒙古人看作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比娼妓都不如，仅仅稍胜乞丐一筹而已。因此，王冕觉得自己在人格上受到元朝统治者的污辱，所以决不入仕，一生耻食元朝的俸禄，对那些朝廷的命官，也一概不放在眼里。

王冕一再得罪元朝中的官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于是伺机报复他。恰好，王冕在卖出的一幅梅花画上，题了两句诗：“冰花个个圆如意，羌笛吹他下不来。”有位官员发挥出惊人的想像力，告发他别有用心，讽刺元政府，应予法办。

王冕得知后，悄然离开元大都南归，从此开始了离世独居的隐士生活。

王冕是个出名的大孝子。他母亲在世时，他除了外出求学离家的几年外，其余时间从不愿离开母亲。

王冕常常亲自动手，为母亲熬汤做饭，侍奉母亲细心而周到。遇着花明柳暗、气候宜人的时节，他使用牛车载了母亲，自己驾车，口里唱着曲子，到外面踏青或游览。母子俩释怀欢笑，其乐融融。这种做法在当时极为罕见，而王冕又戴着高高的帽子，穿着宽大的衣裳，处处显得与众不同。因而牛车所到之处，常招惹得一些孩子们，跟在车子后面笑着，跑着，看稀奇，看热闹。王冕对此毫不在意，依然我行我素。

母亲死后，王冕开始到处游历，寄情山水、师事造化。

王冕的足迹遍及吴楚之间，江淮一带。他广交隐士侠客。遇到投契之人，常作彻夜长谈。他们品茗饮酒、纵论古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诉如泣；一会儿挥毫作画，一会儿投笔漫吟。一些正统的士人骂王冕是“狂奴”。

王冕不予理会，依然是随兴所至、我行我素。他游历完吴楚江淮一带的名山大川、人文古迹之后，又再次北上元大都。

在元大都，王冕穿戴着自己设计的服装。一套摹仿古装，其帽硕大无比，犹如一只筛子扣在头上；肥大的宽袍子，下摆拖地，两只大袖子摆动起来，像鸟儿翅膀一样翩然欲飞。王冕自己设计的这种服装，带有很大的艺术夸张性。王冕如此穿戴，出现在京城中，引起很大的轰动。一段时间后，王冕又换了另一套自己设计的服装，他足登长长的木屐，穿着荷叶绿的披肩蓑衣，佩带一把木剑，在街上行走时，且歌且舞。围观的人群，前呼后拥，交通几乎堵塞。

王冕这种公然违反礼俗的怪癖之举，引起了一些人的责难，有人就指出了王冕的用心：他表面上与当时盛行的明显带有蒙古人风格的衣冠式样唱对台戏，实际上是对元朝政治统治的不满。又有人想迫害王冕了，于是，王冕离开了元大都。

王冕已看到元朝统治很难维持下去，天下就要大乱了。他没有积极投入反元斗争中去，而是采取隐居避祸的消极态度。他选择了家乡的九里山，作为长期避世遁迹的隐居之地。九里山位于诸暨与山阴的交界之处，山峦叠嶂、风景秀丽，确实是理想的隐居之地。

王冕偕妻子隐居在九里山中，躬耕垄亩，自食其力，像陶渊明一样过着“晨兴理荒秽，月下荷锄归”的田园生活。他与妻子自己动手，开辟荒地。由于山上土层薄、石头多，开垦出一块地来，需要捡走许多石块，十分不容易。但在王冕夫妇辛勤劳作下，居然开辟出几块地来。为纪念这种经历，王冕从此便自号“煮石山农”。

开荒的同时，王冕又种植了几十株桔树，三年之后，形成了一片小小的桔林。金秋时节，桔树上缀满了一个个鸡蛋大小的桔子，在斜阳照耀下，小桔林闪动着五彩霞光。

王冕极爱竹子，隐居之初，便在房屋周围栽植了不少的竹子。两三年后，新居便掩映在茂密的翠竹中了。苏东坡的诗说：“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王冕深得品竹之三味，称他的居室为“竹斋”。

阴雨天，王冕便在家里吟诗作画，饮酒读书。这时期王

冕所作的诗，他题名为《竹斋诗集》。

偶尔也有一二朋友进山相访。王冕仍然一如既往，与他们饮酒谈诗，说古道今，酒至酣时，便击节而歌，直到大醉卧倒为止。

还有人不畏山路崎岖，进山来向王冕购画，王冕也乐得换点钱补贴家用。

王冕的隐居生活，过得平静、充实而又自在。光阴荏苒，不觉十几年时间过去了。

这期间，山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元末农民战争兴起，元朝的统治在农民起义冲击下，终于瓦解。占地为王的割据势力，互相争雄，结果由朱元璋建立的明朝统一了天下。

四、元代文学

散曲的辉煌成就

散曲是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相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它是一种新兴诗体。散曲在元代取得了超出于传统诗词的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极富特色的一代诗歌。

曲的出现是对词的一次重大变革。明朝王世贞《艺苑卮言》说“曲者，词之变。”词与曲都是歌曲，都是按流行曲调填词歌唱的。但由于受了金元时期民歌俚曲的影响，在形式上突破了词的某些限制，因而显得生动活泼，在结构形式上，词多分为上下两阙，也有三阙的，而曲却变为单阙体，如有

必要，可用〔幺篇〕形式变为多阙；词的字数、句数有定格，而曲虽大体有定格，却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伸缩性，可以增句、减句、拆句、并句，亦可以增字、减字等，同一曲牌用于不同场合，字格、句格并不相同。

在音韵上，词用平水韵、曲用北方口语为基础的中原音韵；词有入声，曲入派三声，曲韵还分上去，辨阴阳；词韵避同字，平仄往往分押，一首词可以换韵，曲韵则不避同字、平仄合押，一韵到底。语言上，曲的语言较为口语化，可以大量运用衬字、虚字，而且用语不避重复，对仗形式也比较丰富，这都增强了曲的表现力和生动性。在艺术风格上，诗词贵雅，曲则尚俗；诗词忌纤巧，曲则贵尖新；诗词忌油滑，曲多诙谐。

散曲又称“清曲”、“乐府”，它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小令通常指独立的单支曲子，但还包括带过曲与重头小令。带过曲是同一宫调内三支以下的单只曲子的联合，并且相互之间音乐衔接、押同一韵。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的数支小令联合而成、支数不限，每首可各押一韵，而且各首可以单独成立。套曲也称套数、沿自诸宫调，由同宫调的三支以上的只曲组成、宫调不同而管色相同者也可以借宫，一般应有尾声，全套必须一韵到底。套曲篇幅较长，可以包容比较复杂的内容，既可用于抒情，也可以用以叙事。

元代散曲根据作家群分布，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散曲活动中心在大都（今北京）。作家队伍中不乏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诸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遂等，

而成就最高的还是那些混迹于市井的杂剧作家、书会才人。

著名杂剧家关汉卿的散曲作品〔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通过生动的比喻和泼辣的语言，描写了一个书会才人以“浪子班头”、“郎君领袖”自居，坚持“攀花折柳”的生活方式的精神面貌。其散曲描写男女恋情的最多，清新秀丽、真切动人。王和鼎与白朴也是当时书会才人中著名的散曲作家。当然元代散曲作家中，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还当数马致远。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在他手中散曲的题材领域得以扩大，艺术境界得以提高。散曲至此堂庑始大，体制始尊，内容上既有类似“老了栋梁才”、“恨无上天梯”、“白发劝东篱，西村最好幽栖”的感叹身世之作，也有类似“枯藤古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咏景佳作。其恋情之作也清新动人，没有脂粉气和俗气。总体看来，马致远的散曲声调和谐优美，语言清新豪爽，开拓了散曲真率醇厚的独特意境。

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逐渐从大都转移至杭州，随着散曲的繁盛和发展，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或主要精力和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这一时期张可久、乔吉、贯云石、睢景臣、张养浩、刘时中等都号为大家。

张可久是一代曲风转换的关键人物，享誉当世，成为后期散曲创作的典范。可久号小山，庆元人（今浙江宁波），曾以路吏转首领官，仕途上不很得志，时官时隐。足迹遍及江南。一生专写散曲，颇多抑郁感奋之作〔醉太平〕《感怀》道：“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成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倒稳。”揭示当时黑白颠

倒、贤愚不分的现实。其山林隐逸之作最多，在以“归兴”、“旅思”、“道中”命名的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悲凉的情绪和对安定的田园生活的渴望。如〔醉东风〕《秋夜旅思》、〔落梅风〕《碧玉峰书堂》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张可久的散曲，讲究格律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字句优美，熔铸诗词名句，追求含蓄蕴藉，典雅工丽，但有时过于注重形式美。明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为“词林宗匠”。

乔吉与张可久齐名，人称“曲中李杜”。其词或写客居异乡、穷愁潦倒的生活经历；或感愤世事、不满现实，而以咏歌山水，寄情声色诗酒的作品为数更多。曲风以婉丽见长，奇巧俊丽，不避俗言俚语，雅俗兼备。

元代后期，曲学评论与音律研究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贯云石《阳春白雪序》是最早出现的散曲评论文章。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曲韵、曲律的研究也具开创性。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散曲选集，其中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最为有名。

元杂剧的繁荣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它是元代封建城市经济繁荣发达、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的产物，也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主要是歌舞艺术、讲唱技艺、滑稽戏等长期发展互相融合的结果。

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是一种由诗词变化发展而来的新诗体；杂剧是一种包括歌唱、音乐、舞蹈和完整故事情

节的歌剧。通常所说的元曲，主要是指杂剧。

我国唐朝时已经有了戏剧的雏形。到了宋、金时期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宋代的一些城市里已经有许多民间艺人在戏院里进行说唱表演。宋金时期盛行一种“诸宫调”，就是有说有唱而以唱为主的演出形式，唱的部分是把多种宫调联缀在一起。元杂剧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把歌曲、宾白、舞蹈动作结合在一起，是一种综合性的戏剧艺术。歌曲按一定的宫调和曲牌歌唱，是按规定韵律、富有抒情性的新诗体；宾白包括人物的对白、独白，一般都用当时通俗的口语；动作叫“科”，是角色的动作表情。曲词一般由一个演员（男的称“正末”，女的称“正旦”）演唱，通过它抒发主人公的心情来表现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描绘环境、渲染气氛。反面人物和次要人物靠简短的宾白来勾画面目。元杂剧大部分有四折（或加一楔子）演完一个完整的故事。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由于他们社会地位较低，又生活于城市市民中，所以作品充满了生活气息，为广大市民所欢迎。

元杂剧分前后两期。前期从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当时杂剧的中心在大都，这些作家都是北方人，主要是大都人。14世纪初以后，戏剧中心南移到杭州，后期的杂剧作家有郑光

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他们大部分是南方或寄居于南方的作家。元代后期的杂剧不像前期那样富有现实主义，比较追求曲辞的典雅工巧。据记载，元代一共创作了杂剧 500 多本，现在保存下来的有 136 本。见于记载的剧作家有 200 多人，最著名的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郑光祖等。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

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大约生于 13 世纪 20 年代，死于 13 世纪末。他是大都创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玉京书会”里最优秀的元曲作家。由于长期与市民接触，对社会现状很了解，因而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他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而且会下棋、踢球、歌舞、演戏、吹弹、作诗，与艺人往来密切，常常与著名艺人朱帘秀一起粉墨登场。关汉卿共创作了 63 个杂剧，现在保存完全的只有 12 个剧本。悲剧《窦娥冤》是他最出色的代表作。

《窦娥冤》实际上是当时社会黑暗面的写照。故事情节大体是这样的：窦娥 7 岁时，因父亲窦天章欠高利贷无法偿还，被卖给蔡婆婆家做童养媳。不料窦娥的丈夫早死，她就守了寡。一天，蔡婆婆出外讨账，遇赛卢医谋财害命，张驴儿和他的父亲救了她。张氏父子乘机要强娶她婆媳俩。张驴儿见窦娥不愿，就想药死蔡婆婆来威胁她，不料竟药死了自己贪嘴的父亲。这时张驴儿反咬一口，把窦娥扭送公堂，昏庸的官吏把窦娥判定死罪定斩。窦娥含冤屈死，托梦给做了官的父亲，终于平了冤狱，惩治了恶棍。剧中窦娥喊出的“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就是对当时封建统治的强烈抗议。但是，窦娥的昭雪沉冤却是靠她死后的幽灵和她做官

的父亲来实现的。《窦娥冤》作为我国的优秀古典作品，早在100年前就被译成法文传播到欧洲各国。关汉卿的许多作品还流传到日本。

王实甫也是大都人。《西厢记》是王实甫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描写张生和崔莺莺恋爱故事的戏剧。作者歌颂了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争取婚姻自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斗争精神，无情揭露和抨击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性。《西厢记》是一部对后世文学有很大影响的优秀作品。

白朴是^β奥州（今山西河曲附近）人。他的作品以爱情喜剧《墙头马上》最著名。它和《西厢记》相似，也是歌颂男女自由恋爱、反对封建礼教的。戏中的主人公李千金敢于和她公公作斗争，最后终于和裴少俊重做夫妇。

郑光祖是元代后期的杂剧作家，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他的代表作是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的《倩女离魂》。剧本通过张倩女灵魂出窍追随王文举进京的浪漫主义情节，突出地表现了在封建压抑下青年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张倩女既有崔莺莺的温柔深情，又有李千金的勇敢坚定，是独具特色的。这个剧本和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一样，都是元代著名的爱情剧。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有33部，今天流传下来的有10部。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民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

不怕官府和地痞流氓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南戏的创作成就

南戏，也称戏文，是南曲戏文的简称，与北杂剧相对而言。南戏与北杂剧都具有中国戏曲的民族艺术特征，又自成体系。南戏最初流行于浙东温州一带，亦称温州杂剧。温州一名永嘉，唐为永嘉郡，所以又称永嘉杂剧。

南戏产生于宋南渡以后。明祝允明《猥谈》说：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

予见旧牒，其时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徐谓在《南词叙录》中认为：“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宣和间已滥觞”的说法很难成立，因为宋徽宗宣和（1119—1125）时期，温州经历了方腊起义的战争和灾荒。在这种动乱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新的戏曲形式。南渡以后，温州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高宗开始逃到温州，后来局势稳定才决定建都临安。但温州仍是宋宗室贵戚聚居地，各色伎艺人也多汇集于此。又加上温州向称沃壤，名为“小杭州”（《瓯江逸志》），又“号称六艺文章之府”（《永嘉县志》）。所以，南戏便在这里逐渐形成。宋光宗朝是温州人口最盛的时期，南戏在这时得到发展也是可信的。此后，南戏逐渐扩大到浙闽等地。《钱塘遗事》记载：

“至戊辰（1268），己巳（1269）间，《王焕戏文》盛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元灭南宋后进入南戏与北杂剧并行的时期。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说：“然元中叶以后，南曲与北曲，其流行之地域，亦渐相同，且南北合腔之曲，尚有制作行世，显呈相互接近之状。”这时出现南北曲合流的局面，杂剧接受南戏之影响，南戏在声腔、剧目方面则接受杂剧的影响。《琵琶记》的产生标志着南戏的成熟，并逐渐取代了杂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宋代南戏除《王魁》、《赵贞女》外，还有《乐昌分镜》、《王焕》等戏文，这些戏文的舞台影响很深远，但剧本都没有留传下来。《赵贞女》和《乐昌分镜》是历史故事，《王焕》戏文产生于南宋末年。《王魁》是最早的剧目之一。王魁为北宋莱州人，嘉祐六年（1061）进士状元及第。北宋末年，其故事开始流传演唱，成为南曲戏文约在南宋初年。现存早期南戏剧本有出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该书原已流出国外，经叶恭绰从伦敦古玩店中购回，抗战中又不知下落，现在流传的是根据钞本的翻印本。从版本学的角度来看，版本是很晚的。就以《永乐大典》本而论，也是明初钞本，这些早期南戏剧本的时间，流传中有多少改动，仍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研究多认为《张协状元》为南宋的作品，《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为元代作品。

《张协状元》末色在开场念的《水调歌头》词中说：“但咱们，虽宦裔，总皆通。弹丝品竹，那堪咏月与嘲风。若会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满堂中。一似长江千尺浪，别

是一家风。”很清楚，这是一些宦裔的子弟排演的剧目。作者并以“占断东瓯盛事”、“教坊格范，绯绿社是杂剧出的组织。《张协状元》写成都书生张协，上京赶考，路过五鸡山遇难，被居住古庙的王贫女搭救后结婚，张协中状元后，把贫女赶出大门，坚决不认。宰相王德永收养贫女为义女，张协无法，最后认罪，同贫女重圆。这个剧本开始由说唱诸宫调引入，有许多与剧情联系不紧密的场次，以插科打诨为主，这些都表现了初期的特征。剧本语言通俗，刻划人物也有较成功处，如写贫女被赶出大门后的一段唱词：

〔五更传〕我丈夫，张协是。在路途值雪正飞，盘缠被劫得没分文，打一查血沥沥底。没投奔，在庙中，弯跚睡。我医你救你得成人，你及第，便没恩没义。

〔同前〕是我夫，不相认，见着我忙闭了门。我当初闭门不留伊，你及第应是无分。千余里，到此来，望你厮存问。目下要归没盘缠，我今宵，更无投奔。

〔同前〕你记得，要来京里，卖头发把钱与伊。当初道嫁鸡便逐鸡飞，好言语教奴出去！没盘费，教化归，回乡里。买炷好香祝苍天，愿你亏心，长长荣贵。

《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节本，有不少失枝脱节之处。《错立身》，写金国河南府同知的儿子宗颜寿马和走江湖的戏班女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当完颜寿马和王金榜相会时，王金榜所报的剧名，全部为元代流行杂剧剧名，可以看出杂剧与南戏的密切关系。《小孙屠》，描写妓女的奸恶，其中出现

南北合套曲，说明了南北曲合流的情况。

现存宋元南戏剧目二百三十八种，有零星曲子流传的百十九本。现传基本保存宋元戏文面目的，除上面所说《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外，还有《琵琶记》。元末明初作品，经明人修改过，基本保存原来面目的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十一本。

南戏是在北宋杂剧基础上，吸收诸宫调、唱赚，结合地方俗曲歌舞而逐渐形成的戏曲形式。《南词叙录》说南曲的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欤？间有一二叶音律，终不可以例其余，乌有所谓九宫？”又说，“南曲固无宫调，然曲之次第，须用声相邻以为一套，其间亦自有类辈，不可乱也，如〔黄莺儿〕则继之以〔簇御林〕，〔画眉序〕则继之以〔滴溜子〕之类，自有一定之序，作者观于旧曲而遵之可也。”由于它在南方流传，唱时也用南方方音。分平上去入四声。一本戏分为若干段落演出。

南戏的形式至元末明初趋于定型。题目在剧本的开端。一般先由副末开场，说明演唱宗旨和剧情，从第二出起才是正戏。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每出不限用同一宫调，可以换韵。南戏各种角色都可以唱，也可以对唱、合唱。南戏伴奏以管乐为主，曲调比较轻柔婉转。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它取代北杂剧的地位，成为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明清以后称之为传奇。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高明（1305? —1359?），字则诚，号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至正五年（1345）进士，曾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庆元路推官。此后，在元末的动乱中，避居四明栎社，过着隐逸著书的生活，以词曲自娱，完成《琵琶记》的创作。他的老师是元末大儒黄潛，与苏天爵、刘基都有交往。他除《琵琶记》外，还著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和诗文《柔克斋集》（已佚）。现存诗、文、词五十多篇。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赵贞女》写蔡伯喈上京应试，求取功名后长期不归，蔡家父母死后，赵贞女罗裙包土建坟茔，到京师寻找伯喈，伯喈不认，最后以马踩赵五娘，雷轰蔡伯喈结束。《南词叙录》“宋元归篇”所列之《赵贞女蔡二郎》一剧下注文：“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赵贞女》也是民间演说的题材。南宋诗人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中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元陶宗仪《辍耕录》“院本名目”中，著录有院本《蔡伯喈》。元杂剧中也一再引述其故事情节。蔡伯喈，即东汉蔡邕，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称为蔡中郎。戏中情节并不符合历史人物蔡伯喈的真实。高明有意翻《赵贞女》之案，把蔡中郎写成全忠全孝的文人。《南词叙录》说：

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

《琵琶记》改动后的主要关目为“三不从”，即：蔡伯喈是个孝子，本不想去应考，他父亲蔡公不从。他辞婚，牛丞相不从。他辞官，朝廷不从。高明改编《琵琶记》的意图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他在全戏开场的〔水调歌头〕词中说：“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他的《闵子骞单衣记》就是写孝子的故事。作家主观上是想通过“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这是由于作者在元末的动乱中，自己的思想本身就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从他和刘基唱和诗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元末黑暗政治的看法。高则诚的诗虽已佚失，刘基的《次高则诚雨中三首》却保留了下来。其一：

短棹孤篷访昔游，冷风凄雨不胜愁。
江湖满地蛟螭浪，杭稻连天鼠雀秋。
莫怪贾生偏善哭，从来杞国最多忧。
绝怜窗外如珪月，只为离人照白头。

这种忧时忧民的思想 and 自身的愤懑不平，使他塑造的蔡中郎形象，有自己的特色。蔡中郎不是一个“背亲弃妇”的负情者，而是在出仕和退隐，以及各种社会压力面前，陷入矛盾和苦闷之中的文人形象。作品中赵五娘的形象，可能是在南戏《赵贞女》的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工的，保留了一些动人的情节。所以，赵五娘虽然有为了恪守封建道德，在种种困境，包括封建迫害面前，也能“逆来顺受”的方面，但仍显示了旧时代中国妇女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另外作品还暴露了地方官吏的贪污和带给人民的灾难。

特别应该指出，由于高明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修养，《琵琶记》又是他精心创作的作品，因此在艺术上成就很高。这样，《琵琶记》逐渐取代《赵贞女》的地位，成为民众承认的作品。《南词叙录》说：“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之，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以荆瑞光楼旌之。”这虽然是传说，但也说明人们对《琵琶记》推崇的程度。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穿插甚合局段，若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得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

则诚所以寇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食糠》中赵五娘唱的曲子，以糠自比，由糠和米的分离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曲词本色，凄楚动人：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嗟住。糠！遭砮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恰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

〔前腔〕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被簸扬作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米在他方无寻处。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给得公婆甘旨？

蔡伯喈在《弹琴》一折中所唱的曲词则较华丽，委婉地表露了他矛盾的心情：

〔一枝花〕闲庭槐影转，深院荷香满。帘垂清昼永，怎消遣？十二阑杆，无事闲凭遍。困来湘簟展，梦到家山，又被翠竹敲些惊断。

〔懒画眉〕强对南熏奏虞弦，只见指下余音不似前，那些个流水共高山？呀！怎的只见满眼风波恶，似离别当年怀水仙。

〔前腔〕顿觉余音转愁烦，还似别雁孤鸿和断猿，
又如辊凤乍离鸾。呀！怎的只见杀声在弦中见？敢
只是螳螂来捕蝉。

这些曲词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过去把它称为“南戏之祖”不是没有道理的。

《拜月亭》及其他

《荆钗记》、《白兔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被合称为元末明初“四大南戏”，或“四大传奇”。其中《拜月亭》的成就最高，影响也较大。

《拜月亭》，《永乐大典目录》题作《王瑞兰闺怨拜月亭》，《南词叙录》题作《蒋世隆拜月亭》，现在流传的有明世德堂刊本《拜月亭记》，容与堂刊本《幽闺记》，均为明人改本。该剧的作者也存在疑议。明人都说是元施惠所作。据《录鬼簿》记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又说“惟以填词和曲为事。有《古今砌话》，亦成一集。”南戏《拜月亭》是根据关汉卿同名杂剧改编的。故事发生在蒙古军攻占金首都中都，金室迁都汴梁的过程中。中都书生蒋世隆与金朝忠臣陀满海牙子兴福结为兄弟。逃亡途中，蒋

世隆兄妹，兵部尚书王镇的夫人和女儿都在兵乱中失散。蒋世隆之妹瑞莲，王尚书之女瑞兰，因名字声音相近，都误以为对方是叫自己的名字，遂结伴而行。瑞莲被王夫人收为义女，瑞兰遇见世隆，在患难中结为夫妇。后王镇奉命到边城缉探军情归来，在旅店遇见瑞兰，不同意女儿和世隆的婚姻，也不顾世隆病重，硬把女儿带回。在两国议和后，王镇一家在汴梁团聚。瑞兰幽闺拜月，被蒋瑞莲视破，两人感情愈洽。后来朝廷开科取士，世隆、兴福分别考中文武状元。王瑞兰与蒋世隆、蒋瑞莲与陀满兴福，结为夫妇，全剧以大团圆结束。

《拜月亭》因语言本色，受到明人推重，明代研究者中本色派和文采派曾就《拜月亭》和《琵琶记》二剧的优劣展开争论。认为《拜月亭》高出《琵琶记》的，主要称扬它的本色当行。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说：“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绝妙。”徐复祚《三家村委谈》说：“《拜月亭》宫调极明，平仄极叶，自始至终，无一板一折，非当行本色语，此非深于是道者不能解也”。如第十三出《相泣路歧》：

〔剔银灯〕（老旦）迢迢路不知是那里，前途去，安身何处？（旦）一点点雨间着一行行凄惶泪，一阵阵风对着一声声愁和气。（合）云低，天色傍晚，子母命存亡兀自尚未知。

〔摊破地锦花〕（旦）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一

步步提，百忙里褪了跟儿。（老旦）冒雨荡风，带水拖泥。（合）步难移，全没些气和力。

语言质实明白而有余味。

《拜月亭》人物刻画比较细致，有许多细节描绘都很成功。如兵乱过程中，王瑞兰和书生蒋世隆相遇，她不得不向她认为正直的蒋世隆请求帮助，同时也写出她羞涩的内心活动，有很好的舞台效果。在后来的演出中，都增加了王瑞兰因希望得到蒋世隆的帮助，而踏住蒋世隆所带的伞柄的情节，这出戏被称为《踏伞》。又如在招商客店，当王瑞兰的父亲把她们夫妻强行拆散时，作者抒写了她对丈夫的眷恋之情。《幽闺拜月》一折写王瑞兰拜月祷祝与世隆再得相会，因不知瑞莲是夫妹，产生误会，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她思想丈夫的心理。所有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此外，剧中许多巧合的情节，也增强了它的戏剧效果。

《荆钗记》，现存着影抄明初刊本《王状元荆钗记》。作者是“吴门学究敬先生会柯丹丘”。《荆钗记》写书生王十朋以荆钗作聘，娶钱玉莲为妻。十朋中状元后拒绝万俟卨的逼婚；玉莲因富豪孙汝权与继母的迫害，投江自杀遇救，经历种种波折，最终夫妇团圆。这本戏歌颂王十朋钱玉莲坚贞不渝的爱情。与“负心型”剧本不同，成为一个新的类型。从总体来说，《荆钗记》不及《琵琶记》、《拜月亭》的成就高，但也有一些关目以情取胜。如王十朋母亲到江畔祭儿媳的《祭江》和王十朋在京城与母亲相会的《见母》，就颇为流行。

《白兔记》，是在民间说唱中影响最广泛的传说故事。作

者不详。元刊宋代无名氏《新编五代史平话》和金代《刘知远诸宫调》中都已写到。故事描写后汉高祖刘知远的故事。刘知远被逼从军，入赘岳申府。其妻李三娘在家中为兄嫂不容，受尽折磨。在磨房生下一子，被人送至刘知远处乳养。十五年后因儿子猎兔见母，全家才得团圆。《白兔记》现存有一九六七年在上海郊区嘉定县发现的明成化刊本《白兔记》，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刊行年代最早的南戏刻本。其中有关李三娘的戏，凄苦动人。语言质朴自然。吕天成《曲品》说，“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杀狗记》的题材与元人同名杂剧相同，写孙华、孙荣兄弟因柳龙卿、胡子传的挑拨失和。孙华妻设计杀狗假做死尸，柳、胡听说死人都避祸离去，亲弟不计旧恨帮助移尸，兄弟重归和好。这本戏，《永乐大典目录》题为《杨德贤妇杀狗劝夫》，《南词叙录》题为《杀狗劝夫》这一故事也是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剧目，相传为元末明初人徐旺所作。此剧后来演出甚少。

这四部戏都是曾在民间长远流传的作品，代表了元末明初的南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剧中都有不少宣扬封建和迷信思想的地方，在艺术上均属本色当行的作品，但又失之于粗糙。

五、科学技术

郭守敬的科学成就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到了元代，由

于国家实现了大统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我国也是世界上天文历法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元代的天文学在继承前人丰富遗产的基础上，吸取了阿拉伯的天文知识，创造性地发展了一大步。元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是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若思，顺德邢台（今河北邢台）人，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天文学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创制，为祖国古代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其他学科上也有很多贡献。

郭守敬的祖父郭荣是一位精通数学和水利的学者，他的渊博知识对年轻的郭守敬影响很大。还在郭守敬年幼的时候，祖父就把他送到精通天文和地理的老朋友刘秉忠那里去学习了。刘秉忠和他的好友张文谦都是忽必烈非常赏识的学者。

由于郭守敬刻苦学习，十五六岁时就能弄通石刻的“莲花漏图”（古代的计时器）的原理。到32岁时，他的科学知识更加丰富扎实了，张文谦就把他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让他跟随张文谦到西北去视察水利设施，修复古渠。1265年（至元二年），他被任命为都水少监，使他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水利建设事业。

早在元朝统一全国以前，刘秉忠就提出要修改历法，因为辽、金以来沿用的《大明历》使用已经很久了，误差越来越大。1276年（至元十三年），忽必烈决定设局改订历法，派许衡、王恂和郭守敬主持这项工作。在这期间，郭守敬通过实测，获得了许多天文方面的科学知识，他深深感到：要制订新历，必须创造精密的仪器。他说：“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今司天浑仪，宋皇祐（1049—1054

年）汴京所造，不与此处（指大都灵台，在今北京市建国门外泡子河北）天度相符。”于是他决心自己动手创制和改造天文仪器。

针对浑仪的缺陷，郭守敬研制了新的仪器——简仪。元代以前所用的浑仪越来越复杂，用它测量天体的赤道座标、黄道座标和地平座标的读数，每个系统都需要有专门的环圈，因此大大小小的互相圈套的环圈有八九个之多，不但转动不便，而且妨碍观测。郭守敬摒弃了把测量三种不同座标的圈环集中在一起的作法，精简了黄道座标，而把地平座标和赤道座标分为两个独立的装置——赤道装置和地平装置。这两个装置都很简单，使用方便，因此这种仪器叫“简仪”。简仪的设计很精密，刻度最小分格达到 $1/36$ 度，观测结果也就准确多了。当时从尼泊尔来的工艺家阿尼哥，帮助郭守敬制造了简仪。可惜的是，郭守敬的这一重大发明创造，竟在清初被法国传教士纪理安（当时他在钦天监任职）当作废铜销毁了。明朝正德（1506—1521 年）年间仿制的一台简仪，也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被劫走。后来虽然归还了，但已残缺不全，现在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郭守敬还研制了仰仪。仪器的外形很像一口朝天的大锅。在半球的大圆面上，刻着东、南、西、北和 12 时辰；半球面上刻着与观测地纬度相应的横纵线网。大圆平面上用纵横相交的两根杆子架着一块小板，板上有小孔。太阳光线通过小孔，在球面上投下一个倒象，映在格网上，可以观测太阳的位置和日食。

郭守敬还改革了圭表、创制了景符等仪器。圭表是观测

日中影长变化以决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刻的天文仪器。古代的圭表一般高 8 尺，郭守敬把它加高到 36 尺，在表顶又添一根被抬起的横梁，横梁高出表顶 4 尺，这样表高就达到 40 尺，比原来的表高增加 5 倍，因而影长也增加了 5 倍，使观测的误差也下降到原来的 $1/5$ 。现在河南省登封县元代观星台还完整地保存着当时的高表。景符是定影象的仪器。一块铜片，中有小孔，用一小架子斜撑在圭面上。太阳光经过横梁，再通过小孔，在圭面上形成了一个米粒大小的太阳象，象中间有一根细如丝线的横梁影子，非常清晰。景符与圭表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用来观测太阳、星星和月亮。

有了这些先进的仪器，郭守敬利用当时疆域辽阔的有利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测活动。他在全国各地设立了 27 个测景所，最北的北海测景所，设在大约北纬 $64^{\circ}5'$ 的地方，已在北极圈附近了。他亲临全国各地，收集科学资料。经过这们大规模的实测，他不仅测定了有关地方的纬度与夏至日昼夜长短，还测定了黄赤交角为 $23^{\circ}90'$ （合今 $23^{\circ}33'5.3''$ ），这个数字虽然与当时的实际交角尚有极小的误差，但这是科学上的一大进步，因为从汉朝以来，一直认为黄赤交角是 24° 。我国古代把黄道附近的星分为 28 宿，每一宿用一个星为代表，称为“距星”。两距星间的距称为“距度”。古代是用距星为测定星辰的，因此测定 28 宿距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郭守敬的实测后，距度的误差减少了，精密度提高了 1 倍。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的测定工作，对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星，也作了观测，编制了星表。

1281 年（至元十八年），经过郭守敬等人多年辛勤的劳动

编制出来的《授时历》正式颁行了。郭守敬根据自己多次精密测定的冬至时刻的结果，并利用历史上从祖冲之《大明历》以来的六次冬至时刻的观测资料，证实了一年为365.2425日，它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授时历》就是采用这一数据的。这在世界的历法史上还是第一次。现在国际上通行的格里哥里历也是采用这一数据的，但格里哥里历比《授时历》晚了整整300年。

《授时历》是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的新历法。根据新历法推算出的节气比较准确，因而对农业生产帮助很大。

郭守敬在天文、数学方面的科学著作很多，有《推步》、《立成》、《历议拟稿》等，可惜现在都已失传了。

在水利工程技术方面，郭守敬也有光辉的成就。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春，他担任都水监长官，负责整修已经荒废的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决定引白浮泉水解决了河水的来源问题，用了一年多时间疏通了这条运河，定名为通惠河。为了解决由于河床倾斜坡度造成运行的困难，他在这条运河上每隔10里设置一个闸门，在距离闸门半公里的地方又置斗门，使船只得以顺利通过。这样，从杭州到大都的大运河完全通航了，过去每年从南方运来的粮食到通州后就要陆运，驴马死伤不可胜数，现在通行无阻了。

郭守敬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一生坚持不懈，亲自从事科学实验，并善于吸取前人的科研成果，因而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一直到86岁那年他去世时为止，他始终没有中断自己的工作，真可以说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科学事业。

元代的地理学

为了加强统一，控制边地，忽必烈曾设想利用黄河把西藏和大都联系起来，于1280年派女真人都实去勘察河源。都实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出发，向南经4个月的实地考察，把黄河源头定在火敦脑儿（星宿海），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察对河源作出的判断，这个判断虽不如现代的结论科学，但比汉唐以来的说法实切多了。1315年翰林学士潘昂霄记录了参加勘测的都实弟弟阔阔出所述的考察过程，写成了《河源志》一书，实际是河源考察报告，其中对河源地区的地形、水系、植被、动物、人口、聚落分布都作了简要介绍。朱思本把有关河源的梵文图志泽成汉文，增补了有关河源的知识。

朱思本的《舆地图》，也是地理学上的一项重大贡献。朱思本，江西临川（江西抚州）人，初为龙虎山道士，后以道教法师居大都，曾奉诏代祀名山河海，他利用前人的经验和图籍，依所实际调查的资料，用了10年时间绘制成《舆地图》。绘图时仍用西晋裴秀创立的计里画方的方法，即画图时打上方格，每方格代表一定里程，但精确度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地图，且在图中反映了河源探测的新成就。该图长宽7尺，并曾刻石于清的三华院，今已佚。明代罗洪先的《广舆图》保存了其基本内容。

元代官修的地理总志称《大元大一统志》。忽必烈于1286年命札马鲁丁、虞应龙等开始编纂志书，于1291年完成初稿755卷，名《大一统志》。稍后又得云南、甘肃、辽阳等《国志》，便由李兰肸、岳铉等继续重修，于1303年成书，凡600

册，1300 卷，定名《大元大一统志》。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舆地书，今有残卷存世。

私人撰写的地理学著作有《真腊风土记》1 卷，撰者周达观，永嘉（浙江温州人），曾奉命随使赴真腊（柬埔寨），此书是据其亲身见闻写成，记述了柬埔寨人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情况，也记述了中柬人民经济文化交往的情况。又有《岛夷志略》1 卷，撰者汪大渊，江西南昌人，于 1349 年之前，曾两次随商船到东南亚、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地，归国后写成此书，在南昌单独刊印流传。

王祯和《农书》 及司农的《农桑辑要》

元代的农学著作很丰富，留到今天的有三部著名的农书，这就是官方司农司所编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和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这里我们要讲的是王祯和他的《农书》。

王祯是山东东平人，由于他的生平活动史料记载很少，我们只知道他曾做过两任县官：1295 年（元贞元年）任安徽旌德县的县尹，在职六年；1300 年（大德四年）任江西永丰县尹。据《旌德县志》记载，他当县官时，生活比较俭朴，办学校、修桥梁、施医药、认真劝农，做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是封建时代的“清官”。

元朝的大统一，为全国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由于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很迅速的。在这样情况下，人们渴望有一部总结和指导全国农业生产技

术经验的农书，这是很自然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社会需要，才促使王祯下功夫去研究农业技术，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写出这部《农书》来。他认为：农业是天下的大本。一夫不耕，就要挨饥；一女不织，就要受寒。作为一个地方官，应该熟悉农业生产知识，否则就不能担负起劝导农桑的职责。为了写好《农书》，他平常很注意农事，仔细观察，用心考察和积累农业知识，大约在永丰任职二年后，完成了该书的初稿，后来又花了10年时间进行修改补充，到了1313年（皇庆二年）时才正式付印出版。

我国古代历来有编写农书的优良传统，但是还没有一部书能从全国范围的角度来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虽然很有价值，但还仅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南宋陈敷的《农书》也只限于江浙一带；元初的《农桑辑要》主要也是北方地区的。而且这些农书离开王祯那个时候已经有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了。王祯这部书兼论南北，对南北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进行分析比较，这在中国农书编写史上还是第一部。

《农书》的内容主要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桑通诀》，第二部分是《百谷谱》，第三部分是《农器图谱》。

《农桑通诀》可以说是农业总论。内容包括农业史、授时、地利、耕垦、耙劳、播种、锄治、粪壤、灌溉、收获，以及植树、畜牧、蚕桑等方面，是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关于“授时”和“地利”：王祯很重视“不违农时”，认为播种一定要适合农时，不能错过时机；他对各地的气候、地形、土壤等自然条件作了比较，认为农作物应该根据环境不同而有所不

同，提出了选择适宜于环境的作物和工具以及改造自然的主张。关于“播种”：他认为选种很重要，并介绍和推广占城稻等优良品种；他还主张实行多种经营和作物轮种。关于“粪壤”：他列举了大量肥源，并认为施肥是提高地力、改造土壤的关键。关于“灌溉”：他的基本思想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就是说：依靠兴修水利等人事努力，可以克服天灾而夺得农业丰收，因此他特别强调灌溉的作用，具体介绍了引水的方法、南方围田和圩田的建设。

此外，王祯在这一部分里还主张推广北方的“锄社”，以解决农忙时劳动力的不足。

《百谷谱》分别叙述各种农作物、蔬菜、瓜果、竹木等种植培养法。这一部分主要是介绍农作物品种，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棉花的推广。元朝时棉花主要产于南方，后来北方和西北也渐渐种植，但当时有人以“风土不宜”为理由，认为北方不宜种植。王祯觉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说：种不好棉花是因为种植不认真、不得法造成的，于是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种植的方法，并断言：种植棉花，南北方都可以获利。

《农器图谱》是《农书》中最有创造性的部分。书中绘出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和田制、农舍、灌溉工程、运输工具、纺织机具图共 306 幅，每幅图后面都有一段文字说明，描写这种工具的构造、来源、演变和用法。其中许多是当时最新式的农具和器具。如出现了用四牛拉的犁，节省施肥工序的下粪耒耨式耒车，割荞麦用的推镰和灌溉用的牛转翻车、高转筒车等。

王祯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农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机械设计师和印刷技术革新家。东汉杜诗制造的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的“水排”，到元朝时已经失传，王祯经多方搜访，加以研究、改进，把古人用皮囊鼓风改用木扇（简单的风箱）鼓风，对提高冶炼技术有重大意义。王祯还创制了木活字，并且成功地把它用来印刷。他在旌德县撰写《农书》时，估计到字数很多，雕版有困难，就亲自指导木工花了两年多时间，制造了3万多个木活字，并试印了他自己编写的《旌德县志》，全书有6万多字，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印了100部，效果很好。王祯把这次造木活字的方法与排版、印刷经验，写成《造活字印书法》附在《农书》后面。他发明的“转轮排字盘”，工人只要坐着推动转盘，就可以拣字，大大节省了印刷工人的劳动强度。

王祯通过对劳动人民的接触，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在《农书》中流露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说：“种田是多么艰难啊！而高高在上者，不知道衣食来自何处，只知道骄奢淫逸，不想想寸丝口饭都出自农夫田妇之手，反而对他们拚命剥削和压榨！”在书中有许多地方强调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因此，《农书》是一部进步的科学著作。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这本书也在一些地方带有迷信色彩，这些糟粕今天是应该剔除的。

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饮膳正要》是营养学专著。元忽思慧撰，成书于元天历三年（1330），《元史·艺文志》著录，第一部医学书目明

《医藏书目》亦著录。现存主要版本有明经厂刊大字本。上海涵芬楼影印明景泰间刊本等。

忽思慧（约 13、14 世纪间），蒙古族人，元代营养学家。延祐、天历（1314—1329）年间，担任宫廷饮膳太医职务，管理元朝上层阶级饮食、营养卫生、饮食疗法，有较深入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心得。他“将累朝亲侍进用奇珍异饌汤膏煎造及诸家本草、名医方术所必用谷、肉、果、菜，取其性味补益者，集成一书”（自序），命名为《饮膳正要》。

《饮膳正要》3 卷。卷 1 包括：“养生避忌”，记述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日常生活中的养生注意事项；“妊娠食忌”，记述胎教之法及妊娠饮食禁忌；“乳母食忌”，为选择乳母的条件和乳母需忌杂事；“饮酒避忌”，是饮酒和酒醉后的注意事项；“聚珍异饌”，收集了 94 种珍贵食品的功用、原料组成和调剂方法。卷 2 包括：“诸般汤煎”，记述 56 种浆汤的功用、原料组成和调剂方法；“诸水”，介绍玉泉水等 3 种水的产地、性味、功用；“神仙服饵”，介绍 24 种使人延年益寿、返老还童的补养药物的制法和功用；“四时所宜五味偏走”，指出四季的特点和饮食、衣服加减上的注意事项，并论述酸苦甘辛咸五味对五脏的影响和过食五味的害处；“食疗诸病”，记述 65 种食疗食物的功用、组成原料和调制方法。卷 3 列米谷品、兽品、鱼品、果品、菜品、料物等 230 余种，附图 168 幅。每种食品均详述其性味、毒性、功用、过食的危害及烹调的方法；“服药禁忌”记不可杂食或有所犯忌的食物；“食物中毒”记 18 种食物引起的中毒及解毒方法；“禽兽变异”，记述 26 种形象异常不可食的禽兽。

《饮膳正要》从营养学的角度，讲述饮食的营养价值，烹饪技术，患病期间的饮食制度，饮食的卫生要求等，主张治病应首先讲求饮食，以饮食疗法为先。本书对日常食品的营养价值有比较正确的理解，主张一般的食品，特别是蒙古族的常用食品羊肉、牛羊奶以及五谷、蔬菜、瓜果即是补益人体的“聚珍异馔”。书中还提醒人们注意食物烹饪、储存过程中的变质问题和营养价值的损失，注重饮食不洁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并在医学中首次引入“食物中毒”一词，在书中立有专篇论述食物中毒。此外，书中还对蒙古族饮食营养方面的术语、食物名称及卫生习惯等，有较多的记载，为研究元代蒙古族的生活习俗和饮食卫生习惯，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饮膳正要》是现存最早的古代营养学专著，是研究我国营养学、食疗学、饮食卫生学乃至烹饪学的重要文献。英国当代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为题，对忽思慧和他的《饮膳正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饮膳正要》对由于维生素B₁所致的脚气病的饮食治疗，证明了“经验上的饮食知识，特别是某些与营养缺乏病有关的疾病，是比我们通常所知道的要古老。”他甚至认为，认真研究中国文献可能会给现代生理学家和病理学家以某些有益的启示和线索。

黄道婆与棉织技术的推广

黄道婆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棉纺织家。她对我国棉纺织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黄道婆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家住松江乌泥泾

(今上海县华泾镇)。她的生卒年代和身世没有详细记载，大约生活在 13 世纪中叶的南宋末期和元朝初朝。她的真名字也没有留下来，后人称她为黄道婆或黄婆婆。

黄道婆生活的时代，正是植棉业传到江南的时候。棉花自印度传入我国，经过南、北两路：南路，经过南洋的国家，传入现在的云南，云南的少数民族哀牢人当时生产出一种名叫“白叠花布”的纺织品，这是我国植棉、织布的最早记录。北路，传入西域（现在的新疆），约在公元 5 至 6 世纪的南北朝时代。

上海地区的植棉业，是由南路传进的。首先传入乌泥泾，种植在一块名叫“八千亩”的地方。随着棉织技术逐渐被人掌握，棉织品很受群众欢迎。因此，黄道婆很小就学会纺织技术。不过当时乌泥泾的棉纺织技术，是非常落后的。

黄道婆从小受尽苦难生活的煎熬，被迫给人家做童养媳。在 18 岁那年，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牛马般的生活，她决心逃跑。有一天夜里，黄道婆在茅草屋上挖了个洞，逃到黄浦江边，悄悄躲在一艘即将远航的海船中。这样，她一直漂流到远离故乡的海南岛崖州（今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崖县）。

当地黎族人民看她只身度日，都热情帮助她，并教她棉纺织技术。

黎族地区自 11 世纪（北宋中期）以后，就已大量种植棉花，棉纺织业也有所发展。在南宋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一书中，介绍了那时的纺织情况：“取其茸絮，以铁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纺，不烦缉绩，以之为布最为坚善”。当时生产的棉织品种类很多。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黎族：“妇人

不事蚕桑，惟织吉贝（棉花）花被、縵布、黎幕”。光是往南宋都城临安（杭州）“进贡”的，就不下 20 多种，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布等多种棉纺织品，其中被染成各种彩色的“黎单”（宽幅床单）、“黎饰”（幕布）等，更为精美，远销内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黄道婆虚心向黎族姐妹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全套操作技术，成为技术高超的纺织能手。

黄道婆在崖州生活了 30 多年。在她 50 岁时（公元 1295—1296 年间），搭乘顺路的船重返乌泥泾。

这时候，元朝已代替了宋朝。江南地区的生产逐渐恢复，经济有了好转。但是，乌泥泾的棉纺织技术仍处于落后状态，随着人们对棉布需要日益增加，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提高。正在这时，黄道婆从崖州回来了。

黄道婆在黎人织布技术基础上，发明创造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全过程的新生产工具，确立了一套较完整的生产工序。

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原来人们一直用手剖去籽的方法，手指极易疲乏，工作效率很低。黄道婆创造了轧棉搅车，用 4 块木板装成大框，上面树立两根木柱，高度在 1 尺 5 寸左右，柱头镶在一根方木下面，柱的中央装着两个曲柄转轴，利用两轴间相互辗轧，将棉籽从棉絮内挤压出来。

第二道工序：弹花。用 4 尺多长，强而有力的绳弦竹弓代替原来 1 尺 4 寸长、弹力轻微的线弦小竹弓。用弹椎敲击弓弦开棉，代替指拨弦弹花，保证了成纱质量。

第三道工序：纺纱。她创造了一种 3 个纺锭的脚踏纺车，

比原来手摇一个纺锭的纺车劳动强度减轻了，生产效率提高数倍。

第四道工序：整纱和织布。她改进了原先所使用的投梭织布机，能织出各种美丽的棉布。

此外，在“崖州被”启发下，又发明了织宽幅被褥等多种棉织品，并能织上许多好看的图案。

这些革新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因此黄道婆的纺织技术普遍地传播。乌泥泾靠棉织为生的增到千余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各地。我国人民就是从那时开始普遍穿棉布衣服的。

黄道婆热心地教当地妇女“错纱配色”，“综线挈花”，深受尊敬。她在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去世后，当地人民怀着悲痛的心情埋葬了她。后人为了纪念她，又给她立过祠。直到现在，当地人还用歌谣歌颂着她。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和推广，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具体地说明了劳动群众创造了古代社会的文明的事实。

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

元代版图辽阔、国家统一，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文化、科学技术的广泛交流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批汉族人民移居到少数民族地区，许多少数民族迁居到内地，因此，在元代不仅出现不少用本民族文字从事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翻译家、科学家，还出现了用汉文从事著作的少数民族文学家、翻译家、科学家。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珍贵的一部分。

在文化艺术方面，元代少数民族有许多自己的创造。以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品来说，当然首推成书于1240年的《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它是一部著名的蒙古古典作品，是蒙古人用畏兀儿古蒙文记叙自己民族历史的第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也是汇集了蒙古民间诗歌、传说和小说的文学巨著。这部书是我们今天研究早期蒙古历史的最可靠的依据，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重视。

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少数民族歌舞传入内地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到了元代后，这种歌舞在内地更加广泛流传了。早在成吉思汗时，西夏音乐就已深受蒙古人的喜爱。后来，随着蒙古政权统治地域的扩大，回回乐器和演奏者也随之进入内地。特别是元朝宫廷里，有汉、回回、西夏3色细乐，每色各3队，每队达324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乐队。至于民间，欣赏西域歌舞成为大众的乐趣。

居住内地的少数民族，其中许多人掌握了汉文化。因此，元代以汉文化从事写作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家特别多，成就特别大。著名的诗人有蒙古人马祖常，回回人萨都刺、迺贤、丁鹤年，畏兀儿人小云石海涯（贯酸斋）等。其中萨都刺的诗，后人有“诸体具备，磊落激昂，不猎前人一字”的评价。他的《念奴娇·登石头城》十分豪放，是一首借古抒怀的词，颇有苏东坡《赤壁怀古》的风格。这首词的上阕是：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舫，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迺贤的诗则有不少是现实主义的好作品，如《颍州老翁歌》、《新乡媪》、《卖盐妇》等诗，如实地反映了元朝封建统治下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如《新乡媪》一首，描写了在官府逼迫、地主索债的情况下，一个农村老媪只好卖孙抵债的情景：

茅栏雨雪灯未昏，豪家索债频敲门。
囊中无钱瓮无粟，眼前只有扶床孙。
明朝领孙入城卖，可怜索价傍人怪。
骨肉分离岂足论，且图偿却门前债。

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少数民族也有许多人成为著名的元曲家，现在见于记载的有出身于蒙古、畏兀儿、回回、唐兀、女真等族的元曲家 10 余人，其中女真人蒲察李五（即李直夫）有杂剧 12 种，现存的《虎头牌》，描写了金牌上千户山寿马对其叔父银住马倚势玩法、贪酒失地严加惩处、执法不阿的故事，剧中采用了许多女真乐曲，显示了各民族互相交流的成果。

元代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史学家。参加辽、金、元三史修纂的就有蒙古人帖睦尔达世、西夏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有些少数民族将许多汉文著作译成少数民族的文字，畏兀儿人安藏先后将《尚书》、《贞观政要》、《申鉴》、《资治通鉴》、《本草》等书译成蒙文。回回人察罕精通多种文字，他曾译蒙文《脱必赤颜》（《秘史》）、《圣武开天记》、《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为汉文。畏兀儿人迦鲁纳答思译过不

少佛经。

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的画家有善画山水的畏兀儿人丁野夫、回回人高克恭等，善画龙的畏兀儿人伯颜不花，善画花鸟的畏兀儿人边鲁。其中高克恭的国画在元代负有盛名，人们常常把他和大画家赵孟頫相提并论，作品有《云横秀岭》、《墨竹坡石》等。著名的书法家有回回人鲜于枢，人们称他的字有“晋人笔意”，畏兀儿人盛熙明是书法研究者，有专论书法的著作《书法考》9卷。

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人们熟知的西北少数民族的种棉术、酿酒业，蒙古族的养马术、织罽业，藏族的建筑术，西南少数民族的纺织术等传入内地外，许多迁居内地的少数民族科学家，在天文、地理、水利、农学、医学等方面有许多成就。

著名的回回科学家瞻思，精于天文、地理、数学、水利等知识。他的祖先是阿拉伯人，生长在河北真定，从幼年起即博览群书，学问渊博。他根据宋金时期治理黄河的经验和著作，重新汇编《河防通议》一书，是后来治理黄河的重要参考书。此外，他还著有《镇阳风土记》、《续东阳志》、《西国图经》等地理著作，可惜大部分已经失传了。

医学家萨德弥实是回回人，曾在泰定年间任过建昌（今江西南城）地方官。他对中医很有研究，著有《瑞竹堂经验方》一书。回回人忽思慧的《饮善正要》一书，吸收了汉、蒙、回、女真等族人民的饮食经验写成的，其中介绍许多植物为我们研究古代植物志提供了重要资料。忽思慧对这些植物性能的介绍，又反映了他对中医医药学和营养学的研究成果。

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则是元代三部著名的农书之一。当他任安丰（今安徽寿县）肃政廉访使时，对江淮地区的农业情况作了许多调查，最后写成了这本书。这本书以崔实的《回民月令》的体例，以农家月计划来按月编写，补充了元初编的《农桑辑要》中《岁月杂事》那一篇的不足。书中按 12 个月详细记载了每月应作什么农事、应准备什么农事，搜集了许多农谚，如“移树无时，莫教树知；多留宿土，记取南枝”、“十耕萝卜九耕麻”等，作为经验介绍给农民。书中还有许多关于收贮蔬菜、制作酱菜等生活常识的介绍。

回回人也黑迭儿是著名的建筑师。元世祖忽必烈营建大都城时，新的宫城就是他设计的。大都城在辽金故城的东北面，方圆 60 里，共 11 门，宫城周围九里许，高 35 尺，有 6 门。也黑迭儿参与设计、修建的大都城，规划整齐，“有如棋盘”，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元代少数民族在文化科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卓越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的少数民族是勤劳、聪明的民族，他们为中华民族文化科学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